

血 纪

孔令平 著

下 集

目 录

第一章：恶梦刚醒.....	1
第一节：归程.....	2

陈容康的家.....	6
第二节：访张锡钹家.....	8
第三节：被暴政摧毁的家再组合后.....	12
第四节：同母亲重逢.....	17
相亲.....	18
范小妹.....	21
汪秃子.....	23
第二章：落实政策的马拉松.....	27
第一节：回校.....	27
第二节：衙门口前的上访者.....	32
第三节：草菅人命的中级法院.....	36
第四节：区统战部的官架子.....	39
第五节：第二次回重大.....	41
第六节：政治需要.....	45
老秦.....	47
第三章：一段教书的日子.....	49
第一节：走人户.....	49
第二节：二十四中学.....	51
第三节：课堂上.....	55
第四节：天下靠自己争.....	58
第五节：对母亲的歧视.....	60
第六节：我的初恋和婚姻.....	68
（一）“片断”的第二个读者.....	69
（二）逆缘.....	72
第四章：母亲摆脱了伤心地.....	77
第一节：刘老先生相助.....	77
第二节：解救范小妹.....	80
第三节：峨嵋游.....	82
第四节：第二次落实政策.....	91
（一）重回北碚.....	91
（二）搬离蔡家场.....	93
第五节：卢文南.....	95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00

第一节：进入工厂	100
第二节：闹闹嚷嚷的“达标”	106
第三节：遭逢绝境的农汽厂	125
第四节：柳暗花明	135
第五节：李伦的两手	143
第六节：我为一塌安身处而争	153
第七节：专汽大业的破灭	158
第六章：如此霸占民宅	165
第七章：在暴政扭曲下人性的畸变	174
第一节：右派	174
第二节：常见的社会现象	178
（一）假话猖行	178
（二）红卫兵遗毒	181
（三）冤狱继续泛滥	182
第三节：人性的复苏	184
第八章：风云满布的年代	185
第一节：山雨欲来	185
第二节：“六四”中国民众在怒吼	181
（一）在北京	191
（二）在我周围	194
（三）今天和昨天	195
（四）屠杀	197
（五）历史会记住这天	202
第三节：“六四”以后的那几天	205
第四节：从游行想到的	211
第九章：在中共摧残下我的家解体了 ..	216
第一节：致命的跌交	216
第二节：对妈妈的怀念	221
第三节：为保护生命权打官司	223
第四节：我的父亲	226
第五节：合葬	227
第六节：孩子在绝世里挣扎	229

第十章：退休后的打工.....	233
第一节：四 轮 摩 托.....	233
第二节：枪杆子也抢民品.....	236
第三节：城 市 猫.....	242
第四节：在 劲 龙 公 司.....	249
第五节：脑出血·打工的终止.....	252
第十一章：寻 访.....	258
第一节：寻找烈士的家	258
第二节：马开先的下落	259
（一）线 索.....	259
（二）訪少年学友	261
（三）意外得來.....	265
第三节：王大炳和他的女儿.....	269
第四节：潘朝元.....	276
第五节：夏光然.....	287
第六节：散落市井的盐源难友.....	296
第十二章：前 途.....	302
第一节：市井公害.....	302
（一）滥造.....	302
（二）乞丐、娼、赌、毒.....	304
（三）假.....	306
第二节：台湾是中国的希望.....	308
（一）不该出现的.....	308
（二）希望在台湾.....	312
第三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14
（一）“真善忍”与“假恶骗”.....	314
（二）群体事件·民愤.....	316
（三）国企改制后.....	318
第四节：独裁的没落.....	322
后 记.....	328

第一章：恶梦刚醒

恶梦醒来，猛然一惊，不知身处那里？刚从地狱出来，我该到哪里去？啊！**该回家了**，回家本是同久别亲人团聚的旅程；是同父母亲人久别后的第一次拥抱；而我首先要向他们倾诉在地狱中险些丧身的经过。

灾难**无缘无故**降临给刚刚才 19 岁的我，我被丢进了地狱**整整二十三年**。在地狱里，我失去了所有美好的回忆。

从少年时代起，大陆就被苏俄控制，今天我们居住的这片海棠叶，无缘无故的碎裂成几大片，这**那是我的祖国？我的家？**生活的故土破碎成这样，大家都在反思，为什么过去的梦碎得这么惨？

我们家本来人丁不旺，小小的五口之家，以教书为业，**教书匠本与世无争**。我的父母终生辛勤育人。却没想到，被口口声声以解放人民，建立繁荣富强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弄得家破人亡**。

1948 年正是中华民国国难当头，怀着对三民主义的忠诚，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我的父亲辞去杭州师范校长职务，毅然应顾毓秀先生之请，去南京接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校长之职。

就因此，三年后，他首先进了中共的大牢，从此音信杳无。当局向我们全家封锁了他的消息，连判决书都不给。

直到 1984 年，经我反复追查，才从四川省劳改厅证实，他已于 1956 年 3 月 6 日在劳改营中死亡。

我离重庆时的母亲

从那以后，和平年代里我们的家，就在中共沦陷区里惴惴渡日，在黑五类的泥坑中挣扎，在“阶级斗争”大火中燃烧。

我失去了抚育我长大成人的外婆；我再也听不到她讲述炮火连天的南京城里，我在国难中降生。少年时代她驼着背同母亲一起挣扎在大风大浪中，艰难的带着我和弟弟长大。

二十三年前竹篱门前，她用苍白的鬓发吻别我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她的生离死别！

我的弟弟生性软弱，从小就负着‘黑崽子’的重枷，饱受社会的欺侮。我永远不会忘记二十三年前我和他在小龙坎的‘团聚’，更没料到那次团聚又成我们的生离死别。

“文革”夺走了我唯一的兄弟，母亲因经不住这个打击和造反派的凌辱，烧去了仅存多年的老照片，准备跳水自杀。

今天，离家整整二十三年了，原先的家已被中共消灭，现在只剩下了唯一的母亲，她几经生死，而今不知如何？我现在正在回到她身边的归途上。

她能重新振作，同我一起再建我们的家么？我们能重新恢复过去的一切么？

从 1949 年起，在“无产阶级专政”暴力下，枪杆子逼着我做乌托邦的恶梦。现在恶梦过去了，当我醒来时，到处还听得见啼饥号寒声，城市像经历战乱，满目苍夷。

“共产主义”给大陆留下一场欺骗。现在每当阴雨夜晚，无数冤魂都会在夜空中发出索命的喊声令人闻之心惊。该牺牲的牺牲了，该得到的却得不到！

但是，对中华民族造下那么大的破坏，而中共好像并无反悔，反到若无其事的又在津津乐道宣扬“四个现代化”的胡诌了！当我艰难的从下水道里爬出来时，他们对我们悲惨的过去，并无丝毫同情。

尤其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惨痛的现实中，怎么还无人发出重新振作的疾呼？为什么受压迫者至今还不敢喊出：“还我同胞的血！还我们百年来用生命争取的民主自由！”

难道恐怖还没解除？恶梦还缠着大多数人？

旧梦既碎，我们的未来需要新的梦想。但是**做新梦得讲新追求，中华民族追求什么？礼，义，廉，耻。然而大陆有么？今天的大陆人没有廉耻，更无礼义，梦都不知从何做起，大陆仍在沦陷中？原来我们都受骗了！**

我已四十二岁，二十三年来，在狱中向中国独裁势力拼死斗争中，与我一起冲军边荒的挚友们，多被中共杀害，苍天将我幸存下来，我该如何不负牺牲人们在天之灵的嘱托？不负中华民族的重托？

所以首先我该把这二十多年狱中所经历的都写出来，期望大家读后摆脱恶梦的缠绕，警醒过来！

第一节：归程

汽车在黄沙滚滚的公路上颠簸，这情况与当年我们从黄联关到盐源时并无两样。不过那时是64年初春，而今已是79年深秋，风沙丝毫改变它的顽劣脾气，任性的吹到今年的夏初。夹着砂石的风沙打在脸上很痛。

到了骡马堡已是下午一点钟了，在路旁的食店里匆匆吃了中午饭便上路，下午便是翻越小高山这段全程中最艰险的一段。

汽车挂上一档，吃力的向山上爬，气温也越来越冷，我把预先准备好的棉衣从提包里取出来穿在身上。

渐渐的，路面开始变硬，汽车的轮胎在翻越几段隘口时开始打滑。现在从车窗里向前上方望去，在那白雾缭绕之处，隐隐现出白雪皑皑的山头，有“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之感。

司机把车停在山腰间的枯草坪上，从驾驶室的坐垫下面取出了预先准备好的“铁脚码”，套在汽车的轮胎上，沿着越来越窄的曲折山路蜿蜒爬进。

偶尔在山隘口或转弯的地方，出现一些屋顶很尖的茅草屋，看不清楚那屋里是否住着人，我想那一定是平时护路的道班偶尔歇脚的地方。大雪封山时，他们都离开了。

雪景渐浓，松树上挂着一串串的棒冰子，这景色是住在平地上的人们所难以看到的，也是我几次经过这里时没看到的，因为以往都是被枪押着，蹲在被雨逢严严实实封住的卡车车厢里，无法掀起篷布去观看雪景。

现在坐在公共汽车里，从车窗回首下望那些尖尖的茅屋，像是在一片雪景上依偎在松树林的小风帽，很像我童年时喜欢的贺年片景像。

不过此时，在我脑海里给这景色着上了森严可怕的背景，那寒气逼人的松树，个个都像手中端枪的老管，它们站在马路两边，好像在监视从他面前经过的每一辆喘着大气的汽车，咄咄逼视着车里的每一个旅客。

无怪乎在我被监禁这里的十五年中，我们中因忍受不住这监狱非人折磨，冒死逃亡成功的甚是寥寥，就算是一路逃掉鹰犬追捕，在进入大山后，也难以翻越这丛山峻岭。饿死和冻死在这大山里的逃亡者不计其数，大山里留着他们的骸骨。当年选中盐源作监押的禁地，构思堪称奸诈。

汽车还没有爬完最高峰，天色已暮色苍茫，但山巅却成一片银白色的海洋，我的身上此时越发的感到寒冷，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此时想起从盐源出发前准备好的馒头和水壶，庆幸那水壶里的水还没有结冰，便从衣包里取出，揭开盖子，一口馒头，一口水，边吃边喝起来。

向下滑行的速度渐渐加快，两旁的雪景也渐渐消失，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便到了山底平地，此时天已黑净，车已驶近黄联关，气温也回升到原来的温度。

我伏在车窗上，想借那夜色月光，找到十五年前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但是两旁稀稀拉拉的平房中，却没有看见那兀立的烟冲了。问左右的乘客，知不知道这里原先的高炉群？他们说那早已拆掉。

人世苍桑，二十年前一轰而起的怪物，早就埋在荒草丛中了。

然而这一页历史永远留在我们这一代的脑海里，毛泽东肆无忌惮拿中国百姓作试验，役使他们，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暴君。当年许给老百姓的共产主义，使中国白白折腾几十年，饿死，整死几千万老百姓，中国人几代人的血汗变成一堆黄土，中国的百姓怎不潦倒？

汽车在茫茫夜色中向西昌急驰，道路也越来越平坦整直，路旁的建筑群也越来越高大，越密集，整齐排列的路灯一直伸向远处，一座繁星点点的城市在地平线上距我们越来越近。

那天边天幕烧成了半边红色，与十五年前我们刚到黄联关时，黄沙茫茫的景象大不相同，文革十年，恐怕也只有在这里大大变了样。

汽车驰抵城区，马路边巨幅的石刻语录碑上，赫然现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不就是当年朱洪武的座右铭么？只是这“不称霸”真有些招摇撞骗。这里便是被一代“导师”所定的导弹发射基地。西昌因而成了中国西部军事重镇。

在盐源这几年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常常见到头顶上兰空深处，一缕灰白色的烟云划天而过，接着便会从牦牛山上，传来一阵隐隐惊雷般的闷响，文革大乱年代，林彪的爱将吴发宪曾奉旨在此，苦心经营多年。

在当时崩溃的中国经济沙滩上，兀立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犹如在骨瘦磷峋的劣马上驭着一个全付铠甲的战神。独裁者从极度贫弱的国民经济母体，挤出带血的奶，三十年灌养这尊全付铁甲的战神。

汽车在强烈的灯光和电弧光交相辉映下，驶进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工地，这儿正在修建一个巨大的火车交换台站和站前设施。从车窗里我望见了那凌空跃起，盘旋左右的立交桥。

汽车驶过了这段工地后停了下来。火车站的旁边就是长途汽车站，借着这

如同白昼的灯光，我很快找到了车站旅馆，跨进了服务员为我安排的房间，壁上的钟已指着零点正。

墙外还闪着电弧光以及隆隆响声，我此时已疲倦至极，无心观赏，抓紧时间洗脸洗脚，很快躺上床，带着旅程第一天的疲乏，迅速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从床上醒来已是早上七点钟，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去车站购买当天去石棉的班车票。洗漱完结，跨出门外，望天空却是一个上好的晴天，昨晚旅途的风寒已经消失。买到车票后，循着昨晚原路，再次看这建筑工地。现在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在太阳光下泛着一片银灰色，显得冷峻和杀气。

八点半钟，我已挑上了行李坐上了开往石棉的班车，这一天的行程，比前一天已大不相同，气候特别暖和，不但棉衣穿不上了，就是穿夹衣都还有些热，公路两旁的田野上人们正忙着秋收秋种，气氛已不同于十五年前。

那时的农民，被牢牢钉死在人民公社的圈地上。饥寒交迫的人们，无力整治自己的家园，任田园荒芜，荒草丛生，比之任何历史上的专制王朝更凄凉。而北京的御用笔杆子还狂叫什么“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曾狂热拥戴过毛泽东，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连篇谬论的邓小平，等毛归天后，断然“窜位”，取毛氏所钦定的后继人而代之，第一刀便割掉了那套在六亿农民颈上的绞索——人民公社。

这本是“民以食为天”的治国安民的基本出路，既谈不上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谈不上由此而迈入四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传说，北京为 1976 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时，愤怒的石井山钢铁厂的工人，曾去怀仁堂请愿，要求他校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举动，将装在水晶棺中的这个魔头，挖出来放进炼钢炉中焚尸扬灰，却遭到邓氏的拒绝，他说：“三七开吧，谁人孰能无过？我看他七分功绩三分过失”。

一捶定下了和盘接过专制政体的衣钵。毛泽东反了多年的儒家忠孝节义的“文化大革命”，丝毫没有反掉这个小伙计头脑中的“正统”观念，也许小伙计懂得这层道理：叛逆，叛逆，终将祸及自身！

汽车进入铁索桥，那傍桥而立的广场依然如故，只是那原先的露天看台已经封闭改成了一个游乐中心，那里还依稀可闻其间传出来打麻将的哗哗声，在这儿就业安家的“刑满释放犯”就此留滞在这里。当年中共享枪杆强迫留下来刑满人员，今天成了从内地来的“移民”，那里成了新移民区。

投宿石棉一夜后，翌日一大早，整个石棉城还倦缩在灰蒙蒙的月光下，我就登上了开往雅安的班车，开始了我回归的第三天里程。

我对雅安记忆所以深刻，是因为在流放边荒整整十七年中，留下过值得我记念的历程，这里有三元宫，砖瓦厂它们曾留下我们的反抗印迹。

眼前雅安城在青依江的环抱中无比秀丽，在宽畅湖心荡样的游艇，点缀着湖面，这画景虽不能与西子湖比美，身临其境仍有一种陶醉之感。但因为二十二年黑牢中渡过，在我生活中烙下的阴影却挥之不去。

忽然间听见一迭声“叮叮当”的清脆敲击声，远处一个汉子挑着一付箩筐，

一边敲着刀块朝我走来，这是四川传统卖麻糖的叫卖声，我已有二十多年没听见这呼卖声了，记得十三年前我去成都参观中就讲过一段观感，我说，“什么时候能看到沿街叫卖的民间小吃，就证明我们国家被卡死的经济开始复苏了”。

这话听来有些粗俗，但细细想来，独裁者借对资本主义的砍杀，一并砍杀了人民求生的所有出路，独裁倒是建立了，但人民求生计的毛孔却被堵死了，他那管老百姓的生存呀！

我向小贩招手，他走过来，我便掏出了两块钱买了半斤，找到了一个石凳坐下吃起来。

迎着凉爽的秋风，看着马路上结伴相依的男女和牵着孩子的老人，在街心盛开的菊花丛中散步，这是多美的人间啊？为什么独裁狂，给老百姓留下这么长时间可怕的痛苦，为什么他这么仇视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

于是我想“魔鬼可以使美丽的城市沦为地狱”。

沿途问道，找到雅安监狱的大门，1962年3月13日，三元宫被枪押送的流放者，用胸膛抵着枪口在牢笼里喊出：“我们饥饿，我们要吃饭”，并且在全付武器的警察枪口下，赤手空拳一哄而抢。

这反抗暴虐的星星之火，从一开始就带进了刚刚建立的甘洛农场，它越烧越旺，持续十余年，当年带头抢馒头，吟唱带镣长街行的人，接着又高举起了“火炬”，他们一个个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下，这又多么悲壮。

毛认准了强迫农民在集体经济中，才能使独裁政治长治久安。

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八年历程，大陆中国人为之付出了不低于六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毛泽东那套强奸民意的东西，再无法施行下去，才不得不改头换面。

当然，民主事业的成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路，还很遥远。

独裁和民主的争论直到今天还在困扰大陆的人们，“四个坚持”像一把高悬的利剑，随时都会落在被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化人士头上。仿佛离了这套，他们就坐不稳江山了。

“改革开放”今成中共的权宜之计，叫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回归之路，在连续四天更换的客车车轮下飞逝过去，当我座在飞驰在川西平坝上的汽车里时，我被那笔直的柏油马路和两旁高耸入云的杨树，以及一望无边的良田所吸引。这块沃土上的农家，比盐源来是桃园了。

然而即是天府之国，又怎经得起豺狼般统治者的几翻蹂躏？记得1963年初我们从成都发沛甘洛时，路经此地仍是一片荒凉！

车进入市区，入夜的成都市上空，被轻逸的歌声所环抱，这又与当年满城“红灯记”、“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的腾腾杀气不同了，“好一朵茉莉花”，那柔美动人的歌声从那些刚建好的水泥方格里飘逸出来。

这一夜，我便在西城区找了一家旅舍住下，按照我归程的计划，路经成都，我首先要拜访张锡镔的母亲，这要先去寻找住在西城区大菜市的陈容康。

陈家和张锡镔是邻居，但是这么长时间了，张家已经搬迁，究竟搬到那一家？却没留下确切地址。

陈容康前一年回成都后，给我来信，说已找到了张家，但并没有写地址，

而是留下了他自己的地址。所以我来成都先要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找到他，再由他带我去张锡镔家。

陈 容 康 家

第二天一早起床以后，我从旅店房东那里问明了去西城大菜市的路径，便直奔那里。一钻进菜市街，其“热闹”程度与十三年前来成都参观时差不多，商店里存放的干鲜货比之六十年代丰富多了，但街道依然是那样的狭窄，那样的破，房子依然是那样的旧，那样的黑，甚至可以说比之当年参观时更脏更臭。

共产党的老套，逢假节日或有人参观检查，预先就要向被参观地方打招呼，清洁做了又做，检查复了又复，直到某个地方官员点了头才可让参观者进入，所以即使骨子里又穷又烂，也要振作精神打扮一翻，免得失了“社会主义的面子”，现在距“国庆”还有好几天，城市以它的原貌迎接了我。

穿过大约只有两米宽的石板路，那巷子里到处堆积腐烂的菜根、菜叶，那道旁的阴沟里流着黑幽幽的污水，散发出令人呕心的臭气，虽已时值深秋，天气也有点冷，但爬在那些烂菜摊上的苍蝇却挺忙碌，一群群挥之不去。

我埋着头在巷子里几乎穿了半个时辰，忽然我在一个岔道口上，看到了一个背朝着我的老乞丐，除了蓬乱的头发那披在身上的一件黑色的破棉衣，那背影好熟悉。

我便停下脚步来看他，他的面前放着一个酸臭熏天的泔水桶，他正用他双手，拂打着蜂拥在泔水四周的苍蝇，一边伸出一只拖着巾巾吊吊破布的手，在那泔水桶里摸着，摸着，摸出了半个泡得胀胀的馒头，他的眼光一亮，便将它狠狠地送到嘴里，好像在同四周的苍蝇争抢一样。

这一瞬间，立刻使我想起了从泔水里捞洋芋的邓自新，二十年中共和监狱真把他们从人变成了鬼，同时也才让我们看清了中共。

我从他身边走过，深深叹了口气，不过那老乞丐的注意力此时在那泔水桶里，并没有向我伸出手来。

按着门牌的号数，找到了陈容康的门牌时，我楞住了，那分明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大院，我伸头向里面望去，那里面住着五、六户人家。

正当我跨进去时，陈容康刚好从一间小屋里走出来。我们已分别两年了，但他还是那个老样，瘦瘦清矍的脸上戴着深度的眼镜。我刚刚跨进大院他便认出了我，迎上前来握住了我的手，将我拉到大院左侧最里面的一间小屋，一面问我何时从盐源动身的，打算到那里去，今后干什么？

我回答他说，农场只给了我加刑两年的“平反”通知书，要等回重大后再看重庆法院怎么来收这场二十年冤狱戏？

拉开一方用白布做的门帘，他将我引进了小屋，屋里大白天开着电灯。像这样四壁没有一扇窗的口袋屋，白天不开灯是同黑夜一般的漆黑。

屋里靠门的角落，一位大约与我的母亲年纪相似的花白头发老大娘，正坐在一架缝纫机上补衣服，那衣服至少也有四五个补丁了，不用介绍，我便知道这是他的母亲，向她行了一个礼。

我环看了一下小屋。小屋大约十五平方，正中放着一张旧式的八仙桌，两张小床以桌为对称中心，安放在那里。左侧墙边靠缝纫机是一个三开大立柜，右侧屋角一块打满布丁的兰布将屋隔出一角，里面放着煤油炉和碗筷炊具。

一看就明白，这母子俩吃喝拉撒全在小屋里。不过房子虽小却收拾得挺干净，因为摆设的家俱只有那么几件，所以小屋里并不拥挤。只是那临街烂菜的臭味，以及成群蚊苍蝇从那门缝处偷偷地窜进来。

陈伯母告诉我，她原来在一家街道办的被服厂上班，陈容康回家后，为让陈容康顶她的班，她已退休，并告诉我，她的退休工资每月才三十元，陈容康刚顶班，工资每月二十四元，母子俩将就着这间小屋，相依为命的住下了。

我问道：这大院里住的人都同她一个单位吗？她点了点头说道，成都最打挤的就是住房，这周围几十家人除了她和陈容康外，那一家都住着三个人以上。尤其是弄堂口左侧那一家，两个大人三个孩子，还不是挤着没办法，屋里安了两张大床外，家俱几乎只好全放在过道上，为此与邻居经常争吵不休。

陈伯母一边同我们聊天，一边又从“厨房”里取出一个大瓷盆，走出屋上街买早点去了。

我问陈容康离开农场时管教科对他作的结论是什么？他淡然一笑说“刑满释放犯，虽然名称很怪，总算让我回到成都同老母在一起，算刑满人员中的幸运儿了。”

我又问他：“四十出头的年纪了，总不能继续打一辈子光棍。”他摇着头，指着这小屋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妈妈的工资只够吃饭，还别想吃好的，那来的钱娶老婆？再说即便有人愿意嫁给我，又那来的房子住？暂时我是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

我心里为我们悲哀。一次反革命冤案，毁了我们的一生，而今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还处于最底层，留着人生的基本问题不得解决，难道我们真的被压在最底层翻不了身，成了社会无人疼爱的弃儿？

接着他询问还有多少人留在农六队，问到陈孝虞，邓洪元、夏光然，邓自新等人的近况。我告诉他，他们都先后去了北鸟，有的回家了，暂时还没有联系。

正谈话间，他的母亲端着一大盆白糕走了进来，拿出三个碗从厨房里取出热水瓶，在三个碗里倒上了开水，三个人围着八仙桌，坐下用了早餐。

陈伯母介绍他十几年的生活往事，占着离菜市场近，常能买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时陈容康哥哥也跟着他母亲住在这棚屋里，小孙子才几岁，每顿吃饭时吵着要吃干饭，全家人为了保证孩子每顿单独蒸一小碗饭，剩下的粮食，三个大人就把它搅在菜羹里吃。

全国老百姓照样都得熬社会主义苦汁。现在不管怎么样，早晨还能有白糕一吃，总比以前好。

她唠叨起来，“**比以前好**”这种满足感，想起来真可爱，中国百姓的忍让力可说实在太强，只要那种饥寒交迫的日子，不重新再来，就很满足了。

老百姓的忍耐不是一种土壤么？中国人为什么在暴政下只知道忍，而不敢反抗？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那种前仆后继的精神那里去了？

第二节：访张锡锬的家

下午，我们告别了陈伯母。由陈容康带路，走出菜市场向西城市中心解放中路走去。

他边走边告诉我，有关张锡锬的未婚妻在成都遇难的情况。张锡锬被捕后，她也在成都被捕，一直关押在成都监狱，后来两人同期在两地遇难。

身心已遭受严重摧残的张母，因闻得两人双双遇难，便昏了过去，从此得了老年痴呆症。如果有人在她面前提到张锡锬三个字，她会立刻抱住他，呼着张锡锬的小名，没有人能劝阻得了。

所以他的大哥，便拒绝一切登门寻找张锡锬的人。即使有人去他家作客，他都有言在先，千万不要当着老人面，再提到这个令母亲伤心欲绝的名字。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便在一片水泥楼群里找到了张家的门牌号 1268。登上五楼，陈容康扣开了那扇紧闭的大门。

一个戴着眼镜，头发花白的男子走了出来，当他看到老陈带来一个陌生人时，皱着眉头，并没把我们让进里屋，而是从门里闪身出来，向老陈问道，“今天有什么事吗”？当老陈介绍了我，说明来意并向我介绍，他便是张锡锬的大哥。

关于他我早已听说，1957 在成都一家报社工作的他，因为如实报导了大鸣大放的校园动态，便说他鼓吹资产阶级右派言论，成为成都新闻界极右份子，送去劳教。最近他才刚“落实政策”，得以继续回报社工作，这里的房子也是才还给他们的老房。

我们握手之后，他叮嘱我，因为母亲的健康状况，不要当她的面提张锡锬，张锡锬这样一对恋人双双被害于同一天确实很少，毛泽东对柔弱知识份子的残暴，在人类历史上都少见，称毛皇上是法西斯头子一点不过份。

经过提醒，我有了思想准备，张大哥才轻轻推开房门，把我们让进客厅。客厅里显得空荡荡的。这当然是“革命群众”的功劳，像这样的家庭不知经过几次洗劫，早已一无所有。

临窗的一张木凳子上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两目呆滞地望着窗外的蓝天，我想那便是张锡锬的老母了，身边还坐着一个年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手里正织着毛衣，我猜那便是张锡锬经常提到的小妹了。

看着我们进来，老人并没有抬眼看我们，而是一直死死地盯着窗外的天空，好像她正在寻觅那隐藏在天幕上的什么，张大哥向他的妹妹使了一个眼色，那女人便收拾起了手中织毛衣的针线，一手携扶着老母进里屋去了。

大哥将老母进去的房门轻轻关上，我们三个人落坐，开始时一种压抑使大家静默了几分钟，我知道，先于我来到这里的，已有过几批盐源农场的刑满人员。所以，对于张锡锬牺牲的前前后后，似乎没有再多说的了。

坐在椅子上木然的我，心里不禁自问道：“这便是张锡锬的家么？二十三年前是什么样子的？有过欢乐和团聚吗？那时，这位张大哥就没有结婚安家么？还

有这位小妹也没有出嫁么？

母亲的样子就不用再提，二十三年中几经苦难怎样从新回到这个家？这里有多少辛酸的故事啊！

张大哥似乎从我的眼神里查觉到我脑子里在想什么，开始用低沉的语调讲他的母亲，“这几年来她一直是这样独自发呆，有时傻笑，张锡锬和他未婚妻被杀害后，对她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他继续介绍说：“母亲原来也是一个中专毕业生，为了抚养我们三兄妹，辞掉了工作，在家操持家务，我们三兄妹的学习成绩都很好，这都与她的教育分不开。1957年，我们兄弟两被划为右派后，家就被粉碎。父亲不久死去，剩下一个小妹，也被街道上强迫弄到农村去，从此便剩下了母亲孤身一人。”

“有一天街道居委会的人对她说：‘你的娃儿都是反革命，这是你教育的结果，你有责任也应当悔罪，所以要真改造自己，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不能白白的把你这种人喂着。从明天起你要自食其力，不然国家发给居民的口粮，你就得不成了。’”

“为了生存，从此她便在居民委员会的强派下，替人带孩子，扫街道，替百货公司拉板板车。凡是别人不原干的事都派给她干，周围的小市民用冷眼对待她，她自己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只是忍气吞声的干活，否则她就拿不到‘糊口’的粮票和生活费。

那时被拉去斗争，戴高帽游街的事是家常便饭，还叫她每一个月要写思想改造的报告交到段上去。”大哥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清理脑子里被刻得乱糟糟的伤痕

“被人欺侮还不准还嘴，这就是群众专政。小妹从下放的农村里跑回来和那居委会主任讲道理。结果反被哄了出来，说她扰乱社会秩序要拘留她。”

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街道居委会的指使下，红卫兵四次抄了她的家。将我多年珍藏的字画拿走了，说是封资修的东西一律要没收。他们一来砸锅，砸碗，母亲看着这群强盗不敢说话。

过了不出半个月，第二批红卫兵又来了，将家里几件父亲遗留下的衣服全拿走，还逼母亲交出我没有带走的日记和信件。

第三次红卫兵把家里的家俱全部搬走了，只给她留下一张小木床。第四次，红卫兵说你这个反革命老婆子，没有资格住在这里，便将她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又脏又黑的小屋子里。并向她宣布，不准她同任何人接触，不准她的女儿回来看她”。

“后来那街段的主任通知她，她二儿的女朋友，因为猖狂反对毛主席将被枪毙，要她去看，她像犯人一样被押进公判大会的会场，亲眼看到自己的媳妇饮弹刑场。回来后，便再也不讲话，只有每到傍晚独自倚在那黑洞洞的门口，盼着那些不归的孩子们，残酷的现实将她终于逼成了这样！”

客厅里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出声，大家都陷入了悲哀和沉思，好一会儿，大哥才继续的往下讲，“我是去年落实政策的，二弟他们俩竟然永远不归了，托邓爷爷的福，回成都后，我回了报社，不久二妹也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大难不

死的人，想不到还有团聚的一天。”

“我刚回来的第二天，便去找母亲她老人家，原来的房子不在了，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一个胡同里的那间小黑屋。走进去，便是一般难闻的臭气，她呆呆地坐在小床上，看到了我竟然白着眼，好像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说：妈妈我回来了，她仍然呆呆地望着我，我看她满头的白发，衰老不堪，屋子里的臭味便是她撒在身上的尿尿，她已经完全不成人形了，”

说到这里，大哥的眼睛红润了，停顿了好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们的老屋已经拆掉，按政策的规定，补给了我一套报社家属的旧住宅。搬家那天，她死活不走，也不说话，几个人只好把她抬到这里来。

现在经过大半年的医治，她的神志才慢慢恢复，知道吃饭，解便。但是从此以后像白痴一样。医生说，她得的是老年性痴呆症。叫我说，这便是被他们逼成这个样子的。”

今天，我原带着一种内心的敬佩，想来安慰一下这位英雄母亲。原先准备了一肚子话，竟被眼前听到的这残酷故事，全压回到肚子里去了。我知道大哥只是简单的讲了他的母亲，至于他个人，还有他的妹子，大致都有各自不堪回首的往事。

面对着痴呆的母亲，面对着这对强忍内心巨痛的兄妹，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此时，我才明白，何以在我还没有跨进门来时，大哥便走出门来打招呼！

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坚强的人，所以才坦然面对所有不幸。

大哥的话一完，客厅里又陷入了沉默，对于我们三个经历了“阶级斗争”风暴摧几十年的人，更多的恐怕是思考！！

过了好一阵，话题转到“落实政策”上来，我们都是过来人，关于平反，我和他心里都很清楚，这仅仅是中共权力斗争的需要，不存在对过去的检讨和悔意。他的报社给他一套旧房，作为没收原来住宅的补偿已是天大恩赐了。

当我将要告别时，我才从我的挎包里取出了一付“松柏图”，那是我离开盐源之前托人上盐源县城买好的，上面有我写的题词：“张锡镔难友永垂不朽。”现在仿佛只有借这付画来讲述我今天无法讲出的话。

将它送给大哥以后，我们便起身告辞。出得门来，走到楼下，夜幕已悄然降临。沿着通向外面的马路，我走出几十步外，猛然回首，抬头朝刚才的阳台望去，见那上面一个白发苍苍的身影，不知何时悄然地伫立在那窗口下面，我明白那是她十年的惯例。

这是二十多年的心头伤，每当黄昏时分，失去儿子的母亲，仍在翘首盼着孩子的归来。联想到此时此刻，我的母亲也会在蔡家医院的窗口下，倚窗遥望着我的归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我的母亲比起张锡镔的母亲，也许算幸运的，她毕竟还没有逼成老年性痴呆症，她毕竟活到了自己失去的儿子归来时刻。

回到旅舍已是晚上十点钟了，这一夜又失眠了，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马上就浮现出今天下午的情景，张妈妈那一头白发，满脸憔悴，倚靠在窗子下面，形容呆滞地望着我。

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就见她拄着拐杖向我走来，走到我跟前突然开口道：“你看见我的老二了吗？他在那儿，你能带我去吗？”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乍然醒来，才晚上十二点钟，便坐起身来想着可怜天下的慈母，可怜我们不幸一代的母亲，其实她们比我们还要不幸，除了承担社会的歧视欺侮外，还要承担对孩子挖心般的牵挂。

坐在床上越来越亢奋，便索性起了床，打开成都市的地图，按照我原先的计划，拜望张锡鋐家已经完成，若要拜访成都的旧友，一来时间仓促，来日方长。二来住在成都市区除了陈容康和张锡鋐外，其它人的地址我还没记载，所以准备天亮就去火车站买回重庆的车票。

当我走向火车月台时，心情说不出的感慨。二十年前，我经过这座城市，从重庆弹子石监狱押到了凉山甘洛，而今我又从这里提着简陋的行囊从回渝城，想到当年同时押赴西行的人，现在所剩无几。我的眼前浮着那些当年枪押的无辜年青人的身影，和太平间里水肿的同难，我们究竟是为了那一棒，要遭遇这场不明不白的残害？

按理讲“右派”是中共内部的划分，自从中共建立之日起，因争“听谁的”？内斗从没间断，美其名曰“路线斗争”，特别是毛泽东登位，在他不可告人的动机下，这个斗争日渐残酷野蛮扩大。

毛把党内的权力斗争延伸到全社会，1957年的“反右”斗争便从共产党内延伸到全体知识份子。使当时毫无政治倾向的青年学生，也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现在中共仍在为这场罪恶辩解，用“扩大化”替毛诡辩。其实完全无知的学生，才是被整得最惨的政治牺牲品，他们被糊里糊涂扯进这场是非之争，接着又面对中共在“三面红旗”的恣意胡来。

保持良知的人，为反抗暴虐登上了政治午台，他们唱出了一曲曲抗暴壮歌。其实他们并无涉足中共权力争夺的想法。

然而今天，对他们行苦役二十三年，连起码的工资都无理剥夺，对他们善后处理草率应付，证明中共是一个残暴成性，极不负责任的党。如果它不放弃追求专制独裁，还政于民，难说不会再出现“反右派”相类似的惨祸。

我已年过四十，体弱多病的残身上刻着好多好多的伤痕，现在踏上归程时，还得从新开拓自己的生活，寻找还十分模糊的生活起点。

当我上了火车找到了自己的坐位，对那车窗玻璃映出来又黑又瘦的脸发呆，我十分清楚知道，我的青春年华伴着灾难永远埋在遥远大山那一侧了。

从这一点上说，我和那些牺牲葬身在那里的难友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我是在回家，那么今天我只是去同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重逢。

第三节：被暴政摧毁的“家”再组合后

当火车缓缓开动时，车轮撞击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将我疲惫的神经松弛下来，我拉开车窗，任疾风吹拂我的头。远处田野在茫茫暮色中越来越模糊，

我好像身不由己的飘了起来，飘离火车，在茫茫一片中，漫无目的向前游去。

乍然间来到一处白雾茫茫的森林之中，从那望不见的深处，传来了一阵老女人呜咽声，循声奔去，渐渐地从白雾缭绕中见到一处隐约的茅草房，那哭声便是从那茅草房里面传出来的，便好奇的推门而进，才看到半昏的屋里，一个白发满头的老太太，背朝着门坐在一个小木凳上哭泣。

我正踌躇着站在门口不知所措，不料她却已经转过头来，然而她那披头散发，老泪纵横的样子，使我无法在暗淡之中看清她的脸。正徬徨时，她却站了起来，向我扑过来，并喊道：“儿啊！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你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连信也不写一封，害得我天天哭，眼睛都哭瞎了。”

我连忙接过她伸向我的手仔细地端望，她的眼睛已经瞎了，而那脸颊右侧的额头上一个米粒般大小的黑痣，是我母亲的标志。看那面容苍老得比我当年的外婆还苍老，尤其是那双被泪水和眼屎粘成的眼睛同外婆几乎没有两样，真没想到这二十三年竟把她变了这般样子。

认定后，我在她面前扑通一声跪倒，连连磕头，喊道：“不孝儿让老母如此折磨，望母亲赐罪”。那老人忙用颤抖的双手，扶我站起来。想不到同母亲一别二十三年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相逢，正拥抱着相泣，哭声振动旷野。

忽然门外有人大喝道：“好大胆的孔令平，我们抓你好多天了，今天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你在这里同你顽固不化的母亲在一起，你这家伙二十年来从无反悔的念头，今天竟敢私自越狱，还不赶快同我们一起回盐源伏法？”

我闻声赶紧回过身去，认得来人正是六队的何庆云和邓阳光两人，正想开口反驳，一付冰凉的手铐已经套在我的手颈上了，我被两个凶恶的狱吏拉扯着走出茅屋，拼命地挣扎着。

此时回头去望，那老母和茅屋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惊叫了一声，猛然醒来，却是南柯恶梦。

我坐旁的车窗已被邻近座位上的旅客关上，车厢里电灯倒很亮，肚子里感到饥饿。正好装满晚餐的小车被服务员推了过来。我买了一口袋的白面馒头和一包榨菜，就车上的开水吃起了晚餐。

邻近的几位看样子好像是出差的，见他们已经取出一个折叠好的小木板，打开以后，是一张一米见方的牌桌。架在两排座椅的中间后，取出一包麻将倒在那小桌上，希里哗拉的打起了麻将。

车厢里附近座位上的几个人都围上来。一时间吆喝声、搓麻将的声音混成一片，我心中感到厌烦。于是独自起身，走到本节车厢后面的座位上去。

大难过去，原来的家人大多已失散亡故，被破坏的家根本无法修复。生还的人们便在相似命运的人中，力求重新组合成一个新家。

离开盐源前母亲来信，要我回重庆时，回到北碚前，先去九龙坡区的李家沱我的“妹妹”家里住两天，再由她安排回到北碚蔡家场。

所以我到重庆下火车没有在菜园坝，而是提前在九龙坡车站下车。说来，这是母亲又一段伤心事：——

1972年，孤苦无告的母亲因缝制过冬的棉衣，被蔡家医院的“革命群众”诬为偷了医院的棉花和布，斗争了一场，还挨了一顿毒打，本来就因失去仅有

的小儿子，已万念俱灰的母亲，在挨打的当晚去蔡家的一口池塘自杀，被医院一位职工的母亲救阻。

第二天附近一家名叫胡德明的农村妇女，因可怜母亲的遭遇，将自己仅七岁的女儿抱给了她认作义女，后来还为母亲物色了一个老伴，善良的蔡家场农民为母亲作此安排，既可相伴母亲的晚年，又可以在被人欺侮时，有一个保护她的人。

小女儿的生父，因信奉一贯道，而被下狱劳改，刑满后便一直在德阳九五工厂就业，另一个与他同一工厂的就业人员钟治渊，曾是母亲在抗战时期办学的二十五兵工厂的一个学工，原本就认识母亲。

有一次两人一齐到了蔡家场，经过胡德明的介绍和撮合，1975年母亲与钟治渊结成老伴，钟老伯的女儿黄雪梅，当时就在李家沱的重庆国棉六厂做挡纱工，于是商定好，我回重庆后，先去雪梅家里，以认同一个重新组成的家。

按照母亲的安排，当火车过了小南海以后，缓缓驰抵九龙坡时，我怀着陌生而怅惘的心情，挑着行李下了车，踏上了这片陌生的“故土”。

李家沱与南坪相隔不远，1949年，父亲就任中央政校重庆分校校长时，我们就住在南温泉，虽然李家沱仅隔南泉不到十里地，但因当年居住短暂，我从来没到李家沱街上去过，没有一点它的印象。

下车时大约是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寂黑一片之中，一时还找不到身处的位置。正站在那码头的铁门出口处张望，突然从下面传来了一声机动拖驳的长鸣，一阵从那个方向吹来的江风提醒了我，正前方便是嘉陵江出长江的交口处。

定睛看去，在澎湃的江水声中，点点灯光和朔江而上的机动船正在夜色中穿梭，而刚才同我一起下车的旅客大约十几个人，都朝着左前方一条依稀可辨的小路往下走，已经距江面五十多米了，听见有人在喊，“快！轮渡靠岸了”。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挑起行李，急忙跟着往下跑。同这些“同路人”一同登上了开往对岸的轮渡。

站在轮渡的甲板上，天将黎明的夜风，吹得我十分的清醒和舒适，听着船底拍击江水的声音。在我的记忆里，在这条江上坐船，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

那是在重庆大学读书时，每次进城，上午下到中渡口的渡口，登上轮渡，溯嘉陵江而上到朝天门。下午再顺江而下回校，想不到就此以后的二十四年，我竟连轮渡都没有看到过。

轮渡靠岸，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沿着石梯，登上了河边菜市，此时天已朦胧，早起的小贩早已忙碌开了，我询问了去李家沱正街的路。

等我挑起行李走过菜市，再穿过几条宽阔而静静的大街，按照‘妹妹’来信中的地址找到她的“家”时，天已放亮。

在一幢四层楼旁的面前，我向在那里坐着的一位守夜执勤的老伯打听，这里有没有一位叫黄雪梅的住户？那老大爷立刻知道我是“远方”来客。他十分热情地帮我卸下肩上的担子，一手提着其中的一头，将我带进走廊里第三间房前，敲响主人的房门，里面的主人好像也早有准备，从里面迎了出来。

我打量着迎出门来的两位，个子矮矮的大约二十多岁的女主人，想来便是我的异姓‘妹妹’黄雪梅，而那位年纪不出三十的男主人，一定是我的异姓‘妹

夫’李修平了。

主人的住房仅仅只有二十平米，他们的孩子还在梦乡中没有醒来，看看壁上的挂钟才六点过一刻。

“早就知道你回来的消息，就是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不然怎么也应到车站去接你的，”李修平接过我手里提着的行李，那语气像对自己久别的大哥那样。

“妹妹”连忙走了出去，从过道对面的“公用厨房”里端来了一杯热茶。

“本是昨晚八点的车票，原来估计到重庆应是早上，没想到半夜就到了，惊吵了你们真是对不起。”我解释说，话里的歉意是真的，因为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对我完全是陌生的。

苦重施

‘妹妹’和‘妹夫’招呼我坐下以后，‘妹夫’说道：“今天先洗一个热水澡，去去一路上的风寒，再好好地睡一觉，你来这里，这就是你的家，一切都随便一点。”

他感到了我的局促，一边说，一边走进了厨房。‘妹妹’也跟着走了出去。夫妻俩的热情，一点都没有露出毫不相识的隔膜。对我这个二十年从没感受家庭温馨的流放回归者，送来了一股说不出的温暖。

屋里只剩下了我和床上还在熟睡的孩子。

我细细的看了看这间仅二十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一个大柜，一个靠窗的办公室桌已够拥挤，这便是当年住房相当“宽裕”的三口之家。看看床上熟睡的孩子，他大约只有五岁。但是今晚难道我也住在这儿么？心中一阵纳闷。

目光顺着那床的挡头，向上移去，那上面挂着一张七寸的黑白“全家福”照片，其中便有我日夜思念的母亲，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就是我的未来家庭的成员？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浮上了心头。

正陷入沉思，‘妹夫’走了进来，一大桶热气腾腾的洗澡水已放在过道一侧，一间只有三平米的洗澡间里了。

‘妹妹’从街上端回了油条和豆浆，孩子也从梦中醒来，见了我并不显出陌生。她一边为他穿衣服，一边向孩子说，“舅舅是大学生，知识可渊博呢！今后呀！你要好好跟舅舅学文化科学知识，将来也是大学生。”

此时！我才感到了一阵尴尬，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给这个“外侄”带一件玩具或是衣物之类的见面礼呢？唉！从进了这个屋子的第一秒钟开始，说话、坐、喝茶、同孩子交谈，每一个动作好像都是我生平以来的第一次。

‘妹夫’告诉我，‘妹妹’在重棉六厂上班，这房子就是六厂的家属房，而他自己在区政府的食堂里当炊事员。

这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他们对于我的热情不但是因为同情，还因为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羡慕，其实他们从没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看。

我在‘妹夫’的安排下，睡上了屋里那张唯一的床，他提着菜蓝子上街了，临走时，将那临街窗户的窗帘放了下来。

这一觉，我睡得很香，什么时候叫醒我起来吃的中饭我都记不得了，下午又继续的睡，直到五点钟，算是把接连几个夜晚失欠的瞌睡全补上了。

‘妹妹’带着她的儿子已经回来，吃晚饭的时候，‘妹夫’告诉我，他的老

父亲就在这条街的下半段，开了一家裁缝铺，说父亲原是这样土生土长的人，当了一辈子的裁缝，论手艺算是附近最好的，远近的人都找他裁缝新衣，所以他的铺子生意不错。

上个月母亲拿来了几段料子，请他给我打两套合身的中山服，只因估量的尺寸不一定合我的身，所以一直还没动剪刀。现在，正赶上我人来了，正好去量一下，于是我在他的陪同下到了他父亲开的裁缝铺去。

他的父亲五十多岁，一看便知道是一个熟练的裁缝，他指着我身上穿的兰布衣服（那本是用劳改服改制的）说：“现在不兴再穿这种土兰布了，把新衣服尽快给你打好，你也体体面面的穿着回北碚”。

量完我的衣服尺寸，我们告辞他回到‘妹妹’家的路上，我就想，总不能和他们一家挤在一个屋子里过夜。所以一路留神看看有没有旅馆，但是所经过的路上竟没有一个旅馆。

进屋时我才看到，在靠窗户那一块唯一的空地板上，铺好了一个地铺。‘妹夫’宣布我和孩子今晚睡床上，他们俩口子睡地铺。

这种反客为主的安排使我更加难堪，我执意要去寻找旅馆，说已经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怎么能为了我搅乱他们正常生活？

夫妻二人坚决反对说，既是一家人就不应分彼此。还说我把他们当外人看，再说重庆市住房本来就很紧张，一家人中兄弟俩都结了婚，就因没有房子，而住在一间屋里的也是常有的事。同时这么晚了，上那儿去找旅馆投宿？

争论了好久，最后达成协议，‘妹妹’一人睡地铺，理由是她的年龄最小。人虽然睡下了，可是我的心里却一直都在不安。真没想到我这个来客，给别人平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回家”的第一站就够拘束了，加之白天睡得太久，我睡在床上就像睡在针毡上般难受，翻了几回身仍毫无睡意，我实在不愿再这样窘迫了，打定主意，明天，我就动身回北碚。

下半夜我一直都在侧耳细听，窗下马路上有没有人起身走动，好不容易听见有人推着小车沿路扫街的声音，我便悄悄地坐起身来，穿好衣服，正向窗下伸手去取行李，却被中间的地铺隔着。我看了看和衣睡在那里的‘妹妹’，正踌躇间，‘妹夫’已经醒来。

他睡眼惺忪的问我怎么这样早就起床了？我支支吾吾地回答他，我想赶早班公共汽车回北碚去了。他听说我要走，连忙坐起身来，说：“妈妈交待了的，要你在这里住几天，说什么也要等给你制的衣服打好了以后，换了衣服再回去，再说到北碚要换几次车，你一个人是找不到该怎么走的，今天你要走，我连假都没有请，谁来送你呀？”

他这一嚷，吵醒了睡在地上的‘妹妹’，两个人一齐阻拦我今天回北碚。我这刚跨进这个家庭的“新成员”，患上了“边缘症”。哪能那么容易溶入一个陌生的新家庭？现在只好忍受这种拘束和窘迫，服从主人的安排，暂时住几天了。

三天后，我终于换上了“姻伯”为我赶制好的新中山服，‘妹夫’专门的请了一天假，由他陪同我一起从李家沱回北碚了。按照我来的路线，从新坐轮渡

返回江的北岸，到九龙坡车站乘坐去沙坪坝的客车。

廿多年过去了，客车经过小龙坎时，那狭窄的街道还是那样，只是当年我住的医院已经不在，我竭力搜索着那里，寻找当年我和弟弟“团年”那家饭馆，但是我却没有找到，也再看不见他那憨厚的脸和瘦高身影了，一股悲哀再次猛烈地掠过了我的心头。

当车过杨公桥时，我又想起了当年刚考进重庆大学的那一段生活，为了节省开支，我从学校回家经常是穿着草鞋步行走路。记得那时早上五点就起床赶路，整整要走十个小时，途经的地方全是农村村落，直到下午五点钟才回到北碚。一双新草鞋就在这长途归途中穿破了底。

当汽车经过双碑时，我把头紧紧贴在车窗上，这是我童蒙时代的摇篮，詹家溪！我曾在这里顽皮，那儿有我童年的美丽回忆。

记得妈妈有时到沙坪坝去了，我就向外婆说，今天该我好好玩一天了，便到附近包谷地里取下那红红绿绿刚发出来的包谷须，用饭粒贴在嘴上，手里舞着过年去磁器口买的大刀，装成戏台上的杨家将，在院子里同几个同龄的孩子们“杀仗”。
高老师

詹家溪小学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老样子？高自强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我感到她比我的母亲还严厉，记得她常常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后来我才明白它的意思。唉！不知道她现在还在那里么？她还健在么？

我从车窗里望见了那远处的松林坡，那山上也是我常常独去的地方，睡在松树底下，静静聆听江风吹打松树激起的涛声，有一种我自己才听得懂的大山语言，像诗。天晴的时候，我又最喜欢到山顶的花园里去，睡在花丛下面，静静的欣赏绕着花朵繁忙采蜜的蜜蜂鸣叫。

童年美丽的画面，被二十三年地狱的恶梦，挤到了一个最小的角落里，突然碎成了几片。只是没能消灭的天真无邪片断，此刻又渐渐恢复过来！

想到再过一会儿，我便要见到整整分别了二十二年朝思暮想的老母亲，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涌向心头。妈妈就是在这里，经历她中年时期最悲惨的十八年炼狱！

在这里她经历了她老年丧子之痛，直到痛不欲生，投塘自杀！

当汽车缓缓爬上山岗，在横贯蔡家的交叉路口停下来时，惶恐占据了我，这是一座乡场，一座中国大地上普通的，在当时又是那么贫穷偏僻的乡场。

那大约只有两米宽的石板街道的两旁，歪歪斜斜地矗立着两排高矮不同的泥夹竹墙结构的平房。

我和李修平走在街心，从路人的眼光里带着陌生，我想大概因为我看上去又黑又瘦的缘故。

距场口两百公尺，机耕道左侧宽约二十米的石台阶后面，立着一排两层的楼房，中间是双扇的大门，大门的右侧悬挂的白添木板上写着：“北碚蔡家镇人民医院”九个大字。

双扇大门的前面，站着三个穿白大褂医士模样的人，冷冷地看着我们走进医院大门，并不答理。我跟在李修平的身后，径直朝着门内的楼梯走去，上了二楼向右拐进了过道的第三个房间面前，才停下了脚步。

李修平轻轻地去敲那门，那门是虚掩着的，一敲门，门就打开了，屋里并没有人。他拧着行李跨了进去，一面告诉我：“到了，妈妈就住在这里”。

我跨了进去，将行李放在中间那床的前面，李修平说，妈妈就睡在这里，说完他走了出去。

第四节：同母亲重逢

我一个人留在屋里，这是一间二十平米的病房，屋里放着三张病床，每个床头都安放着一张旧办公桌，桌上放着煤油炉和装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床下和两侧都堆放着纸箱，木盒等物。

整个房间便以这三张床为中心，三分整个房间。每一张床之间留着很窄的过道，仅只能一人通过。虽没有布帘隔开，但一看就明白这里住着三位单身职工。

耳朵里响起了雪梅的话：“在重庆地区像我们这层楼一家人占了一间房子住，是最好的人家了……。”我终于明白，何以母亲要我在“妹妹”家多住几天的原因。

看来母亲受了二十二年罪，共产党给她“平反”了，却连自己安家立身以渡晚年的立锥之地都没有。

在我回来之前，为了安置我，恐怕不知向她的“组织上”费了好多口舌？最后仍只有无可奈何的在这个集体宿舍里，迎接我的归来。

我再次环视了我的“家”，我今后的路要从这里作起点吗？

十分钟后，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和讲话声，李修平回来了，他的身后紧跟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妈妈，我立刻回想到我离开她时的脸貌，没想到二十三年后她已苍老得那样！但我仍能根据轮廓认出，那便是我二十三年来魂牵梦萦的老母亲。

她与当年抚着我的头，依依惜别的老外婆，真是一模一样，最大的特点是背也变驼了。

当我们母子的眼光第一次接触的那一瞬间，我便被一股上涌的血堵住了胸口，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走上前抱住了那花白的头，亲吻那满布皱纹的额头，当我的胸前已沾满了母亲的泪水，当血液猛地冲开了被堵塞的心窝，这二十三年有多少的经历要讲，有多少哀怨要诉，有多少泪要流啊！

而妈妈却一个劲地用她那干瘪的手轻轻地拍打着我的背，伫立良久才喃喃地说出：“这下好了，总算回来了，总算回来了！”

我看着桌上的闹钟，已经快 12 点了，忙把话题岔开，故意发问道：“妈妈，中午了，该做饭了！”妈妈才松开了手，擦了擦老泪纵横的脸，去那床边纸盒里取出一块肉来，李修平接过手，到盥洗室里洗净，大家忙着生火炒菜，从伙食团打回米饭，三个人围着那张办公桌，吃我回到母亲身边第一餐“团圆饭”。

我们正吃饭，两位与母亲同室的医生，端着饭盒子走了进来，母亲向我介绍了她的同房，与母亲差不多年纪的那一位，家住北碚街上。另一位比母亲年轻的医生住在沙坪坝。看来在这间屋里，无家可归的就只有母亲一人了。

从六八年弟弟出走后，整整十多年，她就这样孤苦伶仃，守在这人间地狱里。！从现在开始，我的到来成了她新生活的开始。

午饭以后，李修平回李家沱去了，他晚上还要上班，母亲一再向他道谢，并且说，过年时一定到李家沱团年。

我被新任的医院党支部书记王光明，安置在楼下一间病房临时住下，距我住的那房间不到 10 米，巷道的尽头，就是停尸房，我并没有去看整个医院还有没有其它空着的房间。

初来乍到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有一个窝暂能住下，懒得去同医院的“领导”发生磨擦，何况二十三年挫磨已使我习惯了忍让。

二十三年来，我也不知同多少死人打过堆，自己一半也是从阴间里走出来的，自以为一身正气，不怕夜半鬼来抓我。

现在回想，那医院的党支部够体现
‘落实政策’！

刚回蔡家场安置我的住处（停尸房

相 亲

儿子长大成人后，传统的中国母亲，恐怕没有比关心自己的孩子婚姻大事更重要的事，那怕她们一直处在社会底层，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当 1973 年她接到我第一封信后，一直没有忽视给自己的儿子物色一个对象。

但那个年代，凡沾上黑五类的，就等于染上了永生医不好的绝症，准备着跟男方不幸的家庭，一辈子受人歧视。

所以好人家的女儿，自愿接受一个“黑五类”，或者是刑满释放人员，实在太少，但是恰恰就在这畸形的“阶级斗争”社会中，却藏着一些让人费解的故事，我的故事得从我给母亲的通信说起。

1973 年我和母亲整整十五年音信渺无，一旦接上通信联系，我对亲人的思念和所受的委屈，会自然流露到这些信件之中，乍读起来有的像无韵诗。可偏偏这些信件都先要由蔡家医院造反派的头过目，这些经过文革铸造出来的近乎文盲的宝贝，是连普通的抒情语言都读不通的。

那曾用柴棍殴打母亲的刘巴，却像发现了“秘码”似的，以为又是表现她的阶级敏锐性的好机会，便将我的信拿到他们学习会上公开朗读。要大家讨论这些‘反面’教材。

偏偏在坐参加学习中的人中，有一位从北碚卫生防疫站来蔡家医院蹲点的医士，名叫邹双银的姑娘，却被这些内容新颖的信件吸引，她不但在讨论会中解释那些被刘宣树说成“隐语”的典故，例如亡羊补牢一词被刘宣树说成，我想杀了羊子从牢房里逃出来。

散会后，邹双银私下向我母亲索要这些信，这位才二十三岁，还守在闺中未嫁的姑娘，找到一了个机会向母亲表露了她的内心，并认母亲作干妈。表示愿意等我到刑满以后。

母亲闻讯大喜，即刻将这个信息写信告诉了我，并且在那封信里附上了她的照片。后来当我的“平反”开始进行时，我被场部蔬菜组的恶犬咬伤，她闻

讯后，为我配制了狂犬疫苗，用航空挂号为我寄到盐源。

我回到北碚时，邹双银已调回了北碚防疫站。当时没有电话，母亲把我回来的消息，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她，一周后，她回了母亲的信，约我在那一周的星期天去北碚见面，地点定在大菜市街口。

母亲打开了她放在床头的纸箱子，从里面取出了专门为我织好的新毛衣，新毛裤，以及一双才买的新皮鞋。可是当我穿上这些新装时，衣袖和裤脚都短一截，妈妈感慨地摇摇头说，“在我的脑子里，你还是那么小。”

是呀！我被划为右派离开家的时候才十九岁，一个稚气的孩子便被“反右”的恶浪从她身边卷走了，而今过了二十多年，留在她记忆里的那个孩子，怎么能同现今站在面前的，从狱中滚打出来的中年人相比？

看媳妇可不是闹玩的，人家是医士，总不能让自己的儿子一付寒酸像，出现在人家的面前。幸好有那两套从李家沱带来的中山服，勉强的可遮盖里面短小的毛衣。

只可惜那皮鞋足足小了两个码子，穿上脚实在夹得开不起步，还不如自己脚上那双从千里路走回来的兰色解放鞋，既来得轻便，又舒适。

妈妈要马上去街上买一双，却遭到了我坚决的反对，我的理由是，对方只讲究外表，而不是看重我的内在，她又何必等我到今天？

于是在母亲的督促和省视下，我穿上了新毛衣，新的中山服，只是这双解放鞋却被我固执地保留下来。

穿着一新，母亲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全身上下看了又看，勉强地点了点头。

星期天早上八点钟，我和母亲在蔡家场那十字路口，上了去北碚的汽车，九点钟我们准时按照小邹指定的地点等她。三分钟后，一个穿着十分讲究的姑娘，从市区的方向向我们走来。

母亲连忙迎了上去，我也立即认出，这便是母亲寄给我相片的那一位。

只见她身着一套灰白色的新西装，经过了特别的熨烫，白色的大翻领衬衣外面打着一一条黑色的领带，头发也是刚刚烫洗过的，微微的蜷曲，却黑得发亮，脚上穿着一双擦得油亮的黑皮鞋，手臂上挎着一个白色皮包，还没有走近，就将一股清香的香水味向我送来。

这身打扮，当时要算是讲究的白领人士了，与我身着灰色中山服脚蹬兰色解放鞋，皮肤黝黑显得土里土气的装扮相比，很不配称。

我很笨拙的放下两手，不自在的脸上推起了笑容，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笑得极不自然，简直可以说是装出来的。

一阵局促的压力之下一时不知怎么开口，看着对方笑吟吟的样子，见对方已将手伸向我，我才木然的将放在身边两只僵硬的手伸了过去，握了握她肥胖而白嫩的手，便慌忙收了回来。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看到我第一眼是什么表情，还好母亲已经拉着她的手，朝着通向市区的那条路走去。我才像解了围似的，放下被弄得紧梆梆的身架，跟在她俩的后面，简直就像是一个跟班的仆人。

但是几分钟后，我那在狱中多年形成的自信，超然和独傲，很快矫正了我最初颇有些狼狈的局促，心里却还在不断的埋怨自己，亏你还是一个身经百斗

的猛士，怎么见着一个女人便输掉了应有的男子威严和阳刚？不是说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么？今天怎么会变得如此？

于是我挺起了腰杆，将那方才僵硬的手背在背后，若无其事的显示自己是在同“朋友”一起逛大街。可惜，我们依然没有讲话，我也依然没有走上前去同她并肩而行，只是默默地跟着她俩的后面，想着该用什么问话来试探对方。

医学方面我一时找不出恰当的问话，至于文学历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的开口。于是，我们最初相见的瞬间，给对方留下了致命的印象，直到两个月后，母亲才告诉我说，小邹当时就坦然地问母亲：‘他怎么是这个形象，又黑、又瘦、又老，连话都讲不出来？好像监狱把他关傻了一样！’

唉！早知我的形象那么糟糕，怎么也不会匆忙跟着母亲到这儿来出洋相。

我们沿着中山路，母亲和她走进了百货商店，我却毫无兴趣的站在商店门口等了足足十五分钟，当她们俩出来时，我和她又对视了一下，我能感觉出，她那眼光里含着一种挑剔，我原先准备好的话和天真好奇的发问，不知为什么全都咽了回去！。

我终于鼓起勇气发问道：“防疫站隔这儿有多远？”“噢，大约一里多路”她回答得很随便，而且让人无法把话接下去，我的这句打破僵局的主动，被她简短的回话挡住了。

看着她仍挽着母亲，按照原路从新折了回来，我仍然傻呼呼地跟在后面。回到了开始约会的菜市口，看看时间已快十二点了，母亲选了一家临街的饭馆点了几个菜，三个人共进午餐，我瞅着堂倌还没有把菜端上来的空挡，第二次鼓起勇气试图打破我们之间的僵局：“防疫站工作忙吧！”我第二次主动发问。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还好”，接下去又是沉默。

就这样，经过我两次努力，想打开同她对话的话匣子，却没有成功。接下来，只好闭上嘴默默无言的坐在那里，直到母亲张罗着堂倌把菜端上来，各自闷着头把饭吃完。

吃完饭后，她便起身告辞，说她下午还要值班，便提着她的手提包离去了。我出狱后的第一次“约会”就这么尴尬的结束了，以后我们几个月都没有见过面，直到母亲讲出了小邹见到我第一面的印象。

看样子，头次见面便改变了她四年前的初衷，不过母亲告诉我，小邹并没有明确的表态，是拒绝还是维持，还是待观察，这给母亲始留下一线希望。

所以她一再催促我打主劫战，但我明白，我们这个经过“阶级斗争”冲洗过的社会，几乎不可能发生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那种美丽的故事了。

何况我并不具备才子的条件，对方也绝非佳人。不过，我这种形象，难道不是冤狱造成的么？对方因同情心还是因我在书信中那点文才产生的感情，有四年的等待已不容易，虽然这四年的等待因对方的又黑、又瘦、又老的外表而告吹了，这本是二十三年改造的功力所要达到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把我变成了鬼，又能怨谁？

既然对方是那么脆弱，我又何苦勉强挽回？

所以我不想再给她写信，我们之间的玫瑰预约便这么告吹了，但第一次约

会，我面对“爱情”这一当头棒，是对我自信的打击。我必需直面二十三年冤狱带给我的婚姻难关，并且预伏着后半生建立家庭的坎坷不幸。

范小妹

然而，生活竟这样玄妙莫测，没有几天，母亲在七年前认的干女儿，范萍和她的弟弟范山，一起来了，范萍那时是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小姑娘，正在附近的二十四中学读初中二年级，而范山还只有十三岁，在蔡家小学读五年级。

范萍既是母亲认的干女儿，而且是她在最沦落时结下的母子情缘，我理应称呼她为妹妹，当时我俩相差整整二十六岁，便称她为小妹妹。我们初次见面那天，她穿着洁白的毛衣，裤子虽然打过补丁但很干净，特别是她少女的腼腆，带着特有的矜持。比起邹银双来更多了素朴和诚实。

进门时她手里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莴笋和萝卜，进屋后，将它放在母亲平时作炊的小桌下面，站起身来喊了一声大哥，并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第一次见面，我心里很紧张，虽然，我当时已四十二岁，什么风雨世面都经历过，唯独二十几年与女性完全隔离，见到她，同她说话十分的口讷。

范山手里提着一个竹子编的笆篓，里面的虾子活崩乱跳，撞得那笆篓朋朋直响。看来这姐弟俩对母亲的生活习性和爱吃什么很熟悉。母亲一生中喜欢吃鱼虾，当时市场上是买不到鱼类食物的，那怕这种小鱼虾也与市绝缘。

他们告诉我，姐弟俩平时经常在池塘、田边、摸到鱼虾便把它们关在竹篓里，放在塘里养起来，等到积累到一定数量，便给妈妈送来了。

这姐弟俩的出现，顿时给本来显得冷清的“集体宿舍”增加了许多活力。弟弟催着姐姐快去拿盆子来放些水，说再迟一点，竹篓里的小鱼虾们都会“渴死”的，两人忙碌起来。

妈妈见两个孩子，满脸堆笑的问“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来呀，妈妈呢？”小妹笑着回答：“哥哥没有回来时，妈叫我陪在你身边，现在哥哥回来了，我们就不好来了。”

妈妈回答说：“这几天你们没来，还怪想你们的，如果再来我就要到乡下来找你妈了。”

中山抢着回答：“这几天猪儿有点病，妈妈忙着煎药喂猪，所以一时没空，这会儿她还在场口抓药，她叫我们先来这，一会儿她就会来的。”

正说着楼下一迭声的已经喊了起来。随着一阵咚咚上楼的脚步声，一位比母亲年轻，精干的农家妇女已经出现在楼梯口了。

从她那黑黝的皮肤和满脸皱纹，看得出这是一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是苦了一辈子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穿着一身兰布的棉衣，脚上是青布布鞋，一进门来便一迭声的向母亲道歉，叨叨的说道：“大姐呀！我早就该来了，听说哥哥回来了，那天都想来看看哥”。

母亲连忙牵着她的手，给她端了一杯早又准备好的茶。胡妈笑咪咪地说道，“大姐呀！你真好福气，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又是大学生，身体又结实，现在

落实政策以后，政府一定会安排一个好工作。今后呀，你总算有靠头了。

转过身来向我说道：“哥呀！这些年你妈没有少吃苦，医院里的那些没良心的欺你妈是右派，人又老实，又是一个人，净拿脏活、重活给她干。还常常无缘无故的打她骂她，我们蔡家场的农民个个都替你妈打抱不平。他们越欺侮你妈，我就偏要认你妈为干亲家。”

接着讲道：“每次过年过节，我们杀了过年猪，就要给她留一块肉，打了糍粑也要给她留一块糍粑，总之，我们有啥吃的，她也有。”

“有一次我正提着一块肉，在大门口就碰到了刘宣树，她正颜厉色的警告我说：‘你们老是与右派份子划不清界线，如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没收你送给她的东西。’我马上反对说：‘你搞清楚点，我是贫农，不是你们可以随便欺侮的，你如果敢没收我的东西，我就要你好看’”。

“她看到我态度如此硬，便连忙改口说：‘我不是对你，我们的上级有规定，对方坚志这样的阶级敌人，就是要严加看管’。我回答她：‘我们当农民的，才不管你那一套，我们只知道医院的人欺侮一个老太婆太过份。’”

听她介绍，知道这是一个口直心快，心地善良的农家妇女。在她的内心里有一杆公平秤，虽然她没有文化，但她有中国妇女特有的正义感，她不迷信谁家的宣传，她是凭她的直觉来认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汪秃子

从盐源回到重庆时，只带回 1980 年的粮票和布票，到蔡家后，才明白城里的居民什么都要凭票才能买到，不光购买粮、油、布，就连买肥皂、盐巴、豆腐、肉、反正生活上所有必须品，都要票证去买，母亲特制了一个专门存放票证的小木盒，每次上街除带钱外，还必须从那里取出要买东西的票证。

铁托早把票证比作套在中国老百姓颈上的三根绞绳之一，真是一针见血。所有的票证都要靠户口簿领取，这就是说，没有户口的人在大陆上便不能生存。户口便是“党和政府”控制所有老百姓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回到母亲身边，除了粮票布票，其它所有票证都是母亲的。我还没来得及上蔡家派出所办理户口。为生活所迫，上户口的事，刻不容缓了。

当我取出盐源农牧场开具的上户口证明和介绍信交给母亲时，她皱着眉头，那介绍信上，关于我的身份写的是“刑满释放人员”。理由是开介绍信时，重庆法院并没有对我的原判进行平反，而在年龄栏中写着 41 岁。

邹银双的婚约告吹后，在母亲心上结下了一个无法向人道破的“疙瘩”，她拿着介绍信看了半天，便毅然把 42 改为 38，改过后，又仔细地戴着老花眼镜审视了许久，满有把握地拿出自己的那本户口簿来，告诉我，她今天专门请了假，同我一起去派出所上户口。

看样子她的心情不错，儿子真的要留在自己身边了，今天总算可以到派出所去，在自己那只有她一个名字的户口后面，添上了儿子的户口。从此以后这里便不是一个人，而是两口之家了，这可是她盼望了整整二十二年的事。

她整理了一下她的花白头发，便起身同我一齐向蔡家派出所走去。蔡家派

派出所就在石板路右侧的一个门庭阴深的院子里。

一提到派出所，我会想起少年时代，去朝阳派出所递申请助学金报告时，那陈麻子的羞辱，那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永不消退的伤疤。

后来，**经历整整二十三年的冤狱磨难，对于派出所这种衙门，一直把它当成欺压善良百姓的阎王府。**

走进派出所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三个人，坐在外面的两张桌子面前一男一女，身着警服，态度傲慢。当我们俩走进去后，那女的白了我们一眼。

母亲是这里的“常客”，过去她每进来一次，便如小鬼进了阎王殿，不是交“思想汇报”挨训斥，便是接受游街的决定，或是“交待问题”。

现在虽“平反”了，但骨子里那种小鬼见阎王的心理依然使她心有余悸。我感觉得到她进来后，态度十分拘谨。拿着户口登记簿和盐源开的介绍信，走进靠里面的那张办公桌，那里便是蔡家场人人畏惧的汪秃子。

这姓汪的家伙，我刚回来几天就认识了。

回来的第三天，我上街买菜，那天正逢赶集，我走到集市的中间，看见那里围着一大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叫化子模样的跛子，正拦着一个身着民警服的胖胖秃头中年人，要他开一张残废证明。

从围观赶集农民七嘴八舌中知道，那乞丐是附近大队一个曾被划为“反革命”的村民。而那胖“警官”，便是面前坐在最里面的汪所长。几年前这汪所长组织了一次五类份子的“游街批斗”，在游街时，将这个“乞丐”的左腿打断，从此丧失劳动力，生活无着，变成了乞丐。

后来民政局为了整顿市容，收容了全区所有的“叫化子”，对这人说：“只要有当年组织批斗会的人开一张残废证明，便能领到政府发放的基本口粮。”

於是乞丐鼓起勇气在大街上将汪所长拦住，请他给一条活路。

不料那汪秃子，不但不给他开证明，而且，一把将他推在集市街边的污水坑中，弄得这本已不成人形的“乞丐”简直像一个鬼，然后扬长而去。

我目睹这人欺人的一幕，一种本能的憎恶，徒然从心里升起。询问同我一起目睹这一幕的医院门房小张，他告诉我：“这汪秃子原是北碚法院的一个预审员，曾利用职务，掌握一批小偷流氓掌红吃黑，才从北碚法院贬到蔡家场接了这户籍的差事。”

旧性依然不改的他，掌着辖区的小偷、扒手依然行‘黑吃黑’那一套。尤其是他对“五类份子”的手段，更是心狠手毒，我的母亲当然是他任意欺侮的对象，想起这些我抖起了精神。

“汪所长，我的儿子从盐源回来了，今天费你的神给他上一下户口”。母亲怯生生的向他开口道，一面把户口簿摆到他的办公室桌上。而那汪秃子却像没有听见似的，依然的在看他的报纸并不答理。

我向他坐位上方的墙上看去，那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不禁想到旧时衙门，升堂的中间都挂有“明镜高悬”的大匾，但从来是黑暗无比，贿赂重重。而今中共执政几十年来，“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向来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遮丑牌。

户口既管着一个人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上户口的人就仗此，成为被上户

口者生存的决定者。想到这里，我的眼光，又从那墙上情不自禁的向下滑来，一直滑到了他那肥大的圆脸上，我才发现，那鼻子周围也有同陈大麻子一样的麻子，心里对他那种不理不睬的傲慢充满了憎恶。

二十多年来，我在监狱中天天同这种人打交道，他们的欺软怕硬的卑鄙心理，我不但了解，并且学会了一套应对的办法。但是尽管我的心里已经对他产生了恶感，仍觉得还不到发作的时候。

如此忍耐了几分钟，见他仍在那里看报，依然没有理会母亲，直到母亲再次请求后，他才慢吞吞的放下了报纸，爱理不理的将母亲放在办公桌上的户口簿挪到面前，慢慢地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来，懒洋洋地取出钢笔，头都不抬的发问：“姓名”？那介绍信上明明写着的，他却不屑一看。

我被他这种挑衅性的态度激怒了，母亲已看出我的怒容，向我连忙使了一个眼色，低声下气的回答道：“孔令平”。

“姓别？”“男”。

“年龄？”“38岁”。这一次那汪秃子才抬起头来打量着我，我苍老的面容，使他奸诈的眼睛里露出一种拿到对方短处的诡秘。

他拿起了甩在一旁的介绍信细细地看起来，母亲改动的笔迹被他识破了，他奸笑着得意的站起身来，用一种逼视的目光对着我：“这年龄是你改过的吗？”我对他这突袭一时还没准备，母亲已慌忙接过话来：“没有，没有的事”。

然而他这种多年培养的，抓到猎物便穷追不舍的猎犬本领，使他精神抖擞起来，从他办公桌上猛地站起身来，大声吼道：“你还敢替你的儿子狡辩，这明明是涂改了的笔迹，还不马上老实交待？”

看来这家伙是训练有素的，对于处在压迫阶层的五类也是欺压成性的，出口成章的“行话”对阶级敌人是用惯了的，不会走样。

尽管五类的说法已被取消，但在他的狗眼里，我们娘俩，一贯只能是被他训斥，被他呼来喝去的奴隶。

此时我的一股无名恶气直冲脑门，终于按捺不住，走到母亲的前面，恶狠狠向他吼道：“改了个岁数怎么啦，你要做什么？”

这种以恶对恶的战术，便是练狱中培养出来的，在监狱中对张棒棒，徐世奎，何庆云这般恶吏我使用过，对于麻脸中土，三星阎将，我也使他们难堪过，虽然我这种硬碰硬，使自己吃了许多眼前亏。

那汪秃子，对这一招，感到吃惊，因为他一时没对答上来，对母亲的盛气凌人态度，一时没找到该如何应对。

呆滞了一分钟后，他立刻从自己的椅子上跳起来：“你这劳改释放犯，看来是没有改造好，你今天敢公开顶撞？”他的脸涨得通红，向我扑来，摆出“阶级斗争”操熟了的打手架势，指着我的鼻子吼道。

那一男一女也一齐站起来，将我围住，好像就要拿出手铐子或绳索之类的东西，像收拾犯人那样将我压下去。

母亲见这形势对我十分不利，怕我因为冲动而吃亏，慌忙地拦着我，要我不要说话，并且用身体护着我。我明白越是闹到这个地步，越不可退让。

“怎么？要动手打人哪？还是文革那一套？四人帮那一套不是？”我厉声

的地喝道，这一招果然灵验，那姓汪的退缩了，从新的坐到他的椅子上。

我见这句话凑效，便连珠炮似的反击道：“姓汪的，你放明白点，今天我是来落实政策的，你还公然的称我是劳改释放犯，中央三令五申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是你们这一帮子人软拖硬抗，顶着不办，今天又不为什么，就要做出一付打人的架势，老实诉告你，不是四人帮的天下了！也不是你们这些人为所欲为的时候了！你今天只要敢动手，我非把你拉到市委办公室去说个所以然。”

汪秃子被我这翻怒斥弄哑了，一时还弄不清楚我的背景，居然对答不上来了。母亲见势，马上打圆场，向汪秃子解释道：“我儿子心情不好，脾气也不好，你别同他一般见识。”

殊不知这反倒助长了秃子的势头，他一迭声喊道：

“你们母子俩既是落实政策，就应当模范的遵守政府法规，户口是国家的重要法度，任何人都要遵守，篡改户口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你们知识份子比我们老大粗更懂得。按理讲，就凭你们篡改户口这一条就够刑事拘留的条件，今天，你这户口就拿不走了，等我们查清以后再作处理。”

我不知道户口管理有没有规定，对于涂改年龄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但我心里只想到绝不能向这仗势欺人的狗退让或认错，便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一边喊道，“别理他，看他把我怎么着。”一边拉着妈妈的手向门外走去。

当我们离开了那阴森的院落出得街上，母亲先前的那阵好心情全都消失，十分沮丧的一路上叹气。户口没有上，到惹出这场麻烦是她万没有想到的。后悔自己考虑不周到，但谁又能理解她的这番苦心？

我只好劝慰她：“我们又不是伪造户口，更改年龄这种事，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敞若他要继续找麻烦，我们一样生着一只嘴，谅他也做不了什么”。

下午躺在床上想，蔡家场在汪秃子这样的恶棍把持下，母亲当然受了不少的欺凌。然而，想到重大保卫处的郑树勋那张奸诈的脸时，我的心里一阵阵在发冷。

等待沉清冤狱的人，命运却操持在这帮虎狼般恶吏的手中，前途岂可乐观？看样子我们这一群刚脱离虎口的羊羔，又将掉进狼群的包围中。

我接着马上要回重大，了结未了的旧案，可我拿什么去见郑老头？

马大炮的主意本出于无奈，十斤大瓜子、十斤蜂糖、十斤核桃、就像三十吨的巨石压在我的心上，当我空手前去时，我作好的是一个最坏的打算！

今天这汪秃子那种像要吃人的态度，使我压根没对前途有什么乐观。充其量有份工作有一碗饭吃，便是共产党的法外恩典，我能同周围的人平起平座，保持一个普通百姓所起码具备的人格吗？

按照郑树勋离开盐源农牧场的约定，我在回到重庆后的一周内就要回重大保卫处去报到，他这个“约定”属于私人规定，还是对落实政策人员的一种规定？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从盐源回到重庆的时间并没有卡定，而且何时从盐源动身也没有说死。更主要因为我实在为难于三十斤的索取，所以回重庆后，我迟迟没有到重庆大学去。

眼看十一月份已过，年底即将来临，我总不能过着不工作也没有工资的失

业日子。虽然母亲说，我回来后，她的工资已经恢复到每月七十多元，养话我没有问题。所以我回到她身边，是否工作暂时并不是十分迫切的。

但我耐不住了，于是决定十一月底，无论如何都得回重庆大学去。

第二章：落实政策的马拉松

如果因为母亲赐给了我生命，要感恩于她的生养之恩；那么我求学的学校赐给了我生命的内涵，不但铸造了我的灵魂，还教会我知识和适应社会的本领，所以理应称为母校。

学子与母校的感情譬如孩子对母亲的感情，在离开这块我曾居住过、生活过的地方整整二十二年后，重返这里，也有一种怀旧之情。

可惜，这种感情却因这场人祸蒙上耻辱，蒙上了绵绵的恨！

虽然理性上我知道，羞辱来源于中共统治阶级的一小撮，来源于毛泽东，但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应该有起码做人的良心，有起码的判断能力和是非标准吧，然而偏偏坐在北京城头的毛泽东，竟用他想出来的“六条标准”支配着他们，把当年这场荒唐运动搞成一场令人胆寒的炼狱！使数万无辜学子伤身於荒野边陲！

令人惊叹的是，毛泽东怎么想得出把学校变成人咬人的场所？让品性卑劣者变成狗，向毫无防备的学子恣意残害，报复，取乐？

现在，当年整人的打手们藏到那里去了？是心亏理虚躲了起来，还是像狗一样藏在暗处，等待再爬起来反咬一口的时机？

回校的一路上，头脑里不断发生奇怪的问题……

第一节：回校

从北碚坐车到沙坪坝，下车后步行向重庆大学走去，二十三年前的街道依然如旧。记得刚刚入学时，我在这条街道上买过文具、参考书、理过发、吃过饭。

还记得离大校门不远，有一家餐馆，做的麻婆豆腐辣得令我叫绝。我那时觉得这是我吃过的做得最棒、价格也最便宜的菜了！经过那里，我有意觅寻，却不见了当年那餐馆，沿街的发理店文具店也改作其它店铺了。

当我走到那两块刻着“重庆大学”四个红字的石柱碑前，二十三年前我离开它的一幕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二十三年前我们从这个地方，被押上大卡车送到南桐矿区去“强制劳动改造”，那一天在风雨和太阳交叉作用下，风雨操场锣鼓喧天“欢送上山下乡干部”。

全校游行队伍，使我们这几十个被“开除”的异类，徒添了歧视。

今天，二十三年过去了，我刚从地狱里走出来，满脸带着过早刻下的皱纹走进校门，循着回忆的引导先去沿江马路，当年那儿曾是我被斗得昏头转向后常去的地方，我在那里呼天喊地，在绝望中希望有人救救我……

商学院的石头房子还是老样子，它能抗住日本鬼子的炸弹，同样也抗住了“文革”的枪炮！再往前走，化学实验大楼还是那庙宇式构造，只在那辽阔的中间地带，添了几座楼房。

在当年饶家院古老的建筑前面，我看见门口悬挂着：“重庆大学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牌子。不过，此时，我不想马上就进去，因为我还没有弄明白，在经

历了这‘脱胎换骨’后，来这里干什么？

是向他们去诉说自己想都没想到的灾难，给我安抚么？是拾掇那些被破坏的幻梦，向人们呈诉满腹的忧伤？还是去见一个连一无所有的穷犯人都想再榨点油水的郑树勋？是去认错、求饶，以可怜来换取下半生的安稳？

为弄清楚今天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我还需要思考，更需要走遍当年在这里曾留下记忆的每一个角落。弄清楚“反右”是一场我个人的灾难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是母校的过失，还是当年被整的同学、教师的过错？是我们的过错还是专制主义不可饶恕的罪恶？

我在饶家院旁徘徊后，便向着松林坡大礼堂方向走去。二十三年过去，原先就已破旧的礼堂还在那里，只是当年挂在那些松树干上满贴的大字报，交心书和血书却无影无踪了。

追溯这儿的狂热，便能了解学生是一个可塑性多么巨大的群体。

由于他们的幼稚无知，他们具有何等可爱而又何等可怕的双重性。

他们可以呼喊民主的声音；又可被独裁野心家所利用。

创造美好未来，同毁灭正义和科学，同时都可以为之！就看谁在操纵他们。所以这是好事坏事都可做出来的群体，当年共产党对学生的操纵使校园里陷阱满布，现在想来还使我不寒而悚！

再往前走便是学生食堂了，我们当年在这里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时，却不知道“阳谋”的含意！那些当年张贴大鸣大放的专栏早已不知何处？而今只留得一片荒凉，隐约可听见当年在这里的争论和叹息。

转过弯道便是我们当年的宿舍。我在当年住过的地方呆呆站了好一会儿，仰头上望，还清楚的记得曹英们是在那一间屋子里组织的轮番批斗会，将被划成右派的人斗得昏头转向、精神失常。

当年曹英威逼我的声音犹存耳际，我就是在这里掉进了“阳谋”的陷阱。掉进了‘伟大’中国共产党所布下的阶级斗争的天罗地网，我就在这里把自己痴迷的个人幻想，变成一场二十三年地狱里的练狱。

转过身去，便是图书馆后背山底一角，我们当年这群心灵惶恐的孩子们，曾拖着犁耙挣扎在刚刚被新鲜粪水泡灌的水田里，干牛的活，脱人的皮，从此，地狱的烈火就在我身边燃烧起来。

就这样的一路寻来，！当年在我求学的这个摇篮里，除了歧视虐待什么也没有！同学间的那种天伦的感情，全被当年乱舞的群魔扼杀了。

现在，我要从新认识这个曾生活过的地方，从新了解那个时代校园里的主人，再认识这个始作俑者的中共集团，除整人和对社会的破坏，它有光明的一面吗？

如果说我在这故地重游，拾到了当年没有发生，现今已改变了的东西，又产生一个最大的疑问：当年整我们的人现今有几分省悟？他们怎么就全消失了，像鬼一样？毛泽东还没倒，围着他的猢猻们就散了？

重大保卫处仍在原来的老地方。不知为什么，一进入那保卫处的小院我就感到压抑。说实话，若不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和“平反”，我是绝不会主动去跨这个门槛的，

走进大门，在过道上，我向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人询问郑树勋是哪个办公室？他指了指走廊尽头倒数过来的第二间屋子。我整理了一下思路，准备好了几种不同情况的应对，便走了上去敲了一下门。

门打开了，开门的正是四个月前在盐源“提讯”我的人。不过此时白胖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一改一年前“审案”的凶像。

一见是我，他很客气地请我进去入座，还谦礼地倒了一杯茶，一面寒暄一路辛苦之类的客套话，他的这种态度反而使我警觉起来，一面小心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心里却在揣度对方要耍什么花招？

此刻我忽然对空手而来感到难堪。倘若今天我提的是一个沉甸甸的大手提包，一进门就打开提包，按照三个月前他开出的那张货单，将“贿物”一点点地数给他，恐怕对方会关上房门，在喜形于色的同时，会对我的安置有一场讨价还价的口舌。

他一定会说出几个紧缺人才的单位，说那里的规模如何，工作条件如何，工资待遇如何，建议我到那里去上班。我也会提出诸如住房，奖金等等的要求，甚至还会请他帮忙，回重大工作。

虽然这是我花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对方所说的也弄不清是真是假，但我想我也许就有了一个可以摸进去的后门。

但是，一旦我进了他的圈套，今后还会不会没完没了发生新的勒索？现在我偏偏不肖此举，采取了马大炮的建议，此刻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只听凭命运安排了。

在他指定的坐位入坐以后，我便从帆布挎包里，将盐源农场加刑的平反判决和介绍信取了出来，我留意到他紧盯着那挎包，从他的眼神中我明白他在想什么？一种不能明言的难堪掠过了他的嘴唇，他接过信看了两遍，想开口问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过了一阵，他绕着弯子问道：“我这次到盐源专门为办你的案子出差时，走得匆忙，有些想在盐源顺便办的事忘记了，就连自己的路费都没有带够，多亏你们那个队的马司务长照顾，临行时，还给我补足了买飞机票的钱。回来后，我给他寄去了，你回来时，他没有向你说什么吗？”

我看了看他那狡猾的脸，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脸厚功底，便立即按马大炮的嘱咐，很诚恳的傻乎乎地摇着头。

到此时，他才明白，过去在其它人身上使用揍效，并得到好处的手段，却在我这里放了瞎炮。面不改色的对我宣布：“关于你的右派问题，是由我校落实政策办公室来办的，至于你 60 年所判的反革命一案，要经过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了，我已将调查材料和结论转给了他们，你只能去找他们！”

如此看来，要我到这里来，纯属是这郑树勋的三十斤索取的需要。因为无论去落实政策办公室或去中级人民法院，都无需来这里转一个弯！而平反以后工作的具体安排，恐怕更不是重大保卫处所能决定得了的。

于是我心里暗自庆幸，幸好没有按他开出的三十斤见面清单，费尽心机去一一备齐，再路远迢迢的带到这里来当面交给他。

但是，转而一想，重大保卫处必竟是我平反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具体的落

实者。其它环节，还不都要根据郑老头的最先意见办理？这个意见有多大份量我一无所知，所以，我在他面前怎样做才不失误，我还没有主见。

“诺，现在我就带你到学校落实政策办公室去。下面的事是他们负责的。”沉默几分钟以后，郑老头一面把我刚才交给他的材料还给了我，我下意识的看了看他的表情，心里想着，我的到来肯定让他大失所望，便跟着他走出了保卫处，向饶家院走去。

党委办公楼，学生时代一向被我们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机关，它决定着我們今后的政治命运，实际上也就决定着今后一生的命运。入学三年，我就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生怕在这里被问住，节外生枝的自找麻烦。

我被郑老头带上了二楼，走进了一个宽敞的屋子里，进了屋，按照室内的办公桌判断，在这个办公室里办公的人员足有二十余人。

每一个办公桌之间间隔的地方放着凳子，大概专供来访者和正在等待结论人的座位，所有办公桌上都堆满了各种卷宗。

听说自去年开始，这儿每天都要接待上百人次的来访者，他们都是等待或办理各种甄别手续的人。所以，这两年来，这儿成了重庆大学最忙碌的地方。

后来重大党委书记高书记告诉我：“解放三十年来，这么一个总员工不到四千人的学校，**就有四千人**先后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社教、文革运动中挨整，现在平反了，问题一下子全都摆了出来，党委的压力一下了增加了几倍！”

我不禁想到，运动一来，为了政治的需要，**把学校这种培养人才的摇篮，变成了按政治需要制造人整人的监牢**，现在，又因新的需要将抓进来的“鬼”放出来。这忙碌的党委在做什么不是很清楚吗？说中共对文化的摧残，对教育的亵渎，**在这里证据齐备。**

郑树勋把我引到办公室中间的一张桌前，那桌后坐着的是一位年纪大约四十多岁戴眼镜的女士，像是从系里抽出来的老师，交待了几句便独自离开办公室下楼去了。

从她年龄上判断，当年也是一个与我年龄相同的学生，她知道中共捉鬼放鬼的内幕，完成“纠错”吗

等我坐下后，她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式两份登记表来，在上面填写上编号后递给我，一面向我发问道：“你就是机造六零七班的学生孔令平吗？”我确认以后，她便吩咐我用钢笔公正地把表格填好。

我接过那表一看，表的名称是“重庆大学落实政策人员申请表”。心中对这“申请”一词颇反感，暗想道：把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当年捉弄够了的中共，而今又因政治需求予以平反，怎么会要我们填上“申请”的字样？好像是因受害人主动“申请”，才有今天的“平反”。

尤其在表首栏中，首先要填写：“当年划右的主要依据”？

二十多年间，我的申诉不下百次，却没有理睬我，反而在各种场合下威胁我，说我在为反革命言行狡辩，该罪加一等。想到这里，我望了一下面前这位女士，心中的气想借此向她发泄。

想起当年曹英们组织的批斗小组，对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学生，使出

那么卑鄙手段，按他们事前编好的罪名，不惜四天四夜不准我睡觉，捏造马开先与我见不得人的“丑闻”，并要我在精神错乱时认招；把“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诬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种种屎盆子统统扣在我头上。

现在，是要我将这些完全莫须有的罪名从新罗列一遍？还是恢复这段被中共的暴力扭曲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往事真像？

痛斥纵然可以使我所受到的怨气得以释放，但自我接触郑树勋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给平反留下被称作“反右是必要”的尾巴，反而要求我将当年扣在我头上的屎盆子，从新认可并对冤屈制造的元凶表示“谢恩”，我岂能就范？

过去无缘无故，而遭迫害的无辜者何止千万，但有志以自己遭遇的冤害留下亲身经历，告诫后来者的却不多。

我想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溅始作俑者一抹污渍。我要作专制暴政的见证人，犯不着为一栏的填写感到困惑。

想到这里，我便在这一栏中写下了两个字“出身”。这样，既如实地反映了我的遭遇，也说明当年相当多的人仅因家庭出身被划成“右派”的，这既吻合毛氏初衷。同时执行平反者也较易接受。

她看了我填的表，目光长时间的停在“当年划右的主要依据”这一栏内。

正好，邻近办公桌上几个廿多岁的年轻人围了过来，他们多少带着点好奇心向我询问二十三年前发生的事，从年龄上判断，当年他们还没有出生！看看他们脸上挂着天真，想到告诉他们当年发生的“反右”经过，兴许会有利于他们手头正在办理的案件尽快落实。

我在追述往事时特别提到了马开先，讲完了这些过程，我希望他们能帮助我找到马开先，因为重大党委一直拒绝告诉她的下落。

正在这个时候郑树勋回到了办公室来，他吩咐戴眼镜的女教师，取出预先早已打印好的“重庆大学机械系党委办公室”签发的“红头文件”，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经校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反复查核，报经党委批准，现在对你在1957年划为右派份子的处理作出了改正，这是改正通知书。”

我从她手上接过那份“红头文件”那上面这么写着：

“查1960届，机造七班学生孔令平在五七年整风期间，曾出于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动机，对党的政策提出过一些意见和看法，在这些意见中由于受当时社会右派思潮的影响说过一些错话。但仍属于教育问题，不应当以此作为向党猖狂进攻的依据划为右派份子，现在为纠正反右扩大化的错误，特予以改正，对他本人恢复被开除的学籍”

所有“改正”通知书都千篇一律这样写的。

中共用这轻描淡写的套话了结“冤案”怪轻松的！！西方人讲人权，中共视为无稽之谈。！既然当时是我“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当受教育！怎么处置都说得过去，充其量是“处置”不当，中共何错之有？

只可惜，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对无辜者屈打成冤、偏要打着“平反冤假错案”招牌：拿到世界上去诳骗人，我怎会同意？

不料那郑树勋却从一旁插上话来：“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他那胖脸上

有一种说不出的诡秘。他也许真以为，二十三年的炼狱已把我们全都变成了随人戏捏的靶蛋，今天面对这样的“改正结论”会感激零涕！

但他看出了我的反感，心中已明白，便把脸一沉，煽风点火的说：“你这个认识上就是爱钻牛角尖，吃了几十年的亏还不见大改，你想想这次平反，校党委下了多大的决心，排除了多少干扰？既体现了党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错必纠，又体现了对犯错误同学极大关怀和人道主义，来之不易啊！你还不快向系的党组织表示感谢吗？”

他一面说着，一面向那戴眼镜的女士送去谄媚的一眼！

我狠狠的白了他一下，冷笑着说道：“这二十多年多亏我年轻命大，还没有被整死！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不过，今天我是来拿平反通知书的，你们不是‘纠错’么？如果我还保持着人的羞耻心，我为什么下贱到向害我的人认错的地步？”

由于激动，我猛然的站了起来。

此时我的脸一定是铁青的，捏着：“恢复学籍通知书”的手颤抖着。

那戴眼镜的女士看见我那可怕的神情，怕我一怒之下将它撕掉，连忙从我的手里将“通知书”夺了过去，连连说“现在这通知书还不能发给你，只给你看看并让你签上意见的，等到你的原案平反后我们才能给你。”

还告诉我，重大经过一年的调集档案，核实材料工作已结束，现在已申报重庆中级人民法院，今后要催就催法院了。

第一次回校‘落实政策’只好空手而归了，我站起来看到郑树勋正在那里赫赫奸笑。由于我缺乏冷静没能按捺对他的憎恨，不顾一切同这“恶棍”撕破了脸！提着手提包，出门下楼，愤愤的走出那圆形的石拱门！走出党委办公楼，忘了怎么走出校门赶公共汽车了。

在车上，满脑子还在翻腾在落实政策办公室里的那一幕。

回到蔡家医院整整两个小时后，心中仍未平静。钻进了楼下我那间停尸房前的临时住处，往床上一躺，什么话也不想说。

母亲见我从重大回来情绪非常不好，到我的房间里，轻轻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只是摇头，并没有回答她。那晚上，我连饭都没吃就睡觉了。

第二节：衙门口前的‘上访者’

经重大以及那汪秃子的“教育”，令我更加明白：

对落实政策不可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奢望，反而还要提防着这些心存诡计的鬼蜮，玩弄各种伎俩、设下种种圈套！中共的政策，是统治者任意揉捏的面团，我们这些初生之犊，糊里糊涂坐监，现在又被莫名其妙平反，各级衙门在捏这个面团时，是决不会考虑受害人二十多年伤害的。

我忽然想到了自卫，便从我的行李中，将马大炮转交给我的，郑树勋那封勒索信翻了出来，就灯下写了一封给孙起孟的信，告诉他承蒙他的关照，我才得已回到母亲身边。并且把郑树勋这封信一并寄去！

过了几天，情绪慢慢隐定，重大方面既已答复我以后去催促重庆法院，只

有了结我 1960 年“反革命”一案，我才可能得到一份工作，并得到至今还押在蔡家派出所的户口薄，也才可能得到我因生活需要的粮票、布票、油票。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我还有未完成的事业！一切都还刚刚开始。

十二月二十日，我去了在下半城的重庆中级人民法院。

这一天十点钟，我才到了位于南纪门的重庆法院门口，如果我不是必须从这里领到我今后的“活口”。我是宁死也不愿上这阎王殿来的。

它高高耸立在半山之上，俨然以掌握生杀大权藐视着在他下面的重庆老百姓！我走到门房门口，一个披绿色军大衣的值班民警，向我索要介绍信，我说：“我是来催办落实政策的事，也需要介绍信吗”？

他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这是对犯人进行审理宣判的机关，不允许谁向里面乱窜，如果你因催促案件而来，那也应当持你们单位开具的介绍信，说明你的身份以及事由。你一无所有的往里面钻，找哪一个处室，找谁都不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向里面通报啊！”

此话有理，上次在重大，我为什么就没有想起开一张介绍信？

在学校和法院两个机关，如何呈递公文，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回想当初南桐法院由谁审理我的案子，我就一直没有弄明白，也从来没有人向我明示过。

糊里糊涂的在供辞上签字划押，被办案人当成面团，捏出了十八年徒刑，我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这几乎要了我的“命”，到现在，我那十八年徒刑由谁判的我都不知道。

唉，年轻时代的我简直是一个迷路羔羊。向预审人员预先放置的阳谋套子里钻，等到残酷的监牢使我猛省时，我已经被关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笼中了。二十年里我想从这个阳谋的圈套里退出来，是多么不容易！

想到这里，我便把我的名字以及学校和原来的案情，向那守门人作了一个简单介绍。他听后拿起电话筒一连拨打了几个部门，回答都说，对我的案件他们不知道。我无可奈何的向那高耸在几十个石梯上的“阎王殿”望了一眼。

他见我一脸的焦虑，便建议我最好到市委办公大楼的信访办公室去了解一下，看看像我这种案件该通过什么渠道来问？

我就这样，在这道衙门面前，被守门人理直气壮的踢了出来。

也罢，去市委见识见识，看看落实政策的门坎里大小衙门水有多么深？

当我到达七星岗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我在附近的小面馆里胡乱地吃了一碗面，就来到了市委正门。两个全付武装的军警把我拦住，我心中暗忖：这里才是重庆老百姓的真正阎王府。

我还是二十三年前来过，二十三年前，为了向当时的市委呈诉情况，便将我在大鸣大放期间，与母亲的全部通信，送到这里来。

我哪里知道，这对于阳谋来说，划成右派本不需要什么证据，只需家庭出身就可以了，二十三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深深痛悔当年我的天真和糊涂！

两个兵将我挡在传达室里，那里面值班的老头告诉我，专管平反冤假错案，是统战部下设的“信访”办公室。并指着那距正门两百公尺的一个小巷，说沿小巷进去便是信访接待办公室，我便向那小巷走去。

还好，这一次总算没有碰到什么盘查和障碍，进了里面，办公大楼的门却紧闭着，它的面前一条大约五十米长的走廊中，长条凳子上早已排坐着二十多个人，一看就明白，他们是在等待那两扇紧闭的大门打开。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还不到一点钟，按照机关办公在下午两点钟的常规，还足有一个多小时，便问起那排坐在最前面的女人，她说她是今天早晨七点钟就来了，一上午才接待了十几个人，等轮到她，已经到下班时间，只好继续再等两个钟头，等到下午再说。

我望着这些候在走廊里，排着轮子等候接待的人，他们大多上了年纪，为了“信访”不惜饿着肚子在等。

看着长长的队列我开始踌躇起来，要是按照最前面那人所说的，上午才接待了十几个人，那末，下午未必能将排在这里的人全都接待完，白等一下午，空手而归，不如趁早离开。

但是路远迢迢从北碚到这里，空手而归未免遗憾。既然来了，且看看情况再作决定吧！

坐在我前面的两位老人，一位白发苍苍，看上去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再前面的便是一位满脸皱纹年过六旬的独臂老头子，从他们满脸的愁容和疲倦神态看，像经过一场战争后，等候在市政厅门外，排着长队等着抚恤的死难者家属。我听见那独臂老人正在向老太太倾诉他的遭遇：

“解放前，我是水上派出所的警察，干我们这一行的，兵荒马乱年代为一家人的生活，谁又完全没一点靠山？那段历史我早就在解放初就交待了。那时我只是个小小水上警察，无非是干了点水上揖私，船到码头作些检查之类的事。凭我熟悉水路、精通技术，当了几十年的水手！那算什么特务？”

“文革一来，新来的革委会主任，把我当警察的事重新翻出来，逼我承认解放前当过特务，把我送到学习班里关局子，唆使我的老婆和儿子不认我。”

“我说：‘你们对我的历史已经查了多次，现在还要我无中生有乱招一通，是什么居心？’那当官的说我顽抗，开除了我的工职，把我送去劳教。”

“在劳教所里，一面对我用刑，一面逼我承认当过特务，左手被打成骨折，又不给我医，直到我的伤口化脓烂了长了蛆，才送劳改医院。医生说：‘送来晚了，只有截肢还可以保我的命。’我的手就这样废了一只。”

走廊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说着将那空荡荡的左手袖管，用右手拣了起来让大家看，继续说道：

“上个月航运办公室的人跑到劳教场，说要落实我的政策，现在查明我确实没参加过特务组织，所以要恢复我的政治名誉。但这十年来家没了，老婆嫁人了，我已是残废人，儿子也不愿收留我，我到哪去安身？所以我向他们说，我不能空得个平反的名份等死，给我一间房子吧。

可那整我的局长说：‘你已经退休，给你退休工资就够了，你一定要回长航现在能干什么，何况现职的人都还没有房住，我又拿什么给你？’他们打残了我，就这样撒手不管了，谁来服侍我的下半生呀！”

说到这里他呜咽着哭了起来。

大家听着，没有人开腔。在座的人哪一个都有一本心酸账，像他这样的受

害者在中国这个年代处处都是。有谁来管这些被历次运动弄残了的老年人？

当年因执行单位对各种受害人草率处理，今天，这些受冤者，不辞万里行乞，赴北京上访，死在路途上的人多的是。没有人去统计这个冤孽深重的数字！……

看着他那样子，我又联想到我的母亲，她也同样因为年事已高，被整她的单位所抛弃。至今还留在蔡家医院，受那里欺侮过他的人呵斥，虐待。

心中还在翻腾，又听见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接着开始叨叨起来：

“我就这么一个独儿啊……”

她第一句话，便使我联想到鲁迅笔下，“故乡”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那是她刚满五岁的儿子被山里的狼叨去以后，逢人便要诉说的话！虽然面前的她，比之祥林嫂苍老得多。而且从她那身打满补丁的棉衣看，她比祥林嫂的遭遇更惨。

且听她说道：“文化大革命中，我儿单位，八一五的头头！硬说他是‘老保’，还捏造说他过去还参加过啥子七星党，便把他抓起来关进黑屋子里！我听到后，人都吓傻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啦，我跪在那个姓曹的面前，请他看在我这孤老太婆份上，高抬贵手，饶他一码！没想到，我那脾气刚烈的儿子却从关他的黑屋子里逃了出来，唉！”

老太太陷入了沉思，停了一下继续说：“我看到他，叫他赶快跑，哪里晓得，他却去找那个姓曹的“算账”。当场还打了起来。那姓曹的当下便叫派出所把我儿抓了起来，硬把他说成反革命行凶报复，抓进了监狱判了十年徒刑，把他送到新疆劳改。从此以后，我儿就再没有回来过……”

“现在，托邓爷爷的福，我儿写信回来说他的案子平反了。既然平反了，那就该回来呀！我都已快八十的人了，身边又没得其它人，跑这个地方都跑四次了，每次都喊我等！可是，我们这些老人能等多久呀？我的儿呀！你又为啥呀？真的老娘有个三长两短，连个收尸的都没得……”

边说她嚤嚤的哭出声来。然而在场的人没有任何反应，好像麻木一般。人间的涂毒，有时比野兽更残暴，夺去她儿子的不是狼，而是与儿子共事的人。

那些主持平反冤案的官僚们，从没想过，二十多年那么多冤案牵及到多少个家庭？这成了久积的社会肿瘤，平反多成过场，使这肿瘤越来越大！

今天坐在长廊里的二十几个“代表”，就同全国千千万万的冤狱受害者一样，好像是一些奉了特大赦令的“罪犯”亲属，彼此间除了陌生竟找不到相互安慰的话，当然更谈不上同仇敌忾了。

若以个人身份，跑到共产党本市的最高衙门来求解脱和赦免，‘平反’必定流产，路遥远兮，前程漫漫。

我正思考着，长廊里一阵骚动，看我的手表已是下午两点半了，“唔！迟到了”我下意识的喊了出来。可那两个年轻人却丝毫没有显露出一点内疚，而是一脸的傲慢，大摇大摆地从这二十几个上了年纪人面前穿过。

偏偏来访者中有几个低三下四，向两个从他们面前过去的人点头哈腰。好像自己原是来乞讨似的，那两个年轻人却像来施舍什么一样。

当办公室的大门打开后，长廊里等候了几小时的人群全都向门边涌去，只听见那排在前面的人不断地嚷道：“喂！排轮子，不要乱，按次序，不要乱。”

好一阵子的推推搡搡排成了队，不过已不是坐着而是站立着。

我看见刚来办公的年轻人不紧不慢的放下公文包，取过了自己的茶杯，走到里面泡了茶才坐下，从为首大约五十岁的女人手中接过递过去的材料。

那女人叨叨的叙说自己的丈夫、儿子和被抄家的经历。好像一个溺水已久的人几经沉浮后，才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不料，还没等她叙说完毕，那年轻人便显得不耐烦了，不屑的说：“后面的人还多！你把话说简短一点”。一面打开材料，没去听她的哀哀呈诉。看完材料，拿出登记表，截断了对方的述说，一问一答的在那上面填写了信访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及事由等等。

写完后便向求访者说：“你这个案子应去找××法院”。那女人马上说：“我已经跑了十几次了，每次都叫我等，落实政策以来我等了两年了，这案子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啊”？那接待人并不理她，拖长了嗓音喊道：“下一个！”

我看见她那带着深深不满的表情，迟迟不愿从座位上站起来，等到这个时候，今天她整整等了七个小时了，中午还没有吃饭，原想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可惜这里仍把她当成皮球，踢回她不愿再去的法院衙门。

我深深同情她的饥饿疲惫，只见她在那里闷了几分钟，无奈的站起来。那一瞬间，她刚刚的座位便被排在她后面的上访者占据了。于是，又一串新的急促的叙诉，将女人送出了办公室的大门。

第二个上访者，几乎重复着他前面那人的过程：唠叨，填表，接待人向他说应当去找××机关，所不同的，这个上访者提出请信访办开一张“介绍信！”

可接待人以讥嘲的口吻回答他：“我凭什么给你开介绍信？凭你的材料，凭你的口述？我们信访办公室对你的情况在没有确证时，根本无法下结论，所以你能找基层，他们既负责你的案子，他们才了解你的情况。”

结果，在求访者反复要求下，那接待人才写了一个曾于某年某月某日，来过市委信访办的证明，塞在信访人的手中。

看到这里，我已经完全明白，连这种重庆市最高的衙门，依然的同其它单位一样，将这些可怜的上访者当成皮球，从这里踢出去！

明白这种结局，我便不想再在这里挨那年青人一脚，便提着我的帆布书包，决然出列，向那圆形的石门走去，自动的被“踢”了出来！

第三节：草菅人命的中级法院

比起上次去重大的“上访”，这一次简直就是徒劳而返！官场在办理“平反”时就有这样的艰难！平反的漫漫历程就这样拖下去！这对于上了年岁的人可是一件最残酷事啊！

回来后第二天正是星期六晚上，同母亲同室而住的郑医生和丁医生都回家了，宿舍里就剩下我们母子俩。点起煤油炉，煮好面条，母亲知道我两次上访的过程，见我闷闷不乐，便述说起为落实我的政策，她花费了一年半时间的马拉松“上访”过程：

“我去重庆大学，正是去年的大热天，我一连去了三次，每一次都叫我等！

那时天太热，为了防暑每次中午我就吃一牙西瓜。

几个年轻人看见我这么大的岁数了，动了恻隐之心，劝我不要再跑了，说中了暑倒在马路上就麻烦了，有问题只要写封信来就够了。我去南桐法院前后跑了六次！最后一次，我在下汽车时摔倒了，还是被好心的路人将我扶到医院去，幸好还没出大事。

那法院的一个老吴过去也是右派，悄悄的告诉我说，现在办事就是这样，当事人再急办事人绝不会急，一直等到上面来了文件，‘火候’到了，再大的案子也一风吹。他劝我不要再跑，跑出病来还不是自己吃亏”。

听到母亲的这段话，我心里非常不安，当时我急着早日出狱，没有为她的安全多想，万一她真的在这种马拉松长赛中倒在路上，那可是我一生都无法原谅的罪过！她可是这世上我仅有的亲人了。

现在这样，连肥皂票都要占她的，我怎不惭愧，所以明知在中共官衙里跑，变成皮球被人踢来踢去，我还得硬着头皮被人去踢！

我的平反，果然拖到了 1979 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医院书记通知我：下午重庆法院打来电话，要我在第二天上午，去重庆法院刑事侦察二处领取判决书。

拖到一年最后一天，官僚机关的办案够拖沓的。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第二次来到重庆法院，走上那台阶，走进办公室，一个姓丁的年青人接待了我，并把一张纸递给我，这不禁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南桐看守所，一个中年人把一张同样大小的纸，递给了我。

我就这样被两个办案人，在监牢里残酷地戏弄了整整二十年，这种残酷游戏真是绝古今之未有！

我沉住气一言不发的从那小伙子手里接过这张纸，坐在那木凳子上阅读起来：标题：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60）刑上申字第 58 号。全文如下：

申诉人：孔令平，男，现年42岁，江苏盐城县人，大学文化。原系重庆大学学生，一九六〇年八月因反革命罪被南桐矿区人民法院（60）刑字第6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孔不服提出上诉，经我院（60）刑上字第 58 号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驳回原判，本人不服反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再审查明：孔令平自一九五七年五月至一九六〇年一月，先后书写的日记诗词，没有扩散，并作过交待，在此期间还向我党政机关投递信件等，均不构成反革命罪，原以反革命定罪判刑不当，应与纠正，本院特判决如下：一、撤销南桐矿区人民法院（60）刑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和我院（60）刑字第58号刑事判决书。二、宣告孔令平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当事人不得上诉。

1979年12月30日

好一个草菅人命的“判决”。就这样，从 1960 年至 1979 年整整二十年的生死劫难，被重庆法院轻松的用三百多字划上了句号！

就这样，我，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在中共“革命”运动中，被任意蹂躏和摧残达二十多年之久，待我们奴隶不如。“反革命”一词，像一个面团一样，在他们的手里捏来捏去，玩着：“有”，“没有”的词眼，将法律猥亵得

比儿戏都不如！

我愤怒喊道：“整整二十年你们睡醒了不是？在狱中一开始我就一再申明这是一个假案，你们全不理睬，二十年来我写的申诉百余封，你们装聋作哑，今天若不是上面有政策，你们还会蒙下去，你们那像办案的机关？”

那姓丁的漠然看着我，一脸无奈，他知道自己也是一个任人使用的枪手。面对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心中万丈怒火又怎么发泄？

1619年，美国一位叫詹姆斯顿的白人，从荷兰奴隶贩子手中买下了二十个非洲黑人，带回美国充当奴隶，从此开始了美国黑奴的历史，他们的吃苦耐劳和繁衍，使他们渐渐充当了美国建设的主力，到1970年黑人已超过75万人，其中奴隶占70万。

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深入人心，1860年林肯任美国总统，于1864年发布解放奴隶宣言，黑人为争取社会平等进行了百余年可歌可泣的斗争，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牧师马丁·路德·金提出的，黑人民权斗争。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明确：美国国内的公共设施实行种族歧视，被视为犯法。

在中国，毛泽东用阶级斗争实行变相奴隶制，把人为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中国倒退了几百年，今天这种遗毒远没彻底肃清，我们这些黑五类，应向马丁·路德·金学习，发动中国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斗争，牢牢记住：在中共统治下我们的权力只能靠自己争取，天下要靠自己去闯。

此时的我，不是当年如羔羊般的驯顺者了！就在那小伙子要我签字的那张纸上，我留下了：“本人对本案保留继续申诉的权力。”十四个字。

第四节：区统战部的官架子

这天下午，我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被蔡家派出所扣押了两个月的户口簿，今天也由医院的王书记送来了，不过母亲补充说：“蔡家派出所对王光明讲，要你写一个检查交到派出所去！”

我回答道：“别理他。”在我的眼里，这是一群骑在百姓头上的政治痞子，现在同他们多说一句话，都有损我的自尊！

然而，1980年的元旦，对于我们母子俩，必竟是渡过二十三年劫难，死里逃生后重逢的第一个元旦，可惜，妈妈当年想得太绝，将原先的遗照全部烧掉了，现在只有在头脑里留着他们的遗像，寄托对他们的记念了。

恰好，那一天下午，小妹和范山也来了，他们带来了一块猪肉和糍粑！我们忙碌到晚上十点钟！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将在春节才吃的团年饭，提前到了1979年12月31日晚上，就在我那间临时房间中摆下象征性祭品！一缕香烟迎接我的父亲、外婆和弟弟“回家”团年。

我为他们盛上了饭，摆上了酒，然后跪在地上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默默忏悔我对他们的不孝！特别是我挚爱的父亲，他是我们全家中最早进入天堂的人。

元旦一过，我就带着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盐源县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和重庆大学关于我右派的改正书，到北碚区委统战部要求他们根据

政策，安排我一个“对口”的工作，并处理我的“善后事宜”。

统战部长姓贺，用一付不冷不热的面孔接待我，给人官气十足，架子不小的印象。像这种人既不会对被害人以同情，更不会考虑被害人的困难给予应有的解决。他看过我递给他的“平反”文件后，叫我去楼下的‘接待办公室’去找吴庆华。

这吴庆华头发花白，大约五十多岁。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打量着我，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表格递给我！我接过表格一看，那是两张“落实政策人员登记表”，中共的统治，唯独这种文牍式的档案材料建立得十分细密，凡涉及人事调动，不管跑那一个衙门，毫无例外的拿出这种标题不同、内容一样的表格来。

回重庆仅三个月，跑了重大、法院和中共市委，就填了三次这种表格。

当他看完了我给他的那一迭材料和我填写的表格后，问道：“你是重庆大学机械系的学生吗？你也知道的，根据中央及省委文件的精神和规定，落实你的政策是由我们区统战部负责的。不过，我们的权力和范围有限，所以，希望你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来对待我们对你的安置。”

吴老头明白贯彻共产党的政策，必令我“大失所望”，所以预先给我打一针预防针。我正等着他的下文，他突然口风一转，先行发问道：“先说说，你想干什么工作？”

在毛泽东暴政时期，向国家输送建设人才的大学已纷纷关门，几十年来技术人员的枯竭，连中共的上层官员也惊呼“人才难得，人才贵宝”。所以我不但不应成为统战部难以安排的包袱，简直是用人单位力争的“缺货”。然而，这位吴老头向我推荐了北碚区属的几个街道工厂。

国营厂和集体厂，待遇和地位大不相同。这又是中共领导下的怪象：国营、部属大工厂的工人，优于地方国营企业里的工人；省级企业又比市级企业优越；市级企业又比县级优越；县级又优于街道工业。当工人也要分贵贱，讲运气。

工人被划分出等级，体现了“国家”对企业的“分别对待”，在资金，设备原材料十分匮乏的条件下，先满足直属中央的大企业；然后层层降格。轮到那些处在最底层的街道工业，不但生产举步维艰，工人们连最低工资收入都难以保障。

“可不可以考虑将我安置到北碚境内的北碚机械厂或是红岩机械厂？”我请求道，我已经是中年人了，在求职时当然要选择，这两个厂说不上好，只是比较正规一点，生活待遇也相对稳定一点。

“啊！那可不行，这些工厂是市属的单位，我们区委是没有权力向这些单位安置人员的。”吴老头斩钉截铁的回答。

“但是，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的文件中，没有规定我们的就业安置非由区一级来安置。那上面只有：“由哪一个单位处理仍由那个单位安置的规定”，我竭力忍耐着，既要揭对方在诓骗我，又不好同他争执，因为这是我来找他们。

吴老头冷笑道：“如果你有依据，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重庆大学，偏偏要跑到这里来？”对方果然耍赖了，我明白，“平反”的门坎之外，还有“寻找”工作的门坎！对于我们这些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小鬼，在共产党的衙门下要想顺利生活下去，还不知道要爬多少门坎？！

我看了看面前这个老家伙，又联想到郑树勋。我想离开盐源时，就该听从他的吩咐，像背十字架一样，将他所需要的三十斤贡品一斤不少的从盐源带回来，也许现在我不至于在这里犯难。

可我仍书生气十足，满以为只要获得“自由”，在这个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人才”奇缺的社会中，哪有求不到职业的道理？

沉静片刻，吴老头终于又拿出另一个办法，改口说道：“区属的企业你既不愿意去，那么你去中学教书怎么样？”吴老头的这个建议倒真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不过，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须知，1966年为了摧毁政敌，学生成了毛泽东的政治别动队！而今新的中共官僚，上自邓小平，下自官复原职的中共大小官吏，哪一个没有尝过“红卫兵”的拳头？刚从别人踏着的“一只脚”下爬起来的中共“新”当权派，没忘记当年红卫兵的厉害。

对待多年“伤失”理智的学生，不论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还是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中小學生，可不是简单动用警察就能治服得了的。弄得不好，这些被毛泽东调教多年的造反“小将”们，一旦被毛泽东余孽所号召，造起反来是绝不好收拾的！

能走上课堂约束学生的老师，一时的“奇缺”起来！我在盐源时便知道，为了筹集农场子弟小学的师资，不仅从管教人员中抽人，还从就业人员中过去教过书的人（例如魏朋万）叫去当老师。

蔡家场的几所学校中将教师子女以“顶替”名义，请去滥竽充数登上讲台的人就更多了！然而，社会风气既已被毛泽东破坏到这种程度，将老师当作最低贱“臭老九”的遗风依旧！教师不但在待遇上低于当时社会上的其它职业，在人格上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他们依然受到学生任意侮辱，甚至家长可以到学校替孩子呵责老师！好像老师是他们雇佣来的保姆。

对于我个人，“老师”这个职业，却有一层与别人所不同的隐痛！我的父母原来都是忠厚老实的“老师”，他们曾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国新文化做过贡献，结果，父亲惨死囹圄，母亲遭受右派横祸。双亲之痛使我发誓，决不重走父母的老路。报考大学，绝不填师范，出了校门再不回头走进校门。

中共不能宽容“教书匠”，在我心里留下的伤痕没有愈合。想不到在落实政策的名义下，要我去接受这个我早已不愿干的工作，于是我十分果断拒绝了吴老头的“安置”。我的理由很简单：“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

第一次初访区委统战部就这样无果而归了，带着怏怏不快的心情，我回到蔡家。母亲听完我去区委落实工作的经过后却说道：

“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你是清楚的，既然统战部的意见要你去教书，你不妨考虑一下。重庆市第二十四中学，就在蔡家，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有高中部、初中部，离这里也不到一公里，隔家也近，要不你抽个时间去那所学校看看，也好作准备。”

我看着她那多年生活重负压驼了的背，面对那张满布皱纹的脸，想到她好不容易盼了二十多年，才把自己唯一的孩子盼回来了，当然是盼他常伴身边，再不离开。可是她怎么就忘了在中共统治下为办教育，不但使她耗尽了毕生精

力，还使她饱受了二十几年的苦难？

对她的劝告，真不知怎么对答，只好含糊回答道：“你不是从小就叫我不要走教书这条路吗？要不然，我再回一趟重大，按政策我该由重大落实善后处理，看看他们拿什么主意？”

第五节：第二次回重大

1980年一月，我第二次去了重大，在公共汽车上我在想：去重大找谁呢？本来，我的案子既已由重庆法院改判，那么按程序理应去法院落实我的人身赔偿和善后处理，我这一趟该去市中级法院找那姓丁的小子，但我单枪匹马的能去找法院评理么？那里有关于冤假错案的处置规定吗？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只有独裁者政策，却无法可依的地方，执政者可以随心所欲的颁布政策整人，以后，新的人上台又兴另一套政策；在这种不与人民约法三章，也不受人民约束的独裁统治下，有评理的衙门吗？！

于是我便想到当年负责处理我们右派的人事处主任宋殿宾来。听母亲说他因为爱人出身地主，在文革中受过很大冲击，坐过牢，扫过厕所，有过与我们相似的经历，兴许他会良心发现，现在会作出与当年完全不同的处理。

于是我再次回到重大，在学校传达室询问宋殿宾的住所。那门房告诉我，他在文革时离开了学校，现在在杨家坪的市卫生学校任党委书记。我要寻找的当事人还没有“官复原职”。

但是，我既又一次来重大，总不能白跑一趟。按照守门人的指点，在大校门右方的一排两层楼住宅中，找到老校长金锡如的家。

学生时代，除全校性大会上在主席台上见过他，后来在1959年的五一节，在南桐丛林小学听他宣讲摘帽政策外，我还从没对他进行任何私人拜访。

此次来访又没预先通知他，似乎很唐突。心里准备好了见面怎么开口，便登上了那排房子二楼楼梯。

他的房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扣了一下门，不一会儿，从右侧的卧室里面走出一个背略微驼，个子高高的，大约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见到我便问道：“找谁？”我从他沙哑的北方口音和长形的脸上唤起了当年的回忆，这便是中国著名的动力专家，名噪中外的金锡如了。

只是我不相信堂堂大学校长住得如此简陋，家里也没有一个负责通报的保姆或秘书，疑惑地向他问道：“金校长在家吗？”他取下眼镜，仔细端详了我好一阵才回答道：“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么？”看得出他正竭力回忆面前站着的我，只是相隔二十多年，加上他年事已高，在数以万计的学生中，一时无法搜索到我这“倒霉”学生的影子。

我向他鞠了一躬，自报了姓名后，便跨进了客厅。客厅的面积大约十来平米，靠窗的平柜上堆着厚薄头精装书，放得很乱，好像主人刚刚查阅过资料，没来得及收拾。两张单人沙发中间隔着一个茶几已经很旧，茶几上堆着纸笔，零乱放着。墙上挂着的几幅对联上满布了灰尘，两扇通卧室的门关闭着，里屋静悄悄的，不知道住着多少人。

当我在沙发上落坐，开门见山的将我的经历和来意讲出后，他的脸上显得十分碍难，恐怕像落实政策这一类问题，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来打扰过他，因为这种事，实在与他毫无相干。

1959年他带领学校到丛林煤矿“慰问”下放干部工作组，仅仅是受党委的指派，履行公务而已。今天事隔二十年，对于当年反右和现在的平反，他恐怕很少过问，对突如其来我的造访，简直不知所措。

听完我的自述，立刻回答道：“啊！我已退休多年，对学校和行政方面的事，已完全脱勾了，据我所知，你的问题应当由重大落实政策办公室解决的。”停顿几秒后，他又说道：“关于你想找个合适的工作嘛，我现在正受民主同盟的委托，筹划在凉山地区办一所职工大学，正需师资，你不妨再过半年与我联系！”

听到他这话，我对他的善意指点表示感谢，但对他的推荐我已来不及考虑了。当我站起身来，突然从左面的那间卧室里，传来了一阵男孩哭声。

他连忙去开那门，里面的床上正睡着一个形体残缺的，大约已有十七八岁的男孩。因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原来这便是他最小的儿子，刚才因为睡着了将尿撒在床上，醒来不见“保姆”，而发出啼哭声。他赶紧去替孩子更换衣裤和床单。

此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腰间扎着一条围腰，好像正忙碌着家务。不好过多纠缠他，便起身告辞。

看到这位闻名中外的老教授，堂堂重庆大学的老校长现状如此，便知道十几年文革将知识份子怎样作践！不过，此时显然不是细说详谈的时候，匆匆告辞，结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拜访……

走出金校长的“家”，看表已是十一点半钟，走出校门，在门口的面摊上吃了一碗抄手，想到此时去拜望钱主任正合时宜。记得1957年校园里鸣放刚刚开始，我曾为了劝止马开先离校而陪她一起去过他家。

当时他住在后校门松林坡的专家别墅里，而今二十三年过去了，他是否还住在原处？便去门房询问传达室的值班人员，他们告诉我，他现在住在滨江马路的家属区。

在一幢底层低出马路的四层楼房里，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家。

我想从松林坡的别墅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文革的“功劳”，只是不知道当年他受了怎样的冲击？

沿着滨江马路，在一处石梯下面走到底楼，叩响一扇木门后，出来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妇女，她在门口拦住了我说：“钱老师正在午休，没有要紧的事最好不要打扰他，你有什么事吗？”她打量着我。

我猜想，她一定是钱夫人了。于是我说：“我是钱主任五十年代的学生，自我离校后二十多年没有回过母校，今天因为路过重庆，特地来探望他的。”

她听说后，将我让进了门里。这是一间大约只有8平米的小书房，那窗子正好开在马路的下面，这同当年他那个松林坡别墅的小会客厅实在无法相比。

屋子里面，书柜已将小书房占去了一大半。临窗下面，安放了一个课桌和一张靠背椅，使人感到了主人的清苦。桌上的台灯，桌面玻璃下面的许多旧照片，都使人想象出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那玻璃上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想来是河风将窗子上方马路上的灰尘，随意撒在上面的！

女主人等我坐定，才告诉我：“钱老师因患脑血栓多年，记忆已完全丧失，现在行动不便，基本上像一个痴人。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拒绝想会见他的人。”

听到她这个介绍，我又环顾了一下这间狭小简陋的小书房，想开口向女主人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从松林坡搬到这儿来的？但马上转念一想，这肯定又是主人一段辛酸的经历，何苦去勾起她对不愉快往事的回忆呢？

正在此时，里屋的门打开了，一个一头花发的老人扭曲着身子，拄着拐杖，趑趄的出现在门槛上。女主人见到他，赶紧跑过去将他扶住，我也没有顾及自己作客的身份，走过去帮着将她扶上里屋的木床上坐好。

此时，我才注意看这位当年风采绰约的钱主任，而今枯槁的脸比那金校长还要瘦老。他正用手死劲地比划着，好像竭力想说出积郁在心的话，却始终不能说出口来，脸因激动而歪斜发红，看到这凄惨的形状我好不容易。

问到了张可治老师，他可是当年与黄锡凯先生齐名的中国著名机械理论家、重大机械系的台柱子教师！不料，女主人却告诉我一段想都想不到的往事：

文革期间，有一天下午，机械系的几十个学生，将他带到团结广场升旗台后面，那片高出地面两公尺的草坪上开批斗会。大家在七嘴八舌以后，几个恶作剧的学生便强迫他爬在地上学狗叫！还拿着一条教鞭，命令他学狗在草地上爬着转圈子。

围观学生嘻嘻哈哈，忽然一个学生说他屁股翘得太高，是翘尾巴，不问青红皂白，一记耳光，将他那 600 度的近视眼镜打落在地上。

可怜这张教授教书把眼睛弄成了高度近视，眼镜一被打掉他便成了“瞎子”，急得他爬在地上满地的摸，团团转，越发逗得围斗他的学生们哈哈大笑。

此时天已黑下来了，张老师的眼睛也不知被谁藏到哪里去了，他还在那草地上一味瞎摸。围观的学生却一哄而散去食堂吃饭了，只留这睁眼瞎子还在那里乱爬乱摸！不知不觉他爬到了那草坪台的边上，从那两公尺高的崖边，一失足，头朝下跌了下去，当即一命呜呼！

文革时我早已离校！对文革中校园里种种暴行，虽有所耳闻，却没有亲身体会过。

今天，我本意想向往日的师长们，为我指点求职的门路。没想到，却从他们身上上了文革一课。亲身经历文革浩劫的钱教授，刚才表现出的想说又不能说的这份痛楚，不知写下来没有？有多少人像季羨林写牛棚杂记的回忆录？现在他只能仰着花白的头仰天向苍天倾诉了。

当我拜别钱老师，走在通往后校门那滨江马路上时，我再次回想起当年我在这里徘徊的情景！带着几重伤感重游故地，很想见见久违的故友，寻访一下当年在丛林煤矿一起共渡右派煎熬的同学。

便折转身来向着民主湖方向走去，因为我听说，当年从广元坝生还的右派，现住在我们求学时的男生第二宿舍。

当我走近这座已破旧的“学生宿舍”时，那熟悉的门窗再次唤起了我二十三年前的追忆。故地重游如像恶梦，仿佛又听见那窗户里面传出的口号声，夹

杂着隐隐哭泣声。我用力揉了揉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看得分明，那窗户里此时飘出来的是一缕缕白色的蒸气。

大楼的侧门，当年宿舍朱红漆门已变成黑色，两头上楼的楼梯被乱七八糟的桌椅杂物堆满封死。只是过道依旧，从打开的门里望去，原先每间只有十二平米的房间，隔墙已被拆掉，现在变成了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改作了住家户。

走进楼来，见过道上排着一式的炉子，过道中间放着盛泔水的桶，泔水的酸臭与炉中溢出的煤气相混合，令人特感难受。这里成了二十三年后，保下自己一条命，获平反回校的当年右派同学的家。

我在中间的楼梯口上，碰到的第一个当年难友，便是当时地质系四年级的王智山，因为他是调干带薪读书的学生，是当年我们这七十几名极右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今天他已五十多岁了。

1960年春天至今已整二十年，当年赴南桐一起劳改的七十六名“右派”至今剩下生还的不到二十人。

这二十年的炼狱对任何人都是“脱胎换骨”的，何况这张不经老的脸皮？如果这些分别了二十年，当年共患难的同学乍然相逢于路上，肯定会被当作不相识的路人而失之交臂。

幸好在这里，在一个明知故友的故地，所以即便是脸皮已皱成了疙瘩，但只要“匡架”尚能识别，一定还会惊诧的认出来！

此时他正从过道中间的楼梯口上走下来。手里拿着布袋，看样子是要上街去买米，当我们面对面相碰，目光相接良久，他的眼里便泛出了惊诧的光，失声喊道：“孔……孔令平”，接着便紧紧握我的手，拉着我从新上楼，将我“迎”进了他的“家”。

过道里的煤气，使“家”的环境很糟，但无论如何这“窝”比起南桐煤矿或广元坝的集中营来，便有“天壤”之别！这里至少可以自炊自煮，有一个妻子厮守，在身心困乏的时候，可以休养补充。

王智山的爱人看上去挺老实，像北方的中年农妇。我在他那间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入座，没多问这些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却先谈当年在丛林煤矿一起渡过的拉板板车，运坑木、烧焦碳，偷红苕的令人心酸往事，因为那虽然苦不堪言，却是烙在我们心上共同的伤痕，这些伤痕是无法褪去的。

他告诉我六〇年我被捕入狱后，丛林沟所剩下的右派师生除少数的回校复学，其余留下继续改造的四十多人被押往广元坝农场，在那里继续充当名义上不叫劳改的劳改犯。

集中在广元坝的几个老师因抗不住饥饿和高强度劳动，先后死在那里。所以到了1978年原先七十六个发沛南桐的师生，只剩下二十多人出了鬼门关。

我从王智山家里出来后，又去隔壁的江明远家和附近的王泽庸家。

在江明远家，正巧陈兴国跑来了，这陈兴国是当年“杨治邦投敌叛国”案的检举人，在当时的“右派”圈子里，留下了“出卖”同学的恶名，不久前杨治邦投敌叛国案得到平反。使我立即联想到因吃毒草死于甘洛的杨治邦，便把他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1957年的“右派”无论从素质，政治见解，都是一些被毛泽东生拉活扯充作‘阶级斗争’的牺牲品。根本不存在，更谈不上同共产党“平分天下，轮流

坐桩”了。所谓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向党进攻，全是毛泽东的捏造。

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充其量对中共的霸道进行了批评，绝大部分对中共存有幻想，在这个“群体”中，经过共产党炼狱后才开始分化，相当部份人抛弃了幻想，坚决反对毛泽东独裁，成为民主的自觉追随者，其中最优秀的人物，在反抗暴力斗争中光荣献身，例如陈力张锡铨和刘顺森，是我们的骄傲！

当大家七嘴八舌谈到雷继尧的时候，讲到他在丛林甘当王怀寿的耳目时，大家发出一片嘘声，连陈兴国都指责他干的缺德事。十八年后，他因在教职工中非法集资第二次进了监狱。算老天长眼给他应有的恶报。

以求职为目的，我第二次回重大，对老校长、老系主任、老右派同学的拜访，虽没有解决我当时的的问题，却意外听到“文革”中社会上和学校发生的真情实况。

第六节：政治需要

母亲为了摆脱蔡家场这被人践踏的处境，争取按中共文件所规定的条款从回托儿所。八零年元旦刚过，她便亲自去北碚将她准备了好久的“礼物”，送到北碚托儿所去。

这天我见她一个人坐在屋里一声不吭。便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摇摇头，老半天才叹气告诉我上午去托儿所的经过。

蛮不讲理，毫无同情心的托儿所领导，以母亲年龄大，即将退休为理由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她辛辛苦苦制作的教具和伏灯写成的教材被拒收。

当年划母亲为右派的时候，就因为她生性倔犟，虽身受歧视，但对无德无才的团支部书记却常流露看不起的情绪。今天又不肖於逢迎拍马，不善于“走后门”，教育局的“领导”无视她的正当请求。

小小一个区教育局，和它管辖下的托儿所，便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当官的绝不会根据母亲制作的几件玩具和撰写的几本教材，在工作条件、生活起居、住房、待遇等等方面按中共平反冤案的规定，给她起码的安置。

这事发生后不几天，临近春节的一天上午，医院党支书王光明，走到我住的那房里来，向我说：“有两个教育局的人在我的办公室里找你谈一件事。”我心里很诧异、区教育局与我素无关系，我既不认识它的任何职工，也没想过要找他们谈母亲的事，他们找我又干什么呢？

进入王光明的办公室，我见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瘦瘦的大约五十开外，另一个大约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两人等我坐好后，那位老头开门见山的说：“你已经回来四个月了，统战部已将重庆法院和重庆大学对你的平反材料给我们寄来了，我们今天是代表区委专门来对你的工作进行落实的。”

他一面自我介绍道：“我叫罗士进，是区教育局的政工股干部。”

此时，我心里已经完全明白，听那姓罗的叨叨不绝的讲教育与四化关系的大道理，颂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老师是一件光荣的职业等等后。最后说出教育局的人事决定：将我安排到二十四中当教师。

他说：“你的母亲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冤屈，好不容易将你盼回来了，你回到北碚蔡家场同母亲团聚，体现了党的人道主义关怀。这也是你们母子俩期盼了好多年的，我们根据区委统战部的意见，周密考虑后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听他左一个“照顾”，右一个“团聚”，使人肉麻，我本想就母亲的落实政策，要去教育局找他们的，没想到他们自己跑上门来，这些人一肚子坏水，母亲在这里受了二十年折磨还不够，现在打起我的主意来了。

“我的母亲花了那么长时间制作了幼儿的教具，编写了你们正紧缺的幼儿教材，跑到教育局来向你们苦口婆心讲情，要求你们能按政策规定，调回教育局；再说她现在年事已高，这蔡家场交通极不方便，这个医院员工长期欺侮她。

你们不但不考虑有关规定，也不顾及她的困难，反而以她将退休而拒绝她的要求。现在你又跑到这里来，猫哭耗子，想把我们母子俩永远栓在这偏僻的乡镇上。我老实告诉你，这个二十四中我是不会去的！”

我一口气把对方的真实意图当场戳穿！好像出了一口恶气。

当面戳穿了假面具，来人自己也觉欺人太盛，心里欠疚，屋子里暂时沉默了。正在这个时候，母亲从外面走进来。

那罗士进必竟是政工干部，明知自己亏了理，满脸堆笑的向母亲说：

“你和儿子，受了不少委屈，我们都理解，但是托儿所安置你也有相当困难，现在住房是所有安置单位最感紧张的事，他们不想本单位多一个快退休的人。落实政策中你们有气，还可以向我们身上出，我们又去向谁发泄？这都是四人帮造成的，所以大家还要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才能解决问题。”

我望着他，知道他不过是奉命办事的办事人员，我也没有必要找他出气。沉默片刻，他便向母亲说：

“你老人家还是劝劝你的儿子，总不能老是赌气。再说，拒绝区委的安排，老是呆在家里不工作，也对你们没有好处。如果你儿子现在愿意到二十四中报到，我建议工资可以从一月份开始拿。现在中学就差这样的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至于你对这样落实还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程序再行调整。”

我们送走了罗士进后，回到母亲的寝室。我再次望着放在母亲床前那一纸箱的儿童教具出神，母亲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想不到我们母子到了今天这个时候，还要为自己的工作而焦虑。

老 秦

第二天，正巧来了一个病人，上到二楼来，口称是来找母亲的。看他满脸的胡须，头发蓬乱，精神非常憔悴，身上穿一件灰色打补丁的棉衣，很脏。母亲很客气的接待了他，一面向我介绍这个“病人”的历史和遭遇，这是一个同母亲有过相似命运，共过患难的蔡家“黑五类”成员。

他姓秦，二十三年前，同母亲曾经一起在北碚炼铁厂接受“强制劳动改造”，那时他才二十多岁，原籍是蔡家地区土生土长的人。

1957年曾是北碚区农贸公司的一个“干部”，就因出身地主、口风不慎，反右时被扣上没改造好的地主子女和右派双重帽子，同母亲遭遇相似，凡倒霉

事都有他的份：运动一来，当“主席”，运动一过，便充作廉价劳动力。

北碚铁厂解散后，他先于母亲调到蔡家供销社，接受“监督劳动”，当搬运工。

1971年，他在表兄帮助下，讨了一个家住镇供销社不远，蔡家的残废农村姑娘为妻。因为他必须一大早起来为供销社下苦力，下午又匆匆在下班后赶回家忙自留地，实在受不了，便主动放弃了“公职”回家当“农民”。

他今年五十多岁，看上去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常常伤心的说：“每天在地里劳动，分不清洒在地里是汗水还是泪水，要不是看在两个孩子这么小，我真想一死百了。”

风里雨里挣扎到今天，除一个茅草屋，连床好棉絮都没有，两个孩子大的只有七岁，没钱上学辍学在家，打一点猪草，小的才五岁。妻子是一个残疾人，除了喂猪便什么都不能做。那个年代农民的日子比搬运工还苦，家里靠他一人赚的工分，不够四口人的基本口粮，平时开支是拿不出一分钱的。

1978年好不容易他盼到了平反的那一天。不料他除了得到供销社给他一纸“纠正右派”的通知书外，公职却没有恢复，也没有工作和工资，于是他拿着文件跑重庆市委、跑四川省委，像乞丐一样排在长长上访的队列中。

时间花了两年，除了跑路给他留下几千元车费的借债，给他头发增加几处斑白外，一无所获。

中共北碚区委统战部冷冷的回答他：“当年你是自愿离职的，而不是组织上开除了你的工职，所以不存在恢复工职的问题。”

供销社的党委书记翻着白眼对他说：“你自己要辞职，我们有组织规定，如果你硬要求恢复原来的工作，那我们就只好请示上级怎么处理吧？”从此以后，他要再上访，都只得一个简单的回答：“回去等着吧！”

时间就在漫长的等待中过了一年又一年，眼看两个孩子因穷无法上学，妻病不得治疗！除我的母亲在他来医院看病时给他一点接济，很少有人理他。

母亲对我说：“只要你用心观察，他那形象就像油画‘受难者’中将头伸向苍天的老农。看到他的遭遇，想到世上比我们更惨的人大有人在，我就感到已没有什么可求的了。”

老秦的到来和离去，对我产生很大的震动，全国处处一样，到处都会碰到这些落难者，

所有获得平反的人，都吃尽毛泽东的苦果。既然平反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施舍，有它的政治目的。落实到具体的人，工作也好，待遇也好，岂会超出共产党的恩赐？也不会让受害者摆脱当奴隶的命。

老秦走后，母亲劝我说：“我看，你就不要固执了，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就像收拾那姓秦的那样收拾你。横加一个抗拒组织安排的帽子，事情就麻烦了”。

接连几天，我心里被落实工作的烦恼搅成一团乱麻，压抑的心情需要释放，便将自己关在我所住的那间病房里，从墙上取下那把从盐源带回来的二胡，独奏起来。

空山鸟语，空山鸟语，我可是连小鸟也比不上啊！在中共天下里，我们只

是一群关在笼中的小鸟而已……

正在这时，护士小陈在我窗下喊道：“快去粮店领过年的花生和糯米。”这提醒我，回重庆的第一个春节悄然而至了。

第三章：一段教书的日子

按照中国民俗，腊月二十九是祭祖的日子，明天就是这个日子。不过，文革时期，民俗被诬为封建残余而一扫光了。今天，母亲同宿舍的人都已回家过年，整个楼里冷清清的，只剩下几个病人和我们娘俩，尽管比在狱中好，但仍感到孤伶伶的，心中正怀念死去的亲人，中午胡妈来了。

小妹仍像上次那样，提着竹篮跟在她的后面。见面以后，妈妈像待孩子那样，忙拉着小妹给押岁钱，一边问：弟弟怎么没有来？

胡妈回答说，“他们的爹还没到家，范山去火车站接人去了，抽这个时间，把给你们留的过年货送过来。”

说着，从小妹手里接过篮子，取出准备好了的腊肉和汤圆面，并说，“明晚团年饭，干脆你们娘俩到我家，同老头子一块吃。”

母亲答应，倘如钟老也回来了，我们初三来乡下，母女俩便告辞回家。

第一节：走人户

第二天除夕，钟治渊没有回来，因为我和母亲在四川没有其它亲人，所以就把范家当作自己的家。按民俗我和妈妈初三去了范家。

这患难结下的干亲家，住在莲花大队中部一个土山岗上，距医院两里地。在山冈的垭口，泥墙围成的瓦房群里半隐在竹林之中。

门外是一口大约两亩多地的池塘。我想，范山姊妹两为母亲送来的小鱼，多半就出在这池塘里了。

当我和母亲在山垭口露头时，范大叔正在房边的自留地里办菜，看到我们走来，连忙向院子里喊道：“山，干妈来了！”胡妈闻声从围墙的门里走了出来，她栓着围腰，正在喂猪。我看见她走到门边的刹那，小妹紧跟在她身后，但她并没有跟着母亲走出门来，而是闪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我们走上垭口，范大叔迎着我们走来，当我们走近他，伸出手去的时候，他局促地搓了搓满手的污泥，口里歉声的说道：“脏！脏！”。这是一个身体结实的老人，虽年过花甲，但那矫健的步履顶有精神。

听母亲说他因为“解放”前当过一贯道点传师，所以“解放”后不久就被抓起来判了五年刑。刑满后一直留在劳改队，监狱把他的耳朵弄聋了，平时不大与人交谈。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一个“刑满释放犯”。

可是从他那朴实憨厚的老农型脸上，实在无法同中共宣传中，对“一贯害

人道”所宣传的阴险狡诈嘴脸联系起来。

我和母亲在胡妈和范大叔的陪同下，跨进门坎，一股农村特有的猪潲酸臭扑鼻而来，门里的左面猪圈里睡着两个刚刚从集市买回来的仔猪。

胡妈走进里屋，忙着洗手，并从碗柜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汤圆面，和芝麻花生拌的“心子”，放在临窗的木桌上搓着汤圆。这屋子既是他们的灶房也是他们的饭堂，柴火就占了整个房间的 1/4，灶边堆着从后山坡竹林捡回来的竹叶，乡下人的节俭，恐怕世界其它国家都少有。

小妹忙着将堆在里院的柴火捡了几根进来，用柴刀劈开，然后划上火柴将已经放进炉膛里的乱叶败草点燃，并且向灶上的铁锅里掺水。做完这些便坐在柴灶口外的小凳上，给炉膛里不断的添加那些树叶。

我突然从那炉膛里射出来的红红火光中，看到她那张充满青春少女的脸，那是一张很美的脸！

不一会铁锅里的水烧开了，胡妈将搓好的汤圆下锅时，妈妈连忙招手说：“刚吃了早饭不久，就不要煮那么多了。”胡妈笑道：“过去你到我这里来，我也没东西招待你。今天，我们柜子里有的是粮食，哥哥今天又是第一次到我们乡下作客，你们都不要见外，今天这汤圆一定要吃够。”

说着取过一个大碗将已经浮起来的汤圆舀了一大碗，吩咐小妹递给我。

我连忙起身道谢，一边说：“我哪吃得这么啊！”范大叔却笑道：“乡下人没什么招待你们的，汤圆吃够，你不要见外。”说着自己拿起一个大碗满盛了一碗，坐在我对面与我对吃起来。

这可是二十三年来头一次，范大叔的直率和真诚，胡妈的热情，小妹略带羞涩的拘谨，都浓浓洋溢着农家的天伦之乐，让我和母亲溶化在中间，分享他们的快乐。

我们边吃边聊，话题当然是“昔不如今”，这可不是共产党报纸上像宣传“旧中国”那样，向老百姓“灌输”的，实在因为昨天的饥饿在农民心中留下的伤痕太深，所以自然而然的谈昔今对比。

胡妈指着厢房里的两个用竹席围成的粮囤，告诉我，去年一年土地包产到户以后，三个人的土地足足收了四千斤粮食，几乎是过去公社集体生产时所得口粮的三倍多。她说到这些不禁叹了一口气说：“过去哪里是人过的日子？今后希望政策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农村人有口饱饭吃就知足了。”

说到范大叔的工资，都花到范萍姐弟俩读书上了，经济上很紧。她说：“我就因为没有读过书，所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过了一辈子。城里人不种庄稼照样有口粮吃，乡里人累死累活种地，只图填饱肚子，这吃亏就因为没文化。所以，今天我们把家庭所有收入都花在两个娃娃读书上了。”

说到这里她又千叮万嘱的唠叨开了：“哥呀！你是大学生，你的文化了不起呀！范萍是你妹妹，正在二十四中初中三年级，明年升高中，正在关键时刻，今后呀，就拜托你多多费心帮助她，让她初中毕业，无论如何也考个中师什么的；有个出头的日子，不要像她娘那样，当一辈子睁眼瞎，守一辈子穷山沟……”

吃罢午饭后，母亲提议，胡妈和小妹同我们一道去作坊沟，向当年救助过她的老朋友拜年。

母亲介绍说，这作坊沟在二十年前是蔡家场“赤脚医生”点，蔡家医院成立之初，便将这里暂作临时的门诊室，为解决吃水困难，医院院长决定自己打井，当时母亲刚从北碚来这里接受医院的监督改造。

医院给她的工作，除当时全院谁都不愿干的清洁工：烧锅炉、消毒、打扫院内院外，一天下来已累得精疲力竭，晚上还要强迫她加班掘井。给她每天划定的加班任务不完成不准睡觉。

强迫劳役很快摧垮了她本来十分虚弱的身体。时值隆冬，我的弟弟在黄桷坪电力学校读书没回来。有一天大清早，住在附近的田大妈起来打水煮早饭，就看见打霜的地里，打井工地上躺着一个人。

她忙走过去一看，认得是医院的那个最受人欺侮的方老太婆，见她躺在那冰冻土地上已不省人事，奄奄一息，便高声呼唤她的大儿子，赶快把母亲背到她家里的床上。

田大伯连忙把屋中间的火盆加了一个树疙瘩，烧了一盅姜汤，一边用火暖和她冻僵的身体，用姜汤灌进她的嘴里。好一会儿，母亲才慢慢醒过来。

母亲晕倒在井边的事已过去十五年了，从那时留下了善根。

后来母亲每提此事，都夸田大伯大妈的为人，说：“要不是田家老两口，她恐怕就冻死在作坊沟的打井工地上了。”从此，母亲就认了这个异姓“姐姐”。凡是过年过节，一有机会她都要到这里来作客、拜谢恩人。

今天是第一次带着我给田家拜年来了。

田家的宅院，四周用葡萄架和竹杆子围起来一片土坝子，干打垒土筑墙，瓦房后面是一片茂盛的竹林。当我们一行四人从马路上走到那通向院子的田坎时，一只小黄狗汪汪的向主人报了信。

屋里的主人，一位花白头发，大约六十多岁的大娘走了出来，一见是我们，飞快地迎上来，一把拉着妈妈的双手连连的喊“拜年！拜年！”听母亲说她比母亲大两岁，但那矫健的动作显得比母亲年轻。

这一天天气晴朗，葡萄老藤上已开始有了芽苞，我深深吸着田园新鲜的空气。母亲从提包里取出了两件衣服来，这是她在蔡家百货店，专门给田大伯大娘买的过年礼。

我们围坐在葡萄架下，大妈打开话匣，叨叨述着往事：

她说：“当时医院那个叫刘巴的多次向我说，方坚志是坏人，贫下中农不要被她的表面可怜样所蒙蔽。可我告诉她说：‘你们年轻人还是积点德，你们也是要老的，欺侮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要不得。’后来那女人还向我们大队书记说我同情右派，书记问我，我却回答他：‘他们也讲个天地良心！那老方平时又没招谁惹谁，凭什么欺侮人家？’”

亲人相聚，无话不说，看看太阳西斜，我们起身告辞，结束了一整天“走人户”之行。临别时，田大伯嘱我：“你妈那些年吃了不少苦，你今天回来了，一定要守在她身边，不要像你弟弟，到今天也不知道那里去了。”

说到弟弟，当年从电力校毕业被下放农村，开始就在这里落户，至今田大伯的儿子还保存着弟弟当年使用过的农具，这么十几年了，弟弟下落不明，每提到他，母亲都很伤心。

第二节：二十四中学

大年初五的上午，医院开始上班，母亲在挂号室里刚刚打开挂号室小窗口，窗外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他们向母亲询问道：“请问孔令平老师在吗？”母亲抬起头来，诧异地盯着他俩；两人面孔很熟悉，只是一时记不起是谁来。

心中暗自寻思；儿子到蔡家场才四个月，哪里相识的年青朋友？便发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找孔令平有什么事吗？”那女青年回答道：“我们是二十四中的教师，今天奉校领导的委托，专门来找他商量工作的。”

我在王书记安排的“招待房”里，接待了两位二十四中的来客。来人主动自我介绍，男的叫李兴全，女的叫韩泽红，两人都是数学教师，上学期放寒假之前，数学教研组组长周兴在安排下一学期的课时分配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按教育局的“命令”，二十四中初中部增招了两个班，却没有增派相应的教师。增加的课时，硬分摊到原有老师的头上，当时老师们的课时负担已大大超过规定，加上教师们的抵制，学校教务处只好用减少学生周课时的办法来解决。

结果这事不知是哪位学生家长向区教育局反映了，二十四中的领导被狠狠批评了一顿。所以，从下学期开始，只有将所缺课的课时分摊给任课老师，数学老师每人平均每周增加了四个课时。

小韩老师哭丧着脸诉苦道：“经过这么一加，我每周就要承担 32 课时的工作，也就是说，每天要在讲台上足足站五个课时以上，几乎天天都要上联堂课。在课堂上一站就是一上午，我们女同志最怕连站一上午，上学期我就发生过上了一上午课，走下讲台昏倒在教室门口的事。”

——二十四中学

“算算看，每天上五小时的课，加上备课、改作业，每天都要保持十二小时的工作量。这哪里是在教书，简直在拼命！我们年轻人可不想早死，如果下学期真要强行加课，我就只有请长假一条路可走了。”

教研组长周兴只好请何校长来解决。这何希廉因作风霸道，闻名蔡家地区，人称活阎王。后来大概因为文革中被冲击过，坐了九年“牛棚”，打掉了他的霸气。四人帮被打倒，他官复了原职，总算领了些教训，说话做事收敛些。

当周兴把他请进数学教研室时，他满脸堆笑，带着他多年难改的奸笑向大家说：“大家的辛苦我是知道的！对我校缺乏数学老师的事，我向区教育局多次反映了，但现在教师正缺，教育局也苦于无人，加课时的事，实在希望大家能谅解。”

说到这里他眯缝着眼睛，带着讨好的口气说：“不过，最近教育局告诉我，一个家在蔡家场的落实政策人员，原来是重庆大学的学生，1957 年被划为右派，现在正等落实政策，就在蔡家场，他母亲在蔡家医院，你们都认得。如果你们哪一个能把他说来顶你们的数学课，那么，我就答应：谁说服他就减少谁周课时五小时，你们看怎么样？”

被超课时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来老师，谁不想有人来分担一下过重的负

担？何希廉今天把招人进校，用减少课程的条件交给了任课的老师。

何校长反右时整过不少的老师，被整的老师心有隐痛，现在，凡是他出面去请老教师，都会以年事已高相拒绝，迫使他想出用老师去请老师的绝招。

两个年轻人也清楚，但无奈事已至此，经过全教研室讨论，便公推了两个年轻人到医院来试探一下。

我听了他们讲的故事，两个年轻人眼睛里那请求援助的眼神，马上联想起重大一行时，那钱企范的爱人所讲的故事，想到被毛泽东摧残的臭老九可怜状态，也想到那些同样被害的骄横一时，一无所学的年轻孩子们的可悲。我可以置当局的硬派软骗于不屑一顾，但我却不能无视这些被害师生的请求。

想到这些天来，母亲的劝告，心中一直被搅得很烦。当然教师也是一个神圣的工作，只因为这些年累受摧残，地位低微，待遇菲薄，才无人问津。

为使我的生活尽快走上正规，结束目前这种心神不定状态，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老在谋职上空费时间。

既如此，不妨去二十四中当一段时间老师，在我熟悉情况后，再另作他图，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两个年轻人的请求。

小韩老师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教育局都无能为力的事，他俩竟没有花上十分钟就轻而易举的敲定了。感到最沉重的工作压力一下子便得到了减轻，连连向我表示感谢。我把他俩送出医院的大门时，他们一再的和我握手道别，李兴全还叮嘱我，生怕我变卦。

第二天他们又高高兴兴地给我拜年来了，这一次他们从自己的“书包”里取出了一包两斤重的白糖说：“学校领导委托他俩给我拜个晚年，这白糖是学校春节发给全校教职员每人一份的过年货。”

说着又从书包里取出一本高中一年级的数学教科书，和一本数学参考资料以及两个备课本、一支钢笔。

周兴正等着消息，一听说我已经答应任课，当即便安排了工作。

由于我初上讲台，还有一个熟悉过程，暂时把高中一年级一二班的数学课交给了我，周课时总共十六节。我申明：“我没有上过课，怕不能胜任”。

李兴全却说：“你别谦虚了，像你们这样五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正紧缺着呢！怎么说你比那些文革期间鬼混出来的师范生，强上百倍。”

我就这样，在脱离了数学课本二十五年之久，因流放而荒废了二十三年学业的老学生，未经师资培训，出狱后一步就跨上了“高级中学”的讲台上。

好在，我在中学求学中数学和物理基础很扎实，加上在盐源时，为郭三小的两个小子补习功课，尤其是我对工作一贯很强的责任心，不会“误人子弟”，把教书仅当作只拿薪水的手段。

下午范小妹和弟弟来了，提着的菜篮子里装着一篮子鸡蛋，那是胡妈平时积攒下来的。

当她听到我要去二十四中教数学时，高兴极了，当下就跑回家将书包提来，她已初中三年级了，她说：“数学和物理从没听懂过，一上课，课堂里乱哄哄的，大家各讲各的话，老师也不干涉。老师是顶班的，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搞懂，讲

起来让大家坐飞机，眼看初中就要毕业，这么下去，还能学到什么呢”？

经她这么一讲，我想起每次胡妈的嘱托，便答应专门为她从初一的课程开始补习，这样我也好熟悉整个初中的数学和物理教材。从那天开始，她每天都带着书包和一颗渴求知识的心，到我所住的病房里同我一起做作业。

学校开学前两天，按校方通知，我去二十四中报到，行政办公室的总务主任办理了 my 入校手续，并在靠学校北端的松林坡教师宿舍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单人房间。

第二天，我便正式搬到了二十四中学的教员宿舍。在边僻蔡家场，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安息窝。

虽说地处边僻，但校园却是满不错的，足足有五万平米的校区被浓浓的绿茵覆盖，周围被农田所包围，东面临着一个高耸的悬岩，山下便是从北碚通往重庆的公路。

一幢四层的教学行政办公楼位于中央，两幢三层的教师宿舍楼分别位于南北两侧，掩藏在丛林中，加上学校前方大约八千平米的操场，整个学校相当大，抗战时期，这儿原是国民党驻军建立的一所军需学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将这里改成一所国立中学，取名战国时期燕国的贤士乐毅。其中含寓着陪育求贤的宗旨！

真的，它的优美的环境自畜着一种陶冶学生情操的魅力，那山林的气息，又含着稳居求读的气氛，这真是一处难得的求学圣地。

可惜，这样圣洁美丽的校园，却被中共糟蹋了。

在风雨吹打之下，早先军校的黄色粉壁从泥墙上剥落，房梁被白蚁蛀空，连同泥墙倒塌成一堆堆废墟，不知什么时候建的教学楼，像无人管理，窗槛破损、桌椅残缺。那片宽阔的操场上长满了一人多深的茅草，好像一片荒芜的草地无人清整，校舍中的石板通道上长满了青苔。

走进教学大楼，二楼开始是初中的教室，一大群孩子在整个的教学楼里狂奔乱吼，不时传来玻璃被砸碎的响声，和桌椅倒地发出的沉闷冲击声，令人心神不宁。上课的铃声响过后，大楼里传来的杂响仍没有间断，一直要等到十分钟以后，走廊里才渐渐的安静下来。

我在第一天并没有课时，教研组的周兴，建议我去听一下高一年级三班的刘老师所上的数学课。

高一年级的教室基本上在三楼，那走廊上的秩序比二楼稍好一点，当我走进刘老师正在上课的四班教室时，顿时被乱哄哄的课堂弄得头脑发胀。

只见那五十开外的刘老师在讲台上，声嘶力竭的叫喊！不时的还在用手里的教鞭，拍打着黑板，可是无济于事。

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讲的讲话，互相打闹，调笑不停。有的往前面座位上的学生背上，贴上一张画着乌龟的纸，引起后面学生的哗然大笑！还有两个女生在合拍唱歌！这哪里是课堂！简直就是顽童的游乐场！

我深深为讲台上上了年岁的刘老师感到难过！想他苦心备了一晚上的课，全给这些不懂事的少年践踏了。

一堂课下来，刘老师的授课技巧我是一点没学到，脑子里却想着，明天我

上高一年级二班的课，第一个动作该是整顿这游乐场般的课堂秩序。

晚上，当我想到白天所看到的乱哄哄的课堂秩序后，无心备课，便聚在李兴全的宿舍里，同隔壁几位老师一起聊天，那话题从简单的身世介绍开始，接触到学校现状，大家无不为纷乱的教学秩序而烦恼。

唯独只有李宏老师，最无所谓。他是接他父亲班来教化学的，他的父亲曾在文革时被赶出校，最后死在忧郁之中。他说，他决不会像父亲那么死心眼，上课时，学生不听，干脆便停下课来给他们讲故事。

“反正学校的任务就是管着这些孩子不出校门，不到外面惹事就好”！他无所谓的说，只有对文革遗风无可奈何的人，才用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对付学生，这倒合符统治者的要求，当然，这不是教书育人的态度。

在文革中这所学校并没有逃掉厄运，原先一位资格最老的数学老师罗某，在1968年因忍受不了学生们的打骂，在王家大院里悬梁自尽……

晚上十点钟左右，聚在一起的老师已散去，各回各的宿舍。我独自走下楼来，心情极不舒畅。

自己冤狱半生几乎丧命，在监中我自比‘奴隶’，‘平反’并未沉清是非，冤屈旧账远未了结。而今‘命运’还操在他人手上。我对在这种边远学校，管束顽劣少年的差事，心中愤愤不平。

想着想着，便独自向那棵教学大楼门口最大的老槐树走去。听学生们说它已有百年历史，是这里百年变迁的见证人。

一边走，脑海里还在不断涌现白天所看到闹哄哄的课堂。听那百年老树在寒风中瑟瑟作响，似乎正在述说那渐渐远去的故事。

想到在狱中那么苦的环境中，仍以读书为乐事。那可真是：“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当年，为了保存一本书不被鹰犬搜去毁掉，我曾绞尽脑汁藏书于瓦砾、草垛，拼着命来保护那被当局蹂躏的知识！

却没想到，生在如此优美环境下，如今的孩子们竟视知识为粪土，视读书为蠢事！毛泽东你的罪恶滔天！

第三节：在课堂上

今天是我上课的第一天，为了建立良好的上课秩序，一上课堂便与全班同学约法三章：课堂上不许喧哗；不许看小说，做与本课无关的事；所布置的作业必须完成。

这个班的四十名学生，果然被我特殊的上课风格和严肃态度所震慑，没有出现我在刘老师课堂上所见到的喧哗吵闹，这使我相信孩子必竟是可塑的，只要教师作风严厉，对事认真，没有政治流氓的干扰，文革搅乱的学风仍是可以扭转的。

怕只怕执政者的顽劣，视教育如敝履，教育只当成粉饰社会一团糟的遮羞布，以此忽弄世界。用“教育兴国”欺骗百姓，用改善教育环境和教师地位的空话来欺骗社会。今天只要看看教学设备的简陋，教师素质的低下，教师地位

的卑下，便知道中国教育事业今天难以康复。

上第二堂课，按照教学大纲上的安排，仍是复习初中的数学：解一元二次方程，按照寒假备课时准备的题目，写在黑板上准备叫两名学生上黑板来做，其余的在黑板下面做，然后就黑板所做的订正评讲，指出常常容易错解的地方。

于是我在点名册上随便叫了一个周云的学生，可连喊了两遍却没有答应，我向教室里环视了一下，发问道：“周云同学来了吗？”全班的人一齐把头扭向了后面，那里有人发出了顽皮的笑声。

迟疑了好一阵，一个坐在最后排座位上，个头高高的男生，满不在乎的站了起来，既不答应，也不走上黑板。

这时，坐在第三排座位上的一个脸蛋圆圆的男生，傻里傻气的说道：“老师，他是哑巴！”课堂上顿时哄堂大笑！我听出这笑声中哗众取宠的味道。厉声的向他喝道：“我没问你，你多嘴什么？”

哄笑的课堂嘎然静下

——十四岁教学迷

来，那孩子没料到这位刚来

的老师竟当堂给了他一个没趣，不甘示弱的向那站起来的男生嘻皮笑脸的吼道：“周二娃，你有本事不站起来！”这一挑逗，那周云果然扑通一声坐了下来，课堂上又是一阵笑声。

没想到这才第二堂课我便遇上了难堪，我看出那坐在第三排的圆脸孩子，一定是这个班的最有影响的调皮生，如若不坚决回击这种公开挑衅，今后，我就休想在一个较为安静的课堂上讲课。

于是毫不犹豫的喝令他站到讲台前面来，课堂的气氛顿时又静下来。

估计按过去的惯例，恐怕没有老师对这调皮生的挑衅回击过。那圆脸的孩子也许没料到，这种在平时根本就不当一回事的“小玩笑”，会遭到如此严厉的制止。这种出乎意料的处置，他被怔住，乖乖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态度虽然仍那样傲慢，但毕竟不敢对抗，站到黑板跟前后，课堂又恢复了安静。

课堂里所有的孩子正在注视老师的态度，窥探老师的水平，这时会因处置不当掀起轩然大波。抓住这个肃穆两分钟的气氛，我开口说道：

“你们想过没有，是谁让你们在这里读书的么？你们想过没有，此时此刻，你们的爹妈正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挥汗劳动吗？他们省下了辛苦挣来的口粮，将卖猪、喂鸡的钱，省吃俭用舍不得花，却积攒起来给你们缴学费让你们读书，容易吗？难道他们把你们送到这里来，是让你们在这里上课做游戏，顶撞老师，调皮捣蛋吗？”

我停顿了一下，用眼睛扫过那站在黑板面前学生时，我看见了他脸上多少显示出无可奈何的沮丧，我的态度在他身上发生了抑制作用。

于是接着说：“如果你们的家长同意你们到学校来鬼混，那我想，何必到学校来自寻约束呢？如果你们已不愿读书，你们完全可以不进课堂，在课堂外不是自由得多么？何必坐在课堂上自讨苦吃？”

课堂一片沉默，看样子，我的话，至少给仍在蒙里蒙懵的少年们一个思考！我坚信，如果我能恢复这些孩子们的理智，便能有效的整顿课堂秩序！

“如果你们不是到学校来鬼混的，还真想学到一点文化知识，今后也还有

一点对生活的理想和追求，那么，我还要告诫你们，古人说得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们不可以跟着那些混日子的人鬼混，你们还年轻，正是少壮时期，从现在起就抓紧时间还来得及，如果你们要荒废自己的学业，到头来会很后悔，不但辜负了你们的父母，也对不起自己的生命！”

我继续的说下去，我注意到有人在用心的记着笔记，有的把眼睛盯着我，从他们眼神里可以看到他们接受了我的话！

下课以后，我把两个学生喊到办公室里，询问了两人情况。那圆脸的孩子叫杨福他说他的家里父母都是农民，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除了有一个表哥考进大学外，其余的没有一个人是靠读书混出个明堂的。

反而他的小叔和堂兄是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但做生意发了财，还有一个叔伯长兄，帮人开汽车挺阔气，也没读过书。所以他得出结论，读书实在是傻瓜干的事，与其有时间浪费在读书上，不如去学做生意。这就是他的“人生经验。”

当我问他：“那你又为什么要来上学呢？”他说：“那是爸妈逼他的，像我们这样的蹩脚学校，一学年下来，没有一个考得上大学，最后还是回农村”。读是这个命！不读也是这个命！所以他便选择了不读书。

我实在没有理由来反驳他，但我听到了几乎所有学生都这么说！二十年后当我在一次偶然中，在北碚街上看到灯塔建筑公司所打一则广告，上面竟写着：总经理杨福先生，我才好奇的打听到，这当年的调皮蛋，竟然现在成了拥有千万资金的建筑老板，并拥有两处别墅和小轿车，这就是残酷的生活！看来，在这个社会中，教师简直是最没有出息的职业。当我问到周云时，他很直率地告诉我，除了他同意杨福的观点外，他现在没有值得担忧的。他父亲就是附近蚕种场场长，他早已安排了儿子的工作，说好了，中学毕业，就任蚕种场办公室秘书兼小车司机，所以到学校来读书，只是为了拿一个高中毕业文凭。

他说：“我会开车，现在最吃香的就是开车的。”他说的完全是实话，当时一个穷教书的，无论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都无法同一个汽车司机相比。我这才明白，他所以在课堂上对我装哑巴，是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起讲课的我。

在他的人生中根本就没有“求知”，求理想这种想法，有幸于他父亲的权位既给他的前途打了包票，他还有什么“理想”可以追求呢？这种社会里产生的特权阶层，压根就把教育当成一种装饰。

他中学毕业后，我就一直没有看见过他，但听到学生们讲到他在蚕种场开小车，而且，看见在他的小车上，经常有年轻的女孩子坐在上面与他打笑调情。

后来我在教育某些孩子时，他们会用周云的例子反驳我说，“什么读书，前途光明，再用功也顶不上像周云那样有一个好父亲。”

这使我无话回答。

呜呼！中共提倡人为的阶级划分，因黑五类而受践踏，因红五类而成新贵，已现端倪矣！今天，出身好而平步青云的“太子党”，应运而生！看来，真正懵懂的不是这些孩子而是我了。

呜呼！教育照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岂不被徒有一张空文凭，实际上是文盲的群体所充塞？何况中共的老德性，吹牛撒谎已是习惯。只苦了“教育”这头饱受摧残的老牛，又套上了“四个现代化”的枷锁，拖着“实用主义”这沉重

的破车。

当世界的知识每年按等比级数在猛烈增长时，中国教育肯定也是“突飞猛进”增长。例如大学生每年增长的数量中，定会把相当大比例“文盲”“科盲”泡沫般充数。所以在中共专制主义领导下，振兴教育是绝对的空话！

第四节：天下靠自己去争

听田大妈和胡德明向我介绍，在我还没有回来之前，母亲在这所医院受够了这所医院品格下流的员工欺侮。这不仅是中共划分五类实行“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丑陋中国人最恶劣的品性——**欺弱畏强**。

我的母亲个性并不软弱，但她是一个多年从事教育，有相当涵养的人，怎能同满口脏话，作风横蛮的造反天棒相对？加上她多年失去儿子和亲人，孤身一个老太婆，又怎经得起无产阶级专政野蛮的压力？所以，从旁人眼里看，她是太软弱太可怜了。

我刚回到她的身边，因为我熟谙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性多有沦丧，弱肉强食这种动物低劣的品性尤为显着。所以我常常满身芒刺保护母亲，医院的下三滥们都畏我三分，母亲在我的保护下才相安无事。

就是那些对母亲一贯欺侮的人也一改老态度，表面上至少是客客气气的。

去二十四上课之初，既要复习数学知识，写教材，加上忙于整顿教学秩序，所以一连就有两周没有回家。好在，我的努力立刻收到了好评。学生们的家长已有口风，传言二十四中来了一个大学教授，教书颇为内行，课堂上清风雅静，既有此评，算是对我的鼓励。

天气日渐暖和，带在身边的衣物已到了换季的时候，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没有课的上午，八点钟为拿几件夹衣回了一趟医院。

我刚跨进医院的大门，便被医院后院里传出一阵女人的呵斥声惊住，那声音尖声吼道：“方坚志，我身上没有钱，今天伙食团的菜你自己去买！”

那命令的口气令我震惊，这女人名叫何玉，医院伙食团的炊事员，今年才二十岁，顶老汉班来的。大致因为从小受文革风气的习染，不但好吃懒做，工作极不负责，唯独长着一张尖刻的臭嘴，擅长泼妇骂街。

我来医院这半年多，便经常听见她同院内的病人争吵。所以无论是医院的职工还是病人对她颇有微词，赠了一个“小刁妇”的雅号！

今天听她刚才的这么一喊，使我首先感到刺耳的是，她用轻蔑的口气直呼其名，吆喝年龄比她大三倍的老人！何况买菜是医院伙食团定在炊事员份内的事，怎么现在命令起挂号室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母亲去做？

倘若这事发生在几年前，母亲尚被全院职工监督劳动的时候，这种年青人对母亲呼奴使婢的口气倒也听

惯了！而今，六十三岁的母亲

虽入过中共的另册，但也是中共为她平了反，怎么还被呼喝？

于是我停住刚刚上楼的脚步，此时那何玉并没有看到我，还在一个劲的狂喊：“方坚志，我先给你说好，今天中午没有菜吃是你不去买造成的，如果大家

要骂就骂你!”

这一天正逢赶集，来医院看病的人特别多，我看看挂号室里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母亲，根本无暇顾及她，这小刁妇明明是喊给医院职工听的，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职工劝阻这蛮不讲理的女人。

今天我只好亲自杀杀这刁蛮女人的歪风了，否则母亲在这所医院休想安渡晚年。主意打定，便向后院走去。正在歇斯底里吼叫的她，没料到这时我会突然出现，见我满面怒容向她走来，预感到不妙，嘎然停止了叫嚷。

“买菜明明是你的事，你有什么资格去叫一个老太太代你去做？”我劈头责问她，语气充满了怒气！她一时答不上话，顿时感到难堪极点，赶紧折回身，缩回厨房去了。

但她马上觉得当着这么多围观的人，就这么缩头，一声不吭也太输面子，何况她所呼喝的是大家呼喝惯了的右派老太婆。别人能呼喝，为什么她就不能？于是便使出家庭妇女骂街的本事，吼道：“吓！你管得着吗？医院的事关你屁相干，你管得着吗”？

我立即窜上台阶进了厨房，向她喝道：“你搞清楚点，今天不是你横行霸道的时候了，你这种不明道理，不懂礼貌，没有家庭教养的人，就得好好地管教你！”说着抓住她的手怒喝道：“你今天非得当着大家说清楚，这买菜究竟是谁的事？”她见我气势汹汹，生怕挨打，终于不敢吭声了。

正在这时，王明从院里钻了出来，走进厨房便问道：“你们吵什么？在他眼里，我和母亲向来只能埋头干活，规规矩矩做奴隶，平时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今天哪来这种“嚣张”气焰？

便向我正色道：“你是知识份子，是知书达理的人，有话好好说嘛！怎么我院的炊事员在厨房大吵大闹，当着这么多人，气势汹汹像打人的样子，未免有失你的身份。”

他的话为本已理亏，无言以对的何玉壮了胆。立刻大声的说：“书记，你看他好凶，凭啥要他来管我们医院的事？又凭啥来教训我。”

围观的人喧哗起来，七嘴八舌各有评议，二楼窗口上也探出许多身子来。看来，医院职工这种蛮不讲理，对母亲任意呵斥欺侮，根子还在这书记身上。对付这些凶恶的下层官吏，还不能凭吵骂，当着这么多围观者只能讲理！

于是我把脸转向他问道：“你是医院的头，请问，我的母亲究竟现在干什么工作”？这王书记将问就答的说：“这个，我们已根据政策，为她平了反，恢复了干部职务，现在是医院的出纳兼挂号。组织上把经济大权都交给了她，足见对她的信任，她本人表示组织上对她的安排很满意，不信，你问她。”

我又追问道：“那么请问伙食团买菜的工作该由谁做？”这意外的追问使他没有转过弯来，脱口回答道：“那当然是炊事员的事！”，

“既是你安排给炊事员的事，你的炊事员无理的把份内工作，像呼奴使婢一样叫一个年龄长她三倍的老人去做，这像不像话？”

围观者骤然间哄闹起来，喊道：“不像话，那小刁妇一贯不像话！”我指着挂号室高声喊道：“大家请看看，今天赶场，那么多的人看病，这何玉却要喊别人做本该由她自己做的事这叫什么？”

大家的视线集中到门口的挂号处，那儿还排着一排长长的队列，围观者又是一阵哄闹！一阵对何玉的呵责！

那王支书见到这种形势，已极不利医院方，连忙向何玉喊道：“小何！你为什么叫方老师去买菜？”何玉见众怒难犯，畏怯的说道：“没有把钱交给我，我拿什么买？”

“你没看见她忙着吗？你为什么不去向她取钱？还在这儿喊什么”？那女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从地上拣起刚被她扔到院子里的背兜，上挂号室取款买菜去了。

王明打发那女人走后，看看院子里围观的附人渐渐散去，便向我不冷不热的说道：“你看，医院的职工都是很听话的，有什么事，不要动不动和他们吵，你也是当老师的，更要注意影响。”

我看着他那张圆滑的脸冷笑道：“医院这种随便欺侮老人的作风，本是你们医院的传统。今天要不是碰上我，那何玉非逼着我的母亲去买菜！”

中午下班后，母亲回到寝室摇头叹息道：“历来就是如此，在你回来之前，炊事员到我的办公室来，动不动就把菜背兜往我面前一掼。那时，我只有忍气吞声驼着背兜去买菜，有时耽搁了时间还要挨骂！”

第五节：对母亲的歧视

母亲受到的多年歧视和压迫，至今还在继续蹂躏她的心，她怎么能安心在这个医院呆下去？几次三番请求调出这个医院，其实只想图一个清静的晚年，够可怜了！但是她仍像一个叫化子那样，被政策落实单位一次又一次的当成皮球踢来踢去。

我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后，母亲便积极筹划能在蔡家医院分得“家”所必需的房子。邹银双的婚事告吹以后，我的安家便成了她最关心的事。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虽被冤狱夺走了青春和恋爱的黄金岁月，剩下的就只是娶妻生子的大事，“房子”便成了母亲需要迫切解决的头等大事。

眼下医院正在原来两层楼的基础上加高一层，以解决职工的住房要求，两年前，这个扩建工程开始实施时，也是母亲改正右派落实政策之始，党支部书记，曾指着加高楼层的图纸向母亲保证说：

“我们医院像你这样身兼数职，又要挂号，又要作出纳，又要负责全院工作的报表，真是难得，我们缺不了你，现在按工龄排，你的工龄也是没人能同你相比的，这一次分房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政策上，你当之无愧的排在分房的第一名！”

眼看着一天天修好的房子，耳听书记的甜言，她盘算今后的新家规划，心想能在身前了却这桩人生大事。然而，她低估了，对她多年的歧视依然存在。

中共统治三十年来，老百姓普遍没有休养生息的窝。近年来靠恢复农民单干，老百姓肚子在逐渐填饱后，安家的“窝”便空前紧张起来。

农民住在简陋的茅草屋里，还有一个可供遮风避雨的立足之地，城市居民

住房的匮乏堪称为世界之最，据当年重庆市统计，城市居民每人住房面积平均不到 1 平米。

一个三口之家有一间 10 平米的小屋已相当不错。几世同堂共挤一间或几家挤住在集体宿舍，中间用布遮挡一下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毛泽东淫政下，城市里的“吉普赛”人，长期在政治运动中耗尽自己的精力，没有国家的投资和计划谁都不敢在“国有土地”上擅自修建自己的“窝”。

毛泽东驾崩，中共新的统治者，提出拨乱反正口号，庶民们为了争这些破房烂屋，发生打架斗殴、杀人纵火事件层出不穷！。

尽管国务院颁发了一个国企职工分配住房的条例，规定单位分房按职工工龄进行打分，再按分数高低排队分房。

但这个条例一到各级基层党组织手里，便彻底变样！掌握住房分配大权的基层党棍们，运用自己手中的分房大权，或公开窜通，或暗地交易，他们现在又成了抢住房争待遇的强手。

一幢住房从刚刚开始平地基建开始，一场围绕分房排队的争夺战就明里暗里展开了。这种争夺战是世界上罕见的中国特产，**准确说这是共产主义牛皮吹破后，赤贫者如梦初醒的争抢。**

这种蛮不讲理，手长心黑之风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利益分配上，此风要一直延续到专制政体彻底解体的那一天。**

新房建成后，便成立由支部书记“挂帅”的分房小组，按照本单位中势力大小和利害关系制定分房办法。

按小组成员意见塞进“贵献大小、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业务水平、职务高低”的条款。以体现小组成员利益的打分办法。任何单位所执行的分房条例，与国务院规定按工龄打分的办法根本是两回事！

共产党一贯有“保密”的规定，凡是党的政策、会议决议，老百姓是不能过问的。这一条被分房领导小组利用得很好，他们把本该由职工讨论决定的分房条例，和打分办法当成了党的“绝密决定”。

胆小的医院职工，事前没有人探问分房条例，就由医院的领导和掌红吃黑的职工在“暗箱”中，任意塞进有利于自己的私货。

蔡家医院分房

按照当时流行的规矩，蔡家医院为分配新的房子，也成立了王明为组长的分房领导小组，然而，分房条例却迟迟没有公布，蔡家医院首次住房分配，充满了诡秘，四十几名职工预先都不知道分房办法是怎样制定的。

分房时，到了公布结果的时候，即使是错误的也成了既成事实，这样的单位，奉行欺善怕恶这个处世法则，成了无可救药的现象。

然而，老实巴交的母亲，吃了二十多年的亏，还在轻信王明给她灌的“迷魂汤”，认为许给她优先照顾的保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不容怀疑，虽然她一辈子都在受共产党的骗。在建房中有人悄悄告诉母亲，王明是骗你的，但她还是将信将疑地相信了王书记的许诺！

她搬着指头算，四十多名参加分房的职工中，工龄在二十年以上的仅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中她排在第一，新的一层楼一共建了二十间房间，第一梯队

的五个人每人占两间房还剩一半……

蒙冤二十三年，她一直住在厕所旁边，一个有起码人性的人，不会做出再剥夺她正当分房权的事！

然而在分配落实住房的前一天，分配的办法仍然没有公布。提前几天，她已在原来住的三人房间里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些装衣服的纸箱子和破烂捆好，一心一意等着搬进那盼了不知多少年的，一个像模像样的“家”。

因为我从未见识过分房子的事，不知道这分房中，有那么多诡计，也从来没有见过分房条例和分房程序，不会想到掌权者在那里塞进那么多暗算。

加上我刚刚才接手高中的数学教学任务，连日正在加班加点的熟悉教材，对于母亲分房的事情并未充分关注。

直到星期天我回家去，母亲告诉我，下周星期三医院就要分配新的住房了，等要我回来搬东西时，我才问母亲：“搬进哪一套房子？”她摇摇头说：“还没有公布呢。”

星期三上午我请了假，当我跨进医院大门时，便听见楼上人声嘈杂，一股股的灰尘从楼梯口上直灌下来。我捂着嘴连忙奔上二楼，只见那医院职工的家属们正忙着往三楼搬东西。忙跨进母亲原先住的那间“病房”时，只看见屋子已是空的，满地的废纸破布、空瓶，人却不见了。

母亲的纸箱和木床已经搬走了。不是说要我回来搬的吗？我正感到诧异，急忙又抽身向三楼跑去，炊事员秦国秀的两个儿子正在把一口大木箱抬上楼去。过道上到处都塞满了纸箱、坛坛罐罐。

好不容易挤上去，在一个屋里找到了母亲。只见她正坐在那堆搬上来的横七竖八纸箱面前发呆。我环顾了那屋子，只有东北方向那垛墙上留一个窗子，偏偏那窗子的外面便是过道，平时因为要过人所以根本没有打开。

所以，只要进了屋便成了四面不通空气，不见阳光的“口袋屋”。

我忙坐到母亲的身边向她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木然的看着我，讲述了刚刚发生的“分房过程”。

原来，直到昨天下午，
分房领导小组的人，才把每个职工这次分配住房的决定，张贴在楼下的布告栏里，母亲这才知道，这王书记花言巧语向她许诺让她满意安渡晚年的，也是她盼了一辈子的“家”，竟是一间四面不通风的口袋屋。

这位道貌岸然的王书记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反倒是分房小组的人向母亲发出最后通牒，必须在明天之内将所占的病房腾出来。

这天晚上，她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想到自己的命苦，想着共产党给她带来那么多灾难，整得她家破人亡，她被迫害，被欺骗，为共产党作了半辈子奴隶，受了大半辈子的欺侮，至今还在受人欺侮不觉潸然泣下。

第二天她还想等儿子回来后，再与医院交涉，所以迟迟未搬动。谁知，早上刚刚上班，护理室的四名护士和传达室的小张，五个人奉命一齐拥入母亲住的那间病房，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制止，便将她打了的背包、纸箱全部搬进三楼“分配”给她的那间屋子里。

恰是：“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

她就这样被连哄带逼地搬进了分配给她的新居，……直到十七年后，她逝世时都再没有给她一间遮风避雨的房子，使她临终抱恨而去！

我听到她这么一说，便走了出去，对整个楼层巡视了一遍，整个楼层的十套二十间住房都已被占据。位于西南面的两套两面凌空的房子，已被工龄未满八年的院长李德富、会计许晓龙占据。另一套则已堆满了家什，是给即将赴任的付院长留的。

所有通风好，光线也好的房子，全被医院里大小“干部”们抢占一光。

直到此时，医院领导们为策划新房而挖空心思，暗中私自交易并隐瞒一年的私分方案，终于才公开！以王明、李德富为首的分房小组，完全没有按工龄分房的原则，而是利用职权将本该由大家公开评分的房子私自瓜分了。

对老百姓公开掠夺和霸道、欺骗仍是中共执政的贯伎。我们忍受了二十多年，看惯它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幌子下，干的对善良百姓的公开抢掠。眼前发生的只是一个小小乡村医院，在住房分配时所表现的强盗行为。

当然，这种既要抢人又不准被抢者出声的作法，早就被我领教，并预先告诫母亲，然而我却没想到人心会那么坏！！

此刻我已按捺不住这种被骗，被辱的愤怒，冲上楼去，找王明讨公道。行政办公室里，王明不在，只有李德富心神不定的坐在那里。不时把头抬起来，从窗子里窥视着楼上的动静显得心虚，见我满面怒容的冲了进来，心中早已明白，便从坐椅上站了起来。

“你们医院这一次分房子是根据什么办法？”我一进屋并没有向他打招呼，觉得没向他大吵大闹已是很客气的了。

面对我的责问他自感心虚，他参加工作才七年，在医院第一次分配住房时就抢在母亲的前头，必竟有点说不过去，不敢像王明那样说什么“这是我们医院内部的事，你们家属无权过问”的蛮不讲理的话。

“你是讲你母亲分的住房吧！”他沉住气，有准备的回答道：“她的工龄是全院最高的这不假，我们已对她进行了特殊的照顾。分给她的房子，不当西晒，不受风寒，还是整个楼层里面积最大的一间。”

睁眼说瞎话是党棍们的擅长，决不会因此脸红。

我立即向他喊道：“既然这么好的住房，我娘就同你掉换吧！你们把一间四面不通风的口袋屋，光线和空气最差的房间逼她搬进去住，你们还有人性和良心吗？再说，我也回来了，你们凭什么把她放在单身职工的档次。你们不怕她上统战部去告你们吗？”

我憋足了一肚子气提出：“所有的人统统从所占的住房搬出来，直到弄明白了以后再来从新分配。这是最起码的办法。否则，我们不会答应的。”

李德富自觉理亏，心里很虚，怕我指责身为一院之长，竟公开抢夺老职工住房，当着全院职工不好交待！正陷于尴尬语塞时，王书记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李德富看到来了解围人，便退到自己办公室去了。

王明听到我的责问，板着面孔回答道：“你凭什么推翻分房小组集体确定的分房方案，你又凭什么说我们按单身职工的标准对待你母亲？本院的职工像游

再郁，肖信芳都是有家的，她们都只分了一间，你也不想想全院这么多人，人人都要分房，这点房子怎么够分配？现在已经优先解决了你母亲的房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看来他早有准备，想继续维护他一手遮天的地位。职工的权利和公道在他的眼里，一直就有杆他自认为必须维护的“秤”，这次分配住房就是用这杆秤称出来的。分房必须抹良心，这就是他悟出来的“党性”。

他刚才列举的肖信芳是一个才廿多岁，才参加工作的护士，按工龄分配怎么也轮不上她，就因为她是中共党员，丈夫又在本地的供销社供职，仗着这小小的背景，她能堂而皇之与六十岁的母亲争房。

王明给她安排的房子，就在母亲的隔壁，并与母亲共享仅三平方米的“厨房”。这蔡家医院当时仅只有五名共产党员，除王明本人而外，其余四人全都分了房子，这些人全是工龄不满十年的“年轻人”，按正常的工龄排队，他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这住房紧缺条件下，与工作一辈子的母亲争夺。

我问道：“我想向你们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凭什么不按国务院按工龄长短排队分房的规定，兑现这次住房分配？第二，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分房条例，供每一个分房的人评分，并预先张榜公布？”我提高嗓门，因为我注意到门外被我们的争吵声吸引，围拢的是全体住院病人和全院的护士。

在这种场合下不争是非曲直，不仅在这一次分房母亲受欺侮，今后她恐怕仍会处在抬不起头的地位。

上一次因为伙食团买菜，我已经同这个一手遮天的人物较亮了一次，我不会放过这一次，我知道母亲的处境是要靠“争”才能改变的。

王明也注意到，在这么多围观者的场合，败在一个刚刚刑满的劳改释放犯手上，他的威信怎么说都要扫地了。所以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以势压人”，故意挑拨说：“分配住房不仅要凭工龄，还要根据家庭人口的数目，你母亲就一人要占两间住房，全院的职工也不服。”

这真是睁眼强辞夺理，母亲的老伴钟治渊在德阳，退休后要回蔡家场安居的。这是他故意抹掉的事实。而我就站在他面前，难道也要被他抹去么？何况我已四十二了，马上就要安家，都要靠母亲分配的房子才成。

何况，当初把我安置在二十四中的教育局，口口声声要照顾我们母子团聚，没有住房，“团聚”的许诺岂非空话！

当我一连串的揭穿“落实政策”的假面具后，王光明居然说：“你的住房应由二十四中解决”，理由是我是那所学校的员工。

看样子，像母亲这样老实忠厚的人，岂有不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骗？至于教育局对我的骗人鬼话，我压根就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我知道，要争取较为宽松的条件，除了靠自己斗争，不会从天上掉下馅饼来。而王明眼看我当着这么多人面，被一个过去踩在脚下的右派指责，怎不恼羞成怒？于是使出党棍蛮不讲理的本领，把桌子一拍，喝道：

‘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你没有资格干预本院的内部事务，有话也轮不到你在这里责问我们’。他声嘶力竭叉着腰，狂怒已使他不顾一切！我看到这是一个同派出所汪秃子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这种人表面凶狠可

怕，心却是虚的。

在政治上未占优势时，除欺哄、赫诈别无他法。尤其对死缠他们针锋相对的人更没了招数，不甘示弱的我也拍着桌子，回敬道：“你瞒着大家私自分房，一手遮天违背政策的规定，我可以去区委告你。”

这一逼，他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接连拍着桌子吼道：“出去，滚出去！”几名年青的医护人员在李德富的带领下，一边劝着，一边推着我，将我拦出了办公室的门外。门“乓”的一声关上了，这时门外过道上围观的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有的围着我，纷纷诉说蔡家医院过去欺侮母亲的事。

我走到后院的天井里当着上百名围观者，朝着办公室的那扇窗子扯开了嗓门，痛痛快快地声声斥责着。这不是骂，蔡家方圆十里地，谁人不知道这蔡家医院对我的母亲和出身有些不良的人，多年来的歧视和虐待？现在是当着蔡家街的居民，替我母亲控诉她十几年受到的欺凌和冤曲的机会。

此时，我听见了办公室传出来大声吼叫电话的喊声，那王明拿起话筒正声嘶力竭的吼道：“喂、喂，是蔡家派出所吗，请你们马上派人来一下蔡家医院，这里有人正在闹事”。

那喊声分明是喊给我听的，眼看着“阶级斗争”喊不应了，斗争会也不开了，往日欺压五类份子那套办法没用了，今天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霸道，只好求助于警察了。越是想到他还在用昔日对付我们的一贯手段——捆绑，打骂来封我的口，我越是更加起劲地吼开了。

此时楼上搬家的人，纷纷探出头向下张望，也不知道王明打的是假电话故意吓唬我们，还是那姓汪的自从在户口簿上讨了个没趣，对王明报来医院刚刚发生的事，袖手旁观了。

我站在天井里整整数落了几个小时，仍未见一个民兵，或警察之类的人走进医院“维持秩序”。直到我的母亲走下楼来，劝我回屋去时，我才慢慢离开那里，院子里围观的人才渐渐散去。

我被母亲劝进她的“新屋”，但气还没有消，当即我就主张把母亲的东西搬回她原来住的那间病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事情闹大一点，最好闹到市卫生局，甚至市委去，把母亲为落实政策，要求回到北碚的正当要求通通捅出来，看看这区委和区卫生局该如何处理？看看这蔡家医院仗势欺人的作风该助长呢，还是该遏制？

但是，善良胆小的母亲却依然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她说“忍着吧，不就是为了了一间房子吗，退后一步自然宽，能住下就算了，我们总会看到这些人遭报应的时候。”

在母亲看来，这天下是共产党的，那里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母亲这种忍让使医院的人，在她生前继续欺侮她，以后几次加工资升级都尽可能的卡她。晚年移居北碚，直到她逝世，她连一个养老终生的窝都没有！！

中国人的“忍”可谓一种传统美德，劝告的人编了忍字的歌诀，写成警句字幅，张贴在家家户户门口的墙上，我向来认为这同劝人向善的“百过格”，用委曲来求眼前的平安，则终究得不到平安。

“忍”固然在某些场合，是反对专制主义在策略上的一种需要，但无原则

的忍，就变成向统治者的妥协。

相安无燥，有时恰恰是中国专制主义施行霸道政治的需要，立足在这个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老大中华民族，受发达国家民主思潮的冲击已快两百年历史，然而专制主义政体还在中国大陆上岿然不动，其原因之一就是专制主义扎根于被压迫民众所积沃“忍”的土里太深。

毛泽东统治二十八年间，中国人民屈从冤狱和惨无人道的奴役；在刺刀下把嘴封起来；在独裁者制造的遍地饿殍中，宁可忍受啃树皮草根，茹毛饮血的生活，不敢奋起反抗，还以固守自己祖宗所留传下‘忍’的遗训为美德。

想我二十三年像畜牲一样忍受皮鞭抽打，除怒对中共的奴役，在语言上表达愤怒外，也只能适可而止，今天我除了还是忍气吞声与母亲挤着，‘团聚’在口袋屋里外，还能搬石头打天么？

我不幸的眼看中华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将忍受特权阶层剥削，眼看他们贪污，荒淫无耻，穷凶极恶骑在劳动者的头上作威作福。忍受着道德沦丧所造成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眼看贿赂猖狂，盗贼丛生、赌、毒、嫖的毒害而无所作为；

中国的专制狂和中国人的忍让，相辅相成危害着这个古老民族。

忍者诚然少了不少眼前的麻烦，却因此牺牲了公理，牺牲了老百姓保护自己的人权护身符。

忍者助长了掌权者的猖狂，不忍者会因奋起反抗而遭到独裁者的屠杀，所以才会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智者警句，和“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的传世名言。

现在我悟出了横扫四旧的毛泽东，把忠孝仁义批得体无完肤，却对这“忍”的名句格言却没触及的原因。

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各家把炉子一起提到那仅一公尺宽的走廊里逞威，顿时浓烟夹着令人窒息的煤气，便会从各家的门缝里窜进屋去。因为没有出气的窗口而留在屋里弥漫盘旋，常常呛得母亲咳嗽不止。

而我也只好跟着被迫在这间屋子里结婚生子。

倒是与我们隔壁的肖芳，充份利用了母亲的忍，扩大着自己的地盘。

两家人共享的厨房，基本上被她的锅、盆、碗占据，她的丈夫用供销社的车，成天来往于蔡家镇所辖的基层政府之间。物资局仓库，农机站及至武装部，派出所都有他的熟人和朋友，那间屋子里几乎天天宾朋满坐，热闹非凡。

晚上九点一过，楼下面响起汽车喇叭声后，不一会，便有一群人跟在男主人的身后，上楼后便挤进那屋子里，少不了两件事：搓麻将，喝酒。那三平米的厨房顿时烟火滚滚，在油烟夹煤气之中，一盘盘的炒菜端进那小屋去，顿时猜拳行令之声响震整个医院大楼。

吃饱喝足后，便在香烟缭绕之中，铺开了麻将桌，希里划拉的总要闹上一整夜。住在隔壁的母亲被闹得无法睡觉，被迫只好天天吃安眠药。

第二天起身打开房门，本想买一点豆浆之类的早点，可那走廊里，却满地堆了空酒瓶和没洗的油锅，菜盘以及鱼、鸭、鸡的骨头。

至于厨房更是堆得连脚都插不下去，根本就别想进厨房。小心翼翼的把这

些杯盘端开一个刚刚插得下脚的小空间，走进去，将自己的小煤油炉好不容易从厨房的角落里清出来，躲进自己那口袋屋里，放在那个没有丢掉的小方桌上，点燃了火，从新过着在二楼病房里自炊自食的独居生活。

那厨房已被她完全霸占，母亲组建一个小家的美梦，终于破灭了。

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我的身体很虚弱，稍不经意咳嗽感冒是经常的事。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后，我摸索出规律的生活习惯，因为那里树木茂盛，空气特别好，每天清早六点钟按时起床，接着便围着操场，坚持两千米的长跑。

晚上保持着一个独自静静思考和回忆的习惯。准备着写出我一生的经历，用事实抨击黑暗统治。我和母亲在落实政策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和歧视，在客观上起着鞭策我的作用。

中共改革开放时期，在经济上实施改良，而政治制度仍然奉行毛泽东那套，人民要求把暴君焚尸扬灰遭到拒绝。对中共欺压我们的种种霸道，只好奉行‘忍’。

恰好，二十四中这种远离闹市的偏僻环境，给我提供了回忆和思考往事的条件，同时也提供了忍的空间，我开始实现早已定下的计划，写了许多回忆片断，为我今后长篇记实的撰写，作了准备。！

第六节：我的初恋和婚姻

我在二十四中工作安定后，婚姻便成了我个人首先要完成的大事，然而，结婚首先要恋爱。在封建时代，那时中国人在男女授受不亲和旧礼教的束缚下，婚姻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来决定。看孔雀东南飞，梁山泊与祝英台这些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戏中悲剧人物往往触动我。

不过，导演我的悲剧，正是当年抨击封建制度的中国共产党。

大学里那段因反右斗争酿成的冤魂恋，成了我刚刚踏上人生的一场噩梦，我知道当年演出这种悲剧的人远不止我一人，好多人自杀，好多人殉情，又好多人被逼着走上不归路。

但是我没有死，生命从冤狱中延续下来，婚姻和爱情也延续了下去，直到今天。由于我特殊的遭遇和不甘屈从命运的摆布，使我的婚恋故事，充满了传奇和悲哀——

1979年，42岁的我回到蔡家场，冤狱好像决定我此生只能接一个老婆回家过日子。

同邹银双那场“见面散”的戏演完后，结婚对我只留下延续后代的使命，可是我生性倔强，硬要把快死去的爱情拽回来，老天又把一段孽缘赐给了我……

中共统治三十年来，一面空喊消灭城乡差别的口号，一面为巩固它的统治，实施了严密的户口管理制度，人为将国民划为城市和农村两类，农民在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上都比城市的贫民更苦，城里的一个职工再穷，好歹每月也有二十多块钱的工资，就是没有工作，吃粮按居民供应也有“保障”。

农民起早摸黑，还得自己挣口粮，常年劳累不得温饱，形成中国社会的最

穷困的阶层。农村这种低下地位，成了中共统治者，关押不服从其统治的“五类”份子“大监狱”，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把相当一批人下放农村，作运动的惩罚，独裁统治有意制造并扩大了城乡差距。

恶毒的是，为了防止饥寒交迫的农民向城市逃荒，中共的政权机关加强了户口管理，一旦发现流入城市的逃荒者，便被收容和劳教，其生活条件的恶劣甚至比劳改更差。

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这种人为差别，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公开等级，农村人要落户城市，除了严格的审批还要交高额的户口费。

农村女孩子为了摆脱又累又苦的农村，老夫少妻的家庭悲剧层出不穷。这样的家庭没有爱情基础，说穿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买卖婚姻，是中共制造的社会不公平产物。

1980年我和母亲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每月150元，在低收入的蔡家平民和贫困的农村中，我和母亲算是蔡家地区的“富人”。

加上当年国营单位的职工老来退休后，直系的后代有顶替父母岗位的规定，我的母亲眼看就要退休，谁能成为她的儿媳，便有可能获得进这家医院工作的机会。所以我的条件，对蔡家场的贫民和农村女姓，是有诱惑力的。

当时向我母亲提亲的人并不少，只是她们中属于街道居民的，都是伤偶或离异的二婚嫂，而且都带有孩子，在计划生育年代，要和她们再生一个孩子是不可能的。

没有结过婚的女孩子，要未在外地已经有了男友，要未是十八岁以下还没有到结婚年龄的少女，到了法定结婚年龄难说不会变卦，更主要的是，这种单纯从经济利益考虑的婚姻，无异于买卖婚姻而暗藏悲剧。

在我的心目中，未来的伴侣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同时应当不妨碍我的写作，所以对伴侣的选择有了要求，可是冤狱注定我今后建立的家，会出现许多不幸。

“片断”的第二个读者

我写完第一本“片断”时，第一个读者就是我的母亲，她在读完后，老泪纵横，并在篇末的扉页上，留下这样的话：“看了我的孩子这本用血和泪写成的片断，情真意切发人深省，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一页一页再现其间，我的心也随之振动”。

这期间范小妹已经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仍留读二十四中，因为她已经长大，不便再寄居母亲那里，她的家距二十四中太远，只能寄宿学校，晚上上自习时，她常到我的宿舍里补习功课，久而久之她对我晚上的写作引起了关注。

有一次，她很天真的问我：“哥，你晚上常常深夜还在写东西，看你写东西的样子，好像什么都忘了，心里也很伤心的样子，有时边写边流泪，你在写什么呀？能给我看一下吗？”

小妹在我母亲身边生活多年，对母亲的不幸很同情，加上她出身农家，对农民的处境，有切身之痛，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使她萌生了对现实的反感。虽

然她根本不懂政治，在信仰的领域尤如一张白纸。

我想我写的片断，会有助于年仅十六岁带着探索来认识社会的她，所以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我只告诉她，我写的“片断”是中共绝对忌讳的，所以我暂时还没有拿给任何外人看，请她看后不要向任何人张扬。

她便在我的办公桌上翻开了这些“片断”，她是继我母亲的第二名读者。读着读着很快她由好奇变得严肃，渐渐双眉紧锁，看得出她的内心已进入我所描述的境界。两小时过去了，我已将第二天的课备好，她仍在专心读着并不愿释手。

我轻轻拍着她的肩说道：“夜深了，明天再看吧。”她才如像从梦境里初醒，闭上了眼睛好像在回味片断里的情节。

好一会，她才抬起头来，眼里绽出一阵很奇特的光，是一种极为柔和的光，我曾接触过这样的眼光，低下头，轻轻地说道：“你写得真好，像诗，像歌！我差一点都要哭了！”说时，她又抬起头来，这一次那眼里分明噙着晶莹的泪。

我情不自禁伸出双手，轻轻地楼着她那扎着小辫的头，一面掏出手绢，为她擦去已经夺眶而出的泪，我的心中立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暖流在窜动，她把头靠在我的手臂上，静静的听得到我的心跳……

那以后，她见到我总有一种异样的眼光，偶尔两人的眼睛在课堂上碰到一起，她总会低下头去。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她的弟弟在中午时到我的宿舍里告诉我说，“姐姐病了，请你向他们的班主任请一个假”。

那天下午正逢我没有课，吃过午饭，便专程去了她家。

从二十四中到她家，足足要走半个多小时，穿过正街和通向广场的一段机耕道，途中全是田间阡陌小路。今年春节期间，第一次同母亲一起到过她家，这一次我是第一次单独去她家。时值九月中旬，正是收割中稻的季节。

绕过她家门口那池塘，见围墙上的小门半掩着，走近小门，我在那门上扣了两下，里面并没有人应，于是便轻轻推开门，走过猪圈向那灶房屋走去，灶房里堆满了晒干的包谷杆，我向通向里院的小门望去，院子里堆满了包谷棒，胡妈正在忙碌着。

再向里屋望去，里面一共三间卧室。最里面的一间，放着一张古式的大木床和粮食的围囤。靠着外面的两间小屋，各放着一张小床，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张极陈旧的木柜，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张桌子。没有粉刷的泥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已剥落下来吊在那里。范小妹正面墙而卧，我进屋时她并没察觉。

抬头望去，春节时吊在屋梁上的熏腊肉已经没有了，这比我在盐源时詹大娘的家好不到那里去，看来，胡妈辛勤一生将五个儿女拉扯大，却落得一贫如洗，这便是当年中国普遍的农家。

我的单独作客，是胡妈没有料到的，见了我，比春节那一次还要热情，连忙招呼我坐下，并马上走进里屋，取出一只装着白糖的瓶子，给我泡了一碗糖开水。当时，白糖“凭票”供应，农村里是不分配白糖的，所以白糖很稀贵，糖开水是农家用来招待贵客的“饮料”。

小妹被母亲的动作和人声所惊醒，翻过身来已查觉到我来了，便坐起身

来。我走进了她的房间，用手摩了一下她的额头，果然很烫，便从衣兜里取出带来的阿斯匹林片。

她的母亲正忙着烧火弄饭，说一定要我吃了饭再回学校。

屋里只留下了我们俩，看她脸色青黄，头发蓬松好像很憔悴，但仍保持她少女的光彩。此时睁大着一双发红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流露出一种朴质的羞涩。我轻声地问道：“头疼吗”？她点了点头，问道：“哥，你这么忙还过来……”

我端着那盛糖开水的碗，拿着感冒药，递给她叫她吞下。因为穷，乡里的人偶感风寒，极少找医生开药，一般的就只有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了。

吞下药片，我便教她躺下，给她盖好被子，轻声说道“吃了药，好好睡一觉，发身汗，就会好的”。她顺从地躺下，两只大眼睛却盯着我，好像有一种难以启口的话从那眼里向我传递。

不知是一种下意识的冲动，还是人们称作的“情”在作用，我弯下腰，亲了亲她那发烫的额头，那一瞬间就像有一股电流，从我的身上流进了她的体内。

她紧闭着眼睛，体验着那种感觉。

为了让她安睡，我起身走出了她的房间，去帮胡妈弄晚饭去了。

吃过晚饭，已下午六点钟，我便起身告辞。临行前嘱咐胡妈：“发烧病人胃口不好，熬点粥给她吃，我拿来的药一定要按时服下”。说完，便站起身来，向里屋望了望，没料到，她已穿好衣服坐在床沿上，见我要走，便走出屋来一定要送我，说：“天快黑了，那田坎路不好走，我带你走上面那堰沟铺的石板路。”

见她已不像刚才我来时的面容，精神也好多了，显然是刚才吞下的药力发挥了作用。床前已换下了一大堆衣服，毕竟年轻，出了汗，烧也就退了。她一边说，一边梳扎蓬乱的头发，从新扎好了小辫。

“不行，你还在发烧，就是烧刚退也不能敞风，否则病情要反复发作的”！我反对道。然而她却走到我的面前抓起我的手，放在她额头上，我感到那带着汗迹的额头确实已经凉下来了。

她固执的说：“我在床上已经躺了一整天了，现在全身的骨头节都睡痛了，我也想出去走走，活动一下身体。”见她执意要送我，我推迟不过，便嘱他多穿一件衣服，胡妈拿出了一件夹衣给她穿在外面。

走出木门，天色已经暗下去，但没有风，于是她走在前面领路，我跟在后面，一前一后的出了木门，转过一个弯，便踏上了那用石板铺成的堰沟小道。

走出不远，小道伸进了一片茂密的竹林。走进密林中，我们俩便被包围在绿色的竹林中。夏末的黄昏，竹林里蒸发出一种清新的气息，这是我俩第一次在野外单独相处，好像进入了一个只有我俩的二人世界。

我听得见走在前面，仅一步之隔她那心脏里发出的跳动声。

我忽然觉得，如果此时，她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只消深情地凝眸望我，我定会立刻将她紧紧地拥抱在我的怀里，那种我原先以为永远都不会再属于我的爱情，突然奇迹般的降临给了我。

然而，她没有这样做，我也没有这样做，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步之隔的距离，我们双方都在用理智约束着自己，因为她太年轻了，一个高中学生，年仅十六岁。而我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而且是她的老师和义兄，中国古老

的道德理念，发生了强烈的制约作用，我们都应当自重……

我俩穿出竹林走出堰沟，前面便是蔡家广场的出口了。

在暮色中，我还来不及向她叮咛，“等病好了以后，再来上学”。她便已经站在沟上，向我挥了挥手，扭过身去，迅速消逝在暮色笼罩的竹林中了……

不过，感情像一头脱缰的小马驹，冲击着理性的约束，带着与范小妹初恋的感情，我向母亲表示过，我要娶她为妻，但是受到了母亲的反对。

逆 缘

在二十四中，近百名教职员中，与母亲有过相似遭遇的一共有八人。其中，外语组的王基敏老师和已经退体的郑修老师，与母亲交往最密，虽然处在两个单位，但处在同一蔡家地区。

过去，“公社”开批斗会便将她们聚在一起游街，批斗，加上两位老师常到医院看病，亲眼见到医院职工对母亲的欺侮，同病相怜，结下了患难之情。

我到二十四中后，她俩又是我的邻居，除了常常给我烧开水、弄饭，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还常向我介绍，当年蔡家场和二十四中打手的“赤色”暴行。

两位老师最关心我的便是婚姻，她俩比谁都替我的婚姻着急，主张找一个能配得上我的，最好也是教师的人作女友。

正好住在我的对面，一位高中政治教师名叫徐乐生的，正为他的表姐寻找对象。他的表姐叫刘启建，在蔡家地区的卫东中学任语文教员，年龄比我小七岁，已经离异，但无子女。

有一次，蔡家地区的中学教师在二十四集中学习，王基敏和徐乐生便商议，将这位刘老师介绍给我，在那次活动结束的当天下午，由王基敏撮合，我和刘启建就在徐乐生的房间第一次相见。

她中等个子，五官也还端正，据说也有一段因家庭出身发生的辛酸经历，受过“劳教”，并与前夫离异。

第一次见面，留给我的印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只是感到她与人交谈有意无意流露一种不顺眼东西，讲到文革年代，眼睛老是爱翻白眼，两手还在空中舞动，以帮助她表现出某种“造反”的意态，那挥手说话间，不时叉腰的动作，像从当年的红司令那里学来的。

这种动作，大大伤害了她那女姓应有的风韵。

恰恰我的弟弟就是被造反派杀害，我对文革的狂热深感痛恨，从她身上折射的那种阴影，除让我反感还凭添了一层防范的隔膜。我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已把她拒之门外了，我完全没有与对方恋爱的初衷。

所以，当王基敏问起我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时，我只是笑了笑，把这个初次相见的印象埋在心里，并没有说出口。

大约过了两个月，她第二次到她的表弟处来取一些语文教参书，王、郑两位热心的老大姐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当起义务红娘。把我们单独地关在她表弟的房间里，我们两作了第一次交谈，我们不仅各自介绍了自己的“遭遇”，还介

绍了各自的“家庭”。

她的父亲刘学理，年轻时就读于国民党成都军校。抗战时期，原国民政府川东峡防局行政长官卢作孚，曾聘他担任北碚市的民政局长兼城防长官。1949年9月中共军队占领重庆，身居北碚区域防长官的刘学理开城迎共，北碚遂和平“解放”。刘学理也成了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

不过未到五年，这些本想徼幸自保的人们，一个个被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房屋被没收，家被洗劫，刘学理被划为反革份子，受到三年的监督劳动管制，沦为无产阶级政权下一个赤贫的黑五类。

刘学理五个子女中，刘启建是老三，自从父亲被管制，她才七岁就要带弟妹。稍大一点，便在垃圾堆里拣二煤炭，拾破烂，没少受邻人和同学们的歧视，但她却因天性的软弱，从不敢对加给她的不公正表露反抗。

中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使她没能考上大学，但却幸运的当上了小学教师。在她二十四岁时，被西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个姓王的讲师看中，虽然那姓王的比她整整大了十几岁，并抛弃了他的前妻。结婚使她得到一种新的虚荣，做大学讲师又是党员的妻子，使她感到社会地位膨胀了。

据她自己讲，为了装扮自己体面的家，她不顾工薪条件，追求高档的家俱和摆设，宁可负债，向她的学生家长借钱，向兄弟姐妹借钱。

借的钱越来越多，背上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为了躲债，她不得不欺骗上门讨债的债主，学会了向债主施以小利来减缓债务压力，并趁文革期间，学校财务的无政府状态，将学生交来的学费挪用还债。

于是债主的公愤和无产阶级高压的专政，毫不手软的将“诈骗”和“贪污”的双重罪名，扣在她头上，就因为大约几千元的债务和几千元的挪用，她被关进了西山坪劳动教养营，由当时北碚军管会处以三年的劳动教养。

而那位王姓讲师，在判处她劳动教养的宣判大会上，向法院起诉离婚。结果姓王的讲师抛弃了她。

三年劳教期满，她回到老父亲的身边，在她再三恳求下，教育局把她发沛到离北碚二十多里大山上的这所学校，“继续”当她的老师，那可是一所无人愿意去的学校。

我们谈完，已是七点钟了，吃过晚饭后，看天空上月明星稀，一轮上弦月已悬在半空中。她执意要回卫东中学，说明天还要上课。郑修并不劝阻，只是建议我一定要护送她，王基敏叮咛道，“灯塔那一带地势荒凉，文革期间公路上夜间行劫抢人的事屡有发生，所以你一定要把她送回学校去”。

经过一下午的交谈，我对她还没有任何好感，我们虽有相似的家庭出身，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但对于中共的专制政权，她的认识却与我完全不同，由于相似命运而产生的同情，并没有让我对她发生爱怜。但耽误到这么晚，也是为了我，我总不能眼巴巴看着她一个人摸黑冒险去走那山路。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蔡家场，沿着通向灯塔的马路上走去，两旁齐人高的包谷林里黑耸耸在月光照射下，好像路边预先埋伏的不速之客，会突然从那里窜出来，用刀和棍棒比着我俩，心便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彼此都紧张的窥测着

茂密的包谷林并不说话。

我紧握着一根打狗棒，走到灯塔乡的十字路口看看手表已是晚上十一点了，月亮已经开始偏西，光线渐渐暗下来。

当我们走上到卫东中学那段山坡小道时，突然一只山耗子，从路边的草丛蹿出，从我脚下窜过，惊出我一身冷汗，她在田坎上摇晃起来，好像要跌进田里，两手一张便拽住了我的手，为了替她壮胆，我也就紧拉着她的手，走过了那段田坎。

同女人牵手，是我划成右派后整整二十四年来的第一次，三更半夜的在一片荒野之中，这原是很浪漫的事。然而当时处在紧张之中，我却什也没有感觉出来，只觉得背上泛出一阵阵的冷汗。

走完田坎，她才掏出了一支预先准备好的电筒，依靠它，边用棍子驱赶着藏在草丛中的毒蛇。最后总算到达了沉沉静睡的学校大门。

校门口的两条狗向我们狂叫起来，狗的吠叫惊醒了守校的工人，当木门打开时，我们总算舒了一口气，将她送到了校门内已完成了我的任务。

于是我转身告辞，然而她却坚决不允。来开门的校工是一个四十上下的女工，两个人一齐劝我等到天亮再回去，因为太晚了，周围荒山野地，即使没有盗贼也要碰上野物毒蛇，再说此去蔡家十里路，少说也要走两小时，何必冒此危险走夜路。在两人苦苦挽留下，我不得不改变回返的主意，跨进了校门。

这里地处偏僻，起居十分不便，比起我所在的二十四中条件还要差，这就是给曾劳教过的刘启建一个安置！比那供销社姓秦的又似乎好多了，总算还有一口饭吃。若不是现在“教师”奇缺，在这种谁都不愿来的边远学校急需补充，恐怕她连这么一口饭都没得吃的。

在入过另册，从地上爬起来的“五类”中，刘启建算幸运的。

学校很小，这里原是一家“地主的宅院”，四周两米高的围墙围着一群泥木结构的瓦房，院中两棵大黄桷树，显得非常的清静。

她忙着把我请进了她的房间，房间里收拾得挺干净，在一张桌子上阵列着一个煤油炉，满桌堆着蛋、米、酱油、和盐糖之类的东西，她在同那位开门的工友商量一阵后，走进寝室，点燃了煤油炉，安上了锅，倒了许多油。

我说别去弄了，天已经这么晚了何况我也不饿，但是她并不听我的，一面说：“在王老师那里，我根本就没吃，她弄的那菜连油都不放怎么吃？”听到她的话，一时答不上话来，只好默默的看着她弄“饭”，只见她在碗里，打了整整八个鸡蛋，然后往已经烧烫的油锅里倒。

八个鸡蛋，我还真没看到过这种吃法，那年月虽已经什么都能买到，鸡蛋也并不算贵，但毕竟还是非平民食品，整整八个油煎荷包蛋也够出手大方的。

没出十分钟，两碗面弄好了，每碗面上放着四个黄澄澄的荷包蛋，将其中一碗，端到我面前，那时我一点都没胃口，又不好推迟！于是顺手拿起一个小碗，夹过一个荷包蛋和半碗面，心中暗想，这女人不像一个受过苦的人。

吃过面条已是下晚两点半钟，距天亮充其量还有三个小时，我就留宿在她的床上，她到守门的校工那里住了。

当我钻进那白纱纹帐里，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向我扑鼻，好像乡巴佬初进了

大家闺秀的闺阁，迷迷糊糊地一点都没有睡着。

脑子有些紊乱，好像缺乏条理。这是我第一次同一个初识的女人半夜结伴同行，并且寄宿在她的床上，这肯定因为东方人的习惯与西方人完全不同，别说这种没有爱上对方的情况，就是已经热恋而没有结婚，也不允许发生这种性突破，脑子里很奇怪，自问是不是这就是大陆人的要女朋友？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这一夜印象深刻，尤其对她那种洒脱大方，感到非常的格格不入。管他的呢，还没有确定任何关系，我想……

夏天的早上五点钟，天已拂晓，我忙着起身，一夜几乎没睡，头昏沉沉的，好像生了病。好在今天星期天，我得马上赶回蔡家场，在母亲那里睡上一天。

刘启建已经起床，如昨夜的那般热情，忙着给我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并忙着去煮豆浆，不过事前已说好，天一亮我就走。

她和那女工一再挽留，我被拖到了七点钟，还是独自走出校门，临别时她一再叮咛我，下周星期六再到卫东中学来相聚。

当我匆匆忙忙急步赶回蔡家医院时，已是上午九点钟了。平时按照惯例，周末我都是回母亲那儿住的，昨晚一夜没归，自然引起她的追问，我便把昨晚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母亲很不以为然的说道：“没见过这种女孩子，初次见面就要留人住宿的”。

我连忙解释，那确是因为天太晚，加上夜半更深，路上又有狗、蛇，独自回来确实不安全。她只是嘱咐道，下个星期天千万不要再去了！我点头答应了母亲。说心里话，刘启建在我心里没有任何位置，当时我心理真爱着小范。

自古以来被活活折散的情侣，总是归于“无缘”。一声天意难违的悲叹，也不知结束过多少恩爱情人的生命，其实认真思索每一个悲剧的后面，必有一双导演悲剧的黑手。

“梁山泊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这些名戏也不知赚了多少善男善女的眼泪，然而并不因一曲梁祝，随蝴蝶翩舞，使现实中新的梁祝不再发生。

尽管“朱丽叶与罗密欧”以愤怒的控诉，痛斥中世纪贵族们带给人们世仇的灾难。贵族们用相互拼杀，来继续世仇，甚至酋长的亲生儿女，也不能不为种族仇隙双双殉情。

而我们这个社会，残酷的‘阶级斗争’，与中世纪专制的野蛮相仿，难道反右运动残酷地粉碎了我和马开先的初恋，同中世纪的故事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当年因为阶级出身而被强行拆散的恋人还少么？

而在今天，造成我中年未婚，难道不是这场残酷阶级斗争悲剧的延伸么？偏偏老天在将一个圣洁少女赐给我时，当我们真心相爱，却受到市俗的阻挠。于是我爱情的第二幕悲剧，便毫不留情的降临给我。

后来在好心的王基敏，郑修以及其它老师的撮合下，我听从了母亲的劝告，屈服于市俗压力，狠心地割舍了同小妹的初恋，身不由己的带着伤感，同意和刘启建结婚。

毛泽东时代，这种悲剧太多，两个受害者，因缺乏彼此了解和相互包容，蒙里懵懂建起的家，充满吵架，这样的不幸岂止我一人。

残酷的事实证明，两个不相爱的人结成的家，不仅双方是痛苦的，最后必然破裂，我的晚年注定了鳏居，而受害最大的莫过于孩子……

结婚那一天自己弄了几个菜，请了热心我们这婚事的王老师和郑修，买了一些糖果，吃饭以后去蔡家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就这样没有举办任何仪式，悄悄的我们就在母亲那间小屋子里渡过了新婚的第一夜。

后来刘启建逢人便说，我和妈妈太吝惜，一千块钱就打发了一樁婚事，想起来确实寒酸。我和母亲平反后，靠自己这点工资白手起家已经不容易，再说，我对这场婚事充满了无耐。

范小妹我几乎没有和她往来，今天突然听到我结婚的事，一定心里很痛苦，而她的情影、笑声却萦绕在我的耳际。

果然，结婚还没有一个星期，我们就为在那里住，发生了矛盾。按照我的意见，我们三人都应当住在蔡家医院，我不可能因结婚而抛下母亲不管。平时三个人在三个不同的单位上工作，倒也算了，遇到星期天和放假，三个人往那里聚？

三人住在一间口袋屋中，安上两张床，且不说挤，没有活动空间，拉屎拉尿怎么说都极不方便。何况，婆媳同住一屋，本来就有悖于中国民间规矩！

三个人既不愿挤在一间屋里，刘启建从新恢复了她的习惯：星期六就回北碚同她的老父亲团聚，而我也像以前那样，星期六便回蔡家医院与母亲团聚。

分居成了我同刘启建“蜜月”期的奇怪现象，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家就出现破裂的危机。这难道不是这小小医院党支部的坏心眼造成的么？不是中共二十三年迫害结出的苦果么？

第四章：母亲摆脱了伤心地

1982 年春天，母亲正为“落实政策”而心烦时，接到北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寄来的信，孙起孟告知妈妈，她的来信已转给重庆市工商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请他们协助解决母亲落实政策的善后事宜。

第一节：刘老先生相助

四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医院的门卫突然来说：“方老师，楼下有一个姓刘的来找你，他坐的是一辆面包车，看样子好像是市里的干部。”

母亲跟着走下楼去，来人大约六十多岁，身着中山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此时正站在大门边上，面部极为和善。

母亲打量着他，在脑子里竭力思索着，对面前站着的他感到陌生。一面向他走过去，一面询问道：“您找我吗，请问有什么事吗？”那人立即谦和的向母亲自我介绍说：“啊，我姓刘，在农业局工作，请问您就是方老师吗？”母亲诧

异地点了点头。

此时那停放在大门石阶下那辆面包车司机，从车里伸出头来，高声的喊道：“这是我们的刘局长！”母亲终于恍然大悟，连忙说道：“啊！刘局长，刘老先生，刘昆水先生，我早就听说过了，北京的孙老师给我来信中介绍您的，没想到您亲自跑来了，请吧，请楼上坐！”

对方回应道：“唔，不敢当的，我今天是因为到北碚农业局检查工作，顺路来看看您的，孙老师嘱咐过我了，要我尽可能地照应您。”他一面上楼，一面讲明了自己的来意。

我站在楼梯口迎视着他。回重庆以来，这是我见到第一位市里的局长。那外表似乎在那里见到过，或是在什么小说里读到过的，但我却说不上来。

上得二楼，面对本已很狭的过道两旁，杂乱地堆着破纸箱，烂木头和煤炭，他皱起眉头好像在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当走进母亲那口袋屋，他摘下了那副深度金丝眼镜，迷逢着眼睛，露出一种走进贫民窑洞的那种酸涩感，小心翼翼跨进了门，屋里的浊气，使他下意识地捂着嘴巴。

走到紧紧关着的窗子下面，从新戴上了眼镜，试图去打开那窗户。正好，许小龙的母亲从那窗前走过，使他缩回了伸出的手。

接着他又回过身，反复扫视着这间被两张床铺占去，只剩下一条过道的小屋，似乎明白了一切。

母亲并没有介意来人在观察什么，热情的张罗着请客人坐在床铺上，然后从厨房里端出刚刚泡好的花茶，向他递了过去。那刘局长忙站起身

蔡家场十字路口

来，谦恭地接过茶杯答道：“唔，别客气了，方老师，孙老师接连给我来了两封信，托我关照您的，我也因为工作忙没能抽出身来。”他第二次重复了来意。

接着问：“最近医院工资改革了吧，他们给你加了几级？”眼里露出一种关怀的眼光。

“唔，工资吗，按调资文件规定，像我这种二十年从没有升过一级的人，应当在本次连升三级，但是医院调资小组的人说，我的工资已是全院最高的，再说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动员我自动的拿出一级来，照顾那些业务上的骨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所以最后上报时，我只升了两级。”母亲回答他。

刘局长听到这里，不停地皱着眉头，中国人怕硬欺弱已是风气，被欺侮的人是明也欺，暗也欺，到处都一样，今天他已看到这个医院不仅在住房分配上，在提升工资上对母亲的欺侮，他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平时母亲是怎么忍受周围人对她歧视的。

“孙先生要我能帮助你，调整一下生活和工作环境。”他终于说出了来意。“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民建虽说是民主党派之一，却连调动一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我已就此向区统战部联系了好几次，他们说眼下没有好的去处。”

我看这样吧，民建重庆市委已报教育部核准，准备在今年暑假后办一所财经学校，中国要搞四化，没有经济管理人才是不行的，你看在学校里增设一个以培养幼儿教师为专业的专业，由你出任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怎么样？”

刘局长的坦白和开门见山，显示了他对民建全国主要领导人孙起孟尽责尽

心了。母亲的眼里露出了感激的眼光，她那渴望已久离开这野蛮无理，欺侮她，伤害她的蔡家医院，总算盼到了。

这不是由中共的基层组织卫生局，教育局，落实政策名正言顺解决的，而是由中共的一个小“伙计”以私人交情的办法解决。中共对如此不光彩的解决，连看都不肖一看。不过对于母亲来说，问题总算解决了。母亲早在抗战时就创办过中学，一个教育部门的老前辈，被中共践踏成这样！现在他仗着民主建国会帮助，才逃出眼前这人间地狱！

“这样吧，你尽快地办理退修手续，争取暑假就到工商联来准备夏季招生的工作。我已经为你安排了住宿，你就安心在财经学校发挥晚年的余热吧！”

他说完，便站起身来，告辞道：“今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办，所以不能再多给你说什么了，好在今后来日方长，到重庆以后慢慢地说吧。”

我看着两位老人缓缓下楼的身影，母亲一直把他送到他的面包车上，热烈地握手道别后，还站在那里目送那车消失在场口转弯处。！

我心里一面替母亲感到高兴，她终于摆脱了这个令她伤心的地狱，也替母亲担忧，她已经六十五岁了，要单独地在市中区独自开辟一个天地，她能胜任吗？尤其是，为什么一个堂而皇之的民主建国会，对中共这种落实政策欺人太盛的作法，不敢直接提出来明正言顺加以解决？而是想出在一个与幼儿教育毫不相干的财经学校，办一个师资培养班的办法来解决？

六月份暑假到来，母亲按照刘先生的吩咐办理了一切手续，打点了自己的行李，把自己的随身行李装成了两个大包，在我亲自陪送下离开了蔡家医院。当我们顾了一辆运货的人力三轮车，离开医院大门时，除几个与母亲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护士外，没有人知道母亲上哪儿去。

当我们离开了那场口的汽车站向三溪口行去，**母亲连头也没有回。**

从1961年，她被强行在这所医院接受“监督劳动”至今，整整受了它二十年奴役和歧视，在她身上沉淀的伤痕怎么也无法消褪。

我们到达市区的下半城解放西路的重庆市工商联会，已是下午五点钟了。工商联接待室里走出了四个中年人，将母亲的行李接到一个欧式三合院里，母亲被临时安排在招待所楼上住下了。

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热情地为母亲搬行李，介绍工商联的情况。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李重生，是工商联的饮食团长，刘局长特别吩咐他对母亲的生活起居进行关照，今后有什么事只需喊一声小李就行了。

母亲从这位小伙子的朴实语言和憨厚的态度中，感到在蔡家医院二十多年来从没有过的亲切。

今天对年过六十五的母亲，有一种背境离乡的伤感，但很快被周围和睦的人际关系所冲淡。从今以后，也许有一段较为舒心的生活，记载在她夕阳的人生之旅中了。

第二节：解救范小妹

中共建政三十年来，一面空喊消灭城乡差别的口号，一面又为建立统治秩

序实施了严密的户口管理，将国民划为城市和农村两类。农民在生活 and 劳动条件上比城市平民更苦，城里一个职工再穷，每月好歹有几十元工资，吃粮按城市居民供应也有保障。农民起早摸黑，常年劳累不得温饱，成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阶层。

农村这种低下地位，成为毛泽东关押，奴役“五类份子”的大监狱。每次政治运动，都把被整的人“下放农村”以示惩戒。

文革以后，到 1988 年十年光景，从二十四中学校毕业的高中学生，累计三千多人，考上大学仅只有十余人，在 1982 年到 1985 年连续四年中竟没有一个升入大学的，学生在学校混了几年以后回到农村去，只消一两年便把在学校所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并变成农民。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1982 年，范小妹在这所学校里“混毕业”了，她要算在她的同学中最勤奋的一个。

但是无论她本人付出多大努力，她的母亲寄多大希望，我对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她同她同年级的两百多学生一样，只能在高考的榜上名落孙山，她只好回到莲花大队的家，同她所有同学一样，接受回家当农民的命运。

随着毕业，原先的理想变成了泡影，前途一片茫然，呆在家里又怎么解决生活的压力？她偷偷地哭过，我明白，她那白纸般的心灵难以渡过面临的历程。而她的旅程，是一条充满文革留下来的欺骗、抢劫、危机四伏的路。摆在她道路上的荆棘是她难以预料的，也是她的父母和我难以预计的

她的母亲和范大伯商量后，决定让她高中毕业，到德阳九五汽车厂去学一门手艺。范大伯是该厂的退休职工，按照“政策规定”就业人员没有让子女“顶班”的条件，这又是一种偏见和歧视。

她将离开的前一天，突然跑到学校来，恳求我让她带走我写完的两本片断。我体会得出，那片断带在她的身边，就意味着我在她的身边，她说片断上所有的句子，都会在远行的途中，响在她的耳际。

就这样，她像一个在大松树林里到野地采磨菇的小白兔，怀着惴惴不安踏上了远程的路。

那天早晨五点钟，天还麻麻亮，在牛奶场的大门口，她的母亲提着一大包衣物，同她一起塔趁了牛奶场去火车站送奶的卡车，当她俯身在车上接过我递给她的书包时，我看见她的眼圈红肿，眼眶里充满了晶莹的泪珠，我心里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

卡车缓缓地开动起来，她站在车尾，一再招手，一边抹泪，一直到消逝在转弯处的茫茫晨雾之中。

一周以后，也就是 6 月 7 日，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那上面写道：“平哥你好，现在，我独自一人到了德阳，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头昏目眩，想到你对我的关照，心里就痛，我没考上学校对不起你对我的一片真心。现在，我真有点后悔，想到我还是不该离开你们，我看穿了这世界的欺诈……”

第一封信的到来，使我陷入了一连串迷惑之中，她为什么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为什么看穿了这世界的欺诈？难道这些话隐含着一种陷阱？更令我奇怪是信上没有落下地址，读这封信越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她此刻在哪儿呢？

七月中旬学校刚放假，母亲和我、刘启建便坐火车到成都，再改乘北上的火车到德阳并在黄许车站下车。

德阳九五汽车厂前身，是重庆新建劳动工厂一部份，迁川西而建立。

它坐落在宝成铁路旁，同盐源农牧场一样，就业队是就地满刑的“劳改释放犯”充实的，就业人员一方面继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混杂的集合体，这儿有受迫害的政治犯和受到伤害的老百姓，也有流氓、骗子、杀人越货的强盗和妓女。管理它的监狱管教，多半是货真价实的无赖和恶棍。

它的东边靠着黄许车站，川西平原的灵气，使这里风景宜人，然而同大陆美丽的土地一样，秀丽的山水掩盖不了这片土地的罪恶。

到了九五厂，我们很快见到了范小妹和她的父亲，听她的哭诉，短短两个月的经历，在她稚嫩的心灵上扎下了无数的毒刺。

出来几个月一无所获的回去，撞荡生活的美好幻想不但破灭，还要从新回到那破屋里听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准备着像母亲那样，在分给她的土地上劳碌一生，留在黄许镇上吧，又怎么能应付周围人群无休止的骚扰？

在中共“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无数同她一样的农村少女，在向城市游离的过程中经历幻想破灭，痛苦徘徊的历程几乎是相似的。她们经过生活的摔打，因处在弱势，只好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良知。一些人变成了城市的妓女，贩毒的牺牲者，诈骗新的参与者。

这些不幸的遭遇，成了这个时期骇人听闻的市井故事。虽然他们都知道，毁灭别人的人自己必将被毁灭的道理，然而他们在毁灭别人的同时，并不愿接受自己也被毁灭的严酷现实。

不过，范萍就幸运多了，我告诉她，目前地处农村的学校严重缺少师资，估计十几年内这个矛盾无法解决，就在蔡家的几所边远学校都在请代课老师，工资虽不高，但也够一个人的生活了。只要肯钻研，肯吃苦，走上讲台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如果她愿意从事这项职业，我愿为她提供辅导。

建议她暂时到边远的学校代课，再看今后的情况来寻觅新的就业机会，总比在社会上瞎撞强多了。经过我这么建议，她决定跟着我们回蔡家场去。

从成都返回重庆，在母亲那里住了四天，我就和范萍一起回北碚，将她送回她母亲身边，母女相逢酸辣苦涩自有说不尽的心里话。

这一段初闯社会的经历给她多深影响，她虽没说，但从以后她一直忌讳提起这段遭遇知道，给她留下了一生难以消弥的伤痕是很深的。

回到蔡家场后她安下心来，听从我的意见，就在附近的中小学代课，虽然代课的工薪十分薄，但也够她个人糊口了。

第三节：峨眉游

当我们从黄许坐上回归成都的火车时，三天来在这里碰到的种种不愉快终于结束，解救范小妹的成功，虽可以告慰我，但她回到重庆是逃出了一个罪恶深渊，还是失去了一个求职的机会，是好事还是坏事？要等今后下结论。

我们在回归重庆之前，按照原订计划，便是游览川西坝子的名刹古寺。

记得我们在杭州居住的三年里，随父母游于西湖，我特别喜欢天竺、灵荫两座宝寺。现在还能想起每当我走进那林荫覆盖的寺前小路，就被随风吹来的香烟和隐约的颂经声所吸引，仿佛已进入了一个神灵居住的仙境。

走进大雄宝殿，一股天地灵气会使我肃然起敬，不由自主双膝便跪在那高大威严的如来尊者脚下，清理自己浮躁妄动的心。次数多了，灵荫寺的老主持便认识了我们。

有一次，他抚摸着我的头，对母亲说，“阿弥陀佛，这小施主人面善，我观他与佛有缘，他有善根哪！好自尊重吧。需知，从善者得善，无缘者舍之，全凭自己的造化了！”当时我睁大了眼睛，揣摸他话中的意思。

外婆是常年吃素的，在她开导下，我常用零花钱去赈济沿街行乞的残废人。

而今三十多年过去，回想在狱中逃过几次杀身大劫，便以为是佛的救助。我自悟此生苦不堪言，归结于种有恶因。所以在我的内心恶念有一念之差，干过蠢事后，都必在事后加以忏悔。友人劝我在大难后，看破红尘，从此遁入空门，求得解脱。

只因畏惧修行之孤单，于是虽有从佛的意愿，却仍徘徊空门之外。不过我是报应论的信徒，所以我在佛祖面前坦露心扉不敢隐瞒，抱定万事随缘的意念。

游历名胜，阅览中华千古文化仍国人之共同心愿，总想亲身体验暴政对我中华文明之破坏。所以在菲薄工资中省积了两年，以供旅行路资和生活所需。

同行四人中，各怀着不同的心情难以叙说。母亲抱定求孙的宗旨最是虔诚，刘启建心里在想什么她没有吭声，范小妹在经历了这场历时两个月，初逢社会的惊吓正在反思，所以很少说话。四个人复杂矛盾心理作用下，使这次旅游带着说不清的味道。

乘车从成都出发，抵灌县后，中午时分，我们在县城一家小饭馆里吃过午饭，便徒步从灌县城向青城山攀登。

时值盛暑，我们沿着石板路，一阶一阶向上走去。幽静的小道两旁浓密的林荫之中，蝉声缠绵，像唱不完的迎宾曲，起劲为游人鼓劲。到了长生宫，参天的大树已将酷暑挡在幽径的外面，气候十分凉爽。

三十年来母亲是第一次出远门，毕竟年纪大了，能够徒步十里已很不容易。怀着新鲜感，她一路上询问所到处的小地名，以及这些地名的由来，说明她对美好生活仍怀着渴望的激情。

将到天师洞，那盖定集仙桥的浓荫，使古道特别幽暗起来，空气变得压抑，仿佛许多的精灵聚集在桥洞中，把世间的仇杀、冤恨，统统挤到桥的入端处，我相信有意上得此山求清静的香客们，会从这里找到新的灵感来。

如果有在政坛上叱咤过风云的政客，或在战场上显过战功的老将，双手沾着他人鲜血的人，一定会在桥下的淙淙流水中，洗净身上的血污。

人生骄娃和失意者，当回忆自己一生所造下的孽债，在此领悟万事皆虚仰天长叹之余，所剩下的只有在玄虚的妙境之中，生出悔恨二字来。

我看见那些长跪在天师灵麾下的，不但有善男善女们，还有面带凶相，似有过嗜血经历的顽凶。那凶恶的毒魑，口吐毒雾在用权欲，财欲迷窍着人的良

知时，将丑恶不断洒向他们。

当我们快进青城山的山门，在夕阳的斜照下，仰视上清宫闱的苍穹，俯身去拾掇那些刻在石碑上的经文时，我的心被古代的圣灵洗涤。在巨大的香炉面前，凝视那一缕直冲太极之颠的香烟，我的心溶解在那袅袅直上的青烟中。

天地渐暗，太虚之中，万物伏地，唯有瑟瑟作响的晚风，给人清凉的爽意，四周是那么肃穆。突然间，一记宏亮的钟声，使那些圣灵脚下山谷里，还在胡撞乱荡的恶鬼，也心惊胆战规规矩矩，伏听天尊讲那惩恶扬善的训戒。

当夜，我们就求宿在上清宫玉皇尊者的脚下。

第二天天刚拂晓，西边山脚下刚现鱼肚白，我们用过寺庙的斋食，四个人缓缓下得山来。走出数百米外，我还在一步一回首，从不同的远近再次仰看太虚之颠，一再聆听从那上清宫里传出山来的隐隐钟声。

此时我感到遗憾的是，忘记了带上笔记本，没有记下那隽刻在石碑上的碑文，但我一路还在咀嚼昨夜青城山顶元始天尊的布道。

从灌县县城出发，绕着环山路蜿蜒十余里，去二郎庙。公元前 256 年正秦始皇统一六国，举兵韩赵之际，蜀郡郡守李冰率领蜀地百姓，深沟作渠，低滩围堰，分洪成功。原来这蜀地，雨季淋淫，水患横溢；日出骄阳，千里干旱的地方，从此旱涝保收。

川西平原十三个县，从此成为天府宝地，两千多年涓涓流水不断地灌溉着这千顷良田，长年使这里的大地披着碧绿的盛装，一年四季五谷丰登。

二郎庙前蜿蜒的山路上，老百姓和游人沿路供着不绝的香火，李冰父子的塑像目光炯炯，二千年凝视着眼前这都江堰，好像在讲天经地脉，又像关照着他脚下的子孙。一路上进香的善男善女络绎不绝，他们所供奉的香火是中华民族居安思源的寄托。

他们雪亮的眼睛里有一杆称评人间善恶的公平秤，他们绝不会忘记给他们创造幸福的先人，也不会忘记给他们带来灾祸的混世魔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所造下的罪恶，他们都铭刻在心间，谨记着这历史。

九江东去，佛法西来，我们乘车南行，傍晚到了乐山。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来到凌云寺前那百丈巨佛的脚下。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初建于唐玄宗年代，直到唐德宗才修成，历数十年之久。

当我从大佛脚下，凝视三江口，向外望去，江水浩浩荡荡。岷江、青依山、大渡河三种颜色不同的河水汇聚在此，合成一体，清浊分明，其景甚壮。

传说当年三江在这里初汇，恶风凶悍，浊浪排空，常将航行到此的船只无端的冲去触礁，沉没江底的木船无数。

当年有真人骑兽而过，对当地的父母官说：“此水怪出没作怪所致，欲止此怪，须面三江而建一如来尊者的石雕巨像，以作镇怪宝物。”说毕，当江一指，一尊巨石，傍山而出，遂驱兽而去。

当地父老乡亲向真人焚香跪拜，便以此石为本，大规模的修凿从此而始，前后凡经九十年，大佛雕成，佛高 71 米，比世界最大的阿富汗佛还高出 11 米。建成以后，果然咆哮不安的三江汇口从此风平浪静。

如来的石像，为航行在他脚下的船夫纤者保驾护航，从此水怪再也没有肆

虐过往船只。

于是，人们从悬岩绝壁上，下到石佛的脚下，沿着佛身两侧和对面的山路凿出石梯小道。最宽的地方也只能容两人上下，并沿着石梯小路，在岩壁修出数百小石洞，其中雕供着上千尊小石佛，其工精美。

唐代佛教盛兴，天子的兄弟玄奘曾出西域西游取经，吴承恩所撰西游记，将神和魔怪写成身份各异的故事。这乐山大佛成了遗留至今的盛唐古迹。

可惜那时这些小小偶像，既没被当作珍贵的文化遗产与以保护，却在一夜之间，被毛泽东指挥的“千钧棒”统统捣毁。**为了树他的皇权竟可以不尊重他人的信仰，可以在一时兴起，而毁掉千年文化，连这些小佛像也未幸免。**

我牵着母亲沿着那石梯缓缓向上登去，此时我才看到在我身边山崖上的小石像，竟找不到一处完整的，我立刻回想到在盐源的洋芋地里，相遇的冷军当年讲的革命行动中一个细节，红卫兵破四旧的疯狂，使小石佛无头缺肢，这些残骸现在依然很凄凉地立在这里，诉说当年毛泽东的恶行。

毛武断的说宗教是虚妄的，其实剥开幻想的外壳，宗教不但反映了人们的善恶主张，还反映了他们对罪恶的一种扬弃。古时的工匠，能在悬岩绝壁上刻画这些栩栩如生的石像，反映了他们内心的千变万化。

坐落在凌云山顶的一片宽阔的石板平台上，东坡楼就立足在这里，据看山人介绍，苏东坡生前的大量诗文真迹，都珍藏在楼中的“文苑之华”里面。文革把这里当成横扫封资修的重点。东坡先生生前的手迹被洗劫焚毁，至今许多散失的文物已去向不明，东坡楼受到空前破坏。

这次亲眼看到那些已空荡荡的文苑书柜，便对过去口口声声标榜，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党棍恶吏穷凶极恶脸嘴，看得更清。

再行五里，便是乌龙寺了，据说这是乐山地区最大的佛家寺庙，当我们向它走近，就被那些隐没在密林之中的梵院寺庙，和远远传来的香烟和肃穆气氛所慑住。进入山门前的小道，进香的香客背着香袋锦囊，双手就已经合十，精神渐入佛境，络绎不绝进得山门，四大金刚威严的守护着山门口，再向里是维陀护法。弥勒在大雄宝殿门口挺着大肚子，笑迎八方来客。

进入大雄殿，十八尊罗汉于过道两侧依次排列，其像貌迥异，佛经中对它们都有过详细的解述，这些形状怪异的尊者，维护着殿堂里的庄严和清静。千罗万幢中，那大雄宝殿的最高位置上，至高无上的阿弥陀佛威严的高据其上。

少年时代，中共教科书，将佛教同其它宗教，一道归并于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将佛教徒，说成是一群靠鬼话来蒙骗百姓的寄生阶层。中共利用执政的权力，强迫僧侣还俗，将寺庙的田园宅地荒废了，捣毁了。使那些“泥菩萨”陷入了几十年灭顶之灾。

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又怎样呢？共产党的整个统治在无神论的天地里，为所欲为，因果没有轮回，善恶没有报应，精神上失去约束的人，借口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把人性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把道德说成是虚伪的。于是人类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宗教文化全被毁灭。人和人之间赤裸裸仇视外，便一无所有了！

而今人们才开始反思，开始顿悟，思想家们终于明白剥夺了别人，其实也就剥夺了自己。植根于人民之中的宗教信仰，实在是社会道德的一种补充。既

不能破坏，也无法破坏。

广大农民把这些年所受到的灾难，归之于得罪了天地众神，于是在民间，那些为防止灾祸的天地君亲师牌位从新供奉了出来，最终还是召回了曾被社会摈弃的神。相反，共产党的信仰危机却出现了。尽管中共目前仍然想用霸道的方法，让人们接受他们的那一套，结果肯定适得其反。

我之所以笃信因果报应，根本上因为我是一个受压迫的弱者，监狱中所受残酷的压迫启迪了我，往往我用命中注定来解释所遭的恶果，更容易解释我面临的厄运。生活树立起来的信仰是不能用唯物主义来替代的，中国大多数从毛泽东暴政下过来的人，大抵都会有这种切身的体验。

此刻我被那高大阿弥陀佛的庄严所折服，从他那身后的灵光中受到启迪，真诚地忏悔我一生中的罪过，心中杂念也收敛起来。

汽车到达峨眉山脚的报国寺已是中午时分，在那里的餐馆里用过中午饭，从报国寺乘车抵达清音阁，已是下午五点钟了，清音阁底谷的泉水清凉宜人。从清音阁沿着陡峭险峻的山路通向云雾重重的金顶，一般年轻人只消一天时间。然而我却要携着老母亲一步步艰辛地向上攀登，至少也要花三倍的时间。

我们决定歇脚，在这里留宿一夜养足精力，准备第二天攀登。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同在这里过夜的游人一道，开始了第一天的登山旅程。在导游的指点下，我们这一支向着白龙洞方向前进。山间小道走起来很崎岖，但另有一种乐趣，每过一处的寺庙，不论大小，我都会虔诚的礼拜，让缭绕的香烟把我包围。

到达洗象池，金顶距我们已经不远。天色已晚，住在洗象池的大客房里，准备明天一早，登上峨眉山巅看难得一见的“日出”和“佛光”。

这夜正逢我四十五岁，三个人将我围在客房中，大家祝我生日快乐。刘启建还专门的买了一瓶精装的文君酒，四个人都不喝酒，只是登山三天来大家都感到腰酸背疼，借酒驱散高山的凉气和疲劳，每个人斟了半杯酒，酒一下肚，心里热辣辣的，似乎有了醉意，为了第二天登金顶，大家早早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为了赶看日出，我们在早上五点钟便起身向峨眉山之颠进发，因为光线暗淡，走在山路上高一脚低一脚，我看到母亲走路特别的艰难，问到她才告诉我她脚上打起了泡。

这么长陡坡中，她能在我的搀扶下，一步步登上山来已不容易，此时一来怕天黑道路不平，在她精力不济时跌倒，二来也赶个早，别因她步履艰难，延误了观日出的时间。就在洗象池外，我为她雇了一个专门背旅客的“背夫”，我仍怕背夫因天色未明出事，便紧紧跟在后面，叮嘱小范和刘启建尽快跟上。

六点半钟，我们终于登上了天下名秀峨眉山之颠的“金顶”。

平目望去，一轮红日在云海中喷薄而出，整个山头已被朝霞染红，如蒸汽如棉花的白雾，已经退到脚下，将下面的人世与我们隔开。

金顶海拔 3100 公尺，西望天府平原，北瞪贡呷山脉，当红日一出，顿时气清云朗，一目望去，穷极宇宙。只那白雾阻断的千沟万壑，好像仍不能看破。

忽而，一片白云从南边急速涌来，顿时四周茫茫四裹，咫尺之内朦朦胧胧。一会儿从北面扫过来一阵轻风，将白云卷去，好像谁一声号令，先前的白雾渐

渐退去，再细看那兀立的群峰，青翠碧绿，一个个隐隐地站立在在沟壑深处。

当山脚下的雾渐渐退去，就留得几朵游浮于山峰之间的彩云，若那云头上站立的是仙人，告诉人们，今天群仙又要在这里聚首，那朵朵白云上下颤动像是神仙在磋商。快乐无过于那些无拘无束的神仙们，他们今天的聚会是巧合，还是预先有约？

此时我睡在宽阔的草坪上，一如睡在软绵绵的云端。好想纵身跃进那浩瀚的云海中，去洗洗这二十多年地狱留下的积垢，再学学那些快活自由的神仙，超脱自己，让我的心不再积郁和忧虑。

仰视兰天，品味着无穷天籁的奥秘后，我俯身去抚摩那突兀而立的山崖，被那些附在悬崖壁上的山花吸引。红的，白的，黄的，星星点点地分布各处，一丛一丛到处都是。她们向朝圣者招手致意，在山壁上发出清脆的笑声，平添着绝处的生机，令人收敛对绝壁的恐怖。

就在那静得可怕，连山禽走兽都无法攀登的绝处，她们也会在那里吟唱山歌。这些大山里的天使，敢在悬岩绝壁上与万神共进野餐，这是那些在温室中芳香迷人的玫瑰，永远不可及的！她们自由屹立在山岗上，留芳在天地中。

再往下滑移，我的目光便停留在那崎岖小路上义务的布施者，那是些为进山拜佛的人铺路修桥佛家俗家弟子。他们在自己铺路的两端，摆着对求过者布施的木匣，那上面写清了铺路化缘人的姓名。

我明白了那山间的小路，原出自他们的一铺一垫，那上面留着他们的汗水和虔诚。看到他们从远处背来的一石一土，我深深为他们的努力触动：只有迈过艰难历程的人，才更加珍惜平坦大道，他们除了用对佛的虔诚去感动那些同样虔诚的布施者，相互间全凭信仰的力量在沟通。

再看那一路上的朝香者，有瞎了眼的，有断了腿的，有失去双臂和已经耄耋的老人，结伴着趑趄在那险恶的山路上。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既是他们的信仰，又是他们对虚妄者的归劝！他们之中必经历过人生苦海，来领受佛的劝勉，求得一个善果。

至于那一路上花花绿绿的少男少女们，匆匆而过，是不会理解的。他们同我少年时代一样，在没有受过生活的煎熬时，是不会领悟佛所指点的迷津。

忽然一个背着游人的背架，在那崎岖小道上慢慢地蠕动，一位力夫，皮肤黑黝，满身泥汗，双颧突出，青筋暴突，汗水像雨注倾泻着他的小腿，向上蹬的双脚也不知在这悬岩山间打过多少颤，那背架上的游人，那些走到这里欲上不能的游人，就靠着他的“铁背”“铜腰”，得以饱览金顶的风采，而一家人的生活便靠他这种卖命的下苦力挣来的钱。

我知道这里没有人比他更苦，需知他脚上的任何闪失，都会让他滚下万丈悬岩粉身碎骨，那背架上背的老人或残废倒不说了，竟然也有的打扇卖俏的公子哥儿和打扮妖艳的少妇，他们那配进入这灵山佛境？如果佛有灵气，会怎样的处置这种人间的不平？我不知道但我相信。

我们在金顶照像，游览，流连往返，直到下午四点钟，一团白雾将它团团笼罩，看样子像要下雨的样子，我才扶着母亲向山下回归。我们从十八拐下行，天色将黑，我们无心赏玩遍山的猴群，终于赶在天黑之前进入白龙洞。

第二天我们回到清音阁，从报国寺乘车回成都的时候，我们这次历时八天的峨眉山之旅，便告完结。

八天留给我们的除了疲劳，便是心理上的寄托，我笔记本里夹着的野山花，便是我最好的纪念。有时候，我真把自己也当成了在这险峻人世中的野山花，然而我心灵的透白还不能像野山花那样的公开，我的片断，我的回忆录，便是我透明心灵的呐喊，但它们也只能掩藏着，否则我就连这一点空间也要失去。

逗留成都期间我想趁此再访故友，1979年我回重庆后，一直陷于‘落实政策’的奔波，有空把精力放到“片断”的撰写，竟没同陈容康和张锡琨大哥保持经常联系。此时当我再寻西城大菜市，那儿正在拆迁，老陈的窝棚不知搬到那里去了。问到解放中路1268号，干脆就没找到这个地方。于是从此断了同他们的联系。

我到成都前后四次，第二次是十六年前，即一九六六年春天，被盐源农场的狱吏们“押着”来成都“参观”，既要无端的残害百姓，又要让受害人唱颂歌，这便是近代专制主义的丑恶心理。那次成都展出的全国五十二面大寨红旗巡回展出的图片，就是在花会期间在青羊宫里展出的。

然而在这次参观中我回答当局的是一篇：“从南滚龙沟这面红旗看大寨精神”，令盐源农场的管教当局瞠目结舌，我将“大寨精神”与“大跃进”联系起来，得出“劳命伤财”的结论。因为文章的全部依据均出自毛氏自己拿出来自吹的东西。

而今往事过去，故地重游，当我寻找当年参观大寨图片的展厅，却没有找到。问到青羊宫里的游客他们都摇头，中共已对这“大寨”绝口不提了！遗憾没有清算，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了！

去杜甫草堂，这里已经培修。当年诗人穷居恶卧的故居，记述着一个傲骨清风的伟大作家到了晚年拮据渡日，终老他乡的经过，不禁令后人为之伤怀。诗人当年的心怀，今人又有几个具有这种情愫？后人将宋的陆游和清的黄庭坚共祠一堂于此，号称三圣堂，以表达后人对伟大宗师的缅怀和敬仰。

历史对于那些敢于抗拒独裁统治的作家，几乎安排了同样悲凉的一生。这使正直的作家难以保持文坛的神圣。随时俗，无聊文人多的是，有的是统治者奸佞的吹鼓手，有的以迎合市俗们庸俗的口味。将一些污浊的垃圾充塞书刊，纯粹不以触动统治利益而苟活。

然而，历史又将那些伟大的作家供奉在文坛正位上，使后人永远纪念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文学专门家。这证明人心追求光明，正义依然是社会的主流。

武后祠，我是第一次来拜谒，提到它，我总是同那篇伟大的唐诗联想在一起：“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陌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一代奇才诸葛亮辅蜀汉后主，以三分天下平息大乱，得到一个休整社会的‘三国’时期。

近代的一些政治家包括赵紫阳也曾在这里抄录下一些史家的名文匾录，我想人心向往和平民主这种共同的追求一定会决定中国的未来。

从七月二十日，我和母亲、刘启建三个人在菜元坝乘火车到成都，到八月十日回到重庆，整整二十天的成都、峨眉之旅便结束了。

行程的回眸，所见一幕幕交织在我的心头，错综复杂，尤其是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时期破坏的痕迹，当年我们在监狱中备受独裁统治的煎熬，而我的国家却在暴政中被蹂躏，大陆至今仍那么贫穷，不正是独裁的杰作么？

当火车载着我们四个人回到重庆带着不同心情一齐回归！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会心情舒畅的再重游峨眉，看到她变得灿烂美丽？

母亲仍暂住市工商联的招待所，距火车站仅仅只有一里之隔，我们决定暂时在母亲的住处休息几天。

她到重庆财经学校已有一年多了，靠刘昆水先生支持以及周围那些与她有过相似遭遇的同事帮助，她开办的幼师班已经招了两届学员，这些人毕业后充任了工商联在市内所办的各地幼儿园的老师，受到好评，解决了当时奇缺幼师工资。

由于母亲心情比过去开朗得多，她的面容红润，身体健康得多了。她每每讲到李重生夫妇对她的照应充满了感激之情。她告诉我说，四个月前她得了一次急性肠炎，腹泻不止，人也几乎虚脱，全仗重生把她背上背下，送附近医院抢救治疗，才使危险过去，几天就恢复了健康。

后来，由母亲作媒，重生娶了媳妇。我们在工商联短短暂停的几天，就得到他们夫妇俩热情的照应。母亲每谈到这段晚年的流浪生涯，她都显出一种幸福感。可见在蔡家场的二十多年间，**蔡家医院的“造反派”对她的伤害有多深。**

“四人帮”跨台，邓小平粉墨登场，为清除毛泽东死党的政治需要，借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对各民主党派许以相互监督，共存共荣的诺言。

使已进入棺材的各民主党派有了还魂的机会，保持这些党派名称并在政府的席位上占着一个头衔，例如各级政府机构中保持一个“付县长”“付市长”的职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都给一个付职。

但这一打一拉，因为出手太重，实际上早使小伙计怀上了鬼胎。言行那敢违背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大哥？那曾在建立民主党派初期有过的为民请命的阳刚之气早以殆尽，实足变成了专制主义黑幕的遮羞布。

第四节：第二次落实政策

像我这种既不沾亲带故，又没有重礼相赠的书呆子，要想毛遂自荐正大光明讲我的学历和专长，那就准碰软钉子，若靠我的骑术我就一辈子也找不到马的，好在我心里明白，我的调动除靠上级硬压是没有别法了。

1949年父亲将我们全家寄住北碚后，我们全家就从此时开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狱里经历了长长的练狱，1962年外祖母在饥饿焦虑中去世，已戴着右派枷锁的母亲，在当局强迫下带着十八岁的弟弟，悻悻惶惶从北碚街上“流放”到偏僻的蔡家场。

经历了漫长的三十五年，直到1984年我们这个从新组成的家，在各方支持下才从蔡家场从回北碚。

（一）重回北碚

1984年7月我还守在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的课堂里，从报上得知市里由重庆人事局牵头，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人才交流会”，我决定去撞一撞。

正逢暑假，我便专程去了重庆大学，我因获悉，当年划我们为右派的朱批人，宋殿宾已“落实政策”官复原职。这位宋书记在文革时期，因妻子张大珍被划地主份子，撤去卫校党委书记一职，并交农村监督劳动。

中共重庆市委，责令他在爱人和党籍间选择，这位宋殿宾因不忍抛弃爱妻和两个幼小的孩子，拒绝党委离婚的“忠告”，因而被打成重大的第二号走资派，削去重大的所有职务，还将他贬到卫校去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

派给他的工作就是打扫厕所，从此整整十三年，在厕所边将孩子拉扯大，自己也亲自尝到了共产党整人运动的滋味，对当年无缘无故由他朱批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右派们，才产生恻隐之心。

当1978年母亲找到重庆卫校，请他为我当年冤情作证时，他便写了材料，使重大落实我的政策时，减少了不少麻烦。

1983年春天，母亲在重庆财经学校工作仅一年半后，刘昆水创办的财经学校因为经费上的困难，决定裁减最初设置的专业。

工商联的头头，对母亲长住招待所也表示了异议，说母亲占用的是工商联用来招揽客商的经营性客房，从来没有住过本单位的职工。刘昆水和母亲商量结果，母亲决定辞去财经学校的工作，于五月份从新回到蔡家场。

刘昆水为了表示他的歉意，专门用配给他的黑色伏尔加轿车，送母亲回北碚，并亲去北碚区委统战部，请求他们考虑在北碚为母亲安排一个工作和住所。

蔡家场本来就是一个偏僻的小村镇，八十年代初，在横贯小镇的马路上只有几架由农家装的手扶式来回奔跑，充作小镇的运输车，虽然它那令人耳聋的巨响和浓浓的黑色废气令人烦躁，街上的居民也生活在废气排出的浊气中，但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习以为常了，手扶式成了镇上人唯一代步工具。

唯一沟通蔡家场和北碚的公共汽车已破旧不堪，虽说从蔡家场到北碚的车票仅仅只有一角二分钱，但穷苦的蔡家居民也要算着来，能搭上手扶式的就是再危险都要挤上车，他们把命看得很贱。

除此外便是北碚物资局的几辆绿色解放牌，以及灯塔乡的八四五厂过路的东风牌卡车，蔡家那十字马路上很少看到小轿车之类的“洋车”。

当母亲乘坐的轿车，从场口向蔡家医院缓缓驶近时，蔡家街上所有的街民都投以好奇的目光，他们心底里在嘀咕：不知道又是市里的那一个重要官员来视察了，万万没想到车里面坐的，竟是过去被医院整得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方老太婆。

黑色轿车在医院的大门口停下来，母亲从车门里走出来时，正好王明站在门口，他一直眯缝着眼睛注视着从场口向医院缓缓开来的这辆轿车，心里产生

着各种猜想，却完全没有料到这是专门送母亲回来的车。

车停稳后，从车门里走下我的母亲时，这位王书记用笑脸向母亲迎了上去。一面喊坐在挂号室里的小曹和药房里的小李，要两个年轻人赶快去提从车上御下来的两包行李，医院里的护士都出来迎接，一时热闹得很。

我接到母亲回到蔡家医院的消息，从二十四中赶回医院时，母亲的房间里聚着小陈、小周和王书记。王书记正在吹捧母亲在落实政策以后，如何焕发出“革命的青春和活力”。

他当着母亲的面说道：“自从你走了，我们才知道你起的作用，你移交的三个工作，挂号、出纳和伙食采买，现在是交给三个年轻人在管，要他们任中兼一点工作都不干，而且还干不好，上个月出纳就错了三百元钱，这么一对比，才显示你老人家才是我们医院的老黄牛了。”

两个年青人不高兴的看了他一眼，显出很不屑的样子。他对母亲另眼相看，是因刘昆水的关系，还是经过对比的确改变了他原来的偏见？但想起两年前他在母亲分房时的那付脸嘴，对比现在，使我产生一阵阵呕心。

据他本人介绍他的母亲过去是要饭的，当孩子的他，常跟母亲拿着打狗棒沿街行乞，看来他真的“根正苗红”，是共产党的真正依靠对象。可是为迎合我们，常把攻击共产党挂在口上。

不过我心里倒是生了警惕，大陆人生活在这种人的管理之下，可要十分小心，切切不可随便附会他，以免在莫明其妙时从遭“祸从口出”之难。

当时北碚区政府正在组织力量编写北碚地方志，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修史小组。从图书馆和文化馆抽人收集材料，母亲就被定为修史工作组成员，在编写工作地腾出一间小屋供母亲临时居住。后来她又在卫生界朋友的帮助下，长期居住北碚，摆脱了蔡家医院这个囚禁她二十多年的人间地狱。

骑马找马’是刘老教给我的方法，但要调出蔡家的路，还得自己去找，到北碚统战部去了几趟，我说我的母亲既然已经到了北碚，那么当初将我安置在蔡家的理由已不存在。统战部是老吴却说：“你看吧，在我们的管辖区域和权限范围之内，有那个现存的单位空着位子来安插你，你最好自己找单位吧！

1981年，宋殿宾回到重庆大学“官复原职”，他的夫人也调到了重庆大学，只因我在二十四中，并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我回到重庆大学，讲明重庆市人才交流的几个要求，请重大党委为我进一步落实政策时，才找到宋殿宾。他当即叫我去找重大的校长张文澄。

同我们一起划为右派份子的张文澄，原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团委书记，1978年获平反后，1981年接任重大党委书记。按宋殿宾指出的路子我找到张文澄时，他正被任职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并且正在办移交手续。

张文澄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一方面要我去找重大的第一付书记高某，对我重新落实政策，一方面打电话给市委宣传部，由他们出面对我的工作从新安排，不过市委宣传部说他们没有办法强行的安排我去那一家工厂，建议我自己就在北碚地区确定一家最满意并愿意接纳我的单位，再由他们出面调动。

我本人是学机械的，能够吸收我的对口厂，在北碚地区恐怕便是地处区中

区的重庆农用汽车厂了。凑巧这家工厂的党委书记彭季灰的爱人周生碧，正是当年母亲工作的北碚托儿所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此人正是当年划母亲为右派的负责人。

后来的二十余年间，除了我和我母亲被划为强迫劳动的“专政”对象，剩下一个七旬的外祖母和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弟弟，都因黑五类，受尽生活折磨和精神迫害。

二十五年过去了，冥府带走了我可怜的老外婆和稚气的弟弟。

现在我的母亲找到这位周生碧，请她出面向她的老公推荐接纳我进入这家工厂时，在良心发现下，当即表示接受母亲的委托。

就这样，我在张文澄，宋殿宾的帮助下，重大校方从新做了对我个人的改正决定，除换掉了 1979 年发给我的肄业证，补发了重庆大学的正式毕业文凭，确定了以 1958 年开始计算我的工龄，还专门加了一级工资。

当我一手拿着张文澄给重庆市教育局长的信，在得到市教育局批示后，责成二十四中立即放人，又拿了市委宣传部和重庆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批复，到重庆农用汽制造厂，换得了由该厂厂长亲自签署的调动令，我的调动就在短短一个月内办妥！

（二）：搬离蔡家场

我很明白，对我个人的落实政策的进展之快，全因毛泽东淫政之下共产党的分化，没有对宋殿宾的十三年惩罚；没有张文澄再次复职；没有孙起孟和刘昆水这些从地狱里活着出来的民主党派人士相助；和周生碧的良心发现，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凭什么说调动就调动了？我算“右派”中与命运抗争的一个特例。

工厂的劳动人事部门虽有许多调进调出的事。但工厂管理者并没有引进人才的热情！自从政府提出人才交流以后，超编制的企业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规矩：求调人首先要得到本单位头头的点头。其依据除了行政的安排，便是厂长指令，根据从后门涌进来的亲朋关系，掌权者进行着权力交易的平衡。

求调人若没有很硬的‘臂膀’，在调动时，必须准备给工厂人事部门送上一份满意的礼物。一切摆平以后才能谈调动！至于调进的人，是否合乎工厂发展的要求，那是只有傻瓜才会摆在第一位。

所以，没有关系的人要调进一个企业，提着调令和档案来人事科，科长会坐在太师椅上接过介绍信，连看都不看就塞进了抽屉，不屑的回答你：“等领导研究后，再通知你。”你若急着问：“要等多久？”那科长必会冷冷的答道：“办事得有个过程，这工厂又不是为你办的。”

当我提着档案袋到重庆农用专汽制造厂到厂长办公室报到时，接待我的党委办公室周主任，接过介绍信后，满脸堆笑，热情表示对我欢迎。他说：“新上任的厂长李友正缺得力的帮手，只是眼下工厂还相当困难，所以不能解决我的住房问题，请我暂时克服一下。只要工厂一有起色，什么问题都好说。”

据说这位周主任原来是新任厂长李友的姐夫，李厂长的姐姐是中共北碚区委的组织部长。我一来就碰上了这种与地方亲上加亲的裙带关系，知道这本是中共基层组织多年形成的关系网，同这些年吃党饭的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以我为人耿直的秉性难于适应，所以还是对他们取回避为上策！

所以我从进厂的第一天开始，就像孙悟空撞进了玉皇大帝的蟠桃会一样，应付着眼花缭乱的新环境，适应它，干我自己想干的事。

由于农用汽车厂没有房子可分，搬家前我同刘启建商量好，暂住在天生桥她的父亲的旧房子里。

我们的家便于 1984 年 8 月底搬离了蔡家场，经历了整整二十五年，家破人亡后，只剩下母亲和我，费尽周折，我们才从回北碚街上。

就在我家举家迁到北碚不久，接到刘昆水先生寄来的信，这封信仍寄到二十四中，由那里的老师转给了我。在这封信里再度重复我骑马找马的老声长谈。

母亲在北碚区参加的编史工作已告一段落，又碰到了当年在北碚炼铁厂一同接受监督劳动考查的患难之交，原卫生局的一位右派科长李秀贞在卫生局申办了一个为病人就诊的门诊，取名缙云咨询门诊。

母亲在李秀贞的邀请下，参加了这个门诊的组建，并在正式挂牌营业时，担任门诊的挂号和财务工作。这个门诊集中了北碚地区有相当名气的老医生，他们除了医术，还保持着较良好的医德，所以，求诊者门庭若市。

第五节：卢文南

这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母亲在下班回家的归途中，与一个拖着板板车，穿着褴褛的中年人邂逅相遇，当那名汉子走到母亲身边，突然把板板车停了下来，并且呼喊“妈妈”时，她才认出对方来。

原来他是二十年前我弟弟的电力学校的同学，名叫卢文南。他的母亲原是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份子，与我的母亲在北碚炼铁厂一同接受“监督劳动”。1962 年母亲从炼铁厂调到蔡家医院时，她仍留在北碚炼铁厂。

卢文南与我的弟弟在电力学校毕业后，两人同时下放蔡家农村，在同一个生产队落户，算得上黑崽患难之交，只是卢文南生性比弟弟更懦弱。当 1967 年弟弟贸然离开蔡家场时，卢文南却因害怕没有跟着去，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弟弟一去不返，卢文南随即也离开了蔡家场，从此以后，两个孩子便与我的母亲失去了联系。

现在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的他，顶着一顶破草帽，遮着那张冷得铁青的脸，瘦削的身子在寒风中瑟瑟作抖。认出他时母亲几乎惊叫了起来，蔡家一别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看到这孩子了，而今见到他如此狼狈，不但十分可怜他，还勾起她对失踪多年小儿子的思念。

弟弟失踪当天，母亲曾到他们住的那间小茅屋里找到他，问起弟弟去向，卢文南根本不知道。而今站在面前的他像一个被人遗弃的乞丐儿，心中好不心

酸，一面叫他把板板车停在路边，牵着他的手问他妈妈现在那里？

文南只是摇头，好像有许多苦水堵在心里不能吐出，母亲牵的那手正在发抖。看看时间，已近六点，天正黑下来，便在附近面馆里给他叫了两碗杂酱面，一面仍不停地询问他住在哪里、母亲的近况以及他现在如何谋生？

卢文南在那面馆的长板凳上坐定，两眼直楞楞看那灰色的大街，那形态使母亲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向他提问，他依然一声不吭。等到两碗面端上小木桌，他并不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看他那饿极的样子，母亲心里想着自己的儿子，说不定现在也像他一样，潦倒地流落在不知哪个城市哪条街口？

第一碗面已经下肚，文南脸上也由青色泛出了一点红晕，精神似乎也恢复了一些，才慢慢地讲话：他的母亲已于前年死于肺癌，当母亲撇下儿子而去时，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便是几十年来母子相依为命，所住文星湾半山坡又矮又潮的破瓦房。

破瓦房几十年来没有变化，那里是北碚区的贫民窟。留给文南的两间破瓦房还是解放前他父亲购置的遗产，那时父亲在国民政府里当雇员。

“解放”以后，共产党以他的父亲历史罪抓捕了他，那时文南仅只有八岁。后来母亲好不容易通过民政部门，谋到了一个在西师图书馆担任管理员的工作，勉强维持母子俩的生活。没想到 1957 年他的母亲被划成了右派，从此更大的灾难便降临到他们娘俩头上。

把两碗面吃完，卢文南继续讲自己的遭遇：母亲获得西师平反后，并没有回到原来的图书馆工作，说她已到了退休年龄，所以给她办了退休手续，每个月发给她三十元的退休金，母子俩就靠这点退休金维持着活命。

卢文南多次去找电力学校和街道，要求给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但是他们说你是一个弱智，什么都不能做。母亲多方托人，始终求职无门。

后来妈妈单位工资改革了，物价也跟着飞涨，几次退休人员增加的工资抵不上猛涨的物价。1982 年基本生活物价涨了两倍，而她的那点退休月工资却仍只有五十多元，生活一天天更加贫困，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母亲终于病倒，因缺钱上医院，只找了小巷里的游医抓了点草药，聊以应付。

等到她大量咳血时，已经难以起床，医生诊断说她得了肺癌。

母亲眼看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求一条生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由儿子搀扶着到街道办事处，请他们可怜他们母子两的悲惨命运，无论如何在她死前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个职业，以求谋生，哪怕是扫大街，或拉板车当苦力，只要有口饭吃怎么都行。

在那个年代里，街道办事处之类的中共下层机关，如果没有特殊的人际关系，又无靠山可傍，就凭那一贫如洗的脸嘴，谁会伸出同情和援助之手？憨厚的卢文南依然眼巴巴守着家门口，望着过路人发呆。

带着垂危的病体，母亲最后一次到区委统战部去，请他们为孩子安排一个工作。

统战部的官员说：“你现在提出来的，已超出了中央落实政策的范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但看在你得了重病和你的儿子的具体困难，我们仍在考虑怎么

来解决，你还是回去等着，一面静静养病，一面等一段时间，今后还是由街道的办事处来具体解决吧！”

于是把“球”从新踢回街道办事处，这么一踢，不但无助于文南困难的解决，还得罪了街道的头头。

等到卢文南再度找街道办事处时，那街道办事处的老头昂着头，鼻子里哼着冷气，冷笑道：“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还想跑到上面去告状，老实告诉你，万丈高楼平地起，象你这样的问题，还得靠基层。”

按照下乡知青返城的有关规定，当年他也该由街道或民政部门在城里安排工作，也不知什么原因，那时他就没有搭上返城知青的车，从蔡家回来便是一个无业游民，在贫民窟中，混到四十岁了，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打着光棍的卢文南，眼看母亲病得奄奄一息，却无钱无力将她送进医院。最后几天，守在西师的卫生所里看着她闭上了眼睛。同他一起办理丧事的是他住在合川县的一个姑妈。

母亲草草安葬后，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还有十个月的退休金作她的安埋费，他悄悄的把他母亲的骨灰，安葬在松林坡的一棵大树下，就守着那大树，痴痴地过了三天三夜，他希望与死去的母亲，这么永远相倚的陪伴着。

母亲去世后，卢文南失去了生活来源。姑妈帮助他领出了所有的抚恤金，叫他去河边的码头做点小生意，开始他早出晚归，挑着箩筐做点河边菜贩子打出来另卖的小菜生意，不料他因为人呆板，不善于观察行情，小菜却卖不出去烂掉了，把本也亏了，只好另觅生路。

看他形同乞丐的样子，产生了恻隐之心的一位紧邻老大爷，给他找了一架破旧的板板车。每天他便拖着车替附近的商店里运点货得一点报酬，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日子。每逢自己生活过不下去，几顿没有饭吃的时候，他都要跑到埋葬他母亲的大松树底下，默默在那里哭泣。

他讲到这里，伤心地哭了起来，天已黑了，街上的路灯早亮了，看见他精神振作了一点，估计是两碗面的效果，母亲还要给他再下一碗时，他却摆摆手！依然呆呆的坐在那长凳子上面，望着沉沉黑下来的天空发呆。

两个母亲遭遇如此酷似，成了她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原因。

如此又沉默了一段时间，母亲关切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不料这一问却猛扎了他那根埋得很深的神经，他忽的从木凳上站了起来，好像在用力挣脱钳着他喉咙的无形铁钳。眼睛里闪出一股怒火，闷声地喊道：“反正活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用我的一条命去换他们的两条命，也赚个对本，值得了。”

听得出这是郁积在他内心酝酿了很久的打算，带着以命抵命的决心，用砸碎这吃人世界的最后一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他要同归于尽的是谁？是街道办事处欺他太甚的“头”，还是在他脑海里无时不在浮动的魔鬼？然而他咬着牙再不吭声了。

母亲心里明白，越是沉默，这孩子就越处在“风萧萧兮，易水寒”之中。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年代，就不知有多少被欺凌的弱者，积蓄着仇恨，随时都会被引爆！！抢劫、杀人中有多少出自悲伤？社会没有引起关注！是故意漠视这些现象，还是社会有意回避这些？

现在母亲完全相信，这个小时候性格内向，从不多话的人，并不是一无感觉的痴呆。那心里可是郁积了随时可能让人粉身碎骨的一团复仇怒火。既毁灭自己，也消灭对方。

为了拯救这孩子，她想扑灭它。想到这个孩子的危险和可怕，连连叮嘱他看在他母亲在天之灵份上，千万不可造次，一定冷静处理，何况天无绝人之路，总有一天他会得到母亲的保佑。！

临分手时，母亲打开皮包取出五十元钱塞进了他的衣袋，并且把我们住的地址抄给了他，关照他，今后如果遇到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就到天生桥来找我们，叮嘱他坚强地活下去，看看这个世道还会变成什么样？

听罢母亲这一段叙述，感到对这个以强权欺凌弱者的社会，光同情卢文南的遭遇，是无济于事的，今天连在报纸上公开为之呼喊不平的自由都没有，这种不平何以消弥？

像街道办事处的人们的恶棍，谁又能动他一根毫毛？就是他们做出贩毒，聚赌、窝匪藏盗，逼良为娼这些危害公众的事尚且无可奈何，何况像卢文南这种只能归错于“落实政策”不力的悲剧！就更难解决了。

我自然想起了刘昆水老先生，一来，他本人有过类似的遭遇，对卢文南现在的处境不可能无动于衷；二来他身居重庆市的要职，作为“父母官”请他为一个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害者的遗孤作主，向民政部门反映，促使北碚地方官，给卢文南安排一个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

虽然这两三年来，我个人请他帮助，另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被他用“骑马找马”搪塞了毫无结果，但像卢文南这种需人救命的事，他该不至于拒绝。

出于这种估计，于是便提起笔来，为这件事专门的向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两周以后，便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回信，信上说，他正在开政协会，工作极忙，所以只在会议的空歇时间抽出时间，回答我给他提出的问题。

我想他能认真阅读我的信，并及时答复，是中共各级组织不可能办到的。

怀着一种敬意细细读信，那信的前半段讲共产党的人事安排，奉行逐级管理的原则，接着便说他个人无权越级给任何人安排工作，甚至于连自己的子女，他也从来不为他们安排做什么。

在申明他本人权限后，点出像卢文南这样的情况，只能由北碚的民政部们根据街道办事处的具体条件来处理。

读到这里我心头纳闷起来，这刘昆水的清官原则本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向他提出了一个有违中共政策的难题，要他破例‘违背’中共“组织原则”，作一椿好事，竟关上了门，怪难为他的。

其实眼下无论那一级中共官员利用关系胡来的事还少么？难道他没有看清当前官场的腐败？他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着想，那自有巴结他的下级妥善代劳，但对这个生存受到威胁的卢文南，他怎么也不能推卸仗义执言的天责。！为了保持“清廉”和奉公守法，连道德正义良心全都可以一古脑儿丢掉么？

需知卢文南的遭遇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啊。

他像站在贪官衙门口的一个乞丐，被挡了出来。即使那坐在官衙位置上的青天大老爷，过去也曾经是乞丐的同伍者。但中国人的品性就像洪承畴被努尔

哈赤所俘，关在满人的天牢里说过的一句话：

“汉人在危难相共时是一条龙，而当共同的危难消失后，就是一盘散沙”。

想到这里，心潮阵阵上涌，便提起笔给这位先生写了回信，那信上除了替文南这位无辜的受害者再次呐喊，呼唤正义和良知，并痛斥北碚地方官吏的麻木不仁。聪明的刘老先生当然读得出这辛辣的指责实际上包含了他本人。

尤其是信的结尾，还从当时正在流行的电影“七品芝麻官”中，录下了其中一段老百姓通街吟唱的歌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作为晚辈，我绝无指责长辈的恶习，更何况一个已为中共入过另册的人，我更要小心讲话。

何况在举目无亲的重庆市，我们就这么一位在我们身处逆境中，给我们多少帮助过的市一级政府官员，更不愿随意伤害了他。

然而，我还是这样的把信封好！交到了信箱里。这大概是二十年炼狱中，注入我秉性中那种横眉冷对当权者的东西，使我失去了对自己的约束力。一笔泻下，觉得自己心中被压抑的折皱得到舒展，而不顾及后果了。

母亲在得知这件事后，曾责怪过我：首先因为造成卢文南目前这种困境的必竟与刘昆水毫无关系。！对罪魁祸首无可奈何，却去责怪一个同情我们的人，必竟是非颠倒了。

再说刘老先生是受孙起孟先生所托，看在师生之谊上，对母亲给了力所能及的照应，这在当时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的情况下，已算是尽心尽力了。现在反倒为卢文南的事，被无端指责不如回家卖红薯，是失礼了。

何况明知他虽挂着官牌，却并无任何实权，对卢文南这样涉及中共的敏感事件，更要看坐在“主席”位置上共产党的脸色办事，他的回信正反映了小伙计的软弱，所以不该对这位善良老人横如指责。

刘老先生从此以后就再没有给我写过回信，我们之间将近三年的通讯友谊，就这么结束了，也许他是真正生气了，也许他理解我的心情，不愿与我一般见识，主动停止这种争论。

我至今回想起来，给他的信中很尖刻的话，不过是把他当作一个长辈，当作执政党的伙计来要求罢了。

过了几天母亲收到了他的回信，提到了我给他的信中指责当官不为民作主的话，忠告我吸取过去的教训，不可以满身长刺去恣意刺伤他人。也罢，话不投机三句多，想刘老作为长辈大可不必这么小气，过于拘谨的做人活得够累。

我虽穷，住的是破瓦寒窑，天天奔波劳累。但却不为五斗米折腰，见人矮一头，能时时保住心中这块自由的福田。而他当他的官，进出轿车，住别墅，但心里未必舒坦。

后来在 1989 年天安门民运中，集中表现了“小伙计”缺乏自信和自尊的难堪。当然，在这个时代，刘老绝对是一个好人，一个直不起腰板的民主人士。

至于卢文南，后来碰到了缙云门诊的那些老医生们，当母亲向李秀英等人介绍了他的遭遇，门诊部便从门诊收入中凑了点钱，卢文南就在大家的资助下做起了小小的百货生意，在满街琳琅满目的摊位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维持着自己的清贫生活。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上集里我已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大陆实施的真象记录下来，从中可以看到，劳改队是一个法西斯集中营的远东版。

史大林之所以在苏联推行“国家所有”，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与独裁政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效仿苏联，在中国建立一个适应高度独裁国家的经济基础，这便是中共国有制的由来。

同苏联一样，毛施行“国有制”二十八年，不但无法超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连本国老百姓的吃穿都解决不了，数千万中国同胞为共产主义的试验白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作为基础的经济，最终裁判了“公有制”的淘汰。

在这一集里，我回顾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结局。邓部份顺应客观规律，舍弃“共产主义大锅饭”，知道“白猫黑猫能逮耗子的好猫”。但是这一过程依然保存了“独裁”衣钵，它走向了另一极端---

本来，现在大陆社会中与公有制并存的民营企业，以其各方面的优越，令人信服证明，代表私有制的民营经济优于独裁专制的国有制。

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将共产党骑虎难下的“公有制”变成统治者的“私人占有制”，这与自由竞争而发展起来的“私有制”，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共主张的‘私有’，是窃取权力者少数人的私有，带有对社会财富的掠夺性质。它恰恰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这样来认识邓氏的改革开放，才可从“中国特色”的现象中，透视这种新的奇形怪状体制产生的尖锐矛盾，这是一种用“中国特色”包装的统治集团占有制。它与资本主义所奉行的自由经济完全不同。

私有制的生命力发源于竞争，没有竞争，私有制只能萎缩。事实告诉中国的权力握有者中国可以实现的进程应当是：先从取消专制制度开始，才有“改革开放”的实施，俄国已这样做了。那么中国的改革又怎样呢？

下面我客观地把这个转型过程记载下来，并预测它的未来。让我以亲身经历看看这个过程，看看它的后果吧。

第一节：进入工厂

在进入重庆农用汽车厂之前，除听到这家工厂不景气的传闻，对那门上挂着的大牌，门卫森严的表象究竟是怎么一个内幕，我一无所知。只因我当初要求调进这家工厂时，在统战部几次碰壁后对它产生了好奇。

第一次进这家工厂，原是去劳动人事科报到的。当我走进那黄色的办公大楼，找到劳人科，并从那位劳动人事科长手里接过“履历表”填写时，正好碰到了一件奇怪的调动纠纷。

当事人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工，正哭丧着脸纠缠着这位科长。这位年青女士原是北碚区法院的民事庭庭长的侄女，她本在河对面玻璃器皿厂当一名玻璃

制品的磨花工。因为家住北碚市中区，嫌每天赶轮渡上班太不方便，便扭着她的伯伯，要他在北碚市中区的工厂中为她安置一个工作。

农用汽车制造厂的好几位职工是法院的家属，这位庭长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金工车间正准备向外招聘两名万能磨床的磨工。便私下打电话托了当时任厂长办公室付主任的老同学，

对方立即找人事科长商量，将两个准备从外面调进的磨工名额让了一个出来，私下商定“成交”后，就向她发了调令。

像这种法院利用国有企业安插私人子女的事，极为平常。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工人拿的是国家发的工资，调进人不过是在国家付的工资名额中多造一个，**工资虽薄却是铁饭碗**。由于交通便利，所以谁都削尖了头往这里钻。

再说满足法院提出的要求，还可以巴结政府的权力部门。因此调进来的人再没用，工厂再人满为患，依然很快可以成交。**这种调动大家给取了个名，称做：“走后门”，成交双方叫：“关系户”。**

而我在劳人科偶然碰到这位女士，却发生了一点小小曲折。当她被金工车间的李主任带到万能磨床上时，她终于说出她是磨玻璃的工人，从来没有见过庞大的磨床。更不知道怎么开
来操作它。

农用汽车制造厂 和为十根集团收购

李主任哭笑不得，只好将她退回给劳动人事科。然而一切调动手续已经办完，生米煮成了熟饭，这位“关系户”已成了农用汽车制造厂的正式职工。

那林主任只好再次出面与生产库房商量，那儿可是一个容纳闲人的最佳场所。不过生产库的编制总共十二人，现在由于各种后门户，容纳了整整三十个人，主任说既然早就超编，再加一个也无妨。

大陆上的“走后门”配以各种形式的贿赂，成为这一时期国企的主要人事原则，也成为国企管理者贪污的来源。国有企业驮着人员雍肿的包袱，在商品经济来潮之初便迅速‘累垮’。重负荷成了国企倒闭的原因之一。

我填写好履历表交给这崔科长后，他通知我说：“党委办公室的周主任，请你去一趟。”并且将市人才交流办公室的表交给我带上，悄悄告诉我说，这周主任是新任厂长李友的姐夫，你的工作要由周主任安排。

第一次同周主任见面，他告诉我，李厂长为将我调入这家工厂，暑假中就教育局放人，连续跑了许多次。李厂长才上任，正缺得力助手，所以你进厂后希望能全力支持他。

听这话，心想到了一个新环境，我的德性恐怕要改一改才能适应，可惜该怎么改，我却不知道。

按照周主任安排，第二天，我便被安排去总工程师办公室上班。

从党委办公室出来，今天还有大半天，我可以仔细看看这个很难调进来的工厂，究竟如何的庐山真面目？

站在工厂大门口，我仔细辨认了工厂的位置，认出这儿正好是我初中一年级求学的实验中学所在地，算来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年，实验中学搬到毛背沱与兼善中学合并，改名为重庆第十三中学。

现在工厂大门还依稀看到当年实验中学的旧貌，这几年随着城区改建，云泉路和云天路半围了整个厂区。

厂房十分破旧！中心地带的山包上立着一幢黄色大楼，大概是抗战时留下的历史遗物！黄色大楼下方整个厂房分布在四周，全是泥夹墙结构，因长年雨水侵蚀变成危房，很像一些戴着灰色破毡帽的苦力，匍伏在四周。

厂房之间按照天然地形，弯弯曲曲宽窄不等的过道上，散乱的停放着仿苏制吉斯卡车，有的车身已生满了锈，这是当年取名为北泉牌的农用汽车。

几幢厂房黑漆的铁门敞开着，从那黑漆铁门走进，暗淡的光线中机油和霉气的气味迎面扑来，令人感到窒息。

只有冲压车间光线比较明亮，有几台像样的冲床和油压机，其余的车间，冷作、工具、金加工、装配几乎都是五十年代的旧设备，在暗淡的灯光下有气无力的运转着，断断续续发出尖锐的金属切削声。

走进一个车间，工人们躲在黑角落里吹牛，打牌，只有车间办公室和技术组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我看了看手表已十一点钟，距下班还有一个小时。

走出车间，转过厂区，沿过道朝工厂大门走出。

从围墙外的马路向市中区方向走，过了云天路右转，朝车站方向去便是云泉路，围墙外的房屋渐渐多起来，不过那些房屋破烂不堪，过去从这里路过，并没有留意。

今天带着了解工厂的目的，我才仔细看清楚，那房屋像是当年抗战难民筑起来的贫民窑，有些墙体已经垮塌，房顶上铺着破碎的石棉瓦。

想象得到，住在这里的主人在风雨交加时，最提心吊胆的便是整个房子会在风雨中垮下来。好在这些鸽子棚背靠在工厂的围墙外，相互依靠着免得被平地的大风卷走。

走进一处门窗像样的窝棚前面，向一位正坐在门口的老太太询问，她回答道：“这一片烂屋子都是农用汽车厂的职工宿舍。”

那周主任所说的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的工厂，职工们竟住在这些破窑子里渡日，一丝后悔的念头拂过了我的脑海。

当初离开二十四中时，老师们都说我这下终于摆脱了二十四中那穷地方，调到这么一个市属单位，好比从糠兜跳进了米兜，现在看来这里除了在地理位置占着交通方便的光，少走些蔡家场的烂泥路外，并无其它优势！

其实暴政之下焉有福地？！我现在暂住天生桥刘启建父亲的家里，那住房也是危房。半边的房梁已垮塌，地上常年潮湿，平时屋里散发着霉气，一到雨天，整个脚下就没有一处是干燥的，别说孩子，连我常住下去也会受不了。

我是阶级斗争战场上活出命来的难民，能寻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按照周主任的安排，第二天我便去总工程师办公室上班，总工办就在底楼，从正门走进过道的最尽头，我被带进那间排着六张办公室的屋里。这时因为没到上班时间，办公室里面还没有人。

五分钟后，总工程师王重夹着一个皮包来了，他是王庸的五哥，又是重庆大学先我们三年毕业的校友。

在总工程师室丢下皮包后，他便来我们办公室安排了我的座位，并带我领

了一套绘图仪器。

当人到齐后，王重介绍了办公室其它五个座位上的人。给我的任务是协助和统计全厂各车间的技术革新。

第一天上班，办公室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报纸，我却忙碌着收拾那些刚领到的东西。打开抽屉，把领的那些资料和笔记本，绘图仪器放进去，便打开资料看起来。

办公室里很安静，除了翻动报纸的声音，便是喝水声，谁也没有同我打招呼，使我感到十分陌生。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靠窗子坐在第一个座位上，年龄已五十岁多岁的女人，开始说话：“也不知道云泉路那两幢的房子方案出来了没有？这一次大家要盯紧一点，不要让总务科再像上次那样塞了私货……”她喃喃自言自语。

坐在她后面那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脸上长着络腮胡的男子接了嘴：“总务科上周就把这次分房的方案订好的，只是那姓冯的还迟迟不与公布，又不知他在搞什么鬼！”

“明天就要公布分房的第一榜单了，我是盯着了，我几轮都被挤掉了，就看这一次有没有我的份了。”坐在最后面的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头说道，全办公室看上去他的年龄最大。“如果我再分不到，那么退休以前再也没有我的份了。”原先办公室的安静顿时被热烈的讨论代替。

大家讨论的就是我昨天所见云泉路上两幢新建的楼房，从大家的讨论知道那两幢房子只修了五层楼，一共才四十套。全厂一千多号人，盼了快两年了，现在就眼巴巴盯着这四十套新住房，怎不紧张？如果按照工龄排队，这办公室所有的人恐怕都有份，就看谁手长、关系好了。

我听了很久，已听出他们谈论的无非是：有分房资格的老职工双眼紧盯着总务科，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资格不被意外的关系户挤掉；没有分房资格，便会利用有利的人际关系，千方百计地挤掉那些已排上号的老职工。

估计自己分新房无望的人，就把眼睛盯着那些将要腾出来的旧房上，以各种理由来调整自己原本太挤太潮湿，太恶劣的住房。

总之各自打着小算盘，至于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在住烂房子，怎样才能让大家住好房子，却无人提到。

想到这里，我回过头从新看了看办公室的其它五名同事，论年纪除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一位女士还只有三十岁左右，其余的人都是四十以上的人。而且能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的，大多都具有大学学历，可是他们看问题的深度，对问题的态度一点都不比文盲大老粗的工人高。

且听那在临窗坐位上，脸上长满络腮胡的中年人提高了嗓门吼道：“老子工作二十多年了，这个工厂怕没有几个敢跟我比的，现在一家三辈六口人还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烂棚子里，几次分房，都被那殷白毛的关系户占去了，这一回再分不到房，老子全家就搬到李友家里去住。”

那最先引发讨论的老大姐，也不甘示弱：“老娘到这厂来足足干了十八个年头了，如今娃儿都长大成人了，一家五口还挤在那牛毛毡破房子里，前年分房，第一榜，第二榜都有我的名字，独独落实最后一榜时，我的名字却被刷掉，这

次再刷掉，我绝对要问个凭什么？”

她的话音刚落，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年轻女士，喊道：“你们晓不晓得李友的那个小舅子冯西，这一回排的分房人员中就有他的名字。”这话像点了一把火似的，点燃了整个办公室。

“怪不得李友叫冯西当分房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才来工厂几年？他凭什么上了榜？大家盯紧点，这一次如果他冯西分到房子，我们到李友家去闹。”络腮胡吼道，然而那老大姐朝络腮胡压低嗓门说道：“轻声点，隔墙有耳。”

她指了指对面的那间晒图室，然后转过身朝那年轻女士问道：“刘茜。你这条消息可靠不可靠？”那年轻女士被这么一追问心里老大不高兴，闷声回答道：“你不信等后天张了榜就明白了。”

络腮胡却并不理会老大姐的提醒，站起身愤愤的吼道：“真他妈缺德，这么大的工厂，一千多职工一大半就住在烂棚子里，苦苦等了许多年，眼睁睁地看到这两幢新房子，又只有四十多套，李友那家伙，还想拿去照顾他的小舅子。”

说到这里，坐在后面的两位，嘟哝着说：“这个厂啊，连当一个班组长都会利用手里头的那点“权”，往私人腰包捞，李友当厂长了，正该他捞的时候！”

正在这个时候门口闪过一个人影，那老大姐咳嗽一声，办公室刚才热烈的讨论便突然的轧板。果然门口走进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她便是对面晒图室的描图员，走进来问道：“你们有谁有图或资料要描，要抄的？”没有人理会她，于是她便走出门去。

我后面的那位告诉我：“这就是李友的侄女，安在总工办专门当耳目的。”！

这李友仍是我的初中同窗，大学以后又走着很顺的路，遭遇与我大不相同。三十年后，又在这童年相聚的地方再次重逢，今天怎么才一上台，便陷入了“后门”的各种是非中，成了众矢之的？

我既进了这家工厂，也希望工厂兴旺，真如大家所说这种状态，别说等三年五载，就恐怕一辈子也别想“天下寒士皆欢颜了。”

便想把听到和看到的与他本人交换看法，让他明白面临的诸多不利，希望他能赶紧调整自己的做法和作风，把工厂组织得像样一点，迅速改变目前这种一盘散沙状况。

李友住在云泉路上一个三合院里，那院里一共两幢五层楼房，每一套住宅都有成套的寝室和客厅厕所，算是当时这家工厂最好的住宅。

主意打定后，便在一个中午，在街上吃了一碗小面，看看手表距下午上班的时间还足有两小时，便向三合院走去。

走进三合院的门口，问清他住在进门左手那幢楼的四楼上面，找到他的住所，敲门却一直没人应。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家，后悔当初来时该在办公室通知一下他本人，也不至于空跑一趟。

缓缓地走下楼来，在二楼楼梯口碰到一位中年职工，向他询问李友下班后回家没有？对方答道李友是否回家他没看见，但肯定他一家人都在，上午看见他的母亲上楼，刚才他的大妹还来过。

于是我又折转身从新去敲那闭着的门，仍没有动静，我又继续敲下去，反复三五次，那门手终于摇动了，门轻轻的开了一条不到一公分的细缝。

“你找谁？”那声音是从那门缝中挤出来的，听去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
“我找李厂长，我是新来的，是李友的老同学，”我回答道。

心中已十分别扭，怎么明明屋里有人，敲了这么久的门才来答应？这种无礼的“神秘”使我颇有看法。门里面有了响声，好像是悄悄的对话，又过了一分钟那门才慢慢打开了。“请进吧”，黑屋里传出的仍然是那女人的声音。

我朝门洞里望去，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不安的刚举步，“噢，请换拖鞋”那女人在洞里发令道，我接过了递过来的拖鞋换上，跨进了门，门从新在我的身后被关上。随即，“啪”的一声电灯打开了。

一间略微讲究的客厅呈现在眼前，抬头望去，那两边的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盖得严严实实，心中正思考这位老同学，为何在大白天把自己关在寓所里？

客厅里正对大门的长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一位头发已经全白的老太太，紧靠着她身边坐着一个约十五岁的男孩，旁边还坐着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从年龄上判断，眼前四个人没有李友。

刚才开门发话的女人戴着金丝眼镜，四十岁上下。此时，她很有礼貌的指着右侧一个单人沙发说了声“请坐”。

没见李友，我心里又生了疑惑，难道这位老同学今天中午没回家？我见过不同层次的人，以这种神秘方式接待客人的，好像在那篇侦探小说里有过描述，虽然很尴尬，却又充满好奇。

于是我一面坐下，一面再次自我介绍道：“是这样的，我是刚刚从蔡家场一所中学调来的，想找李厂长随便聊聊，他在家吗？”

话音刚落，只见左侧的寝室门帘动了一下，一个戴着黑边宽镜框眼镜的中年男子，闪身从里面走了出来，向我伸手，握手致歉，那面部却是冷冷的，缺乏热情，也许因为我是空着手来的，有违市俗规矩。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一面示意我坐下交谈，一面解释道：“真对不起，不知道是你来了，所以迟迟没有开门，你不知道这家工厂有多烦人，这几天就为了两幢刚刚修好的职工宿舍分配给大家，全厂闹得乌烟瘴气，这几天不管中午休息，晚上睡觉，只要我在家就有人来找，全家鸡犬不宁。”

我打量眼前这位西装革履的“绅士”，人变到这种程度似乎有些可怕，本属于人性本能的东西，不知为啥丢失了。他边说，边从茶几上的水果盘里取出一个梨子递在我的手上，继续解释道，“我被缠得没法，只好将妹妹请来，对付这些成天缠我的人，凡在休息时间来找我的，一律说我不在家。”

他向方才放我进来的那位女士点了点头，算是自我介绍了。随即他指着坐在沙发上的老太婆和中年男子介绍说，这是他的母亲和小舅子。

我朝那中年人看了一眼，猜想在办公室议论的冯西大概就是他了，接着主人又询问道：“听舅舅说，你安排在总工办，手续办完了吗？”我迟顿了一分钟，刚才我进门前，所存下的映像还在回映，一时脑子里还在那黑洞的房门口徘徊。

更主要是，儿时的同学相隔这么久，不管现在的身份如何，同学之谊总该放在相见的第一位，因为童年的情谊最能唤起激情的。三十年相别，初次相逢且不说多么惊喜，也不会板着面孔，摆出上级对下级的那付臭架子来。

心里面的这点隔阂，已将我来之前准备好的话吞了回去，一面口中应付着

他说道：“噢！手续已办完了，并且上了两天班了。”

“有住的地方吗？我们工厂目前最紧张的恐怕就是住房了。”

“暂时只好在天生桥的老丈人家挤着住了。”

话说到这里，便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似的，很为今天空手而来，感尴尬，这些年中国人到别人家里是不兴空着手的，更何况是刚进厂的人到厂长这里来，本来抱着看见老同学既聊家常，再将两天来所见所闻婉转讲出来，结果见面竟弄得这么僵。

看到对方大概因为心绪烦躁，再去说些他所不愿听的话，弄得对方反而不高兴，而适得其反。

那沙发上坐着的人盯着我，更感到浑身不自在，如此尴尬了几分钟，我便起身告辞，他也没有任何挽留的话，站起身来，关照道：

“老同学了，今后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有什么情况我们常常通气，你个人有什么要求也尽管直说，凡我能办的，我一定尽力去办。”

客套话一边说，一边去开房门，最后叮嘱我说：“以后你如果要来，在预先没有通知我时，就要按约定的暗号敲门，暗号是这样的：***我们就知道是自己人来了。记住了吧。”

我看着他那宽大的眼镜框里透出一种令人猜不透的眼光，不自然的点了点头，便出得门外，穿上自己的鞋赶紧离开……

刚走完那楼梯，见两个气冲冲的中年人向那扇已紧闭的门走去，然后使劲地敲那房门，可那门静悄悄的一动也没动，直到来人没趣的走开。

我下了楼梯，一边走，一边还在回味刚才所见到的厂长，感到今天实在不该空手到来，自觉唐突，对这位千余职工的头，怪僻的神秘颇感不安，预感到今后，怕难以同他相处，心中未免泛起了一阵失望。

我们一家从蔡家场迁居北碚以后，刘启建还暂留在卫东中学，我和母亲以及两岁的儿子，暂住岳父的私房中，我的母亲和老岳父都已是年过七旬的人，母亲又在缙云咨询门诊上班早出晚归，不到两岁的儿子只好托邻居刘大妈带。

可是不久，刘大妈的外孙出世，本想请母亲出面送去北碚机关托儿所全托，但看看不到两岁的孩子就离开父母单独生活，于心不忍。再说，托儿所也不可能在学期末了中途收插班生。

经过与本厂托儿所商量，暂时把儿子送到那里去上日托班，从那时候起，我每天都五点半摸黑起床，在街上打回牛奶煮好后，再叫醒儿子喂了奶，便急匆匆地把他驮在肩上去上班。

从天生桥住地到工厂相距两公里，而且通公共汽车，但是上下班那趁车的拥挤实在骇人，公共汽车一来，等在站上的乘客，并不排队，而是一拥而上争着抢座位，挤上车以后，坐着的都是精强力壮的年轻人，别说我这种抱着孩子的人，就是单身年龄偏大的人，也常常在上车被拥挤人群推倒跌伤。

同时趁着挤车的混乱，扒手十分猖獗，像我这种经历二十年监狱见过许多窃贼的人，也会在挤公共汽车时，遭到洗劫。

第一次从蔡家到北碚来，身上带的三十元钱被扒一空，还是向驾驶员说了

许多好话，才免交了车费。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上车时只带着一元钱的车费，但即使只揣了一元钱都会被扒去。

偷扒成风，有两个原因，一是老百姓太穷，无业游民生活无着。二是文革遗风，道德沦丧，抢劫杀人已成普通的事。“打砸抢”既成为执政者认可的“好得很”的革命行动，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加以提倡，文革晚期刑事犯罪，便成了社会上令百姓心寒的公害。

中国老百姓长期生活在乱世，对文革业以形成的社会陋习已经习惯，加上处于弱势状态，事不关己别自找麻烦，是老百姓最常用的明哲保身态度，即使对众目睽睽下的行凶抢掠也视而不见。

挤公共汽车，既有受伤和被扒两大危险，加上住地到工厂不过两里地，所以我不再去凑那坐车的热闹。

每天一清早让儿子喝过了牛奶，自己一边啃馒头，挟着帆布的工作包，驮着儿子，冒着清晨的寒雾，匆匆地走上公路，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工厂的托儿所，再匆匆赶往黄色大楼。

时值初冬，每天早上这一趟就得弄我一身热汗。好在我劳动惯了，权作早上锻炼身体，开始时还觉得太紧张，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形成习惯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下午五点半钟下班，我又到托儿所接出孩子，依然地把他驮在肩上，当然回家就没有上班那么紧张，抓着儿子的小手，慢悠悠的往回走，一边还问他今天阿姨教了他那些儿歌，跳了什么舞？搬着指头数数能数到几？有时还教他背唐诗，在我的肩上响起，“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那日子虽很累，但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朝夕相伴，换来的天伦之乐让我忘掉一切。有一次托儿所流行腮腺炎，孩子被传染了，喉咙和脸肿得胖官似的，晚上还发烧，整夜啼哭，我就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地哄他，给他讲故事，唱儿歌直到睡着。

那一周我几乎整夜没睡觉，我可是快五十的人了，硬撑着，终于自己也得了病，咳嗽不止。

但我想到了盐源时，得了病还要被抽打赶上山去，便无所谓了。依然一早起床生炉子打牛奶，然后驮着孩子，冒着寒雾，急急的往工厂托儿所赶。

有时路上碰到同厂的职工，逗着我驮在肩上的儿子，有意无意地向我发问，“老孔！这是你的孙子吧。”其实儿子也好，孙子也罢，这是命中注定的，也是中共给我造成的，既是命中带来，我都认。

第二节：闹嚷嚷的达标

1984年，重庆农用汽车厂正处在发财的时候。不过在那汽车特别缺的年代，只要有生产许可证，装上四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再装上一个车身，再整脚的汽车都能卖钱赚钱的。

刚从饥饿中活出来的农民，从三自一包的土地上收获了粮食，基本上解决吃的问题以后，便把眼光转向城市里挣钱的“付业”。跨出家门的农民盯上了在马路上来回奔跑的汽车，十分羡慕坐在驾驶室把鼻子翘上了天的司机。

挤在手扶拖拉机上冒着翻车危险的农民，梦想自己有一辆普通卡车跑运输，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挤进中国第一代的万元户。

然而要走这条致富的路，可不比养鸡养鸭投入饲料的小本买卖容易，他们手头至少得有几万元买车的钱，这对刚刚吃饱饭的农民，好似海市蜃楼。

正好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国家银行向个体农户发放了低息贷款，凡持有地方

农用汽车制造厂旧地后改为专汽厂

政府的证明，所有的农户都可以贷到他们所需的钱，那些做着“运输”发财梦的农民，终于得到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排着长队在国家银行贷到款的农民，匆匆背着钱袋，挤到有卡车出售的工厂或商场，农用汽车厂平时十分冷清的销售部窗口下，很快排起了长长队列，过去很少人问津的农用车，一时变成了紧俏货，车库里停放的车早已售完，那停放在车间过道上，遍体锈蚀的将报废的车被争抢着。

有一天，我见一个背着钱包的农民，正将一个上了车正在发动的人从车上拉下来，并大声喊道：“这车我已交了预付款，是我要的。”那被拉下的人跳下车后，气势汹汹向对方吼道：“我刚才交了钱，是这位大哥叫我提这辆车，你凭什么拦我？”他用手指着不远处站着的车员。两个人互不相让，抓扯着，像公鸡打斗似的直着脖子。

这时那发车员走了过来说道：“我可得给你们说清楚，谁要我不管，这车交给你们发得动，开得走，成色虽然旧了点，可是你们自己争着要的，今后出了问题别找岔子，说什么质量不好要退车的话，我一概不认”！

那已拿到车钥匙的农民，连忙从他那刚才装钱的帆布包里取出一包精装的“大前门”来，向发车员递过去：“大哥，你说那儿的话，这车我是要定了，现钱现付，整整六万元，你是开了票的，现在冒出这个人来，你给评评理。”

发车员接过香烟，对着那抢车的农民吼道：“谁收你的预付款，我可没听说，你还是乖乖的去排队吧。”发车员的裁判，看来是那包大前门的作用。

“不，大哥我上个星期就来了，就怕到款提不到车，专门找段科长预约好的，就是这台车，你不信段科长还在办公室可以当面对质。”抢车的农民摸出了打火机，打起了火，向那嘴上刁着大前门的人递过去，还想竭力的挽回败局。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过道上平时排列着的车已经腾空，地面上留下了几摊机油和从车身上剥落下来的铁锈，再看看这台两人争抢的车，兰色的漆已经发白，底盘上的黑漆已经锈蚀，少说也是在露天存放了一年的。这样的车开上路，没有人能保证它不抛锚，再碰上这些初学驾驶的黄司机，今后难保不会扯皮。

“算了吧，这车已是人家的了，你还是另外再卖一台吧，段科长既与你约在前，他一定会安排的，说不定你买的比这台车好得多。”中间人最后作了裁定，抢车的农民只好提着胀鼓鼓的钱包，向着销售科办公室走去。

看来农民抢购卡车的热浪正在这家工厂盘旋，随着这股抢购风，原来只值五万元的农用车，一路价格节节攀升。仅销售科公开亮出的牌价，以增收购置费，手续费，付加费等名目，两个月就上涨到七万一台。

有的农民刚刚才从库房接过手的车，便会有人以高出买车人两千元的买价，

从他的手中把车接过去。有人盯上了这汽车转手买卖的生意，一辆车转手之间便可以赚到两三千元。这年代，以“万元”作致富的标准，转手之间不费一点气力便能成万元户，可谓小暴发户！

李友可是交了好运气，汽车的紧缺，为汽车制造厂创造了比其它机械加工厂优越得多的条件，在他上任时碰到了这机会，如果指挥和组织生产不失误，这家工厂可以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改变亏损局面，由一个职工住烂窝棚的穷厂变成名符其实，人人羡慕的富厂，可李友在想什么呢？

他首先对本厂生产的汽车颁发“汽车供应券”，这本来就是从共和国的票证学来的，对供不应求的产品发供应券是大陆的常规。

然后在厂长常务会议上作出决定，以对外联系业务的需要为名，为他和负责销售工作的付厂长每人提供了几张汽车供应券。

这个决定立刻引起了其它付厂长的反对，“状”告到了新上任的党委书记那里，为了摆平这件事，李友决定给每个厂级干部也发几张汽车券。

厂长们暂时搁平了，却将刚刚卸任不久的厂长殷某的红眼病引发了，于是他一面暗示李友，要求从新‘分赃’，一面指示他的儿子殷老大，到每个厂长那里，私下以每张附加价格收买这些汽车券。

在殷老大软硬兼施之下，给厂长发的汽车券被他收买了一大半。胆大包天的殷大公子，将这些收来的汽车券加价，在离厂门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出卖给那些排在队列后面，又急于求购的农民。

一张汽车券，在殷老大转手之间，便凭空赚了几千元。一个倒卖汽车券的黑市交易市场，就这样在工厂大门的侧面公开的营业了。

这段时间，中国已形成了专门从事倒卖为业的特权阶层，并且还形成了一个以这种官方为背景的倒卖市场。掌握了物资的特权阶层使倒卖合法化。老百姓给这种一经转手，就得到巨额利润的“爷”，专门起名为“倒爷”。

经这些倒爷之手，控制着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控制着国计民生。

开始，倒爷成立公司，经政府批准正式做起了生意，凡百姓紧缺的日用品，大米、食油，甚至肥皂火柴，后来发展到成吨的钢材，汽车、彩电，那生意越做越大，公司也越来越大。这一切只需要一个先决条：“批条”。

“批条”只能由各级官吏开，大倒爷靠大官得到大买卖批条，小倒爷靠芝麻官得到小买卖批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靠了这种不受大众监督的政体，成了贪污的温床，“倒爷”们的乐园！！

这一时期，对于汽车彩电等等国内紧俏物资的倒卖，已成了“让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原始积累。像殷公子做点北泉汽车票的小买卖，确是小巫见大巫，消息证明，到了 1985 年已有军队替走私货护航保驾，保驾的走私货已由百货发展到枪械、毒品且发展趋势惊人。

面对十分严重的投机，贪污，腐化堕落，中共各级政府不时抓几个替罪羊，在向全国的小倒爷们打招呼的“宣判”大会上，真正的大倒爷便是大会的主持人。他们依然架子十足的在电视节目上，振振有辞的作着振兴中华，维护社会稳定的报告，摘几顶奴才的花翎顶戴给百姓做做样子。

在这样的大好时机下，老同学召开了厂长会议，我们办公室的王主任开会

回来传达说，企业要立即进入三级“达标”验收，现在全厂人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投入这个中心工作。从那时起工厂的广播里天天宣传这个中心工作。

所谓“达标”是指工厂在管理水平，生产能力，职工素质，利润指标达到国家对企业三级的要求。

达了标的企业，在国家贷款，更新设备，职工宿舍申报和增加工资，奖金发放上有诸多好处。而本厂这种萎靡不振，工人们干活磨洋工；办公室里看报纸，喝茶和吹龙门阵，都必须在达标运动中统统克服。

在奖金的刺激下，在一再讲明三级“达标”关系大家切身利益的鼓动下，一场我从未见识的“运动”，便在工厂沸沸腾腾开展起来。

总工办在这次“达标”运动中是全厂核心组织之一，大家忙碌的搬出过去制定的工厂管理条例，在市机械局派出的临时工作小组指导下，按当时市机械局认可的江北机械厂的管理“本本”，进行“整改”：抄写他们的工厂方针，从管理部门的设置以及职能的确定，到各种原始记录的存单和报表，无不连夜连晚的进行誊写，印制。

最困难的是，必须赶紧补上从来没有做过的原始记录和报表，例如，设备利用率，原材料消耗率，工时利用率，以及成本核算的原始数据原来是根本没有的。我们的任务是要让验收工作组在验收时，可以根据这些“原始记录”，来核实工厂是盈利还是亏损。

根据原材料和配件的质量文件和制造过程的现场记录，检验报告来证实生产出来的都是名符其实的合格品。在几天内凭空仿造江北机械厂的兰本，伪造记录和单据，便成了我们的中心工作。

这本是中执政的法宝，毛泽东就是用欺骗和伪造愚弄百姓整整二十八年。

邓小平讲“实事求是”是讲他继任的是一个烂摊子，用一穷二白，以否定毛泽东的形势大好。但是为了愚弄民众，这欺骗作假的传家宝却一直没有丢掉。政府部门如此对付国际与论和老百姓，企事业单位如此来应付政府，相沿成习，不用怕“一经查出，国法不容”。

只是所有的记录，单据法票，文件要前后一致，有名有据，这编假伪造的工作量就不小了，为了保证在规定的“验收”时间内按时拿出来，厂长办公会议作了硬性规定，凡在规定时间内拿不出这些“假”证据的，一律扣除奖金。

于是，所有的职能部门从经营办公室，到车间负责统计的人员，动用了所有的人手，加班加点赶制这些“验收”依据。这段时间，办公室里平时喝茶吹牛的现象收敛了，连工会，党委办公室，这些平时闲得无聊的部门，也被组织起来成为“督战队”，不分白天黑夜参加了这场“战斗”。

整整忙碌二十多天，各办公室常常终夜灯火通明，一般的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二点，这可苦了我这个既当爹又当妈，又工作的三位一体的人，除了白天加快了接送孩子的脚步，晚上加班时，我只有临时的把孩子托咐给隔壁的刘大妈。好心的刘大妈也乐意帮这个忙，靠了他才解了我二十多天的加班之忧。

正当全厂准备迎接达标的验收准备工作正酣之际。有一天晚上，大约已是一点钟了，突然从总务科传来了一阵嘈杂的人声，听去像有人在打架，又像有人偷东西被人抓获。

不到半小时，一段头号新闻便在黄色大楼里传开了。下去的人在总务科的办公室门口看见，三个老工人正在抓打着小舅子，有人在厨房里找到了一根绳子，准备将他就地捆扎起来。而办公室的灯光下面，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看热闹的年青人，一眼就认出了那分明是财务科的核算员。

一个小时后，值班的纪委书记，叫开了三合院李友的宅门，将这个丑闻告诉了他，并且讲黄色大楼已因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总工办，要求当场将二人扭送到派出所。李友不得不立即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将舅子撤职，并将他开除工职留厂查看，至于那女人只能严办了。

第二天下午，全厂职工大会在农汽厂后院大坝召开，老同学在会上痛骂小舅子在全厂验收定级的关键时刻，做出这等破坏验收工作的蠢事，并将对二人处理决定，当众宣布。第二天以厂长办公室名义，向各职能部门和车间发出印刷好的处理决定，以示他秉公执法的决心。

正愁闷之际，机械局来了电话，通知他，工厂验收工作组，决定在国庆节后，进厂验收。

“国庆”节刚过，厂办工作人员身着清一色笔挺的西服，站在工厂的大门边，振耳的鞭炮声，迎接着几辆从云泉路上徐徐开来的轿车，大门左侧立着一块足有两米高的巨幅标语上写道：“热烈欢迎上级领导同志光临我厂指导工作”。

正对大门的黄色大楼房檐下挂着二十多米长的红幅，上面写着：“全厂职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和饱满热情，迎接我厂达标验收的顺利完成。”

销售公司的门口仍排着长队，但已经增设了几间接待室，买车的用户可以在那里休息洽谈价格，并签订合同，办理提车手续。工厂门前的那个“黑市”被厂的保卫临时驱散，不知到那里去“暗箱”操作了。

黄色大楼已打扫干净，粉刷一新。会议室从新换上了新的办公用具，各车间的泥墙上都被“整容”，用石灰水从新粉刷，雪白的墙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所有的办公室都把各自的职能条规，框在镜框中挂上了墙。

所有的车间大门、过道、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在墙上和刚刚添置的玻璃灯箱里，贴上各种工种的操作规程，劳动纪律和安全条例。

三级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验收的评分怎么打？怎样演完这场验收戏？这对于刚刚进厂的我全都一无所知，而且我敢说凭我的直觉，就是这家工厂的大半老职工也绝对弄不明白。

大家担心塞给验收组的那些赶制和伪造出来的“资料”，会不会被明眼人识破？使二十多天来的辛劳功亏一篑？

大家心里明白，工厂依然是一个月前的那个设备陈旧，管理涣散，编制超员，工人消沉，产品低劣的老样子。只是老叫化子临时的换上了一套新装而已，它的本体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三级”所规定的那些标准。

工厂所以出现短期的兴旺，纯粹是国家向农民发放贷款促成的，与报表上、资料上显示的数据、记录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验收工作组嘛，都是些经过局里挑选的处理“假材料”的好手，他们对企业上演这种假戏非常熟悉。何况那些手册，报表、摆得清清楚楚，验收的标准又统统上了墙，那是气氛极好的舞台。

余下来就只要厂级领导工作“做到家”就行了，经过厂长工作会议研究，验收开始的那一天，厂级领导全体出动，隆重接待验收评定小组的全体人员，安排最好的宾馆和最好的伙食。对于娱乐，验收过程中，都分派了小姐相陪。加上对验收组成员，准备了一份不薄的“红包”，三级达标万无一失。

验收工作组进厂的第一天下午，老同学主持了一个场面热烈的欢迎会，当时还没有摄相机，厂部的五部照像机和广播室的录音机全部出动，第二天便从广播里传出了李厂长主持欢迎的致辞，那声音高亢而乐观：“工厂近两年来，由于形成了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

他介绍着自己的工厂，但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同所有副厂长的貌合神离的实况，这种关系成因于制度，他们不必为工厂的生死而过虑。所以从名义上讲，他们与工厂的头是“平起平座”的。动辄可以指责企业的“法人”，但又决对无权控制他们，貌合神离便是工厂中必然的厂群关系。

那李友继续在喇叭里喊道：在领导班子，实干苦干和务实精神的带动下，全厂一千三百职工拧成一股绳，扎扎实实推行了工厂方针和基础工作，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有力促进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一连串八股式的废话，见于报纸，闻于广播，实在是浪费听众的时间。

接着是编了一大堆谎话：“我们的职工每天都满负荷工作……今年迄今为止已装车八百台，预计年内将突破一千台大关……在年产量达到五千辆的能力时我们会把上级验收组的领导们，再请来为我们厂验收二级达标。我们一定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李友的结束语激动而有力，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王主任说：她看见他那时对着麦克风的脸通红通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带着微微的颤抖，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说他在公开的撒谎，其实也不全是，例如职工们满负荷工作，加班到深夜就讲的这两个月来的实情。

不过，这加班所干的事是决不能公开的。工厂年产究竟多少，谁也没有核实过，估计也是事实，就是说今年这横财到来时也才出车一千台。按正常的利润，每生产一台车三千元，每个职工每人平均只有 0.7 台，年收入 2000 元，平均每月 150 元，有什么好炫耀的？

可惜即使这样容易的计算，也没有人去算过，靠正常收入来算，今年工厂的利润总共不到三十万，何来两百万的利税？这一点，银行也是容易计算的，然而两百万的收入肯定是胜券在握，否则老同学也不会在那里吹大牛。

至于老同学最后的豪情壮语，纯属自我欺骗。然而国家向农民的贷款能坚持多久？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有多少工厂都会挤到农用卡车的生产行列？农用汽车厂的内部管理竟如此空虚，空虚的管理能把这种高利润支持多久？老同学难道没有想过吗？

我一边听李友的演讲，一方面暗自为他捏一把汗，他果真在玩着自欺欺人的勾当，须知古人言“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尽青山卖，不用人间造孽钱。”然而今天“吹嘘”又是中共习以为常的作风。想想它的开国宗师当年如何在贫弱的中国土地上，向世界吹嘘实现了共产主义？

欢迎会开完，第二天验收组的成员在厂部指定人员的陪同下，忙着在各职

能部门和车间翻阅那些“资料”，抽本厂人员询问，核对有关的记录、照片、报表，整整忙碌了三天，基本的分数都打出来了，李厂长又雇了豪华旅游车，安排验收组所有工作人员去大足、统井等附近的旅游景点“放松”了三天。

一周以后，验收组圆满完成了这次验收工作，只等几天以后，由机械局正式根据评分结果发文，认定农用汽车制造厂经过“严格”的企业达标验收，正式成为市级合格的三级企业，工厂也升级为标准的国有企业。

李友为此，召开了全厂“达标暨欢送市验收工作团”的大会，厂门口响了半个小时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机械局的局长将企业正式命名为市三级企业的证书交给了李友。随后，李友驱皇冠轿车跟在市达标验收组的轿车后面，开出了工厂的大门，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紧张”的验收闹剧。

然而，在这两个月里越演越烈的工厂内部矛盾，在工作组刚刚离开就迫不及待的爆发了。第二天，李友以总结达标为名，在厂部会议室召开了厂务会议，他一开始就用咄咄逼人的语气，公布了这次达标中各职能部门的扣分值。

总工程师下管的六个部门除总公办外还有设计科，工艺科，检验科，计量科，资料室，本来就是达标检查的重点，需要应付检查而伪造的图纸，工艺文件和质量记录数量最大，因图纸工艺文件的错误和不当最多，所以扣分多本是正常的。再说总工是厂长最得力的助手，李友对他应更加帮助才对。

然而小舅子的丑事一直令他耿耿于怀，加上平时矛盾日积，使李友借验收小结机会，当着全厂所有职能部门训斥王重疏于职守，说总公办人浮于事，超编超员，无事可做。说王重千方百计把厂里的漂亮女孩子调进描图室，并且说他几次路过总公办时，都看到王重同描图员摸摸打打。

当着全厂中干的羞辱，使王重恼羞成怒，当即拍桌而走，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整个办公大楼为之一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双方都向机械局告状。

王李二人的矛盾，已经表面化。老同学利用自己的权利派自己的侄女安排在描图室的用心，是人人共知的，李友为紧俏的农用车设制车券；并以“便于工作”为名为自己私分汽车券的事，被王重联合其它副厂长成功的将到嘴的肉拖了出来，使李友心中结下一个大疙瘩。

当然，厂级的头们何止王李二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在日常工作摊派，安置“后门”，形成自己的小山头。在收买和刺探对手的隐私，各有自己的亲信，八名厂干八仙过海，对工厂巧取豪夺，早已不存在开诚布公了。

老同学在向验收组，吹嘘工厂“拥有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实在令知情者闻之嗤鼻。

第二天老同学将我叫到了他家中，询问王重在验收达标过程中有哪些言论？我说什么也没听见，老同学脸色很不好，我是绝对不愿意夹在两人中间当一方的枪使，古人有戒：“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想到在两人间，难以应对这种无聊内讧，第二天我便主动向王重请求调离总工办，到金工车间干点实事。得到王总同意后，便递呈了请调报告。于是，我便以一名普通技术员的身份调到了车间，脱离了总工办这个是非场所。

走进金工车间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墙上张贴的那些应付验收的东西已经

撤去，打扫干净的地面，重新是铁屑、垃圾满地，那刚刚粉刷的墙壁，又被霉气和废机油所污染，失去了光泽。

九点钟，我在车间主任陪同下，走到技术室门口，只见那左边的钳台上围着三四十个工人。一个中等个儿胖胖的中年人，正站在一米多高的钳台上，眉飞色舞的向围听的人“公布”刚从财务科透出来的“快讯”。

“昨天下午，财务科又给机械局开了五万元支票，财务科说，那是李友答应验收咨询费，嘿！这些机械局当官的，工厂亏损的那一段时间，鬼都看不见一个，这几天，工厂的大门都要遭这些人挤爆了，你们数过没有，验收那天，工作组开来的轿车就是五辆，他们刚下车，李友就点头哈腰把他们接到泉外楼宾馆，中午在缙云餐厅开宴会，喝得醉熏熏的，晚上还要请跳舞，你们算算看，旅游、吃喝、加上红包，这些龟儿子，又从我们身上括了几万块走？”

经他这么一煽，人群议论纷纷，有人说：“机械局已经许下的，这次企业达标，李厂长年终就要分到一万元奖金”。有人说：“这次达标验收的最后一天，李厂长，在小车子里一次就塞给带队每人三千元……。”

当他发现张主任在听，胖胖的中年人解嘲的喊道“张主任，这次验收你分了几千？向大家坦白坦白。”那张主任笑了笑说道，“陈左派你在这里乱说，总有一天要遭李厂长炒你的鱿鱼。”

然而那胖子却越说越起劲，继续用大喉咙压倒大家的声音说：“昨天早晨，税务局的所长带了两个税官来，说工厂前几年亏损，免交了税钱，今年盈利得把这些老帐还清。李友怕他这一搅，会最后影响达标的结论，赶快把那所长请到泉外楼去，也不知悄悄塞了好多包袱才摆平。

殊不知那税官刚走，银行又来找李友，要他把去年欠交的利息一并交清，李友又赶快应付银行。这两件事还没有办完，那重庆日报和四川日报的记者，又在厂长公室等他，说要采访他。我看哪，采访这个宝器还不如来采访我陈左派，那李友上台几天，洋相出尽了，小舅子又不给他争气。”围听者哗哗大笑。

我忽然想到这几天销售科的紧张状态，他们因为缺货脱销。一再向生产科和车间催促生产进度，便下意识向装配后轿工段望去：

车间大门左边的落地车床前面，堆着一大堆制动鼓，工人还在那里悠然的抽烟。三台磨床和五台铣床的周围全被堆积满地的毛胚另件阻塞着。两名女工，好像在那里打毛线，前方排列的二十台 C614 和 C612 车床，只有几个床开亮了电灯，那里面堆积着杂乱的工件。

再往里看，三台摇臂钻床前面除了堆积的毛胚也没见一个人影。而车间最深处两台满身油污的坐标镗床前，则由堆成小山一样的差速器壳堆得难以插足。

在微弱灯光下，机床似乎因为年事已高又很累，静静的躺着不愿意启动。车间的左边一排钻床旁边堆满了制动器、后轿轴等等另件，点着灯却不见几个人影。一看上班的人几乎大半集中在胖左派所站的钳台周围。

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半钟了，张主任催道：“喂，上班已经一个半小时了，该动得了，还围在这里吹什么牛？”人群才开始慢慢的离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边走一边嘟哝着：“急什么？反正只有那么几个钱，这几天天天加班……”另一个附和道，“是呀！干活的是干活的，捞钱的是捞钱的，不管你干出多少来，

赚的钱还不知道流到哪个的腰包里去了？”

一个女工，拉着他的伙伴催促道：“周燕，你还不快把你的床子赶快调好，昨天你整整一天停了机，一个制动鼓销子也没有车出来，钳工等着要装的，今天你再车不出来，这个月的奖金，全要被取消了。”

那被摧的女工却吼道：“你别装积极，前天晚上加班你跑到那里去了，是不是又去那皇冠舞厅找那姓何的，小心我告诉你老公剥你的皮。”于是两个嘻哈打笑地拉扯起来，向车间左边那排车床走去。

原先暗淡的车间，开始亮起来，几台洗床开始有气无力的运转着，工人们慢慢地回到自己的车床前，或钳台上去，一天的工作算是启动了。我回过头去看看技术室前面的钳桌上，那刚刚口若悬河发布“快讯”的胖子，还坐在钳桌上同几个老工人继续在讲这个月的奖金分配。

看到这样松散的工厂，又一次使我后悔，但这年头，到那个单位，那一个地方还不都一样？看今后怎么发展吧？于是提起装着绘图仪器和记录本的帆布包，随着张主任一起跨进了技术室。

那屋子里光线极暗，迎面一股霉气向我们扑来，仗着那办公桌台灯我看清了，屋里放着三张办公桌，里面的墙和门对着的地方，两张办公桌前已坐着两个人。只有左面墙边的办公桌是空着的。

我们进去时门对面的那一位转过身来，张主任向我介绍说，他叫黄祥老师傅，看上去他的个子很矮，但非常结实，年纪与我相近，在总工办就听到关于他的介绍，知道他是工人出身，由技工提拔起来的技术员，颇有实干精神，是我今后长期合作的伙计。而另一位姓张，原是部队转业到地方来的技术员。

张主任出去以后，我在剩下的那张办公厅室上放下帆布包，打开抽屉，三个又肥又大的蟑螂在里面乱窜。抽屉也生霉了，我一边从屋外打了一盆水，洗擦着生了霉的办公桌，将帆布包里的绘图仪器，一边往里放，一边担心的说，这些仪器和书会不会今后霉坏，或被虫蛀咬？

黄师傅向我介绍说：这屋子是靠山修的，与地下室差不多，已二十多年历史，修房子时我才进厂，每到下雨那墙上就渗出水来，当时正是灾荒年间，国家没有钱，在车间旁边傍山塔个砖柱棚临时用着。

我又抬起头来看，屋顶盖的石棉瓦，有几处已经破裂，看得见那里漏出来的光缝，于是我指着那光缝问道：“下雨天不漏雨么？”老黄回答道：

“这石棉瓦，早已老化，后勤科的维修工也不知来了多少次，他们说那石棉瓦是整块式的，要换就得整个屋顶都换，只好将就着，等到工厂挣了钱，把车间从新拆掉，可惜，从建新车间的话，已二十多年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工厂一直穷得连厂里的环厂道路都修不起。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看到新的车间在这里从新站起来。”

他说时声音里很悲观，这可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对工厂前途的估量。

“工厂今年赚了那么多钱，李厂长不是提了一个工厂技术改造的方案么，改造各个车间可是这个方案的第一内容。”我说道。

然而黄师傅却说：“你别相信他的话，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拆了车间又搬到那里去？何况这钱赚到那里去了？李友这个人，我已同他相处多年，他能干得

出什么好事？除了安置他的亲亲戚戚他还能干出什么来？”

黄师傅介绍的李友为人和业务能力，大致与总工办所介绍的情况相吻合。

然而，福星高照，1984年农用汽车制造厂当年实现了100万利税，不仅顺利达到国家对三级企业这个指标，为李友涂上了一圈光环，在全国普遍的经营不振，亏损严重的国营企业中，鹤立鸡群的脱颖而出，荣登四川省1984年度四个盈利大户的光荣榜，李友碰上了最得意的时光……。

那些正为国营企业的困境，弄得市政府的官员一筹莫展的时候，记者便抓住了这个典型，频频来厂采访，大量报导农用汽车厂的“事迹”，以及不知道怎么拍出来的照片，把这家工厂吹得上了天，不但突破了重庆范围，还突破了四川省的范围，好名好利的李友岂可放过这人生一世，只此一回的风光时日？

他频频地和蔼可亲接待着所有来访的记者，李友的巨幅照片见诸重庆日报，四川日报以及经济日报报端。而他的长篇论述，在经济日报的显着版面登载，农用汽车造厂1984年底醉熏熏地蹒跚在农民抢购汽车的春风中，而李友却驾着这抢购的春风，名利双收。

然而，正当这位四川企业的明星每天出入各种招待会，酒醉半酣同来访者，上级和政府官员合影留念时，全厂几乎所有的职工，从“财务快讯”中知道，工厂每天都把发横财得来的钱，通过李厂长等“领导”的手，大把大把的塞给那些对工厂毫无贡献，甚至是些与工厂毫不相干人的口袋里。

那被奖金激起的兴奋，迅速地化成牢骚和唾骂，人们指着这段时间进出厂门的小轿车骂道，又是一个“吸血鬼”来吸我们的血了。

国营企业的所有权是不明确的，大家说工厂是厂长的，这太荒唐，因为工厂真是厂长的，他能将自己的钱随便乱撒么？他能对工厂混乱的管理置若罔闻吗？他能自欺欺人做表面文章么？

国营企业的大锅饭分配是使职工怠堕的温床，是千真万确的！表现之一便是职工借各种渠道从生产工人向着科室和库房管理“挤”。

偷懒的工人被管理者督促时，反唇相讥的回敬道：“你再积极也只是个工头，你有本事去叫那些坐着小轿车，吃得嘴角流油的人干活吗？”更恶毒的人当即咒骂道，“你看你那熊样，只会欺侮我们这些穷工人，在当官的面前你自己照照自己，还不如一条狗。”

被骂的人只能张口结舌，久而久之，车间主任也讲，“得过且过，何必多得罪人自讨没趣，”无论生产任务有多急，每天早上必延至九点半才开动，平时断断续续地劳作，每天工作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那怕工厂再好的效益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这便是大陆中国的国有制企业。

正当农汽厂销售正旺，产品脱销，十二月底，总装车间却传来了停工待料的消息，因为缺车轮钢圈，看看已经装好的底盘却上不了轮子，底盘因此中断供货，总装车间停产。黄色大楼的生产调度会，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管生产的副厂长在生产会议上责问经营厂长，说道：“你怎么连汽车走俏，汽车零件也会跟着走俏这点常识都不懂？为什么不理生产科第三季度提前预报的采购计划，造成这种缺钢圈的事情发生？”

经营厂长面对生产厂长的怒容，明白在目前状况下停工待料，就像行军打仗断了粮草一样严重，他会因此被扣奖金，甚至降职撤职。

所以连忙解释说：“因为对零件涨价因素估计不足。其中涨得最快的是轮辋，与今年年初相比价格涨了一倍，如果在五月份按生产科所报计划采购，那么，资金投入就会大大超出预算。李厂长预先就打过招呼，凡是超出的资金必须经过他批准，所以我们把采购轮辋压了下来，请示李厂长的结果。

他指示说：‘到今年年底还有好几个月，估计年底时价格会回落，等到十一月份再买不迟’。这么一决定，轮辋就没有按生产科的计划采购，殊不知等到十一月，轮辋非但没有降价反倒来了个缺货，再高的价也买不到了。”

一般说，责任追到法人身上就告终止，李友又是走红人物，日理万机情有可原。何况这“估计”谁又能算得那么准？

生产会议兜着圈子整整吵了一天，毫无结果，责任者一个也没有找到。所有参与生产、供货、技术各部门都可用恰当的理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虽然他们心中十分明白，如果工厂是为自己生产，那么无论哪个部门都有办法克服这种事发生。

生产会议最后只能责成供应科，赶快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抢购，过年也不许休息。商场如打仗，对于瞬息万变的供应市场，谁又能料到农汽厂会因一个另件，而眼看千载难逢的大好赚钱机会白白丢掉。

过细想来，这位连汽车紧俏时该多多备货这点能力都没有的老同学，怎么配带领这千余职工在商海里去拼杀？他是否知道在自由竞争之下，商机都抓不住的人只有淘汰出局？

眼看那些提着钱袋，焦急等在销售科窗口下的农民，听到几天内无车供应的消息，早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带着失望匆匆散去。

他们可等不起，私人贷款的利息并不会因为买不到车而免付。春节时期运输黄金时节，他们巴望买到一辆货车，拿来搞运客运货，把赚的钱尽快抵偿这笔“贷款”，于是背上钱袋连夜起程到省外抢购卡车去了。

这位老同学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还比上了这些普通农民。农用汽车制造厂在脱销情形下，因缺汽车轮胎钢圈，元旦将要到来的时候放假三天。

在农汽厂有史以来的“大好形势”下，每个人只领到五十元的过节费，却要拿五十万去贿赂钢圈厂的厂长！

李友被钢圈的事扰得心烦意燥，但看到他的巨幅照片仍照登在重庆晚报上，在那画面上，他微笑着向全市全区拜年，代表农用汽车长恭祝大家 1985 年元旦快乐发财，心里便心安理得下来。我却对他笑容可掬的照片发愣，难道他真失去了自知之明，不明白他所管的这家‘明星’企业多么混乱和虚弱吗？

1984 年在热闹和争吵中过去，鞭炮声迎来了新的更加热闹的 1985 年，按传统的中国民俗，旧历腊月三十才是一年的年底。元旦过后，年关在耳，所有职工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年末奖金的分配。

没有几天，劳人科关于 1984 年末奖金分配的红头文件，下发到车间和科室，党委书记马兵根据机械局颁发的文件精神称：“要打破平均主义的传统作法。”所设的奖项和每个奖项的金额规定，奖金按发放的系数“拉开距离”。

如果现有工人领到的系数为 1，那么凡属厂级干部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几个副厂长奖金系数规定为 4，中层干部及车间主任系数为 3，技术人员和一般干部和工人中的班组长为 2，第一线的工人为 1.5，勤杂工为 0.8。

厂长的奖金是工人的四倍！但马兵还嫌不够，接着又抛出一个各部门负责人，兑现承包合同办法，对于完成任务的厂长，职能部门和车间负责人发给额外的承包奖。这样一来，厂级的头头们可从 1984 年年末分配中得到六千元的奖金，车间主任也不低于三千元，而工人只分得三百元，于是这距离在年终奖上就拉开了足足 20 倍。

同时他还抛出一个名额占全体职工的 5% 的“先进”指标。被评上先进的人当年工资增加一个序号。奖金分配、承包兑现、评选先进三大年终分配办法，颇费了马书记一翻心机！这敏感的分配方案，以职代会的名义，由劳人科正式发布。

胖左派迅速站到工厂门口，当着做工族们吼到：“工厂是工人的，厂头们白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劳动，还要借开会出差公费旅游，吃吃喝喝全是我们工人的血汗，而工人们成天埋头在车间里干活，到头来一年辛苦，我们挣到的奖金只有他们的二十分之一，这叫飞起来吃人，这里还讲不讲理？”

劳人科办公室为年末奖金分配闹得乌烟瘴气，可惜再怎么闹，奖金的分配仍按红头文件规定条文执行，工人们也只有吵吵架，充其量说些：“老子干得再多，还不是替别人干。”“老子巴不得停产，大家都不要得那钱。”磨洋工，上班迟迟不动工，提前下班，懒懒散散。

别以为工人们会团结起来声讨这些“吸血虫”。工人们发发牢骚是可以的，遇到具体的利益冲突，照样可以自相厮杀。这都是文革的遗风！！

马兵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那百分之五的先进推举，自然成了工人间相互指责的导火线，因为这 5% 的先进是与当年工资升级挂起勾来的，工人们在提名上相互攀比，车间到处是推选“先进”的争吵声……宁可使生产停下来。没有选上的人说：“让评上先进的人去做。”

这样闹了几个月。在大锅清水汤长期泡惯了的国营企业职工们，本就习惯于低工资这种“平均”所营造的宁静，现在被马兵们扰乱了。

权利在手的工厂经营者，在中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差距”的掩护下，故意放纵贪污。掌权而不受监督的中共，使工厂管理者腐化！他们羡慕资本家的富有。认为富裕是人当然的追求，不必追究怎么致富。然而，靠权力致富这种共产主义效颦，恰恰成了公开的掠夺。

按照工厂的规定，进厂不满一年的职工，奖金是要“打折”的，但我在车间主任那里还是领到了三百元的年终奖。我才进厂，还不知道同人比较，但这笔奖金是我在学校几年所得奖金的总和，加上进厂五个月发的月度奖总共五百元，够买一台“福日”彩电了，邻居们羡慕我走了好运，调进了一个“好单位”。

年三十的那天下午，我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中碰到了李友。又碰上厂办的黄色伏尔加轿车从左面公路上开来，我远远看到那辆车就在李友身边停下，满面红光的马兵精神抖擞地从车厢里走了下来。

他身着黄色皮大衣，提着装有保险锁的高级提包。一下车便迎着李友向他

伸出的手紧紧相握。在一片“辛苦了”的客套话声中，两人互道问好并拜了年。

马兵是奉厂务会议决定，专程派往南京汽车制造厂乞讨钢圈底盘的“钦差大臣”，今天上午才赶回来过年。只见冯、李二人肩并肩向厂门走去，那马兵还不停将嘴凑到李友耳边，好象密告不容他人听见的秘密信息。我的心中又是一阵纳闷。这么紧急的采购件竟没有带上采购部门的人同行，令人疑心。

与马兵几乎同时外出的工厂生活厂长肖足，据说是为筹集即将动工的油漆车间的厂房，和已经批下来的三幢职工大楼的木料，专程去西双版纳等地采购木料的。

油漆车间的技术改造是李友在验收达标时，向市验收工作组和上级主管局提出来的。他要求工厂今年实现盈利的三百万全部留在工厂，作为他上任提出对工厂实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

为了在主管局换得信任，他曾起草了工厂技术改造近期和远期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提出了一个改造油漆车间、冲压车间、金工车间、冷作车间和总装车间等八个技术改造项目。

这个夸夸其谈的技改方案，当时曾赢得重庆市主管局的喝彩。由于这个计划，李友被提名上了四川省 1984 年度的四大明星企业厂长的光荣榜。在四化口号下，有多少赵拓应运而出啊！

我判断，这样的计划是当时最时髦的假大空产物。因为以后的实践证明，计划提出既没有市场需要为根据，更没有工厂所能承担的物资、资金为依据，单凭一个突然因国家向农民发放贷款而暴富怎么可能实现？

至于李友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是用农汽厂发横财的机会赢得中共当局的好感，还是另有图头，自会在不久之后暴露。不管怎么说，1984 年工厂发横财挣来的 350 万盈利，全部留给了工厂作 1985 年技术改造资金投入。

根据 1985 年度李友技术改造规划的第一项目——改造油漆车间，老同学趁热打铁，启动了重庆市的媒体在各种报纸和广播瞎吹，说这是迄今为止，前处理容量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除尘效果在全川最好的一个车间。在油漆车间掩护下，新的职工宿舍大楼同时启动……

三幢职工宿舍，各七层，共 78 套住房，其中二楼三楼全是“工程师住宅”，共十八套。每套建筑面积近 100 平方，每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厕，是当时北碚地区的厂长们都没有住到的最豪华住宅。

竣工后，搬进去住的第一户人家当然是李友，当我和工人们一样，还在为遮风避雨的陋屋发愁，老同学却嫌那三合院的两室一厅欠气派。他打的这个算盘，可比马兵在奖金分配上的主意高明多了。

三幢大楼预计投入百万，然而破绽还是被基建科的杨科长识破了，他说：“按照李友提供的三幢住宅的房屋设计要求，这一百万恐怕只够修一幢大楼。”

与此同时，去云南采集木材的肖付厂长，被人发现，买回来的近二十个立方的木料，运回北碚时并没有在大白天正大光明的返回本厂，而是深更半夜，开进了天生桥附近的一个竹木社坝子里卸下了。过了两天，又派车到那里向竹木社“购回”。

这种奇怪的过程立即被胖左派抓住，他们私下从竹木社采购人员口中证实，

两天后从竹木社买回工厂的木料，价格竟然高出了云南价格的两成！这种倒卖使他把五万元捞进了自己的腰包。

闻到这猫腻味，胖左派并不甘心，再深入的向竹木社打听，由运木料的司机证实，在购木料期间，利用派去运木料的卡车，从途中的威远铁厂将几十吨生铁运到重庆倒卖给铁作社，估计从中至少又获利五万元。

问题迅速传到了工厂纪律检查委员会罗书记那里。那罗书记竟然不作调查取证，而是将这件事全部的抖给了肖付本人：“有人反映你在云南运木料时，与竹木社勾结，经过竹木社的倒卖，从中牟利，请你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案情发展，我都是听说的，不想在这本书中占据篇幅，只想说罗书记正式的提讯冉某，冉某被追急了，最后凶相毕露说：“我劝你还是知趣点，不要再追了，追下去这个工厂所有厂长书记没有一个脱得了手。”罗书记自觉棘手，他明白不能再追下去，案子在他手里便不了了之告了终结。

那时倒手买卖已经在国内成为风潮，大官大倒，小官小倒，正名曰：“做生意”，搞活经济，似乎于经济发展有利。倒的钱也不知道滚出多少利，最后都落进了中国特色倒爷们的腰包。

社会主义先富起来的“阶层”，便从这些手段中一步步累积起来。倒得不好，暴露了，受到查处（以后叫双规），充其量只是一个撤职查办的行政处分，何况倒爷们互相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久传来消息，说某地银行负责人，因收不回向农民发放的贷款而受到追究，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摸索中又遇到了问题。银行不可能向农民持续发放这种难以保证收回的“风险投资”，农用卡车也不可能长期由几家农用汽车厂“独家”生产。

然而在诸多不利条件下，最不该因缺件而影响生产的因素，首先起了作用。因为轮胎钢圈迟迟不到位，在短期的发财季节里，八五年一月份的产量仅仅只有十八台，二月份装车实际上只完成了十二台，三月份也只完成了三十台，三个月装车总和不及正常情况下一个半月生产量的一半。

黄师傅气愤的说：“这点产量，别说是发奖金，恐怕供一千人喝水都不够。”

然而，人生一世几回才逢得风光的机会？该出风头的时候还得抓紧机会。春节刚过，全厂便抽出一天，整队到油漆生产线的工地上，那天正好起了大雾，布置在工地周围的彩旗在大雾中隐隐拂扬，党政工团敲锣打鼓的捧场来了，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群记者，背着照相机在大雾和彩旗中穿梭！

今天选了个黄道吉日，定为给油漆车间奠基剪彩的好日子。李友态度严肃的主持了这个仪式，他发表了工厂未来四年中美好的规划，他的演说依然那么富于词令和感情。四面的照相机照例又对准了他，发出一阵喀嚓喀嚓的响声……

可惜，光阴并不饶人，农用车走俏的大好时光，也是老同学踌躇满志的岁月，像箭一般倏忽而过。到了四月份，所缺的钢圈和其它总成的供应源源不断的跟上，生产也开始恢复正常时，唯独排在销售科办公室窗下等候“提车”的队列却悄然的消失了。

有人说是农忙季节来了，买车的农民要赶着回家种粮食、插秧。有人说是

我厂生产卡车的质量常出问题，所以买车的人都跑到其它生产厂家去了，农用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由脱销变为滞销。

但是，既是“明星”厂长，岂甘束手无策？更不可能露出半点慌张，为了挽回即将到来的危局，他必须摆出一付胸有成竹、稳扎稳打的样子。于是他立即在销售公司召集了紧急工作会议，短短的开场白以后，便从皮包里取出了一大扎的材料，打开后，摊在与会者的面前。

那是些用户一大堆关于质量投诉的复印件，以及几十封用户的检举信。那上面指名点姓告发销售科的工作人员如何无礼地谩骂顾客，如何变着花样逼着用户掏钱请他们进高级餐馆，送高级香烟和高档名酒，以至于钱。

厂办秘书小吴一边读着这些信，李友两眼盯着这些在汽车走销时，动辄就在顾客面前甩牌子的“骄子们”的反映。今天他是来抓替罪羊的；李友把滞销的第一板子打在销售公司的段经理身上。小吴刚刚把选择出来的信读完，老同学故作愤怒，责令销售公司经理老段对这些用户来信作一个交待。

然而老于事故的段经理，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抓来的替罪羊。工厂短期暴发时厂长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谁才该负这个后果责任他心明肚亮。那时，厂长吃饱喝足名利双收。现在工厂走下坡路，却要他不明白的承担所有的责任，他当然不会听人作弄。

他不紧不慢从夹子里取出一叠三包服务的记录和用户来信，从容地朗读起来，那上面不仅记录着用户刚刚才接手的新车子，在路上就发生诸如刹车蹄片没有调整好，使制动抱死，刹车失灵；因为线路接错，而使全车线路烧坏线；因汽缸油路不通，而使发动机活塞卡死；等等。

大家一听都明白，这些问题是装车件的质量低劣，供应质量保证体系没有建立的原因。

于是整个会议将责任从销售公司转移到产品质量。段经理把滞销的原因归结为产品质量的低劣，以及生产部门和质量部门和供应科的失职。

然而供货厂家和检验科长又在会议上出示了检查报告和记录，证明各种质量问题早已记录在案，并且上面批着“不准进厂”的检验记录，只是因为脱销和缺货，由李友在不合格的判决书上签上，“此批放行，下不为例”的批示。

问题又重新追回到李友身上，厂长主持的厂长会议就这样玩着踢皮球的游戏，从早上八点钟，一直踢到下午三点钟，整个会议室被香烟的浓烟包围着。所有部门负责人，都起劲把球从自己门口踢到其它部门，谁都不承担责任，谁都对挽回滞销的秃局提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

像这样的扯皮工作会，十年一贯如此。我看见老同学在香烟的浓雾中显得焦头烂额，工厂发财时风头出尽，如像过雨云烟般晃然而去？他曾在半年前听到的后果，竟这么快降临了。他看着面前正在猛踢足球的人，那一个没在工厂发横财时没沾过光？而现在又有谁能替他分忧？

他脑子里浮现着满坝的“兰地毯”，库房堆积着数千万元的另部件积压，面对财务科长哭丧脸，第一次感到给全厂职工发工资的担子这么沉？他在考虑怎样从明星厂长的位子上体面退下来了！

反过来一想，亏损出现使他混不下去，充其量将他另调个地方，从新东山

再起。于是他又松了口气，现在该思考如何找客观原因体面的退下来了。

于是，他从浓浓的香烟烟雾中抬起头来，打起精神作了小结，在对各部门各打二十大板后，发出了一道责令限期整顿的指令。

然而他回避了因轮胎钢圈缺货造成的停产。也不提各部门的头们如何用公款吃喝玩乐，对于汽车券的倒卖和肖付倒卖材料只字不提，对马兵过年前提走的五十万就像没发生一样，他知道，提及这些眼下很敏感的问题会引火烧身。会议毫无结果散去。

正当农用汽车造厂开始亏损滑坡之际，一个由马兵签发的劳动人事科〈关于 1985 年度农用汽车厂调整工资的决定〉的红头文件在全厂下发。按照当时机械工业部有关企业职工调整工资的条款规定，企业只有在当年获取利润以后，才可以按照所实现利润的一定比例用来增加职工的工资。

由于连年亏损，农用汽车制造厂的职工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升过工资了，据黄师傅告诉我说，北碚市民有一段时间曾评说，在菜市场上为两角钱一斤的毛毛菜，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的都是农用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物价飞涨而没有效益的农汽厂职工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工资升级上面。

牢牢掌握工厂管理大权的马兵们，不顾工人们的反对，下发了由他亲手制定的 1985 年工资升级办法。

这个办法把全厂职工按岗位和业绩划分了四个等级，厂级领导和对工厂有“特别贡献”的人列为第一等，可以在本次调资中晋升七个“半级”；中层干部和有工程师相当职称的列为第二等，在本次调资中可以升五个“半级”；第一线工人列为第三等，本次可以升四个“半级”；勤杂工、清洁工、库管人员列为第四等，本次晋升三个“半级”；同时规定凡是无故旷工，不服从分配，有过违法行为受过拘押的将视情节减少升级的数目。

老同学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说得很漂亮，他说，现在是在企业获得大盈利后的丰收季节，也是大家分享劳动成果的季节。

而工人们则一针见血的说：“掌权的人那一个不是在任职期内往自己的腰包捞钱？暗地里要捞，走后门，倒买倒卖，收回扣，权钱交易花样百出！公开的更要捞，奖金要多占，住房要多占，升工资要多升，否则一个人当了几十年厂长，不明不白的“富”起来了，今后查起来也有个依据。

中央既有政策，所以在利益上，职位越高心也越黑。以经营付厂长李德为例，他的妻子是财务科长，女儿是工会干事，女婿是总装车间工段长，在本次调资中，全家共增加了二十二个半级，而工人中的生产骨干在本次调资中只增加了四个半级。两种家庭，经过这么一调资，增加的工资就悬殊了五倍。

工厂的贫富分化过程大抵正反映了全国的两极分化过程：仰仗权力而富有，无权无势则贫穷。不义之财是脸厚心黑得到的，然而恰恰也加速了这种制度的解体。

一场争夺升级的大战又一次被点燃了。能运用关系与权力挂钩的，则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能讲关系的就凭吵骂和拳头来挟持各级调资领导小组。科室之间，车间之间，人与人之间几乎都放下工作，互不相让的打“争级战”。

这种白热化的争夺，一直延续了两个月。在吵架语言的流利和用辞的刻薄方面，我素来以为四川人堪称全国之冠，这骂街尤其是城市平民家庭妇女的“长项”，这是一种以使对方当众出丑所产生的威慑力，压迫对方让步的方法。

我所在的车间计划员王某和库管员周某便是全厂闻名的吵架能手，两个人就凭着一双利眼和揭人隐私的利嘴，使车间里的人谁也不敢轻视她们，就连车间主任在争执时，都要让她们三分。论年纪她们还都只有三十来岁，一个车工，一个钳工，正是生产第一线干活的“骨干”，但是，在全厂“向第二线转移”的热潮之下，她们就凭着自己的泼辣，向张主任提出安排二线工作的要求。

开始，这位车间主任对两位泼嘴提出的要求采取缄默的态度，结果被王，周二人抓住私下安排过车床在夜间干私活的几次“违章”事件，一阵冷言风语，迫使这位主任对她们策略一下。许诺了两人从钳工班和车工班退下来，一个安排去做”计划“工作，另一个则安排为车间的工具库管理员。

国有企业的职工对于调资的认真，远远超过对工作的认真。因为工资级别决定了一个人长期的收入水平，一次调整和升级在毛泽东时代几乎十几年不会遇到。邓小平时代开始，工资经常调整，但是因为过去留下来的穷困使升级特别敏感，工厂的调资向来采取平均主义。

几年前工具车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因为一个工人的病假超过了工厂的规定，在调资时少调了一级。

虽然这一级区区只有四块钱，但那工人却以“一辈子”为借口，提着砖头去找主任评理，当场用这块砖头，猛击对方的头部，当即昏死过去。工人被拘留，他的家属就到位主任家里坐着要饭吃，吓得这位主任在外躲了一个月，后来就辞去主任的工作不干了。

马兵四级划分的办法保证了厂各级管理层的利益，他心中十分明白，因为生产工人最苦，因不满而发生的越规行为也最多，所以他指令把调资的总金额划到部门，矛盾因而下交。崔科长自然明白马兵的意图，金工车间在得到劳人科所划的升级方案以后，不敢怠慢，便将分到的名额又摊给了班组。

车间对所分到的级别落实到人头时，对照文件算的级别与劳人科调拨的级别差了两个级，与劳人科再次核对，问题恰恰出在两位新近才从第一线下来的女工身上，工厂管理在编制上极为混乱，计划员本归于干部的名额，但若从工人转岗时，两个人既不属于干部编制，又不属于一线定额工人。她们只好委曲于少升一级了！

两人找车间主任说：“工厂已有三年没有调资了，这三年里两年零十个月都是在第一线干。现在才干了这么一个多月的库管，怎么在确定升级时，把她们当成了勤杂工”？车间明知公开照搬调资方案，一定会大闹一场！于是，把他们向劳人科一推，要她们直接去找劳人科理论。

两人商量好了，就去找劳人科崔科长，崔科长明白两人的来意，还没有等她们开口，就把马兵关于这次调资定级的办法拿给她俩看，王秀根本就不去看那文件，吼道：“那马兵从西双版纳内转业回来才几年，就想欺侮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老职工了，他在这次评级中升了七个半级，而我们才升了两个半级，你把马兵叫出来，我们评评理。

黄色大楼里两张利嘴尤如两挺机关枪，整个楼里回荡着女人的尖声叫骂，所有的办公室都打开了窗口，伸着头向劳人科指指夺夺，骂声随处可闻，劳人科处在责骂包围之中。

马兵挺知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李友打了一个电话，请李友帮忙调停。李友劝说两个女工回去，条件是立即给二车间增补两个半级。

两个女将得胜班师，临走出黄楼还大骂崔科长，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可是没有一个星期，车间的张主任被解聘。但为了怕战火再持续下去，张虽被解聘，但本次调整工资还是保留了他原来加的级。。

升级的风波刚刚在金工车间平息下去，却在工具和总装车间从新点燃，工具车间一位姓黎的女工平时因为爱跳舞，住在单身宿舍经常深夜不归，白天睡懒觉，迟到旷工多了，这黎小姐该被取消升级资格，不过车间主任知道这女孩不是好吃的果子，没敢全部取消她的升级资格，只留下了一个半级指标。

殊不知黎女士将这件事与她相好的男舞伴通了气，没过几天，车间主任在上加班回家的路上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围在小巷里痛打了一顿，幸好没有被捅刀子，只是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家里睡了整整十天。

厂部报了派出所，可是那凶手却一个没抓到，从此以后，这位车间主任，只好自认晦气，再不敢行夜路，对以后的奖金再也不敢克扣工人了。

总装车间一位女工，因病假超过了工厂规定的时间，这次被取消了升级的资格，结果她想绝了，喝农药自杀，幸好被及时发现，当即送医院抢救，等她从昏迷中醒过来，对丈夫的第一句话就是要为她报仇。主任听说，慌忙赶到医院陪小心。

中国人的胆子像一根橡皮筋，有时气壮如牛，有时胆小如鼠，十分脆弱。为升半级工资，可以拼命，而真正要拼命时，偏偏退缩了。马书记一个调资办法弄得全厂鸡飞狗跳！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所谓按“贡献”和“业绩”拉大差距的原则，本就可以随意解释，谁掌权，谁都会站在确保自己利益的立场上。

对比起来，在“收获”中抢得最高明，抢得最快，也抢得最隐蔽的，莫过于我的老同学，对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趁工厂发横财机会，捞到一套 100 平方的高档住宅。

工程师住宅楼的兴建，是李伦根据国务院文件提出来的，当设计人按照这位厂长的意图绘制了设计图以后，财务处曾根据这个设计方案预测十二套工程师楼层，耗资之大，相当于整个住宅投资的三分之一，职工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人公开反对工程师楼，主张增加户数，减少投入。

然而，李友心中十分明白，错过这一次机会，以后恐怕再也不会得到了。所以，他再次利用权力，武断做主，批准了工程师住宅楼的设计方案，并从原先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中硬拨出钱来，并令颇有“倒”爷经验的生活厂长肖付，全权负责三幢职工大楼的建筑工程。

继油漆车间动工后仅一个月，云泉路上的三幢住宅大楼便开始了平填地基。

胖左派再次发表“快讯”，说肖足在确定住宅承包商时，从承包商手中得到了三套红豆木家具的回扣，他除了给自己留下一套，也给李友留下一套，不过，

当时在与论作用下他没敢接受，等到房子分到手，人们才发现，那套家具已放在他的客厅里了。

用工程师的称号，修的工程师大楼，主意是李友出的。大楼一修好，骂声便跟随着他走墨城而雀起。

就在八四年下半年至八五年上半年，农汽厂走运发财的好日子，也成了“后门”最拥挤的时间，由李友带头，工厂各级“领导”都争着把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子女，巧寻借口拼命往工厂里“塞”。这些人没有任何调动手续，就只要厂长们点头，都可以从劳动人事科进入这家“肥得流油”的工厂。

仅我在的金工车间，在这段时间内招入的“工人”就有几十人。这些“工人”进工厂后，又被陆陆续续调往各办公室、后勤部门以及库房。“后门”现象既已成为工厂常见现象，习以为常，连胖左派的“快讯”中似乎都忘记了这件事。因此，这家千人编员的工厂不到半年便增员为一千三百人！

改革开放年代初期的企业，由政府机关任命管理者，在阶级斗争年代，穷得没房住，现在他们发现真正需要的原来是房子，票子和儿子！于是他们便附在刚刚有一点血液流动的工厂血脉上，拼命贪婪的吸血。

在所能伸及的范围里，用手中的“权”唯恐不及，伸出去的手唯恐不达。在这个中共惩戒贪官的办法仅限于“党内警告”的年代，正是中共大小官吏抓紧进行原始积累的大好时机。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绿灯下，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利用掌权的机会，从上到下的贪污。中共各地官吏无不如此，国有企业更是如此。邓小平为权力致富大开绿灯。

到了1986年以后，中共上层才迫于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得不对喽罗们杀鸡给猴子看。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余铁民案子的处理，在报纸上大张旗鼓的给以公布，以收受贿赂三万元，判处余铁民无期徒刑。其实三万元是当时高层官员的一笔数目极小的“外快”，三百万、三千万又算得了什么！

到了十八年后，即2004年，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2004年1~11月全国抓出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子共36509件，涉案四万多人，增长之快数量惊人，仅仅披露的原温州市付市长杨秀珠，1996年竟在办公室里用批示文件的形式一次就吞了1100万公款。

依据1993年全国纪律监察机关向全国公布的数据，九十年代，共有三万名地厅级以上官员，因贪污贿赂受到查处。从1990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各种涉及高层的案件110万件，立案50多万件。

以我所在这么一个千人工厂，掌权的管理者没有不捞的，上面所记仅一年所见所闻，这种制度下吃亏的当然是工人。

不过在这“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底层企业中，虱子们所吸的血常常面临枯竭的危险。充满贪污而脆弱的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总是逆着那些做着横财梦的虱子们的意愿，使他们的梦想在现实中变成了一串串的泡影。

正当这家工厂厂长们为升工资和营建职工大楼闹得乌烟瘴气时，85年8月，经营办公室便向厂长们传递当月亏损的报表。报表显示，因滞销而造成材料和部件在库房的积压已突破了两千万，而且当月已呈现了十六万的亏损。

李友在得到这个报表后，马上赶到经营办公室，向全厂职工宣布已经找到了扭转亏损的办法。相信眼前出现的这点小困难，一定会在不久之后得到克服。可惜，那些由一辆辆卡车编织起来的兰色地毯，每天都在将工厂亏损和积压的噩耗，无声地告诉给全厂职工。

正是：“……枉费了意悬半安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第三节：遭逢绝境的农汽厂

仅仅保持了半年旺销的农用车，由于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在国家取消了向农民贷款后变成了滞销货。到了年底，停放在工厂范围里已装好的卡车已超过了五百辆，成了无人问津的积压货，地域本来不大的工厂实在停不下，还租用了厂外的场地。

密切关注本厂经营情况的银行，早已向工厂的财务科提出了“质询”，认为农用汽车制造厂再不打破滞销局面，继续的盲目投入，无疑会造成更多的积压，工厂像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只好停止注入资金。

老同学已明白，自己已经骑在狂奔的虎背上。农汽厂像一个陷入赌场的赌棍，发够横财后，随之而来的是狂输。卖不掉的农用车仅仅因为资金冻死，工厂就要承担可观的利息，为了减少亏损，最好的办法就只有停止生产。

但这样一来，工人领不到工资，一千多人的生存面临着威胁，工人们首先会到市政府请愿，愤怒的工人会砸他的家，一切后果都要发生，当然也包括要到手的豪宅全都只好泡汤。

虽然他大不了被撤职或调一个工作，但他经营的一翻事业，和利益全都没了。这个时候他如坐针毡，他给农业局打电话，给各个在几个月前热销的农机公司经理打电话，想办法打开销路。然而，那些热销时的酒肉朋友居然不接他的电话，有些连人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胖左派的“快讯”却因此发得更勤，把工厂的亏损及时的向大家公布。从85年年底开始，农汽厂的亏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银行首先将准备为职工调整工资的专用储备金冻结了，理由很简单，上级有明文规定，处于亏损期间的企业是不能调升工资的，于是吵吵嚷嚷的调资终于没能实施，这是虱子们始料未及的。

现在，眼看大祸正在迫近，工程师大楼却抓紧进度，尽量提前竣工成为李友最关注的事。

工人们在这个时候“团结”起来了，他们自发地组成了以曾元为首的调查小组，收集证据，写成了马兵、肖足等人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列举伙同倒卖钢材、木料，收受建筑承包商贿赂，以及公款旅游，吃喝玩乐的十大“罪状”，并以联名上访的形式将这个材料送交市委。

在老黄介绍下，各车间准备到市府上访的工人们找到了我。

我进这家工厂才一年光景，情况并不很熟悉，加上来厂时李友的友好表态，我一时还不好同他闹对立，但我已经凭着我一年多的观察，获得了这家工厂一

个轮廓的概念。在老黄介绍下，我把大家提供的情况整理出来，写成上告材料。

然而，接到这个材料的市委信访办经过了一翻“认真”研究，认为现在否定半年前还在报刊上发表“治厂经验”的“明星厂长”，实在有点自己捆自己的耳光，何况，全国的工厂像农汽厂类似的多如牛毛。

现在最好把这些收到的“检举材料”原本的交给马兵他们，由他们自己来“正确处理”吧！这叫依靠基层！是中共又一法宝，否则全市上千个企业工厂，哪一个没有这种乌七八糟的事？主管局这几个人处理得下来么？

我所代笔的材料，没有逃出所有寄到上级机关的上告信所共同遵守的轨迹，一个月后便回到了马兵的办公桌上。看到这封材料竟是出自我的笔迹，老同学和马兵感到十分意外。进厂一年半来，由于我的沉默，所以李友和马兵几乎将我遗忘。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些材料令他们震怒不已。

倘在毛泽东时代，投寄这类材料的，是五类家庭出身或本人就是五类分子，那么轻则把投信人叫到办公室里训斥一通，指责对方无中生有；重者召开批判大会，把写材料的人抓到斗争会上斗到低头认罪‘当众消毒’为止，甚至根据材料摘章引句，申报专政机关立案侦察。

倘若是普通职工联名上告的材料，则由基层党组织逐个调查。凡档案中有污点的人，立即传唤，给以警告。就是‘根红苗正’的革命群众，也要按组织程序，不能越级突然袭击。‘党天下’之下，基本上不会有告发组织的材料越级寄到上级部门去。

现在形势变了，党内分裂变成公开，腐败也一天天暴露，五类没有了，批斗会也不开了。

有一天，母亲从北碚区府带回了她的好友，北碚九三学社负责人倪尔云写给我的一封长信，那信上对我才从蔡家乡下调进这个厂才一年光景，就同厂领导唱反调表示担忧，她提到了我伤痛的廿年牢狱。

不久，马兵正式在他办公室里向我“摊牌”。那一天，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志，党办主任王珍及金工车间书记幸才已经等在那里了。看到这个“阵营”，我立即想到我在当年反右斗争会的场面。

他轻轻咳了一声缓和着紧张的气氛，然后慢慢地说：“你是本厂的职工又是干部，你应当熟悉干部应当遵守的组织纪律，我们厂的确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今天专门抽这么一个时间，想听听你对工厂领导的意见和建议。”

我瞅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由市里退回的这份材料，平静的回答道：“我向市里写的那份材料，是受托于工厂部分老工人的意见，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请你提出来。但是我认为既然是上告材料，那么上级部门有义务替我保守秘密，派人作认真调查。

现在既没有认真调查，又原封不动把材料转了下来，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自己清楚。至于我所写的这些材料虽不可能绝对正确，但那上面提供的事实和证据，我可以对它们真实性负责，但你们也应当对你们的行为负责。”

旁听的人面面相觑，是啊，谁又能保证上告信上所举的不会有错？马兵严肃的脸上迅速换成了笑脸，开始紧张而严肃的气氛缓和下来：“哪儿的话，老孔，

我们是想同你交换一下看问题的方法。

马兵满脸假笑：“我认为你看问题阴暗面多了一点，主流却被你忽略了。比方说：工厂今年的产值和产量都是建厂以来最高的，油漆的技改工程已经开始，车身面漆的起泡和质量会得到根本的改观，职工的住房楼也是我厂建厂以来从没有过的。工厂的一穷二白面貌一天天在改观，看问题不要老看阴暗面。”

不看主流而看支流，这正是中共当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击我们的主要理论武器。可惜，当年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污蔑”不幸被言中，在二十年铁的事实面前，后来中共给我们平反，正好证明了这点。于是我抬起头来回答道：

“既然你说看问题应当看主流，我就来谈谈这个主流吧！你如果是尊重事实的，那么去年这个时候达标升级整套东西是不是假的？当然，你会说这是为了应付升级，不得不这么做。那么工厂靠一时的机遇，把汽车涨价说成是领导的“业绩”，是不是也是假的？”

“就算天时地利盈得了一个能使企业发展的机遇，而工厂的领导却不赶快加强基础工作，在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上下功夫，却忙着在毫无贡献的条件下搞升级方案，厂级干部不论其贡献，就凭职务拿高过工人十几倍的奖金和升级，问心无愧吗？平时你们有谁踏踏实实考查过生产怎么在运行？有谁在认真的关心技术改进，却在大小报上吹嘘工厂如何提高了产品质量是不是又是假的？”

我停顿了一下，看看马兵今天招来的人不但没有反感，还露出赞同的眼光，便继续往下说：“内部的混乱几乎无人过问，如果你硬要否定这些，说我写的材料只看阴暗面，对工厂的成绩肆意诋毁，现在工厂每月已经产生了十几万的亏损，从整个趋势看，工厂的亏损已不可逆转，一旦工厂亏损超过了破产的警戒线，工厂是要破产的”。

“到了工厂无可挽回的时候，恐怕全厂一千多职工便要打你的扁担，你的职务未必能保住，到时候不但你的升级和住房保不得住，恐怕更可怕的后果都会发生。现在不是追究我所写的材料是不是诬蔑，而应当把这些工人们反映的材料，当成警钟严肃的加以对待，采取措施来挽救工厂了”。

“同时我还要建议你，你最好公开的把你批示的调资方案宣布作废，并主动将自己在这次调资中所升的七半个级，还给工厂，向工人们认个错，也许还能盈得人心，有助于启动大家一起止住已相当严峻的亏损势态。”

我的话完结，办公室里沉默了，马兵沉默了，不管他对我向市里投书材料有多么的反感和憎恶，今天他本想达到制止我的目的，现在也觉得考虑不周。他的沉思反应出他的尴尬。他原先精心安排的，“公开审问”以求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只好到此收场。

工厂的不景气却无情地撩拨着这一千多职工，他们再也没有像半年前那样，拿着比工资还多两倍的奖金，到市场上去称烧腊打白酒。而是重新回到一年前那穷样子，同挑担进城的菜农争分论两。贫困激发了他们去市府上告的劲头，。

然而我一点都没有因此心中感到舒畅，相反的，焦虑笼罩着我，我所争取进来的工厂，完全不是当初大家所羡慕的“米兜”，工厂的底子那么薄，现在又眼看着它朝着破产的轨道猛滑下去，年近五旬的我，恐怕要借助于“落实政策”再跳一次槽就不容易了。

何况我明白在这片国土上，大家都在穷窝里过，想寻找世外桃源是没有的，特别是我年近五旬还寄人篱下，若要想从天生桥那又霉又黑的危房中，搬进高楼大厦恐怕就再干上十年八载，等到我已经退休时都未必如愿。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胖左派发布的厂部“经营快讯”已把工厂累计亏损六十万的噩耗向全厂职工公布了。各个车间又一次提前放假，关心工厂前途的中老年职工，到工厂来每天打听情况。当他们走到工厂后面看到这一天天拔地而起的工程师大楼，不免又一翻强烈指责，他们对这工程师大楼是竭力反对的。

面对职工的反对，李友笑着回答道：“眼看工厂富起来了，今后还要不断的建房，而建造新房的档次，只会一年比一年更高，到那时，难道低档次的房子还要拆掉重建么？”在他的力争之下，建房便保留了原来的较高档次的建房标准，建房预测资金的不足从油漆车间的资金去挪用。

由于资金枯竭，油漆车间已完全停建。现在工程师大楼已经矗立在地面上，李友面对的除了骂声和争吵什么也没有。这一次，胖左派站出来大骂马兵和李友，说他们那还像是工厂领导，简直就像一群蛀虫。

工程师楼已接近竣工，老同学十分清楚，全厂一千三百双眼睛都盯着这五十六套新住宅的分配。除了这五十六套新宅分配，还会带来五十六家迁居人所住旧房的再分配，这可是一件随时都会带给他烦恼和不安的头等大事。

在他的幕僚策划下，仍以劳人科红头文件的形式，向全厂颁发了一个“关于六号七号楼的分配方案”，为稳住全厂主要技术骨干，让他们在分房中站到自已这边来，这个方案明确，凡工厂里有工程师称号的十二个人，都会分到一套“工程师住宅”，

这一次，李友算是聪明一点，不再将自己的亲友拉出来充当分房领导组的成员，而是将分房领导小组的权力，交给了素与他貌合神离的付厂长王泉，条件是许给他本次分房权。这等于将分房的矛盾，全部转嫁到他的身上。

从十一月份开始，一场分房的明争暗斗，就在李友与王泉为一方与全厂一千多户职工之间，勃然掀动了。每天分房领导小组办公室门刚打开，等待的人拥进来以后，便是一片吵架声。王泉虽然得了一套意外的住宅，但是他必须承受精神上的高压和对付各种质问。

老职工在子女的陪同下，向他倾诉成古八十年的住房辛酸；中年职工逼着他出示本厂分房办法的政策依据，列数邻近厂矿是怎么来分配住房的；鲁莽的年青人用拳头和石块警告他看着办。

他一时成了全厂的磨心，又是李友最恭顺的奴才。可惜唯一能依托的李友却用阴阳怪气的态度使他为难。

老同学这些天是格外的小心，晚上从不出门，白天走过墙边或屋檐下都要警惕的东张西望，害怕随时都有一块飞石从不知那个地方向他的头上飞来。

人活到这个份上才体会到当厂长的悲哀，这时他时时从心里咒骂一年前把他捧成明星的政府官员和别有用心的记者。

十二月初，当整个住房已经粉刷和外部装修，完全可以住人的时候，四十八套新房的分配名单以及五十六套旧房的“再分配”名单，在办公室大楼下面的公布栏中贴出了第三榜，在围观者的一片咒骂和怨声中，王泉在办公室里，

突然得到后勤科的报告，说有三家住宅，房门已经被下了锁。

三户人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搬了进去。他闻报不敢怠慢，立刻电话通知了李友，电话的这一头气急败坏，而电话的那一头却冷静如常。也许李友早料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者明知而故作镇静。

两分钟后，保卫科长率领两名保安，赶到了抢搬地点，然而面对抢占户的一家老小，谁也不敢动手！李厂长的指令是将抢占户拉出来，将他们的东西甩到马路上去，但是那一家在工厂都有三亲四戚，师兄师弟。保安们谁都不是傻瓜，甘心为李厂长当枪手使。

在王泉亲临现场的督阵下，只有软硬兼施，一边劝说，一边动手将搬进去人家的家俱一件一件的又搬回原来住的窝棚里，许诺在旧房子的调配中，给他们增加旧房的面积。

正当大家为分房而拼杀之际，农用汽车厂的亏损却像下坡滚去的雪球，越滚越快，越滚越大，到了这一年年底工厂累计亏损已逾百万大关，去年同期那种高奖金和名目繁多奖项的热闹局面，已经消失。工厂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发一分钱奖金，为了过年，老同学七拼八凑每人发了三十元钱的过年费。

在年底召开的工作总结会议上，曾科长以质问口气要书记和厂长就工厂在本年度工厂规划实施情况，向全厂职工作一个交待。还就新建的职工住房大楼的建设和分配，提交职工代表大会专门进行“审查”的建议。

经过他的“点火”，到会的人纷纷向老同学责问起来，工作总结会变成了牢骚指责会，使老同学感到十分狼狈，一年前他在全厂年会上的自我陶醉已变成了沮丧。除夕的茶话会也取消了，只在食堂里进行了冷清的“聚餐”。

为了防止意外，老同学像偷东西似的赶在除夕前一天，顾用几个捧捧，最先将自己的家从三合院里，搬进了他筹划整整一年的工程师大楼。搬完后他才独自坐在宽敞明亮的大客厅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平安乔迁。

这时候他感到了一种丧家之犬的悲哀，他真的没想到他的好景竟转瞬即逝了，剩下来的残局该怎么收拾，心中没有把握。也罢，充其量工厂垮了，自己再调一个单位的想法又浮上脑际。无论如何，住房总算到手了。夜已深了，心里特别的闷，信手推开临街的窗子。

黑夜中，他似乎听到楼下过道上脚步急促，意识到又有谁连夜在搬家，定睛再看，朦胧的路灯下，王泉和老婆，两个儿子也像是做贼一样的将家俱朝刚刚分到手的房子里搬。他鄙视的向下淬了一口唾沫骂道，“贼儿子，全是贼。！”

1985年底，五十六户人家忙着搬家，在第一轮竞争中没有分到房子的职工，继续地围住分房领导小组的几个头，一面吵骂着，一面等到旧房子的再分配。王泉既然已占了房子便学着李友躲起来了，当然，无论是李友还是王泉，在工厂那一个角落都会听到满街对他们的责骂。

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房门关紧，只当什么都没听见。三十晚上，围炉吃年夜饭的农汽厂职工没有几家没在诅咒，他们把无钱过年，无房可迁的罪过。一股脑儿地倾泻给老同学，以及与他并驾齐驱着农汽厂的同僚们。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自回到重庆，没有比此时更冷的冬天了，当时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便是一塌之地，我没有老同学的福气，也不存在他那种有了房

子还要图更好房子的贪婪侈望，看到工厂如此糟，我只求一间干燥一点的旧房子便心满意足了。同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相比，我可是连旧房都没有一间啊！

晚上我睡在那充满霉气的危房里，望着头顶上那已经折断，随时都可能垮塌下来的房梁，眼前浮现出全厂争夺五十六套新房子的那乱劲，想到倘如在这一次旧房大调整中，再不争得一间旧房子，我就可能流落街头了。

何况我的这位老同学还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宣称，本次分房向知识分子倾斜。第二天，我带着这个理由到分房领导小组去，请他们在旧房调整中给我考虑一间旧房。得到王泉的答复令我感到宽慰，他说：“你尽管放心，我们一定会按规定处理好你提出的要求，使你满意。”

可惜，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个答复，夹杂着奸意。十天以后，在公布旧房调整名单时，满有把握的我竟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开始我还不相信我的眼睛，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依然没有我的名字。周围的工人看见我焦急的样子，有人给我打抱不平，他们都因为亲眼目睹，每天清晨我驮着儿子上班的那种狼狈像。

于是我第二次跨进了分房领导小组的大门，王泉不在，大概他又避风头去了，接待大家的是劳人科的崔科长，听到我的责问以后，他翻着白眼回答道，“你进厂时不是亲自写过不要住房吗？怎么，亲笔的诺言不算数？”

这一下子我完全明白了，我的住房问题是老同学和马兵商量好了的整人行为。否则这崔科长怎么歪曲我进厂时的本意？甚至还专门查了我进厂时的档案。我回答他：“当时由于李友说，暂时没有住房给你，等以后有条件时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放弃住房作为进厂先决条件的承诺，永远不能曲解为在工厂有房时，我也不要。”

我一个落实政策的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你工厂有房时不给我，是承心给我为难吧？再说，你可以把我进厂时填写的东西拿出来公开吗？”

这么一逼，“吹”科长开始那轻蔑态度收敛了，推说道：“我也是执行上面的意思，至于你填的表根本是不可能拿出来公开的，那可是在你进厂随调的档案里存放的。”看来我给市委写的信，确实给我带来了麻烦。

我现在才体会到了什么叫“收拾人”，什么叫软打整。比起不动声色的老同学，比起年轻气盛的马兵，我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事情既已经弄到这一步，我就只能迎战了。于是我准备立即进城去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找张文澄。

但又一想，落实政策我已经麻烦过他了，他当时毫不犹豫的给我开介绍信，给我调动开绿灯。现在又接二连三地为我个人的住房，再去找他，于情理上显得过份，虽然同是右派，我不能为个人问题再给他出难题，何况我们素无交往，仅凭都是同一运动的受害者这点同病相怜之情。如此一斟酌，我便踌躇起来。

想到已经和老同学闹翻，我给市委写的检举材料还捏在马兵手里，倒不如把脸撕破，用二车间那王，周两位女将的办法，兴许还可以凑效。何况在住房问题上我是无房者，再不力争，我可是真要露宿街头了。而老同学却是高档房的利益占有者，我撕破脸闹起来他肯定会心虚。

我决定去找他，然而一连几天老同学好象驾了土遁，从农用汽车厂消失了。每天办公室里见不到他，夜晚去敲他那铁门，没有丝毫回应，邻居说“李厂长从那铁门的猫眼上就可看清来人，看来他躲起来了。”

我不得不写了一封挂号信，交到了重庆市政府，一个月以后，区政协主席张××亲自来到了农汽厂，对厂里的住房分配进行“专题调查”。预先他就给厂工会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到我的住房，希望他们妥善的处理。张主席的到厂触动了工厂的神经，出来挡驾的是工会主席向云。

向云在工会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张主席，并向他介绍了一名至今三代人共居一室的一个老工人，以此证明工厂确实没有房子分给我，这位老工人一家人分居两处这个真相，却被向云隐瞒了，中共党员没有其它能奈，唯有这种编假说谎个个都是能手。

既已惊动了上级，又有张主席的调查，老同学知道情势不妙，迅速转舵，指示党委付书记施安出面，将离厂两公里以外，地处文星湾熊家院的危房群中，一名后勤杂工腾出来的一间大约二十平米的危房打发给了我。

当我不久在厂门口见到这位老同学时，他故作惊讶的说“啊呀老同学，你的住房我们早就考虑了，工具车间主任本次分到新房后，腾出来的两间砖结构的房子，就是专门安排给你的呀。都怪那王泉太不会办事，这家人搬出来空出来的房子却没有上锁，便给另一个工人钻了空子，擅自搬了进去。

我还为这事专门追查了王泉，现在那占了房子的工人，也赶不出来了，没办法我们为你的住房，专门开了办公会，研究了一个多小时，才决定把文星湾蒋老工人搬出来的房子，安排给你暂时住下，施书记给你落实好了吗？”

我望着他那假惺惺的样子，实在是太令人呕心了，要说他低能，可在玩弄两面三刀和整人的戏法，却不能同他相比的。但事已至此，心中在忿忿说，都怪我自己瞎了眼，怎么会钻到你当厂长的这家工厂来！

同这样的小人生气真是犯不着。他见我没有任何反映，假惺惺地说：“这几天分房子真太乱，文星湾那房子如果已经腾出来了，那么你要赶快搬进去否则再被人占去，就只好办了。”说毕他嘴角边流露出得意的奸笑。他真还以为这样收拾我，泄了他那卑鄙报服的私愤。

为我个人住房在厂里搅起的风波，曾科长找到了我，从他那里我才知道，这文星湾的破房子是农汽厂的职工都不愿搬进去的，除离厂远，上下班不方便外，那房子是一间漆黑的口袋屋，白天没了电灯，就什么也看不清。由于年久失修，每逢刮风下雨，多年的扬尘会像细雾一样弥漫整个房间。

更重要的是分房条例中有一条没有公开的“内部规定”，凡有私房的，或厂里所属住房在主城区外的，一律没有分配新住房的资格，文星湾属于主城区外，所以我只要搬进去了，今后再不要想参加工厂新房的再分配。

我不禁赞叹这位追求虚名，见利忘义，治理工厂毫无能力的老同学，将中共斗争的这一套两面三刀，借刀杀人的鬼把戏操练得如此纯熟！为了报复这一个“异类”，竟在住房的分配上玩弄了这么多心机！

人心叵测，什么事凡不涉及自己切身的少说为佳！但秉直的我永远都改不掉我的老脾气。粉刷一通，第三天便搬入了“新居”。

在那里整整住了三个冬夏，那时我已半百年纪，从搬进去的那一天开始，我的三岁的儿子，每天早晨六点钟就被我从被窝中叫醒，匆忙的吃了早点就将他驮在我的肩上，步行两公里，将他送到托儿所后，我又步行到工厂上班。

由于匆匆赶路，完成这种“苦力”后，我常常汗流浹背，再加上居住条件恶劣，原先监狱受到折磨，身体本来就多病，所以我三天两头的感冒、拉肚。命运折磨着我。

就这样，我的孩子在我的肩上渡过了整整四年的童年，直到七岁他上小学，我们才从新搬了家，结束这段扛着孩子，早上“晨练”的生活。

好在，文星湾的老宅院里虽穷陋，但邻居却十分的和睦敦厚，隔着天井，对面住的几家人都是重庆棉纺五厂的退休工人。

当他们目睹我的困难，孩子那么小，我的年纪又那么大，上班那么远，请不起保姆，实在照应不过来，有时家里没人的时候，又正碰上托儿所里放假，孩子没人照应，他们会主动的义务照看我们的孩子。

晾在天井里的衣服，下雨了，他们会帮助我们衣服收回来，上街买菜顺便给我们带些回来，这些细小的事表现出来的关照都深深打动我的心，让我牢牢记着这些善良的邻居。

那时，我们的住房靠近嘉陵江边，我和孩子经常在星期天去河边，捉蝌蚪和小鱼，当春天到来时，我教孩子做风筝，去宽敞的河边去放，我的心回归到童年中去。

中国民众的人性和互助，虽经中共摧残变得冷酷，但在老百姓中她依然温暖着每一个人，住在文星湾那破旧的大宅院里，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对面的刘爷爷和胖胖的刘婆婆，像亲人一样，关照我们并温暖我们的心。“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那时生活虽苦却感受到人间的暖意。

而住进工程师宅的李友窃喜后，马上就陷在矛盾之中，他的住楼是在缺资金情况下靠挪用油漆车间的专款建立起来的，遇到贪婪的肖某，马虎的工程质量很快显现了出来。

新宅搬进去两个月后，赶上第一泼春雨，雨水毫不客气地从墙壁的裂缝中，渗进李友的客厅里。雨水浸进了厨房，那从墙上浸出来的黄水流进了他的天然气灶台，他把后勤科负责施工的人叫来责问，那人指着肖某住的地方说他心太黑，吃的回扣太狠。

那施工员承认，地板和糊墙用的水泥全是次品。不过李友也只好背着肖某骂娘，当着肖的面还不敢吭声。

继 85 年亏损一百万之后，农用汽车厂从 1986 年开始，便以每月三十万亏损的不可逆转的颓势，向破产绝境“大滑坡”。当然农汽厂是同一时期国有企业的其中一个，但却是当时全国国有企业的缩影。

国有企业相继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纷纷倒闭，中共把“工厂破产法”向全社会公开宣布，被中共奉为决不放弃的公有制禁区被打破了，我在的厂不到两年时间便从全川盈利大户，变成 1986 年四川省名列第三位亏损大户。

工人人们的上访，使市政府不得不关注这个被他们捧红的“明星”企业。机械局组成调查组到厂调查时，问到他们私吞工厂的稳私，大家缄口不言，使局里派来的人莫衷一是。李友是他们瞎吹出来的明星，而今怎么自圆其说？调查组只好勒令李友限期整改，止住亏损势头，否则只好对他“组织”追究了。

不过李友并不是没看到今天这种结局，他也不是束手待毙的窝囊废，在他任厂长时，供应 130 底盘的南京汽车联合公司，看准他的虚荣心，除在上任时特邀他参加南联公司的年会，还特别将他的名字写在董事会常任理事的名单上，在私人利益和个人虚荣心诱惑下，李友同南汽的接触一直在秘密中进行着。

南联公司为实现在西南建立销售和组装基地的计划，以便打开西南市场，打算在重庆建立一家南联集团的子公司。但是当时重庆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立场，一直拒绝将农用汽车厂变成南联集团的子公司。

眼下看农用车滞销，日趋严峻的亏损，加快了李友依靠南联的步伐，他向重庆市政府建议，认为如能投靠一家大企业也未尝不是一种上策。

南联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便带着进一步接收这家工厂的决定，来到了重庆。当南京的客人刚刚走下飞机场，迎接“贵宾”的是李友和马兵。

南京的贵宾一走，李友像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精神振作了许多。他随即召开一系列的生产会议和经营会议，向与会者宣传目前在市场竞争中，由于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资金困难农汽车厂很难存活，只有寻找与有实力的大企业合并，才能活下去。

正当他焦虑万状之际，却收到了南京汽车公司董事会发来的请贴，要他参加 1987 年度的董事会新年团拜。他豁然心中一亮，明白这是一次将农汽厂归并为南联汽车联合公司的一个绝好机会。他决定利用工厂法人的机会，抓住这一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借南联的资金和力量解脱捆在他身上的绳索。

并入南联后，几百万亏损一笔勾销，工厂也可以引入南汽的品种和其它专用车技术。经过一夜紧张思考，他终于破釜沉舟，准备迎接一场“地震”。弄得不好，他会因此而下台并受到处分，弄得好，他会因此而解脱。

第二天他便从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到厂长办公室去，说他去市里开会。便独自一人在家里正式的向机械局某局长，起草了一份进入南联的绝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把工厂亏损的原因归结为工厂缺乏技术设备的落后。

现在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只有向国内有实力的大公司敞开大门，走联合的道路。否则很难依靠自己落后的车型和技术走出困境。

同时，他拿出几天前起草的向上级的报告，写到工厂亏损的人为原因时，将责任全部转嫁给马兵和肖某两人身上。这两个人原是他上台时，由上级安排在他身边协助他的台柱子，在农汽厂发横财时，许多捞私利的鬼主意都出自他们，因此成为他最好的密友。现在眼看厄运已至，他只能分道扬镳了。

但这种在背后下刀的做法，终于点燃了一场内战……，李友写完报告立即进城到机械局，交给局办公室秘书，随接去了机场。

正当李友同南汽的主人碰杯互致 1987 年新年快乐时，他却接到了机械局发给他的加急电报，催令他立即返回工厂，李厂长敏感到“召回令”中，某种不祥已经发生了。当他趁坐的飞机在江北机场着陆后，提着行李走出机场四处张望，却没看到往常在机场停车场里场部派出的皇冠车。

这已使他不安起来，在机场电话厅里他接通了厂部办公室的电话，厂长秘书回答他，小车已经派出去另有任务，所以只好委曲他自己坐公共汽车回来了。

在汽车上他的思绪非常复杂，到北碚下车时，他想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没有人来接他并预报情况，只好硬着头皮匆匆步行回厂。跨进工厂的大门门卫只朝他点了点头，好象并不知道他刚刚出远门归来……

匆匆走进办公大楼，平时见到他毕恭毕敬的厂办主任不知那里去了，这才发现整个办公大楼里，除了过道上平时做清结的临时工外，一个人都没有。进得办公室忙去翻日历，今天是星期二不可能放假，他们都上那儿去了呢？

正踌躇间，办公室桌上的那架电话铃响了，接过话筒原来正是办公室主任打给他的，叫他半小时以后，立即到厂部大礼堂开会。

他的心中一惊，仿佛他的办公室已四面布控，墙上全是窃听器和摄像的镜头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暗觉奇怪，那些平时仰仗着他开后门进厂的亲戚朋友，和受过他的小恩小惠的人们，都到那里去了呢？谁把这里发生的情况通告他一声，也好让他有一个准备。

看看墙上挂的那张中国地图，在大陆那张海棠叶上，重庆相距南京那么近。

拿起电话筒想向南京方面挂一个电话，却没有打通，这才想起临去南京时，他已将长途电话上了锁，忙去皮包里翻找钥匙，但转而一想，事情还没弄清，向对方告诉什么呢？就是发生农汽厂已把他就地免职，这个南联分司难道还能塔救他不成？

看来现在只能乖乖的按别人给他布下的路，硬着头皮走下去了，于是便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向大礼堂方向走去。

走进会场的第一眼就看见那个平时对他千依百顺的厂长办公室主任，正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忙着张罗，主席台上机械局的高局长和曹书记已坐在主席台正中，几个付厂长坐在两旁，连马兵也坐在上面。心中已觉察自己陷入了陷阱，可惜为时太晚，硬着头皮向前台走去，那办公室主任从左侧的楼梯上走了下来，招呼着将他安排在台下落座。

直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所要面对的现实：主席台上已没有他的座位，他已被免职了。在无数双含着敌意和渺视的目光逼视下坐落，把头埋得低低的。

会议开始，气氛严肃。主持会场的厂办秘书宣布全厂起立，唱国歌。他从坐位上站起来，两腿僵硬发直，依然保持着低垂头的那种反省姿势，有点像站在高高的悬岩上失足滑落下去的感觉。心中一阵紧张，也不知怎么坐下来的。

耳朵却紧张听那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机械局曹书记不紧不慢的宣布道：

“今天我代表机械局向农用汽车制造厂的全体干部和党员宣布机械局1987年第1号文件“关于农用汽车厂的任免决定”。……李友听得非常真确那1号文的第一条就是将他就地免职，却一字都没有提到他另调其它岗位的内容，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大概因为预先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耳朵里发着嗡嗡的长鸣。尤其是使他痛心的是全场雀跃，欢呼声中夹杂着十分熟悉的咒骂声，有人喊道：

“要李友回答他把工厂搞得了资不抵债了，工厂关门了，我们的饭碗找谁去？”；“不能就这么一个免职让他便宜地下台”；“你不是在一年前还许下那么多大话，今天要你回答我们，我们这些普通职工拿你怎么处置？”

人们愤怒的吼声使他无地自容。现在他完全明白了，两年前自己被人抬得高高的，现在他已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他感到一阵阵的心慌，喉咙里一阵发痒，猛咳一声，咳出来的竟是一口血。他终于彻底地崩溃了，瘫在座椅上。当他的家人闻讯，将他扶出会场时，他的耳朵里分明还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向他喊道：“李友，别装熊，拿出你上报纸的威风来，别像臭狗屎”。那分明是总工程师的声音。

从“政敌”嘴里说这样的话，本不奇怪，而今听去是那么挖心的痛。他想回答他：“你身为厂领导，难道出现这个局面你没有一点责任么”？但他实在没有气力说出来。

在家人的搀扶下，他不知怎样跨进五号楼他家的那扇铁门。“家”倒是挺气派的，今天就连那套肖付送来的红木家具也擦得发亮。当着众人受羞辱的那种感觉坐在家里的太师椅上，变成了一连串的焦虑，两年来体验的“横财”，不会受审计部门和纪检部门的清查和追究？

一会儿又在想，今后去工厂上班到那一个部门报到？千万别弄到总工办或技术部门，那些人都知道他的底，自己随时都是别人踏的对象。

当他的妻子催促他赶快换一件衣服去医院时，他才猛然想起，刚才才咳过血，心里一阵害怕，好象死神就在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向他窥视，觉得喉咙里痒痒的，好象又有一口血要咳出来……

正当他被两个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侄儿扶着走下五号楼的大门时，猛然听见三楼的窗口鞭炮声大作，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只见那窗口正对着的阳台上，吊着一长串正在乒乒乓乓炸响的鞭炮，那旁边还挂着一幅长长的字联，上书“送瘟神”三个大字，那分明是××工程师干的事。

这人素来看不起自己，这次分房给了他一套自己一样的住宅，意在安抚和收买，谁知道他并没有感谢李友的恩惠，反而认为，李友不过是借工程师们的名来拉拢他。所以在自己最窘迫时“落井下石”了，心中一恨，喉咙一痒，又咳出一口血来。

此时他才觉得虚弱得很，对人们这种公开的羞辱除了只有“忍”以外，连反唇相讥的力量都没有。

这正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黄，一载赴黄泉。”

关于对农汽厂人事任免的决定中，红头文件中接替他的是机械局一名姓孙的处长，同时还任命总工办的付总工程师王桂林为常务付厂长。

党委书记马兵虽被免职，却调到重庆市汽车公司担任那里的党委书记，肖付刚被调到北碚区乡镇企业局但任了付局长，两人明里撤职实际上是升级了。尤其是肖付，在乡镇企业局捞油水的机会更多了。

李友，则因为向上级参奏了自己的同行，破坏了“行规”，才落得替罪羊的处境。若不是他在市委里的姐姐，说不定会落到想不到的泥潭之中。

谁教他心太大，倘若他放弃了南联的计划，老老实实接受上级的保护，还不是照样同其它人一样，异地发财？而今他气得吐血，担惊受怕成为全厂笑料，是谁造成的啊！也许他真是被新闻界，捧得昏了头。

其实在国有体制下那有独闯天下的奇才，靠吹捧邓小平而发的全国著名巨富牟其中，最终以诈骗外汇罪沦于武汉监狱。自吹创业的天才，在中共泡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过是为一定政治目的炮制出来的玩偶。

玩偶是没有独立人格，也没有他们独立生存的土壤，所有改革家都是依附于中共皮上的气泡，像幻影一样出现于瞬间，又消失在刹那。

不过，被这种“政策”作弄得最惨的，还是农汽厂一千多普通职工，按照银行接到的指令，亏损的农用汽车厂的亏损额，早已超过了倒闭的警戒线，工厂已领不到职工的基本工资，只能按每月领取几十元的“救济金”。据银行说，李友为了不准在他任职时就停产，结果积压的农用车变成了一堆堆的废铁。

胖左派站在黄色大楼最高的石梯坎上对着全厂摇头哀号道：“完了，农汽厂完了，我们也完了，工厂死了，我们就此等着流落街头”。接着又指着黄色大楼大骂道：“你们这群败家子，工厂赚了几个钱，你们自己吃花不算，还要请客送礼，巴结记者，现在几个钱被你们吃完了，你们却像蝗虫一样飞走了。”

机械局新任命的“领导”丝毫没有阻挡亏损下滑的能力，陷在厂后坡荒草泥泞中的农用车，依然静静的躺在那里锈烂，大家在唾骂李友出了一口恶气以后，不得不从新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我们已经两个月没领到工资了。

在厂的生产经营会议上，个子矮矮的孙厂长像菩萨一样，眯缝着眼睛一言不发，那王桂林却操着广东腔的普通话，呱呱空喊着强化产品管理的空话。销售公司在他的主持下开的会争吵一阵，毫无结果的散会了，车间照样死气沉沉金工车间联系了渝洲汽车厂，为他们加工车身覆盖件和非标……。

过年时，由于农汽厂不断有人上访市政府，他们怕年关之际，被逼的工人会在春节期间上街闹事，为稳住危机四伏的国内形势，维持中共控制下表面歌舞升平的政治气氛，市政府悄悄向银行指示，农汽厂的职工总算领导到了1986年底所未发的工资。

然而1987年春节一过，工厂又是两个月未领到工人的吊命钱。当工人们围着新来厂长向他索要维持生计的基本工资时，这位上级派来的厂长兼书记竟然喊道：“你们向我要，我向谁要？有种的就不要向我要，我带着你们抢银行去”。

第二天，黄色大楼的正门上，贴出了一付打油“对联”，上联是“桂林贫（凭）嘴一付画（话）”下联是：“要抢银行找有余”，横批“左右无路”，那分明是写王桂林和孙有余的“无能”。

农汽厂在一团死水中挣扎，到了这个时候，反倒有人替李友打起抱不平来，公开说：“这是市政府的小人们搞的阴谋，如果南京集团兼并了我们，恐怕也不致于落到今天连饭都没有吃的地步”。

曾元领着几个老工人去找刚刚赴任的市委书记肖秧了……

第四节：柳暗花明

事情既然闹得市政府整日不安宁，新官上任三把火，肖秧亲自过问此事。一个“明星”企业才一年多就走到破产绝路，新闻界一直要弄明白，想炒作一翻的事，也该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肖秧批示，令机械局派出工作组弄清情况，采取措施，务必予以解决。1987年5月，接到批示的机械局，组织了以付局长为组长，市汽车公司生产科长，李伦为付组长的“扭亏帮促小组”进驻本厂。

当中国商品经济的大潮，第一次冲击苟延残喘的封闭式国有企业大门，使毫无生命力的大锅饭企业遭遇与农汽厂相似厄运时，中共基层中，一些从事国企管理多年的“才子们”，从旁边看得十分清楚中共国企的病。他们想崭露头角，一舒多年被压抑的身心。

纷纷倒闭的国有企业，给了他们一试身手的机会，因为他们相对超脱了那过时的僵死思维方式，敢于试探一下新的企业管理方法，成为第一批转型时期草创性企业家，登上了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舞台”。

例如当时闻名全国的史玉柱，以及张树新和她的赢海威，支撑他们的只有一个动力；成名成家。毛泽东禁了一辈子的事，被突破了。

身高 1.88 米的李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推动他勇于挽回这个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绝境企业的动力，是他从不惑之年一事无成中感到时不待我的紧迫感，他决定抓住这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至于他是否洞察国企致命之处而有起死回生的“秘方”？我可不知道。

中共的后极权时期依然紧紧依靠国家权力的控制，使权力以追求金钱为目的，便是贪污，行贿滋生的原因。这种交易出现李友这样的怪胎，权力捧着他上台，并指挥着这个傀儡演出一出又一出的丑剧。

在企业毫无根基的条件下，用“假”报表，假数据换一顶上等级的假桂冠，利用农汽厂短时间的发财，让这个木偶一再登上媒体和广告的舞台，为行将就木的国有制唱赞歌。最后在企业跌入不可自拔的泥坑时，便将这个被他们捧上舞台的是明星“宠儿”重重的扔进垃圾堆中。

李友的可悲就是他的那一颗被中共牵着走的虚荣心。机缘使他成了明星，又很快把他变成垃圾，它失败的全部过程被旁观的李伦窥测清楚了。

李伦清楚地看准了，中共体制下的企业管理和官本位之间，许多完全可以利用的“中空”。这种漏洞百出，凭一人决断的体制可以牵着它走，成为一时，一地资产聚敛的源头。

这同蒙在鼓里的被人玩的木偶不同，虽然挽救这么一个看似没有希望的企业困难重重，前途渺茫，但是只要牵牛鼻子，这种局部性成功完全是可能的。这种成功的奥秘是当时以上管下，绝对服从的官僚体制还没弄清的。

刚刚开始“摸情况”的李伦，每天夹着一个日记本，开始了他那种意志和体力的马拉松运动，他最先就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平素爱发牢骚，被工厂领导视为“捣蛋”的胖左派们，他想这些人总有独到之见。

同他们中的年长者交朋友，称他们为挽救工厂难得的“智囊团”！给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当厂长，该先从那些事着手？”“家”由这些平常一贯唱反调的人来当，“策”自会出现。他认真的倾听着每一个新颖的意见，将这些意见写在笔记本上，编成了一幅冶厂蓝图。

古希腊伟大哲人苏格拉底说过：“当许多人在一条路上徘徊不前时，他们不得不让出一条路，让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走到他们的前面去”。怀才不遇的李伦当时看准了农汽厂十分糟糕，迫使不敢接招的庸才们为他让路。所以他得到了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

我同李伦的初交开始于同车间管理的一次碰撞。事情得从 1985 年十二月马

兵因我向市委写的信，同我的那场舌战开始。那一次舌战，使我成了整个农汽厂领导班子的“眼中钉”。其实我进厂两个月便要求下车间的举动已向他们表示，我对工厂的权力争夺毫无兴趣。

我之所以向市委写信，一方面是工人群众的推动，也因为工厂搞得这样糟，别说住房连工资都发不起，我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然而当我通了马、李的马蜂窝后，我受到了诸多的威胁，不但在分配住房时给我穿小鞋以示警告，工作上也被压制，受到歧视。

论学历和工龄，还是能力，早就该得到工程师技术职称的我，进农汽厂已三年，每年年终，由技术部门和劳人科向机械局上报职称名单中，从来就没有我的名字。理由是，你在重大只读了三年，不具备本科毕业的水平，何况以后因劳改而荒废学业多年。

但是我自调入这家工厂，便在车间埋头苦干，自修完了汽车制造的大学专业课程，很快恢复了被中共荒废的学业，亲自设计和制作了许多简易的夹具和模具，成为当时全厂百十名技术员制作工艺装备最多的一个。

正当李友被免职，陈桂林主持工厂的技术生产指挥时，发生了一起价值大约八万元的铸胚报废事件：因为翻砂木模失修，造成模芯错位，五千件钢板弹簧后支架的翻砂铸胚的翻孔位置错误。倘若仍按原来的加工路线选择粗基准时，眼看将导致五千件铸胚全部报废。

负责胚件供应的生产科老张，把我叫到堆放胚件的现场和我商量，他提出这批胚件，更改粗基准的加工工艺建议。我经过实地测量同意了张师傅的意见，工艺科的人竟说我不知收了铸造厂多少回扣，在生产科填报的回用单上大笔一挥将这批五千件铸胚全部报废。

当然报废的是工厂的铸胚，损失是工厂的，与我无关。但迂腐的我却认为眼下工厂正在亏损，毫无道理的将这批可以使用的铸胚报废回炉，等于往亏损上雪上加霜，问题吵到了陈桂林那里，那陈桂林皮笑肉不笑的回答道：“报废了的东西谁使用出了问题，便由谁负责，我看，干脆报废算了，损失一点不伤害人，何乐而不为。”

我不甘心这种不负责的处理，中午自己动了刨床，想用事实来证明这是一批不该报废的铸胚，没有料到那刨床上值机的工人发现以后，骂我是一条厂长的看家狗，工厂到了这个时候已无是非可言。

既然对是非没有了判别的标准，我还有什么必要在这里上班呢？便向车间主任递了一个请假两个星期的假条，回到家里，晚上面对床上睡着的孩子独自发呆，工厂陷入破产绝境，今后该怎么办？我现在才感到出狱后第一次面对生活的压力。现在我再去市里面的那一位当官的都没有用了。

另调一个单位，调那里？我已五十岁了，效益好的单位接受我么？正为难之际，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我所住的文星湾三合院的门口，他戴着一付宽边眼镜，一边向院子里的人打听我的住处。

正在猜测来人是谁，他已向我的屋子走来。跨进院子大门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他的一双大手，自我介绍说：“我性李，是一个刚刚才从扭亏工作组正式转为重庆农用汽车厂的职工”。

我很诧异的握着他的手，猜测来人的意图。握手以后，他便四面环顾，打量着我那陋屋的门口和院子的整个环境，说道：“我是在后勤科查到你住在这里，你写的假条是昨天上午我才接到的，看到假条，使我对你产生了了解的兴趣，我想就从你身上开始摸一下工厂员工的想法”。

他一边说一边跨进我们的屋里，继续说道：“你这个地方可真不好找，不但藏在几道拐的深卷子里，过道又窄又黑而房子又矮，我是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的。”

当我把他让进那黑屋子里，他的头却碰在那门栋上，一面接过我拿给他的凳子，四壁环视后，连声说道，“委屈你了，一个老工程技术人员竟住在这种烂房子里，太委屈你了”。

我明白了他的身份，看他的表情不像在说客套话，便回答道：“唉，你还是第一个走访我这个穷技术员的人了，单凭这点我得向你表示我的感谢”。

大约已是六点钟，我们坐在黑屋子里，借着暗淡的灯光，开始了第一次谈心。他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笔记本，一边交谈一边作记录。从我的身世讲到平反，讲到如何进厂，最后讲到李友的失误。一直谈到深夜，因为谈得十分融洽，时间很快过去，我送他回厂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1987年3月农汽厂在行政大礼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取名“扭亏”动员大会。为了显示“危机感”，扭亏工作组向全厂职工亮出了政府对农汽厂发的“黄牌”警告。其实破产，这本属于商品竞争的残酷事实，无须谁来“警告”。

致农汽厂今天这种状态的，是中共庞大的官僚机器。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国有制。

工厂破产后，还摆出主人的姿势鞭打工厂的全体员工，这不仅是戏剧性的，也是残酷的，台下的我心中十分明白，捧着李友这个木偶玩弄够了的政府，现在要捧出第二个木偶来了！。

然而，被中共恐吓惯了的农汽厂职工们，听到这种严峻的警告时，全都蹙眉沉思，将一年来的谩骂和争吵收敛起来。工厂一旦关门，一千多赖以生存的职工及他们的家属，都会被抛向街头，这对吃惯国有大锅饭的穷职工怎么才能挣到生活的饭碗？产生了最大的忧虑，但当时谁也不敢说中共害了工人群众。

李伦被大会正式任命为“扭亏组长”，第一次主持了全厂工作大会，当他提出用‘自愿兵’精神‘生产自救’的口号，我看不出他的信心和措施在那里？用这些战争的语言来唤醒谁呢？由于生活逼迫农汽厂的职工天天都在上访，他们所盼的，关键在带领这些职工的领头人怎么办？

农用汽车制造厂的招待所，是一排占地大约五百平方的平房，那房子足有三十多岁了，总共二十来间房间，平时白天走廊里也要亮着路灯，否则一进去便是漆黑一片。由于背山而筑特别潮湿阴暗，房间里一到下雨天，地上总是泛潮，下段墙上的石灰层因霉变而剥落，露出一片一片的黄泥墙。

贫困至极的农汽厂职工的住宅就是那种档次，当然也没有能力建好漂亮的招待所来接待客人。所以招待所里面住的，是配套厂家派驻本厂的修理工，外地招来的钣金工和油漆工。稍有“身份”的来客，是由厂长办公室和供应科长专门安排在泉外楼，或其它较高级的宾馆。

李伦接厂长后，厂办主任为他在泉外楼安排了一间带浴室的房间，李伦找到了这位主任说，“工人已经有几个月没领工资了，我还住那么高档的宾馆不符合志愿兵作风，请你把房间退掉吧！”

于是他住进了厂招待所的5号房间，我第一次造访他，便在那房间里，房间被刚刚粉刷，显得比平时亮堂。靠门边摆着一张床上，一半推着足有两尺多高的书籍和文件，靠窗一张课桌上，放着他的吃饭盅和洗漱用具，两个翻折凳用来接待来访者，一盏台灯立在课桌上，这便是他的全套办公和生活用品。

经这么一布置，那12平方米的小屋还算“宽裕”，自从他搬进这间小屋那天以后，这间屋子里经常灯光通明，有时候通宵达旦。就在这小小课桌上，这小小陋室内却酝酿了一场创业方案，赢来这家工厂未来七年的一段辉煌。

农用汽车厂的饭堂位于工厂中心地带的盆地中，那儿的竹泥夹墙，年久失修，早已失去抵抗风雨的能力。一到冬天或风雨袭击，那饭堂中也如露天一样平地来风。里面原先还安着的几张木桌和凳子，不知何时被人搬走。单身职工在厨房的窗口上接过饭菜便席地蹲下，趁热尽快把它们送到肚子里去。

那些天，饭堂的角落里突然增加了这个很打眼的高个子，因为身材高大，蹲下显得很吃力，食堂的管理员连忙把总务科的办公凳子给他送来，他看着那红漆办公凳，笑了一下指着同他蹲在一起的其它人说道：“人家蹲着能吃，为什么我就非要坐着吃？”

这一谢绝反倒引发了就餐人一阵议论：“唉！这种鬼地方，连科长都不会在这里吃饭，从没想到过厂长会光临的。”一个矮过子工人忿忿说：“那些败家子，把厂败了一拍屁股走了，谁来管你穷工人在那里吃饭的小事。”一个年纪稍长的工人回应道：“这地方当官的，除吃团年饭，就没见他们来过。”

后来，他在大会上常提这事，说一个连职工吃饭都不关心的人，怎配当厂长？

然而，被中共骗够了的工人，特别是经历文革后，对这种表面一套内心一套的两面话早已听厌，不会因为几句话就轻易相信，至于他心中真想在这个被前任搞得一踏糊涂的工厂，干出点让工厂翻身的事，还要拭目一看。

文革刚结束的那几年，四个坚持喊得很响，工人们压抑在心中的不满，因余悸而不敢坦露。随着时间推移，耳闻目濡对中共渐渐看清，先前的迷信被捅破，如今它的无论那一级官员，小到科长，业务主办都公开用公款吃喝，奢侈渐成风气。原先在恐怖压力下不敢伸张的人们，公开咒骂共产党了。

对李伦初入工厂的调查之风议论道：“还不知上面给了他多大的好处，一旦亏损扭转过来，工厂成了他的摇钱树。定把自己的腰包捞满才卸任？”似乎只有这种评价，才符合当今的时代和人心。人心在这个年代里，被着上了黑色。

然而真心干事业也好，做样子也罢，这位高个子的豁达健谈和平易近人，逐渐产生魅力，市场观念被他灌输给每个职工，他指着刚刚才从‘一碗水’买来的越野车说，按照目前市场，能产生较高利润的不是那些已经很陈旧的农用车，有市场要求的是国家的公用车，是大小官僚们所寻求的小车。

他造访了从1985年到1987年独占川内汽车鳌头的成都客车厂，这个厂就是靠开发越野车，三年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利税大户。

而适应于小批生产的手工制作模式，正好适合我们这样的小型汽车制造厂。投资不大，见效快，这在当时叫做汽车制造业打“短、频、快”的方针。一方面利用政府官员的出行追求“气派”的心理，一方面又利用目光短浅的中共“关税保护”政策，将外国发达国家的小车挡在国门之外的机会。

利用中共的普遍腐败，对机关采购人员高额回扣的引诱，使李伦心中已经对农用汽车厂形成了快步扭亏的方案。这是政治经济学和营销学根本就找不到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特有的市场：**政府官员用纳税人的钱，去买生产方式极其落后的汽车品种，附带着中饱采购者私囊的畸形市场。**

产品结构调整的方针确定后，以合同的形式把工厂生产品种定下来。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专用车的各归口部门，以自己的口舌和交往的应酬能力，赢得这些部门的领导层的赞赏。为了打开这些部门采购汽车的胃口，从银行贷款中抽出钱给对方经办人以“丰厚”的回扣。

他花了大量时间，在这些部门来回奔跑，获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订货合同。

市场打开后又回过头来，向当时扼着农汽厂脖子的银行、税务局、工商部门作了大量工作。他知道，这些部门有着大量的空隙和水份，只要经过某掌权政府官员的点头和批示，可以动用无息的扭亏专用款。

欠税也可以挂起来，享受三年免税甚至更长时间的优待。这样一来，过去一年多来，像滚雪球一样的“前帐”可以不与追究。

于是农用汽车厂在李友时期所背的包袱基本上甩掉了，而职工的工资暂时按照原来的标准发够，而不再按市里对资不抵债企业的职工只发生活费，全厂的浮动人心平稳下来了。所有原先被李友捆死农汽厂的“绑”，很快在李伦努力下——松开。这家工厂赢得比较轻松的起步条件！

在做政府部门的工作时，各衙门口中对于小到门房的看门人，都得低三下四，有时候奔跑了一天，回到工厂是晚上十二点钟了，他一脸灰色感到又累又倦，回到自己的宿舍，白天那些羞辱人格的话，还在脑子里反嚼，但是为了实现他想干的事业，他必须有一般人都不屑为的阿 Q 精神。

为迎合各个政府口子里的大小官员，他把这套经营方略浓缩成“上靠、外联、内团”的六字方针。三方面中上靠为首，他说上靠就是依靠政府，就是钻政策的空子。他把他的六字方针写在办公室里的写字台前，写在联营办公室里，写在农汽厂最醒目的地方。

这六字方针浓缩了邓小平为首的‘人治’政策，中共在经济建设中没有理论只有‘政策’，因此随意性极大，谁有权谁说了算，用贿赂说了算的人风糜官场。当然要拿产品出来的工厂，对内部的管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摆着用户所需的，在马路上飞驰的汽车，要战胜同种企业的竞争，在外观和性能上，在同样的手工制作的条件下，必需“略胜一筹”..

竞争毫不讲情的淘汰掉弱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工厂要不被淘汰出局，必须不停地改造原来已经显得陈旧了的车身和底盘结构。工厂在调整了产品结构以后，跟上的是不断的质量更新，这是农汽厂原来那种老牛拖破车的步伐是无法想象的。

钟师傅必竟是老技工，他在接受负责越野车的时候，就已经思考了一个保

保质量的施工方案，对所有的施工细节都考虑好，所以他说的话带有权威性。按照他的建议，李伦召集了所有参加者的现场施工会议，初步将现场工序分为四个组；一个制作车身的组合件；一个是负责车身分块的焊接组合；一个组专门负责车门的制作和焊合；另一个组是负责车门的安装。

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全都要跟着施工的工人，一方面应证图纸正确性，一面组织现场的施工，绘制必要的成型手工模具，并且根据施工发现的问题及时的修正图纸和采取补救措施。

被穷困和失业困扰的农汽厂职工，一种“玩命”精神贯穿在李伦煽动性词令中！现场会几乎通宵，边做边议，一个个解决开发中所碰到的具体问题。从此，试制组每晚上都要加班到第二天凌晨，为了给加班试制的人加班时醒脑，他吩咐厨房每晚十二点送来酸辣面，疲劳和困倦被强烈的酸辣味驱散了。

古人云，“年少鸡鸣才就寝，老来枕上待鸡鸣，转头三十余年梦，不道消磨无数声。”他说：“回看少年时光今已半百还一事无成，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我只有再来一次鸡鸣就寝了。”他用隶书写成的杜句鹤的名句：“少年辛苦终生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压在他的办公室桌上的玻璃下面。

1988年的夏天，在工具车间前面的空坝子上，搭起了半露天钣金临时工棚。夏天多暴雨，然而在这里，灯光和焊弧光交织着送走了一个月的不眠之夜，即使大雨滂沱也从来没有打断过这里的夜战。

第一台客车和第一台越野汽车相继问世，当鏖战了整整一个月，脸色苍白的志愿兵们，欢呼本厂建厂以来第一代独立制作的换代产品诞生时，胖左派也不禁为之惊叹：“李伦的两刷子农汽厂起死回生有望了。”

样车的第一个顾主、公安部装备处的处长趁飞机专程从北京赶来，认为在当时农汽厂的简陋条件下，仅靠手工制作，短短一个月内开发出两个品种实在不容易。他认为虽然第一台样车问题百出，但一股拼命精神是国营厂职工所缺的。就凭这精神，专用车就有了希望，当下签订了两百台的订货合同。

在一千多职工工资低微，人心涣散，既无模具又缺焊装条件下开始，第一台样车就像学画的孩子用心描出，远远看去整个越野车似乎有近代的味，但经不起走近了细看。

细看车的外观，车壳的外表并不对称。车上腰线像蚯蚓起伏不直，车的平整度仅用钢尺比划了一下，凹坑和凸包之间相差了十几毫米，找来经验丰富的油漆工看，要填平这种差距需20毫米厚的腻子灰。门与门框的高度差，至少也有十个毫米以上。

门是锁不上的，如果用力的锁上，那么就打不开了。车身上相邻部位不相吻合，留着很宽的缝隙。摇窗机就更糟了，装上去以后，是不能摇动的，勉强的摇动，那么内衬的防水胶条不是挤在一堆，就是脱落。

那负责冷作的钟师傅，围着车反复细看琢磨！也低声的叹气道：“这样的车，拿去交给用户，别人怎么会要？我看干脆从新来过。”

然而很懂得“士气可鼓不可泄”，“凡用赏者贵信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的道理。！李伦专门召开了样车的评议会。

几十个由设计、工艺、和工人组成的评议小组，围着车身数落着这个样车

一百多条的不足，他叫技术员作了详细的记录，一方面他布置了下一轮制作的整改条款。另一方面，召集党政工联席会议，作出“特别嘉状令”对于样车的主要制作人和技术人员实行嘉奖。并且令样车披红戴绿的绕工厂一周。

在会上他说：“我们必需对这种拼命精神加以激励，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在冷嘲热讽中死亡。你们知道这两个样车虽然带着许多的缺陷，但它是我厂有史以来自己制作的换代型越野车，这是我们厂的产品方向，也是我们活出来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大张旗鼓表彰宣传的理由。”

在会下他还说：“我曾经把一句巴顿将军的话当成了座右铭：“没有不好的战士，只有蹩脚的将军。”他的这种热情评价，曾被人当作攻击他的政治把柄，这对中共僵死的官僚体制是一种叛逆。

嘉奖令颁发的第二天，他召集了得奖的志愿者说：“今后你们就是新车型的基本施工骨干，你们手中决定是着农用汽车厂的生死存亡。”他逐一的数落样车的毛病，规定出，车身的平整度，门锁，风窗摇机三大整改的主攻方向，他说到这些致命的毛病显得特别激动，他说：

“这样的产品拿给用户岂有不骂娘的？为什么国营企业多了干不好事的公子哥儿？临到工厂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能再要这种公子哥儿气了！”

其实工人人们的随性容易改变，最难的，也是最怠堕的是这架由党委，工会行政组成的庞大管理机器，包括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付厂长在内的十一个在上级卵翼下的天之娇子。面对商品大海里将淘汰的工厂，这些人从来没去钻研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案。

也难怪，上级规定他们的职责，就是“指导”并掌握企业政治方向的。说白了，就是贯彻中共统治利益的。扭亏开始，为扭亏而开的办公会，他们指手划脚的乱说一通，让干事的人毕恭毕敬的听他们训示。

会议不客气的把具体的任务分派给他们，并限定他们完成的时间，写在会议纪要上，作为会后执行会议决议的书面依据。于是平时惯于用鞭子抽打别人的人，在扭亏非常时期不得不忍气吞声接受李伦甚至他的手下人的指派。

但，亏损的危局逼迫他们，他们只有悄悄背着厂长向委任他们的主管局数落李伦，说他凌驾于党委之上，是严重违反组织的行为。于是李伦处在领导班子的冷弹伏击圈子中，古人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扭亏虽然打响了，可他感觉自己处在各方面的夹击之中了。

越是向前发展，这种“夹击”会越来越厉害。他既然没有能力搬掉这些绊脚石，就只能听命小人们的夹击。在他的事业顺利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向他施放冷箭，一旦他的事业稍有失利，他便会遭到痛打落水狗那种围歼。

他的威信越增加，越潜藏着危险，改革开放预设了事业者葬身的坟墓。

在引进外籍技工的问题上，便爆发了他同反对者之间的第一次公开较量。当第一个批量越野车将近完工后，他亲自同我一道检查了这些“产品”。结果发现，制作样车出现的几个主要毛病仍然没有改观。连续的跟班观察，使他体会到国有企业，习染多年的旧习，牢牢缠着工厂。他看到工人们并不是干不好，而是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作祟。

“干不干，一月一百半”这是工人的口头禅。“亏损又怎么样，国家还能不拿饭钱给我们？扭亏又怎样，再卖命工资卡上不会给你升一分钱。工资是政策规定死了的东西，扭不扭亏还不都一样。”年纪稍长的工人这么说。“工厂条件就这么差，那能保证出好车呀！”年轻的工人总是这样替自己的粗制滥造作辩护：

“李厂长，一个月就只发这么一双手套，我们的手都要冒烟了，眼睛天天流泪，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我们也是人，要不李厂长你也来同我们一道玩两下。”调皮工人的挑衅使他无话可说，他看了看蹬在那里磨磨蹭蹭的工人心里别说有多么焦急。

当他回到办公室看到保定汽车厂为他寄来的“太空”车照片时，想到别人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好的车身？于是他千里迢迢亲赴保定汽车厂实地考察，考查结果告诉他，保定汽车厂从浙江引进了一批钣金工和油漆工在那里“大显身手”。他们拿的是计件报酬，做一台车得一台车的工钱，要想多拿钱回家，只有靠自己尽量多干活干好活，否则解雇走人。

于是他从那里以高报酬招聘了几名浙江工人，经过实地的操作，从农村里出来经过几年严酷训练摔打的“雇用”工人，无论在技术水平和吃苦耐劳，工效等方面都是本厂工人无法企及的。

在党政工联席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引进外籍工人的主张。同时将那些只会在操作工地上散布消极情绪的人，就地“挂”起来送劳人科“待业培训”，待业期只发给生活费。他的建议一出口，联席会便“沉默”了，既不热烈同意也没有反对意见。

可他没想到第二天就在那简陋食堂，他按平时的规矩，中午去吃饭时，那里已围了一大圈老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见到他以后，人们七嘴八舌向他发问，“你准备把工人送到劳人科去究竟怎么处置？”“谁给你的权力把本厂的工人的饭碗拿给外厂工人去吃？你究竟拿了好多钱给外厂的人，他们给你分了几成的回扣？”叫声越来越高，责骂越来越难听。

在经历了这么一场谩骂和声讨后，晚上，他独自睡在床上反思，难道，党政工联席会上，有这种号召力极强的与他貌合神离的“领导”背地与他作对？他们是谁呢？在这种孤掌难鸣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把这个本来只需厂长取舍的人事任用权，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职代会召开讨论表决，引进外籍人虽勉强“通过”。但引进来的人报酬，却要与本厂工人拉平。而对本厂子弟送劳人科“挂”起来培训的意见，则被全体与会者否定了。吸引外籍工人的“高报酬”既被取消，应聘来的外籍工人只好打道回府，李伦第一次尝到凭他的直觉和需要办不了任何事。

眼看引进外籍人就要搁浅，他仍不甘心，晚上同几个到他住所来“聊天”的“智囊团”成员交谈，把这个问题提交他们讨论。有人向他竭力主张推行计件工资制，使有能力多做事的人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这本身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合理办法，可以留住从保定召来的工人，他立刻采纳。外籍工人算留下了。

经过一年努力，到了1989年底，产品结构终于改变过来，原来生产的农用车交给了大集体去做，主厂全力以赴加大越野车和小客车的投入。过道上停塞

的农用车开始渐渐疏减，年底由财务科公布连续两年的亏损终于止住。

然而财务科放出空气，说这全是把工厂亏损的利息挂起来不计的结果，如果过去亏损仍然算在工厂的头上，那么到了 1988 年年底，依然亏损上千万。

李伦有何德能，还不是靠政府政策的挽救？李伦心中明白，自己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要彻底改变这家工厂的面貌，要让农汽厂在政府部门购置专用车的潮流中“存活”下来，还要付出很大努力。

专用车生产已成定局，根据他的提议，农用汽车厂正式更名为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不知内情的媒体，各大报社的记者们，又在中共负责宣传产品的官员指派下，从新来专汽厂对李伦个人进行专访，并且像两年前捧杀李友的老方法，对李伦进行吹捧，要他讲一年多来止住亏损的治厂经验。

不过李伦毕竟比李友聪明得多了，他知道记者的宣传，不过把自己扮演成中共玩弄的木偶，木偶那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更何况虽然第一仗他打赢了，工厂要真正站起来走出困境，还有一段极其艰难的路。

但是他必竟是“事业家”，他同他的几个“左右手”商议以后，第二年的第一步，要在全厂所有工种推行计件工资，用按劳动件数付酬替代计时工资。

此外还用划小核算单位到班组，来迫使工厂的每一个库房，每一个班组建立成本意识。同时还要破除工厂的原来用工制度，不拘一格吸收有志为厂兴旺的有志之士，以改造工厂管理层的素质。用建立第三产业消化那些平时不做工，专门发布“快讯”的人员……

一大堆的改革方案，仗着当时邓小平的“体制改革”为依据，他准备一试自己的“身手”。

第五节：李伦的两手

正当他为这家濒临绝境的国有企业开刀时，他的同僚们无不权巧取豪夺，使自己囊中的票子，房子在任职期间三丰收。没有机会巧取豪夺的人，也会本着得过且过，能捞就捞的态度，捞不到也不会拼命，能维持工厂不死不活就是好厂长了。

老天满足了这位大个子的期望，在 1988 年平过以后，1989 年经营决算告诉他，工厂当年实现了四十万元的利润，连续亏损几年以后第一次盈利，对他不能不算是一个事业上的成功。

这一天恰逢工厂建厂三十周年大庆，为了庆祝这一大捷，也为下一步盈利创造精神上的条件，他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厂庆游行。游行队列从厂门源源不断列队而出，穿过云天路、中山路，浩浩荡荡的队伍占据了北碚的主要街道，然后绕道人民路返回。

他兴高采烈站在马路的十字路口，不断领着队列的拉拉队喊口号，唱着由他谱词的厂歌。殊不知职工们并没有积极响应他，游行队伍在从人民路回归的路上就自动散去。

当他兴致勃勃在工厂后门迎接归来的队伍时，却剩下稀稀拉拉的少数人。领队人说各有各的家，有的要回去弄饭，有的要照应孩子。

中午大家散去时他一再给大家打招呼，下午按往常一样上班。

下午三点钟，他独自站在黄楼最高处临窗向下眺望，这时秋风倦刮着梧桐残叶，满地都是。也许因为自己的妻儿一个也没在自己身边，一种莫名的孤独和悲哀在心头油然而升了起来。……游园会虽然进行了，但参加的人极少，工人们并不理解他的巴顿式激情。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他便站在厂大门口了，为了组织和整顿这支亏损“溃军”，他曾三令五申整顿迟到旷工现象，规定凡上班迟到早退者一律由门岗登记，当天在黑板上公布。

恰好这一天八点半钟了，上班时间已过，还有人稀稀拉拉从街上窜进厂门来。他阴沉着脸责问门岗，为什么不对迟到者进行登记？那门卫却用藐视的口气回答他：“你身为一厂之长，站在这里却奈何迟到者不得，我一个小小门岗能管谁呀？”这回答激怒了他，当即把劳人科科长叫来，把顶嘴的门岗撤了。

当场他拦住了一个刚刚来上班的年轻人，问他知不知道工厂劳动纪律的新规定？可那年轻人傻乎乎回答道：“我不认识你，你管谁的闲事，那么宽？”一大堆围观者哄然大笑，还替这年青人辩解说：“他是新来的”，令他感得孤单无助。

过了几天，党委办公室电话通知他，说市机械局党委要他到局里去一趟。晚上回来时，他的脸上黑沉沉的，看来不知又受到上级的什么“规劝”。

晚上，我在他的卧室里与他单独交谈时，他拿出一份复印的手写文稿，递给了我，我接过一看，封面上的标题是“创业者忧思录” 付标题写道：“活着难道比死去更烦恼？”并签上他的名字。

这么快就止住了工厂习惯性的亏损，还实现了略有盈利的惊人成绩，上上下下都有很好评语，本应使他高兴，怎么反而使这位创业者如此悲叹起来？

回到家里，对这篇文章细细拜读。现不妨摘抄于后，以飨读者：

“……创业者的孤独往往比常人更深重，创业者活的极苦，最累者无非心扉宇宙里的重重重压，……积郁下的苦恼，使人到了无话可说，也就到了苦闷的低谷。是因为不堪重负才华发早生，在热望中的失望才形容憔悴？……

所幸人生一世也不一概心如止水，也有心扉的一角在欢笑，在爱和恨。其间也有万夫莫敌的暴发力。如此来到烦恼的人生，应作些有益于人类的事，于是有了春波荡漾，才有极端的物我两忘，才有无我的奉献，才有公而忘私弃家不顾之举，才有不识人间烟火的愚人之称。”

这开头语说他极痛极苦，虽没有说出苦在何处，痛出何因，宛如受委屈的孩子受人欺侮而又无法说清欺他的是谁一样，对比他的行动与心情似不相符。我想创业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在大业初成时所向披靡，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却渐渐的磨钝，磨钝的过程就是一个痛苦过程吧。

不过大个子的人生价值和善恶标准，细想起来却含糊不清，含糊的人生价值观和朴素的人性爱憎，并不容易恰当的配合默契。但内心的悲哀，没用虚假的东西来掩盖，以欺人之谈蒙骗世人和社会，说明他良知尚存，向人倾泻内心，令人可亲可爱，这一篇他用了很大篇幅呼唤着理解。

呼唤理解，其实就是呼唤人性，在今天，理解的稀缺，正是人性泯灭的表

现。不过，难道李伦真不明白，人性在我们的社会中，是被中共几十年摧残而泯灭殆尽了么？他看问题的浅近，使他行动发生盲目，每遇受挫折而产生的悲哀，成了他‘得不偿失’的兴叹！再往下看——

“怪物，一个飘忽不定，却与人类的存在同时出现的黑色怪物，我们不知道其称谓，姑以阿 Y 呼之，创业者足迹所到之处，阿 Y 都漂然而至，形影相随，阿 Y 毕生追逐创业者，不置死地难以后快，此属命定，姑妄看之。”

“创业者立誓舍弃一切，参与挽救破产企业，阿 Y 却说，这些人另有所图，不然那有的这么傻？”

全文以阿 Y 的十六种非议来揭示“守旧势力”的阻挠，以自己推行“新措施”所处的尴尬来描述创业者的艰辛，最后以这样的一段话作全文的结尾：“所不安者只是哀怜造血者的血色反而苍白，补天者的天职累遭诋毁而已，专汽人啊，专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似比愚公移山还难，路漫漫其修远兮”。

大个子以他的理想主义设想了专汽文化，以最常见社会主义文化表现，来描述阿 Y 的种种非议，在常人看来似乎是无病呻吟，唤不起他想唤起的人性同情。专汽文化是他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在现实中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在我看来他讴歌并需要建立的东西，早就被市俗的不伦不类，例如懒散、自私、欺诈弄得面目全非了一。

因为人们还没有理解，怎谈得上接受？连接受都不存在，继承和发扬就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对日常老百姓的挣钱吃饭，这种普通行为硬套上某某文化就简直是多此一举。

他的专汽精神，好像有一种口号标语的毛病，经不起挫折，因一个员工和他顶嘴而产生那么多的感慨。所以他的拼搏让人难以理解，恶意者把它当成另有所图的障眼法，说他像演戏一样。说他无病呻吟，装腔作势。

然而就比如一场恶战摆在统帅面前，他必须想出让人冲锋向前的激励口号，例如“不攻下某高地决不收兵”、“与阵地共存亡”、“誓死血战到底”之类！除了万不得已的杀身成仁，那也是名垂千古死也值得的。

不过，按照中国国情，他的事业注定成功不了，他的悲哀注定在他的性格之中，被人无法理解，只好任人肆意歪曲了。中共腐败的政治制度，永远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他产生哀叹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不过，从这种矛盾百出之中，他能总结出一套专汽文化，确是他才华的表现，虽然他对各种阿 Y 无可耐何，但他终于以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把各种类型的人捆在一起，驾驭他们。让他平时最看不起的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也听从他的指挥，当然他也同样付出了耐心，容忍他们的装腔作势。

有时还必须用最腐败甚至为人不齿的手段，去迎合政府里一个决定工厂存亡的小吏所提出来的要求。总之戏台上要求演员的一切，他都必须具备并要得体的表演出来，同时还要将自己的人格一齐加以扭曲，而扭曲自己做不愿干的事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虽然他并不承认。然而旁观者亲，若要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

他只有在十分冷静的反思后才能写出“创业者忧思录”这种内心独白，那独白中的空虚，正好反映出他的盲目性与现实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他自己不能

回答的，也许这正是他被统治力量利用之所在。

当然，就像一个学生寒窗十载，在毕业考试中获得了优良成绩，得到一张从事某种事业的毕业证书，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变成了中国的富有者。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在他告退后，利用同市里的关系和自己开创专用汽车厂的名声，经过几年努力，从经营外国进口的组装车积累了自己的资本，在商海中升级，最后成为一个拥有上百万资产，经营一个以房产开发和旅游休闲的中型农场。

但是，当年正在为他个人事业打基石的时候，他必须对工厂作出贡献：在经营上打开销售渠道后，必须打开生产不出产品这个瓶口，他清楚打开这个瓶口，首先要砸烂低工资的“铁饭碗”。然而真要砸烂这个已经吃了几十年的铁饭碗，却并不容易。

习惯计时工资，混天日的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公们，对“计件工资”历来采取抵制，得过且过的工厂管理人员，被推到了这个矛盾焦点上，他们在办公室泡茶过日的安闲日子被破坏，并且还要面对习惯势力控制的工人们。

“忙”和“风险”使他们对李伦产生反感，工时定额的不公，使定额偏低的工作无人去做，强制性的分配使工厂管理层与工人发生直接对立。

于是生产任务受着那些定额偏低的工作阻碍，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瓶口”，工时定额的压力使劳动者自然趋向于只图数量不管质量这种惯性，而质量又往往成为用户最为敏感的东西，人称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工时分配不均的矛盾，夹杂着老厂自然形成的亲朋戚友关系网带，人与人之间这种，“权”“钱”“关系”的复杂角逐，令他举步唯艰。

计件工资施行以后，使本厂职工中留在生产岗位上的“第一线工人”人数越来越少，稍有“关系”的凭着父母亲友的帮助，拼命钻向无定额的岗位。这同官方公布，中国吃皇粮人数在国有企业中要占一半以上的比例相当。

而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填补了这些空虚的劳动岗位，工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雇佣工，各类非工时人员充斥了各个办公室和库房，除了相互扯皮发生“内耗”消磨掉工厂活力外，难以再发挥他所希望的“志愿兵”精神。

一张报纸一杯白开水渡日这种现象，使他试图用一次又一次“岗位培训”，“待岗”来精减那些人浮于事的办公室和车间。结果又伤到了工厂里层层交错的关系网，而招致了“党”“工”两大巨头的反时，于是三驾马驾辕的工厂中枢中。只得靠他那高大的身材强制大家一齐行动，使他事必恭亲，劳累至极。

计件工资总算在他的竭力主张下，排除重重障碍推行起来。然而推行计件工资的直接后果，便是粗制滥造，为产品质量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扯皮多得令人心烦。

每次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李伦便亲自和我一起召集现场质量分析会。一辆汽车从原材料进厂到总装成一台成品，从底盘组装到车身制作，从油漆到总装配，成千个工步，问题出在那一个环节？若对每一个环节不熟悉，对事故不深入调查，事故的责任绝难准确判断。

李伦把事故的处理权交给了我，使我感到就像捏着一个烧红的炭团。最难的是，事故的责任究竟落实到谁？每次质量会都会招来无穷的扯皮。

于是我成了工厂的磨心，产品的质量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它必须奉行真正的‘人性’。这与奉行毛泽东的假、大、空是无法并存的。

不过，在专制统治最后解体之前，独裁者所奉行的文化没有被公开批判之前，“人性”的解放还在艰难中挣扎，处处受到排挤和压抑。

一位署名周炎来的作者，在厂长办公室出刊的‘每日谈’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组‘孔令平精神’的讨论文章，目的在排除传统观念的阻力。不过作者似乎把他所写的对象写得太悲观，悲观得有些过了头。文中把‘孔令平精神’说得那么孤立无援，比成衔石填海的精卫鸟。但我明白，这就是李伦领唱的歌。

这就是他提倡的专汽文化所赋予丰富人性的底蕴。当他在中华大地上这么一个小小角落里，为挽救一家早该淘汰，即将伴着旧体制殉葬的企业拼搏奉献时，人们花费在精神上的折腾要比耗费的体力多的多。

1990年下半年，借助于李伦对我的“关怀”，我终于从当年工人都不愿去住的文星湾的破旧四合院中，搬到了离工厂大约只有两百米的菜市街。虽然是新居，入室仍要弯腰，口袋式的小屋依然阴暗潮湿，地处菜市，环境复杂而肮脏。

但新居离厂近了，孩子的读书以及我上下班就方便多了，用不着再背着他上下班。加上烧的是天然气，避免无烟煤的污染和毒气。

当时工厂新的职工住宅还正在平地基建，职工住房依然是那么紧张，大部分职工仍挤在陋室破屋之中，所以我只有知足的余地，知足者常乐。看来，我们的窘困将随着李伦的成功而成为过去。

在搬进菜市街的新居之前，我向后勤科要了几袋水泥，将潮湿的地面重新铺垫过，几张牛毛毡将破烂的瓦面重新遮盖。幸好，我习惯了用自己双手改善自己的寒窑。在这陋屋的顶上留着一处通风的天窗，口袋屋便是凭借着它流通空气！每当夜深时间，天上下起绵绵细雨，经风一吹，便从那天窗处浸下雨滴来。

黑色的雨滴打进我迷朦的梦中，打在我的脸颊上很是难受，仿佛秋雨也要借着黑夜给我奚落，如像一个高踞在豪华大厦中的权贵，向我的脸上吐着唾沫，心中一阵恶心。惊醒后，我很快联想到白天，因为车身焊接不良同冷作车间的主任争论不休，或者为错装了真空助力器，而将工人训斥一顿！

便觉得那份“认真”劲确有点唐·吉柯德。便自叹何必争此你强我弱，因此招来诸公们“打倒孔令平”的喊声！的确是自找麻烦了。

顾影自怜，我已经年过五旬，被专制独裁折磨了大半身的残躯，还蜷缩在这“冬来似冰窖，夏日如火盆，雨中觅盖瓦，风里倚围栏”的陋屋之中，想到这里，我会独自悄然坐起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发呆。

侧耳听妻正在打着雷鸣般的呼噜，孩子那显得焦躁不安的翻身，他那掀开的被子掉下床来的响声，使我悄悄站起身来，摸索着在漆黑里悄悄进里屋给他盖好，再深深亲吻他的脸蛋，好象唯有这种爱才在我的心中熨上了欢乐。凝眸良久，再回到我那被雨水浸得潮润沾手的床上，蒙头而睡……。

所幸人有睡眠，睡眠伴着忘却使那积郁在心头的悲凉，连同白日沉积下来的劳累在沉睡中消散。大抵因为这黑屋太不能遮风蔽雨，我在这段时间夜里常做恶梦，经常回到那盐源农六队的高墙内。把过去三十年的故事，从我大脑中深深太

深的沟纹里重新翻印出来：

因为偷拔了一个萝卜，当兵的用枪尖逼着我连荫带泥一起嚼到肚里；因顶撞那张棒棒，我被捆在大黄桷树下学老鸦叫！仿佛就从来没有获得过自由似的。唉！我们这不幸的一辈人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受噩梦干扰就很幸运的了。

在中共刻意的扶持下，李伦的事业蒸蒸日上，随着亏损的扭转，专汽厂从1990年开始，利润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强烈的商战意识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把工厂成员公开称为克己奉公的志愿兵，攻坚闯关的敢死队。他的口号是“进攻”。唯有进攻，工厂才有生存的空间；唯有进攻我们才会获得进入国际汽车工业的机遇。

他还用其它人几倍的精力，晚上开会运筹必至十二点过，他说晚上十二点钟属于正常的工作时间，因为“人在此时头脑最清醒”。刚刚在会上做出的决定才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就已经站在工厂大门口，向每天早上参加碰头会的付厂长或者主管干部们，询问他们对昨晚布置工作制定贯彻的计划。

商机意识正是国有企业的那些不知产权归属，上级指派的厂长们所缺乏的东西。专汽厂凭借着这点，脱颖而出了！

久而久之，他成了工厂的一部动力机，不过这动力并不出自国营企业，而是发自他个人的。虽然他在各种场合都以党政工集体的名义，并称为志愿兵和敢死队精神。然而他比谁都明白，他的事业心并不会感染工厂里由上级部门指派的原班人马，这正是他在忧思录之中所发出的种种悲叹的原因。

他“自诩”的党政工领导班子，是一块只能应对上级的招牌。不管他在玩傀儡戏也好，或者他常常发牢骚说是挟着他们一起前进也罢，他在完成各项扭亏部署时只能满头大汗，疲惫不堪！不过由于他个人能力，使这个厂很快扭转了亏损，实现了李友规划了几年的改变产品结构梦想，便是事实。

市政府卸下了一个多年都有工人去找他们麻烦的包袱。所以，不管他怎么搞，机械局的领导对他怎么另有看法，但宣传的媒体仍竭力的吹捧他，他在工厂里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人们管他叫“天牌”。便可以证明他在这家工厂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也就不会有后来继承人来延续他的事业，因为这些是国有企业无法产生的。

1991年5月，重庆市政府组织了一次有关汽车的赴美考察学习。由重庆市各个主要汽车制造厂长们参加，预计学习两个月，他成了这个考察团的成员之一。

工人们戏称“天牌”要出国两个月，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反映出他的独柱支撑的局面。！那时，新开发出来的越野车卖点正好。临行时他关照五一期间虽放假，但生产不能停，总装、油漆和车身制作按照轮班休息的原则，照常上班。

扭亏以来，每逢假节日都要应生产部门需要，指定检验人员现场跟班，检验科于是便没有了星期天，这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星期的工作，是这段时间国营企业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也养成了习惯，就是大年初一我都要去车间巡查一下，以便协调发生的临时需要。

4月30日，李伦由厂办派的专车送到机场，正巧这一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雨，一

直下到五月一日早晨。八点左右，我撑了一把伞，从菜市街向工厂的后门走去，到了办公室，雨停了，我放下雨伞，径直向总装配车间走去。

今天与往常的“节日”显得不同，除了厂后面新的办公大楼还在忙碌着扫尾工程，整个厂区静悄悄的，连通往车身制作的过道也不见人影。“天牌”不在，小鬼偷闲了。今天是国家规定的大假，别说八点钟没人上班，就是全天无人上班也是正常现象。

当我穿过通往总装车间的过道，向总装车间的大门走去时，我突然奇怪的看到，大股流水正从那十米宽的车间铁门门槛上向外翻涌，并且顺着那天桥过道的两侧，像瀑布似的直泻而下。

“不好！总装车间里面怎么会关着这么多的‘雨水’？难道总装车间屋顶漏雨么？”我被那大股的流水惊呆了。顾不得大水的阻拦，脱了雨鞋，挽起裤脚，踩着齐脚背的积水顺着那天桥过道，向大铁门淌去。

总装车间的大门紧闭，门锁锁在大铁门的铁栅上。我走到铁门前，扒在铁栅上向里张望，只见沿着车间外廊上长六十米的生产线旁，均布的五个洗手槽上，水正从四十个水龙头向水槽里猛灌着。然后从灌满的水槽里翻过槽壁，向车间的地面上直泻。整个车间的地面已经积着大约有一公分厚的积水，满地漂浮着包装零部件的塑料袋子和泡沫块。

当我的眼光扫向车间中部三个通下一层库房的升降运输口时，车间地面的积水，正朝三个洞口向着下面大库房猛泻而下。我急忙侧着身，扶在天桥的铁栏杆上向下望去，下层库房的铁门门槛上也如这总装车间一样，昏黄的浊水从纤子门缝里涌出来，溢过二层楼的天桥过道，翻进了最底层的冷作焊接车间。

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北碚水厂的自来水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洗劫”了我厂总装车间，零部件总库和冷作车间。

总装车间被水淹没的损失，比起下面的总库房里面淹没的损失还算次要，总库房里堆积的价值上亿的配件和物资，平时都要保持严格的通风和防潮的措施，以确保防锈防霉。现在这些物资全泡在浩浩黄汤之中。

底层冷作车间配置的电动工具、焊机开关都泡在水里，构成了人身触电的巨大危险。想到这严重的后果，我抬起头，向四下张望，在过道上没见到一个人。

看来昨天晚上，夜巡值班的门卫和巡视警没有人来过这里，情况使我顾不上多思索，我急忙三步并作两步赤着脚，顾不上穿鞋便向办公室跑去。抓起电话，先向李伦的第一助手，常务付厂长陈增“报警”。

“嘟嘟”！那电话响铃响了十余下之后，话筒的那一端传来 了他睡意惺忪的回应：“谁？”他大概才从床上爬起来，问话语气很弱！我向他报告了总装车间大楼、总库房、以及冷作车间全部遭淹的情况。

可我还没有讲完，电话的那一端就被不耐烦的语气打断：“别大惊小怪的好不好？情况不要讲的那么严重、那么夸张好不好？”

陈增早在我进厂之初，一次去医务室看病的机会，我便认识了此人。那时我在二车间，上班看病本来就不合工厂规定，心想赶紧看完病，好回车间上班。医生桌前已排着三个人，陈增正好排在我的前面。轮到他，啰里啰嗦向医生讲了足

足二十分钟的“病情”，其中拉扯了许多与病无关的闲话。

好不容易看他接过医生开的处方，不料门外涌进他的爱人、女儿和女婿，插着轮子依次问诊。我只好耐心等着他的家人一个一个看完，看看手表，足足耽误了一个多小时，一家人才离去。

李伦担任厂长后，大概被陈增表面冷静的表象所蒙蔽。在向云推荐下当了常务付厂长。殊不知这陈增上任才一年，便私自窜通劳人科管工资的刘丰，在年终呈报工资报表时，篡改了自己的工资档案，私自晋升了一级。可惜，事情很快被察觉，陈增受到了李伦的严厉训斥。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陈增同销售公司总经理老婆私通的丑闻。为了替这个钢班子遮丑，李伦暂时还将他留在常务付厂长位置上，向全厂职工封锁了他的斑斑劣迹。不过，尽管他表面装得道貌岸然，老成持重，尽管他熟悉上层领导的脾气，而将这种关系处理得很好。但可卑的行为已使他暴露无遗。

现在，听到他这种无理、无责任心的回答，我可绝对不示弱，语气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向着话筒吼道：“你是常务付厂长，李厂长刚走，工厂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怕不好交代，现在灾情严重，现场又没有人，你必须立刻到现场排除灾情！”我几乎在用命令的口吻向他吼叫，说完将电话重重地摔在电话坐机上。

我第二次重返库房时，库管的总负责人肖芳正踩着积水，打开库房大门，那积水从门中汹涌而出。整个库房已经汪洋一片。大股的水还在从升降机运输口中直泻而下，进入库房的水柱正好冲在装着零件的纸箱上，打得劈啪作响。库房里的配件像落汤鸡似的呆呆地伫立在黄澄色的污水中呻吟。

望着那从上面灌注下来的水注，我想现在第一件事是打开总装车间大门，立即关掉还在继续狂泻的几十个水龙头。！便朝楼上冲去，此时，值班的保卫人员已闻声出现。正从侧面的栏杆上爬进车间的侧窗，翻进了第一个窗口。两分钟以后自来水的龙头一一关掉，车间和库房开始缓缓的退水。

半个小时后，陈增和卢瑞到达现场。库房门口聚集了十来个人，正在用桶和碗将库房的积水向大门方向向外拂！看他们的样子狼狈失措。我在门口喊了一声：“赶快把淹没电器的纸箱抢出来，不要堵在一个口子上打拥堂！”我这么一吼，其实是代替了陈增在指挥救灾。而他直起腰来白了我一眼，并没有理会我。

想到刚才他在电话中那轻蔑口气，便不屑挤进去，免得他又认为我在贪功邀赏了。转身，绕过盘道向楼底走去，那楼底满地已汪洋一片，库房的积水渗过预制板的缝隙，还在不断地泻到排列在车间中的铁皮车身上。

而焊接的电插板好几个都泡在水中，发出噼啪的火花，从浙江招来的冷作工在水中工作了。看到这情形，我想他们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便冲他们喊道：“不要命了么？马上关掉电闸，暂停工作！”电闸关上了，车间里静寂一片。地上的积水在寂静中向四周溢去，从库房上面漏下来的水也渐渐减少。

十点钟，整个总装大楼的水算是退去了，太阳也从浓浓的云层中伸出她火红的头。总装车间和焊装车间暂停工作，打扫积水，清理配件。唯有总库房的库管工们正忙碌着将沾了水的内饰和座椅以及装着电器的纸箱，往库房外的运输过道上搬，让它们照照太阳透透气。

陈增们已经离开，一场抢救水灾的事故平静下来。我望着那些堆在运输过道

两侧的水淋淋的纸箱，心中暗忖损失少说也有几十万，造成水灾的直接责任人总装车间的负责人，是否受到追究，我不知道，也不打算追究这些李友的骄子。

只是在这一周周末的生产调度会上听他声明说：“4月30号上午水厂就停了水，我们车间没有接到任何停水通知。那天下午休息，除了几个加班的工人都没有上班，这些水龙头一定是工人忘了关上，晚上什么时候来的水没人知道，因为第二天是五一节放假休息，当天晚上下了大雨，再没人回过车间……”

经他这么一说，水淹总装车间的责任，应由与专汽厂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水厂来承担，而与本厂和他本人不相干。经他这么一讲，坐在会议室主持人位置上的陈增未作任何追究。

我坐在会场中间，心中想到李伦经过多少日日夜夜，熬更守夜所挣来的这份家业，还没等到结果就呈现解体的微兆了。他刚一转身，放假不休息的规矩便守不住了；车间主任的责任制也不执行了；工人都再不轮流加班；库房管理制度乃至警卫人员的职责全部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好象迅速回到工厂原来的状态。

由此想到他的忧思录，想到这家工厂从亏损的泥潭中爬出来的日日夜夜。

李伦既是一个匆匆而去的过客，他的努力，他的心血无非只换来了一个“天牌”的美名。

这陈增原是中共很称意的代表人。还有那参加会议的王惠书记，向云主席，他们在这个缺“天牌”压阵的事故责任交待会上，无一不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如此看来，对李伦的事业只能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因为这是国有企业！大家迟早要散伙的。

两个月后，李伦从美国归来，当他在向全体中干和党员干部的传达会上，讲到美国企业的职工对工作岗位那尽职的态度，还在为他的事业培养人的素质时，我注意到，全体与会者对五一期间发生的这一重大事故只字不提。

我当时想，他的钢班子铁队伍在向他隐瞒此事呢，还是他那志愿兵领导班子对此事达成了什么默契？或者就有一种无形力量在牵制李伦，使最亲近他的人抱识时务者必缄默的态度？只要没人问起，千万别提此事！

又过了三个月，李伦应我的邀请作为朋友，光临我刚刚住下的菜市街新居，“查看”我的陋室时，我才在吃饭时试探地向他发问：“五一节发生的事是怎么处理的？”他圆睁着惊诧的眼睛，带着一种没头没脑的疑惑，奇怪地问道：“五一节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没听说？”

听他这么回答我心中便有了底，打趣地替他解嘲：“你别故作不知，发生这么大的事，你的得力助手不可能不与你商量处理办法。”他越听越奇怪，放下碗摘下了眼镜，严肃追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才将五一节水淹总装大楼的事向他叙述了一遍。

从他那惊愕的眼神里证明，对此事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边听边站起身来，脸上泛起了红晕。我知道，此刻他有些激怒了。按常规，发生这样的事情李伦刚去美国当天陈增就应该通知他，可是事情竟然过去了整整五个月，竟没有一个人向他汇报。可见他同这个厂的亲和度究竟有多大？

人若缺了感情的支撑，单凭单方面的事业心，再大的热情也是要熄灭的。为止住他正在亢奋的情绪，我说道：“对这件事你先冷静下来，最好不妨先单独了

解一下库房人员和总装车间的工人，把经过了解得更透彻一些。当然你也许最想不通的是，你最信任的人这次是一手遮天地向你隐瞒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李伦已经深深地陷入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中。自言自语地说：“怪不得这段我离厂的时间，还有人督促财务科查壁山坐椅厂的帐目。”

事情得从三年前说起。那时李伦接任厂长的第二年，因为资金匮乏，开发新车品所需要配件一时采取从配套厂家赊购的办法，讨回来装车的东西多有残次品，几家沙发厂送来的坐椅，不仅做工粗糙，颜色和款式的配套上也难于一致。

这使他萌发了建立一个由劳动服务公司管理的坐椅厂想法，由本厂职工自己生产坐椅。结果被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否决，理由是自己做出来的成本高，未必比买现成的坐椅划算。这时候家在壁山县农村的孙镛找上门来，从自己家的农家茅舍中办起了坐椅厂，取名重庆专用汽车坐椅分厂，专门为我厂的车配套。

几年后随着本厂的日益兴旺，孙镛的坐椅厂也越办越大，由农村茅舍搬进了璧山县城。三年内发展成为拥有资产百万、厂房二十亩的民营企业。

与此同时，厂里反对李伦的势力有了“把柄”，说他用国家给专用汽车厂的专项贷款，暗中挪用给壁山坐椅厂，并成为这家私营企业最大的“私人股东”，每年都要从那里分得几十万红利。

因为先前两件丑事，受李伦严厉训斥之后，对李伦怀着私仇的陈增，早就把眼睛盯住了壁山坐椅厂……李伦出国两个月的学习时间，给了陈增一次难得的好机会，经过当时的党委付书记王惠的默许，他调集了财务科的两名办事员和有关坐椅厂全部帐目，进行了秘密清查。

结果，出乎陈的意外，他在查帐中并没有找到李伦挪款的证据，也没有找到李伦年终分红的任何收据之类的凭证。

李伦从美国归来回厂以后，财务科长将陈增组织查帐的事情告诉了李伦，在李大伦追问下，陈增将这件事情归结厂的职工代表大会所要求，并说清查帐目，还这些代表一个说法也是一件好事，查帐已经惹恼了李伦，现在又听到水淹车库的事，无异于火上浇油。

国庆节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他终于揭开了五一水淹总装大楼的事故。在严厉的斥责了责任者对这次事故的失职行为后，宣布免去陈增常务付厂长的职务。但因为陈增与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有说不清楚的关系，在机械局有相当影响力的后台支撑，所以，在免去他原来职务后，仍给他封了一个中层干部头衔。

在行政职务上降了一级，但工资津贴年终奖金并不少拿。

陈增却并不甘心他的失败，一直到了四年后，李伦“病退”，陈增死灰复燃，重新窃取了工厂的常务厂长职务。并对李伦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报复，几乎使这个高个子中箭殒身。

在扭亏致富的春风中，李伦的“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钢班子”，其内部不可调和的斗争拉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帷幕。

这原本就是共产党内的党风决定的。不论李伦在专汽厂有什么报负和追求，也不论他个人的素质如何出类拔萃，他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他都必须面对这种无法摆脱的内耗。

但是，不管怎么说，李伦终于成功地在四面埋伏的危机中完成了他的“专汽

的大业”。从1989年开始，工厂每年的赢利以几何级数在增加，不出五年，工厂实现累积利润达2.5个亿，奠定了他事业的物资基础。

第六节：我为一榻安身处而争

1989年下半年，专汽厂已在李伦领导下摆脱亏损，总共七百套职工住宅的修建蓝图，就在李伦的亲自审阅后，摆到了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的议事上来。这七百套住宅几乎使在厂职工每人一套，是历年兴修住宅总和的六倍！他们分别以9号楼、10号楼、11号楼分期分批的在奔月路、云泉路和云天路边耸立起来。

在它们竣工以后，专汽的职工们将永远告别三代同住一间房、一家人拥挤在阴暗潮湿的“灰色”贫民窟时代。实现了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豪迈诺言，告别那“冬来似冰窖，夏日如火盆，雨中忙盖瓦，风里倚围栏”的日子终于才到来。

这才是李伦留给专汽厂三千员工最有价值的纪念，也是对我的“忘我”工作最好的回报！这才是“孔令平精神不死”的最终目的！不然，救工厂干什么呢？

1991年底，第一幢共75套住宅的9号楼在月亮田正式竣工。我因为所住的菜市街已被房屋开发公司征用，住在那里的全部居民房马上都要拆掉，所以面临着搬迁的紧迫形势。满以为根据工厂的分房条例，无论谁玩什么花招，我都可以排在分房队列的最前面，住进9号楼不会再有什么意外。

可我临到在分配9号楼之前，想都不会想到，在向云把持下，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抛出一个新的“分房方案”。在原来的“进厂届满五年才有资格排队”的规定后，加进了“以进厂的年限进行计分，并按这个分数进行排队”的条款。

理由是只有厂龄才算对工厂作了贡献。在厂的年限越长对工厂贡献越大，应当越有资格享受工厂的福利。

按照这个逻辑，比起那些在厂几十年的老病号，坐吃大锅饭的懒汉，我的贡献微乎其微。能分给一个栖身住地已是工厂赏脸，要分房子请站在后面。

按照这个修正办法对原先名次从新进行调整，我被排到了三百名以后去了，不但9号楼没我的份，就是10号楼建成，我也排在最后几名。我不知道这个一贯捉弄人的恶棍，是对付我呢，还是给李伦看？我尤其不能理解李伦为什么还让这个恶棍主持这次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分配？

其实这已不是李友抢机会给自己修工程师楼的年代了，在那个年代，好多职工为盼望能住上一套两间的住宅，硬是等到头发都白了；

在那个年代，为了搞乱分房次序，沾着权的人，以花样百出的理由，千方百计地在分房条例中塞进有利于自己的条款；

在那个年代，就为了一个分房排队的前后，可以与同事争得打破头，千方百计把别人挤出分房的队列。蔡家医院收拾母亲那一套，从新浮在我的脑子里。

那向云和他的老婆占了两套住宅还不满足，还偏偏利用工会主席的权力，来捉弄他心中不满的人，令人愤怒；这世道人心怎么变得如此之坏？

比着工厂破烂的过去，讲今天辉煌的业绩，李伦这种有意无意的自我欣赏，既中伤了机械局的老前辈，老上级们，又刺痛了像向云这样的痞子。用进厂工龄

算成绩，其实是对李伦的又一种否定！别看这混混在公开场合下将李伦捧在天上，他对这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嫉妒和仇恨。

不过眼前却大不相同了，眼看着工厂四周新房子一幢幢建了起来，房子的质量也越做越好，好房子还在后面，何必去挤着争？本来我大可不必在名次排前后计较，更不屑同王惠、向云为代表的小人一般见识，但是对向云的流氓地痞本性，敢于同他作对的我，应该让他明白世道已经变了。

赶上菜市街的拆迁！北碚城建指挥部贴出来的告示，要求所有的拆迁户都必须在当年年底之前搬离现场。否则推土机进场，不搬出的住户后果自负。我处在9号楼搬不进去，10号楼又还没有建好的两难境地。

在城建局最后通牒面前，我只有再去找工厂总务处，请他们在分配完9号楼腾出来的旧房里，为我家安排一个临时的住处！当我走进后勤办公室找陈涛的时候，他却向我亮出了厂工会关于安排职工临时宿舍的“书面通知”。

那上面写道：“由于进入新房的住户所腾出的旧房已安排完毕，对以后要求住临时房的职工，一律停止安排。”

“通知”上的落款，又是向云。真是寻衅者路窄，每每我最迫切需要解决住房时，都是这个向云同我过不去，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仇恨，使他像鬼似的缠着我？

奉行整人的共产党人，其用心之黑，整人之不择手段，我足足领教了四十年。整人不因别人错不错，凡是看不顺眼的，整倒别人以为快意。整倒了别人还要踏上一脚，这本是中共头子毛泽东的座右铭，也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原则，“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嘛！挨了这么多年的整，我也摸熟了共产党员的德性。

欺善怕恶是他们的共性，对付向云这样的下三滥，只好使出对付地痞流氓的办法，就比如我曾在监狱对付监狱官吏和找麻烦的“狗们”；对付郑树勋；对付过蔡家场的那个汪户籍；对付二十四中校长何希濂，以及蔡家医院的书记王光明等等。中共统治的天下遍地都是咬人的狗，狗性不能以人性理解。

有几次我都想将向云拦在厂大门口，当着工人的面臭骂他一顿，以泄心中的愤懑，但反而又一想，现在情况不同了。一来因为我现在在工厂所处地位已不同于一般职工，二来，尚有孔令平精神的美誉，动辄使出那泼辣办法，有损李伦的面子，他已两次亲自过问我的住房了。我不能为羞辱一个无赖而伤了李伦。

所以对这个流氓我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但是眼下我周围的邻居已纷纷他迁，城建局的推土机，已经蹲在我们那最后几座孤零零的房子面前，随时都像要“铲平”那里！。

傍晚时，我在外经办的过道上与向云对面撞过，听说他在安排迎接全国总工会的一个来厂视察工作的付主席。便上前拦着他的路，冷笑道：“要不要我来替你向全总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呀？”他见我横眉怒视，语气逼人，话中有刺，立即虚了胆，不敢迎战，垂下眼皮，一语不说，绕开了我走了过去。

他刚进去，门里出来了李伦的秘书小杨，他一面劝我说：“年纪大的人不要动怒，发火伤肝，对身体损害最大。”一面将我拉到一边低声向我说道：“李厂长正在召开迎接全国总工会来厂视察的预备会议，里面还有重庆两家报社的记者，你就是有再大的意见也要忍耐一下，等视察完结后怎么都好说。”

余怒未消的我，恨恨地指着外经办说到：“这老混蛋欺人太甚”。接着便向这位年轻人，讲述了向云三番两次阻挠我正当参加分房的经过。

正在这个时候，通向厂后门的石阶上，突然冒出了我母亲的身影，她在刘启建的搀扶下亲自来找李伦了，眼看我们马上就要露宿街头，她实在不能再等了。

李伦已经闻声在门口迎接了她俩，并且将她搀扶进去，连连声明：“我们的工作做的差，劳烦你老人家了。”

第二天陈涛电话通知我，要我下午两点钟左右去后勤办公室，参加由李厂长亲自主持的关于我的住房问题的会议，参加这次专题会的是本次分房的领导小组组长向云，付组长王惠，要我准备一下。

与其说这是一次彻底解决我六年之久的分房资格纠纷，还不如说我当着李伦的面，揭穿这一对暧昧男女长期搞的阴谋。早在六年前，因为我向市里反映了本厂的情况，李友故意通过他俩编造了一个理由，说我在进厂之初就写过不要住房的承诺，把故意不分给我房子，曲解为我自己为了进厂而不要住房。

从此以后，每次厂内职工的分房都没我的份。

这一次我要从头到尾彻底的捅烂这个阴谋！逼着对方在交不出我写的不要住房的承诺书时，痛快地将他们长期非法剥夺职工权利的阴谋公布在全厂职工面前，逼迫他们承认这是他们卑鄙的打击报复。

主意打定，下午两点钟，我准时来到了后勤办公室。

当李伦宣布会议开始以后，我便单刀直入追问道：“在我厂房屋调整中，是王书记和向主席说我在进厂时，曾书面承诺来厂不要住房的书面保证，现在，请你们二位当着李厂长的面，把我所写的这个书面保证亮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逼问，几乎是二人所没料到的。

其实，在档案中塞私材料是中共整人的常见惯例。当年在大学生中为了划某同学为右派份子，就曾经在窃取被害人的一句话或一段日记，经过“无限上纲”臆造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使好多人含冤几十年，无缘无故死在冤狱中。

当时很多人就提到“黑档案”应与本人见面，后来平反当局诡称这些整人的冤档已销毁。然而现在，我有理由认为专汽厂的党工，又在使用这一下流的办法继续整人。现在面对我的追问，老奸巨滑的向云，回避正面回答，连忙重申他在李友掌权时，就主张将文星湾旧房解决我住房的旧事。

于是我不紧不慢地把老事翻了出来，从向云在六年前隐瞒真相，回答区政协主席张文新的来访，讲到分配八号住宅他那蛮横态度；从85年的分房条例，讲到眼前分房条例许多条款的变动，揭看向云的煞费苦心……

“一个工会主席理应在我厂扭转亏损的重大转折时刻，做一点有利于全厂员工团结的工作。例如把工厂暂时的困难向职工们经常解释，让他们树立克服暂时困难的信心；经常深入到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向他们问寒问暖，解决具体困难；对职工中发生的家庭矛盾及时解决，以免闹到厂里干扰扭亏大事等等”。

“可是作为工会主席你干了哪些实际工作呢？几年来我还从来没听”

“举几个例子，总工办的瞿工，老母亲因重病向工会借钱，你执意不给；逼着他只好到医院去卖血；厂里面的交通车坏了一停就是半年；职工食堂里为了单身职工有一个吃饭不被风吹雨打的场所，伙食团找你批一点牛毛毡你就整整拖了

一年……这种事真是太多了”。

“就以我的分房资格，明明是被你们有意剥夺了，你知道我的工作忙，你说，你脑子里打的什么鬼主意？我们就真是愚钝极点的人，任你把我们当猴耍？”

我怒斥这个一向盛气凌人的工会头，使他像一只失了神的木鸡！呆呆地坐在那里，也许他的脑子里正盘算着进一步收拾我的阴谋，但我却并不怕；**几十年我同这些鬼蜮斗，不但练出了胆，还练出了智。**

我把话讲完，李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位仁兄的自信被无情的事实动摇了。他并没有能力挟着党、政、工一齐，率领全厂的自愿兵。！他那“团结一致”的钢班子依然同中共下层的普通官僚一样，慑于他在工人中的威信，玩着两面三刀，对他采取阳奉阴违罢了！

此时他抬起那显得疲惫和烦躁的眼睛，望着两位‘助手’发问道：“那么，你们看，孔令平的住房该怎么解决？”他今天是有意让我同两位工厂的最高头目当面对面的。因为只有这种交锋才会把平时里二人的阴谋戳穿。

两个木鸡在他追问下一言不发，陈涛终于开口了。他建议道：“根据工厂职代会的决定，九号楼留有七套由厂长处理的住房，我建议李厂长可以动用这个处理权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么处理既不提过去的事，又解决了我眼下的困难，也给两个人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以免“伤了”领导班子装出来一致那点面子，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此时，两人表面不说，肚子里还不知耍什么花花肠子，同这样的人共事够累。

在这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到来的时刻，我们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换这个果实的，真正觉得问心无愧啊！看看我们周围的厂，垮的垮了，有的维持着倒死不活的状态。！专汽厂没有这几年李伦带领我们拼搏，能在今天分到住房吗？

所以，我不愿接受任何人的特殊照顾，我说“今天，我是要讨回党委和工会长期剥夺我正当的分房权，**他们应予公开认错。**然后，按纠正错误的名义解决我的住房。这才令人心服”。

不料，我刚一说完，那原先打算沉默的王惠，像被针扎了似的立刻跳起来叫道：“这怎么行？**党所作的处理，也是组织的决定，是不存在纠错的。**”

死不认错，整人后不准别人申冤，这又是中共的传统作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若不是被打倒过的邓小平，胡跃帮替毛泽东制造的冤案收场，谁会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平反？小小工厂党委付书记不认错是当然的事。

第三天，《重庆专用汽车厂关于奖励分房》的条例，由厂长办公室签署的红头文件，下发到专汽厂的所有科室和车间。获奖的七人中，我排名居第一位，虽然仍是一种变通的方法，却是创下了这家工厂的首例：**我已五十五岁了，才第一次以获奖的形式分到了属于我的住房。**

然而，若不是全厂员工，在李伦领导下创下这段业绩，我的住房恐怕还遥遥无期呢！不过，像我这样的普通职工，像我这样的年龄，甚至比我年纪更大的，在毛泽东疯狂作乱下，没有自己住房的人家还多的是呢！偌大的中国大地上，‘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

1992年8月，我终于在城市规划指挥部的通令紧逼之下，在推土机隆隆的催促

声中，雇了一台长安车，匆匆将我的家从菜市街，那四面废墟的包围中搬离出来，搬进了阳光充足的，专汽厂九号宿舍一套三居室中。**结束了我屈身霉而潮湿的贫民窟历史，当年我已55岁。**

我坐在客厅里感慨万端，尽管我并不心服这种以厂长名义的奖励，但我想，农汽厂继续烂下去，难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住在哪一个街边屋角？至于在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中，我又哪里同向云们去争“公正”啊！

第七节：专汽大业的破灭

专汽厂能在短时间里“振作”起来，是因为它遇到了面临破产的危机。破产后，一千名职工及其家属总共三千余人拥上街头向政府要饭吃，是对中共政府一个不安。在这种时候碰到官场腐败沾染较少的，又有很强运筹能力的李伦，以他拼命的精神和敏锐的天赋，才得以成功地完成“专汽大业”。

一千三百多专汽职工看到了工厂短暂的希望，享受了它的效益，在北碚的街头不用为几分钱的菜钱同农民们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又可以在街头粗声说话。然而，那些多年“指导”这家工厂的上级机关，却增长了日渐膨胀的嫉妒心。至于那新闻版头上，猎取专汽厂新闻的小报记者，又从新围了上来。

“暴发户”是机械局的领导们对李伦的看法，他们从来不会掉过头去看看过去，思考之所以有这种隔世之变的原因。

他们没有体会到大资本家李嘉诚、霍英东们当时是怎么创业的？而老是站在中共这个相互猜疑的，带着嫉妒心和这个政党根深蒂固的缺乏人性的立场上，来看待创造事业的人。当然，大资本家创业是为了他的家族集团，而李伦也是为了他今后的事业前景！虽然，这里埋伏着李伦事业一个悲剧性的结尾。

可悲的是，李伦的刚愎自用，使他当时还没有洞察这个政局的能力，还一味沉醉在一群为他捧场的“敢死队”迷魂阵中。当时就有人向他提醒过：“你在那个工厂干了那么一番事业，一定要伤害一部分与你貌合神离的人，同时，中共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是没有前途的，你要多加小心。”

可惜，他在面对朋友的忠言逆耳时，只是一笑了之，而且夸下海口说：“谁能否定我这些年所创下的业绩？我一年就可以赚回过去的十个农用汽车厂，谁敢污蔑我，他就也上台试试！”

但是，最后终于不幸的被他的朋友言中了。

同当年人民公社豢养一批不做事的公社书记和社长们一样，国有企业养着一批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工厂的厂长书记们。他们担心的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存亡，他们只知道执行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奴才般贯彻一个接一个名目繁多的指示，时下他们只认钱和权。

专汽厂自1987年，换了一个将工厂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李伦，就能实现每年1千万等差盈利，成为重庆市（也是全国的）国营工业企业的佼佼者。虽然专用汽车厂的上级对李伦的桀骜不驯很不以为然，但前有李友、孙余等人，都一个个败下阵来，所以对李伦的傲慢也只好忍气吞声。

在他任期七年的时间，前四年用来弥补他的前任480万亏损，从1991年工

厂亏损已提前扭转时，新的办公大楼落成，新的总装大楼，新的焊装生产线陆续投入使用，新的金工车间在破土建立，新的七百余套职工宿舍先后竣工，专汽的职工们搬进了新居。

在办公大楼的左侧升旗台边，留下了一块两米高的大理石碑上，他亲自蘸着创业的酸甜苦辣，将他的深情，倾注在那石刻的碑文里，那碑文叫扭亏纪念碑，上书道：

“公元一九八八年工厂亏损四百八十万……是时，悲叹之声随处可闻，凄凉之井到处可见，人人思散，能者思走……后经三载，夏历三伏，冬博三九，一日不彻底翻身，余一日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终至 1991 年春提前九个月向世人宣告，重庆专汽从新站起来了……环顾乾坤，古往今来，适者生存，当今之世竞争激烈，改革为先。饱受亏损之苦的专汽人立下海誓，决不重演亏损历史……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为后者诫，特立此碑。”

七年前这家资不抵债的农用汽车制造厂，现在已变成一个拥有固定资产 2.5 个亿的大厂，形成了拥有越野和公共汽车两大类，五十多个品种，年产值超过五个亿的重庆市汽车生产大型企业，成为政法、公安、农业、卫生环保、邮政等二十多个政府部门指定的专用汽车生产基地。

在云泉路和云天路的交叉区，原有的那十分沉重的灰色破毡帽，已经在原先荒凉的土地上耸立起一片崭新的厂房。位于中央地带的黄色办公楼，已从它立基的小山包被炸平，原先长满荒草，停放兰色农用车的场地上，一幢占地六千平米的八层办公楼，拔地而起。

在办公大楼的东面，一排五层楼房共两百套带有浴室和空调的客房，以及与之配套的锅炉房和餐厅，取名北泉宾馆的豪华招待所，以它的妩媚迎接着到这儿来作客的八方宾客，永远结束了李伦所住的阴暗潮湿小屋，以及端着饭碗蹲墙角的寒惨日子。

回过头回忆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片沉寂了几千年的八万多平米的土地上，从荒凉的状态发生的变脸。在惊讶之余自然会想到这里换了一届又一届的厂长和书记，怎么就没人想到在自己任期上作点改变它面貌的创业？

好像这里就等着这位 1.88 米的大个子到来后，才开始改换它的旧貌？而今，只有那些不计名利，无声劳动的建设者们，才十分清楚这一切来之不易。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1993 年春天在持续七年的日夜奋战之后，在一次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的会议中，他昏倒在会场上，当会议的工作人员把他从昏倒的椅子上扶起来时，才发现一层厚厚的坐垫已经浸透了他的鲜血——因为脱肛造成的大流血，整整折磨了他一个晚上。

他的妻子、孩子和贴身的工作人员，抹着眼泪将他抬送到重庆医学院的住院部，他不得不一连躺在病床上三个月，在这期间他仍一如既往的通过他的秘书，关心他一手扶持起来的“专汽大业”。

1995 年 4 月重庆市政府对他个人进行了特别的奖励，他的名字载入了当时山城创业的企业家——山城之星的光荣榜。并且一次性的向他发给了十万元的奖金。颁奖时，他表示为表彰和鼓励为专汽厂的科技进步作出贡献的人们，他决定将这笔奖金捐献出来，成立北泉汽车集团的科技发明奖励基金。

当时党委书记王惠、工会主席向云曾代表党政工领导集团在病榻前发表了“极其动人”的讲话，王惠称李伦为专汽事业之父。录像的镜头摄下了她流泪激动的片断，当场决定由党政治处摄制，取名为“逆流奋进”的长篇纪实纪录片，记载专汽厂在他的领导下如何克服困难，扭亏为盈的七年历程。

这部纪录片的开场便是李伦在任职时临危受命的录音讲话，以及他亲自参与编写的专汽厂歌。当我看到王出现在镜头，注意到她几次摘下眼镜擦去流在眼角的眼泪时，我虽有一种不适的呕心，但还是半信半疑了她。

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然而，正当人们议论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他从病榻上醒来，感到自己**其实是干了一件自命轰轰烈烈的蠢事，他突然感到生命已不能支持他继续完成他的宿愿。**

然而，就像一曲美妙的乐曲突然弦断了一样，李伦在专汽厂开辟的事业，就此中断了。

1996年五月一日前一天的晚上，党政工召开了全厂的职工大会，决定成立北泉汽车集团公司，并同时成立集团公司的董事会。这一夜，李伦带着初愈的病体到厂主持了最后一次“交权”大会，在作了长篇的工作讲话后，便宣布了他的工作交待，接任他担任厂长的是原汽车公司的一名生产处处长王洼。

会议一直开到了晚上十一点钟。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李伦不知是因为身体原因，还是心理上的障碍，坐在主席台上，灯光映着他苍白的脸。

散会后，他不像往常一样被一大群人簇拥，而是独自一人走出办公大楼，坐上在那里等候他的车匆匆离去。我当时只听说“升任”北泉集团公司的李伦，在专汽厂某个办公室里继续在策划他的集团公司大计。

换班就这么戏剧性的完成了，李伦再也没有回到专汽厂来。所谓北泉集团公司，也从来没有挂牌，专用汽车厂一段“辉煌”的创业，随着他的离去而结束了。没有后继者继承他事业，专汽厂像一个断层出现在他任职七年后的一瞬。谁也不会像他那样拼命，换取这个厂从未出现过的辉煌。

令李伦没想到的，两个月后他的儿子李嘉，因套购北泉汽车组装进口汽车的合格证，被检察院刑事拘留。那个被一度贬为外经办主任的陈增，重新由王洼聘为常务付厂长，纪录片“逆风奋进”停拍，这一切厄运好像早就等着这时到来。

李伦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根本没认清，在中共统治下，任何有才能的人没有掌权者作后台是休想干成任何事的！！专汽大业的成功，只说明中共一部份人的主张，没有认识这点，怎不到头一事无成？

一个以王惠为主任，刘贵为组长的审计组宣布成立，那审计组的办公室就设在办公大楼五楼党委办公室对面，开始了对李伦在职期间的财务大审计，审计组放出风声，说李伦在离任时至少卷走了数百万公款。她举着一把检举信，声称审计室将拿出一个令全厂职工都满意的结论报告大家。

这种说法，挺合乎中共改革时期企业法人的一般逻辑，所以颇能蛊惑人心。现实过程应当这样：一个在任职期间一无能力的人，把一个企业搞得一塌糊涂后，也要捞足自己的腰包。

有权就捞，过期作废，是邓小平中共管理下国营工厂的通行法则，有人把

这时期的工厂管理者比喻成一群蝗虫，蝗虫飞来飞去，吃完地里庄稼，留得荒凉一片。李伦既把厂搞富了，也有条件捞了，收获一把也是应该的，要不然，他的儿子也趁他离任机会，连走私车合格证也要捞几十张？

但是专汽厂的一部份职工们却替李伦打抱不平了，黄师傅说：“贪财的人不可能把这个厂从死地里救活。再说，李伦就是拿了一笔钱走，他也应该，一份贡献一份回报。这些年来他把我们这个厂救活过来，工厂赢了那么多，他得一点也是天经地义的，反正总比吃光了庄稼再飞到他处的蝗虫好多了”。

而另一部分人，像陈增以及曾在李伦从严治厂的刀口挨了宰的人们，别有用心的鼓动职工联名写信上告机械局，要求彻底清查李伦任职期间的所有账目。

李伦被一群小人当成落井下石的罪人。

中共这种令人寒心的官场格斗，那王惠令人作呕的变脸，就会想到今天人心不蛊。中共统治令人感到道德处在败坏的末日！中共的党员有几个不是当面是人，背地是鬼的呀！君不见那毛泽东是怎样对付刘少奇们就明白了。先师楷模沿袭至今，成了中共的党风！

靠走私进入大陆的小轿车经过倒卖，每车可以赚到二十万人民币。官僚集团为了控制这种轿车的分配，严格卡住这些走私黑货的合格证，掌权者利用发放合格证也能跻进中共“中产阶级”！。

为支持李伦日野生产线所需资金投入，肖秧曾给李伦特批了走私车经营权，以政府名义给每台组装进口的小车，以每台二十万，向专汽厂输入了“资本”。这比之由市政府调拨三个亿，简单又快捷。三个亿相当于 1500 台进口车的组装机，每一台组装机充其量只消两个人装两天就成功了。

李伦退休后，正是进口车组装进入高潮。重庆市大小官倒们像一群苍蝇，盯着这转眼就可赚二十万暴利机会展开了争夺。他退休以后，进口车的发放权力落到了王洼的手里，正儿八经的做起倒卖合格证生意来了。这比六年前殷大公子在工厂门口倒买农用车卷，大进了一步。

1996 年初，王洼批给成都的经销主任陈平，一次性出售的合格证就有一百张。这个消息是通过什么渠道让李嘉知道的，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已成为北京车经销商的李嘉，从陈平手里一次性买下了三十张组装机车的合格证。

然而，因为暴利太赫人，很快中共派出专人查封和清理走私车。陈平因此而被公安局传讯。于是李嘉从陈平手里买下三十张合格证这件事，便成了殊连李伦贪污的“证据”。在这铁证之下，李伦便由众口称颂的创业功臣，一夜之间降为受到追查的“准阶下囚”……

人在剧烈的运动中头脑发热容易盲目冲动，有时会犯很大的错误却不查觉。等到激情过去，静下来反省已经过去的事，有时就会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极其荒唐需要修正，甚至发现基本方向全错，误入了迷途，必须调整方向。

李伦在中共特权者阶层利益分配的倾轧中落魄，改革开放时，财权归属不定的状态下，这种掠取最后必表现为夺权斗争，夺权使他昔日的辉煌归于消亡。所以他大可不必把个人的失意，归于某些职工不讲良心，普通的专汽职工除了听命摆布外，充其量也是一些发发牢骚的受难者。

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库中，记载并论述经济的文典显得不足，十三经传了

几千年，无非都是围绕统治这个题目，以仁义礼信为“宗”，礼乐官爵遵守的制度都没有摆脱社会关系这个总纲。这是因为中国还处在封建主宰时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统治阶级只关注社会的治和乱。

当辛亥革命给中国输入建设国家的民主大纲时，却被北方输入的共产主义所截断。三民主义被蒙上了反动资产阶级的不白之冤，被赶到大海一个孤岛上去了。在大陆所施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裁统治下的封闭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吃尽了苦头以后，才从新将中国历史拉回到市场经济的起点上。不过这种权力支配的“市场经济”最终滑向何方，大家可拭目以待。

从李伦手中接过专汽总厂厂长位子的王洼，摘取了我们奋战七年辛辛苦苦换来的劳动硕果，他不仅享受了前任为他创造的条件，还享受了一家富裕大厂法人的荣誉和利益。低能而贪婪的他，很快将工厂管理大权交给野心勃勃的陈增，在陈增的操纵下勾结向云，王惠这帮专汽厂“旧臣”，把持了工厂的大权。

好端端的北泉厂，在内斗中两年不到，就失掉原有的盈利惯势，到了1996年从新转盈为亏；这一年这家工厂实际亏损了五百万，陈增为了怕露了马脚而失宠。用假报库存物资，虚报基建投资来掩盖实际已发生的亏损。

机械局的头们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他们的口袋里塞着王洼在年底送来的“慰问金”，他们的桌子上，摆着仍然显示专汽赢利的报表。欺哄行贿，是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厂长们都会的伎俩，在种种肮脏交易的狗肉上，还要挂“学邯鄲精神，力创第一流”的羊头。

1996年5月我正式提前内退，结束了我对这家工厂所作十二年贡献。时年58岁，此时我的儿子才14岁，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为了筹集今后给孩子求学的学费，也为了积蓄一点晚年的生活补充，我走上了打工的生涯。

离开专汽厂偶有回厂的时间每次回到车间，工人们都围着我问长问短，曾在品质处当付处长的肖森告诉我：

“自从你走以后，原来制定的质量法规全部取消，产品的质量实际上无人管束。购车业主，将出故障的车开到工厂大门堵死。他们拿着事故鉴定找厂长交涉，吓得王洼躲在办公大楼里不敢出来。堵门的司机们呐喊示威，久而久之，专汽厂的老用户，都一个个离开了这家工厂，售出的车辆每年大幅度减少，而售后服务忙碌得团团转。”

他还告诉我最近开往新疆的十台车，因为制动不灵，电器等毛病，不但用户不要了，反而叫专汽厂自己开回来，这么发生的往返路费，修理费就上了好几万。说完以后，便沮丧的摇头说：“今年亏损预计已超过千万，我看，工厂是没法再维持下去了。”

第二年夏天，我回工厂经营办公室办理我的退休手续，碰到了戎露，她正在办公桌上翻阅一大叠我当年起草的，而后又被陈增打入冷宫的质量管理文件，她见到了我，好似见了久别的师长。连忙请我坐下，端上一杯开水后，问我离厂后在那里工作，还询问李伦现在在干什么？说大家都希望我们再次回厂。

我回答道“世上并无救世主，李伦也好，王洼也好，只要心存事业，都能振兴工厂。”说着顺手翻了翻桌上堆放的文件发问道：“近来工厂的经营状况还好吧！”她摇摇头说：“自从你走后，产品质量基本上就没人管。”

她还告诉我：“因为工厂重新出现了亏损，市机械局最近还派了一个工作组，审计了陈增，没几天陈增也下台了。王洼眼看着车库里积压了几百辆车卖不出去，一面召开厂务会，决定重新翻印过去你所起草的管理办法，和质量考核的经济责任制，由总师办整理后，重新颁发执行，并令总工程师督行。”

听到她的介绍，我心里很平静，六十岁了，深刻体会“天命”不可违抗，陈增以为人意可对抗客观规律，为拔除眼中钉而废了全质办，从此专汽厂再也不会出死心眼的孔老二！当年唯一想得到一个堂堂正正的名，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我们应当挣得的房屋和待遇而已。

现在我们的退休金可求温饱，住房也有了，我们还图什么虚名？何况接替李伦的是一些肖小。李伦所提倡的敢死队精神，成了笑话！现在还有谁像李伦那样傻干啊？面对戎露期盼的眼光，我只有笑而不答，这正是：“一曲新辞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陈增因免职引发专汽厂的一片谴责，两年后，王惠也灰溜溜退休了，当人们用解嘲的口气问她“李伦的问题，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给全厂职工一个满意的答复？”时，她只好苦笑而不能回答。

而那个被撤了职的李小兵，在王惠辞职时向她家打了电话，恭喜她终于从书记的位置上退下了，愿她不要再像任职时瞎整人了。听到这公开的奚落，她也只能当成一瓢泼向她的污水。这真是“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人何必争高低！任何是非曲直自会得到公论。

从 1995 年王洼接替李伦后，专汽厂从新被亏损缠住，1998 年，卢瑞接替专汽厂后，2003 年亏损已达一个亿！1990 年李伦在“扭亏纪念碑中刻下的誓言，终于变成一代创业者留下的一厢情愿！一个从亏损开始创下三个多亿的大型国有企业，由重庆市政府坐东，以五千万的“跳楼价”，出卖给了重庆市一家私人摩邦立帆集团。重庆专用汽车厂在这块土地上挣扎苟延，直到消失。

卢瑞这个纨绔子弟，便在中共市政府庇护下，靠“贱卖”这个大型工厂的昧心回报，换来老板尹三的嘉奖，在力帆公司谋到了一个付总经理的头衔，拿着年薪十万的报酬。进出有轿车，有豪宅，过着老板生活。

而贱买专汽厂的尹三，根本就不想在这块土地上，继承专汽厂有过的雄风。从卢瑞手中以五千万买下这片黄金宝地后，便迫不及待向北碚区政府以四个亿的价格，准备将它们抛售给北碚房地产公司。

可惜，这私下的买卖尚未成交，就遭两千专汽职工群起反对，纷纷上告市政府，迫使尹三暂时没能得逞！当然这都是中共某当权者背后在捣鬼。

经过卢瑞的穿梭，条件谈妥，专汽厂‘改制’闹剧于 2003 年拉开序幕。所谓‘改制’便是处理原国有制的职工，其退休部份已交给“社保”，有一口饿不死的饭吃。没退休的抛向社会。

于是以人员超编为借口，重庆市政府以七百元一年的低价，买断了最后七百人的工龄，当然，在面临生存危机时，被解聘者可以奋起反抗。可惜中国人的丑陋，使他们像一盘散沙，不能团结一致，只好凄凄惶惶各奔生存之路。

这使我联想到中世纪时期，英国的农场主为了获取暴利的目的，将世代依附土地的农民驱逐出他们耕作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变成种植草场的牧场。因

为他们看到在土地上圈养羊群所得的利润，远远高于农奴们种植粮食。便演出了一段羊吃人的历史悲剧，史称“圈地运动”。

被逐出工厂的职工们，猛然由‘主人’地位，跌进了出卖劳力的深坑。专汽总厂的职工从此流落街头。

我的一个邻居，谭某因家庭经济拮据，夫妻离婚，如果不是李伦当年为她的父亲留下一套房子，她将带着年仅九岁的女儿流落街头。

专汽厂只短短存活了十年，李伦为此所付的一番心血便告消失，他立的扭亏纪念碑被后继者卢瑞推倒打碎，成为行人脚下的碎石。写在大门立柱上的志愿兵敢死队精神，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每想到当年没日没夜的“拼命”，就在我心头涌起对这种傻劲的羞耻回忆。现在只有大伦时代留下的八百套住宅，才在这些住房里栖身的职工心坎里，留下一点纪念！

问到失去工厂的几百名职工，为什么被卢瑞这么轻而易举的卖掉？

需知，李伦创业时，同样的地盘上依靠一千三百名职工，在这里建起了专用汽车厂。并创下了每年盈利四千万的成绩，就可以明白，人多并不是企业衰落的理由，其实卢瑞只是中共“改制”新花招的小小枪手，毛泽东从干爸史大林那里搬来的国有制行不通了，又变了一个花样，吃苦头的还不是工人！！

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发生了我所在的重庆专用汽车厂现任厂长李安林，被人在办公室里暗杀的事件。

那一天，他的妻子在晚上十一点钟见她的丈夫迟迟未归，当天下午又没有打一个电话回家，以为他手机没有电了，于是从家里带着充电器，到他的办公室里找他。一上丈夫办公的二楼，整个楼层黑压压的一片，静悄悄的。

打开过道的路灯，走到丈夫办公室的门口，见门是虚掩的，黑压压的屋里没有任何声音，顺手打开室内的照明灯，眼前出现的场景使她顿时吓蒙了。

她看见她的丈夫倒在他的办公室沙发前，地上的血已呈黑色，身体已显得僵硬。看来，已死去半天了，连忙战战兢兢地喊醒楼下值班室里的值班保安，据保安说他是下午六点钟来接班的，并没有发现楼上有异常响动，立即打电话通知了“110”，李安林身上被砍十一刀。

李安林被杀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十一幢家属楼，人们议论纷纷。

李安林被杀第二天早晨，便有人告诉了我，与我们这幢八号楼只有一墙之隔的专汽厂大门边的露天广场里，正在搭造死者的灵堂。

自从97年我退休以后，至今整整八年了，前几年还偶尔去总装车间去一趟，多是受买车的朋友所托，要我选一下他们所要的车，近四五年，我已完全不进厂了，严格的遵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风闻王洼继任专汽厂厂长以后的种种无能，也是当了耳边风。

后来与我同是这七套奖售房的得主，搬了三户出去，其中两家搬进了在云泉路口，新建的一幢每户占地两百平米的楼层式“豪华”住宅。我感到奇怪，有了住房本该满足，缘何想好还要好，占了一套又一套？

残酷的事实摆在专汽职工的面前，自从李伦离任以后，任何由官方指定的人没有人让它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站稳脚跟。从王洼、陈增、到卢瑞仅花了五

年，三个亿的资产，便被继任者亏光了。
短短十年的专汽大业就这样谢幕了!!

第六章：如此霸占民宅

从八七年开始，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也包括了毛泽东时代在“清匪反霸”、“土改分地”、和“镇压反革命”中被无理强占的私人住宅的清退。

当年相当数量的受害者，被无缘无故扣上恶霸、地主、国民党特务遭受屠杀，幸免于死的被带上五类份子帽子，遭受了几十年的身心摧残。

遭整者家里一点可怜积蓄被抢去，尤其是赖以遮风避雨的住房被强占，还要延及他们的儿女受到牵连，其涉及人数之广，受害人之无辜，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毛泽东自己就不打自招供认，“**革命对象占人口的 10%，这样算来，祸及人数至少也有六千万**”。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二十九年间，五类份子绝大多数已弃尸荒野。所余的幸存者到 1979 年已不多，这些幸存者中还有相当部份，是‘解放军’兵临城下就已缴械投降，束手献城的“起义投诚”人员。

有人说中共原本是山里的土匪，土匪以抢劫起家，土匪当了政，将原先政府的制度废除，抓一项“革命”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成立“革命政府”但骨子里仍是土匪，老百姓的房子，几亩薄田，一点女人用的戒子耳环，都在‘没收’名义下抢去。

1979 年当时中共组织部和国务院，曾对私营企业改造中，和起义投诚的国民党人员私宅，作了一个清查并作出发还的政策性规定，以文件形式下发给各级政府！一个清退霸占房地产的工作，便在中共统战政策的鼓噪下开展了。

然而，这比右派落实政策还要马拉松，其中借口政策界限不清，借口没有钱和种种对清退对象所作的限制，使最后体现政策得以归还的人数微乎其微。被北碚区政府列入清查的人数仅只有十余户。

尤其是在政策贯彻过程中累累受到干扰，使政策落实备受阻挠。所以受害的人骂道：“**中共真是活抢人的土匪！**”

我的老岳丈刘学理便是其中一员，他的住宅被中共抢占去四十年，最后仍未归还。直到 1991 年，高龄九十的他，抱着被人抢占家园的终身遗恨含恨九泉。

他曾任北碚城的民政局长，当时的北碚属于卢作孚管辖下，山峡防务局的一个重镇。刘学理只是跟随卢作孚先生的一名普通地方官吏：民政局长兼任北碚保安部队司令。

抗战时期，保安部队算成国民党正规军编制，刘学理被授了一个上校军衔。1949 年 10 月刘邓大军进军重庆，二野下属的十二军没费一枪一弹便和平地占领了这座城市，率军欢迎共军入城的刘理，也就成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人员。

十二军入城后，刘学理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家中五个孩子还小，他要自谋生计。当他怯生生的到军管会去求职时，他的身份一下子从率军起义的城防司令，变成了被军管会召去思想改造的学员，入了反革命另册。他本人被判管制。

唯一的积蓄是 1946 年在上海路购置的一幢四百平米的私宅，被一直觊觎着它的北碚工商联会看中，并于 1952 年用军管会签署的命令加以“征用”。

在枪杆子押送下，他只好同妻子一起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离开了自己的家，哭哭啼啼迁居到北碚天生桥偏僻郊区一所破房子中，一住便是三十年。

同大陆上成千成万计的五类份子一样，在共产党暴虐的历次运动中，被街道居委会欺凌，年过半百的他，当过街段下力的搬运，挑凉水的力夫，为豆腐坊商店磨豆腐的伙计。为了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做别人不愿干的活，忍辱负重，把一腔怨恨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刘启建每提到她的童年，都会伤心的说，她八岁时就要背比她小五岁的小妹妹，捡二煤炭和木工房里砍下来的木屑时被狗咬过；每天她同姐姐抬着一桶水，走两里路送到父亲做工的豆腐坊……

直到 1982 年，中共才按照上级文件给刘学理平反，取消了管制，并以起义投诚人员身份得到一张平反证书。

毛泽东咽气后，民间响起的怨恨声一直在沸腾。在为无数冤魂平反的同时，归还被强占的民宅也提了出来，这本来就是一件压了三十年的事。被霸占当事人的房地产契约，和当年军管会所发出的“征用”通知，都写得明明白白。

1984 年，中共中央有关清退过去历次运动中被强占民宅的政策公布后，刘理正式向北碚区政府提出归还上海路房产的要求，他同北碚区同时被没收的几十户人家，开始了向中共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私宅的长期马拉松交涉。

中共的任何‘革命’借口，都无法掩盖无理强占民宅的恶名，其实无需经过调查核实。**只要有诚意，全国这种种霸占民宅的恶劣行为，完全可以在几个月内全部清退。**

但是中共政策的制定者，向来按他们的需要出发，难以光明正大的纠正错误。加上中共内部派系林立，以‘头’为本，并没有什么共同遵守的法律和原则可遵循。今天一些人发出的政令，明天另一些人就可不认账。而且共产党“左”风盛行，朝令夕改，在清退民宅问题上，便有几个前后矛盾的决定。

例如先前的文件说对强占的民宅一律退还，后来又有了一个补充规定，把土改中没收的地主房产和反动会道门带有封建性的房子，排除在清退之外。后来又加上了凡有剥削性质的民宅都不与清退一条，这样一来范围越来越小。

中共政策的执行者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把这事结束在一连串“**上级批示**”的推诿之中。对这种有附加条款的软指标，慢慢就变成根本无法兑现的零指标，以各种借口将被强占的民宅继续地霸占下去。

在国际人权组织对中共的谴责所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了向国际社会做点样子。中共除了对有影响的国民党上级军官，以及有统战关系的人士，给以归还外，其它被强占的民宅根本就没有动。

看不清中共骨子里面的东西，心存侥幸的绝大多数被掠夺者，花费了无数的精力，备齐了各种证明房子的材料，等在统战部和民政局的信访处，一等就

是几年，最后除了白白等下去，没有任何结果！

然而，已经八十高龄的刘理老人已经等不及了，自 1983 年老伴死后，他天天都在搬着指头算自己还能活几年？被人占去他的老宅，是他晚年最不能咽下去的一口恶气。他要趁着这剩下的一口气，要回这被人抢去的家园，给五个亲生的儿女一个明明白白交待，否则他就是死了也咽不下这口气。

这一天，他手捧着“人民政府”发给他的，那张盖着政府大印彻消管制的‘平反’通知书，在小儿媳妇和孙子们的搀扶下走到区政府去。

在信访接待办公室等了好几个钟头，一直等到下班。一个中年男子向他说：“你不要在这里等了，我们要下班了，你回去还是准备好自己的有关房屋的所有资料，说明房屋所在地、占地面积以及何年何月购买，以及房地契的复印件，还要写明，何年何月那个机关签发的没收令，因什么理由没收等等……”

当刘老从怀中掏出已经带来的材料时，那中年男子还算耐心的坐下来翻了翻，说：“现在办公楼的人都下班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再按我向你说的范围从新整理，备好所有的资料再来吧。”

整整等了一天，陪伴他的孩子们都已离去，老人连衙门里管事的官都没见到，便在这里花了第一天的上访。“解放前”他为官十几年，没想到中共的官架子这么大。他无奈的喊了唯一没离开的小儿媳妇，没趣回到天生桥的家中。

当我听到他在信访办公室受到的冷落，便自告奋勇由我陪他去。

按照我的经验，中共这种官僚体制对这种找上门去的告状，非经长期多方力争不可。北碚地方的衙门叫不开，就把材料转发给重庆市，依次向四川省政府直到中央国务院呈送。

刘老把当年的房地契找了出来，由他亲笔重新起草了一份有关上海路住宅被没收的材料，经我删改后，复印多份准备逐级投递。

由我陪同刘老伯去区政府信访办，向接待人出具了有关我们预先准备好的材料后，刘老伯又被接待人支到北碚区房屋管理局。

北碚房管局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看样子是那里的负责人，她在看了我们的材料以后说：“你们的问题属于天生房管所经办，你们还是去那里找他们吧！”我又陪同老人到天生房管所，看来谁都不知道经管的办事衙门在那里？

一番口舌后，天生房管所的办事员，终于收了刘理写的材料，并且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接到了有关北碚区给各所发的需要清退房产花名册，但是具体怎么办还要等到市房管局的通知，你们还要回去等一段时间，如果有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事情总算有了一个“开端”。刘老伯回家又等了半个月，可是仍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老伯终于焦急的又一次在我的陪同下，又访天生房管所。

然而这一次他们回答说：“你们交来的材料已交到了市房管局了，有关这次房屋归还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办？上面没有批示我们无法操作，这里有一个经费问题，没钱拿什么给占房户？发还给你们还缺乏具体的规定，所以你们最好去催一下市房管局。”

又将老人踢到市房管局去了，我想我在落实政策时，就被当成球在几个衙门里踢来踢去，那被踢的滋味真让人难受。按着心里的一团火，我吼道：“你们

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球踢来踢去讲良心吗？现在天气又热，你们不感到这么做太过份了么？”

但是他无奈的摊开手说道：“你们也知道，现在办事真的很难，天生房管所变不出房子来，拿什么还给你们？”接着说了一大堆的安慰话，给了一个使上访者不完全失望的话，他说：“这件事老大伯尽可以放心，反正中央有政策，房子归还只是一个迟早的事，你们总有熬出头的一天。”

事情虽然已过去三十年了，老汉总还盼到了一线“希望”，受骗了一辈子他仍把希望寄托在中共政策上。

时间就这样，在刘理告别人生的最后几年，白白的等下去。然而越是在中共的衙门门坎上打坐，越使这位老人感到不明不白被人抢去的住房，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羞侮。

他多次在假日里，请我们一道去看他的那幢住宅，唠唠叨叨不断讲当年被赶到天生桥那揪心的痛。他不能再等下去，他不能将这个羞侮带到冥间去。除加快了他去房管局催办的频次，由每月去一次，增加到每周去一次。每次徒劳无功的空返，又增加他新的一份怨怒记进了他写的材料中。

有一次我们又去天生房管所，这次接待的是一个女人，老人怒道：“你们办事怎么这么拖拉，你们要的材料都写清了，你们一次又一次要我重写。你们欺我老是不是，你们这种工作态度我会写信到上面去告你们，我就不信真理会被你们践踏掉了。”然而那女人却漫不经心的回答道：

“跟你讲过，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我们是普通办事员，没有权处理你的问题。你写的材料我们统统都转了上去，等上面批示怎么办。我们也想早一点落实你老人家的住房，免得你天天跑，够累的，我们也够麻烦的。我们要你写补充材料也是上面的意思，请你不要找我吵好不好？”

这话里有办事人员的苦衷，但也许又是她故意的编造，或是授意的编造。气急败坏的老人，只有拄着他的木头拐杖在那信访办的地板上发出笃笃的响声，以示抗议和愤怒。他还能把她做什么呢？他只好等……直到感觉自己再无力继续呆在那里，才悻悻的离去。

为了解除这件事对老人的烦忧，我还亲自陪同他两次夜访区长陈超。陈区长夫妇是我母亲苏州的小同乡，多年在北碚与我母亲很熟。

他住的家是一般平民根本不知道的，就是上他家去，也要受门岗的盘问和阻拦。但由于这层关系我有幸得了进出的机会，加上刘理本来就是北碚区统战名人，当时市政协的付主席卢子英的旧友，说什么也不能将我们拒之门外。

但是，在态度谦和的陈超那里，除得到与天生房管所办事人员相似的回答外，依然一无所获，不过他答应将在区政府召开的办公会议上，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为此，还留下了刘理带去的上访材料。

作为一区之长，他照样不敢违忤那自相矛盾的中央政策，甚至于不敢对这种前后矛盾的上级批复和中央文件妄加评论。不过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要求清退的房产必须同地主和封建财产相区别。

1979年，彼此以炮轰来对话的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了缓和。“告台湾同胞书”有几分诚意？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了长期封锁的大陆百姓，知道海

峡对面早已进入了富裕社会。

五年后首批回大陆探亲的台湾人，好像外星人一样被故乡的家人和邻居当成贵客。各种过去根本不敢亮相的台湾亲朋关系，到此时才慢慢公开。

最开始，这种带着离乱伤感的相见，是在中共统战官员的陪同和监视之下进行的，有了这层监听，纵然家破人亡，再大的悲情也难以畅诉，那真的是“相对无言，唯有泪双行。”

1987年我还在文星湾时，第一次见到台湾归来的客人与亲人团聚的场景。来人姓陈，大约五旬开外，但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是一位1948年随国民党部队去台湾的普通士兵，接待他的主人便是他的亲弟弟，但弟弟已满脸皱纹，看上去比他苍老十岁以上，宛如一个贫苦老农。

主客相对，淡淡相视。哥哥首先向弟弟询问了一家人的下落，弟弟讲1960年，双亲先后得了“水肿病”相继去世。一个妹妹因没饭吃而跟了一个城里的人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否还在人间？弟弟讲这些伤心事却好像一点都没有动容的表情，像数落着普通的家事。

大陆老百姓对毛泽东带给他们的灾难麻木了，饿死被当作正常死亡。然而从旁听来，陈家真是家破人亡了，中共统治下的和平年代，比之战祸还要凄惨。

陈家大哥从台湾归来，召来了一大群邻居，尤其是那些抱着孩子的女人，她们怀着好奇，看看一直被毛泽东宣传为处在水深火热的台湾人，究竟是什么样子？陈老哥在弟弟这里住了五天，回去时来看他的侄儿侄女每人都给了一百元到五百元数量不等的人民币，在穷极的中国农民眼里，一百元人民币在当时农村中相当于一个人一年收入了。

1988年，刘启建的隔房三哥刘信，从高雄随“大陆观光团”回到了他的老家合川，合川原是刘理的祖籍。刘信父母早亡。当年家境贫寒的刘信三兄弟，便拜给了大伯父刘学理，从小就得大伯父的资助得以早年去军校深造。刘信军校毕业就去了台湾，他大哥仍在合川老家，戴了几十年的地主份子帽子。

刘信归来前，合川大哥和成都二哥便计议了好久，决定他回来后，先去成都再回合川祭拜祖坟，最后才回到北碚作一个礼节性的拜访。但听到刘信归来的刘启建五兄妹，在刘学理的指示下与刘信三兄弟一共八个家庭，想借统战关系由刘信出面向北碚区政府交涉，促使上海路老宅的归还。

刘信来访一个月前，刘启建的长兄联合了北碚区其它十四家卢作孚旧部，联合向中共重庆市委进行了请愿，要求归还当年被没收的房屋，托区长将请愿信向市政府和房管局呈递。紧接着他又将请求归还上海路私房的申诉，分别寄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厅。

采取这么一系列行动后，终于有了回应，天生桥房管所正式通知联名请愿的十四户房主，约定了时间在北碚房管局的会议厅里，向他们作正式答复。

给刘学理的答复附有当年军管会没收上海路住房时，一个没头没脑的通知，那上面写着军管会以地主产业加以“征用”。

这个用词含混的通知，成了区政府不能退回的依据，至少变成了有争议的房产。因为“征用”不是没收，这上海路民宅还有一线归还的希望！！但这个通知将上海路房产划成地主产业，就不能归还了。

当场老人向宣读文件的人申辩，说他少年就离开合川本家出外求学，后来的户口以及各种证件都把他的出身写成学生。这用作居住的民宅被定为地主产业从何说起？然而答复的人说，他不知道过去的底细也无权去过问，只能宣布文件，并按上级文件执行。

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就凭中共政策，而政策是可以随意制定和解释的，对老百姓可以任意戏弄的。激动不安的刘理回家后，就关于当年的房屋划为地主财产的消息，电话通知了合川老家，按照他的理解，只消由老家证明这栋楼的主人，属于什么出身，就可澄清当年军管会所作的结论！

所以关照刘中柱在老汉出生的故乡，开一张关于自己出身和经历的证明。并加盖合川政府的钢印，叮嘱他办完证明后请他派人专程送到北碚来。

看来老人安心非同政府就上海路那幢老宅的归属，争个谁是谁非了。

按照刘老的吩咐，合川的大哥将他所需要的证明开好，并且派他的侄孙专程送到北碚。刘老伯在接到这张证明后，立即复印了好几份，拿着复印件再度上访天生桥房管所的张所长，张所长望着那盖满了红大印的纸淡然一笑，他这种基层办事人员，虽然不一定能准确洞察出中共各项政策的背景和底线，但他从实践中很懂得落实中共政策该怎么来对付这个老头。

近来接触到老百姓要求归还被政府占去的房产店铺的“案子”太多了，**不管这些要求是否该同情，合理性有多大，在上方没有明确指示时，最好的态度是采取不值可否应付了事。否则犯了错误还不知究竟怎么错的。**

张所长回答道：“我一定会把你的材料转上去，等到有了消息，我会立即告诉你的，所以你还是回去等着吧。”既不表态，也不得罪上访者，“**回去等着**”四个字，成了落实政策年代里，向上访者**最权威、最准确、最不承担风险、最不负责任的回答。**

但是，快九旬的刘老伯还能等多久？然而，除了无可奈何而外，对这样的回答他连反对的话都说不出来。

第二年春天，也是六四事件爆发的前几个月，刘信按照约定时间第二次赴大陆探亲。为了增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此行他挂了回国观光团付团长的头衔，加盖了台北市政府的官印。刘信兄弟俩与刘启建五姊妹，在刘理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个关于上海路住宅的小型家庭讨论会。

刘老伯当场拍板，若在刘信交涉下房子归还后，便立即将旧宅进行改建，楼下做成铺面和库房，专供刘信主持的台商独资的中药材营业厅；而楼上修成几层，分给兄弟七个每人一套居家的住房。

大哥刘中柱的积极性首先调动了起来，当时他的大女婿正任中共合川县委管理财经的付书记，在家庭会议上，刘中柱表示他的儿女们一定会根据大伯的要求，在老家合川，全力以赴促成上海路房产尽快归还。

出于政策和统战的规定，北碚区政府办公室的赵秘书，代表北碚区政府，在区办公大楼的会议厅里，接待了刘信和他的刘大伯。

宾主坐定闲话不多，很快就进入了正题。有备而来的刘信，引证了一大堆国际上公认的法律条款，盛赞了中共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关于清退房产的政策。接着便谈到了台湾政府中公务员的“办事效率”。

在台湾执行公务时，不但严格依据规定得十分详尽的法律条款，而且还必需在规定的时间内执法，否则所有的公民都有权根据公务员法，对执法循私舞弊或拖拉不办的行为上告法院，使之受到处分。

在这种主题十分清楚的“接待”上讲这些话，赵秘书就是再笨也听得出来，这是刘信借台湾来责问和讽刺北碚区政府，在落实他伯父的房屋归还上，使尽了拖拉和故意找岔的伎俩，使这个纠纷久拖不决。

当然台湾讲的是全民都要遵守的法律，而中共兴的是中共一党规定的政策，法律是不变并可监督执行的，而政策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这位赵秘书心里十分明白，只有在大陆才会有这种本应法律解决的问题却由中共“政策”管着，甚至还用与归还无关的问题来搪塞，一拖五年不解决。

所以他听到这种指责，依然面不改色，从容的给刘信和刘大伯的答复依然是“回去耐心等”这五个字。

“接待”就这样无结果的收了场，还不如我们到陈区长的家里作私访来得积极。在归途上，刘信很感叹中共这种无法无天现状，认为中国不健全法制，会拖着社会进步的后腿，在这种环境之下什么事也办不好。

可惜，开放的中国，还有一条主权不容外部干涉的闭门羹，这给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一个不论怎么胡来，都可以对外界的批评置若罔闻的保护伞，至于大陆上的老百姓因长期暴政驯服而麻木了，这种条件只会助长官僚作风！他感叹地说：“中共的官既不懂法，也无所谓执法”，

刘老伯发往中央统战部各衙门口的信件如石沉大海，等到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政治空气突然收紧。

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借口下，刘理等十几名请求落实房屋归还的联名上告，被公安机关明令“下不为例”。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为归还自己的家而窜门，写请愿书，上了年纪的老头们只好眼巴巴的伏在窗口前，伸长脖子耐心的等下去，一直等到被火化的那一天。

1990年，重庆市政府建设局，奉命对上海路的平民住宅进行了全面的拆修改建，强令那一带的居民搬离久住的家园。刘老伯听到他那被霸占去了四十年的家，将被政府拆除修成商品房和店铺出售。便请儿子和媳妇孙子牵着他，带上照像机，一同去了他那暮年魂牵梦萦的地方。

他的家已被一排高大的木栅隔断，正在工人们拆毁的烟尘中倒塌。城建局的工作人员带着红色纠察的袖套在外面游弋，不时的发出吆喝声，不准任何人靠近它们。同一大群围观的市民们站在远处，刘老伯的两眼发直，他明白这一拆，原先属于自己的证据就会全部被毁掉，今后再提起归还他的家，就更难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叫孩子们将他家的遗貌，尽量地拍摄下来。……

良久，孩子们催他回去时，他还直痴痴的站在那里，半天他才吐出一句话：“我要告，我要告你们，非法的霸占我的家，我要告你们像强盗一样，拆毁我的家……”

站在一旁的大儿子劝阻道：“没有用的，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小老百姓往那告？法院还不是共产党的法院？难道会站在你这边来，反对同一个共产党的房管局和市城建局吗？”

他胀红了脸，那种受羞辱，但又不屈服的表情从新浮上了他的脸，无奈的被孩子们牵着他往回走。突然背后响起轰的一声，全家人回过头去，见他们的“家”终于倒塌在一团泥灰夹杂的气浪之中，仿佛在那里向他们扬手告别……。

唯有小儿媳还不服气，她拿了拍下的照片和 1944 年那张房地契，再度去天生房管所评理，见那经手办理清退的张所长理直气壮的责问：“房管局为什么在城建局拆毁刘家的私宅时，竟连通知都不通知一下房主？”

质问他知不知道“这幢房子还在打官司，这样单方面的拆毁会发生什么恶果么？市政府给我们的答复叫我们等，你们居然在房产归属都没有结论的前提下，私自拆除这所民宅，你们可知这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吗？”

可是那张所长丝毫不动声色，只朝着气势汹汹的小兰冷笑，虽然嘴上没吐出一个字，心里却在暗暗的嘲笑道：“你这黄毛丫头懂什么共产党的政策？朝我装熊发狠没有用，有本事的去找没收你房子的共产党闹呀！”

小兰见对方并不回答，以为自己占了理，便借势向对方提出一个“补偿的办法”，说道：“你们既然奉命拆了房子，也知道这片房子中有刘家的一席之地，那么修好新房后，也该按我家的房地面积如数补给我们，否则，我们会一直都要找你们的。”

这种请求一点都不苛刻，但是那房管所所长，心中暗暗的笑道：“只要共产党的天下还在，你们家要求清退房产只能是一场梦。谁教你们的房子当年被中共占去，那已成了不可改变的死案了”。为了不得罪这个泼辣的女人，他淡淡的冷笑道：“只要政策有这个规定，我们肯定照办。”

然而，天不绝人，小儿子刘才所在天然气公司，效益特好，那几年有条件为职工建起了三幢生活大楼。无房可住的刘才分得了三室一厅，他的父亲也随着他搬离开了那个又潮又黑的天生桥危房，搬进了新分的房子中。

在新居房中，刘老伯开始慢慢的形成了有规律的作息，每天他把门外送来的鲜牛奶煮好，喝下以后，就到楼下的街心草坪散步去了。

然而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他都习惯的站在阳台上朝东边上海路的方向伫立良久，他还在牵挂着他的故居。

两年后，上海路的新建的大楼群已经竣工了，其中就有他旧居的那一块地方，他不愿去看他的旧居！因为这会触发他四十年前携儿带女在军管会的押解下，离开自己的家去到天生桥那段伤心的往事。

这四十年来，他像乞丐一样的日子已深深留在他记忆里了……

1991 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小兰像往常那样，早上七点钟起来，打开门将送来的牛奶拿进了厨房，却没有听到老人屋里的响动声，也没有听到老人轻轻移向厨房的脚步声和打开天然气灶煮牛奶的声音。

直到上午八点多钟，她从街上买菜回来，厨房灶头上今天清晨端进来的奶，还放在那里，而刘老伯的房间还紧紧的关闭着，他放下菜篮子心中疑惑地去推老人的房门，门却关得很紧，里面没有人应。她还怀疑老人是不是到楼下的街心草坪散步去了，所以把头探出阳台，四下张望却不见人影。她从新去推老人住的房门，确实怎么也打不开，带着疑惑只好去忙碌中午饭了。

直到刘启才下班归来，小兰问他看到爹了吗？刘启才不解的问：“发生什么

事了吗？”小兰指了指灶头上放着的瓶牛奶和老人的房门说：“一上午都没见爹，他那房门关得太紧好像上了门闩，无论怎么喊里面没有人应。”

刘启才闻言连忙去敲那房门，里面没有人应，推那房门重重的好像被什么东西抵着，使足气力猛力一推，只听见扑通一声门闩断处，刘大伯倒在那门里面，两眼却直直的瞪着煞是吓人。刘启才连忙把自己的父亲抱住，已是满身冰凉，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死去了好几个小时了。

从他倒下的地方和姿势判断，老人跪在门里面，面朝门溘然长逝的……

大家伤心的办理老人后事时，纷纷议论，上海路被人抢占的住宅没有收回来，对老人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那份被强盗抢去家园的羞耻心，一直耿耿于怀，加速了他的亡故。君不见对这件事直到临终时，老人跪朝着苍天，还在倾诉他的愤怒和伤心，而上海路的家至今都没有归还给他……

第七章：暴政扭曲下人性的畸变

出于立党为私的目的，中共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把持下，将独裁这根套在中华民族脖子上的绞绳，原封不动的继承下来，他说批判毛“将会犯历史性大错”，现在“改革开放”施行三十年的事实证明：贪官污吏，贫富悬殊，畸形的社会反而明目张胆的为毛泽东招魂。

毛的幽灵正在召唤与他相似的野心家卷土重来，重新控制这片土地，演出第二次井岗山、第二次清匪反霸、第二次“反右”、第二次文革，因为毛的暴政恶果被邓包庇着，原封不动没受任何清算，这是多么危险！

毛泽东为独裁目的，是他对中国人人性的扭曲。

记得，刚进重大，正逢基层人民代表的换届选举，我们系高年级一位女生在竞选系人民代表时，曾发表竞选演说，宣布与地主父亲断绝父女关系，并在一份声明上签字。

为个人前途公开断亲情的做法，曾成为许多同学竞相学习的榜样，特别在一场触及“灵魂”的反右以后，校园里爆发了一场向党交心的热潮……

“革命嘛”，要有鲜明的阶级立场，谁又甘愿站在挨打一边呢？

第一节：右派

毛泽东把大陆的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倘若你被划成了黑五类，便永远矮人一头，充当奴隶。若再要反抗，必入另册，押进监狱。他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指这种整人的章法，死死卡着每个人的脖子，令人只好被他牵着鼻子跟他走。

对人的“划分”，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而是从中国封建王朝中异民族的统治者那里学来的，元朝就把人按民族划分为四等人，最低的叫南人，是毫无人身权的奴隶，毛共最恶毒的，是把被践踏者反诬为剥削者，不惜一切扭曲他们。

当年‘右派’，本身是毛泽东为建立独裁统治而抓出来的牺牲品，在五类中排名第五，他们中多数并没有认识自己已被划成“南人”，其中的学生更是一张白纸。在毛泽东时代，如不对中共下有毒药的宣传进行抵制，不但受愚弄，而且会在长期被压迫环境中，变得自私、虚假。

所以并不因为右派是一个被残害的无辜群体，而把他们不加区分加以肯定，把他们误作社会的精英，其实他们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人，只不过在经历了一场人为的劫难后，从新认识了中共，也从新认识了自己。

随着右派维权斗争的开展，右派们的许多未曾公开的行为也日益暴露，当我读到宋永毅先生：“中国知识精英的丑陋和耻辱”后，知道这“右派”被社会误解，它决不是什么先知的精英，事实上他们中出现叛徒，干出不齿于人的勾当并不值得宋先生发指。

看待右派必需从两方面：一方面它遭受残害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群体；另一方面

又是一群鱼龙混杂，对他们必需分别评价。

逆“反右”而抗的人，以行动证明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在毛泽东倒行逆施中醒悟，在反抗中无畏的牺牲了，他们的名字应当刻在纪念碑上，让后代永远记住他们，永远做学习的楷模。

我的父母原来都是教书匠，自从我的父亲被捕后，原先自持从未参加任何党派，有一大批“进步”同学撑腰的母亲，不得不折腰做人。思想汇报，成了必尊制度。每当在政治学习会上，主持人朗读报纸，读到“阶级敌人决不甘心失去他们的天堂，定要蠢蠢欲动”时，向她扫过一眼，都会使她低下头来，像芒刺在背，令她痛苦不堪。

那年月能向谁说清？在家中也无法向老母说清，更无法向两个年幼的孩子们表露，唯有在半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哭泣。

为了解除这种压迫，也为了自己的老母亲和两孩子的生承，她不得不向“组织”上表示：划清与反革命丈夫的界线，她要求离婚。人性终于屈从中共的政治压力，使她的人格变形了。

同时也强烈影响着我幼弱的心灵，为了摆脱父亲的压力，我选择了那位竞选时对父亲“一刀两断”女同学相似的做法。可是，没有超过屈服极限的压力一旦减少，发生的弹性变形就要“恢复”。父亲入狱后他的音容笑貌，每时浮现在我的梦境中。

母亲的记忆里查觉不出父亲的狰狞可憎，“反革命”帽子戴在这么一个勤勤恳垦从事教育耕耘者的头上，怎么也不近情，同时中共不是向他有“交待清楚”，许以“安排工作”的承诺吗？怎么会自食其言，突然又把他抓进了监狱？

后来，当大鸣大放出现时，压力好像在瞬间减轻了，畸变的人性立即恢复，可是她刚向“组织”上提出“政策”执行有无偏差时，便成了我家第一个“阳谋”的牺牲品；而刚刚长大的我，便成了我们家“阳谋”的第二个牺牲品。

扭曲人性是一个极端痛苦的事，在斗争会上，猝不及防的我，稚嫩的精神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精神失去了常态。今天回想当年为什么那么多人发疯，投河或上吊？毛泽东罪不容赦！！

庆幸的是我还没有丢失人性，变成连我自己都无法辨认的侏鬼！也没有因此而自杀，消失。而是继续扭曲着自己，大声为自己的冤枉辩解。

投入监狱后，原先复学的幻想彻底破灭，饥寒交迫和奴隶般的生活，使我从幻觉中惊醒。当我看清了屈服我的魔鬼怎样使我的国家，使无辜的老百姓在饥饿和苦难中挣扎，我猛然醒来，不再屈服于压力，渐渐的我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我把生死置之度外，变成了一粒反对独裁的响当当铜豌豆。

直起身来，同一切反抗暴政的人们一道，向这魔鬼拼死一搏。

毛泽东扭曲人性，除奉行政治挂帅，频繁进行‘改造世界观’的洗脑运动，同时肆无忌惮的制造冤案。追溯历史，从延安整风已有大规模整人的经验，冤死的人何止王实味一人？依靠史大林取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靠整人登上独裁宝座，成了令人人恐惧的共产皇帝。

在整整二十年的‘劳改’岁月里，狱吏们执着皮鞭抽打我们。奴役我们似

乎是统治者本性，尚可理解。最奇怪的是与我们遭遇相同的人中，也会出现一群‘靠拢政府’的‘狗’，有时他们比管教更厉害，仗着熟悉奴隶生活的内情，掌握着管教们也没法掌握的秘密，对我们有很大‘杀伤力’。

在我的《血纪》中描写胡俚、周学祝、马文华、刘知远等人占了很大篇幅，虽然他们干的肮脏事，无法用人的正常行为解释，不能简单用‘狗’的称谓泄恨。他们的行为归结原因，都是被暴政扭曲的结果，暴政彻底毁灭了他们的人性，使他们变成了不齿人类的臭狗屎。

右派中即使共过患难的人，也照样有骗子，你诺不信，那就听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1992年9月的一天，一位长住我厂的江淮汽车厂从事售后服务的李师付，手里拿着一张名片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上周去九宫庙的八桥客车厂进行售后服务时，该厂总经理问到了你，我告诉他你的情况后，他便拿出他的名片，拜托我回北碚来交给你，还嘱我最近请你去他们厂一访”。

我细看那名片上写的是毛贯益总经理。

自从1959年南桐丛林一别至今已33年，也不知他在何方，现在突然出现在不远处与我干同一行道。带着好奇心，我在一个星期天去到他的工厂，几次交谈后，我才知道袁如从美国回国，答应投资五万美元，支持他在大渡口区办了一个旅行车改装厂。后来她与毛交往中，察觉此人能力低微，大陆也决非投资场所，最终合作中断。

第二次拜访他时，他就向我伸手借钱，我是一个靠工资糊口，两袖清风的穷光蛋，虽近年工厂有较大盈利，但我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我的孩子正读高中，正处在花钱之际，就只有母亲在落实政策时，中共扣了她二十年工资，退还给她两万元，这笔钱被我存下来，以作她养老之用。

他听到后，一再要求将这笔钱暂借给他，帮他渡过难关，答应有钱后立即归还，花言巧语说了一大堆好话，毫无心计的我推托不下，借钱时说好这笔钱是母亲的，归还我时折成美元。

从此，他当着一齐划右的同学称赞说：“在所有同学中只有孔令平才真心帮助他，拿出他仅有的积蓄不吝相助。”我听后只感到肉麻。1996年他还要我陪他去李伦家借钱，幸好被李伦识破拒绝。

后来我才知道受发财梦支配的他，经营两年来，不仅赔光了当年袁最初的投入，外加大渡口国债服务部贷款六十万及市乡镇企业局五十五万元，并到处向过去的难友们伸手，用支持他办企业的名义大施骗贷。

等我识破他向我伸出肮脏的行骗之手，已经晚了，就这样，我对他同难之情换回一场骗局，将我母亲带有血泪的两万元养老金骗去。

与此同时他大肆在受难者中举贷，受他之骗的例如难友之女彭萱十五万元，陈先菊九十老母二万元，难友蒋伯林（律师）帮他免费法律服务还倒借别人一万元，直到现在也没还。

1995年我接到夏光然电话，说他生活无着，要我为他寻找一个打工场地，能夜宿吃饭就满足了。为老夏沦落市井深感不安，想到在老毛厂里安排一个看门值班的工作他不会拒绝。于是打电话求他出于同是天下沦落人给以相助。

想不到口头称我恩人的‘毛总’在电话上冷冷回答我：“我这里不是社会慈善机关，安置任何人都要经大家同意，何况工厂如此困难，你怎不顾我的难处”。

看他产品落后，设备简陋，资金奇缺，管理混乱，知道他断无能力继续发展下去，从1996年开始，我竭力劝他解散工厂。同时我也好从这家没有希望的公司抽出我借给他的钱，为孩子升学作准备。

为了帮助他摆脱自己陷进去的泥坑，我动员本厂的销售人员帮忙卖掉他积压多年的老车，联系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接受他们的九龙牌新型车，把他当成一个同难来帮，殊不知他八方借钱，全国旅行到处行骗。

2003年我因头部跌成脑出血，需动大手术，要他还我的钱做手术时，他竟矢口否认他私人借了我的钱，此时我才看到他出具的借条竟是以八桥公司名义开的，而八桥公司早在他被关押前一年就关门了。

2007年在我的孩子追问下，他仍以八桥公司的名义信誓旦旦说他决不欠来生债，2008年我获悉他的私宅十分富丽，大家支持我申告法院解决。

区区两万元就蒙昧了良知，玩尽心机，令我都羞于启齿。

没想到母亲晚年被毛贯益狠狠咬了一口！毛贯益欠我母亲的两万元就被他癞过去了！

“金钱至上”和“精神至上”本来都是反人性的两个极端，它产生于专制主义的总根源中，这肯定是立志行乞以“教育救穷人，教育强民族”为己任的武训，所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

当年一批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年青学生，为“阶级斗争”需要，沦为政治上的牺牲品，这些受害者中由于本质决定，泛起一些渣滓有什么奇怪？

所以对“右派”的成份，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描述，这对即将到来对“反右”彻底平反有重要的意义：

(1) 整个“右派”纯属毛为建立中共专制独裁，对受害人的诬蔑，“反右”是一次对民主的无耻背叛，他所定下的“六条标准”对中华民族带来政治，经济的破坏必需彻底清算。这已是大家的共识。

(2) 照理说“右派”指共产党内的划分，矛头本应指向共产党内，但为了把打击面扩大，毛泽东把出身定为“右派”的重要标准，产生了“五类”这个“奴隶”阶层，从此中国老百姓人人禁言，媒体禁声。

(3) 当年的“右派”基本上分成了两大类型，一类“共产党原型”，包括了共产党共青团内，和民主党派的下层和文化教育界知识份子，他们有一定政治主张；与中共具有先天联系；

另一类便是按家庭出身为主要标准的“社会另类”，他们在面临“讨伐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几乎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意识，是一群纯粹无辜的无知者，他们人数最多，这些“初生牛犊”在认识毛泽东的诡计后产生的冤恨很朴素。

(4) 紧接着反右，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完全是一场违反经济规律违背民意的好大喜功瞎折腾，对这场灾难，首先起来反对的，恰恰是“初生牛犊”们，他们的许多人对中共没有任何顾忌，反抗最坚决。他们中出现了为追求真实，向暴虐的中共进行坚决的反抗，这就是林昭，陈力，张锡钹等人能以身同专制制度搏击的原因，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它才值得歌颂，这些

英烈应同谭嗣同，秋瑾一起记载在中华民族的青史中。

（5）由于无知，他们中出现的败类并不足奇。至于右派中出现的“告密”、“出卖”、“损人利己”等等现象，只能归罪于毛泽东对社会道德的破坏，对人性疯狂的扭曲，使传统“礼义廉耻”失去了约束。

五七右派是暴政扭曲的知识群体，四百多万知识份子长期处在屈辱中，是中华民族の羞耻，它在中国大陆留下了：“谁反对独裁就遭厄运”。这才是使中国长期不能崛起的原因。

第二节：几个常见社会现象

毛泽东建立了“档案”制度，个人档案必须严查三代，上至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都要按阶级成份严格登记。成份在档案中跟随一个人一生，本人的工作安排，职务升降都要以此为依据。它像紧箍绳，捆得人不敢动弹。

（一）“假”像猖行

在中共统治下，因人为的划界，并以‘阶级斗争’所毒化，人与人间的行为，再无传统的道德所约束。

许诺给全中国民众的“共产主义”天堂，原来比哄骗都不如，饥寒交迫的民众谁都不敢说真话，因为有武装的警察监视。我在古柏记载的辛志华那段“吃饱了”的故事，在毛时代可说遍地都是，还不准人说出来，否则李管教的绳捆索绑有几个受得住？

从此人们对中共赤裸裸的欺骗只好铭记胸中。改革年代这种造假公开泛滥，社会主义既是假的，说假话，做假事成为上上下下的通则，毛泽东以身作则，叫做：说不来假话便成不了大事，李宗吾找到了毛泽东这绝配的搭当，可以说说假话办假事便成了这时代“官”“民”的通则。

报纸上媒体上承然是假的，戏当然全假，工农业计划，国家的指标没可信的，文教卫生全是假的，有段时间媒体揭了假文凭，人们声色俱厉的谴责考试中雇枪手代劳作弊，抓了几个卖考卷的考官，其中大言不惭为之辩解的人会公开指证说：“你没看到连官都可以买到，何必对我手里几张考卷看得那么真？”

由假衍生出来的是“骗”，发达国家为保障正常生产活动，讲质量管理，但遇到了中国假货害市，监督部门一经发现，只好公开退货或焚烧，用的日用品还不危及人体，若是吃的可就小心：“千万不能买中国生产的食品”。

假酒假烟只害嗜好者，倘若是米、面、油和喂养婴儿的奶粉中，渗杂有害婴儿的化学物质，可与谋杀同罪的，权贵们当然会在无毒无公害的供应站买，唯有可怜的中国平民百姓只有靠提高自身的免毒能力了。

其实每个人只要勇于说真话，直揭事物的假象，撕下这欺世骗民的伪装，就会清算毛泽东的罪恶。

在同一地球上远隔大洋，出现令人羡慕的美国。在美州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联军司令华盛顿，站在时代的最高点，在美国铲除奴隶制后，立即还政于

民，经过两百多年，美国人建起了繁荣昌盛的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

而在中国，一群从山里出来的‘绿林人士’在北方熊的支持下，利用日寇侵华，在沦陷区八年扩地为王，夺得全国政权。从此共产主义加独裁统治，使中国陷入另一绝境。

暴力是同欺骗同时横行的社会恶象，人们交往不懂礼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早被“阶级斗争”践踏无遗，连中学生讲不清“礼、义、廉、耻”，忠孝节义既已“批倒批臭”，代之以骂娘对话，拳头裁断是非，这便是毛泽东遗留在我们几代人身上，难以洗净的污渍。

毛泽东说政治是灵魂，是指导一切的核心，把人性放在绞架上受刑，把人人平等，把礼义廉耻统统列为封资修，他说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份子，是一批由特殊材料铸成的。

经他这种神化，中共党员变成了没有人性，无需制约的统治者。

改革年代，邓小平只管能刺激生产的“猫”，中共对社会道德从来只有践踏，人们不顾一切的追逐金钱，有权的利用手中那点权，不顾一切，见钱眼开，有钱能使鬼推磨成了办事的手段，在这种冷酷的社会里“见义勇为”成了傻瓜信条，所以才会有路见行凶打劫的事再不会拔刀相助的义士。

中华民族遭到这翻浩劫，真正变成了一盘散沙，敞若再有一次凶狠的武士道武装起来的强寇侵入，恐怕蒋中正复生，也难以“地无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人人皆有抗战守土的天职”相号召，组织起民众，再写一篇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诗篇了！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是毛早年延安整风就提出来了，随着中共“武力”统一全国至今，已整整统治中国六十，好端端的家被破坏无遗。父不父，子不子，社会乱成一团，几十年毛氏独断专行，不顾老百姓死活，不但弄得百姓啼饥号寒，饿殍遍野，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园里，好像来了恶鬼，百花凋谢了。

中国人为搬动这块巨石，也不知付出了多少牺牲。

随便打开最近的报纸，择其中几段摘抄于后，值得说的，这只是冰山一角：

河南驻马店平与县一个名叫黄勇的人，当兵出身，使用一种被称为神奇木马的‘游戏’，从2001年经三年时间共残杀青年中学生十七人，直到2003年才被一个未杀死的青年检举告破；

另一杀人魔杨枝芽，报载说他从2001年在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共作案26起，杀67人，重伤10人，强奸23人，他采用灭门屠杀，杀死全家后又杀另一家，多少无辜百姓就白白死在他屠刀下，直到三年后才告破；

一个拾荒者陈能杀死的十人，全是与他一样的拾荒者，遇害者的尸体全被肢解。这些杀人者没有同谋，没有高智商的作案手段，没有武林的真功夫，就这样杀人如无人之境，国家法律和公安机关形同虚设，一百多条生命就轻轻松松死在这么三个低级刽子手手中，令人闻之耸然。

与以上案同时见报的还有四川南川县的符文生案；

四川万洲的杨天勇案；公安部通缉的李天佑案；河北石家庄爆炸案……

2004 年 5 月两个杀手马勇、段智勇在广东某职业招待所以招聘为名，将 12 名单身求职的女青年杀死；

2003 年 12 月 28 日，鞍山一出租车司机用绳子勒死一回家的女服务生；

河南省汝州市，杀人凶手严明一次杀人 9 名；

2004 年 2 月 23 日昆明大学马加爵杀死 4 名学生；

2004 年 11 月 11 日马汉庆，在武汉和乌鲁木齐所干的四起抢劫案，造成 5 死 6 伤；

2005 年沈阳王强，自 2000 年五年作案 34 起，残杀 45 人，强奸 10 人，被捕时公然说：“若不是抓住我，还要继续干”；

2005 年河南沈长银、沈长平先后胁迫四个坐台女一起作案，先后杀死 11 名坐台女，肢解并食用尸体的器官……

以上血迹斑斑的案例，是近年来零星摘下报上注销的消息，残缺不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恶性作案罪犯全是四十岁以下，其中多数是部队转业兵，有相当避侦能力，不由令人想到‘解放军’成了罪犯学校，社会被恐怖笼罩着。使人想到一党专制的共产党，已成为孳生暴力犯罪的土壤！！

除了以上报纸注销来的，平时社会上还经常传来各种恐怖杀人事件，就以我居住的小城，去年西师校园教工宿舍传入室抢劫杀人不久；又传辽宁路某小区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下水道经常发现被害尸体；去外县的长途公交车上经常传出有人持刀抢劫的凶讯；

至于孩子们上学路上发生的杀伤、斗殴案；校园里的吸毒贩毒更是不计其数！！社会治安如此坏，完全归罪于执政党本身的腐败，前文已列数中共党内的腐败，‘无官不贪’的帽子戴在今日中共头上真是恰如其份。

这么腐败的执政党，怎么不使人民怨声载道，怎么敢实行民主选举？这样的政府，除了强化警察外是没有任何办法来维持的，当然，不顺应民心的中共不得被推着前进，只不过执政者不得不提心吊胆！

冤狱是中共执政最大的恶政，本文通遍都在控诉冤狱，这不仅是我的个人不幸，而且是全社会的灾难，其根产生于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要当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制造全国大冤狱，目的是排除异己，扫清称朕的障碍。他所亲手建起来的专政机器，上至最高司法机关，下到地方法院检察机关无一不行霸道，缺监督，只要有上级的保护伞，瞒天过海，毫无顾忌。立案办案明知不对，能骗的绝对要骗。如此旺法，怎不冤狱遍国中？

大陆经中共统治六十年，欺骗和假话扼杀了纯朴的民风，以诚信为本的市场经济，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中共自己就是欺骗老百姓的祸首，假货充斥了市场，衣食住行所有国计民生里，以骗为纲，含毒的食品岂止烟酒，连毒米，毒肉，毒菜使老百姓缺了健康的保证，连救死扶伤的医院也频传致人于死的药物器械。

人走在大会上，会耽心脚下马路塌陷，天上会突然降下致命的坠物，经济越发展，人的安全感却在降低，大家想过没有，这怪现象的原因何在？

不过，说也奇怪，被中共诬害为邪教的法轮功，竟以‘真、善、忍’唤醒了中国人的人性，并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得淋漓尽致，最近‘神韵’在世

界各地演出，赢得轰动效应，不但场场暴满，赚尽世界各国观众的感激之泪，真正为中华民族艺术争光添彩。

一个备受中共践踏残害的团体，一些被中共弃如敝履的中华子民，为什么在自由的国度里，能发出这般异彩？这不是很值得大家深思吗？

（二）：红卫兵遗毒

人性复苏一个重要表现是 1959 年庐山会议的召开，一品大吏彭德怀敢于犯颜皇上，显示毛皇上的独裁受到中共上层的反对，中共发生了裂变。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独裁受到中共上层孤立以后的疯狂报服，他想用年轻不懂事的孩子们为他火中取栗，从新坐回已经坐不稳的帝位，当年幼稚的孩子们被他那套政治挂帅的毒液麻醉，人性再次遭扭曲。

我在狱中看《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新闻记录片，很为那组成“红色海洋”的红卫兵感到难过，他们既不知道外部世界已进步到电子时代，人民享受自由民主，享受现代科学文化的成果，享有自己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享有人权作为人最高权力的保障。

这些被中共欺骗，不能正视自己奴隶地位的人，不但不起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反而捧着一张毛泽东开出的路条：“沿途吃饭住宿不要钱，坐车招手上”，‘威风凛凛’的打着红旗到北京朝圣去了，若问他们，“你们上北京去，向伟大领袖要什么？”他们一定说：“去看望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

人性被毛泽东的暴政扭曲，在毛泽东主义邪教教唆下，红卫兵干下打砸抢抄抓，还要把枪对准生养自己的父母，对准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五类份子”，这些五类已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而毛泽东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是随时要爬起来骑在人民头上最危险的“敌人”。

红卫兵被毛氏邪教控制，干出对无辜者断手臂，割舌头，挖眼睛的暴行直到若干年后进行忏悔，但那有什么用啊？根据最近的揭秘，毛皇上已在他临终前几年眼睛已瞎，中国就在一个瞎老头独裁把持下，怎不出现暗无天日的黑暗时段？这是一段中国人值得好好反思的历史！！

我的弟弟被造反派无端杀害，就因为他是“黑崽子”，凶手知不知道，他们残害的是一个无知的孩子，他们杀了他，曾使他的母亲，一个善良的教育工作者，一个被无端划为右派的人痛不欲生，并产生自杀这种悲剧后果吗？凶手做人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那里去了啊？

1979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面对毛泽东扔下经济崩溃，人民啼饥号寒的烂摊子，本当痛定思痛彻底抛弃独裁政治，开创一个民主新纪元。可惜，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功过三七开对这位乱世枭雄“盖棺论定”。他的腐尸装在水晶棺里，原封不动保存“四项基本原则”，保留“一党专制”的政体，掩盖毛对人性扭曲的滔天大罪。

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的全部“错误”，在于放弃了经济建设。如果埋头经济和物质的生产，对以往罪恶处以“无为之治”，而对专制独裁给中华民族所犯

下的罪恶则以“向前看”，一笔抹掉。

至于那个社会积累的民怨沸腾，冤狱遍中国，则以“路线”的左倾而不究既往。对它形成的伤害，不与认真清算，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惨重被坏闭口不言，对道德论丧，似乎只要用轻描淡写的“五讲四美”的空口号，就可以解决了！于是文革后期的余毒依然流毒于社会，并在新的条件下更加恶化！！

（三）：冤狱继续泛滥

在中共独裁统治下，大陆上正气无法抬头，毛泽东时代，冤狱猖狂泛滥的重要表现是文字狱，然而文字狱之根，是从独裁政体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邓小平保留独裁，也埋下冤狱的毒根！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混乱和冤狱可以推给“四人帮”，那么毛都死了几十年，深感文革大乱的邓小平怎么治乱？又治了些什么呢？

实在瞒不过了，才在媒体上曝了出来。下面又举几个报载，并以冤狱为例，略窥一般：

2005年4月全国公开披露，湖北一普通农民徐祥林，十几年前因杀妻被公安机关定为杀人犯，公检法机关不顾当事人一再申冤，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处以死刑缓刑两年已成铁案。那知十余年后其妻活着回乡，冤案始告大白；

同一时期披露，湖南麻城当地屠夫滕兴善，起因1987年锦江河边发现六块女姓碎尸，被当地公安机关认定为留居当地的贵州女青年石小荣，并将滕于次年执行枪决。五年以后，石小荣返回贵州，才供认被枪杀的人根本就不认识她；

同期，另一个因强奸杀人被判死刑的聂树斌，被杀十年后，真的杀人犯王树全归案才使聂树斌‘平反’；

2002年7月12日，唐山市南堡开发区住户郭其夫妇，在家中被杀成重伤，唐山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李明久，在刑讯逼供下招供此案系他所为，直到2004年11月26日真凶现身，李才得以出狱。

冤狱不断乃中共一大弊政，民间的上访，就是申冤。中共不得不惊呼：‘人死而不能复生，判处死刑应慎重…’并收紧死刑的复审制度。对可用事实认定的刑事案，用‘复审’加以制约，却不能排除整个中共党风坏死、制度不全的作用造成冤狱丛生。毛泽东发明‘思想罪’，所谓‘颠覆政权’‘破坏稳定’则是陷人民于恐怖，扼杀民主意识，助长冤狱的罪魁。

现在揭示的历史证明，早在中共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已欠下了累累血债，直到今天建国六十年冤狱伴随一党专制长期存在！令人触目心惊的杀人案频频发生，冤案不断，足以说明暴政猖狂地扭曲人牲，蒙昧社会良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良心黑透的打砸抢罪犯，依靠共产党内仍占据领导地位的后台，和自身变色龙那套拍马屁逢迎的能事，摇身一变成了大贪污，大倒爷，大投机商的“师爷”。这些人像癌细胞一样，潜藏在社会的肌体中。一旦条件和机会形成，必会恶性发作。

那时新的阴谋家，从新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夺取最高权力，再演一次文

革之类的大浩劫是完全可能的。即使建设得无论多好，“国力”恢复到什么程度，都将毁于一场新的内乱！！经历过去的灾难的人们，不能不对此深怀忧虑！！

中国封建的帝王，可以伪称“君权神授”的愚民意识，规定出“王者沐浴五步者死”“王者入葬从陪三千”。在这种特权者吃人的社会里，中国黎民苍生对专制主义的容忍，远远超过了对异族入侵的容忍。

毛泽东死后，被诬陷的成百万右派，只将他们头上强扣的帽子一风吹，这种平反显示中共是一个没有章法的组织，谁在台上，谁说了算。

被毛泽东扭曲的邓小平，因人格的缺陷，使他根本不可能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抹掉中共历史上这可耻的一页。

到今天为止，中共既没有勇气承担该负的历史责任，更不可能为受害者彻底洗雪冤情。所以他们只好禁谈过去，把这一页可耻的过去遮掩过去。

跨入二十一世纪，中共日渐腐败，社会财富集中在窃取权力者之手，旧恨未平又添新冤，人民的上访与日俱增，社会矛盾更趋尖锐，为了保护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找了一个“维持稳定”的理由，建立了庞大的警察队伍，一遇假节日或让他们感到内愧的纪念日，尤其对群众游行，必大批出动武警，生怕走上街头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

这样一伙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团伙，那有资格代表人民执政？

第三节：人性的复苏

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在他任职期间，只是从教育者的良知出发，从国家在抗战胜利后需要安定，需要建设出发，做了一点于国于民有益的事，却被中共认定是反革命，以破坏学潮治罪，才四十多岁便戾死中共狱中。屈死他一人还没消中共之恨，将他全家几乎赶尽杀绝，家破人亡。

然而，被暴力扭曲的人性却在复苏，1985年，一直不敢讲真话的母亲终于向法院递交了替父亲申冤的诉状，虽然她知道，父亲已离开人世整整二十六年了，她的申诉是一份对知识份子迫害的抗议书。但是，重庆法院仍维持着当年军事法庭的判决，重复着加给他的“罪名”。

老百姓追求人性复苏，是中国大陆廿世纪九十年代的民意主流。在这一期间，一位台湾的女作家琼瑶所写的《还珠格格》传入了大陆。

这个故事选择皇宫为背景，皇宫是中国专制主义的大本营。《还珠格格》剧描写了一个千里寻父的女孩把‘人性’带到这里，描述一群追求自由的男女，怎么在重重包围中战胜专制主义这头怪兽，歌颂了‘自我牺牲’、个性解放、追求自由这个主题。

《还珠格格》热的出现，体现了中国民众对丧失多年人性回归的盼望，当“阶级斗争”把中国大陆弄得兄弟、父母可以反目成仇，把人性践踏成荒漠一片时，只有回归的人性才滋润中国人心，唤起人们对生活和爱的渴求和希望。

几年来《还珠格格》剧不但家喻户晓，老百姓交口赞誉，它赚尽了中国百姓的热泪，它反映了中国大陆人心所向。

人们会发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大陆十几亿人口，竟没有产生一个像琼瑶的作家？大陆的中国作家真的没有那种反映人民心声的热情吗？

只要看看中国的影坛，看看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电视荧屏，那上面老歌反复，电视剧不是古人登台就是战火涂炭，加上时髦口号，和俗不可耐的对话。

专制特权封住了作家的喉咙，中国有那么多近代的历史事件：从戊戌维新，康梁变法；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抗日血战；台湾民主政体的建成这些大幕的题材，够好多历史家、文学家撰写，够好多艺术家表演，够好多中国的观众从中受到教育启发。

中共血腥统治六十年，民主同独裁搏斗的可歌可泣故事，千千万万。如果说中国需要民主主义启蒙的素材，那么这些都是最丰富的素材。然而它们却被中国的独裁势力紧锁着，埋於地下，使它们无法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独裁势力是中国进步的巨大障碍！！

1957 年的受难者地狱二十三年，受尽折磨，大半都折磨死去，埋骨於流放荒野。今天逼得他们在风烛残年，守在中共的衙门口讨要二十三年工资。在中共眼里“右派”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掀不起任何风浪的人群。

但是 1957 年的“反右”是大陆历史上的大事，当年骄横跋扈的毛贼撕下他的伪装。三面红旗的惨败，毛贼东不仅完全丧失人心，在大陆失去统率一切的地位，邓小平能窜其位，重打锣鼓再开张，证明中共已无可挽回走下坡路了。

冲军边荒的人中产生陈力，张钫，刘顺森这样的中华精英，在黑暗中举起了“火炬”，引领人们反抗暴力冒死无惧。这些人用生命证明在暴政下，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的精神永存。他们的人性在反抗暴力中闪耀，他们的精神是右派的骄傲，传扬他们就是继承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血纪》告诉人们，反抗暴政才能保持自己的人性。

今天大陆上在中共压迫下的民众，普遍呼出人性复苏的声音，表达他们对毛泽东暴力的普遍扬弃，古人教晦，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把老百姓当奴隶使唤的中共顽固派，总有受到民众惩处的那天！

“以事实为依据，以史为鉴”向来是中国史学家共同遵守的准则，中国古代为了秉笔直书，有多少史官宁可杀身。

然而中共统治下的史学工作者，有多少能继承这一传统？

这使我又想起了 1972 年，中共邀请访问大陆的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基朗·安东尼奥尼，曾冒着所获资料被没收，甚至人身扣押的危险，在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摄下反映大陆当年实况的照片，回国后整理成新闻纪录片《中国》，并在世界上传播，让世界知道被恐怖神秘隐藏的中国大陆真实情况。

一个信奉民主的外国人，尚能通过沿街乞丐，武汉长江大桥头的贫民窟，表达对陷於灾难的大陆百姓以深切同情，对带来灾难的中国独裁者以声讨。

而大陆的史学家，依然对这种罪恶噤若寒蝉。这难道不是独裁专制扼杀人性的又一结果么？

第八章：风云满布的年代

第一节：山雨欲来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共控制下，社会从阶级斗争‘内战’向经济建设的一次‘和平’转变，客观上国家和庶民得到一次修养生息的机会。

但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搪塞世人，是不能掩饰少数人霸占社会财富的不义的。这种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财富私有和残酷剥削，需要独裁的政治制度来保护，这是邓小平继承毛泽东衣钵的原因。靠特权占有的私人财富与自由资本靠竞争占有完全是两回事。

推行农业的‘改革’不是什么新发明，只是农民和平要回了被毛泽东抢去的饭碗，从饥饿桎梏中挣脱出来。解散人民公社，阶级斗争不提了，对五类这种类似中世纪的奴隶制度一风吹掉，有它进步一面。却不让人们批判毛泽东反动的独裁主义核心，而是改头换面继承它，就是它的反动一面。

用裁军一百万，向世界证明中共需要和平的诚意。这得到了世界的好评，美国全球性权威刊物《时代》周刊，邓小平被誉为 86 年世界风云人物，出现在该杂志封面上。

不过，邓小平用“向前看”掩盖毛泽东滔天大罪，暴露了自私顽固的本性。

“不谈过去”，以回避中共背叛民主，抹掉历次运动对无辜老百姓所欠的血债；用反对自由主义泛滥，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不准人民对它进行批判；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掩盖统治者占有社会财富的掠夺性，达到保留共产党的特权，便是中共后极权时代的目的。

但是昨天刚发生的事能忘记吗？中共怎么尽干这种掩耳盗铃的事？邓先生“不谈过去”难道能抹去毛泽东的罪恶吗？老百姓不是失聪的傻瓜，他们之所以顺着中共说瞎话，实在是怕满街带枪的卫巫。

今天权力是特权聚敛的保证，它造就了中国新的官僚阶级。毛泽东所造成的物资匮乏和强权秩序，加上道德文化被摧残，使这个社会充满了欺诈、贪污、腐败，“改良”充满了权力与金钱勾结造成的两极分化。构成了畸形改革开放社会的特征！

百姓只好怒目相对，却不能在新闻报刊上公开仗义执言。中共在言论上的封锁，暴露了‘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本性！

然而一部份对世界不了解，缺乏政治头脑的人，包括过去的权力拥有者，而今天失去权力的人；一些没有认真思索造成社会今天这么坏的原因，因而一齐来搅昏是非的人，让人们陷入到另一个误区。

1986 年的一天，我因公出差去重庆市中区，早上七点钟登上了一辆川运二十二队的中客汽车。刚刚跨进车厢，就看见司机台前挡风玻璃的后面醒目位置上，挂着一张足有八寸的毛泽东头像，那头像在风中摇晃，依然十分得意。这段时间说来也怪，全国一股风，汽车的驾驶台前都挂这玩艺儿。

据说交通事故太多，就因为他在阴间作祟，挂了它可以免车祸之灾。

这时坐在我前排的一位头发花白，教师模样的老人，指着那悬空的彩色挂照，向司机发问道：“挂上这么大像片，不挡你的视线么？”那司机却笑了笑回答说：“没关系！人人都说他老人家生前是恶神，要不然那时贪官都不敢猖狂？现在他死了，贪官污吏便成了灾，挂他的像就是请他老人家回来杀杀这些贪官。”

那老师显然对这位司机的回答不以为然，再问他：“照你这么说，还是过去的好啰？”那司机看上去大约四十来岁，显然是经历过文革风暴的过来人，见他沉思片刻后回答说：

“照我看都不好，毛老头当权吃不饱，说句话都提心吊胆，大家都过的苦日子，又不敢吭声，活像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现在呢，饭倒是有得吃了，可是贪官太多，苛捐杂税太多，失业也多，反正老百姓倒霉。”

这是一段老百姓内心对中共专制政权的无可奈何的评价，可惜老百姓不明白中共之所以如此，根源于它的唯我独尊，党章就自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不能受任何约束的“神”，毛泽东所有运动目的都是“造神”。

我在专汽厂任检验科长，手下有一名年已五十上下叫雷昌的检验工，常常有意无意的对当今中共的腐败忿愤不已，他常说“现在这些当官的要在过去早就抓起来关监或杀头了，所以还是毛泽东那一套镇得住人。”

当我问他过去那么多人遭整，那么多人饿死，老百姓不敢说真话，吃饭靠粮票这种日子，你认为也好么？回答是：“我也不是说毛泽东好，我是说今天不搞阶级斗争了，贪官污吏实在太不象样了。”我又问他：“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比较，你拥护那一种？”他盯着我的眼睛，神秘的默不作答。

那雷昌就住在我的隔壁，他的老婆所在企业倒闭，失业在家，平时最关心的就是粮、油、肥皂之类的供应和价格。菜油取消油票的那天，她便借了钱买了一大桶的菜油屯起，以为油票取消后油价会翻番上涨。

她排在油店门口长长的求购者队伍中，抢着去买菜油。

除了菜油，还有肥皂、牙膏、草纸等等极为普通的日用品，在这涨价的风潮中，老百姓把所有钱都换了日常用品和消耗品，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躲过那币值贬值之灾。

雷家的钱全变成了几百斤菜油，那菜油可不能放得太久，充其量一年以后，油就变质了，如果再拿到市场上去卖，别人一闻就走得远远的。

抢购风潮时期，大量的假货劣质货，尤其是食用油、米、面粉，霉变的东西经过“处理”后购进老百姓的家，直到过一段时间才发现。雷家就为了自己消受变质的菜油，夫妻两没少吵过架。

我在前面介绍了我所在的厂李友，马兵、肖付等人的故事。在84年工厂靠农用汽车短期走俏时期，一个普通的提车员都知道利用手中这点摊派权，向急欲购车的农民伸手，表明社会风气已经坏到了何种程度？上行下效，沾着权的边，能够不贪的反而成了怪物，往往还要遭人讥讽说成是大傻瓜一个。

无官不贪已不够概括这个执政党，应当说，“无权不贪”更切近描绘这个政府，邓小平主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无权不贪这个潜规则，贪官的泛滥却要社会消化，但社会的承受力是有限的！

现实告诉我们，腐败根源于专制之中。这一时期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又怎样

呢？独裁的中共政权向来对政权内部的丑闻讳莫如深。

我没有专门收集中共各级政府腐败的资料，在这里仅仅根据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中所载，摘下 1985—1987 年中共公诸的几个材料：

中共对海南区党委书记雷宇 1988 年给了党内警告，这种以‘家法’处置的老传统实在是欺人欺世，**中共岂能以私党的规矩替代国法？**

事实证明，用轻描淡写的党纪处理，已无法抑制中共的腐败，腐败的恶性膨胀使中共整个的烂掉。于是被迫使出他们一贯认为最有效的老章法，借高压和运动杀人，将个别人当作整个统治的替罪羊。

1986 年 6 月 24 日，中共上海市对市委办公厅主任余铁民，利用职权收受三万元贿赂被处无期徒刑。事实上同一时期中共官员贪污上百万的案子相当普遍，对余铁民案的严处，正好暴露中共党内腐败已相当严重。

1985 年福建查获的邓国桢案，诈骗、走私、套汇、倒卖、行贿金额达两亿，到 2004 年，中共官方公布当年 11 月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的大案共三万六千余件，人数四万二千余人，比 2003 年增加五倍。

1987 年 3 月 2 日江西省南昌人民检察院，对江西省长仇献策循私舞弊和包庇走私受贿等罪起诉，判处他两年徒刑，成为邓小平向“刑不下大夫”开刀的信号，这是为了“神化”这种不得人心的政治需要，造成共产党“伟大”、“清廉”、的假像。

像这位仇省长级别的贪官不是一个，而是一批，就其蔓延趋势，将是整个统治集团。估且不论仇献策是否因与“中央”政见相左，而身陷囹圄，**这一时期贪污者的官职及贪污金额和手段，都是中外历史上贪官们望尘莫及的**，其中尤为触目惊心的是公安检察人员，办案人员所发生的“犯罪”。

震惊全国公安系统大案，云南普洱县刑警大队长乔跃忠从 1985 年开始贩毒，杀人越货，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直到十年后才披露出来。

中共官方报纸不得不惊呼“毒品，暴力凶杀与黑社会联合在一起，产生严重刑事案件，听任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贪风日盛显示独裁专制正走向崩溃。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共已无法遮掩已入膏肓的腐败了，对外开放期间一开眼界和胸怀的分子和青年学生，从剧烈的社会斗争中，产生了民族危亡感。毛泽东独裁在知识份子烙下切肤之痛，使他们亲身领受党天下的专横霸道，虽然他们对中共的暴虐心怀余悸。

但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反腐败争民主的运动首先从学校开始了！

1986 年 12 月正在进行人民代表选举的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们，组织竞选论坛，活跃在整个校园里。

12 月 1 日校园里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首先向人民代表这个橡皮图章宣战，号召选民越出中共提名的框框，在选票上写上自己拥护的人。约有四千名学生呼喊，“打倒封建独裁”的口号上街游行，并冲击中共安徽省委。

与此同时，上海、武汉、南京、长沙等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民主政治反对腐败。全国各地高等学校陆续出现一些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字报。

其实这些要求在三十年前的学生大鸣大放中已提到了，只是毛泽东当即就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扼杀了学生刚刚提出的正当民主要求，从而导致了更惨烈的后果：大陆陷入了“三年自然灾害”，大约五千万老百姓饿死。

我们的工厂距西南师范学院仅一路之隔，早晨锻炼身体时，我常去西师的风雨球场，经过该校的大礼堂，顺便看那时学生们贴出的大学报。在礼堂旁的玻璃橱窗张贴栏内，学生们设计的《民主园地》已一改过去的东西，代之以宣传民主自由的启蒙文章。

坚持一党专制的中共死硬份子，不能不对这种山雨欲来的形势担心。

邓小平连忙在北京发难，他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赵紫阳喊道：“凡是闹起来的地方都是那里的领导态度（执行独裁）不坚决，这是近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思潮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这话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与民主为敌的中共顽固代表者，在它的统治时期，没有一刻放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泛滥的杀手锏，这是中共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最核心精髓。

第二，共产党执政期间，党内斗争和分化势不可免，靠近民意的改良派与坚持独裁的顽固派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直到独裁统治的势力完全退出执政舞台。

我们这些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经过的政治运动，使我们亲眼看到并牢记，一批又一批的“异己份子”，在两条路线殊死搏斗中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当邓小平祭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使我们马上看到毛泽东独裁魔影在大陆上的再现！

皇冠与法典二者不可兼得，中国的韦斯巴芗，曾高唱过法制替代人制的邓小平，到了危及其独裁统治的时候，坚决地选择了皇冠。

延续几年的“反对精神污染”，就是保持“四个坚持”的洗脑惯例，就是保卫独裁统治的新格局。

到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亮出来后，等于在指示各级中共党政组织，要按过去对待右派的手段，来收拾争取民主和法制的学生。看来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民主势力，中共要采取极端行动了。

1986年12月由他亲自点名，开除了方毅之，刘宾雁、王若望等敢于主持正义，为民请命，疾言中共贪官劣迹的几位领袖人物的中共党籍，1986年3月开始在上海、南京出动军警，以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向初萌的学生运动挥起了屠刀，学潮暂时被中共暴力压了下去。

1987年1月2日，胡跃邦在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咄咄逼迫下，请求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中共内部的政治反对派，在素有独裁经验的中共顽固派面前的软弱，反映出中国民主力量的软弱。

这使中国当时倾向民主主义知识份子感到愤怒，对于在中国统治三十年间，血债累累，已经民心殆尽的中共专制主义，仍能照常执行其统治职能这个怪现象，引发了思想界的思索和争论。

从伤痕文学开始，到苦恋一书出版，受到了中共文痞们的清剿。探讨中国民心，继“丑陋的中国人”之后的代表作，莫过于1988年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六集电视连续剧“河殤”。

说河殤是一部探索中国文化尴尬状态的政论评说片，那么在我看，由中共主要喉舌中央电视台来播送，至少反映了中共上层的分歧。

正因为这些意见是分歧的，使它一改老传统。‘河殤’列举颠狂的大跃进和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这些为世人所共感的反面材料，哀叹在中国失去了一次**选择自由民主的机会**。并证明，毛泽东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欺骗性。

其实“河殤”的伤感，何尝不是每个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人们共同的伤感？正因为这样，它有强烈的感染力，以致于当局在《人民的报》《光明日报》等中共把持的刊物上，对“河殤”的文化围剿也只能风声大雨点小。

中共上层领导，已经越来越明显分裂成顽固保守派和主张和平改革深入的民主派。在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危机中，民主向专制主义发动的思想交锋，为思想启蒙开路。

第二节：六四，大陆民众在怒吼

1989年4月15日胡跃邦含愤去世，一场学生运动终于爆发，学生们对胡跃邦因反对党内腐败主张民主，而被戴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撤去总书记职务感到愤怒。他们悼念胡跃邦，反映了日渐成熟的民主要求。

（一）在北京

4月22日，四万名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将他们酝酿已久的要求公诸社会。这些要求仅仅是：（1）中共中央应重新评价胡跃邦的功过；（2）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过处份和批评的人平反。

这两个要求丝毫没有推翻共产党，取消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成份，同时这也是中共自己制定和颁布的宪法所容许的。

下面仅就我当时从媒体上摘下的报导，对这场运动作一个不完整的描述：

运动一开始，游行的学生举着“反对腐败，打倒官倒”的小旗。

当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旨意刊载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使我想到三十二年前，毛泽东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这是为什么”？

（顺便要说，三十二年前这道格杀令，毛泽东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不仅把屠刀对准了无辜的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恶毒的把奴隶社会镇压社会的那套方法，应用到当今社会。）

5月4日新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将中共分歧公诸于众，学生们受到鼓舞。

5月5日以后，学生们再度走向大街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高自联”。

5月13日，“高自联”在北京发动了一场历时七天，3000人参加的绝食请愿，大批的市民拥向街头，声援学生。中共统治下的一部份警察，为学生的和平请愿和绝食运动所感动，开始倒向学生一边。

5月17日惊慌失措的顽固派，通过李鹏操纵的国务院宣布：从5月20日开始，对北京地区部份实行戒严，并且在戒严令中宣布，所有反对政府的行为

都属于非法。

这些消息证明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学生运动，只是中共内部的较为进步的民主派，向坚持独裁顽固派的斗争，是符合于中共自己提出来的“改革”纲领的，它反映出社会对财富积累的不义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可悲的是几十年被中共暴政压扁了的中国百姓们，还没有人公开喊出打倒这个腐败的政府时，言论和思想，已被中共密布的特务封杀得万口缄默。

现在，学生冲出了禁锁的校门，走上北京街头、一泄积郁在心头多年的愤怒。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学生们喊出了“打倒官倒！”“打倒腐败！”的口号。

工人在街头为学生组织募捐，有的把赖以生存的冰棍箱，糖水摊推到了学生中间，把冰棍，糖水葫芦递给学生。

北京市民已不像前清那些盘着大辫，穿着长衫的“老北京”，望着谭嗣同喋血长安街头黯然神伤。更不像三十年前看洪水猛兽般的“红卫兵”，愁得只好皱眉头。

几十年中共暴力的淫威在人民心灵上的折皱，第一次被展平。

时间正好倒转两百年，1789年4月27日，巴黎的市民高呼着“消灭财主”，“消灭剥削”的口号，簇拥着向巴士底狱前进，他们高举自由宣言，掀起了欧洲民主主义大革命。

然而这股人类争民主的热风整整刮了一百年，才远涉重洋登上了华夏这块封建冻土，让北京市民第一次向世界对话！！

清廷的皇室在国土分裂，民族危机深重时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努力，光绪皇帝尚有实施民主的戊戌变法行动。

然而世界上产生了新专制主义的中共，连光绪皇帝不如。

历史在俄国和在中国同时应证了，新的披着革命外衣的专制主义，比满清王室更凶恶的虎视着民主力量。

然而民主仍然战胜了新的专制主义，经济这个最活的社会原动力，是任何独裁势力不能征服的。

于是，距法兰西大革命爆发刚刚两百年，1989年北京发生的事变再次雄辩证明，民主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一直顽强的同专制主义斗争。

五四运动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十分虚弱，中国民主初潮蓬勃兴起的背景下，无论从运动所受的阻力和运动的动力看，当年民主力量占着相对的优势。

而今天，“六四”是在中共统治相当强大，人民又因长期中共的暴力禁锁，自身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背景下，由人民自发的发动起来的。！

一句名言“刽子手只有在真理的面前才会感到虚弱而颤抖。”被应证着。能对振憾人心的提问置若罔闻吗？能对反对腐败振臂高呼“拯救祖国”的孩子们开枪么？能在这种洪流面前心不惊，肉不跳，胆不怯么？

就连中共最顽固的候舌，人民日报的编辑队列，花白头发的老人披着“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的条幅，今天也要公开与中共中央“划清界线”。这些七十高龄的人记得他们的前任，邓拓，胡绩卫，秦川，都因无法蒙昧良知充当毛泽东的打手，最后落得被彻职批斗自杀的结局而悲愤。

在学生和市民的声势浩大游行队伍支持下，中共改良派。与中共独裁势力，

一天天发展到怒目相持的地步。

由毛泽东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独裁统治，已在民心振撼下，迅速呈现解体。继胡跃邦而上任的总书记赵紫阳，比邓小平对“共产主义”的叛逆走得更远。

中共党内的这种分化，是他们对学运动犹豫不决的原因！

良知和残酷的现实，民心的强烈振憾，使赵紫阳流泪。

共产党理论上的矛盾，猛烈冲击着统治集团。

于是他呼吁：关怀、理解、克制和对话！

5月17日，北京各界民众一百万，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口号，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秩序井然。

即将回归的香港市民举行了持续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反对回归到中共的暴政统治之下，他们清楚此刻申援北京等于伸援自己的明天。全世界人民同声声讨北京的专制暴行，反对中共把专制主义带给香港的人民！

学生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起了自由女神像。表示民主和自由是中国年轻一代知识份子的信念，这同一味追求专制的中共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个举动向世界宣布他们同北京政权决裂！

然而，中共专制的淫威依然僵而不死。

游行的队伍里，有人在焦虑呼喊：“当心，中共的政权机器是一具杀人不眨眼的绞肉机”。几十年内它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尽管它已丧失人心，但只要它的统治还在，在面临其生存受到威胁时，它会以百倍疯狂杀人。

有人则说：“不要使社会失控和动荡，不要给老百姓带来苦难，中国不能再乱，社会需要安定。”

有人在劝阻那些热血沸腾的学生，要注意语言上的分寸，以免激怒枪杆子，给这次运动带来灾难的后果。

然而，四十年的屈辱，第一次伸直了腰，学生们摇动他们手心里的小旗，上面写着：“反对腐败和专制”，大学生们为民族的前途担忧，义无反顾的用正义和理智为自己开路，用赤诚感动道路两旁年长的一辈。

布满苍桑的父老们一脸警惕，俨然以孩子们保护者姿态出现，他们准备这些孩子受到伤害时，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们。

（二）在我周围

北碚这坐落于重庆偏北的小城，因为集中了重庆市两所著名的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以及市一师等专科学校和几十所中学，所以被称为重庆市北部文化中心，这段时期比较集中反映了重庆市学运动的发展情况，使我沐浴了这场运动的洗礼：

4月22日北京四万名师生上街游行开始时，北碚两大院校学生也结队走向了街头，开始时，他们只是散发来自北京的信息和资料，宣传北京市的学生向中共当局提出的各种要求，并将巨幅海报张贴在人民会堂前。

这个一向被北碚区中共区委用来宣传的中心，现在被学生们用作学运的讲台。人民会堂门前成了北碚老百姓了解时事的窗口，学生们除了在那里摘抄海

外各大媒体对中共丑闻的报导，还散发学生和市民们反抗中共的传单。

每天下午七点钟，两院的学生都要上街进行游行，在街上同其它学校的同学会合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环城路一面举着小旗向市民演讲，一面呼喊口号，直到深夜才从街头陆续散去。

每到这时我都要挤进市民的人群中，去聆听他们所呼出的每一口号，同他们交流共同的感受，我的思绪和呼吸被同学们调动着。

有时候我的母亲和我一起，当我问她，当年国民党时代是否见到过这种群情激愤的游行场面？她那昏花眼睛里陷入了半个世纪的回忆，点点头，叹息道：“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气势磅礴的队伍。”

我看到两名学生举着，“镇压爱国运动就是犯罪”的横幅标语走在最前面。后面的数千名学生呼喊口号用坚定的步伐紧跟着，他们神情凝重。

我的母亲和朋友们一面向他们欢呼，一面怯生生的劝告我：“不要轻易卷到游行队伍中，因为你是再经不起燃烧了。”

上了年纪，被专制折磨伤痕太深的老人们，怀着激动和忧虑混合一起的复杂心情，他们被中共欺骗了一辈子，奴役了一辈子，他们的性格被中共几十年的高压压扁了，难以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了。

我看见一个头发苍苍的老太太，跟在孩子的身后，擅抖的呼唤着：“你还小，不知道中共的霸道，小心呀我的孙子回来呀！”好像灾难是游行人们激怒了统治者造成的。

但是，我回答他们：**“我的学生时代是够听话、够软弱的，而我们的遭遇却是最惨的，我们在皮鞭下忍受饥饿和酷刑，我的同难壮烈牺牲，难道这不是因为我们忍让屈辱而造成的么”？**

沉默了几十年的学生，在中共专制下失去理想和自由的中国学生们，怎能放弃争取重新生活的斗争？

那时每天早晨上班和中午回家的时候，我都要特意绕道去人民会堂前，阅读学生们新贴出来的大字报，接受学生们的宣传教育。

虽然，大街的两侧高楼中，潜伏着一些训练有素的怪物，它一直在窥视着游行的队午，在那黑洞洞窗口后面，把摄像机对准经过的游行学生，将他们此时此地的作为，全部摄入镜头。准备这场“动乱”平息后，进行清算和镇压的依据。

5月23日，北京城雷雨交加，寒风袭击了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示威的绝食者，数百位中华民族优秀的孩子，终于在饥饿和风暴中昏倒了，同伴们迅速地救助受难者，这里响起了悲壮乐曲，远远超过了鲁迅笔下的刘和珍时代。

消息传来，北碚的学生立即在傍晚举起了醒目的标语，走上了街头，万众一心表达声援！那标语上写着：**“妈妈我饿，但我们吃不下！”**

迎着这悲愤的标语，我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这是稚嫩的孩子向祖国母亲的哭诉，这更是游行队列中发出令人惊醒的呐喊，目睹这一幕，侏子手被震撼了，退却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狱中的三次绝食，尤其是1967年文革野蛮的批斗中，我一个在狱中长期反抗迫害的无辜者，以绝食这种文明方式抗议文革残害，

竟成当局摧残的借口！当时所有在我身边的同难们，目睹我受到的摧残，除了下泪谁都不敢对我表示同情和声援，支持我的仅仅是我对野兽暴行的愤怒。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我数着一秒一秒的熬。为了戏谑我，他们居然剥夺我喝雨水的权利，这样的斗争等于让野兽笑看我活活饿死。

他们幸灾乐祸说，绝食而死又怎么样？狱方充其量向人宣布，又少了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家伙！。当年被打死、饿死、和冻死的人，引不起他们内心的颤抖，因为他们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

今天的绝食者们，在经历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反反复复动荡，认识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欺骗？什么叫专制？什么叫复辟？今天已不是二十年前我在监狱里孤军奋战的时候。

“是的，我饿”，六十年代的孩子们从一生下来，就生活在张铁生虚无枷锁封闭的年代。奶娘干瘪的乳头上，**已挤不出五千年文化的乳汁，而是无知和野蛮的毒液。**孩子们哭喊着挣扎着，而无情的“奶娘”却向他吼道：

“忘记你的祖先那些封、资、修的东西，你现在要学会吞食用斗争和战火练成的铁丸。你应当从此脱胎换骨，学会用阶级斗争征服你的父老兄弟，长大后，除了事奉那至高无上的教主，呼喊毛泽东万岁，什么都要抛掉。因为从你降生的那一天开始，你只能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练成专制主义的打手，永远成为张铁生类型的狂人”。

哦，妈妈！这样的精神粮食我怎能下咽？

（三）今天和昨天

天旋地转，老魔头的幽灵归天，继承他的鬼魅像烟云散去，先天发育不健全的孩子们在新的课堂里，手捧着发给他们的新教材，从书包里装进自然数学课本。

读吧，读啊，文凭热在召唤着我们：中学、中专、大专……可惜就在那凭文凭才能晋升的热潮中，有几个亮出的“文凭”是真才实学的？在这么大群的小学生，中学生中有几个能进入大学门坎？大学成了无数求读者可望不可登的境界，毕业变成了失业。

在城市里，穷人的孩子因为无钱上学，只有排在待业的行列中等候有钱人的雇佣，在阴暗潮湿的工棚里做苦力。而在贫困山区里的孩子，蹲在危房的教室里，一边听老师颂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边听那教室的房梁被风吹得摇摇欲堕的响声，担心它何时会跨下来。

于是那些在政府权力保护下顺利上攀的佼佼者，便向那些学校大门外的大批学生们发出嘲笑：你们这些愚蠢的苦读学生们再有天大的苦功失，能值上我那有权有势的父母么？

在拥有权力的大款们的乐园里，读书求知变成一种天大的傻事。一个善于周旋于政府和富人间的富仔，要比一个老实巴交的求学者“精明”百倍。

这贫富悬殊的现实在教会你懂得，今天这里绝没有求知者的安乐园。

这样的书我怎能读下去？妈呀，我饿，我渴望知识，然而摆在我面前的课

本里再多的科学知识都毫无用处，靠它们赚不到钱，解决不了我的生存。在这个社会里，我除了被迫学会对权势顺从和依附，奉献自己。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这里不需要知识，有的是欺骗，有的是对良知一刀一刀的切割。

妈妈，好心的妈别劝我麻醉自己的神经，蒙蔽自己的眼睛，坐在摆着人肉筵席的席前，看着富人啃同胞的骨头，跟着也蘸着弱者的血和泪去吃那馒头。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会被人在这筵席上吃掉。

所以妈妈呀！我好饿好饿，但我怎能安心坐下来“读书”，去同吃人者同桌享那有毒的“盛宴”。

1989年4月的春天，对我来说是我四十年来经历的最温暖的春天。

四十年来压在我身上的这沉重的专制巨石下，我像一颗羸弱的小草，将根深深扎进了巨石下的泥土中，在盘石的缝隙里顽强地向上生长，我看到我的同类一颗一颗地因为缺乏养分和水，缺乏阳光而爬在泥层某一个断层里枯死掉。

四十年来此时此刻，我第一次强烈地体验到我们民族觉醒的生命力，我紧紧地贴着这支游行队伍，体验它溢出的热流溶贯我的全身。

四十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在大街上贪婪呼吸充满了民主气味的新鲜空气。

五月底的一个下午，我看见西师的一队学生捧着募捐箱向我走来时，我忙从口袋里取出了一百元钱投向那箱口，一个女孩走到我的面前恭敬举起一个签名本，要我在上面留下我的姓名。

我笑道：“不用问我的名姓。”说着举笔在那本子上写下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对六四运动的心意”，我那时已经被一种虔诚支配着，这些天来我感谢孩子们给我上了令我感动的一课。

不料我的旁边却传出一个声音，低声说道：“他们拿这些募来的钱上馆子大吃大喝。”我立刻警觉起来，大声说这是别有用心の中伤，这种冒生命危险的街头募捐，谁愿意？

坚持中共专制独裁的核心人物和他们的狗腿子，正用疯狂的仇眼来看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他们认为专制倒台了，自己的特权消失，他们会失去抢来的一切，此时正全神贯注的寻找破坏学潮的机会，这些人像曹英一样造谣生事，无中生有，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四）屠杀

一个多月来，北京部队在市民们的阻碍下，一直屯兵城外“无法进城”，而城内的部队拒绝镇压的密令，他们不仅因为受到爱国学生们的感染，而且已经感到在北京市民面前“众怒难犯”了。

外电报导，三十八军军长被青年的军官们软禁，拒绝镇压爱国同胞，他们不愿当历史的罪人，并成为这座城市里人民的死敌，所以喊道：“我们是打仗的，而不是打人来的”。

北京的父老们为保护自己的孩子们挺身而出，横卧街头，用身体作路障，六、七十岁的老人流着眼泪劝说这些还不明真像的部队。

在中共的辞典里，民主是特权的最大敌人，“动乱”不是指社会秩序的破坏，

人民生命涂炭，而是指独裁专制受到了全体人民的反对，处在不稳之中。

中共建国以来，凡是出现威胁他们统治的任何迹象，甚至于出现不与独裁者相一致的言论，都会被斥为“反党”和“反革命”，并以“动乱”诛讨之，镇压之。十年前，魏京生就是在西单墙，刷了几张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就抓去蹲了整整七年大牢。

其实，自称人民大救星的这个政党，恰恰是陷社会于动乱和灾难的元凶祸首，在高压政策之下，在经历了长期痛苦的过程，过去许多人没有认清或不敢直言的事实，今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共识。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比当时北洋军阀奸诈得多，残暴得多的新的暴力集团，他们所付出的艰苦，曲折，和努力是当年的刘和珍们无可比拟的。

就在同一时刻，天安门城楼下有人用鸡蛋裹着颜料向天安门城楼上那张中共政权的奠基人，混世魔王毛泽东的挂像掷去，这个行动证明，队伍中有人把中国灾难的元凶点了出来。

凡是年过四十以上的人都知道，只有彻底的将毛批臭，让它现出专制魔王的真身，中国社会问题才算真正点到了要害。如果这个举动能得到游行基本队伍的响应，针锋相对的提出打倒毛泽东，打倒独裁的口号，树起民主革命的旗帜，那么它将奏响向现代专制讨伐的战鼓。

恰恰相反，在队伍中却有人对此喝倒采，一帮夹在游行中“支持”学生运动反对社会“混乱”的人，对邓小平存在着另一种见解；旧的毛泽东党羽专横跋扈的天堂失去了，他们想用学生的力量来恢复毛氏独裁的旧秩序，所以怎么也不能容忍，把运动的矛头直指他们的祖师爷。

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喻东岳被抓，并处以无期徒刑。

这足以说明邓小平集团的改革开放，一点都没有放弃毛泽东的专制主义，也说明学生运动的头头们认识和步调极不协调，运动并没有升华到它所应有的历史高度。没弄清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不仅是暴政的根本原因，还是产生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陷在姓资姓社这种可笑的争论中。

毛泽东的嫡系们，也反对腐败和官倒，但他们是非颠倒的把腐败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为了让过去毛泽东专制主义再度复辟，拼命的叫嚣只有老魔头才能将贪污腐败收拾干净这种谬论，严重干扰了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使它最终向独裁势力屈膝。

专制的寡头，终于端出毛泽东的衣钵，大声惊呼这是一场反革命的动乱。他们召集紧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撤去了赵紫阳的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并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平息动乱。”疯狂喊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历史在这个决定性时刻，毛泽东复活了！

六月二日，屯兵北京城下的勤王部队待命入城。BBC 台立即播报了这支部队的底细：这是一支以少数民族为基本骨干，没有文化素养，不了解学生运动内情和底细的虎狼之师。

六月三日残暴的中共当局，终于为专制集团的利益孤注一掷，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命令这支虎狼之师用坦克开路，以摧毁一个月来北京市民筑起的工

事和路障。受命镇压的部队从驾驶仓里，用机枪扫射那些横卧街头进行阻拦的老百姓。中共的专制寡头血洗了北京城！

赤手空拳的学生纷纷倒在血泊中，在这种情况下的市民和学生用胳膊和棍棒，血战坦克。一时间到处血肉横飞，哭喊声声振环宇，一场在中共导演下空前惨烈的血腥镇压，在全世人民的面前公演了！

连日来因为绝食而虚弱不堪的学生们，高自联的指挥者已来不及从自由村撤退，有的饮弹坦克履带和机枪子弹之下，有的带着伤、流着血，还在继续指挥着从人民纪念碑前撤下的大学生们继续后撤。

六月盛暑的北京，血流成河，横尸街头。一切“克制”、“爱护”和伪善的承诺，一切“解放人类”最美妙的颂词，被他们吃人杀人的行动，当着全世界拆穿无遗！全世界的卫星上，自带的录像设备，记录下这一段中共统治老巢中发生的血淋淋历史

它们拍下了北京的市民和学生倒在坦克的履带下的经过；它们拍下了履带碾过自由村里的帐篷留下一条条长长的血带。！

当时，北京的大学生们已经没有后退的路，他们除了用肉体阻挡着坦克的前进，一批一批倒下去的人们，又在愤怒和泪水在鲜血中奋起。他们拣起了铁棍向疯狂的军警们还击，把那些最猖狂的屠夫，悬吊在立交桥上，用火烧死这些畜牲，以表达他们对屠夫的仇恨！

北京城在火海和呐喊中挣扎！这番同胞相残的实景，比当年北京城里任何被镇压的学生运动，更惨烈！！

就连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也带着哭泣的悲声，把这件中华民族最羞耻的消息向世界播报！他们感到良知在受折磨，从而违背了统治者的意愿。那里发生了枪战，大学生们冲向电台，四百名学生倒在机枪的扫射之下。士兵冲进了播音室，那里传来了最后的枪击声，电视莹屏消声敛光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血腥罪恶的日子，这个罪恶是继土改时的清匪反霸屠杀地主富农和“反革命份子”；继文化大革命由中共挑起的红卫兵武斗，文革期间从严从重的杀一小批，又一次对人民大开杀戒，特别是，它发生在当权中共的眼皮底下，动用了阵地攻坚的坦克，令人格外震惊。

历史记载中共屠杀无辜者之多，罗织罪名之奇，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几十年来，杀人后把血迹和真像一盖，便由他们编造谎言任意篡改历史，向来是毛泽东的老章法！事后这些中国土地上血淋淋的故事，被紧闭的国门封锁了。

然而，科学进步了，发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六四血案，通过卫星转播，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目击了这场大屠杀的真像。

它非常鲜明的记载着中共专制王权的狰狞面目，也记载了邓小平的改良是多么伪善虚假！由此足以证明，只要中共仍在坚持共产党一党独裁，中国的社会不可能得以根本改变。

今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成千的爱国青年，在一天内饮弹天安门城下。与北京几乎同步，上海、天津、广州、兰州、成都相继演出了军警对人民的血腥暴行。传闻当时摄制的底片揍起来足有万里长城长。

我虽没有亲眼看到坦克碾过自由村的画面，但我们围听 BBC 台的报导，面

对这种在人类历史上对人权的公开践踏毛骨悚然。

根据卫星录相显示，北京发生的是，一个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动用坦克机枪，大规模屠杀和平抗议的人民，若问那里的人民在干什么？回答是，“他们在反对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猖狂的官倒。”

于是各国人民群情激愤，一致支持本国政府向这个丧失理智和人性的政府发出制裁通牒。海外华侨目睹卫视转播的中共暴行，愤怒的组织起来冲击中国的驻外使馆。

香港、澳门、台湾的民众组织了大规模的烛光游行，声援还在坦克履带下呻吟的学生。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从捍卫人的尊严出发，同声向北京这个反人类的政府发出声讨和谴责，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这场灭绝人性的屠杀。

那天晚上，收音机响着外台的新闻报导。我含着眼泪走出了那漆黑的小屋。

这一夜，我目睹着这座小城发生的一切——灰蒙蒙的夜空下，街上的人流如潮，沿着大街，头戴白花摇着白色布带的学生们，向区政府结集，呐喊声滚动在夜空，今天他们已经一反往日安静有序的状态，队伍里嚎啕的哭喊声此起彼伏，眼眶里沁着带血的泪呐喊着：

“侚子手放下屠刀！”“绞死镇压学生的侚子手！”“以血还血！”

他们向小城的百姓喊道：“凭什么要杀我们的兄弟姊妹？”“今天北京学生的噩运将降临在我们头上！我们正等待着明天，我们将被驱出校门，被押着去边塞充军，因为中共早已证明凡被定性为“反革命”和“动乱”的，那么已同这个政府结下了不共戴天大仇！我们今天除了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别无他路！”

听着这些发自肺腑的悲壮的心声，有良知的中国人怎不垂泪？！

我站在十字街头，看着一队学生，为首的头缠白巾，身穿白服，腰系黑带，拿着高音喇叭，向围观的市民读着 BBC 发出的最新报导，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他的眼睛已经红肿，一遍又一遍地向围观如潮水般的百姓喊着，仿佛此刻他带领着人们置身在天安门前，历史正在苦难中迈过这血腥的一天！！

游行向北碚的父老乡亲们喊道！“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坚持专制的中共当权者，已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纵容贪官污吏的绝境，现在又举起屠刀，你们可要看清！国人啊！同胞啊！赶快醒来，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求生呀”！！

触景生情，我的脑海却检索着三十年前的亲身经历：——

三十一年前也像在这十字街头，灯光拖着我和跌跌撞撞的身影，由长变短，又由短变长。周围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大字报和标语，校园里到处是批斗会的喧嚣，年仅二十岁的我，一个在“红色校园”里长大，既无涉世经验，更不懂政治为何物的“孩子”，却被同班同学围在教室里揪斗。

先前的羞辱感以及对生活追求的热情，已完全被恐怖和疲劳取代。

“为什么会这样？”潜意识发出了反抗信号，却被四天四夜连续批斗消融得干干净净。我蒙胧的认识到我之所以被戴上右派帽子，哪里是因为家庭出身？我单纯到向这个“党”去解释，我与家庭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关系，却没有动

脑筋问：“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两位从事教育的人，他们对社会犯了什么罪？”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和消化这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时，那些年龄与我相同的同班同学，却向我投射轻蔑的眼光，狂喊着：“休想蒙混过关”。

在极度需要睡眠的条件下，曹英这个恶棍要我交待永远无法说清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机！”要我戴上国民党遗少，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承认为资本主义复辟充当帮凶，梦想从中共手中夺取“失去的天堂”！

那时我只有哭，我怕！我怕将我从此赶出大学求学的课堂；我怕，我不敢想象我会从此落入囚犯的行列；我只好乞求！我乞求共产党的饶恕，在我的脑海里除了设想这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外，我是无法解释并面对这一切的！

然而，当我匍匐着向它乞求时，我听到魔鬼奸诈的狞笑声，“要你充当杀一儆百的牺牲品哪，懂吗？！”

我被送到荒野的深山和农村去参加人民公社“大兵团”作战的劳役，去体会大炼钢铁的苦役，去领受饥饿奴役。

这时候我的一位“老师”才告诉我什么叫玩弄政治权术，并且帮助我悟出了“阶级斗争”的真正“用意！”我才开始明白，已经被毛泽东推入社会最底层的我，原是专制狼爪下的一只小小绵羊。这里面既没有“误会”更不需要“解释”，我渐渐看清楚这毛泽东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一心为当皇帝挑逗百姓自相残害以取乐的魔鬼。

残酷的炼狱使我们的幻想终于破灭，经过二十多年漫长的时间，我懂得我们青年时代，被暴政剥夺了求知的追求，尤其使我明白，我必须面对掉进地狱的现实，抛掉麻醉自己的幻觉，最后认识到在独裁统治下，读书是没有前途的。

学者教授纵有满腹经纶，不照样同我们一样，戴上右派的帽子忍受着饥寒交迫，在皮鞭下，歪歪倒倒的在水田里种试验田；去深山野谷中挖铁矿，肩挑背磨从山里运出来；在山林里充当扛坑木的苦力；在烟尘弥漫的土高炉中呼吸有毒的空气炼成一堆一堆废铁！！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猛然清醒，我们“接受改造”的过程是一场冤狱里的炼狱，我们的同难成批成批饿死累死在荒山野岭中。当魔鬼将我们这些清白无暇的学生推到炼狱之中，就成了我们觉悟的开端，所以苦难拯救了我的灵魂！！

今天，中共的后继者仍在回避它的过去！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要我们忘掉过去的历史？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三十年来所见中共所作所为，剥开画皮，让所有的国民都明白，他们怎样制造饥饿，还要逼着快饿死的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又怎样制造武斗，让无知到学生们相互拼杀；他们又怎样让孩子们为了“统帅”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去死，到死时自己腹中空空，衣不蔽体。

今天，专制主义旧病复发了！中共的独裁再次向和平人民举起屠刀！！

（五）历史会记住这天

忽然，我的眼睛一亮，就在中山路的十字路口，在那幢最高的建筑屋上，垂挂下一幅巨大的大字报，醒目的写道：“我们是几个老共产党员，当初我们怀

着对共产主义理想幼稚盲目的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幻想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望。”

“想不到这个党执政几十年使我们饱赏了一切苦难，几十年来我们盲目的执行着它的政策，结果一个国家反而被弄得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我们同老百姓一样，尝到它对国家建设的破坏和对文化毁灭”。

“到了今天贪污成风，民怨沸腾。当我们看到它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时，我们的心颤抖了，今天我们深深为作这样政党的一员而感到羞耻，**所以我们今天向全体市民公开宣布，我们集体的退出这个政党。**”

落款的地方写明，北碚邮政局的几名工作人员，并签上了他们的名字。

看来中共是该回到被告位子上，接受全民审判的时候了！！

记得罗曼罗兰的名言：“人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追求真理，发现真理，热爱真理，为真理而牺牲自己。”这张大字报表达了当年几个投身革命的青年如何迷信共产党的宣传而加入这个组织，但是事实无情的纠正他们初衷的盲从，而毅然宣告退出这个政党。

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一天我同李伦去重庆单独出差的机会，讨论到六四运动，他的表情十分沮丧，叹息道：“在我的一生中，参加中国共产党恐怕要算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中共党员对中共领导倒行逆施的这种认识，代表这个党的基本群众的共同认识。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靠着邪教，欺骗而夺得江山的共产党现正从强大走向灭亡。

老天保佑我，能亲眼看到它衰亡的过程，灭亡的结局看来是天天临近了。

如果陈力张锡钰刘顺森皮天明等等，当年为反对毛泽东专制而殉难的烈士们在天有灵，他们会对此而感到欣慰含笑九泉的。

如果他们有兴趣，不妨在这个夜晚，附在普通的三口之家的窗下听他们与电视机是怎么对话的——

电视机：“学生们阻拦交通。”妻子立即反问道，“静坐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怎么会到马路上去阻拦交通，这真是太离谱了。”

电视机：“学生们的行动妨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丈夫接口道：“静坐在广场上的学生们招惹谁了，他们又不是到工厂矿山去闹事，这个罪名简直‘莫须有’。”

电视机继续说道，“暴徒们围攻民警，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女主人回答：“这就更奇怪了，赤手空拳的学生怎么会对拿枪杆子的士兵动手，这不是找死吗？”

男主人接口道，“军队向和平的示威者开火，杀人太多了，激起了民愤，才有市民的自卫行动，不然学生们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对解放军动手脚的呀。”

这时候，小女儿从里屋里探出头来，报告说：“爸、妈 BBC 台最新消息，联合国正通过要制裁中国的决议。我在学校里学不下去了，大家都说书没法读，这个昏庸腐败的政府那天垮了，我才回校读书去。”

电视机里还在喋喋不休地报导“平定”天安门事件的真像：

“一部份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极少数人制造谣言，煽

动一些人设置路障，阻碍军车，抢夺军用物资，焚毁军车，杀害解放军战士，他们还打算第二天，（即六月四日）造成更大的暴乱事态，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在这个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命令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熄反革命叛乱……在戒严部队进入市区的过程中，一伙暴徒大搞打砸抢，抢走枪支弹药、杀害、绑架解放军战士和公安干警，部队不得不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严惩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六月五日清晨戒严部队全部到位，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

这就是中共的喉舌报导的天安门流血的全过程，然而中共当局忘掉了高悬在中天的天地良知，忘掉了地球卫星已拍下了整个事态的全部过程，并将这些真实的录像公布于全世界，如实地报导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按中共的说法，手无寸铁的，已被绝食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学生，忽然变成全付武装，青面獠牙的魔鬼，也不知从那里暴发出的巨大魔力，焚军车、抢枪戒、杀士兵。按照这个说法驾着坦克的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不得不”严惩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可惜，今天的科学技术对信息的传播能力已不像二十年前那样，可以由毛泽东封锁和篡改历史了。

“有消息说，北京发生的焚烧军车的事是军人自己干的。”如果确实如此，中共今天也堕落像当年日本野兽进占卢沟桥的故伎重演。还有消息说，北京“六四”事件之前，执行戒严任务的军队接到上峰密令，“对一切阻拦者，格杀勿论”，这是可以从执行屠杀任务的军人那肆无忌惮的疯狂证实的。

如果没有上面的密令，加上封官许愿的刺激，面对同胞，军队也难以发挥出如此疯狂的兽性。

人类有时简直比动物凶残百倍，因为他们有掩盖罪恶的能力，而动物却没有。人在丧失理智时，比猛兽更可怕，他们可以无缘无故地杀害自己的同胞。！中国人的悲哀，大致出自一群丧失人性的“革命家”！

我想但丁的神曲里，地狱的第十圈外应当增加第十一圈，那一圈就是为假革命者和独裁者准备的，他们死后所遭到的报应，应比所有的恶鬼酷吏更严。

我前面讲的故事，还没有收场。当电视机播完了这一段以后，那男主人再也按捺不住，走到电视机前忿忿地关上电钮，对着那黑黑的屏幕大声喊道：“谁还不知道你们这一套贼喊捉贼的假新闻，今天明摆着你们出动的是坦克，机枪来镇压无辜的学生，怎么颠过来反说学生在杀你们的人，中国的百姓真被你们一直在当傻瓜耍啊。”

陈力，张锡铭，刘顺森们，你们听见了么？你们今天在天堂，为天安门城下浩大的学生和市民奋起的队伍而兴奋吗？

算起来陈力牺牲了十九年了，张锡铭也牺牲了十四年了，当年只有你们喊出的声音，今天已成为普通百姓的共识了！！今天老百姓那一个不唾骂这个凶残贪婪的统治集团？善良老实的中国民众已从中共的欺骗中清醒过来。

我相信，我会亲眼目睹，这个实行专制失去民心的党走向灭亡的那一天。那一天我一定备酒到盐源的山岗上与你们一道共庆。

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再以与会国联合的形式，向中共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停止这种暴行。国际金融组织一再对中国政府的这种暴行实行制裁。在全世界人民的强大声讨声中，中共当局竟然无耻的公布如下“六四”伤亡记录：

“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共 6000 人受伤，数十人死亡……暴乱中有 3000 多名非军事人员受伤，200 多名死亡，其中包括 36 名大学生，……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同时，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贵阳，哈尔滨，兰州等一些大城市接连发生暴徒冲击执法机关，残害无辜等严重事件……。”一贯黑白颠倒，中共真面目百姓看清了吗？

为了歪曲六四真像，他们在以后的时间里在报纸上、电台、电视，连篇累牍的刊载暴徒袭击民警的暴行。由中共举行“为六四事件牺牲的英烈记功表彰大会”这些蒙骗国人的手段，令人肉麻。

可是这一次不可比 1976 年的“四五”事件，这次无论在参与者的广大，市民觉悟的程度都大大的与毛泽东当年不同了。

这一次，普通百姓家里家家都在抨击当局的无耻颠倒！北京死亡的学生岂止 36 名。

仅北师大教授丁子霖女士，在当局极端封锁下，徒步走访登记六月三日晚，有姓有名的死难学生就是 155 名，另有 65 名伤残者。这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仅北京一地死于这次中共暴行的不会低于数千人！

“六四” 已永远铭刻在中共的历史上！

第三节：“六四”以后的那几天……

七月初，我借出差重庆的机会，顺便走访了重庆大学同划右派的老同学，想听听他们对‘六四’的见解，顺便也想了解重庆大学的学生在“六四”运动中的具体行动。

早上十点钟，当我顺着汉渝路重大的后校门支路，走到松林坡杨家铭家。刚刚跨进她家的门槛，她连忙关上门，屋里门窗关闭，显露出十分紧张的样子，开口的第一句话竟向我问道：“你怎么这么大胆，这几天是什么时候，还敢东走西窜的？”我被弄得十分的惊奇，反问道：“我又没做错什么事，何来畏惧？”

她凝视了我好几分钟，像是在试探我似的，用一种十分神秘而略带恐怖的眼神望着我说：

“你在工厂还不知道吗，这几天学校水紧得很，全校正在大清查，凡是六四期间上了街参与游行的人，都要由学校保卫处进行登记，算有了新的‘历史污点’。有的头头已被隔离反省，听说正在甄别，有的要逮捕送监，有的遣返回原籍下乡落户，轻的也要开除学籍。”

好了，一股正义热情涌动下反腐败反官倒的人，现在却要面临锒铛入狱的下场。学籍没有了，前途渺茫，当年我们曾有过这种亲身经历的痛苦，而今却要这些孩子们从蹈我们的足迹！

我望着面前这个三十年前同在南桐丛林沟与我共过患难，现今已白发苍苍的老女人，一时不知该向她说什么才好。

中共这一套用运动整人，制服学生运动的手段我已领教过了，从这位老同学的身上，使我深深感到历史伤痕多么深的刻在我们的身上。难道中国的命运就这么长期操持在几个寡头手中吗？如果大家都被红色恐怖吓成这样，中国的民众还有什么希望？

我们相对的默默坐了两分钟，看得出她越来越不安，啜嚅着告诉我：“昨天党支部书记还专门上我家来过问，最近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时值七月盛暑，四周的门窗却紧紧关闭，闷热的空气使我大汗顺着脸颊淌下来，而心却像冰冻一般，一阵阵战栗。知道刚刚她的话已是逐客令，便立刻站起身来，告辞出门。

当我离开松林坡，朝着汉渝路往回走时，心里说不出的懊恼。看来我完全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跑到学校来，中共对付学校和学生的那一套，依然没有变。今后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校园永远不会是学生们安心攻读的乐园。

举目望公路两旁的水泥电杆上，还残留着六四那几天学生贴出的标语残迹，那激愤的人流仿佛还在眼前，耳中还响起那激昂悲壮的口号声和歌声……

专制！令人泪咒的中国独裁，中华民族还要驮着你走多久？中华民族还要为这具僵尸付出多大的代价？中华民族的民主前途究竟还有多远？今天我算是又上了一堂沉重的课。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如当年在狱中一样的沉重。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想去拜访一下隔着一条龙凤河，住在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的程贻举，因为他当时已是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想来可以在他那里采访到在六四中，民主党派发出的声音，了解他本人的态度。

当我走进他的家门，也如杨家铭的家那样，大热天窗门紧闭，连窗帘都拉下了。他见到我时同样面露恐惧的表情，决不比杨家铭更好，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后，他告诉我说：

“北京这次全国八大民主党派，都参与了声援学生运动的游行。现在已将这次运动定性为动乱，八大民主党派看来又一次在重大政治关头‘站错’了队。一如当年反右派运动一样，现在只有听凭（中共）党中央‘发落’了，我们都等候着中央的处份！”

说罢脸现阴沉，很失落的样子。看到他的面容，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平时一贯在中共鞍前马后，侍候主人的奴婢像！

既然他不敢直言说“六四”孰是孰非，却在小心翼翼地等着开庭审案，未免替他感到汗颜。也罢，就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天牌人物，还不是一付唯唯诺诺的相，除了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日子，以“帮闲者”的身份出现，坐在主席台上，貌似木雕，平时是不敢轻言表态的。

看见他的秃伤样子，我也找不到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只是重复的说，“大家上街和平请愿，实在是对腐败已经看不下去了，还不是为了中国好，希望政府知过而改。我们每个中国人在六四期间问心无愧，你也不用担心。”

一场恐怖过去了，留在人们心坎上的又是一道深深的鞭痕，无论是自己烧自己的军车嫁祸于无辜的学生和市民，还是军人驾着坦克屠杀学生，罪魁祸首都是明白无疑的，罪魁的目的也是明白无疑的。只有目击事件全过程的北京市民，都清楚记住这些军人的番号。

北京市民因此在未来的岁月里，长期将遗恨放在四川人身上。

两年后，我因公出差北京，有一次我的同事操着四川口音向一位北京市民问路，这位北京老乡向他直翻白眼，眼里透出极其鄙视的神色，白了他一眼，什么也没回答他便走开了，口里带着鄙夷的口气骂道，“四川猪！”

看到这种情景，为了防止在北京遇到更大的麻烦，我只好决定，在北京期间任何人上街都不要同当地人说话，凡事都由我操东北口音向当地的老百姓询问。人民之间竟因六四如此隔阂！

其实惨死在“六四”中的，无论是学生工人和居民，甚至是军人过后都应当清楚，他们都是专制和腐败的中共政权的牺牲品。

在这些牺牲者中唯有投入静坐绝食，要求中共当权惩治官倒，惩办贪官，放弃特权，放弃独裁实行真正民主的善良学生们，才是这次运动的主角和英雄。可惜他们没有组织起一支足以摧毁中国专制政权的大军。

在六四中以屠杀学生而暂时占上风中共独裁势力，效法他们的老祖宗毛泽东，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开始了又一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赵紫阳被软禁；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大学院校，开始了搜捕参加六四爱国运动的领袖和中坚人物，大搞人人过关，层层清理。

北京市把在六四中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陈希同推上了北京市长的宝座，由他负责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发起人狠下毒手。

当时由北京军管会发出通缉令，通缉著名的民主运动领袖严家齐，万润南，陈一谔，以及学生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方励之，李淑娴，追捕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努尔开希，王丹等一大批精英。

当时落入军警特务魔爪的人，数以万计，一场真正的白色恐怖笼罩了各大专院校。对六四参与的学生登记，并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劳教。

三十年来无论是我们这些不更事的少年，还是老教授们糊里糊涂的被划为胡风份子还是右派，糊里糊涂的“认错”，后来又将这些糊里糊涂的人，押到边荒农村糊里糊涂的流放，像牲口一样的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鞭打，残酷的折磨使他们大多数人死在流放地的深山峡谷中……

三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招唤民心，同全付武装的军警搏斗，在两个月中把中共的内部矛盾，和危机四伏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余。

尤其是在强大民心的催化下，中共政权一度汲汲可危，而它的内部也在这种民主潮流中分化互解，弹指一挥三十年，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每一个人都看到中国，决不是中国独裁势力能所欲为了。

1989年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题目便是“公审”赵紫阳。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中说：“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

赵紫阳是邓小平一手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仅仅几个月又把他打翻在地，这既说明共产党在失去民心的作用下已乱了阵脚。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气势汹汹以叛徒罪名将赵紫阳“永远开除出党”。更没像斯大林对付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处以绞杀。

邓小平看到史大林，毛泽东众叛亲离的晚年，他想逃避焚尸扬灰的厄运。他的内心又是何等虚弱。

李鹏在这个报告中不是公开承认，当时中共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上么？实际上独裁的中共，不得不在专制和民主的较亮中，修改一党独裁的脸谱。

如果赵紫阳能与邓小平相抗衡，实际上反映了共产党已经到了没有主义的时候。所以六四事件虽然又牺牲了许多为民主而战斗的年青人，中共也不得不答应，严惩贪官污吏，放宽党禁。让各民主党派稍稍有一点生存的余地，敢于在某些问题上行使监督的权力。

当然，邓小平自己便是毛泽东的叛逆，他知道赵紫阳所做的仅仅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赵所主张的，不过是政治体制向民主方向再迈进一步。对于学生运动残酷镇压的决定，也让邓小平足足犹疑了两个月，毕竟国内日渐猖厥的腐败是他的一块心病。

所以，在六四学潮的推动下，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坚决”把惩治腐败作为头等大事，特别要注意抓好的决定。

1989年下半年以反贪污，反贿赂为主要内容的运动，便掀开了帷幕，8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公告》规定，贪污份子必须在10月31日前向政府自首坦白，8月19日监察部发布《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待问题的通知》，说明中共中枢机关不敢对六四事件无动于衷。

他们明白，逐渐腐败的政府正坐在失去民心的火山口上，再不整治将会使整个统治大厦崩塌，但是它却不想用人民的力量，自下而上的开刀这个肿瘤，而是采取了一个内部的行政命令办法来处理它。

这就正好对烂疮自己下刀，烂疮是永远割不掉的。事实证明中共这些年来贪污之风越来越严重，贪污腐败与专制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仗着不受约束权力的掌权者，对另一批同样掌着权力得到贿赂的人实行整肃贪污，能治得了谁？

事实上，对六四的镇压，客观上放纵了中共各级贪污的胆子。从九三年开始全国纪监机关自己公布的数字，贪污贿赂案件以每年9%的速度递升，而受到党纪政纪处份的官员，又以12%的速度递增。从中共检查机关1990年至1998年共受理各种腐败案件达110万件，立案五十余万件，涉案人员达六十余万。

后来为了专制，中共的独裁头子江泽民喊道，“对腐败现象如果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而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也要失去党的执政地位。”他的担忧是必然的，但他的惊呼丝毫没有阻止中共腐败的大势。

到了跨进二十一世纪，据中共自己所公布的资料，新华社2004年公布，1月——11月查处的贪污贿赂以及各种渎职侵权的案件3650件，涉案人数42225人，比2003年增加了五倍。足以说明中共的腐败已病入膏肓，整个的国家行政管理可以说是无官不贪，甚至于还出现了所谓59岁效应，官吏在退休以前都要大捞一把的事，成为国家机关腐败的公开现象。

89年8月15日国家审计局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公布了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等全国最大的几家公司的审计，对这些公司的内幕没有公开。但据传

它们与中共天字第一号挂勾，并由太子党的实权派所操纵，并以这些中共的实权派为后盾则是明白无疑的。

这些公司，从事私自买卖外汇，倒卖国家紧俏商品和走私偷税漏税数额之大要以亿来计算，由于劣迹昭著加上统治集团的内讧，五家公司被责令追交了五千万税金了事，实际上这些公司都是当权者私人资本的基地，以后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以分赃并保持着相对平衡而相安无噪。

5月19日监察部发布限定全国的贪污份子，规定在10月31日的最后期限主动交待问题的通知，本身说明中共的大小官吏无法无天，全无顾忌，若不是六四的推动，监察部也不会向全国大小贪污份子发通谍了。

现今限期已到，检查机关随后公布战果，在这一阶段受理投案的人达到三万多人，中共自己十分明白这个人数只是事情败露，没有必要再隐瞒下去的小鱼小虾，真正的蛟龙还藏在深水处，永远都不会触动他们。

当时社会流行着，“大鬼坐衙门，小鬼跪阶下，三堂审贪官，只给外人看”这样做做样子势必还要使中共更进一步腐化。到了2004杀了一个广西大员成克杰又怎样？不在制度上下功夫，中共的灭亡是迟早的事。

设计师因在国人中名声太臭，不得不引咎退出政坛，转到幕后当起太上皇来，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算是对六四运动的引咎自责，无论怎么说，他交出了军权。从此个人专制主义的标志，行政长官终身任职的权力，在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取消了。

但是中共一党专制仍顽固地保持下来，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震慑下，统治集团从新改组，一方面清理赵紫阳这样的政治异己，另一方面为缓和国内矛盾，在肃贪、扶贫、禁毒、平抑物价、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等方面作出一些收揽人心的动作。

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次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决定，从1993年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进行体制改革，毛泽东最后一点僵死的国有模式终被冲破。

然而顽固的中共独裁势力并不会因此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血腥镇压六四后，将六四领袖人物驱出海外，想以此消除他们在国内的影响。

流亡在外的民运精英们，纷纷组织民主政党继承发扬六四革命播下的种子，继续同中共的独裁势力作斗争。

1990年1月，北京解除戒严令，并对王丹等人进行审理，尽管这是违背民意和宪法的，但比之当年毛泽东对政治犯的赶尽杀绝，殊及无辜，无中生有等等暴行就缓和多了。

同年6月28日一直在美国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的政治犯方毅之，李淑贤夫妇得到准许让他们赴美“治疗”，使他们得以流亡海外。

令人感到惊心的是，邓小平用坦克对付‘六四’却给毛泽东这个恶棍找到了腐尸还阳的借口！一股专制腐败势力在民间蠢动，使毛泽东恶名得以抬头，他们把政府贪污腐败以及学生闹事，归结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不但这魔头当年所犯的累累罪行没清算，还公开鼓吹：“只有毛泽东才会禁绝贪污腐败”。

中共后极权时期为了防止老百姓打倒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强行灌输的文化遗毒，根本不清算，只将露骨的文化独裁收敛了起来。毛泽东‘愚’录，虽没有再泛滥，‘欺’世歌“东方红太阳升”，“大海航行靠舵手”却没有列为禁歌。

尤其对几千万的饥民被饿死，人民一贫如洗，人民之间尤如野兽般的相互残杀，知识份子在运动中大量被虐杀，流放，人性已普遍为兽性所替代，父子不相识，兄弟相残等极其严重的罪恶，并没有得到清算。

我原以为，毛泽东专制遭到否定后，在信仰危机中，应当出现一个对独裁的批判时期。但事与愿违，连我写这个自传时，仍处在担惊受怕之中，并出现了“只有毛泽东才会像恶神一样镇住贪污、腐败和烟毒娼妓”等等奇谈怪论。由于历史相去越来越远，这种奇谈怪论竟成为民间舆论就更令人深省了。

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现过一点“伤痕文学”却像小媳妇那样嘤嘤哭泣了一阵，便很快消声了，1981年由白桦编写的‘苦恋’，哪怕是哀诉独裁对知识分子任意残害的作品，都遭到党阀们的口诛笔伐。

午台上，千方百计掩盖独裁统治下残酷斗争和冷酷的人际关系，表现那个年代竟是：“纯真可爱，开诚布公的人际关系。”我举一个最露骨的电视片“真诚年代”，那是彻底歪曲了当时的社会关系！令人呕心。

今天，大陆上再有才华的作家提到毛泽东如骨梗喉，要末继续写‘愚民作品’，要末写些无聊的武侠艳闻，或家庭纠纷的低俗东西。

邓小平一方面顽固坚持把毛泽东这个死人像，照样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以对付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大肆宣扬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这个时代中共政策的两手，然而毛泽东的罪恶不得以清算，中国的独裁不与扬弃，中国社会就始终难以进步，这一点也是六四失败的原因。

人心背离促使中共进一步的分裂，‘六四’后，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赵紫阳，于2005年1月14日在北京含恨去世。六四以来拒绝中共要他承认六四期间所犯“路线错误”；拒绝承认学生在六四事件中使社会动荡的指控。

他以行动证明，中共在八九年的历史关头已不是一个意志统一的，目标明确的执政党。并说明中共除了用军队和暴力来实现它的集权，别无他法！证明当前中共内部的腐败正在酝酿着巨大的社会动荡。

而我们这些经历了这几十年中共暴虐的人们，看到中共这种内幕，要想社会长治久安，必须从新建立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和经济发展协调的民主社会。

最近在世界主流思潮推动下，许多知名的学者，不怕中共打压，在08宪章的签名运动中，签上自己的名字，这证明“民主”已逐渐成为大家追求的共同目标，坚持独裁的中共顽固派睁开眼，不要等着被历史唾弃那一天。

今天“六四”那一尊在自由村里树立起来的民主女神，像一轮朝阳，照醒了亿万昏睡的人们，接着又在悲壮的歌声中缓缓离去。

‘六四’之火虽被中共享血腥手段扑灭，但是放开眼看看世界，‘六四’期间戈尔巴乔夫造访北京，学生运动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共产党所建立的奴隶制，被撕下他们狰狞面具后，再也难于维持下去。

这一年东德人民在古城莱比锡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民主改革，11月9日德共在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放宽东德公民出入境制度，随之东德人民拥

上柏林街头，自发用锤子榔头电锯敲打柏林墙，建于 1961 年经历二十八年之久，1989 年 11 月 10 日，人民终于推倒了这堵 155 公里长，对东德人民禁锢与奴役的墙。墙倒之日东德人民欢声雷动，喜迎德意志祖国统一。

叶利钦在苏共中央成立民主纲领派，1990 年 9 月民主纲领派退出共产党，并在竞选中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早在六十年代，中苏两国互争‘领导权’的共产党头目，早已分道扬镳，社会主义阵营早已解体。

1991 年 8 月 19 日叶利钦当选为首届俄罗斯总统。苏联成为历史名辞。

中共可以在大陆这块落后的封闭故土上，用暴力继续维持他们的独裁，然而，违背民心和民主潮流的反动能坚持走多远？大陆筑起的坝，终有倒塌的一天。

以后每年到六月四日这一天，不独北京的独裁执政者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我们更透过当局的层层封锁，听到来自全世各个角落中国人讴歌六四的纪念歌声，这歌声带给我们多少怀念和思考！。

第四节：从游行想到的

1999 年 5 月 9 日凌晨零点，我被一阵口号声从梦中惊醒，坐起身来，侧耳倾听。楼下的街道上人声嘈杂，由手提麦克风传出来的口号声，和人群中有节奏的呐喊，汇合在一起，虽然有些混杂，但仔细分辨仍听得清楚。

其中频率最高的呼喊声分明是：“强烈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行径”而那有节奏的呐喊是：“中国，雄起，……中国，雄起”。口号和呐喊在刚刚入睡的小城上空汇集在一起，显得非常的刺激。

我马上想到昨夜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已播出：“五月七日晚，北约的三枚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致使大使馆被炸毁，三名驻南记者遇难，一名失踪，二十名使馆人员受伤”的消息。

同时还播出了中国政府所发表的严正声明，称：这一事件是北约蓄意对中国的挑衅……云云。在表达了愤怒和谴责后，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力”。

与此同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处理这一事件的紧急会议。随着，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相继发表声明，拥护政府维护主权尊严的严正立场。

此刻我已明白，北碚的两大院校师生，现正走出校门组成游行队伍，表达他们的“爱国心声”。

我连忙从床上翻身坐起，很快穿好衣服，走下楼来。只见一支大约几百人的队伍，经我们住的大楼前，向着天生桥方向前进。

从队列后面向前看到最前面的几排学生，用身体并排地裹着一付红色的横幅上，猜得出是抗议北约“暴行”，捍卫民族尊严的内容。

领头学生两旁及队列周围，稀稀拉拉跟着几个手执麦克风的年轻人。口号

声正是从这里发出，再由游行人们合着节拍响应而成。

学生队伍后面是一群住在附近的市民，他们进进出出人数不定，最后面跟着十余两出租的士，大约是些专跑夜路的青年司机，跟着“看热闹”，也顺便给中途从游行队列中退出，准备回家的人，提供一点交通方便的。

出租车队列的后面，便是十几名骑着摩托的武装警察“断后”，人声喧哗，似乎并没有人专门去注意他们的“特殊使命”。

就这样，这个由学生、市民、出租车和警车组成的队伍，在狭长的街道上排了足有一百多米缓缓前进。在昏暗的街灯下，我认出他们是附近的工人和居民，商店的营业员、三轮车夫、小饭馆里的服务人员，以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下岗工人们。

我插进他队伍中，想听听生活在社会下层老百姓的议论。

自从 1989 年‘六四’学运以后，我已整整十年没看到学生们组织的规模壮观的游行队伍了。但眼前看到的这支队伍，无论在规模和情绪上都无法与当年的‘六四’相比。

平时他们聚在一起，多半都花在麻将桌上那点事。而今天，他们都以好奇的口气，议论着从早到晚电视里重复播送的消息，发着莫明其妙的提问。

“克斯握是什么国家，在那里啊？”一位小饭馆的中年女人，向她身旁的一位戴眼镜的附近小学的教师发问道。

“北约在那里？为什么要轰炸中国，他们隔我们很近吗？”一位工人打扮的人向他身旁的老者发问道：“我们在这里干吼干闹的，美国政府会理睬么？”

尽管政府所掌握的媒体、报纸、电台和电视天天都在宣传报导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战争。但从周围人们令人可笑的问题中知道，除了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南斯拉夫的地理位置，以及在那里发生的民族冲突和近期以来发生的战争。

这种漠不关心，正是中共长期愚民所造成的。

‘六四’后在中共统治下，长辈们对年轻学生的担心一直没有消退。上年纪的人还用十年前看‘六四’老眼光，认为学生上街，又不知为反那一个贪官？

至于那些新近下岗的失业者，他们被面临的艰难生活弄得心力憔悴，所以一看到游行队伍马上就敏感到，又不知是那里生活不下去的失业工人，被迫起来向政府请愿；或者就是那条街的拆迁户，因为所住的陋室被房屋建筑公司老板强行拆迁流落街头时，被迫起来向政府呐喊请愿。

居民们在游行队伍中相聚，各聊各的家常，干涉那些刚从床上被闹醒，跑上街看热闹的自家孩子，且听他们的对话：

“你们厂的下岗生活费定了么？”；

“孙二娘的下岗饭馆昨天才开张，张嫂的擦皮鞋摊证是昨天向段上去要的，擦皮鞋还不错，一天也挣个十来块钱，相当于吃低保了。”

“这该死的江泽民把我们工人是整惨了，今天可不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工人们都下岗讨饭。”

“娃儿要读书，学费书费往那里去凑钱，生活这么贵，低保费就只有百十元怎么活呀？我们家的小三，小学毕业就只有上街卖报纸了。”；

“去当棒棒吧，可是那有那么多请棒棒的？”；

“李二嫂就只好去干那事，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她，在黄昏时候去守电杆”；
“拾破烂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家的小子也干那事，每天满街头拣烂纸，一天下来只能拣两块钱的东西。”；

“昨天西师的员工宿舍又发生了杀人的事件，警察出动时杀人犯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社会乱了套，晚上我就关照我们那口子，不要上街，谨防半夜三更撞上鬼”；

“封三哥两个娃儿都沾上了毒瘾，你们的小二要小心，他常常与封三哥鬼混，那天说不准撞鬼，怎么死在下水道里还不知道”；

“前天开到璧山去的公共汽车，又发生公开的抢案，那趟车上，余二哥被杀成了重伤！”

“你们知不知道天生街段自杀的那两口子，失业几年了，女的又有病拖着两个娃儿，段上的人去处理，那住的地方比狗窝不如，屋里没有一样象样的家俱，两张破床上没有一床好铺盖……可怜丢下两个娃儿，唉！”

我身后的两个年轻人却另有高论，一个说：

“这世道太不公平了，穷的穷富的富”。说着他指了指身后不远跟着的摩托民警唱道：“一等公民称公仆；二等公民叫大款；三等公民算倒爷；四等公民大盖帽；五等公民公务员；我们呀是新生的无产阶级”。

另一个接着说：“谁叫我老汉是穷工人。原先说地主、资本家骑在他的头上，现在啊，五等公民骑在我的头上了。

忽然队伍中不知是谁爆出一声：“江泽民雄起”的喊声，队伍中原先有节奏的“中国雄起”喊声中，在人们的笑浪声中掀起轩然大波。于是“中国雄起”的口号声变成了“江泽民雄起的”呐喊。

一种对当局的无奈，点燃了这支队伍的后半段，而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乘坐摩托的刑警们，若无其事的任队列中怎么喊，只要不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江泽民的口号，谁又愿意去干预那些分明有怨恨情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

此时我随着游行队列走到了隔西师大门不远的上坡马路段。原先在月亮田参入游行的人纷纷走出队列，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渐渐散去，但“江泽民雄起”的笑浪声，却并不因此而减退。

好在这年头不像毛贼东年代，动不动用暴力对付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现在老百姓在私下可以不避‘皇上’忌讳，说些不为当局喜欢的话，那也仅限于‘私下’，这种有限的牢骚话正反映了民心失去，中共已处末代。

国民政府时期，组织民众游行示威以反对政府，是中共欺骗民众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共建政后，依然用民众游行作欺骗民众的重要手段。此刻，处在游行队列中，六十年前的往事不断在我脑子里涌现：

记得 1950 年年底的一个晚上，夜空中突然飞起了几道耀眼的照明弹，接着位于嘉陵江边解放台，传来了隆隆的礼炮声，不一会安在自来水塔附近的高音广播喇叭，传出一个宣布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当夜地处北碚附近几所学校和机关就在老新华书店，举着火把在川东行署官员指挥下举行了这座小城的第一次环城游行。以后每年‘五一’和‘十一’都要在解放台举行游行庆典，

建政初期那三年，都会在这里举行杀人的‘公判大会’，每次要求学校组织参加，使每个参会的学生领会那种‘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惨景，这便是中共特有的‘洗脑’方式，那时红色恐怖笼罩着大陆。

1953年以后，这种游行庆典成了‘制度’，开会那天九点钟，所有该到会的单位到齐后，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唱国歌，按惯例三部曲一完，到会者原地坐下。

各“领导”在主席台前相继讲话，内容都千篇一律的口水话。但对于盘腿而坐的我们，则是最难熬的两小时，直挺上身正襟危坐，就是练了几天禅功的人，也要逼出一身大汗，每次游行前又要举行贯常阅兵典礼。

1955年，我考入重庆大学后，这种每年两次由官方组织的游行，在重庆市中区解放碑举行。前去参加的单位是指定的大专院校和机关，人数也有规定。

参加单位准备了象征性的大彩车，那是按照组织者的意图，制成的钢铁厂、发电站或农庄的模型，车上盛装的彩男彩女，在游行时，挥动花束向周围的围观者致意。

游行队列中最打眼的是由重庆军事院校组成的队列，他们在列队通过解放碑的检阅台时，礼炮齐鸣，坦克和军车隆隆开过，步兵方阵整齐的迈着阅兵式规定的步伐，接受重庆部队长官检阅。

队列中举着：“随时准备粉碎来犯者”的巨幅横幅，其势杀气十足。现在回忆，这样的游行示威完全为了镇慑老百姓，同时也是做给民主世界看的，此乃毛贼东全民洗脑的重要手段！这种庆典，也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

可怜的大陆百姓在这种长期折腾中怎么不穷！除了吓唬老百姓外，起得了什么作用啊？

1958年5月末，我已成了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在指定管理教师的监督下，参加了校园里的游行。

反右刚告一段落，校园里的“阳谋”暂时收场，二十多名下放干部在一片喝彩声中，被校方戴上“光荣下放”的大红花，簇拥着登上披红戴绿的彩车，游行队伍锣鼓齐鸣，绕校一周以示告别。

吃过午饭后，我们这七十多名已被认定为第一类极右派，打好了自己的背包，连人带包的塞进了几辆卡车中。在干放干部乘坐的包车押解下，离开了学校，向南桐驰去。我就这样结束了我十五年的学生生活，并从此告别了校园。

这一去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惨痛的遭遇，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幼稚期。

我在蒙懂中开始了我长达二十多年的练狱，监狱的‘年轮’在我身上刻了整整二十圈。

当我从死难者身边走过，我暗暗发誓，我不能死，爬也要爬出这地狱，把我所亲身的经历写成书，永远留给后来的中国人！！

中共自吹自擂，把这种非人的折磨，说成是无产阶级对反动派最人道的改造，说只有那样，才能脱胎换骨，改造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经历这种‘改造’后我才明白，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

至今这种法西斯专政并未向公民公开揭露，施暴者没有向受害人道歉，那些遍布全国的集中营（劳改农场和监狱）并未撤除，里面还关着异议人士，甚

至反抗中共压迫的老百姓（例如法轮功信徒），继续进行见不得人的残害。

像眼下南斯拉夫使馆被北约导弹轰击，发生中国驻外使团人员的伤亡，在真像不明朗时，煽起学生毁坏外国驻华办事机构，举行游行示威，又是多么危险的玩火行为。

反过来说，一支为声援政府抗击外侮的游行队伍，却要用警察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岂不是对游行者的莫大讽刺？由此可以看到中共统治者与老百姓存在的距离有多么远？当然这种对立，中共又要千方百计掩盖了。

其实在民主社会里，发生歹徒危害社会时，决不会大惊小怪，因为人民会起来制止少数人的为非作歹。如果人民真到了对危害自身的行为熟视无睹，那么这个国家用什么来抗卸外侮？

第九章：在中共摧残下我的家解体了

母亲几天来经常感到气紧心悸，加上夜尿频多，想去医院检查一下，这天，打定主意到距我们住地二百米的九院分院去。

看看壁上的挂钟，正好是十点半，于是我马上向医院内科室挂了一个电话，询问陈开第医生今天是否值班。这年头的大陆上，什么都要讲“熟人”，尤其是看病，非熟人莫去就诊，成了医道的行风。

电话中回答陈医生正在查看病房。

我自己因为要弄中午饭，便请临时请来专门为母亲做清洁的钟点工小周，陪伴母亲去那里就诊，关照她，母亲已八十四岁高龄，虽然表面看，她身板还硬朗，但由于遭到长期折磨，加上年事已高，每晚我陪她出外散步一个小时，总是我牵着她走，生怕在不经意中跌倒，造成意外。

没料到母亲走后才十几分钟，电话铃响了，小周打来电话，说她们刚到医院，母亲就在门槛上跌了一跤，现在正在陈医生办公室里，要我马上来一趟。我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我急忙丢下厨房里备好的小菜，向医院走去。在陈医生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她坐在椅子上痛苦地呻吟着。

陈医生告诉我，暂时无法判断母亲跌伤了那里，从她痛苦的表情看，她的右手和右脚都摔得不轻！小周把我带到医院的进门处，那是一扇双开的活页门，小周指着进门的门坎上一道高五厘米的阶梯说：“妈妈在进门时就是踢着那阶梯跌倒的，等我慌忙去扶她时已经晚了。”

我看了看那阶梯，内外没有色差，没有警示标志，加上这一天天气本来就阴暗，老年人在这里被绊倒是非常容易的。

回到陈医生的办公室和他商量怎么处置母亲？他说：“暂时因为没有设备可以确定母亲受伤的部位和严重程度，现在已到下班时间，我建议你下午一定要到照光室去照个片。”

第一节：致命的跌交

这真是飞来横祸，母亲的身体没有检查先就把手脚跌伤了。无奈，只好同陈医生一起把她扶回家，等下午上班时再说。

那几天，正好刘启建办了退休手续，为了偿还自己平时拖欠的债务，她到南充她妹妹那儿联系找一个临时打工的工作，所以去南充了。我回到家里赶紧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把母亲跌伤的消息告诉她，要她立即返回北碚。

一面忙着弄好中午饭，等孩子回家吃午饭下午好按时上学。匆匆忙忙打发了孩子，给母亲弄了一点稀饭，看她睡在床上呻吟不已，弄的稀饭只吃了一口。因为还不知伤势如何，按照陈医生的吩咐，下午就雇了一辆长安车在我的一个学生帮助下，把母亲送到中医院去检查。

照片的结果，证明母亲已跌成了右腿股骨颈和右手手腕两处骨折。等到我忙着为她办完了住院手续，住进了骨科普通病房，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忙了一

天，把母亲住进病房后，实在疲倦已极，就在病房里暂时请了一个扶持病人的临时工，请她在晚上照应一下母亲。

晚上十二点钟，我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听医生说，八十多岁的老人凡跌成股骨颈骨折的，十有八九都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叫醒了孩子让他喝了牛奶，督促他上学，这孩子好像突然变得懂事多了，说中午放学后要到中医院来，叫我不必为他准备中午饭，就在学校食堂随便买点面食过一顿吧。

我到医院时，还没有跨进病房，就听见了母亲的呻吟，说她受不了牵引。病房里的病员们都说昨晚她几乎是喊了一晚上。我忙去病护室，找到值班医生，询问能否取掉牵引？医生说，根据片子上的情况如果去掉牵引，那么她就是出院了，也只好永远躺在床上，不能起立了。

我又忙回家，找到她的病历，匆匆赶回医院，把病历交给医生，向他们说明她患有较严重的冠心病和肺心病，加上年岁已大，受不了牵引的剧痛，建议他们取消对她的牵引手术，至于今后怎样，就只好到时候想办法护理她了。

牵引取消后，她仍呻吟不止，直到打了一针镇定剂，她才昏昏入睡。

中午放学后孩子来了，我轻声告诉孩子说祖母刚刚睡去，要他不要惊动她，问他吃过饭没有，他点了点头。

我嘱咐他婆婆跌伤了，他自己也要考试了，不要再像往常那样上网贪玩了。下午按时回家，自己热饭吃完后完成当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尽快上床睡觉。

直到母亲跌伤后的第三天上午，刘启建才从南充乘车回到北碚。

我们商量后，白天由我们轮流守着母亲，晚上暂时请了一个临时护理。

受伤第六天，母亲叫我备上纸笔，要我给她写下遗言，说，她感到不久将辞别人世，她死后骨灰洒在嘉陵江中。因为她从二十二岁开始就到重庆嘉陵江畔居住，这里是她的第二故乡。虽然漂离他乡，一生坎坷，一生痛苦，但那生养的恩情却始终不忘。

另嘱她死之后，不要举伤，不要惊动故年老友，最担心的是我和刘启建关系，母亲认为，我年龄已老，没有条件另外组成家庭。如果再因家庭破裂，闹出难以想到的后果来，是她最不愿看到的。

她又说：“我自幼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少女时特别喜欢听唱诗班唱歌，所以一生都想买一架钢琴。但，一生颠沛流离，在毛泽东时代，积蓄被抄去，受尽折磨和凌辱。这些年，老年打工留下一点积蓄，只因没有自己安身的窝，买琴便成了她终身没有实现的梦。现在孙子既然喜欢艺术，那么就将积蓄的钱买成钢琴送他，以此作为我的遗托。望他弹着钢琴，让祖母在天堂里听他的琴声，垂望他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我静静地听她临终的遗言，将她的话写成遗嘱，至于和刘启建离婚，要看事情的发展，如果有一天我违背了她的意愿，我会焚香请她原谅……嘱我买钢琴的事，我一定照办。她去世后，我立即实现了她的遗愿，买的钢琴放在客厅里，琴的抬板上留着她遗像。

那时正逢十二月初，是重庆地区一年之中最冷的几天。年迈的母亲因手脚骨折，翻身十分疼痛，加上她本来就肾炎发作，尿水频多，每次小便又要别人

帮助她，，将她下身抬起来，将尿盆塞在她盆骨下面，尿盆与尾椎骨几经磨擦，使她的尾椎很快擦伤，形成血淋淋的褥疮，使她疼痛呻吟不止。

因频繁排尿，稍不注意尿液就洒在床上。医院的大病室内，又缺专用的接尿设备以减轻她的痛苦。一天之内就因尿液打湿了被褥，被迫频频更换，天气又冷，使她很快感染了感冒，迅速引发了她的老年肺气肿。

气喘和口痰，伤痛和尿液夹攻着母亲，使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饱受折磨。几天住院，她原来就体弱的身子已完全垮了，死亡正逼近她。

就在她最伤痛的日子里，她的孙子成了最后生命中给她安慰的亲人。这几天，这孩子特别懂事，每天晚上他都按时从学校归来，再没有上过网，九点钟他从学校来到医院，静静地守在他的婆婆身边，悄声的附在她的耳边讲许多安慰的话，叨叨讲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

每次祖母要小便了，他便伸出他巨大的臂膀，把婆婆抱起来轻轻放在尿盆上面，让她减少痛苦。有时候从学校伙食团或沿街卖过夜小吃的摊上，买上一个羊肉串，送到婆婆的嘴边，虽然他的婆婆根本没有胃口，但那份孝顺之心使她临终前得了极大安慰。

在中医院的大病房里，母亲终日因伤痛而呻唤。眼看她一天天虚弱下去。肺气肿和冠心病代替了骨折，成为威胁她生命的主要病因。

第八天，我同九院的主任医生商量，将她从中医院转到隔家很近的九院分院，住进了单人病房。

然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却更加恶化了，开始住进第九医院单身病房那几天，她已有两天没有排泄了。但还能勉强吃一点稀饭，陈医生说，那是她体内电解质紊乱造成的，嘱我一定要煮酸菜鱼给她吃。

那几天我彻夜守在她的身边，晚上，等到刘启建来换我回家后我便忙着给她弄酸菜鱼汤，每天一大早，我就把煮好的新鲜酸菜鱼汤给她送去，可是她却只能呷两口再不张口。

由于极度的衰竭，她的最后几天，完全处于半昏迷状态，有过瞬间的清醒，这时候，她微微伸开眼睛，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努力说出来，当我俯下身子，耳朵贴在她嘴边，却只听见她轻微的嗫嚅声，很快闭上了眼睛。

我们母子在中共残酷迫害下，前后合起来渡过了四十年，挣扎到今天已非常不容易，她对我的牵挂，只有趁这片刻清醒的分分秒秒想倾诉出来。

我的儿子每天都照例在放学后来守望她，每一次来，第一个动作便是伸手握住她的手，好像是他搀扶着走过这最后的几步。但是她已不能像住在中医院开始那几天可以同他交谈，而只有含泪相望。看到婆孙俩噙泪相对，我也禁不住要掉下眼泪。

我在重庆地区没有任何老家的亲戚，来探望母亲的人是她晚年在北碚缙云咨询门诊里共过事，一起渡过晚年的同事们；市工商联的代表和李重生；此外五指山疗养老院的杨桂明夫妇；嘉陵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崔老的同事和三个儿女。

到临终的前三天，嘉陵中学六位代表，在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带领下，专门从成都赶来，探望将一生勤勤恳恳献身的这位教育先行者。

六个人送来了鲜花，围着病床，但母亲已经不能开口，只是张开嘴吐着大气，好像在拼命地表示，她无法完成她毕生使命的遗憾。

她的褥疮更严重了，背部擦伤的地方大片的已经溃疡。在杨桂明指导下，我每天在医护人员帮助下，给她溃烂的地方消毒，如此渡过了最后的十一天。

在九院住到第九天时，她已进入了昏迷状态，眼看着吊着的的盐水一滴一滴的输入了她的体内，而接通的输尿管里再也滴不出尿液来，她全身已呈现水肿，我意识到她的生命已进入了最后的时刻。

只听见她喉咙里响着呼噜呼噜的口痰声，我怕那不断涌出的口痰，会堵住她的喉咙，使她窒息而亡。所以拿着药棉花去她的喉咙里不断去掏那些口痰，我的孩子放学以后，也同我一齐掏，好像在从死神手里争夺她的生命。

十二月十八日，九院的住院部正式向我下达了母亲病危的通知书，十二月十九日，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我用热水给母亲擦了一下身子，并用蘸头孢的药棉花给她的褥疮上了最后一次药。

12月20日下午，冬雨啾啾，中午喂过她半小碗鱼粥以后，她又一次昏昏入睡。医生搬来了心脏监测器，她的心电图已非常微弱。我和妻子以及儿子三个人全都守在她的病床前，见她安祥的熟睡了一般。我把药棉签子再次伸进了她那呼呼作响的喉咙，掏出的痰越来越多。

从下午六点钟我就不停地抠那源源不断涌出来的痰。一面抠，一面痛哭，一面又声声地唤着，“妈妈！妈妈！”

我多么想能帮助她把那无力咳出的痰抠出来，幻想她会因为最后的阻塞被一下了掏通了，出奇般的长长舒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睛看着我。但是，我的努力终于成了永远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刻同死神的争夺。

下晚一点钟左右，她永远闭上了眼睛，不管我怎么喊她，也再没有睁开眼睛看我一下！！心脏监测器图象表明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室外的冬雨下得特别大，天气也特别的冷……母亲就这样离别了我们！！

我们连夜在楼下的过道上搭起了棚帐，一直忙到21日天亮，杨桂明取出了为她特制的寿衣，替她洗漱完毕，为她换上寿衣，将她的遗体装进冰棺。六个人抬着她的遗体，放置在我们楼下的灵堂中。此时，我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母亲是一个独生女儿，唯一的母亲一直跟随着她直到去世，我唯一的兄弟，死在文革中，只剩下我和妻儿替她送终。

来为母亲送行的除去崔老的三个儿女全家，和她的缙云咨询门诊部的老同事，以及她退休医院的代表，便是嘉陵中学的师生了。

但我并没有按她临终前的遗言，处理她的遗体。只是没有通知生前七旬以上的好友，特别是高自强老师。前来送别的足有二百余人，其中，李重生专程从市中区赶来。灵堂里挤满了人。

12月22日晨，就在母亲的灵堂里，我主持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追述了她坎坷而平凡的一生：

“1916年10月23日，她出身在苏州河畔的一户贫民家庭。1933年她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

1936 年她在苏女师毕业后，便在南京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时值日寇入侵，国难当头。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她与一家人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到了重庆，积极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抗日战地服务团，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 年在双碑二十五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育主任，与当时全国著名的教育前辈，梁淑溟等人一齐为教育救亡，贡献力量。

1944 年她在兵工署支持下创办私立嘉陵中学，抗战胜利以后，她一直埋头默默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着一生。

不料 1957 年被冤划右派份子，在“监督劳动改造”的压力下，忍辱含垢渡过了长达二十二年“监督劳动”生涯。

在这二十二年中，她经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祸，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直到 1978 年始获平反，时年六十二岁。但她仍坚持工作，直到 1994 年，才因上班挤公共汽车而跌伤，加上此时她已年届七十八岁高龄，才停止了工作。

一生辛劳使她压弯了背，但仍与嘉陵校友联系，为编写校史和回忆录继续贡献她的余生。”

母亲是一位中华普普通通的二十世纪中期知识份子，她教人和处世恪守诚信待人的原则。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群体，如果说她（他）们千千万万人的努力起到承前继后，为建立新的教育做了自己该尽的社会责任，那便是母亲留下的一点纪念。

她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的民主教育的启蒙。更多的用自己的生命和经历，见证了中共专制主义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残酷摧残！。

我由此联想到一位，伟大的中国近代教育杰出的先行者武训，他以忍让、委曲感动着他生活的时代，为中国的教育提出了一个苦行僧的口号。因为人性的感化，仍是教育的道德基础。他的行乞办学的精神，虽然表面看，缺乏同一个没落王朝斗争那股轰轰烈烈劲，而是用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全社会。

武训没有想到，在他逝世五十五年以后，一个自称为解放全人类的独裁者，用卑鄙的心理对他不朽的精神，进行了公开和残酷的鞭笞。

结果，在摧毁武训的“投降主义”“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的“革命”借口下，一个反人性的专制主义和文字狱，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人民几十年。一个新的更残酷“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枷锁，套在民主教育脖子上，使教育成了统治者的工具，母亲就在它的驱咬下，渡过了凄凉的一生。

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处处看到人与人的欺诈和虚伪，一个新的怪物在中共的创导下，从另一个极端腐蚀着国民。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就在人性被摧毁的社会背景下长出了新的毒牙，当我们兴叹教育沦落到今天这种见钱眼开的地步，那是中共另一个巨头：新专制主义者所期望的。

第二节：对母亲的怀念

我的母亲为教育奋斗一生，劳碌一生，然而就在中共蛮横地剥夺了她教书

育人的权力！仍矢志不移。她的晚年凄凉，中共连一处她能栖身养老的“窝”都没有给她。

若不是倚靠她唯一的儿子，得到一间八平方米的栖身地，她只能孤苦地去养老院渡过她的晚年！！但迫害没能扼杀她的终老之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独裁专制所推行的愚民政策，终会以不耻人类的狗屎堆而载入中国的史册。

今天大陆，表面上看似统一的专制政体，却因丧失人心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被迫也在向民主政体作转型的姿态。中共专制主义必以代表少数人而让出自己的地盘，吃尽毛泽东独裁苦头的中国劳动大众，也决不会自甘愚昧的境地。

母亲去世以后，一个当年没有钱读书，是母亲免费为他入学的穷孩子给母亲的唁信写道：

“得悉 1999 年 12 月 20 日晚母亲不幸病逝，顿时悲痛至极，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收到你 12 月 30 日的信，纪念母亲的悼词和照片，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而流泪不止。母亲的许多经历，往事不断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母亲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出众的工作能力，使我对她产生了内心的挚爱。她是我心目中最善良最无私最慈爱的母亲，她对我的关爱像春日阳光温暖着我的心，使我感到很幸福，生活很充实。母亲走了，我深深地怀念她，母亲生前写给我的许多书信，我将整理好，保存下来，经常翻来看看，以寄托我的哀思和思念。”

我因此想起在毛魔猖狂年代里，对母亲屡下毒手的人，至今不知天地良知该怎样报应他们？当年母亲受到迫害时，蔡家场的农民敢向殴打她的刘巴斥责，证明人性是专制迫害狂所不能摧毁的。

出殡的那一天，为母亲送行的时候，嘉陵校友会还专门送来他们编写的《回忆嘉陵中学》一书，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从成都打来长途电话，嘱咐道，一定要将这本书随同母亲一齐火化。

倘若母亲悲凉的一生，能使后世有志振兴中华教育的儿女有所激励，那么她在天之灵，就得到了应有的告慰，而安心于九泉之下了！

于是我把她的一生，写成了《我的母亲》一书以志纪念。

她刚去世的那几天，每当傍晚，我都会独自沿着她生前每晚散步的街道独自徘徊。特别在附近街心花园里，我会坐在花园角落里，静静坐着，仿佛又回到每天陪伴她的过去，想起她看我在她身边做操。一边听她叨叨重复我童年的故事，禁不住在树荫下潸然下泪。

第三节：为保护生存权的一场官司

在去九院清理母亲住院期间的费用时，听到住院病人讲，该院进出使多人摔伤，该院护士抱怨进出时，脚下常发生磕碰，过去就有人向九院负责人反映这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去那门上仔细看，这是一扇仅 1.8 宽的双开活页玻璃大门，门在关止处，留着内外高差十分不明显的门坎。

我取来尺子一量，那门坎只有 5cm 高。由于进门时，光线阴暗，病人进出门时不会引起注意，又无警示标志，特别老年人多数老眼昏花，提脚抬腿很低，很容易使他们在进出大门时，被这个不起眼门坎绊倒。我向医院负责人提出门坎致人伤害的危险，要求他们为老年人安全着想，填平它，却遭到拒绝。

2000 年 1 月 14 日，我在消协王尔金秘书长支持下，填好投诉表，并按他的吩咐，整理了有关母亲跌伤的病历记录，陪伴人的目击证词，伤害我母亲的门坎照片，拿着母亲的死亡通知，1 月 18 日我把这些材料交给了王秘书。

当即我同他一起步行到九院去找该院的院长，本想通过说理使九院的领导承认他们工作上的疏忽，并能及时治理好这条致人摔伤的门坎。我俩在九院的接待室里等了足足一个小时，等出该院处理人身伤害的唐付院长，当我们向他呈诉母亲摔伤致死全过程时，那姓唐的面带轻蔑的冷笑说：

“在我院门坎上跌倒，这首先是出事人本人的责任，何况，医院只对医疗事故负责，所以，这件事是不应当来找医院的，你们回去吧！”

我俩没想到医院的负责人，这么干脆的给了我们闭门羹。王秘书长显得非常尴尬，我却用愤怒的眼光看这盛气凌人的小官僚，一时还没有找倒足够份量的话给以还击。

这事倒引起西南工商行政报记者李良军的关注，在他采访王秘书长，核实了我整理的取证材料后，于 1 月 20 日，在该报上发表了题为‘老人之死谁之过’的报导。不料这唐付院长不但嗤之以鼻，还打电话到报社公开威胁小李。

过了两个月适逢 3 月 14 日，北碚各有关单位摆摊纪念消费者权益日之际，在九院摊位上我公开斥责来参加活动的唐某，本意敲打一下，对病人不负责任臭名在外的九院负责人，说完后，定睛看那姓唐的，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来一场官司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良军关于九院进门门坎伤人致死的报导，在西南工商行报上见报后，立即引起重庆媒体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市民的强烈反响。长期以来，被病人视为活阎王殿的医院，一直是市民怨声沸腾的焦点。

2000 年 4 月，我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第九人民医院推上法庭，要求九院对母亲伤害致死负起赔偿责任。不料素与法院某院长关系密切的唐付，不知玩的什么招数，长达七个月审理后，竟无视该门坎无数次伤人的严重后果，不顾全市市民的反反对，北碚法院驳回了我的投诉。

医院对本该由医院方承担的医疗事故责任，成立专门机构对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常被新闻媒体逮住，在报上曝光的事层出不穷。于是，母亲的死亡赔偿，被当作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1 年 4 月 8 日在民意和舆论的压力下，北碚法院对老年康复中心的门坎伤害责任，进行了第二次开庭，那天到会的共有一百多北碚居民，坐在后边的是各媒体的新闻记者。作为人证出庭的是由雷春隆等四人组成，包括新疆石河子医院的刘医生。在新闻媒体和全国消委的介入下，这个案子惊动全国。

刘医生以雄辩的不容推卸口气，讲述了九院大门坎频频发生事故。矛头直指九院领导，那姓唐的付院长不再像上次开庭，故意做出虚张声势的狂妄态度，

他在被告席上搭拉着脑袋。

北碚法院对事故的责任很快重新划定，九院终于负起赔偿的责任，一时各大报社报导了我们胜诉的消息，医院和病人的关系，原来由医院说了算，向前迈了一步。病人作为消费者的权益纳入消法保护，便成了有名的案例记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典型案例之中。

九院在北碚法庭上输了理以后，唐院长们并不甘心，背地里的交易始终在进行，他们利用上诉机会，再次与中级人民法院商量，请出专门打“疑难官司”的重庆政法委书记女儿办的律师事务所，担任他们上诉的辩护律师，在事实无法推翻情况下，利用法律的漏洞引用旧赔偿标准，使赔偿金额大大降低。

九月二十日判决生效，至此、整个门槛违背建筑法致使我母亲跌伤，致死的人身伤害，九院只作了低额的赔偿而结束。

第四节：我的父亲

父亲出身于苏北盐城新兴场一个地主家里，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祖父去世后，老大占去了祖父留下的大部份田产，在新兴场上继承了祖业，当起靠田租和放高利贷的地主。

父亲因为憎恨老大的贪得无厌，中学毕业后，将家里所有放高利贷的借据，当着伯父的面一火而焚，从此兄弟反目。

1931年他变卖了分到的房产作为学资出外求学，在南京，他考上了中央大学，攻读教育学，拜师顾毓琇门下。

1935年大学毕业，眼看当时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民不聊生，中华大地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呻吟，唤起了他救国志向，1937年10月他带着一家从南京逃难到重庆，投奔顾老，去中央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育学系系主任等职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时，刚满八岁的我，住在沙坪坝的双碑镇，那是国民政府兵工署所在地，住着许多逃难而来的下江人，“八年抗战”中，在异乡整整熬过了八年，对抗战胜利后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今天当我翻开记忆中这一页，它仍鲜活的保存着。

这年9月，我们一家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不久父亲担任杭州师范校长。

按‘新生活运动’要求，他身体力行，每天清晨提一把大扫帚，在杭师“东升楼”前打扫校园和校门；主动撤去为他配的黄包车，把配给他的车夫派去为学生伙食团磨豆浆。

我亲眼看到杭师学生的伙食，中午和晚上，每餐至少三菜一汤，常听炊事员责备学生不知谷米来之不易。而那时各校都有学潮，学生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每当学生游行打这些标语，我不知内战从那里爆发，饥饿在那里发生，祸端起于谁手？

1946年春天某一天，“东升楼”前集合了几十名学生，手臂上戴着红袖套，

称他们要到市中区参加全市举行的反内战大游行。

早晨八点钟左右，父亲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升楼前，站在他平时站立的升旗台南侧，面向准备上街的游行学生讲话，他讲到八年抗战的艰辛。

讲自己 1937 年从厦门返回南京，沿途只有人推的独轮车，又逢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九死一生回到南京，赶紧带着母亲，外婆抱着刚出生的我，在日机轰炸下，从下关乘船逃出南京。

日本飞机尾随着插着红十字的轮船，像追一片只有挨打而毫无反抗能力的“绿州”。“绿州”中弹了，着火了，它的甲板上倒着死人，“绿州”用鲜血染红了长江，炸弹爆炸声掩过难民的惨叫，倒在血泊中的母亲，挣扎着把奶头递给那扑在自己怀里的孩子！

当他讲到毫无反抗能力的和平居民，受到鬼子的屠杀，泪珠夺眶而出，声音也嘶哑了。

他说：“我们牺牲了几百万抗日将士，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鬼子，昨天尝尽了苦难，今天正需要和平建设中华时，如果你们是祖国的好孩子，就只有怀着的一颗报国心，而不要听从谣言和煽动，将来不易的和平时光白白浪费掉。”

他含着泪珠，希望学生们从国家和平建设大局出发，不要离校。

这一席以心对心的讲话起了作用，准备去市里参加游行的学生，纷纷摘下袖套，收起已打起的校旗，悄然散去。

到了大约九点钟左右，从鹰白路方向打着“浙江大学”旗子的学生队伍，向这里缓缓走来，经过校门口时，只有两个学生加入了那支队伍，原来准备的校旗也丢在升旗台前。我记得那一天是阴天，宽阔的马路上行人很少，他们匆匆赶路，向游行的队伍投去好奇而陌生的眼光。

母亲站在家门口，一个劲喊着我，生怕我被那大队的学生吸引了过去。

1947 年下半年他又在顾老的推荐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学总务长，以后又改任政大重庆分校的校长，成为大陆上中央政治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

1948 年我们离开上海时，为“中共打来了，我们怎么办”？父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母亲坚决反对“逃”。她说：“我是无党无派，共产党不会把我怎么样。”争论结果她赢了，全家放弃了去台湾。

1949 年中共占领重庆后，父亲在成都放弃了飞赴台湾的机会，回到重庆北碚家中。1950 年在当时中共西南军管会川东行署的指令下，去西南革命大学受训。并在那里得到中共的“政治结论”，要他去贵州参加土改工作组，回来后进行工作安排，他们说父亲是统战对象。

不料，1951 年底，在中共掀起的大镇反高潮中，他在北碚家中被捕。

被捕后，由北碚法院的陈文俊（该员 2006 年还活在北碚）带人对我家进行大搜查，不仅将父母亲多年积蓄搜枪一空，还以“国民党大陆潜伏人员的活动经费”没收。

在父亲的反革命罪状中，首要一条就是“镇压学潮”，被捕五年后他便被关死在劳改队里。

父亲被审讯判刑严格对我们家封锁了消息，禁止我们家人探视，尤其是拒绝向家人出具他的判决书，透露他的情况。父亲就这样被他们“黑办”了。

当我的父亲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时，我们小小五口之家面临了灭顶之灾。而我是当年父亲“镇压学潮”的目击人，很替父亲镇压学潮的罪名不服。

那时电影话剧都宣传‘解放’战争，专题讲学生运动的题材，都是描述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军警、宪兵的镇压，大批学生倒在枪林弹雨中或被抓进牢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受到老虎凳，烧烙铁等等酷刑折磨。

可是后来，**我亲身领受到中共监狱的残酷折磨，才使我体会到中共的栽赃、诬蔑，领会他们不择手段的残暴。**

从此，我们一家几乎遭到了中共政权的灭门之灾：我的母亲因为对父亲遭受不明不白前后矛盾的审判，在大鸣大放中提出质疑，1958年被划为右派。

同年，求学的我因同一罪名被划右派，并于1960年锒铛入狱，我的兄弟于1968年被造反派不明不白杀害，**我们一家几乎家破人亡。**

直到三十年后，我死里逃生回到母亲身边，她才深深后悔自己的无知，并一反过去的害怕和回避，向法院投递了为父亲的申诉。

而幼小的我，早听到中共占领区逃亡出来的人介绍中共的所作所为，此时脑海里更清楚中共的兽性。

1979年经历九死一生以后，我和母亲才得以在二十三年后，重新相聚北碚，在我十几封追问区、市、省的公安检察机关后，才由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回复，说他于1956年就因肺结核钩虫病病死狱中！时年仅47岁。

我们家，是千千万万无辜家庭，在中共暴力下破灭的一例！

第五节：合 葬

母亲去世时，我想父亲带着一腔报国志向，从1931年离开故乡，在外撞荡二十年，寻求救世救国的道路，一生为教育奉献，也该让他流落他乡的孤魂，回故乡入土为安了。

然而我无法找到他的尸骨丢在何方。于是我把母亲的骨灰与父亲的遗物，作成衣棺冢合葬一墓的打算与盐城新兴场老家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就在父亲故乡买下了一方坟地。

2000年清明后，我亲自背着母亲的骨灰盒，和当年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一条旅行口袋，与我的孩子一道乘火车辗转到了盐城新兴场。

盐城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过去我听说苏北地区地域苦寒。若不是让二老魂归故里的原因，恐怕我今生未必能专程到这个地方来。

来时正值初夏，在这一望无垠的平川上，空气犹为清新，比之雾气横弥的重庆简直是一个仙境，就是不知冬天到来时如何。但我想这么肥沃的水乡，定是一个适于安息的地方，

若不是中国遭遇到了战争，遭遇到民主和专制的生死较量，才使父母背井离乡，发生这段伤心的经历。今天历史故去，留给我们的只有对历史的反思。

为了表述二老的生平，我在墓的后方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块，上面简述了二老生平的简历。

他们俩都是新的教育事业先行者，只因为黑暗政治对他们的迫

害，使他们坎坷一生，无法为振兴中华教育奉献一生，连他们组成的家庭也横遭离散之劫，家破人亡。

在中共统治下，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更那里谈得上事业？像他们的遭遇在中国大陆累见不鲜！这是一个时代的谬误！中华民族的浩劫！

现在他们到了冥间，可以在一起切搓他们生前献身的事业了！！

当我将骨灰盒和父亲遗物送入墓中，当一吊一吊纸花扬向天空，入殓的颂唱在耳边声声哀响，我和馨儿长跪在一派茫茫的天地之间。

人生何求？归宿何在？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又如何？

第六节：孩子在绝世里挣扎

我的父母都是好人，我的母亲求学时还是闹学潮的参与者，同民主建国会关系亲密，但是反右运动她失去了所有亲人，我唯一的亲兄弟死得不明不白，若不是老天保佑，我也是要被屠杀的，对生活绝望的母亲几乎自杀！暴政无端毁灭了我的家。

1979 年当我回到重庆，母亲独自一人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见面时，我们母子俩面对她睡的单人病床，一张木桌一个凳子几个纸箱，从新开始建家。被中共摧毁的家已无法再恢复，要把家延续下去唯一只有看我了

1980 年经过我教书学校老师们的撮合，我和刘启建结婚，当时我年过 44 岁了，为了急於求一个孩子，1982 年我们婚后第一次去峨眉山旅行。

也许是峨眉求佛的灵验，回到蔡家后刘启建便怀上了孩子，次年六月四日，一个姗姗来迟的男孩便降生了。当我们的孩子降生后，老来得子，我俩从内心都十分疼爱这个迟来的独生宝贝，我又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二十多年，仅仅留下我和母亲。

现在因妻子和儿子到来，似乎在枯木之上接上了新生的幼芽。孩子的降临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本来同刘启建几乎离婚的僵局，因孩子降临暂时缓和。

孩子的可爱之处积存在我的记忆里，给我安慰和天伦之乐。也许因为中共独生子女政策，家里没有第二个孩子作伴，他从小喜欢小动物，在他的能力范围里可以弄到的小鱼、小鸟、小乌龟、小狗从来就是他童年天地里的挚友

孩子九岁这一年过年，母亲买了一只大黑鸡，捆了双脚，放在厕所里准备年三十的下午杀。中午孩子放学回家，看到厕所里捆着的鸡，便把它松了草绳，放到楼下坝子里让它饱饱吃了一顿，再用一个木箱子，把它装好，藏在自己的床下。

下午母亲发现黑鸡不见了，到处找，终于在他的床底下拖出那个木箱，明知孩子有喜欢动物的习惯，当天下午就提前把鸡杀了。

下午馨儿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便去自己床下找木箱，当他发现木箱不见了便跑到厨房去，看到被打整得干干净净的鸡已经装在盆子里面了。

他顿时放声大哭，扭着婆婆定要还他一只活鸡。

哭罢，便从撮箕里捡出一把黑羽毛，插在阳台的花盆里，并用一块三层板，

上书“黑鸡之墓”，插在装鸡毛的花盆中，旁边还点上两柱香。站在那花盆面前抽泣良久，将他爱惜生命的本性，表现得很真挚。

在他的中学作文里，多次写他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世界。写培植花草的方法，在区的中学生文艺征文中得过奖。

他读初中时，每逢周末，我们照例要到龙凤溪去捞小鱼捉蝌蚪，逮蚱蜢。

我和孩子经常不顾龙溪河刚刚退水留下的泥泞，也要去那里捉小鱼。有时穿的鞋、裤弄得全是稀泥也在所不惜，孩子给我留下不可抹去的回忆。受到孩子童心的熏陶，我自己仿佛也年轻了许多。

到了初中三年级，他常常向母亲要钱，独自去商店买一些奇装异服。袖子特别短，管口特别小，腰身很瘦，还缀着许多彩色的边条，穿在身上，对着镜子津津有味按照歌星影星的模样打扮自己。

特别是买了染发药水，把头发染得红红的，模仿着歌星们时髦的发型，在镜子面前又唱又舞。

我告诉他染发的药水是有毒的，但他并不接受，追星在他身上变成学星，他那童贞的爱好和天真的幼稚一天一天消退了。我耽心地规劝他，讲穿这些很不合身的奇装异服，有碍于他的健康和发育。

为了教育孩子，我常把我上中学背着背兜打猪草的故事讲给他听，意在用自己童年的甘苦教育孩子，讲述从小节俭，长大后养成良好习惯的道理。

但这种故事讲了几遍后，孩子却不耐烦的说道：“老是听你翻那本老皇历，让人烦不烦呀，总不能用你那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年代要求我吧！”

为了应付联招考试，初中三年级，我们不得不将孩子从 22 中学转到北碚的 118 中学，这所学校因考入重点高中的升学率连年攀高，而在北碚地区出名。我们想在这一学年里，专门的给他进行教材难度的加餐。

“填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必需做大量超过大纲的偏题怪题，考前一个月为强记这些怪题的有关公式，规定每天起床前，必需把前一晚上要记住的东西统统默念一遍，凡有不记得的强记二十遍。

经过联招考场的筛选，我们的孩子以 1:3 的录取率被朝阳高中录取，说明孩子在学业上完全可以跟上。

孩子考进朝阳中学以后，我已从工厂退休到城里打工，没有时间再督促他。刘启建更认为翻过重点高中门坎，考大学便没有问题了。

当每周星期天，我回家检查孩子的作业时，才发现平时作业教师根本没有批改。照说高中课程比之初中难度大得多，加上孩子在课堂上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使他在课堂上留下了许多似懂非懂的疑问。布置的作业，教师既没有检查，更没有督促。课堂上拉下的账在作业上没有及时弥补。

久而久之，孩子越来越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加上文革遗风并没受批判，学而无用的观点在他脑海里起了作用。主观上没有及时弥补的积极性，放学以后受到社会上坏风气的干扰，同班里和几个本来就是差生的议价生，交上了“哥们”，我们孩子的功课就这样一天天蹉下了。

老师的师德很差，他的班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上英语课时，年轻的罗老师在一次课堂抽问时，抽到了他，当时他没的回答出来，直楞楞地站在那里。

那罗老师不是善意的督促，而用尖刻的语言嘲笑道：

“你上课一直在讲话，以为我没看见你，你自己不好好学习，还猪八戒倒打一钉耙，说我们只知道收你们学生的钱，却不负责任管教你，你反正也不像一个学生，如果你不听，就给我滚出去，没有你这个学生，看我会不会在月底工资中少拿一分钱？”

倔强的孩子因此赌气，走下座位出了课堂。从此便完全放弃了英语课，后来期末考试，孩子的英语成绩是全班最差的。

刘启建接到成绩通知，才开始翻看孩子的作业，发现已经整整有三个月英语课堂作业没被老师批改过，追问孩子，他回答说，我讨厌这女人，她讲的我根本没听懂过。再追问下去，孩子才讲出在上英语课时发生过的这件事。

高一学年下半期，孩子迷上了网吧。开始时，他还仅仅在有电脑的同学家中上网，时间也选在周末晚上。后来上网成瘾，在几个同学相约下，每晚都去网吧，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为了怕母亲跟踪发现他在哪一家玩，他还故意变换离校的时间和走出学校的位置，使去校门口接他的母亲每每扑空。

直到有一次，几个辍学的小流氓在网吧里动手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两耳光，他还久久的瞒着我们，当然更不会向学校报告了。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更大的事情发生了，使他瞒不住了，才讲了出来——

有一天，直到晚上十二点了他还没有回家，刘启建焦急的向几个平时和他在一起玩的同学家里打电话。这几个孩子都睡了，从床上爬起来回答说：“晚上下晚自习就各回各家了，所以不知道他回家没有，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和刘启建的心像猫儿抓一样，社会上很乱，生怕他在夜半更深出事，我忍不住走到街上去找他。但此时街上夜雾迷茫，行人已十分稀疏。我对着街上像疯子般喊着孩子的小名，静下来的马路上并没听见孩子的回应。

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他才回到家里，进门时脸上带着伤痕，衣服上沾着泥巴，在我们追问下，他才讲出他们学校与街上另一所学校学生打群架的事，他们学校还打伤了两人，住在医院。

接连发生了两次放学途中被抢被打的事后，我不得不与他们班主任商定，今后凡下了晚自习，他的母亲到教室接孩子时，没接到的，发生问题一律要由校方负责。

事实证明，把精力放在议价生的校长，对学校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根本无所谓，议价生这种不花精力和努力的横财，使学校的头们利令智昏。

名牌的重点学校教育，完全被校长之流追逐蝇头小利变质。他们哪能肩负培养品学兼优的国家建设人才重任？要转学校，就要交几万的转学费，何况那一所学校不都是半斤捌两。

孩子高中阶段陷入“网聊”以后，每夜也不知与荧屏相隔多远距离，同另一个不相识的人用奇怪的称呼，嘻嘻哈哈把道听途说的消息，天南地北的神侃起来。开始是好玩，渐渐的彼此交流着厌学和对人生前途

为了弄清他在网上同谁交谈，我专门搜了他的课桌，在我收搜他的网友来信中，还发现了一个南昌的网名叫巴比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不是一个中学生

而是一个工人，爱好唱歌。

不久，这年青人来了北碚，在我家住了三天后才离去，每天晚上都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放音乐碟子，因为离高考，只剩下最后一学期了。

在他离去时，孩子还向我告假，说巴比请他在春节到南昌去玩。在遭到我拒绝后，一味迁就他的母亲，给了他两百元作路费，春节前与我不辞而别，去了南昌。当我知道后，孩子已经上了火车。

大年三十的下午六点钟，天色已暗了下来，防盗门的门环上响起了拍击声，早已守候得望眼欲穿的刘启建，像一个皮球一样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冲到门口。

我从刘启建身后，看到他穿出去的那套最华贵的棕色西服上糊满了泥，那平时精心梳理的头发，发型也被破坏变成了一蓬黄色的乱草。!

脸颊颧骨突起，平时孩子气的脸蛋变得又黑又瘦，精神十分沮丧，眼皮耷拉着，看样子好像几天几夜困在矿井下刚脱险而出的矿工，那一刻他给我的印象是累极、饿极、疲倦之极。

我当时低估了社会的影响，尽管孩子吃了到南昌的苦，但影响他的东西却没有变。过了几天，他依然故态复萌，依然地染红头发，依然的穿奇装异服，依然坚持他选择的生活方式。

高考以后他便独自去了成都，幻想走上舞台的孩子，被一家酒廊的歌舞厅看中，要他去那里担任报幕员。我虽心中疑惑怕他在那种环境，被烟毒、娼妓、黑社会所害，陷入可怕的深渊，但已回天无力。

为了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家，我仍拿出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的七万元积蓄，给他购买住房，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买房子，而是用这笔钱与他的男友，开了一家小餐馆，尤其没料到，开店剩余的钱，被他母亲以抚养拉下债务的名义，还了长期累积的债务。

2009 年我已七十二岁，还必须面对老来的孤独。人到晚年，倍觉凄凉、夜半一觉醒来，感到枕巾上沾着刚留下泪痕。

就因为我和刘启建本来就缺乏了解、相爱、相尊。时间一长，裂痕不断在孩子面前公开暴露，于是宽严不但没有得到互补，反而偏执的双方对对方横加指责，在孩子心理上留下恶劣后果。

2009 年 7 月，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刘启建已被刑事拘留，一个家落到这步田地是我人生的失败，但此时最难受的莫过于孩子了，所以当他责问我，家破碎成这样，妈妈落到这步下场，你要负几成责任？并说他之所以 2001 年独闯成都，就因为逃避父母的吵架。

2011 年 6 月，我收到他从渝中区看守所打给我的电话称：他被拘留两周，含糊其辞说了拘留原因。

真没想到，他二十八岁生日，竟和他的同性恋男友在看守所渡过。拘留期满回到家中，我才看到他已经完全变异，欺侮身生的父母，成天沉埋在音色中。

可悲的是，他长期受了中共洗脑，对我的教育和警告置若网闻，还在天真寄希望中共会安排他一个满意的工作。

至此，我和母亲团聚后建起来的家实际已经破败。我们这个教书为业的家，从此就在大陆上消失了。

难道这是苍天惩罚？我们何以归终？去敬老院还是能去一个足可让我完成我的写作，较为安定的去处？那儿才收留我？

而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此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

至此，我们的没有了后代，按中华民族观念，孔家解体了。大陆上无缘无故遭此家破人亡厄运的何止我一家？

常听人说，不良社会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刃，我唯一的孩子难道就这么无声无息的丧身在这柄利刃之下？

第十章：退休后的打工

第一节：四轮摩托

马刚原是重庆机床厂的一名普通干部，七十年代曾以武斗出名，外号人称马司令。改革以来，他利用和重庆市政府的老关系，靠走私车发家，并且买下重庆机床厂的几台重型淘汰机床，打通了重庆重型汽车制造厂的配套部门，从配套处挖出了一些配件生产销售，1995 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在了解发达国家汽车发展的一般规律后，估计随着经济发展，汽车正在进入轿车时代，自以为能为中国轿车进入家庭做点贡献。完全不懂汽车制造的马刚，1996 年从附近属于部队的山花汽车厂，以低廉价格买回一台发动机后置的微型车。

买进后，雇请了几个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在南坪临时租用了一个场地，开始了他对微型车的研制。当时他急需聘请一位懂得汽车结构和制造的工程师，便求助于原来的老朋友李伦，在李伦的介绍和推荐下，1997 年初夏，我到了位于南坪的金汇公司，开始投入了微型车的研制。

在一无生产场地，二缺资金和设备，仅仅只凭买来的极不完全的图纸，和一台样车，四个人开始组装第一台“金汇牌”微型样车。

马刚给每个组装的人开始只给几百块一月的工资报酬，他靠造反派的传家本领，不断向我们做思想激励工作，说只有在这种白手起家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每个参加者的创造性和水平，还说中国首批民族工商业产品，都是在白手起家的环境中出生的。

当时，重庆地区热销三轮摩托，它的轻便，载客量，和安全都优于普通的两轮摩托。加上销售中享受摩托车的优惠，很受运营者的欢迎。

但它行驶中震动和噪声，车身发抖和易倾翻的缺陷累出事故，使乘客日渐不满，特别是交管部门十分反感，所以每逢节日庆典，为装点城市的文明和市容，各级交管部门除了贴出告示，还要出动军警，没收、禁止三轮车上街载客。

在试制人员的建议下，金汇公司产品的开发思路由“微车”改为“四轮摩托车”，1998 年马刚向市申报该年度重庆市科技成果项目。

两年以后，样车也制作出来了，不过这才经历了最初的几步，它的开发能否成功，谁也没有底。

整个底盘实际上是东拼西凑而成的，零件图纸和买来的实物不相符合，经常发生装不起，装起后相互干涉的故障，要从新拆装，所以安装进度极慢。

最后勉强凑合，装成的底盘，又遇到市场上没有现存配件的困难。纵使开发成功，今后由于市场上买不到零件，又会碰到售后服务的困难。

1998 年秋天，两辆挂着金汇牌试车牌照的四轮摩托车，开出金汇公司的试制场地，向车管所的检测站开去接受整车性能检测。

能在不到一年时间，装出两台样车，挂上试车牌照，开去检测，已相当不容易了。

进入市区时，被一大群路过的三轮车夫围住，他们停下自己的三轮车，七

嘴舌地问道：“这是什么款式的车，从来没见过？”“这车的外观造型小巧玲珑、顶好看的。”

样车向车管所前进时，到了通往新桥的支路口，两个恶狠狠的交警拦住了样车的去路，开车的小刘预感到意外的麻烦又降临了。交警将样车拦在马路边上，先把驾驶员的驾驶证拿了去，把我们统统叫下车来。

小刘咕嚅道：“年关到了，交警们又在打过年奖金的主意了，看来，我们今天恐怕开不走了。”

好不容易老马与交通局周局长联系。用钱打通了关节，傍晚才把车开到车管所的检测站。

第二天，检测结果令我们大大失望，七个必须通过的强检项目中，在制动，测滑，灯光，噪声，排放上就有五个指标不合格，整车总体评分挨了一个“×”。

原先盼望着整车顺利过检的马强，满脸挂着不满，向试车组全体成员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辛辛苦苦装了一年的车结果仍是一个不合格品。

在大陆上，由于冗长的过程和资金不足，经历的衙门太多，一个自行设计的新产品常常经不住这些关口的扼杀，而在过关前，就已死在它的漫长途中了，除非靠行贿买通这些部门。

马老板哪有那么多钱作买路钱？

试制组又经过了两个月对四轮车整治，并在租来的场地内反复试车。这时候一家厂址在成都龙泉驿的军工厂，经重庆市经委介绍，来我们的试制场地参观。

这家军工厂家正在物色一个适合于他们生产的民用汽车产品，他们看到了我们组装的四轮摩托，相中了它的灵巧和外观。

当即在老马的公司本部商谈，决定由该厂出场地，金汇公司提供图纸和样车实物，并以这家工厂购买的方式解决所需的生产资金。

为了进一步合作，对方邀请金汇公司去龙泉驿九二工厂进一步进行商谈。

正在想对这个新产品进行一万公里可靠性试验的试制组，本想借往返成都，在行驶中对四轮车的可靠性作结论。

1998 年底，由试车组的全体成员驾驶的样车，便在马总小车跟随下，向龙泉驿进发。从早上五点出发足足行驶了十四个小时，到了下午七点钟才行驶到达这家工厂的大门。

龙泉驿九二汽车厂属于部队编制下的民品生产厂家，既是军工企业，门卫森严。

进入大门后，工厂里静悄悄的，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近万平米的生产车间里，除了设备和一些材料堆放着，车间里并没有任何的产品摆在现场上。

来迎接我们的工厂领导人介绍说，这家民品工厂成立三年来，因产品滞销，所以已经停产半年了，他表示厂的领导十分重视我们的到来，望我们带来的产品能给工厂带来活路。

四轮车是第一次长途运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日行五百公里行驶，样车没有发生重大的质量故障。

第二天大约十点钟，九二厂接待我们的人来了，我们一起步行到昨晚到过

的车间。

这下看得更清楚，车间里稀稀拉拉的分散着身穿制服的工人，办公室就在车间的楼上，当我们登上楼梯时，忽听办公室传出激烈的吵架声音，那是一个待岗员工因为两个月没领到工资在劳人科大呼小叫。

眼见这种气氛，令我想到了十年前李友当政时的农用汽车制造厂，**军工厂都不死不活，足见全国有多少工人面临没事做，没饭吃的生存危机中。**

下午，与九二厂汽车分厂领导，在会议室中举行双方第一次会议，正式讨论联合开发生产四轮车的事宜。

会议开到晚上十点半，厂方在九二厂的招待所里包了两桌酒菜，名义是为了欢迎我们到厂协商联合生产，其实这是亏损厂常有的规矩，一桌酒席少说也在几千元。

亏损工厂平时没钱来吃喝，遇到这种可以向军方上报的机会，**借上级的钱，来安抚一下职工中的大小头目们，何乐而不为？**

那一天，对方来进餐的人足有二十多人，一些与商谈业务毫无干系的“头”们都到齐了。这使我看到军管企业中，国有体制的遗风是多么顽固。

对方明摆着是想寻找一个让他们渡过目前状态产品，老马对这个产品质量心中无数；整车的排放和噪声两大难点还没有解决；生产许可证还没取得的条件下，与九二厂联合，是想借军队力量强行取得生产许可证。

强行走向市场的四轮车，一切质量和安全的责任，将落在我们这些负责研制的具体人肩上！

所以一进入谈判，我使用国营企业的工厂那种无人负责，遇事推诿的眼光，来看待马总选的合作伙伴，预先感到合作困难。

联合生产四轮车的意向性合同第二天就签订了，金汇公司需要提供四轮车的全套图纸和指导人员，协助九二厂汽车分厂作好技术和生产的准备工作。

还好，我已把车架的工艺装备图纸，以及车身分块的工艺卡预先准备好了，我和马总商量后，决定把刚刚进厂负责工艺的黄辉祥接到龙泉驿来，一边完成底盘焊接工艺装备的制作，一边对九二厂试制第一台样车作工艺指导。

我们立即返回南坪作下一步的准备，像来成都的行驶一样，样车在马总小车监护下从成都出发，车到潼南已是下午两点钟了，为了赶路，老马大胆建议走高速公路。

根据高速公路管理办法，禁止试车驶进高速路的。好在潼南高速公路的进口疏于监视，等到四轮车买了票，已经驶过路口好几百米了，管理处的人才疑惑的喊道：“那红车子是什么车？”另一个检票的回答道：“我也没看清楚，好像是进口汽车，样子很漂亮。”

当我们两辆车驶过了路口监视人的视线之外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汽车在高驶公路上提速，使我们能在傍晚时分驶抵南坪。老马对样车倍加称赞，第一次长途连续行驶千余公里，整车没有发生任何故障使他十分高兴。沿途对样车造型交口称赞，说明造型美观，很受一般人的青睐。

回到重庆已是 1998 年的除夕前夜，大家只放了一天假。

1999 年 1 月 2 日，第二次与黄辉祥一起乘坐四轮车到了九二厂，这一次我

和老黄花了几晚上详细的校对了四轮车工艺小车的图纸，以及四轮车车架各组合焊的分件尺寸，并且初步计算了初期投入的成本。

在九二厂派来的专职技术员参与下进行校对后，初步确订了单车底盘的材料定额，工时定额，以及焊装工艺的过程。整整进行了十天紧张工作。

没有想到我们回到重庆后，还没有一个星期，黄师傅打电话回南坪告诉马总，所要制作的车架材料迟迟没有买回，招来装车的工人，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经常不见人影，这些工人的理由十分充足，九二厂的工厂管理方面没有给他们一分钱的工钱。

这年头拖欠工人工资事太多，这家工厂实际上处于停工待料。整天面对着冷冷清清的车间，黄师傅自己一个人怎么干？因为天气冷，得了感冒，反正干不起来，他要求从成都回来，另换他人。

自此原先热火朝天的计划和图纸很快变成纸上谈兵，我在开始谈判的担心终于发生了

回想起来，我从 96 年为赚取孩子学费，打工三年处处短命，处处碰壁。最先的青杠干了才半年，就碰到了政府封杀走私车，只好离开；接着就为陈家桥的防弹服项目，全套文件已经准备好，鉴定会也开过了，又遇到了领头人因利益冲突很快散伙；

这一次四轮摩托车搞了一年多辛辛苦苦的爬地沟，加夜班苦思苦想解决四轮车存在的问题，又因缺乏资金，看来又干不下去了。

后来由于道路和车辆管理的部门扯皮，设置层层障碍阻拦，而不得不使这个项目中断。尽管老马绞尽脑汁，眼看这么好的项目只好夭折了，我的打工生涯布满荆棘！

第二节：枪杆子也抢民品

2002 年初接到马刚电话再次邀请，电话上告诉我说，他的公司在南坪找到了新的合伙人：“xina 计算机公司”，这家公司与九二厂同属军工系统。

在电话上他告诉我，这几年他在四轮摩托车的研制中，对发动机后置结构暂停研制：新的结构仍取发动机前置，前桥取独立悬挂，传动机构和后桥结构采用这些年进步很快的三轮车结构，动力用 125 单缸发动机。

同时这几年将四轮车划在摩托外的规定有所松动，为实现原先金汇公司的计划提供了条件。只要对原先的事业持之以恒总会有成功的时候。

对他的事业心我很赞赏，但我对成功的希望并不乐观。

我带着犹豫和试探，于 2002 年 2 月份第二次来到位于南坪的金汇公司，它已在南坪西路的中段临街左侧，租到了一套普通民房作为办公室。

他见到我以后，对两年前四轮车试制中一点挫折当了‘逃兵’作了责备。我只是哑然一笑，说像你这样几百块钱一月请人帮佣实在为数不多的，去留当然会随便一点，我已退休，不像你有事业的想法，低工资对我没有约束力，更不存在与产品共存亡的那种豪气。

但是他却拍着胸脯说：“男儿所追求的是一番事业，有我老马在，就有四轮

车在。”说话中底气十足，对他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说着把我带到了试剂厂旁边的一个十分简陋的厂房里。

我们从金汇公司出来坐的是公共汽车，我随口问道：“你的两辆日本丰田车呢？”他苦笑道：“因为四轮车的开发，耗尽了我的家当，两辆车也变买了，我现在也靠公共汽车上下班了。”

当他带着我跨进他租来的破旧厂房时，里面噪声刺耳，尘灰飞扬，厂房里七八个工人，正挥舞砂轮机打磨几个玻动钢做成的车身。

用玻璃钢替代原来钢板结构的车身，这大概就是他这两年来对四轮车作出的重大改进。

接着他又带我到 Xina 公司的本部，四轮车生产安排在公司底楼一角，大约占了五百平米的场地，在主楼的北侧用石棉瓦临时塔起了一个工棚，场地很简陋。工棚中间排放着两排共十台车架，电焊的火花此起彼落。我看了看那房顶虽是牛毛毡盖的。但离地足有十米，不会发生安全事故。

工棚外侧的过道上，放着两个已装上了玻璃钢车身的四轮车，装配工正在装内饰和校正底盘的操纵机构，他们边装边埋怨，整车许多地方装配很困难。

我在这底盘前观察良久，发现安装转向器的横直拉杆系统左右相差太大，同时因为缺横向稳定杆，估计就是勉强装好，整个转向系统不会协调。

再去看安装车架的预装工位上，乱装的现象十分严重。一看就明白这些工人都是生手。问道：“你们是从那里调来的？”回答说：“我们原是从公司的各个车间里抽调出来，并不懂车，也没有经过培训，不懂怎样才叫正确的装配”。

我问道：“现场上的施工人员在那里？”那工人指了指车间进门口坐着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人，说“他原是金工车间抽出来一名工程师，姓张”。

经过了解，我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印象，装车的工人基本上是一批生手，没有技术指导，我又问道：“你们装这种车装了多久？”回答说：“才装了两个月，公司说边装边熟悉”。

下午我将要离开时，我向马总介绍了我看到的状况：“整车全是生手在装，乘用车尤其要注重安全，装车错误出了事是要人命的。”

老马才说：“正因为这样，我请你做现场指导，至于月薪，暂时按每月一千五百元给，是四轮车工段最高的工资了。”

这种四轮车结构，是马总从一个姓赵的手里买下的，底盘采用了长安微型车的悬挂结构改造而成，但极不成熟，还需要大幅度改进。

2001 年 10 月经过中介人的撮合，马刚与 Xina 计算机公司刘经理。签订一项开发金汇牌四轮客车的合作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制造出来的四轮车在推向市场实现盈利后，金汇公司占有 60% 的利润，而接受委托加工的 Xina 公司只能得到 30% 的利润。

在自己的地盘上以自己军工资格向国家贷款，用自己的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自己仅只得到 30% 的利润分成，再大的傻瓜也不会答应的。但对四轮车一无所知的刘经理，利用国家的钱冒多大的风险，只要私人得到实惠都是可以的。

何况，若四轮车开发顺利，“一无所有”的小小金汇公司，将被 Xina 关起门来吃掉，“贪婪”这个怪物产生出阴险的算计。

当然，在这场赌博中无论是 Xina 还是金汇，都在用国家资金下赌注。这便是当时流行国有资产“流蚀”的合法方式：拿国家银行的贷款和国有设备，实现利润，这是两家牵手的基础。

不过合作人之间各谋各的打算，使这种“开发”带着尔虞我诈。

我到 Xina 上班的第一天，老马就向我打招呼说：“我们和 Xina 是委托加工的关系，所有图纸和技术资料都必需经过我的手，他们的内部关系很复杂，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所以你在现场上最好少发表意见，遇到问题要及时向我讲”。

两年不见，原先不懂车的老马，现在是技术主管了。从别人手中买过产品，又用 Xina 公司的资金和人力将这个未成熟的产品生产出来，老马想出四轮车开发的路够绝的。

Xina 可不是一个破产企业，也不同于龙泉驿的九二汽车制造厂，这里的制度表面上极其严格，进出大门都必需出示工作证。

第一天上班大约半个小时，车间里走进一个夹着点名册大约四十岁的中年人，张工告诉我他是专门负责思想和考勤的杨书记，今后在他面前说话要当心点。经张工提醒，在我忙碌的纠正现场各种错误的装配时，偶而也对这位翘着二郎腿的人投以警惕一瞥。

十点钟，工间休息的铃声响过以后，这位杨书记走到我的身旁，以询问的口气漫不经心的问道：“你是那一个厂退休的，今年好大年纪”？我平静回答了他提的问题后，他又问道：“看样子，你的身体不太好，你能胜任这个工作吗”？我马上就警觉到，他是在嫌我年老体弱。

心中产生了一种防备对方挑剔的警惕，便毫无惧色的冷笑道：“你们 Xina 有的是年轻人，随便挑一个出来试试，他敢在我面前充狠吗？”碰了这么一个软钉子后，他自觉没趣，退到他的的凳子上翻自己的报纸去了。

在中共国营工厂中，像这位杨书记，上班时不做工，而是转着一双贼眼，专门靠找人岔子为职业的人并不少见。尤其在军工企业中，凭着官票和一张打小报告的嘴，占着上风的小人到处都是，同他们打交道，最好是不与理睬。好像这种人不存在一样，便是上策。

我和老马分了工，他专管试剂厂那边的玻动钢车身，而我主要负责底盘的安装和整车的装配，现场反映出来的问题的确不少，有的是设计上的错误，大量则是工人缺乏装配常识乱装。还有的是从市场购进的不合格品而带来的，那张工程师因为不懂汽车几乎不能搭上帮手，使我在现场忙得团团转。

刚刚才接手一个多月，便接到四月底，全国摩托车产品展销会在陈家桥开幕的通知，Xina 的毛总，亲自下令组装两台样车参加展销会。

而我知道这个车目前在装配时，就已毛病百出，更因为它没有经过行驶的验证，心中对它的质量和可靠性本就无底，所以反对草率参展。

结果毛总说装车已三个月，已经花费了近百万的投入，工厂不能老试制下去，见不到效益，投进去的钱怎么向主厂交待？

他俨然从被委托加工，变成主持生产的主人。下令由杨书记督促，务必按时完成展车的生产进度。

展车是从已装好的成品车中选出来的，这位杨书记在展车的车厢外，贴出了 Xina 的大幅商标，并且以 Xina 的牌名，印制了产品说明书。

这就像一则外国寓言里说的，老虎从猫那里学会了捕捉动物的本领后，就反过来要吃老师了。不过这杨书记也太性急了，老马可不是一个随便向 Xina 交底的猫。

我清楚四轮车处在当前质量状态，距成批生产投入市场还远。

负责整个产品质量的我更明白，虽然这个车能够开走了，但是，负责生产行驶系统的厂家还要花大力气，从新思考新的结构，才能确保安全。

经过一个多月了解，我对 Xina 这帮人马接手四轮车开发毫无信心。

国营企业那种见利就上，见困难就让的作风是改不掉的，四轮车前途堪忧。

我对杨书记这种轻狂感到气愤，于是我把他贴在车上的商标撕去，那姓杨的当即气急败坏追问撕下商标的人是谁，工人指认是我，他便破口大骂说我每月拿的工资是他的双倍，现场那么多问题没解决，要我立即滚回去。

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狂叫，并不答话，把我填写的工作记录当众向他掷去，告诉他我才进厂一个多月便发现和解决了两百项的问题，叫他睁开他的狗眼看清楚。

大声喊道：“我不是你叫来的，而是老马叫我来的，要我走，也要老马叫我走，还轮不到你。”

中午时分老马来了，他已听说了上午在装车现场我和杨书记的对吵，他对这姓杨的蛮不讲理作风心中早就不满了。

一面安慰我，一面就这件事专门找到了毛总，双方约定下午在金汇的办公室里，再次对委托加工进行“磋商”。

名曰协商，双方都不加掩饰表示出争夺四轮车研制成果的意向。Xina 指责首批的三十台样车进展缓慢，技术根本不成熟，边做边改，实际 Xina 已不是原来委托加工协议中的被委托方，而是研制的主体。

现在凭他们占据的试制场地，投入成本，提出成立新的股份公司提案。根据这个提案，Xina 所有的八个中层干部都在这个公司中占有一份股份。

这样一来，金汇公司占有的股份不是原来的 60% 而是 20%，同时四轮车的牌名应由金汇牌改为西金牌。才四个月的委托加工，Xina 已由刚刚试制时一无所知的状态，而变成主人了。

老马没有估计到形势如此陡转直下，原来与四轮车开发完全无关的 Xina 中层干部，全部成了毛氏股份的股东。

这就是中共统治下的新型社会主义私有原始积累：Xina 用国家的钱作资本，如果赚了钱就落进股东们的荷包里，如里亏了，这些股东分文不会掏私人的钱来抵亏的，这种用国有银行贷款进行的公开掠夺非常精彩，当然，Xina 入股分红的八名干部，又绝不会按机会均等的原则平均分赃。

到果真四轮车撞入市场，获得的利润，杨书记和毛总，岂容费尽心机赚来的钱与其它人平分共享？

拿去参展的两台四轮车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最佳效果，四轮车以价格低廉，样式美观，安全可靠，受到了使用三轮车代步的外国用户青睐，这些国家的贸

易代表团在展销会开完后，便到 Xina 公司四轮车生产场地进行了参观，并且分别与 Xina 签订了每年供货两千台的意向合同。

利令智昏的 Xina 领导班子欣喜若狂，那毛总跟着下达每月安装出一百台的生产计划，并加大了对装车配件的资金投入，公开加紧了对老马的侵占和排挤。

自从毛总向马刚亮了重组联合公司的底牌，老马很后悔当初找错了搭档，现在对手吃掉他的面目已显露出来，而所有的四轮车又都在对方的场地上，没法撤了，继续合作下去，只能反被当雇佣使唤，他的研制全都完了。

为了做好同 Xina 撕破脸的准备，他决定要我将四轮车的图纸和牌名，向重庆专利局申报专利，一旦撕破了脸，马刚唯一指望的，用合同法在重庆法院的经济法庭上指控 Xina。

但中国人都明白，在中共人治的霸权下，所有法律是那么苍白无力，尤其是对于 Xina 这样的国防工业生产厂家，他们完全可以在枪杆子保护下，置之不理。万般无奈的老马，只有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呼吁了。

他立即打电话通知公司的常任法律律师，请她草拟一份状告 Xina 的投诉材料，将 Xina 告到重庆市经济法庭，同时他动用了在市里的关系，向付市长吴某提出了一份备忘录。

其实 Xina 的头们在抢夺四轮车成果时，显然缺乏全面权衡。

Xina 的头们根本就不懂，机动车这种产品，是不同于其它任何民用用品的。在大陆，机动车的管理和生产，是由公安部和交通部联合颁布的“公告目录”加以规范的，凡对于目录中没有的厂家和车品要取得生产许可证，是要通过业内人士并花费大量金钱才可买到的。

再说，这现场所摆的三十台样车，在悬挂、后轿、转向上存在着致命的危险，急待解决时，公司领导却大打内战，还有谁能安下心来一个个加以解决？

正好，五一节前，原来长沙地区已经禁止三轮车进城，原先从事三轮车营运的残迹人迫于生计，奔跑全国各地到处寻找四轮车生产厂家。

他们得到四轮车已在 Xina 批量生产消息后，便蜂涌而至，一到 Xina，看见高大的厂房和森严的门岗已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信赖，在 Xina 的四轮车车间里赖着不走，硬要将停放线上的三十辆有严重缺陷的四轮车全部买走。

五一节那天是法定节日，全都没有上班，天也下着很大的雨，马总为此事专门找我对长沙残迹人要车的事表个态。

我说：“那三十辆车我是不敢签字放行的，全部的车都要更换悬挂摇臂和轮毂，尤其是轮毂已在试车时飞出了两次，差点造成翻车，合格的配件等了四五天还不见买回，现在老毛叫放行，说卖出去后再来补救，那是设下一个陷阱，翻了车出了人命，坐班房的是我。”

三十辆四轮车终于没人敢放行，长沙的残迹人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

第二天，老马传达了 Xina 总部的通知，为了防止外聘人员混入 Xina 厂区对军事秘密窃密，Xina 刚刚成立的四轮车分厂总部，立即迁入第二机床厂租借的厂房里，六月初就在 Xina 总部的督促下，四轮车车间迁出了 Xina 本部。我的工作场地暂时也迁到了第二机床厂里面。

三十辆等候换轮毂的样车，在二机床厂的现场上足足停放了两个月。

七月底按照老马布置，试制组全体成员，从三十台首批四轮车中，挑选了两台车准备完成规定里程的行驶试验。在更换不合格的部件后，准备交重庆技术监督局作首次质量鉴定。

正当办完所有手续，第二天就要开到质量监督局进行检测时，Xina 突然单方面宣布，将所有试制的三轮车统统开回 Xina，两辆已开到半路上的待检车也中途折回，开进 Xina 的大门内。

那已经好久没出面的张书记，带着两个人突然收缴了二机厂库房的钥匙，并在门上贴上了 Xina 的封条，一场强盗式的抢劫四轮车，及库房四轮车配件的行动，便在二机床临时租用场地突然打响。

我在车间的楼上亲眼目睹了这场穷凶极恶的抢掠，一伙军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抢劫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Xina 的五架卡车在车间搬运工的配合下，几个小时之内，将三十台样车和全部库房物质，装配车架用的工艺装备全部抢走，运到 Xina 本部，交给荷枪实弹的守卫人员看管起来。

当时，我忍不住在楼上向指挥抢窃的杨书记骂道：“强盗，简直是一伙强盗。”那姓杨的竟毫不介意的从楼下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不禁想，这伙从贵州大山里迁到这里来的山野村夫，看着几辆四轮车都眼红，日子久了，不定还会干出更出格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把这些车抢去了，可没有弄清存在重大问题，他们实际上是抢了一个祸事捏在手心里。

深夜三点钟，当楼下的东西已基本上一扫而空后，安在楼下的电话铃响了，电话筒里传来了老毛的声音，他说：“你不要误会，我们因为场地租赁费太贵，现在重新搬回了 Xina，等待着安排新的场地，眼下我们正在重新调整四轮车的技术力量和劳动力，我们欢迎你到总部来上班。”

听到他的话我浑身阵阵感到肉麻，姓毛的不仅抢了东西还想抢人，我恨恨的回答他：“没看见你们这样公开抢老百姓东西的部队，你就不怕金汇在法庭上指控你吗？”对方的电筒里传来了哈哈大笑。

按他的逻辑，他们是保卫公家的东西，不被私人老板占去。从来没有民营企业告倒军队的先例，毛泽东早就说过了：“枪杆子里出一切”！

抢劫事件的第二天早上，金汇公司办公室里，撞进来了南坪工商所执法人员，他们说接到举报电话称，金汇公司‘私自’组装没有任何许可证的“黑车”，按照工商管理条例，非法组装的黑车，不但要没收，还可追查黑车组装者的法律责任。

看来 Xina 的毛总和杨书记十分通晓黑吃黑这一套，四名执法人员要马钢带他们去黑车的现场。

到此金汇老马反被反咬了一口。

马刚走到他最不愿看到的一步，请律师向重庆法院就违反合同法和侵占他人专利权，将 Xina 告上了经济法庭，就这样从 2001 年 11 月开始至 2002 年七月份止，为时八个月 Xina 和金汇公司合作对四轮车的开发研制，最后以 Xina 撕毁合同，抢占四轮车宣告了它的终结。

垂头丧气的老马被迫解散了四轮车所招纳的金汇公司全体成员。

然而他并不甘心失败，一边将我留在他的公司办公室里，根据张工绘制的残缺不全的四轮车另件图纸，以及我对整个四轮车底盘的回忆，依凭在试剂厂的厂房里还控制在自己手里的玻璃车壳，绘制了整车的装配图。

老马不甘心就此放弃奋斗多年的研制成果，一面应付着与 Xina 的这场官司，一面四处寻找新的投资伙伴，准备时机成熟东山再起。

可是，靠抢杆子抢夺他的人产品的头头，把到手的产品看得太简单了，股东们坐在办公室里打着如何“分赃”的算盘，争吵声在大楼上响了好多天。

但对于四轮车的结构和基本性能一无所知，听凭一群 Xina 本厂的工人在现场上瞎装的 Xina 头们，严重连反边试制边试验的科学方法。对初期试制样车已发现的问题又不知怎么去克服，便匆匆将带病的三十台样车卖了出去。

结果卖出去不到一个月，便陆陆续续的被用户退了回来。在残疾人用户的一片谴责声中被迫关门整顿。面对这种恶果，Xina 的领导们为追究责任，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狗咬狗的争吵。

好在 Xina 头头们自有弥补损失的招数，三十辆长期积压在库房中的旧车，被当成产品试制的正常报废，名正言顺地报销了。其后果，无非是给上交国库的中国亿万纳税人，增加了一笔小小的负担而已。

在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市场经济，产生出中共官僚中的贪婪、外行和荒唐。他们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用正常情况不可能给他们提供的冒险机会，以卑鄙手段掠夺弱势个体，不用尊守道义规范和失败的风险。

第三节：城市猫

十月底，金汇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到重庆市国际公司一位杨经理打来的电话，自称是马老板在机床厂的师兄弟，现在承包了该公司进出口车辆的业务。

最近他得到了国外需要批量很大的四轮摩托订货单，他知道老马从事四轮摩托研制多年，所以特地来电话和他商量。

姓杨的打电话来时老马没在，等到中午老马回办公室，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正在焦头烂额中寻找合作伙伴的马刚，得知这个消息，立刻与这位杨师弟通了话，并在下午亲自到国际公司去了一趟。

下午回公司时，他满面红光，心情显得兴奋起来，将近三个月堆积的一脸愁云，似乎消失了。

回到办公室里，便把几张我们没见过的三轮车照片往办公桌上一摊，指着它们说：“这便是国际公司得到孟加拉国订购的样车照片，名字叫“城市猫”，对方说，只要在外形和质量上得到保证，生产多少他们就要多少。”

这对于三轮车相对生产过剩的重庆大小三轮车厂家，都是一个有诱惑力的客户。

城市猫的发动机是意大利比亚特公司产品，我听后心中却在想，要上批量并不那么容易了。何况发动机还要靠进口，制造成本经过初步核算没有？

正想提出问题，老马已向我布置了任务，要我根据照片的外形，立即绘制一张整车的效果图，再用电脑进行修正复制，达到这张照片的正面和侧面的效

果。并说外商在两三天内就要来公司洽谈，达到外商要求后，再把效果图传真到孟加拉国，国外公司本部去。

第三天，国际公司的老杨带了一位广东籍的外商代理人，到了金汇的办公室里，那外商代理姓罗，看上去很年轻，他看了绘制的城市猫效果图后，介绍了孟加拉国对这种车型需求的市场前景说：“只要按质按量在二十天内拿出样车，他便能够代表孟加拉国订出年需求量三千辆的订单。

三位老板级人物的乐观，使金汇公司小小办公室里泛起了一阵起死回生的春潮。我们商议了在二十天内出样车的方案，老马表示金汇公司虽受 Xina 的影响，但生产四轮车玻璃钢的厂房可马上用作新样车的试制场地。

刚解散的人也马上可以召回来，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摩托装配工，可以根据样车的照片和效果图，确定出它的结构和基本尺寸。所缺的就是购买装车部件的资金了，老杨立即表态，初期制作样车的钱由他负责筹集。

于是三个人初步定了分工的方案：马总负责生产场地重新布置及今后的现场管理；杨老板负责试制资金以及外销的运输集装箱准备；罗总答应马上通知孟加拉国，并负责运发的国际手续和样车出售后的资金回笼。

生产场地很快地整理出来，原来四轮车用的玻璃钢车身和模具暂时全部堆放起来，第二天杨老板带来了一个叫陈大发的投资人，据杨老板介绍那陈大发原是在渝州大学读书的同学，现在正在宗申公司协助袁老板筹建壁山三轮摩托车分公司的建设。

重庆的摩托车私营厂家，经过几年拼杀兼并，已形成了宗申、隆兴和力帆三大托拉斯集团，他们各自拥有几十亿的资产，虽然民间对三大集团的总裁口卑并不好，但谁也说不清，他们同中共重庆市委有什么样的渊源。

壁山新成立的三轮厂，把过去套用宗申铭牌的各小三轮车厂实行了兼并，正积极地寻找新的三轮车样车。所以在得到老杨信息后，决定将金汇公司纳入到宗申集团，专事开发新的三轮样车。

那陈大发一到了金汇公司的办公室，将腋下夹着鼓鼓囊囊一个皮包向老马办公桌上一扔，老马见财神到，满脸堆笑躬身站起来，打开我们制作的城市猫效果图请他审阅。

一面介绍金汇公司开发四轮车的经过和积累的经验。那陈大发对老马的自我介绍并不感兴趣，他需要看准备制作样车的场地是否已就绪。

在参观了生产现场后，那陈大发倒也爽快，回到办公室从他的皮包中取出了一叠百元面值的五万元现钞，往办公桌上一甩说：

“这是宗申公司的初次投入，用作两台三轮车和一台四轮车开发，购买零部件和材料的专用资金，如果不够，随时通知我。样车如果按外商要求，按质按量完成，那么今后你们就是宗申公司的一员了，我们以你们为骨干力量共同开发外销车。”

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脸色一沉，继续说道：“如果样车搞砸了，那么金汇公司就砸了自己的饭碗，我们充其量就当作在澳门的赌场上输了一把。”

听到了这带刺的话，我心里实在不是一个滋味。在这些没有长大的资本家

看来，唯有钱才是万能的，有钱可以兼并小公司，像我们这些读了一辈子书，挣到了高级工程师这个“虚”名，只不过是人家用几个工钱召来，可以随意使唤，不满时可以炒鱿鱼的打工仔。

五万元在老马看来是一笔拯救本公司的救命钱，而在陈大发的眼里，不过是赌场上一局小小赌博的赌资。

当然小老板的洒脱会使老马拱手把五年辛苦的奋斗，交给这个赌棍左右。想那宗申集团，也是近来才从市政府通缉夹缝中存活下来的小摩帮，时来运转，也不知使用了什么招数，居然替代了嘉陵集团这样的独霸四川的摩托王，成了重庆市三大摩帮巨头，连他手下的一个小头目，也敢今天在这里说大话。

真可谓社会主义江山无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共在推行建立市场经济的主意时，绝对遵守谁逮到耗子便是好猫这个原则。

钱，在初期长大的小老板眼里才是适应生存的手段。

回忆起来，八十年代后期，我去机械局参加会议时，就听说重庆市几个摩托帮主为求一席生存，躲避工商部门封杀通缉的故事，私人的摩托业主当年，最难弄到的就是生产许可证，而生产许可证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权，没有钱买到生产许可证的工厂，即被认为非法经营。

对于重庆摩帮，我不清楚他们具体的发展过程，从没有认真思索过它存在的理由，因此也无法估量他们今后的无量前途。

只听说他们上午被工商查封了店面，下午又在另一个地点开了张，像游击队作战一样，想不到这样顽强拼了几年后，竟然长大了。

今天产生像牟其中这样的中国巨富，那一个又不是邓小平及其官僚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木偶？然而，随着中国权力变幻，这些风流人物有几个能逃掉阶下囚的最终归宿而昙花一现？

小业主们在市场经济苛捐杂税的重压下，难免偷税漏税，或在流通领域中‘违法乱纪’，是使他们沦为阶下囚的原因。同时为了私企的发展，对这个失去了监督的官僚体制实行贿赂，就成了常有的现象。

重庆的几个摩帮巨头中，无论是左宗申、尹明善和涂建华都是善观统治者脸色的投机者，只消看看他们在种种公开场合中打出来的旗号，就会明白他们向权力谄媚的程度。

左宗申的：“拳拳报国心，款款宗申梦”的巨幅横幅，撑在交通枢纽的上空，尹明善大吼：“民族工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中共在“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这些叫得泛味的标语后，提出来比较切合民众心理的口号。

中共的专制政体最命脉的一条，就是强迫全国人民在他们的意志下统一，尽管这些民族主义的口号与中共的纲领，牛头不对马嘴！！

中共所扶植的私人老板，在改革开放中拼命扮演一党独裁的代言人，我在摩帮几年打工就知到摩帮的底，他们决不愿为科技发展而献身的。

研制四轮车，在马老板这里找不到一本设计资料。

后来在宗申和隆兴的研究所，看不到属于本公司自己设计思想的理论阐述和计算资料。在他们的开发室里，找不到一辆属于自己民族研制的样车和换代产品，甚至于找不到一个独特的样车模型，里面除抄袭和模仿外什么都没有。

至于摩帮研究所的领导人，无论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完全热心于短期效益，照抄国内现有的其它厂产品，照搬国外过时的设计，工厂标准互相抄袭。

然而，只知抄袭别人的民族是一个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这些老板拿不出任何治理企业，规划产品的方案来。国家和民族决不会因他们的出现而振兴，也决不能依靠这些私企老板求发展。

国家要这些老板为生存而拼命赚钱，并交纳征税，以取代原来的国企！！

在私企工厂的劳动者可以随意被解雇，每个劳动日的劳动时间都在 12 小时以上。星期天加班和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并且经常拖欠工人工资，这些就是走投无路的国企，所要达到的目的。

私企是靠盘剥更多的劳动力而生存的，所以在中共体制下的私人企业，是比任何资本主义更残酷剥削工人的怪胎。

马老板在接到陈大发的五万元后，立即派人买回了样车制作所需要的钢材及配件。三轮车无论是车架和车身上的设计，是现有机动车辆中最简单的一种，对于从未从事三轮制造的我，仍坚持根据车的最大载荷，画出每根梁上所承受的力。以选择材料和断面保证其刚度和强度。

三轮车结构绝大部分由焊接而成，为消除每个焊接点所产生的应力集中，选择焊接材料及焊接方法，保证行驶中不致发生断裂、变形等安全隐患；需要编制工艺，进行设计计算。但我翻找所有公司技术资料，却找不到有关设计和工艺的资料。

而我按常规进行这种计算时却受到三个老板的讥讽。

陈大发板着脸问道：“像你这样搞，等到你把整个计算拿出来了，雇主恐怕就另求厂家了，你懂不懂什么叫商机，商机就要讲快，没有像你这样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力学计算的时间。我们宗申集团，不能让你们这种书呆子当成试验的场地，坐失商机”。

那老马和老杨喊道，“老孔你要明白整个制造交货期只有二十几天，我们不能让你慢条丝理的搞计算了。”他们的意见具有权威性，他们话语中刺激人的用词使我懂得，这里需要的是一些懂得普通三轮车结构的熟练工，而把我这样的人当成绊脚石，我预感到我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实际上三轮车从来就讲的“类比设计”，根据现有的车，凭经验，甚至凭感觉选择材料，确定断面尺寸。

至于这样定下材质断面，会不会断裂和变形，或者因为过份粗大而浪费材料，带来功率损耗，就只有在今后从行驶中才能发现。

老板为争得商机，关键能不能在用户所规定的时间拿出样车，耽误交货的时间是决不允许的。我一个打工仔，怎能拗过财大气粗的陈老板？

明白了这层道理，我心中便有了主意，第一，三个老板已经视我为障碍，既然他们已经跳到指挥开发的位置上，所以我只能尽快地躲开，走为上计。

第二，在我物色到新岗位前，千万沉住气，老板怎么说，就怎么执行，同这些把精力花在赌场和女人身上的有钱人，犯不着争谁是谁非。

就是看到明明错误的加工方法，只要是老板定的，我就要装做没有看见。这样，今后出了问题也不会算在我身上。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私人老板有时比国有企业的厂长更不讲理，更不懂科学，那怕两个老板在高等学府里混过几天。有了几个臭钱就变成了凌驾一切的主宰了。

“城市猫”试制的开工的时间选在 2002 年 11 月 8 日，杨经理说，这一天，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日子，日历上写得清楚，这一天是黄道吉日，共产党都相信天命了，阴阳八卦，讲天道轮回，对于不信鬼神的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他吩咐在简陋的试制场地挂起了三大串鞭炮，燃放后，将临时召来十多名工人召集起来，朗声宣布，宗申三轮自制的第一台摩托车就此开工。整个简陋工棚里立即被电焊的弧光照得通明刺目。砂轮机，敲击声，震耳欲聋，一改三个月的戚静。马老板在下料工段指导着每一个下料尺寸和焊接方法。

从那以后，陈大发每天晚上十点钟驾着他的进口立桑车，赶到现场对已焊好的车架，指手画脚地发表一通意见。

根据谁出钱谁说了算的原则，现场的工人们都要根据他的意见，把已焊好的结构从新割断，从新焊接，谁也说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种既不耽误进度，毫无根据的返工更改，只好以延长工人的加班时间来补偿，所以经常要做到晚上十二点钟，而召来的工人对这种只加班不加工钱的蛮横做法，心里只有暗自骂娘。

但是，社会上的失业者到处都是，马老板招来的都是附近的国营长江电工厂下岗的待业工人，他们忘不掉失业待岗的尴尬，只好用白天消极怠工发泄不满，并不敢违抗。指定的组长秦三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讨好老板，背地里把工人说的牢骚话都悄悄报告了老板。

所以，小小工棚里几乎天天都要听见陈老板对工人的训斥声。

陈大发骄横，杨老板拔扈有余，马老板阴阳变脸，三个小老板各有手段，为了争：“我说了算”谁都互不相让。他们本就是为了“城市猫”优厚的外汇，临时凑合在一起的利益联盟，无所谓谦和和团结。加上他们那一个都凭着“我看这样才好”的主观意愿，所以谁都不能说服对方。

有一次就所占厂房的租约，杨老板和陈老板没说上五句话，便当着工人的面大吵起来，并不顾及他们同窗情谊，开口就拿对方的妈出气，摩帮内说话粗俗已成习惯并不奇怪。

工人们看到小老板为一点小事翻脸，也在老板间拔弄是非，所以这个总共不到二十个人的集体，从成立开始就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

看来，开工的黄道吉日并没有选好。这使夹在这些人中的我特感难处，我本抱着拔一下动一下的态度，在这种一盘散沙的集体中几乎动弹不得，最后，连秦三都认为我可欺，动辄当着老板指责我。

我虽将技术上的决定权拱手还给了马道刚，但老板们随意定出来的尺寸到头来却要我表态。我只好声明，整个的设计都由陈大发决定，我凭什么下结论？于是马刚把编写产品说明书和企业标准的任务交给了我。

车还没造出来，技术参数凭什么定？虽然可以胡弄我国商检部门，但要骗用户就困难了。当然，中国的商品基本是从外国偷学来的，造假仍是中国大陆

的拿手好戏，我就只好根据马老板的意思，把我眼睛闭上，瞎抄别人的东西。

然而，我一双不识时务的眼睛，看不惯缺乏机动车结构的外行胡搞，例如焊接车把龙头，不能用切断材料对接焊起来，这样焊接起来会造成应力集中，潜伏把手折断的危险；秦三将减震器焊成与车架几乎平行，使它不但失去了减震作用，反而会因行驶中车架来回振动力作用，成为撕裂车架的原因。

当我纠正他时，他说：“那里的位置不好焊，经请示马总以后叫这样焊的。”

我见他把 Xina 杨书记那一套原封不动的学了过来，忍不住长期所受的委曲，怒骂他是一条围着陈大发的腿转来转去的狗。

一个三轮车底盘因没有在动工前进行设计，违反机动车常识的地方，到处都是。这样的“抢”字当头装出来的车，怎么不发生致命的故障？就是陈大发不提出要辞退我，我早就准备离开了。

然而老马，却反对辞退我。经他们的商议，改派我去当采购零部件总成的技术顾问，买回来的配件因为买东西的人根本不懂这些件装在何处，它的功能怎样，买回来不是装不起，就是材质不对，要反复买几次还不行。例如一根进汽管因弯曲度不对就反复买了几次。

试制就这样在忙乱和吵吵嚷嚷之中进行下去，谁都说不清焊成的车架有几成合格？正好，那位广东的小罗，却带回了孟拉加国需要铁壳四轮车车身的信息。于是我乘机向老马提出，将我派驻指导四轮车的外协。

铁壳的四轮车身，是离南坪五十公里外的专汽厂大庆分厂制造的。每天一清早，我就起床，匆匆去乘坐从南坪到北碚的公共汽车。

晚上要摸黑才赶回来，回到临时租的房间里已是半夜，疲惫不堪，肚子还是空空的。插上电炉自己弄饭吃，一直折腾到十二点才能脱下衣服，皮肤触到已很久没有换洗过的被盖，感到沾糊糊的，疲惫不堪的我还经常不能入眠。

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我已六十五岁了，仍只身凄凄惶惶在外打工流浪。离婚后还不知家在何处，心中牵挂孩子，也不知道在成都入学怎样了，现在可是他决定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

想到孩子祖父毕生献身教育，到头来，身陷冤狱，葬身囹圄。他的祖母一辈子立志教育，冤冤枉枉戴右派帽二十三年。我是中共政权下的黑崽子，家庭的不和，给孩子产生的压力，在孩子幼小心灵中刻下了深伤痕。社会影响对他的伤害，致使他对前途迷茫一片，我想不出一点可以弥补的办法来。

窗外飞起细细的雨来，又是半夜了，冬日的夜雨对于僵卧在租房里孤伶伶的我，感到特别冷，白天受那陈大发故意的刁难和刺伤，心里真不是滋味，睡在床上难以入眠。

经过连夜加班，外销的“城市猫”样车终于在奋战了一个月后，横躺在工棚里。进度倒是如期完成了，陈大发还按照比亚特的照片，将车架上发动机的位置移到了大梁的中段位置，并且为上下方便，取消了加强横梁，拿出去在附近马路上行驶一圈以后，车架的脊梁好像得了佝偻病似的，塌陷了下去。

我仔细地察看了整个的纵梁，除因为多次返工，反复的焊了又割，割了又焊，留下无数癌细胞一样重重叠叠的焊疤，使整个车架退了火似的变软了。

所以当驾驶员一坐上驾驶台后，还没有装上车壳，车架中部便先掉下去了

三公分，我心中明白，这是一台无论如何都不能正常行驶的车。我由此想到摩帮门的胆大不就是因为不懂吗？不懂车的人指挥做车，发生的车祸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可怕。

我正在对这些车架发怔，那陈大发却在一边冲着我吼道：“你站在那里怔什么！整车要按时交货，进度必需得到保证，你现在根据车架尺寸，将车厢的结构图画出来，明天就去道角的车厢厂，无论如何要他们在五天内，拿出车厢，连夜装车油漆不得有误。”

我从蹲着的位置上站起身来，正想向他讲我刚才测量的结果，劝阻他千万不要把这种车拿出国外出丑，但耳朵里突然响起了他第一次到这里来就曾说过：“……如果样车搞砸了……我们充其量就当在澳门的赌场上输了一把。”

又想到他已累次对我非礼，并扬言要辞退我，便一声不吭的走到办公室里。

画好草图交给老马审阅后，第二天，便拿着草图向道角的方向趁车到车厢厂去。到了车厢厂，他们要求将车架运过去，他们好根据实际测量出车架和车身有装配关系的地方，再定出车身的尺寸。

我告诉他们，老板正追着抢进度，不可能将车架运过来量尺寸。

下午我回到南坪的加工现场，马老板在吃饭时就命令我说：“光有车身还不行啊；你去把样车的座椅给我定回来。”

吃过饭我又急忙奔座椅厂，与座椅厂的周厂长商量可不可以按我提供的尺寸先做一套？周厂长冷冷的说：“你们那个金汇公司一点信用都没有，要新的座椅可以，但先要交付开发费。”

听了他的话，当即向老马打了电话，讲明现货没有，要想另做座椅必得先交开发费。马老板在电话那一头，恶言说道：“他们不供就算了，摩帮没有先支付开发费的规矩，只是请周厂长想清楚，今后我们的外销车开发成功，上了批量他想挤进来供应，就已经晚了”。

摩帮这种主厂吃配件厂兼以讹诈利诱相威胁，逼迫对方上钩是一种经常的惯例。我明明知道这次开发的失败结局，四轮车的门铰链还要等我到大庆沟定下来，不允为座椅纠纷耽误时间。

于是便要了几个长椅子拿回去改制，等到尺寸定好之后，再批量定货不迟。主意打定，便买了一套长安车用的座椅，急急忙忙回到了试制车间。

老马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见我拿着长长的凳子回来，便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按照我们车的尺寸，长丰座椅厂确实没有现存的货，我只好拿回来现存的凳子，由长改短，确定安装的准确尺寸后，再交由加工厂批量的供货。

不料，他把脸一沉，训斥道：“现在大家都在加班赶进度，派你去半天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拿回两个这么长的凳子怎么装？”那陈大发从工棚里攒了出来，说：“我们是私营企业，不能拿你国营厂什么都等现存的工作作风来混日子”。

两扳子不轻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便将好几天早已沃在心中的怒气冲口说道：

“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是设计车身，我已经做了，拿座椅我也落实了，并且有了解决的方案，今天一天从早上六点起床，直到现在，工作变了三次，还没有坐下来休息一下，我被你们当作一个棋盘上的走卒一样，一会儿摆在这

儿，一会儿摆在那里，如果你们实在看不顺眼，我走好了。”

说着我把扛在肩上的凳子往地上一掼，那秦三在一旁火上浇油说：“你这是什么态度？”那杨老板见我动了怒，便缓了口气说道：“你吃了晚饭没有，先去厨房把饭热一下，填饱肚子再看怎么办？”我一看时间，已是晚上九点钟了。

吃过饭，按照我在归途中想好的方案，同一个工人一齐动手，将座椅改短，支架重做，一直忙到凌晨两点钟，两付座椅已改制成功。马老板自觉下午说的话有些不妥，向我解释说：“外商的交货期逼得紧，你看我还不是和你们一样，忙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家……”

我想到再不离开，这种车出了国境线，今后打起国际官司来，我真要兜着祸事走了。晚上便写好了离职的报告，第二天交给了马总。

马老板看着我的辞职书一言不发，此时他从两个多月的吵吵嚷嚷中似乎清醒了下来，他明白我们合作多年，开发四轮车走过了多少政策、技术、人办、资金所铺设的坎坷路。

2003年，一月份，宗申集团的基地从南坪，迁进了他们在大堰沟租好的厂房里面。

就在我执意离开宗申公司的前两天，两台已油漆好，准备运往海关的“城市猫”三轮车，雄纠纠正开出了试制场地，在马路上作装箱前的最后也是第一次试车。秦三得意洋洋坐在驾驶员旁边跟着试车，样车顺着铜元局一路下滑。

此时他的心里很得意，因为这是他“指挥”的第一台外销样车的制作。

不料刚刚开出去不到一小时，估计两台车驶到河边的最低处向上回返的时候，马老板接到了秦三的电话说：“两台样车在上坡时，无论如何都爬不上来了，现在正停在河边，只等公司派汽车把它们拖回来。”

等到两辆新车拖回试制工地的厂门时，秦三沮丧的从样车上走下来，我看到那里程表的读数才十公里，再仔细看大梁已明显压弯，发动机离地面只有10cm，秦三嚷道：“后轿的速比装成了平原型的，当然爬不上坡了。”

然而，我最清楚，还不知道有多少问题等着这辆第一台“城市猫”。还好，没有伤着人，新开发的‘城市猫’仅仅跑了十公里，便不能再开了，这个车架最后只能割断，从新来过。

承诺按时交货的罗老板只好立即用国际长途告诉接货方，因为客观的原因，海关没有通过，至于何时才能发货？要等海关手续办完以后。

当时对重庆三大摩帮有一句评语说：“只有摩帮那么大胆，因为他们不懂。”这无疑是指的现象，要探究摩帮兴起的原因，只能从国营企业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生产不能创新，长期成为国家负担上寻找。

摩帮的出现，帮助中共新的当家人，完成了甩掉国有企业掙得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国营企业“破产了”，大量的富余人员顺势被推出了国有企业，留散到市井中，工人成了社会主义最惨的试验品。

我不知道，重庆的摩帮怎么会热衷于“冲出国门”这种壮举？被中共利用和操纵的摩帮，对自身产业所知甚少的水平上，盲目冲出国门无疑于“找死”。

也许把摩邦的‘冒险’精神，说成中共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未免夸大，但是用无知和冒失代替科学态度和诚实工作，个体户短浅的暴利追逐，拿出质

量极差的‘中国货’，无疑要在走出国门后受到国际制裁，今后会证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产品，同中共的独裁制度一样将受到主流社会的抵制。

自从今年 2 月，我辞别了含谷，来投马刚后，短短一年时间经历的所见所闻，亲身体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的社会百态，目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期的表现，只感到乱麻一团，理不出头绪来，更看不出它今后发展成什么样子？

第四节：在劲隆公司

我将要投奔的是属于大渡口区大堰工业园区里的劲龙公司，它属于三大摩帮之一的隆兴公司。据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谭总介绍，这几年重庆摩帮从发达国家那里引进了三轮、四轮，以及用于水上、雪地、沙滩等等道路的专用车。

他告诉我隆兴公司准备成立一个特种摩托车辆厂，在听到我的经历后，他欣然的接纳了我。

谭总大约三十多岁，他说他在万虎摩托车厂当了八年的销售经理，对于摩托新产品的开发，有浓厚的兴趣。但因为他是学会计的，所以对机动车是外行。在我来前，他已从摩配厂家那里听到了我的情况，表示欢迎我来他的公司做技术指导，他的谦虚使我对树了信心。

第一天去，我就在他的陪同下参观了刚刚铺设的生产线，如果说经营得好，特种摩托车，有很可观的前途。

这一天返回南坪我原来租房时，已是晚上七点钟了。没想到，在我住宿地门口的马路边，碰到了马老板。他见到我，满脸堆笑说，为了等我，他已在这里恭候多时了，问我上那里去了，怎么手机一直关着？

我告诉他我已在劲隆公司应聘，过几天我就要搬过去了。他连忙劝阻我说：“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忙于产品开发，外销的任务使我们彼此没有交换意见的时间，对于一些误解也没有及时疏通，相互产生的不愉快希望不要往心里去，我们已合作多年，彼此都十分了解，何苦为口角而离开？”

我心里暗想，如果没有试车对“城市猫”来了一个大揭丑，暴露出它的致命失误，使他清醒，他会对我主动疏通么？

我告诉他，我虽是一个打工仔，但知道为人诚信。我既然已答应了谭总，岂有失信于人的道理？何况那陈大发对我已下过多次逐客令，我岂有再回去的道理？

他明白已经无法挽回了，说了声“如果你在隆兴工作不如意，我仍然张开双手欢迎你归来。”唉！有他这么一番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到劲龙公司第一天上班，我就被安排在开发部里。技术部里的工作人员小陈和小曾向我介绍了公司的情况，他们拿出一大叠香港著名影星，在公司成立庆典上与公司要员们的合影照片，在这些精制印刷的广告中，最显眼的是本公司特聘的“形像大使”成龙。

这几年，重庆的商业广告已为各行各业采用，重庆的摩帮为了销售战略的需要，用重金聘用一些名演员来作自己的代言人，李连杰，周杰伦，成龙等等巨幅照片布满了马路两旁。

至于摩托车的技术和质量究竟如何，是无法从广告上知道的。

小陈和小曾打开了靠墙的档案柜，里面除了存放着劲龙牌两轮车的企业标准以及原总工程师留下四轮车装配示意图外，连三轮车的装配图和部件图都没有一张，更不要说有关特种车辆的技术资料。

小陈说：它们全都储存在开发部的三台计算机里。

但是，我请他们打开计算机，看看里面究竟存放了哪些资料，小陈却说：“你不要拿正规的工程设计去要求摩帮，计算是没有的，它们有时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一个车的车架就只要尺寸就够了，至于讲新品开发，只能按要求选择现存的类似结构就可以了。”这大致就是摩帮们共同的技术状态。

两个年轻人向我介绍了公司的人际关系，他们说公司成立还不到半年，各部的部长都是新到位的应聘者，宗派关系还有没形成，本公司工作作风还算正派。这使我感到很高兴，以为可以放手干点事。

于是，进入公司第一天，我就草拟了准备开发特种车的工作计划。

按照谭总的工作安排，我们在装配车间的楼上，开辟了一个足有五百平方米的样车试验基地，样车在计算机上经过绘制结构图，便可绘制车架图。

利用这个便利条件，三台全新的三轮车底架图，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便绘制出来，它们陆续在试制场里诞生了。

下一步就是对样车进行可靠性的行驶试验，只有经过长途试车，才可以验证我们所作初步设计的可靠性。也才可以验证整车的动力、动力传递和结构是否合理，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而试车的牌照却一直迟迟地没有拿下来，由我起草并经过谭总批准的试车申请报告，一直押在公司的经理办公桌下。

公司的头目说什么“摩托车”试什么车？这一笔费用该由谁来开支？他们根本不同意自己进行有创意的车体结构设计。

他们问道：自己设计的车身，用户能接受么？市场能接受吗？我们是靠自己的钱来办厂，而且又是小厂，开发后能否打开市场？即使一举成功，大家争着去学，你的新车说不定还没有卖出，别人已经仿制成功了。这笔试制费岂不是替人家付了吗？

谭总在公司决策人面前被问得哑口无言，试车工作由此受阻。

为了纠正谭总的开发计划，隆兴公司派了一个姓罗的人来担任总工程师，干脆取消了我领导的技术开发室。

这姓罗的积极主张“捡别人现存的东西做。”这是摩帮们对新品开发的原则！！这种时候我只好采取回避，独自一人在开发室里闷坐。

停在开发室里经过两个月辛苦开发的十几种款式新颖样车，被全部封存，！公司的管理机构却像肿瘤一样长大。这个总共六十名成员的小公司，就有一半以上的科室管理人员。

总经理以下有六个科室，分设五个部，最大的销售服务部就占员十五人，几乎是全体员工的 1/4，物流部的采购人员就有五个，还有库房管理人员五个，这样的公司恢复了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

谭总为了推行部长责任制，排解天天都发生的扯皮现象，不得不每天召开

生产协调会，然而，扯皮的生产协调会，除了拖住谭总的全部精力，并不能推动工作的按时完成。

这与我很熟悉的李友时代的农汽厂几乎一样，生产协调会上到会的部长们各说各的理由，然后毫无结果的散会。可是亏损却像鬼魂一样的附在这个新成立的公司身上。

我曾建议谭总少开会多调查，多调整不协调的部门，可是他说这是公司选择的日本管理方法，谁也无法违背公司的管理思路。

贫穷百姓在中共致富诱惑下，重庆的三轮摩帮在其开始兴起时，是由许多彼此独立的家庭手工业组成。这些向大公司采购发动机和配件，借用大公司的牌名，一哄而上的，分散在重庆九区十三县的街道小巷中的私营小“作坊”，从来没有正规的设计。

这些质量低劣的三轮车，从四面八方涌入市场。小业主说如此总比失业好，正是靠着廉价的优势，满足了视生命很贱的城市贫民和农村苦力的营运需求。

这些带着结构和材料的先天缺陷，使三轮车不断发生翻车、车架断裂、制动失灵、方向失控的致命事故，危害穷苦下层百姓的生命。

中国的车辆管理部门想通过国际上推行的 3C 认证，来消除或减缓这些层出不穷的人身伤害，扼制粗制滥造所带来的交通隐患。但是中共各级官僚的腐败，使 3C 认证机关把这种神圣的使命变成金钱的交易。

小作坊找到大企业，大企业出钱买认证，小作坊出钱买合格证，最后还不是维持老样子。隆兴公司也同相当规模的大摩帮一样，决不会把 3C 认证的过程当成认真提高产品质量的企机。

在上级部门发出通知以后，一面向政府机关交钱，买过关的认证书，一面指示下属子公司对过了关的 3C 材料依葫芦画样照抄，伪造标准中规定的检测数据，便成了公司获取 3C 认证的方法。

谭总知道，我在专用汽车制造厂负责质量工作，所以把认证工作交给了我。我虽不愿做这种花钱作假的事，也只能随大流。

坐在办公室里抄袭其它单位弄来的文件，填写假数据，亲眼看到公司把几十万块钱拱手送给市的认证中心。承接这种抄袭的文牍工作，整整忙了三个月。

没有多久，这个刚刚成立才十个月的企业，就处在内无新品可生产，外无过硬产品开拓销路。在隆兴公司高层管理层的干预下，已严重出现亏损。

到了 2003 年 7 月份，隆兴公司的财务总监，拿着一张劲龙公司十个月来总计亏损百万元的通知转给了谭总，接着由隆兴公司派出了一个审计工作组，进驻劲龙公司本部，把谭总推到被审计位置上去，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我也被当成亏损的一般成员一齐下课，离开了这家公司。

早已等候我的老马，听说劲龙公司的人事变动，当即打电话给我，表示欢迎我重新回到宗申公司。他们那时已从南坪全部迁到大堰工业园区，就在劲龙公司的附近。从劲龙公司出来，我准备去老马那里看一下现场。

刚出门就被老马碰上，他说今天凑巧，杨总、陈总都在办公室，我们正缺 3C 认证的负责人，这一次你就不要推诿了。

我只好同他一起到了宗申现场，试制的场地摆满了各种新型的摩托车，尤其已投入了孟加拉国所需的“城市猫”的成形手工模具。相比起来我的起步比他们早，可惜被开发不如抄袭的思想占了主位，劲龙公司在后期没有投入，所以这里反而先行了一步。

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听老马介绍，宗申现在新品开发的工作全由老马负责，大概因为擅自作主，使第一批的样车完全失败，陈大发已完全不干预开发工作，老杨也只负责外销，不像原来那样，多头变成了无头。

我心中有一些动摇，加上我已经脱离了劲龙，所以对老马的诚意不得不加以考虑，毕竟我们是多年合作了。

我们走上了办公楼上，果然老杨和陈大发都在那里，他们见我到来，都起身相迎，陈大发第一句话便向我作了道歉，这种诚意不可以随意傲对。

私营企业用人没有那么多手续，没有那么多弯子，灵活调整的优点，是官僚气味十足的国营企业所无法企比的。原因很简单正如陈大发所说：“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掏的腰包！”

赚的钱和亏的钱全要落在老板肩上，是他们历精图治的原因。纵然有主观盲目，不讲科学，但吃了亏后便及时改正也是可取的。想到这些，我当即便答应暂时留下来试一试。

第五节：脑出血·打工的终止

“城市猫”开发的失败，客观上促进陈大发的反思。对他来说，最深刻的教训是没有认识到技术不是简单抄袭可以得到。好在他本人也读过几天大学，明白设计和计算是一个产品必不可少的。

其实，私人老板个个都是人精，趁我与谭总因劲隆公司大换班的机遇，便招我重回宗申，本来就是老马一直关注的事。

然而，正当我准备重新搬回来时，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它使我不得不结束我的打工生涯，进入了人生最后的晚年。

我在劲隆短期的聘用，是住在谭总原来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间只有一扇窗子的口袋屋，时值八月盛夏，我住的屋子十分闷热。

当时我从旧货市场买回一台旧的窗式空调，旧空调风力太小，白天已很累，晚上开足空调也只是一束解不了热的风。

8月4日因为太热，我睡在躺椅上。迷糊中渐入梦乡，没想到躺椅突然倾翻，我随着躺椅跌倒地上，头先着地。顿时天崩地裂，脑袋炸裂般的疼痛。

挣扎着从地上坐起身来，抚头呻吟。打开电灯，稳了一刻，头痛并不见减轻，但心里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十分清楚，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我跌到了致命地方？”想到《血纪》还没有整理，也没打印，今生最起码的工作还没完成。回忆我一生曾经多少风雨和磨难，岂能就此结束？

忍痛从地上爬上床，看看手表，时间正凌晨两点，心中想，只有等到天亮再打主意。

我来劲隆后，刚刚在弹子石一家电力配套厂分配了工作的王玲，曾到劲隆

来找过我，想到劲隆来。在我的介绍下，谭总接纳了她，在我所在技术室里担任技术员工作，那时她已结婚两年。我既碰到了眼下这种事，举目无亲的我，只好依靠她了。主意打定，静静等着天亮后，用电话通知她再作定夺。

迷迷糊糊中，感觉头痛减缓了，不知什么时候，廊沿的扶梯口有了脚步声。窗上已渐渐眨出白光，劲隆公司的工人们正陆续起床下楼洗漱。

我用手机给王玲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她昨夜我跌跤的事，请她上班进办公室前，务必到我这里来一趟。

九点钟不到，王玲来了，我马上嘱她去药店，为我买回两盒“脑心通”。中午，她买回药来并告诉我，药房的人问起我的情况，关照她说：“像这种年龄，头部跌伤，切不可大意，最好能马上去医院检查一下。我服药以后，感到头痛已经减轻，并没发生呕吐，说不定就是普通跌了一跤，我命大不碍事。

反正今天还没有去宗申报到，我可以好好休息一天，看情况如何！

第二天，头痛减轻了，起床时除有些恍惚，还能行动。于是我并没有告诉老马我跌跤的事，照常去宗申车间上班，为现场解决了一个三轮车制动管路的铺设，下午回办公室着手三 C 认证标准的起草工作。

如此坚持了半个月，我的头部伤势一天天严重起来，吃药并不见效，白天头痛加剧，晚上睡不着觉，尤其是走路双脚不听使唤，一向以硬汉自居的我，终于感到无法再硬撑下去了。

八月二十一日，我向宗申公司告了假，独自一人踉踉跄跄走到公路上，摇摇晃晃的爬上了过路的公共汽车，到袁家岗的重庆医学院第二门诊的脑外科就诊。

在那里，一位才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脑外科医生，在测了我的血压，翻看我的瞳孔后，嘱我赶快去 CT 室照片，他说我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延误治疗我的生命都会危险。

CT 照下来确诊我是硬膜血肿，我的后脑勺里微血管破裂，后脑勺下部已经积存着大量的淤血，必需马上做开颅手术清除淤血。

我在门诊里接通了王琳的电话，请她赶快到重医来。

下午五点钟，王琳为我办了住院手续，医生将王玲留下来守护着我。晚上七点钟，我被送进了开颅手术室，这种手术有生命危险，进行手术前，一定要我的家人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

但此时，我到哪里去找我的家人来签字啊？我已离婚四年，唯一的孩子远在成都，这时候，我才感到我行为的冒失，痛感到离婚以后独自流浪在外无依无靠的狼狈。果真我就此一命呜呼，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签字总算由王琳代笔了。

在无影灯下我渐渐地麻木过去，只恍惚地感到手术台周围，几个穿白衣服的护士来回忙碌着，耳边响着手术刀打开颅骨时撕碎头盖骨的声音。

忽然我看到王琳还呆呆的站在我的病床前踌躇，她说：“医生不准我离开，要么有人在这里守着你。所以从现在开始，得请一个看护，我要回公司上班。”看看时间已是下晚一点钟了，原来她一直守护着我没有离开。

一个临近病床上的男看护走过来说：“每天只要给我二十五元看护费，病人

就交给我吧！”我才想到王琳明天还要上班！于是摧她赶快回公司。

一连两天，我彻夜不能入睡，头部开刀的地方像一把刀在伤口上不停的扎，我摸摸我的被子，分明感觉到那粗糙的棉布。

见我开刀后效果很差，医生复查的结果证明第一次开刀，淤血并没取净，而且原来破裂的血管也没扎好，他们决定还要开第二刀。

我嘱看护接通了范萍的电话，请她无论如何赶紧到医院来一趟。

那一夜可是最痛的一夜，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超离了肉体，从病床上飘了起来，我想我已经死去，人死后，灵魂便从肉体上出窍，在空中自由游荡。

迷糊中我在空中寻觅着我的母亲，母亲始终没见着，倒是蔡家场那池塘边的老宅见到了爱萍，她还是像当年的少女那样迎接了我，我握住她的手说我自由了。可以牵着你穿过山坳河湾去寻找那属于自己的家了……

接到我打的电话，中午范萍带着她的侄女和同事五六个人站在我的床前，并在我开第二次手术的申请书上签了字。

我再次回到了无影灯下，又一阵风吹来，将我飘起的灵魂又沉沉地攒到尘埃，我听见我躺的担架护理车车轮滚动的响声。

晚上，当麻药解除以后，我的头部像炸裂般的疼痛，像一把尖刀截着我的伤口，一下！一下！耳边隐约响起爱萍的哭声。

我安慰她说：“别哭、别哭”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人死只不过是灵魂从原来的躯壳上超脱开来，依附到另一个躯壳上，所以只要你记住我的灵魂，我们可以在另外的地方重新相聚，那地方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来生吧，只是来生千万不要重演今生的悲剧。

好久好久，我又从新回到了那四壁白墙的病房里。

我明白，我还活着，身旁已没有亲人，范萍她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了，剩下的依然是那陌生的男看护。

此时此刻，我最需要的是亲人的安慰啊，但是能给我安慰，抚平我创痛的人在哪里啊？头痛加剧，眼前除了天花板便是白色的墙，我只好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打发着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

第四天，手机的振铃响过以后，电话里传来馨儿的喊声：“爸爸你怎么啦，王琳姐才打电话告诉我你跌成脑出血了，我这就请假从成都赶回来看你……”

儿子带哭的喊声使我暗自流泪，常言道：“知子莫若父”。孩子生长年代对生活的追求，与我们这一代相隔太远，他没有按我的希望成才，却被社会夺了过去。

小小年纪就离开家，独自在外闯荡，我对他缺乏理解和耐心，几乎对他失去了信心……此刻我为我没有尽人父之责而倍感痛心。

苍天保佑，现在，在我孤伶伶的一个人与死神较量的时候，在我最需要亲人关心的时刻，孩子终于要来到我的身边了，我枯瘦的脸颊上淌下了热泪。

高效的消炎药物和疼痛的伤口日夜折磨我，使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不想进食，只能靠喝水度日，但是体温和心脏证明我的身体能够抗过这场死劫，从新活过来。

第六天，我的孩子终于来到我的床前，他给我带来了苏打饼干，还带来在

医学院工作的小陈，他们忙碌的查我的病历和服用的药物，俨然像医生，好像在检查给我的治疗方法是否正确？

吃饭时，他用勺子喂我，问我好不好吃？我看着我的孩子想到他儿时，我驮着他去上学，一边教儿诗的情景。从两岁开始到十岁的绘画作品至今还保留在书柜里，等我康复后一定从新把它们整理出来交给他。

第七天，刘启建终于来了，她一来就声明说是孩子叫她来的。她那人格的尊严，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不是法院的判决，她到了最后都表示拒绝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现在既然已经离婚了，她就不能主动看我了。

回想起来，在我们结婚的十八年中，我一直没有爱过她，活了一辈子也没人关爱，她也够苦的。天哪！“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我千丝缕，天涯地角有情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我是生错了时代，建错了家哪！

我在动手术后的第九天，第一次从病床上站起来，在看护人员的帮助下走出病房，穿穿跌跌的走出病房，那天是阴天，我的语言功能还没有恢复，我多希望有人能同我谈心啊！我记不得有多久没同人交谈过了，当我在医院的花园里慢慢在陪伴人的搀扶下散步，我多么希望有人同我讲话。

下午，我的中学同学申德荣来了，他与我中学同班，从初一到高中毕业。我平反回北碚，常和他相聚。

后来他退休不久遁入佛门，从此笃研佛经，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世间的善根恶果，与风轮法师一样，他以人间因果报应为依据，劝我皈依佛门。

这一次他听说我跌成脑出血，来看我时，专门给我带来了神龛上供佛的水果，和一盒颂念阿弥陀佛的磁带。教我跟着磁带上放出的音乐，每天颂念百遍，自会心里平顺，伤势也会在菩萨的保佑下很快康复。

其实我本来笃信因果报应。若非杂念无法排除，而信守了随缘自生的安排，还在凡间徘徊留恋，饱受人间的苦难，也许我已随他出家了。

他坐在我的床边开导我说：“人生无常，你要切记，就比方说，你突然跌了一跤，肯定是有缘因的，那一刻改变了你的一生，这就是无常。无常不定因欲而烦恼。”

跌跤那天正是我的生日，难道这是佛的警示？他继续说：“我劝你抓住这个机会，从此信佛，免去了六道轮回，再不受人间轮回之苦，岂不善哉！”跟着老同学出家山林，在心理上寻找依托，但又怕晚年孑然一身，怕我烈烈一生就此消影山野。左右思来，不得其果！我与皈依佛门失之交臂。

自从申德荣来过以后，我循他教导，每天放颂他给我的磁带，从此以后，我的病床前一早一晚，都会响起悠扬的阿弥托佛颂唱。就如他的说法，我果然一跤瞬间就改变了我此生的道路。人是多么脆弱，就跌了这么一跤，便永远结束整整七年的打工生涯。

以后，在我病体恢复期间，我的心静下来，成天很少出户，整理我一生的回忆录，最后，完成了《血纪》的长篇整理和打印，我决心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记录这段中共所创下的历史。

从此，早晚在佛的面前焚香、悔过，虽然我心与潘老相仿，时时还有杂念缠着。

第十一章：寻 访

1980年，在二十四中任教工作暂定后，生活暂时安定下来，随着片断的撰写，每当夜阑人静，死难者的音容笑貌都会来到我面前，与我交谈，大致因为我在他们牺牲时走过他们的遗体前留过誓言：“只要我能活着出狱，我定要将你们的事迹告诉全中国，把你们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告诉全世界。”

现在，是该把烈士们的噩耗告知他们的亲人了。

第一节：寻找烈士的家

可惜我连他们生前准确的住址都没有，当时又没电话，在人海茫茫中，我与他们又从未谋面，大海捞针，陡步寻访，他们在那儿呢？

根据刘顺森生前留下的地址，我曾两次去大阳沟寻找他二十五年前的家，据他讲，他的姐当年是重庆共青团委的干部，1956年 he 被抓进少管所以后，便与那个三代工人的生活断绝了联系，为了不受到刘顺森的影响，他的姐姐割断亲情以求自保，这在中共统治时期是普遍的。

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口号下，扭曲人性破坏家庭。但我不相信人性因此而泯灭。我相信刘顺森的老父老母不知为失去亲骨肉流过多少泪！我甚至还相信，刘顺森的姐姐在经历了这二十八年的风风雨雨，体会中共宣传的欺骗和虚妄，

事久以后，在中共法西斯真面目越来越暴露，被扭曲的灵魂也在恢复，割断的亲情必将从新建立。

刘顺森的亲人们，一定会像张钊铤的亲人一样，翘首等待他的归来。因为她们比谁都了解刘顺森，他的聪明，正直和冤曲，他们没有理由死守曾作过的荒唐决定。

如果此时，我把刘顺森的死讯告诉他的父母和姐姐，她们会怎样反应呢？我虽不知道，但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正是带着这种心情走进了大阳沟。

整整一天，我的足迹走遍了那里所有小巷，挨家挨户询问：二十五年前，这里有没有一个曾在市团委工作过的姓刘的女人，然而我每穿出一个小巷时，总是带着怅惘再穿进第二个小巷。最后在一无所获后，只好改变主意，让岁月将她们浮出来了。

寻找皮天明就更难了，在盐源我就没有打听到他家的确切地址，只知道他还有一个亲弟弟在渔洞，可渔洞那么大的地面，那一家才是他的家？

渔洞属九龙坡区，从北碚到渔洞要转两道车，过长江到南坪再转车，光赶路就得花五个小时，所以我特别作了准备，选了一个晴天，早上五点钟乘上公交早班车，天不亮就出发了，直到上午十一点过，我才到达渔洞车站，下车以后，不知该向那个方向找，怀着侥幸去叩开那些街边一间间简陋小屋的柴门，询问有没有姓皮的住户？

依据他生前对他的后娘和兄弟的描述，应当就在街上，然而走遍了那里所有的巷道，只问得两家姓皮的人家，他们都不知道我所说的人，更没听说皮天明的情况。

想到他赴义前，在六队的大监门口临就义前的嘱托，我便挨着大街一户一户的问下去。

花了整整一天，人虽渺无踪影，但我的心意已尽。直到下午过了五点钟，证明我的寻访失败从回车站，望着灰色的街道，我擦着汗水悻悻离去，再次寄望未来的岁月或偶然机会，将他的亲人们浮现出来。

陈力就更难了，他压根就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他的家在何处，只有他被捕入狱时的华龙桥弹簧钢板厂还在，兴许在那里可以问到他的父亲，和他家的下落。然而，就在钢板厂的门房那里，便将我档了出来，他们说，从来就没有陈力这个人，更没有听到有关这个人的事。

在中国为民主和正义而献身的人怎么这么凄惨？难道他们的家都被毁灭了不成？当然，他们的档案会提供他们的下落，不过，那一定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好在，我的《血纪》有他们的记载，不会让他们在地下默默无声。

第二节：马开先的下落

1979年的九月我从盐源平反归来后，就一直打探马开先的下落，原因出在划我为右派后，这是我心灵上烙下的最厉害的隐伤。二十三年来每次想起，心里一直很伤心。

自从1958年我离开重大后，我们就被强行拆开，从此，我和她天南地北各赴冤狱。尤其是，我要弄清当年曹英为斗倒、斗臭我俩，是怎样诬害我俩的？她怎样渡过这二十三年，现在又在何方？

当年重大来盐源为我“平反”时，我尝试向郑老头询问过她的下落，但被拒绝回答，79年回重庆路过成都一直留意寻访，想在偶然中找到她。

后来我向重大保卫科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询问她的下落，结果都被拒绝，这就更加令我怀疑，当年给我们的诬陷，定有不敢公开的东西。

受到这种羞辱，而不理会，还算七尺男儿么？

（一）线索

1989年冬天，有一次在街上，我偶然碰到了离别整整三十年的郑业文，她姐姐当年也在北碚托儿所工作，姐妹俩父母早亡，从小进了孤儿院。这次与郑业文相遇时，她已满头花发，相互倾诉二十五年遭遇后，她滔滔不绝倒出一肚子苦水。

原来1958年反右运动尾声，七十六名极右份子离开重大去南桐后，郑业文姐姐在托儿所向党交心时，说他们两姐妹的祖父曾是合川县地主，郑业文因此从重大实验室“清理”出来，下放到北碚东阳公社。

开始她在一所小学当教师，文革时却被公社的干部诬为地主阶级的后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拉出来批斗。

那时她刚怀孕，仍不能避免站在凳子上受到一连六小时的斗争，残酷的惩罚使她小产，幸好中医院老医生相救，母子终于逃脱了生命危险。

后来她拖着孩子打扫过厕所，拉过板板车，挣扎着渡过了她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

她一边叨叨不绝诉说经历的伤心事，一边痛哭起来。其实她们的祖父早在她们出生之前就已去世，中共的运动并没有饶过这对可怜的孤儿。

那一次相遇，我问到杨明彦下落，郑业文告诉我：“杨明彦自 1961 年重大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农机学院任教，在文革中她受过批斗，但遭遇比我好。1987 年四川农机学院改名四川工学院，她就一直在那里任教。当年重大在成都老校友的下落，她几乎全知道，兴许杨明彦能提供马开先的下落。”

正好，我厂有一位叫陈孝牧的检验科人员，他是 1967 年应届四川工学院毕业生，是杨明彦的学生，他说过几天他要参加学院建校三十周年大庆，我当即拜托他回校参加校庆时，务必不要忘记去看杨老师，并向她转告我的问候。

为了说清我找杨明彦的目的，我专门写了一封简单的信，托他当面转交给她。那封信简单讲了 1958 年我被划成右派后二十多年遭遇。

陈孝牧参加校庆后回厂不久，我便收到了杨明彦从四川工学院发给我的回信，在这封整整八篇长信里，她的伤感倾泻无遗，读罢我的身心溶进二十年前那段天真童贞的回忆。——

“看到你的来信，我久久不能平静”，她写道：“一个勤奋好学，喜欢探索，有理想有上进的青年，被整得这么惨，使我万分痛心……你是我敬重的中学时代的校友和兄长，要不是挨整，你一定比我的成绩更好”。

少时友人对我的遭遇表示痛心和惋惜，给我带来了安慰。

杨明彦也许是我当年同窗中最幸运的一个，她在这封来信中，讲到她的家，她的丈夫是在我们大学求学就认识的，她在读书时他已工作，在那种险恶的年代，她俩从大学开始恋爱，终于有了善果，这在同时代人中要算稀贵的。

信中还介绍了她的事业，她已是有多篇著述的机械专家，眼下还带着几个研究生。信中追述了她家在 58 年的遭遇，她的父亲也在 1957 年划为右派。当时剥夺了他在西农正常的执教，将他放到一家劳改工厂，后来死在狱中。

1960 年以后，她们姊妹三人被拆散，一个流落他乡，一个在工厂做工。唯独她才侥幸从重大毕业，分配到四川农机学院执教至今。但她没有逃脱文革的风雨，挨斗抄家，对她这种被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人是免不了的。

对我托她寻找马开先的下落，她写道：“历次运动中私心重的人确实害了不少好人，这笔账就算在错误历史上吧……如果整你的人有点良心和人性，他们自会受到良心责备。你够苦了，去找这种小人算账反而伤自己，不值得”。

无辜受害者，到今天也只有恳求“历史”惩治那些做尽伤天害理坏事的人，而无法惩戒这些坏人，甚至于连控诉余地都没有，还蒙在鼓里的杨明彦把一切只看成个人整个人的行为。

后来我接连收到她的几封回信，告诉了我一大串在成都地区工作的，我的同班老同学地址或下落。其实人的相聚是要讲缘份的，想到我被揪斗的那些日子，同班中几乎没一个人向我表露同情，哪怕讲几句值得我永生纪念的关怀话！想起他们在斗争会中学舌的丑恶嘴脸，我就对他们感到呕心！。

（二）访少年学友

第二年春天，利用一次出差成都的便利，我专程去拜访了杨明彦。记得那天正逢成都的花会期间，座落在成都郫县的四川工学院风景格外美丽，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却一直很沉郁。

汽车在四川工学院的大门口停下。走进校门，按照门卫指点的路线，我在教学大楼西侧的一群老式三层楼的楼群中，找到了她住的那排房子。

从1958年一别至今，已过了整整三十多年，从她略呈花白的两鬓中，我仍可以认出她来，她那男孩子般的倔强，以及特别清晰的五官，让我记起少女的她，看她那样子，心情肯定也很激动。相见一刹那，表面装得十分平静，心里翻腾着复杂的波澜，

她伸过手来接过我提的皮包，一边解释道：“早上我去校门两次都没有接到你，今天又不凑巧，天伦又在开系务会，女儿出差去了湖南，家里丢着两岁的孩子，我怕母亲照应不过来，就没有去车站接你，太抱歉了。”我奇怪的望着她，听着她那毫无惊诧很随便的口气，好像我们是分别了不久似的。

于是我问道：“我真的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让你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微微一笑说道：“你不是在上封信寄来过照片么？我怎么认不出来？”听她这么一说，我也笑了起来，回答道：“你虽然老了，但少女的轮廓还没有脱形，这就叫‘本来面目’。”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原来忧郁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当我跨进她家那扇已经褪色的朱红木门时，我才意识到原先估计她住的“教授”别墅，同眼前所见相差太远。这套房间还是二十年前的“遗产”，毛泽东时代，大学里的臭老九们住这样的房子已经相当不错了：两间卧室，没有客厅，也没有过道，外面一间放着两张大床和一个两开大柜，这便是大陆十年“改革开放”后，中年知识份子的家境。

临窗放着一张办公桌上，堆满书籍资料和字典，墙上挂着绘图用的三角板、丁字尺和绘图仪器，证明这里是集卧室、工作室、研究室为一体的“教授房”。一张木桌四个凳子证明这又是吃饭的地方，房子里已经十分拥挤，没有任何可以接待客人的地方。

通往里屋的，同样是朱红木门里挂着帘帏，门半掩着。主人打开那门，里面同样摆着两张床，床的四周被整齐的大柜子包围。大柜里整齐的插满了各种大部头的精装参考书和工具书，这样一布置只留下了不足三平米的“活动空间”。

靠门边那床上，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正在那里搭积木。当我们走进去，他朝我们望了望，依然聚精会神的在设计着他的“建筑群”。我取过提包，从里面取出那可爱的‘唐老鸭’，放在床上按动电钮，便在床上“扑”动起来，还发出“呬”、“呬”叫声，孩子立刻被吸引到它的身上来，从床中间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试图捉住那“怪物”，逗得我们都哈哈大笑。

这时杨明彦忙教孩子：“小迪快喊孔爷爷”。听他这么教，我顿时感到时间已在中共迫害中，将我们拉成两“代”，我的孩子还只有七岁。

门外传来一声老姬轻声的招呼：“明彦，红烧鸡的调料还没有买，我这就去

小卖部，灶上熬的排骨汤你看着点。”

估计她是杨明彦的母亲，少年时我曾在西农见过，今天怎能不向她老人家打个招呼！当我跨出过道，便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提着菜篮子向楼梯口走去，我连忙喊了一声伯母。她同我母亲年龄相仿，退休时还是西农讲师。

从她苍老面容，可知她过去吃了不少苦，她回过头来，向我点头，明彦介绍说母亲专职在家带孩子。说中国知识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黄不接，其实也未竟然。

中共统治下，几乎没有什么知识份子“溃缺”的时候，就是到了改革十年初，知识份子依然被闲置一旁，并无他们的用武之地。

现在我明白，杨彦信上所说的四代同堂，便是讲她的家四代人口，济济一堂于这两间陋室之内的现状。这样的四代同堂，客厅可以省略，但人要吃饭拉屎拉尿，这厨房和厕所就少不得的，好奇的我向杨彦发问。

她指着过道对面的一个砖墙砌起来的小屋说：

“这里原来是学生宿舍，每层一共十间房子，新建的教学大楼竣工后，学生宿舍搬到西侧的教学大楼南面。这些腾空的旧房子便加以‘改造’，将两间房中间打通，增加了一道门又封掉了一道门，成了一户人家的一套两居室，用来分给老知识分子住。临时过道上又搭建了小厨房，浣洗间和厕所，两家共享。”

我走进了那两家共享的厨房，那大概就只有五平米，里面放着一个炉子和一个烧木材用的灶。那炉子上的煲锅里，正溢出排骨汤的香气。这种住宿条件，与我在 80 年初回重大时所见右派的家情况相似，至今十年来依然如故。

他们在极不公正待遇，在歧视轻蔑里，仍保持着那勤奋的韧劲，无怨无悔的劳动着。有诗云：“阳和不散途穷恨，霄汉长悬捧日心。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

九十年代，中国的大款已纷纷上市，住的小洋房，驾的小汽车，请的是保姆。游泳池花园，高档生活设施应有尽有，还要养情妇二奶，靠的是官本位的钱权交宜，随手捞来，八旗子弟们发福得轻飘飘的人们，从八九年的六四民运以来，更感到这特权不可丢失。

现在对“性资姓社”的无聊争论不感兴趣的官僚们，只盯着权和钱，活得快活的人，不屑于知道创造财富的下苦力都市劳动大军；也不屑于知道，中国的科学家和专家们，在怎样条件下奉献自己的奶汁。

我忽然想起 1979 年回重大时，已瘫痪的钱企范教授。

可惜，中国知识阶层这头“牛”除了耕耘，被人鞭打，被人挤奶外。最令我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像正常人那样反抗施暴者？却以德抱怨。

“过去的就不谈了”这是我的旧友们共同的口头禅。

能不谈么？能不知羞耻么？能不知雪恨么？能做一辈子忍字当头的顺民么？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一个断论，就陷死了中国知识界的一生？他说“知识份子^①是附在统治阶级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正谈话间，忽然楼下传来了喊声：“杨明彦接电话”。她向我做了一个歉意的手势，便匆匆下了楼。我再次环顾了四周，暗暗自问道：教授也够可怜的，不但身居陋室，连电话都没有一部。

两分钟后她上楼来了，带着无奈对我说道：“真对不起，本来今天，为了你远道而来，我专门请了一天假，但连这一天假我都不能自由支配。刚才系上来了电话，叫我把资料室的钥匙拿过去。”

她的母亲刚从付食店回来，不声不响的独自到厨房去忙碌了，我又插不上手，便在屋里教她的小外孙玩唐老鸭。

大约十二点钟了，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家，我们互致问候后，便忙着将她母亲已弄好的菜肴端上方桌，今天除了我这个“远道”来客没有外人，相互之间没有拘泥。一到吃饭照样会与十年前联系起来，大家都是饥饿年代的过来人，对那段数粮票过的日子印象太深，比较起来，眼前日子算是“天堂”的生活。

席间，她告诉我，她已问遍了过去重大毕业来成都工作的同事，他们并不知道马开先其人，更不知道她的下落。

不过在成都科技大学机械实验中心工作的杨治国认识马开先，而且是马开先的远房亲戚。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得到马开先的一些下落？

杨治国是我在重大同一专业同年级的同学。在重大时，因为诗歌文学创作方面爱好，我同她都曾是大业业余话剧团的成员。1956年的暑假和寒假，我们还在重大话剧团的组织下，去重庆市话剧团受过培训，在参观了当时该剧团编排的曹禺名剧“雷雨”时有过交往。

在杨明彦家吃过午饭后，便在他们夫妇的陪同下转了一下校园，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我便向她道别，回到了我出差住的川南旅舍。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杨明彦提供的电话先给科技大学挂了一个电话，证实杨治国确在成都大学的机械实验室里工作，并且这些天没有外出。

吃过早饭便乘坐公共汽车外环线路南进，过了九眼桥，大约九点钟，我已顺利地走进了科技大学的校门，并在门岗指点下向学院东侧的中心大楼走去。

当我走上实验大楼门口的石阶上，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在他带领下，我走进杨治国的实验室，见一位穿着白色大挂年近半百的女士，正同两个年轻人忙碌在一台拉力试验机前。引路人指着她，示意她便是我要找的人。

学生时代一别至今整整三十三载，眼前的她已两鬓花白，只是托老天保佑，在乱世后，和杨明彦一样，在她多年耕耘的天地里忙碌奉献，若不是因为我突如其来寻访，恐怕我们今生都难以重逢。

按学校规定，工作时间谢绝会客，但她破例转过身去向两个年轻人交待了几句，便引我到隔壁的小会议室就坐，我明白，虽然是久别重逢，但这里不是畅说旧事的场所。在递出了我的名片后，简单介绍了我现在工作和近况，听完了我的故事，她喟然一声长叹伤感的说：

“这些年大家都有一本辛酸经啊。”这简单的感慨已勾画了这三十多年来，她所走过的人生道路。

明白我的来意后，她走出会议室，两分钟后拿了一张名片递给了我，告诉我说，马开先现在何处她不知道，但她有一个亲堂弟就是名片上的这一位，你不如去找他，说不定他能告诉你。

那名片上写着马开运，工作单位是成都气象学校总务处。看来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寻找，我终于在浩如烟海的人流中觅到了她的踪影。

从成都科技大学乘公共汽车奔气学校的路上，我坐在公共汽车上，想这些年，我在中学同学中每次打听马开先下落，就听他们说我和她的种种绯闻，这些绯闻，全是曹英们为批臭我们而编造的！

至于我的冤情和当年事实却无人说起。他们宁可道听途说，为什么不顾事实和受害人长达二十多年痛苦，起劲向受害人伤口上撒盐？也不愿为被害人说几句公道话！

母亲听到这些谣言，劝我再不要找马开先了。

然而不明真像的人还在向我身上拨脏水，就越坚定了我揭示真像的决心。虽然我将拜访的是马开先的弟弟，这个人会持什么态度我心中没有底。

十一点钟我在气象学校的门房里，马开运的爱人接待了我。当时这位女人并不知道我是谁，更不知道我的来意。当时该校正在建设，建筑承包人经常到总务处找马开运。

那女人热情的招呼我，忙着请我坐下，一面端上茶杯，一面殷勤的告诉我说，马开运今天出差到龙泉驿去了，要到下午很晚才回来，如果有什么事，尽管向她说，她会如实转告的。

于是我只好向这位从不认识的陌生女人，亮出自己的名字和“隐私”。我预计如果她和她的丈夫知道马开先的下落，至少也会把她现在何处告诉我。

但是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令我吃惊的看到，她那薄施粉黛的脸突然一沉，眉眼立即倒立起来，原先谦和的态度顷刻变得凶恶，充满敌意训斥道：

“最好你别再找她，你还嫌当年害她不够是不是？你现在听明白了，她已经有家，有儿女，她恨着你，也决不会再理你，你还是走吧！”

在这突然变化的脸面前，我鄂然了。遭到拒绝的可能虽在我的预料之中，但，听她那种对我和马开先的事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敌对的口气，使我的心凉透了。

面对向我拨来的这盆污水，我太难堪，看到办公室里另外两个年轻人，都莫明奇妙的看着我，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嘴巴也像被堵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怀着一股被羞辱被驱赶的恼怒，我从坐椅上霍的站起来，头也不回的走出那学校的大门！

此刻我的脸热辣辣的，好像被刚才那女人狠狠搥了两耳光。愤怒和羞辱顿时集中到刚才这个毫无教养的妇人身上，却又骂不出口，无法渲泄，小跑着向车站走去。

这一次算是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世情”课，哪怕在大陆这块灾难的土地上，中共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百姓。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也只给被害了一生的人有一口饭吃而已，八十年代，一度兴起的“伤痕文学”，用被害人凄惨遭遇，也只赢得善良人们的一抹眼泪。

只要中共的独裁统治没有被推翻，那段漫长而血腥的历史，没有拿出来公开受到揭露审判。在平反中还有一堵：“不要过多纠缠过去，而应向前看”的墙，严严实实堵着国人省视历史的视线，公开说：“反右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受害人悲惨的过去永远不会得到昭雪。

受害人对自己被害在那里都没有弄清，怎么平反？

与全国千千万万被害人一样，我同马开先这段被当局封杀的冤情，其中必有他们不可告人的内幕。我持续几十年努力寻找她，就是要找到当年受侮辱的原因，揭这层黑幕。

匆匆上了回程的汽车，想到‘平反’后奔波已快十载，正是：“回首西川月又斜，天涯孤客真难度”的时候，那女人尖酸刻薄诽谤之声：“你还嫌害她不够是不是？”不断像炸雷般响在我的耳际。她那话是代表马开先本人，还是代表她的家人？

从中，我可以隐约感觉出，这些年来马开先被中共糊里糊涂整得生不如死的惨景，也许只有这种悲惨的遭遇，才会强烈的震撼着她的亲人们，也才会让她的兄弟媳妇有如此“一触即发”的愤怒。

上有毛泽东，下有曹英，统治着善良的中国老百姓，那来的生路？我不知道这道理至今有多少人认识？所以寻找马开先将这段被中共掩饰的罪恶真相公诸于世，不但是关系我和马开先个人的事，也是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晚上，我没有心情去杨治国那里作客，按照她给我的电话号码给她打了电话，没有提及马开运的妻子那令人咀伤的“接待”，只告诉了她，马开运因为出差没有碰到，因为我将回重庆，在成都该办的事还得抓紧办理。所以晚上就不去她家了，今后若有机会到成都来，一定挤出时间拜访她。

（三）意外得来

说来也巧，冥冥之中自有牵引，两年以后的春节，在邀约重大当年赴南桐监督的右派同学小小聚会上，我在王泽庸家里获悉了马开先的下落。

原来，正逢 1990 年 60 届重大校友毕业 30 周年纪念，重大校友会，曾向全国各地同系同届校友发出回校团聚通知，10 月中旬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多校友重聚饶家院，各诉三十年来的事业和人生遭遇。

王泽庸回忆其中一名来自西北的女同学，在聚会的第二天晚上自由发言时，讲到当年她被划右派而遭受批斗侮辱，声泪俱下，控诉了当年机械系六〇届中共党支部委员曹英，对她的胁迫和威胁，她因不堪侮辱而逃离学校，于是被开除了学籍。在生活无着，万般无奈下，嫁给一个工人，不久就流落到北方去了。

王泽庸还告诉我，机械系六〇届的同学，总共六百多同学，当年划成右派的就有一百多人，而这次参加这难得的聚会仅只有十来人。

这种聚会，不可能专门反映那个年代里令人伤心的往事，也不可能记载他们的血泪仇恨。仅仅几个人的哭诉，已把聚会带到了那个血腥年代里。

曹英正好就是当年这个年级中共支部委员，同学们纷纷控诉这个对无辜学生的迫害狂，为了疯狂捞取政治资本，在反右中大搞逼供信。

王泽庸回忆说：根据这位女生的揭发，曹英对当年稍有姿色，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女生，进行肆无忌惮的调戏和玩弄。毕业时，利用决定毕业生分配的政治评语，强迫她们同他发生“初夜欢”，居然把中世纪奴隶主对奴隶的虐待带到校园里重演！。

从北京来的同学告诉大家，文革中曹英调到北京某机关，因为恶习太深，兽性不改，被人打断了脊梁骨，已直不起腰，终生残废。所以，他不可能来参加这次聚会，逃过了这次当年被他残害同学们对他的控诉！

易曰：“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癞皮狗拖着一生罪过，最后怎么到阎王老爷那里去下地狱，了结肮脏一生啊！

听王泽庸这段叙述，我想起当年曹英组织对我昼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式斗争，硬逼着我按他的意思，编造与马开先的“不规”行为，以达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原来他自己就是实足的禽兽。

直到我入监后，他那狰狞的嘴脸，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有人说，在这个暴虐时代，“**趴儿狗比主人更凶狠。**”在那个年代，类似于我的遭遇岂止我一人？只要中共的一党专制存在一天，这种罪恶还会不断发生，像曹英这样的禽兽还会公开的加害无辜者。

王泽庸所讲的西北来的女同学，是不是就是我大海捞针一样寻找的她？

我问起他当年聚会时的同学通讯录，他便从抽屉里找出来给了我。

我当时就在这本同学通讯中，找到了她的名字，后面留下了她的地址：甘肃兰州西固区第二十一中学，在这本同学录的最后一篇，《重庆大学机械系 55 级毕业三十周年活动纪录》中写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兰州市西固区政协付主席，一级教师马开先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工作。”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想不到她已离开了四川，去到大西北的兰州，过着“名人”的生活，她是怎么会从右派奴隶升到省人大代表？是她遇到了奇人，还是她的亲人中有中共的新贵？我却不得而知了。

要不是王泽庸，我恐怕还不知道那年那月获此信息！尤其是马开先不是因她以甘肃省人大代表，在这种会上涕泗泪流的“介绍自己不幸的经历”，怎么知道至今我所获悉的一切？缘分吗？巧合吗？

也罢，既然马开先的下落已经找到，不管她现在的情况如何，我都必需马上与她取得联系。

回到北碚，我立即按照通讯录上的地址提笔给她写信。

当我发往兰州的信过了十来天，我终于收到了从兰州寄来的“回音”。

当我拆开这封信的信封，我的手在下意识颤抖！她那弟媳妇尖刻的警告声，此时又回荡在我的耳际。

“我几乎是在痛哭中读完了你的来信”，她写道：“收到你的来信整整两天两夜都没有合眼，泪水一次次地浸透了我的枕巾，现在又一滴一滴地洒落在这一封长长的信纸上。”

“三十八年前，我含恨离开了重大，我当时恨一切人，尤其恨你，那时我真想得很绝，真想找你拼命，一刀杀了你再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说毛泽东是杀人狂，他的杀人不但在战场上，在刑场上，在监狱中，也包括在和平年代用挑斗办法，制造出人和人间的自相残害。

马开先兄弟媳妇的怒斥，不应说完全无理，在“阶级斗争”年代中，有多少子杀父，夫杀妻，兄弟相残的悲剧啊。马开先当年对我如此

的愤恨并不足怪，要怪就怪我们生在这万恶的毛贼东时代！

此时此刻，如烟的往事，唤起了有关她的一段回忆：

鸣放初期，在正义感和同情心支配下，曾为她的一位长辈，鸣冤，伸张。据她介绍重庆钢铁公司一位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在三五反期间被认定“大老虎”。为逼迫他们承认大笔贪污款项，双双隔离审查，毒打折磨了两个多月。两人不堪冤枉和羞辱，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趁监押他们的人不备，逃出囚禁地。

天地茫茫，大雨倾盆，两个走投无路的人在雨中抱头痛哭一场，便双双触电自杀。丢下两个女孩，大的六岁，小的才四岁，无人收养，被送进了孤儿院。

两年后，事情终于水落石出，这对夫妇并没有贪污劣迹，可是，当时的中共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拒绝对他们平反，反诬他们“革命意志不坚定”戴着“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永远的含冤九泉。两个孤儿，也不知如今流落那里？

不过当时的马开先，并没有看清这一点，仅仅出于正义感，站在同情受害者的立场上“帮助党整风”。在大鸣大放会上她赢得听众热泪横溢，也成了她“借题发挥”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

死者的“冤”没申成，反而自己也被搭了进去，成了连环冤。中共统治下，正义被蹂躏，这又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例证之一。

批斗我的时候白天开斗争会，晚上派人轮流守着我，按照他们已定好的罪名强迫我写“交待”。因为几夜没有合眼，倦困不堪的我刚刚闭上眼睛时，他们就用预先准备好的竹棍敲我的头，用针扎我的脸。五天五夜下来，我的头上也不知留下了多少青包。

我写的交待写了又被他们撕碎，撕了又喝令我重写，直到第五天我实在熬不住了，只好按照他们口授的东西一字一句成了我的交待材料。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按的手印，只知道等我醒来时，我还睡在反省室里。

就这样，年仅二十岁的我，被逼着开始了我长达二十三的冤狱之路。至于当时交待中我写的是些什么，已全然忘记，当我听说，我写的材料重重的伤害了马开先时，我便负着良知的重枷。

对马开先的诬害，恐怕是曹英最恶毒的绝招！！中共的无耻，深深烙印在被害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消褪。

“六月雪”有唱：“你道是暑气喧，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窦娥虽含冤而死，但为此东海大旱三年。民间传说在临刑前，伤心过度的窦娥，怒撞在刽子手的尖刀上自尽。古来的烈女，节妇比比皆是，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还少了这样的事吗？

而曹英三十年后成了爬不起的一条癞皮狗，天道是怎么编写人间故事啊！

写这封信触到她一生中最悲痛的经历时，在信笺上留下了两行“……”，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直到今天她都无法用文字来表述。在她的一生中这是切‘魂’之痛，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愈合的心灵伤口，一触这伤口就会流出血来。

她从此就没有和机械制造专业沾边，她流向社会后的经历没有写出来，使我无法为她这段经历落上句号。

信中接着介绍了她的家，她的丈夫姓张是一位老实厚道的工人，眼下正和最小的儿子承包了一家车辆维修店。

她一共三个孩子，两个女儿都已成了家，一家人过得挺平静。阿弥陀佛，慈悲为怀的佛祖爷在她身陷绝境的时候，将她引出了重大这块是非之地，引到了这北国古城，重新给了她生活的天地，重新给了她的家。

来信的最后，她还告诉我，九〇年，她所以不辞千里迢迢的专程回重庆参加同学聚会，主要正是寻访已整整失散了三十三年的我。开会期间她问遍了到会的同班同学，可惜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我的下落。问到重大党委，他们故作惊讶回答说“不知道”，当时她根本没想到我已重回北碚了。

《诗·国风·汉广》有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苍天安排人间的缘份阴差阳错，更堪统治者故意的搅乱！处在音信渺无的她，唤起的岂止心灵的惶惑？他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他埋在那里？他的这本悲剧怎么没有一个结尾！曾经爱过，却被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无缘无故地拆散，整整三十多年以后，天涯各方，你在那里？

从此又负着心灵的责备！这责备会有尽头吗？到了生命结束时，这责备变成了悲歌长泣，她因不能弥补，而把这段永生的恨唱出来，哭出来的呀！

“现在突然之间，苦苦寻觅的人从远方寄信来了。还是北碚，这令人断肠的地方！！不是说你早已离开了那里？怎么你又回到了原处？拿着这信，怎不使我伤伤心心的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啊！”

从此以后，我们万里尺书，遥寄着向对方的祝福。“雁来音讯全无，路遥旧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她来信还介绍了她眼前的生活，说她因为身体很差，有几次几乎因心脏不好而死去，现在满头已布满了银霜。

后来拜了西藏一位高僧学长寿秘功，受益匪浅。93年还随甘肃省人大代表团，到了青海省塔尔寺拜了藏医院长扎西活佛为师，并皈依佛门，成了俗家弟子，长期素斋。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人生自此，已近归途。搬着指头，年已五十五矣，但经历年轻时代的痛苦折磨，早已领悟了人生苦谛。

后来，她来信告诉我，她长期练功显了奇效，白发转青了，精力充沛。还练了一身好功法，常常为他的家人挚友发功治病。但凡邻人相求从不拒绝，不收分文，只图善缘。

当我告诉她我患严重的气管炎而苦恼时，她便抄摘了一篇长长的气功疗法，嘱我贴在墙上对照着早晚修练，还介绍了很容易制备的药方，用她介绍的方法，泡制服用。

这正是“寄身但忧兰州远，顾影无如白发何。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谨慎风波。”（刘长卿诗）

97 年一封信，告诉我她已退休，并说苦了一辈子，晚年希望搞一点实业，以资儿孙们的不足，这封信整整写了一篇，介绍了兰州的地理风貌，把这座甘肃走廊上的古城，描绘成了瓜果满市，绿茵成林的西北乐土。

说兰州尤其适易住家，并恭候我去兰州一游。

兰州乃我国通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名城古都，西汉时期张迁和班超都曾经过这里，我虽然没有去过，对这座沙漠上的绿州所知甚少，但仍可以想象到她的美丽。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王之涣的“出塞”，以及宋明许多大诗人的诗词遗作，也许赋出了身在北国的马开先的心情。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小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扎根兰州的重庆女孩，是思乡情切而产生自我安慰，还是兰州真的那么美？

我在电话中问她是否打算回重庆，与我今生作最后相见？她笑着回答：“那只有看老天爷的安排。”我说“事在人为，只要我们都下了决心，今生相见完全是可能的。”到 2003 年屈指算来，我俩已分别了整整四十六年了。

这段封存了近半个世纪可悲可叹的故事，直到今天我对其中的细节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极想将这些不明白的地方在有生之年写出来，向我的读者们作一个更完整的交待。

当我告诉已经入佛多年的她，我正把我们的悲剧写出来时，她却反对我写这本《血纪》，说我逆缘，走远了，阿弥陀佛……！在漫漫黑夜里能熬过来的人，是要付出好多人无法想象的牺牲啊，意志柔弱的女孩子选择逃避是很自然的。

后来我们就再没相见，这样了结，算不算演完一场有始有终的悲剧？

在这个中共一手导演的悲剧舞台上，暴力和恐怖扼杀了多少人性？被践踏的美好东西不能恢复，受害人选择了逃避！所以更增加了它的悲情！！

第三节：王大炳和他的女儿

回重庆后，按留给我的地址，给王大炳发出的信过了十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告诉我，自 77 年同老婆一起回到长寿后，当年她的女儿就出生了，第三年又生下了他的儿子，现在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家”就靠他像牛一样辛勤劳作，总算能图一个果腹，近年来他又自己打土胚，筑墙，建起了能让一家人遮风避雨的窝。

在盐源农场，大家因他的勤劳管叫他驮牛。信上告诉我，他原来的判决，是以叛国投敌作结论的，所以一直没有给他“平反”。对他来说，平不平反，反正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块土地上当牛马。

来信告诉我，今冬岁末农闲时，一定要到重庆来看我，一叙久别之情。

1982 年冬天，我在蔡家场迎接了我这位患难中的兄弟。我怕他在蔡家车站下车后，找不到偏僻角落里的二十四中，所以预先和他约好了时间，他到蔡家场以后，我到车站去接他。

按照预定的时间我在车站上足足等了他两个时辰。中午时分，从车厢里走出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农”。

他身穿灰色补丁的棉衣，脚踏绿色的解放鞋，由于终年的劳累和省吃俭用，那干瘦苍老的脸，高高突出的颧骨，颈项上黑黄的皮肤裹着深深的皱纹，下巴被树皮样干燥的皮肤拉得长长的，配以压得略弯的腰，榨干了油似的双肩。

那外形，酷似中共在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地主庄园，展出的两尊屹立门前呆望天空，手里拄着打狗棍的老农奴塑像。只是他那形像不是地主刘文采压榨出来的，而是中共强迫‘改造’出来的。

正在下车的他，手中提着一个沉重的麻布口袋。

他比我还小一岁，正逢壮年，但那样子好像足有六十开外了，我们大约五年没有相见，相逢第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比之盐源他新婚的岁月，真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了。我连忙迎了上去，把他手中提的麻袋接了过来。

我们一边走，一边讲叙六年前，给我的母亲送信和带来一包瓜子的情景，指点着所经过的街道上那些没有变的地方。我说：“世道变了，现在已不是当年，吃的东西并不缺，你不该路远迢迢带这么重的东西来重庆！”

他说自己土里一点绿豆，算我对你母亲一点心意，他对人的忠厚可想而知。

我望着他的脸耽心的说：“你的孩子还这么小，你自己更要注意身体健康，不要太劳累，不要太节俭，留着身体是最大的本钱。孩子要你抚养成人，千万不要还像驮牛一样的干，身体拖跨了什么都没有了。”

算来他的大女儿已经六岁，小儿子才四岁啊！

说话间，我们不知不觉到了医院，因为他曾来过，所以并不陌生。

母亲早已在她的房间里等候了许久，今天特别买了很多菜。吃中饭时，她还回忆当年大炳送瓜子仁来的事，用她的话来说，当时在这个人间地狱里，他给我送来的不是普通的瓜子，而是一种生活的希望。

吃过午饭后，我俩便到二十四中我的宿舍里，在我的宿舍里，他住了三天，晚上便是我们促膝谈心的时候，我告诉了他去成都探看张锡镔家的经过，还告诉他我去潘朝元家，又去渔洞、化龙桥、大阳沟等地寻找陈力，皮天明，刘顺森的家。告诉他，由于中共的封锁失去联系的人寻找很难。

第二天，拿出了我写的片断给他看，看后他深情的说：“我可惜没有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个精力了，愿你能把我们在监狱里所遭受的苦难，特别是进行的反抗以及牺牲难友们的大无畏精神，如实写出来。”

并表示非常渴望我的文章交付出版，并且预约，成为我第一批的读者。

当我问到他眼下生活上的困难时，他说，这几年，原来的茅草房要从新盖瓦房，更换破烂的家俱和农具，给大人孩子添置衣被，平时称盐打油、买种子化肥都需要钱。眼看明年大女儿就要开始读书，孩子们的学费全指望他在农闲时候替人帮工，换点力钱。

我看看他身上穿的补疤棉衣，便将我的衣服，翻出几件来送给他。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暗暗替他悲哀，这是一个经中共长期炼狱的“政治”犯。

不管外形如何，他内心里那一团熊熊燃烧的反抗烈火，他那棵赤胆忠心永不会泯灭。

临走时，我给了他一些钱，虽杯水车薪，解除不了他的贫苦，但总是我的一翻心意，叮嘱他明年岁末农闲时一定再来我这里，那时我写的片断就更多了。

从此以后，我和潘老，大炳一直保持着亲人般的交往，看到他们的信更使我想起狱中的经历。

远在长寿的大炳，除了隔一定时间给我寄信来，问侯母亲的身体健康，谈他的孩子们上学的情况。

直到 1986 年他才在北京的舅舅帮助下，在一所学校里谋到了一份烧锅炉的工作，以后每年秋收完结，他都要赴北京打工。

每次到北京去和归来，途经重庆都要来我家一聚，人虽穷而情谊浓，每次相

聚如亲兄弟，除了拉家常也谈国内外大事，有时我们一起到潘老家共聚，畅谈。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突然接到他的长女王琳给我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那一端传来了她断续的哭泣声。告诉我说，她的父亲因煤气中毒身亡！

闻此噩耗，我吃惊不已。三个月前他去北京打工前绕道重庆时还来看过我，当时我提醒他已近六旬，身体没有原来利索年龄不饶人，远离家人更要小心。

没想到，意外厄运真缠上了他。

现在他丢下妻儿，在为人打工的路上一去不返了。

大炳在北京中毒后，没有马上身亡，煤气把他变成了不能动弹的植物人，直到那所雇用他的学校通知他的妻子时，一家人才匆匆赶到北京。

他这一走，丢下了两个孩子，长女才十四岁，小儿子十二岁亲朋都是些困苦农民，加上在这个人情菲薄的年代，谁又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倾力相助？在边远的农村，娘儿三人活下去更加艰辛。

可恨的，对大炳的死负有直接责任的那所雇佣他的学校，想草草了断此事，在三个孤儿寡母到了北京后，趁已变成植物人的王大炳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把责任往死者身上推，仅拿出八千元人民币了结此事，将母女三人打发回重庆。

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不知怎么才能保护自己的母子三人，只好含着眼泪将行将咽气的王大炳，送上了火车，哭哭涕涕一路回到重庆。

刚下火车，王大炳便闭上了他的双目，与这个奴役他一辈子的社会永远长辞了。悲痛欲绝的妻女三人只好在车站附近，草草办了丧事，将他送去石桥铺火葬。

他的离去，使我痛失一个可以交心的挚友。他那诚恳，质朴的语言，干瘦的外形，都会唤起我内心对他的无限思念。

也罢，大炳逝去，从此再不为儿女牵挂，再也不受中共奴役，也再不对不平世道愤懑不平了。

面对他丢下的孩子，王琳正面临初中毕业即将升入中专或高中的学业关头，按他母亲的意愿，只要她在初中毕业后，能在城里谋到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便心满意足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她才只有十四岁，就必须应付世道里处处潜伏的危险。稚嫩的肩上，过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担。

我竭力支持她读书，至于经济上拮据，可在我的工资中省下一部份来供她。便当着母亲的面，承诺了帮助她继续求读，至少也要读到中专毕业。直到她取得工作，能独立生活为止。

我这许多年来，在中共统治的天下，天天耳闻目濡，不平的事太多，对受

害者充满同情，却无可奈何。渐渐把我性格上固有的楞角打磨得平滑光整，有时碰到替人打人命官司讨回公道的事，也往往没有去做。

听王琳母亲讲，致大炳中毒身亡的那所学校，因暖气烟道前年堵塞，并未疏通，所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何况人死后只付了她们母女仅八千元了事。为亡友，为他的孩子向学校讨公道，索取应赔的损失，便成了我义不容辞的事。

中共把保护劳工权利，口头上唱的比什么都重要，而实际上看看他们制定的劳工权利保护法，便知道他们的虚假，公认的劳工基本权力，中共并无可行办法给以保障，连他们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时，所得的赔偿也是低得可怜。

为替王大炳讨回一点公道，为王琳向北京用人单位多争一点赔偿，我到我厂劳动人事处借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法”，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贯彻劳保条例的细则，想找到一点关于用人时，被雇佣者死亡或工伤致残，劳动者可以诉诸法律的条款。

遗憾的是，劳动保法及各地配套文件，只字不提劳动者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被侵害的规定，以及遇害时，如何索赔的条款。

只有一段“职工因病伤死亡的‘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凡职工在职期间因工死亡的，用人单位除承担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医疗住院费，补发十五个月的工资作为一次性抚恤费；承担死者治丧的全部费用；……其配偶在农村的，因死者亡故后而失去了劳动力，应由所在单位给与死亡者每月基本生活补助费，子女未成年的，由所在单位承担生活补助费直到成年，如此云云。

据用人单位说，王大炳的基本月工资仅 400 元，十五个月工资只有 6000 元。而给与王大炳妻子的生活补助费，在四川省劳保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每月仅只有三十元。在九十年代，三十元的生活补助是连吃白饭苟延生命都不够的。

8000 元拿给三个人用来买粮食吃，能维持多久？何况大炳一条人命岂可以八千元了结？当然，这比草菅人命的毛泽东时代，算“进步”了。那时，像大炳这样中毒而死的五类，就只有用席子一裹，抛尸荒野的命。

既然找不到其它的依据，只好按“劳保条例”中的抚恤标准，找用人单位算账，看能不能多争到一点抚恤金，以救救将面临失学的孩子们。

想到这里，便提笔以王琳的口气，写信给那所学校，一面据理陈述有关国家劳动保护条例对死亡职工的抚恤规定，如果以四川省政府的最低标准进行计算，一次性需要这所学校所付出的抚恤金，至少需再补一万的费用。

写完了这封信，把它交给王琳，嘱她将原件保存好，一次性复印三份，一份挂号寄给那所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如果这位校长抱着不理的态度，则可以将其它两封向劳动部投诉。当然这些信都只能抱着试的态度，因为，这种老百姓的“人命官司”在中共的天下一向是不会重视的。

两个月后，给学校发出的信，终于有了回音，答应再增加三千元抚恤费作为一次性了断，面对这种“软打整”，王琳犹疑了。

她说介绍她父亲去北京找工作的“舅公”来信说，王大炳去北京打工，纯属他的面子带着“照顾”，并不是该校聘的正式员工，所以还不能完全按劳保条例交涉，劝王琳母亲在学校增加抚恤金后，不要再纠缠了，不然他不好处事。

同时马上就是初中毕业生考试，孩子正面临着一场激烈的竞争，据她说长寿地区当年初中毕业生要求考中专的学生，在一千人以上，而各中专学校招收长寿农村学生的总数不到一百人，在这场竞争中她必须取胜。

她说“爸生前对我的最大希望就是长大成材，他外出打工，一心让我上学，现在他去世了，考大学受经济条件限制，唯一只有应考中专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最需要是从学校毕业后得一个就业机会，所以暂时只好将替亡父打官司的事押一下，等到考试以后再作计较。

其实她已经在舅公和社会的压力下，放弃了追索父亲死亡赔偿的念头，无可奈何地了结了这场人命纠纷，在中共专制时期受苦受累的大炳一命，最后以**1.1万人民币了结了，在中共眼里普通劳动者人命多么贱!!**

1996年夏天，在长寿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中专的考场上，王琳在一千多考生只录取96名的高难竞争中，沉着应对，以总成绩486分，远远超过了当时对农村学生的苛刻录取线440分。

但是在如此优异的成绩面前，她的面部没有任何兴奋。在她那孩子气脸上不但布满了倦容，还忧虑的告诉我：她报考第一志愿的学校已半月，一直没有发来录取通知书。并且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在重庆市工业学校有没有相识的朋友？我看得出她被一种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困扰着。

在我追问下，她终于告诉我，这次报考她填写的第一志愿，是重庆工业学校，在通知她的中考分数时，她的中学校长特别叮嘱道，重庆工业校是重庆市经委主办的一所重点中专学校，因为该校包毕业生分配，所以是重庆报考生最多的一所热门学校，考进去不容易。

加上工科类毕业生常受用人单位拒绝女生的影响，所以工科专业，女生被录取的机会比男生更苛刻，过去长寿地区常常发生女生上了录取线，没被录取的事。所以请求我设法与工业校疏通关系，说关系不到位，就是上了分数线，也有被落榜的危险。

像王琳这样远在长寿偏僻农村里的女孩子，那来与工业学校攀亲沾故的关系？万一真的落榜，要未前功尽弃回家务农，要未交足两万元读该校的议价生。两种后果，对王琳都是致命的。

她的父亲为她读书连老命都丢在异乡，还不是让她能走升学这种唯一前途，她从小刻苦读书，为了节省开支，她背米上学交学费；放学了打猪草喂猪；内衣烂了也没有换的，补了又补；做作业把其它同学用过的作业本翻过来打草稿。这一切都近在眼前，她不能把父亲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钱去交议价费。

世道的不公平在她年幼的心灵上烙下了铭心印记，这也许是那个年代，想在求学中找到一碗饭吃的穷孩子们，最痛苦的事。报纸上每年都有这种因考不上学校的考生，走上自杀轻生的消息。

事不宜迟，病笃乱投医了，王琳在几个亲戚的商议下，在老校长的建议下，从银行里取出来一千元，这可是她父亲的丧命钱，用这钱买了烟酒之类的常规“礼品”，战战兢兢怀揣着剩余的几百元钱，到重庆找到了工业学校。

工业校已放暑假，就连操场上也没见几个人影，怯生生的她跟着老校长，找到了往届长寿中学毕业后就读工业校，至今仍留校工作的老校友李某。李某

表示他可以为王琳介绍现招生办公室工作的林老师，据这位李同学介绍，报考同学只要上了线，都可托他来决定入校的资格。

于是老校长和王琳跟着他，爬上半山上的教师住宿楼。不巧林老师放假后回乡下老家一直没有回来，但是这位校友答应林老师回来后，立即办这件事，劝他们暂时回长寿听候消息。

王琳回到长寿，在焦虑和盼望中等了十天，工业校的录取通知，仍杳无音讯。王琳心中想：是这笔私下交易出手太轻，还是那位李校友另生了枝节？乡下又没有电话，正夏日三伏，王琳在骄阳下天天往学校跑，犹如热锅的蚂蚁，经过发奋努力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她，还要为求学送礼，撞后门！

又等了十天，她终于耐不住，再度从长寿乡下来重庆，这一次跑来求助于我了。学校在国家统一下达招生指标外，增收应届落榜生的规定，称之为“议价生”，教育上的投资，大陆向来是世界最低的国家。经费严重不足，成为学校招收议价生的‘正当理由’。

我不知道这种议价生的招生人数和价格是谁定的，也不知道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兴的。只听说收议价生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子弟期盼求学的一种措施。大陆实行一胎的计划生育，一个家庭一个独生子，特别是贫穷的家庭，砸锅卖铁也要让唯一独儿进得一所较好学校。

在中共毛泽东时期穷怕了的臭老九们，盼来了发财的好机会。议价学校遍地开花，教育也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之一。古时候卖官鬻爵是可杀头的，而今中共领导下，文凭变成了社会主义流通中特别的商品。当然双方都心甘情愿本无可非议，不过买方往往成了无力支付的穷人。

而且“文凭”不是日用的商品，买卖文凭这种公开的腐败在中共后集权时期的猖獗，窒死了求知识求本领的学风。

中国是一个文明教化的国家，自古我们祖先办教育是以“修身，致知”为目的，古来圣人办学完全是为了修好社会风气的。提倡苦学，以立身为本，老师也只满足于束脩之礼。

而今文凭既成了进身的通行证，成了有钱人炫耀自己的阶梯。办学的人也从事贩卖假文凭的勾当，在社会上招摇撞骗。

报上偶然看到对买卖文凭的批露打击，那是行骗者搞得太不像话，拿个别人开刀做做样子的。学校都这样，教师收取学生贿赂，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敲诈学生便一点不奇怪了。

令王琳烦恼的就是为了求学的这份礼该送多少？这是不比商场上的商品，挂着“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的牌子，使买卖双方都明白的。送给老师的这份礼，其多少也要根据求学人数变化的“供需”关系来调整，俏时可以几千元，贱的也是几十块。

再加上，这种议价为世人所不齿，需要遮遮掩掩进行，王琳再烦恼也只好委屈着忍受，好歹这也是社会主义特色一绝！

不过，已经付出去了一千元，穿着拣来的比自己大两个码子很不合身的花裤子，对于刚跨进城里，在工业学校的大门口徘徊的王琳来说，就是一笔了不起的巨大开支，要知道仅仅这么一送，就送走了他的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抚恤费

十分之一的数目，是长在农村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了一年的收入！

《儒林外史》开头讲元朝末年有一个叫王冕的少年，他十岁时就给人放牛，因为他七岁的时候父亲早逝，母亲为人做针线活，供他到村校读书。每天黄昏回来，放牛的东家给他的一些鱼肉，用帕子包好，带回家孝敬母亲。白天放牛时常骑在牛背上，画池塘的荷花，日渐成名。

长大以后，他常常以自己画的荷花拿来集市上换些柴米，后来有人发现他不但才艺高超，且胸襟开阔，便举荐他去当官，王冕却为了逃官跑到山东济南靠测字绘画为生。没有好久，明朝改代，礼部拟定了在民间行科举考试办法，凡要考取功名，三年一试，以四书，五经，八股文考士。

王冕说：“这种科举制度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以此为进身之道，必会把文行出处也看轻了。王冕后来隐居会稽山中。

古人连科举制度都有非议，而今天却兴出来贿赂作弊。王琳既然跑来求助我，也是天有巧合，工业学校校办工厂的厂长陈明生，正好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八六年我和陈明生在同学会上重逢，当时参加这次同学聚会的人留下了通讯地址和电话，现在王琳入学的问题正好请他出面帮助疏通。

当我接通陈明生的电话，告诉他有事相求后，他欣然答应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带着王琳匆匆地乘车赶到了化龙桥，在工业学校教职工的宿舍里，我们很快地找到了头发已斑白的陈明生。

自上次同学聚会后又相隔了十年，十年的时间对于老同学尤其显得光阴摧老。他告诉我，他刚刚才退休，校办工厂和学校的大小化验室他都没有介入了。今年招生办公室负责的教务主任张某正是他的学生，向来关系处得不错。

当我讲到当今社会上教育的种种丑恶现象，生活在我们这个层次的人感受是相同的。他当即表示，现在不是评论中国教育危机的时候，而是要赶快落实王琳入学的具体问题，于是他又亲自带着我们去到了张主任的家里。

张主任的爱人接待了我们，但她告诉我们，张老师去成都招生还没有回来，估计要下周才能回家。陈明生当即写了一张便条，把王琳的名字、考区、准考证的编号以及所考的分数全部写在上面，拜托这位张主任务必关照。

便条写好，交给了张夫人还一再地嘱托张夫人等到张老师回来后，务必落实这件事，这么一来王琳的录取才算是有了着落，但终究还没有最后的敲定，回到陈明生的家里，我把和王琳父亲同我在狱中多年交往告诉了他，他感叹说，现在人和人之间感情的空间已越来越窄，社会上除了金钱关系什么都很淡。”

教师为了多捞几个违心钱，与学生关系搞得如此庸俗，仔细想来难道不是中共统治设下的隔阂么？师生已经谈不上什么感情。

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情丧失，人与人之间全是势、利关系，何等可悲。

当我们起身告辞后，我嘱王琳暂时回长寿家里，好好的休息几天，准备好上学的行李和学习用具。中专学习的时间足足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所需要的费用还很多，固然我可以帮助她，但毕竟是有限的。

大约十几天以后，我终于接到了陈明生的电话，告诉我，王琳被工业学校正式录取，我问老同学需不需买点礼品，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如此，他和这位教导主任纵有师生之谊，也该随着俗流有所表示。否则王琳就是被录取了，

今后还要拜托工业校的老师 and 校长们对她多多的关照。

他在电话上说：“不必了，否则也太小看他这位老同学了。”但是他关照王琳先前送的礼也不要再去追究，礼是王琳自己送的，只能看成是她自作多情了，何况收礼的林老师今后是王琳的班主任，在今后三年的学业中，不但要依靠她对她的关照，还要在三年以后的毕业评语上得到他的肯定，千万不能得罪他。

但我还是主张找个适当时间，大家认识一下，就在附近找了个干净食馆吃顿饭聚一聚，一来为王琳顺利入学庆祝一下，二来也算是我代表他的父亲向学校拜托王琳今后三年中学业顺利，陈明生同意了。他们把聚会相识的时间订在该校开学的时候，那天我反正要到学校来给她付开学第一个学期的学费。

王琳在得知她被录取的消息，究竟高兴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我想到千千万万个类似王琳的孩子，不一定都会得到她这种比较满意的结果，中学毕业升入中专，以及今后处社会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开学前三天，王琳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包来到我家，那包里装了一袋绿豆，一袋芝麻和一大块农村的“老腊肉”，满脸汗水，脸蛋涨得通红的王琳向我解释说：“这是我妈的一点心意，本来还想把家里的几十个鸡蛋带来的，但我实在拿不动了，再说路远迢迢的，鸡蛋在汽车上又容易打烂，所以我没带。”

我知道在偏僻的长寿农村，她送来的东西恐怕要算农家最值钱的礼物了，我那能收下？便对王琳说“你母亲对你的用心，你应当牢记，这些东西，你在大热天这么老远的扛来，谢谢你妈的心意，但你还是带到学校去，酬谢一下你的陈伯伯吧。”

后来我知道，陈明生也没收她的礼物，最后还是送给了班主任林老师了。

后来，陈明生告诉我，他已问过张主任，知不知道王琳送礼给林老师这件事，张主任说林老师压根就没有提起此事。若不是陈明生起了作用，王琳能不能走进工业学校的校门，并坐在课堂里上课，恐怕还是一个未知的事。

后来为托附王琳的入学和学业，我曾两次去过林老师的家，在他的家里家庭电影，柜式空调，国外进口的高级 VCD，讲究的家具摆设，应有尽有，比我富裕多了，他那里希罕王琳带来的一包绿豆，一块腊肉啊。想到可怜的王琳连内衣都没有换的，我心里真有说不清的滋味。

听这位林老师说，他除了工作外，还兼任好几个业余的职位，他拿给我的名片上写着，某机械进出公司的推销员。

因穷而逼出来的致富狂热，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鼓动下，对穷得上无片瓦的中国人，产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尤其是像林某这种人，邓小平的政策意味着一个富人集团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古人说：“人无横财不富”。

所以现在知识分子，也学会了这种从更穷的人身上进行“原始积累”的手段。这可是中国人中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无疑是文革道德堕落的继续，有这种行为的人，怎么能担当塑造人类灵魂的神圣使命？

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经历毛泽东疯狂的摧残已完全堕落，人们以随意的骂人打人为习惯。以公开枪劫为乐事，社会道德的危机日趋严重。接着就被一群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者搞得面目全非。

教育的危机，可说是当前社会最大的危机。形形色色的腐败以及公开的损

人利己已严重腐蚀了青少年，据报上透露，未成人的犯罪年龄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低了三岁，1999年公布的我国青少年作案数，占整个刑事案件的19%，并以偷、盗为重点。

先前还有在报章媒体上发一点“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渐渐的淹没在“怎么发财”的嚣声中，人们似乎对社会的堕落感到麻木，当局更担心的是救救孩子的呐喊会引发六四的回声，会因此而动摇中共统治的大厦。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口号，就像包着无数腐肉的依包，越包越烂，人们耽心，为维持一个腐败政局的稳定，究竟会把中国引向何处？

我们古代的哲人主张内心的修养。把修心养性当成教育的出发点，百年树人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业，被一群打着“解放中华民族”，“砸烂封建礼教”的革命家们糟踏得一无所存了。

当然，王琳送给林先生的礼物，既无聊也无知，然而这恰恰是被社会看作可行的途径，林先生对给他送去的酒和烟不屑一顾，这区区一千元的礼物，对聚财有道的林先生哪里算得上是“礼”？但对于连布衣服都没多一件的王琳，恐怕就是一笔想了又想凑了又凑的大数字。

同在一个课堂上的师生怎么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尴尬？所幸工业校求学三年，王琳在班上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想这大概是王大炳的遗传基因作用，是他那双死不瞑目的灵魂，在阴间对他女儿的督促？

1999年夏天，她从工业校毕业以后，在南坪一家电力公司下属的配件加工厂从事技术室的工作。算是她跻身城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一业之地”，实现了她的母亲最低的要求。

由于我已年老，这几年很想找到继承我的遗志，完成对这个时代无情批判的大业，我曾倾注于我的儿子身上，但令我羞愧的是，在和社会争夺我的孩子时，我却失败了。

曾一度把这种神圣的希望寄托在王琳上，然而没料到，我的影响终于没有战胜恶劣社会空气对她的影响，三年的中专生活，在环境的陶冶下，她那原先诚实的品性被渐渐改变，渐渐地我们失去了原先那种感情，自2003年她结婚以后，我们就很少往来了。

但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延续，王琳是王大炳的女儿，他们身上固有的秉性会最终会起作用，我想我终生反对专制主义那种不懈斗争，终会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结出硕果。

第四节：潘朝元

1979年回重庆后，有地址可找的便是潘老，回重庆后还没有电话，我就按他信上留的地址很快接上了同他的通信联系，从信上知道他回渝后，在大坪黄沙溪一家百货商店里站柜台，并暂住在大女儿家里，大女儿是重庆干电池厂的职工，

1980年一个星期天，我乘车去了大坪大黄路，并问到了去干电池厂的路。

到了重庆干电池厂，大门传达室里的人将我引出厂门，指着山下傍在嘉陵

江边陡壁悬岩半山中的“吊脚楼”，告诉了我潘老大女儿潘丽娜的门牌号数。

我向山下远远望去，认得那些依傍着绝壁札下的“鸽子棚”，还是当年抵抗日寇长驱入侵，国民政府从南京西迁，以重庆为陪都时，跟随着国民政府流落这里的难民留下的遗迹。

这些不愿在日寇铁蹄下当亡国奴的子民们，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也为了从简建起可以遮风避雨的窝，选择了这些绝壁，用木板石头为材料砌成临时“吊脚楼”，成了当年国民政府抗战的珍贵纪念留了下来。

1992年冬天

潘朝元和我儿子孔德馨

它们曾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中被搬上银幕。它们的屹立，证明中华民族的子民不屈强暴，誓死抵抗外侮的气节。为抗拒日人入侵，他们宁愿在这里风餐露宿过着流浪生活。

没想到四十年过去了，这些简陋的建筑依然还在，中共三十年来既没有将这些遗迹保护和培修留为文物，现在却被编上门牌号码，变成了贫民窑。毛氏三十年统治，建设竟是白纸一般。

而潘老回到这里安居，真是想都没想到啊！

我沿着曲曲折折的山壁小路一路问去，大约走了足足半个小时，终于才找到潘老的“家”。他的女儿潘丽娜一家住在傍岩而筑的小木房里。当时没有电话，事前我也没有写信告诉他我那一天来访，所以当潘老的女婿打开小木门的时候，带着诧异和陌生问我找谁？

这时在木屋门口仅一尺宽的山路外侧吊脚楼里，响起潘老的回应声。我定睛去看那吊脚楼，靠三根圆木柱，从更低的岩石上支立着。两块厚木板架成了通路。远远看去令人心悬，说不定那阵巨风就会将它连根拔起来吹走。

潘老的回应响过以后，他从关闭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一别四年乍然相逢，我和他都喜出望外，热烈的拥抱后，他喊道：“啊呀！我的天使，你真是从天而降，来这儿也不给个信。”他还是那么幽默。

看上去他比在盐源时精神了许多，虽然头发更花白，但脸却是红润的，显得很健康。他的身后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跟了出来，那是他的小外孙，我来时他正教小外孙做作业。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他的小屋。那小屋整个面积不过六平米，顶上盖着石棉瓦，地上是木地板，地板下面是空的，小屋上面有半山里的大树作荫蔽，可以减轻太阳对小屋的幅射。

屋里摆着一张小木床，一张小桌和两个小凳，小桌上还摊着小外孙的作业本。虽简陋，但主人却将它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环顾了一下小屋问道：“这小屋冬天恐怕够呛，下面的江风往上直灌，你老人家受得了吗？”

他尴尬一笑，说道：“这总比监狱强些吧！何况，这小屋通风和光线都好，有益于长寿。自陈‘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我在此山岩下已历三冬，倒也习惯了，被共产党磨出来的，什么苦也不当回事。”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大女儿一家。大女儿在厂里任会计，大女婿姓汪在

工厂任技术员。两个外孙，大的已上中学了，小外孙还在读小学。

因为事前大女婿没有任何准备，中午他执意邀请我到大坪街上用餐，我们便踏着山路向上走去，边走边以这些吊脚楼为话题，谈到当年抗日战争。

抗战时，他才从军校毕业，在汤恩伯的部队里当排长。由于累立战功，抗战胜利时他升到少将军衔，内战时期他的部队打散了，辗转回到重庆。1952年因在深圳偷渡，准备去香港事情败露，被中共边防部队抓捕入狱。

他一生追随孙中山信仰，若非遇到76年中共大赦令，他是下决心要把牢底坐穿的。我对抗日战争和对国民党军队的了解，颇得他的教益。

我告诉他，‘平反’后，我回重庆路过成都，曾去张锡珪家。他听到张锡珪母亲和兄妹悲惨遭遇后，唏嘘不已。

讲到徐伯威时，他说：“1976年我回重庆之初，市委统战部也曾把我请去市参事室工作，但遭到我拒绝，因为我不愿意按共产党的意图，写国民党当年在重庆的历史。我宁可去商店站柜台，也不愿说国民政府消极抗战。”

于是来劝说他的中共统战部官员，将他分配到黄沙溪一家副食品零售点，接受每月四十元的工资，聊够糊口。

他说：“当局之所以今天对我们保持统战的“客气”，不仅因为三十年统治，原形毕露，民心丧尽，统治地位动摇了，更因为台湾今天发达的经济和实力。随着大陆的开放，国民逐渐了解真情，台湾赢得了中国越来越多的民心，历史定将证明台湾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宁可住在这里昼迎江风，晚看渔火，过着超然脱世的生活”！

说到这里，他停下脚步，望着绝壁下滔滔东流的江水叹道：“几年来，我常常独自站在这里仰望蓝天。

春天，当候鸟从南方飞来，秋天大雁从天空掠过，我的心就想到南归，我常常仰天长叹，苏武牧羊十八年，尚有归期，而我也许只好终老这里了”。

这真是：‘几日避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流，臣心一片磁石心，不指南方不肯休’。少年读陆游绝命诗，对诗人临终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殷殷之情，尚理解不深，今天便有了切身的感受。

在他挽留下，当晚我就留宿在他那鸽子棚里，我们俩将他大女儿屋里的沙发抬进他的吊脚楼阁里。与他的小床拼在一起，我俩就在这“加宽”的床上同榻而眠。

是夜正逢上弦月，黄昏一过，月光便从那石棉瓦逢里透了进来，银色的月光洒落到地板上，令人不由得想起李白的“静夜思”。！

他是我在重庆最知心的知己，我在他面前可以轻松坦露心怀，甚至于个人隐私也无回避，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我的安家娶妻，我讲了邹银双的故事，长叹道，年轻岁月被中共所践踏，身处蔡家场偏僻的乡间，不知我底细的“好人家”，又有谁愿把自己的黄花闺女，许配给我这个劳改释放犯？

记下了潘老住地的通讯地址，我在第二天一早就告辞了，好在北碚到重庆并不远，今后每逢节假日重逢团聚的时间还多，那时虽然家里还没有电话，但平时，通信问好互道近况则是经常的。

1987年春，我接到潘老给我的信，说他随着全家从黄沙溪悬崖壁上的吊脚

楼里，迁到了重庆电池厂新建的职工宿舍，说我半年与他没相见了，很思念我。在信中附来了一张他所住大黄路新宅的位置图，按照他图上提供的坐标，我在一个星期天再度专门去拜访他。

从公路上到达那楼房的底层，大约有二十米高的石梯坎，我心中暗暗想，这样的新居，虽然免却吊脚楼那种风雨袭击的惊恐，但从马路登到他住的八楼，足有二百余台阶。潘老已七十多岁，每天上下都要徒步攀登，够呛的。

但这年月有一住处已相当不易，谁还管它进出方不方便？

我正仰面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八楼窗口，便听到那窗口处传来了他的喊声，他早就在这里扶窗相望了。

爬上三楼，他已从楼上下下来接我，好在多年劳动锻炼，他当时身子还很硬朗，见到我后握住我的手一个劲的摇。我知道，长期的孤单今日得与我相见，那心情一定很高兴。

我们一起走到八楼左边的房门前，他取出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门，进门第一间小屋，大约 6 平方米，便是他的房间。进到屋里，一个平柜，一张小床，一张供他写东西看书的办公桌。

与黄沙溪旧居相比，听他打趣说道：“高高在上，空气清新，更加远离人间，进入仙境，我搬来时，想既成了仙，本不应有任何的东西，连这床、柜、桌、椅都不要，中共关了我整整二十多年，出监后又过了十一年，菲薄的工资够糊口，便是中共在我身上体现的人道主义。不知台湾政府知道我们这些当年党国幸存者，住在这高空上有何想法？”

进他房间后，他张罗着给我倒茶，我们俩在小床上对面而坐，他细细打量了我以后，叹气道：“你老多了，大概工作够操心吧。”我微微一笑道：“你也显得苍老多了，心情大概也不怎么痛快吧？”

他摆了摆手说道：“我今年已七十三岁，来日不多，这把老骨头被中共消磨殆尽了，我只希望在回到阴曹地府后，来生再不受这种折磨。”

说了一会话，便邀我到客厅就坐，自己到厨房去了，不一会从厨房里传来了他的叹息声：“真够呛！又停水了。”他告诉我说：“临近中午大家都在用水，水厂的水压不够，上午就停水了，天天如此。

为了解决白天的用水之需，他只好在半夜起来接水，自来水像一条线一样，开着龙头一直流到天亮还留不满蓄水缸。夏天经常闹水荒，只有等女婿下班回来，到楼下去一盆一盆地端上来，有时候我也要下楼去端水”。

活到七十三岁，已过古稀之年，生活的苦涩仍在困扰他。

我听到后，忙拿起盆子要下楼端水，他阻止道：“下午的水已经够了，晚上如果要洗澡差也差不了多少，凑合着用吧？”

正说着，他的小外孙放学回来，我已经五年没看到他了，现在已经长到一米五以上，俨然一个大小伙子，潘老说他已小学毕业上中学了。小外孙告诉我，外公为了到楼下端水，前几天还在三楼楼梯口上跌了一跤，所以我们都不准他下楼端水。

城里的居民，楼房建起来了，却陷入水电供应不配套的难事，这种本来很快可以解决的问题，一拖就要几年。

潘老叹道：“我们的生活就这么缺着过吧！”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女儿丽娜夫妇下班回家。丽娜提着一把宝剑，从客厅里拿进卧室。潘老笑着对我说，他的女儿也学起国粹来了，每天一清早都要提着剑到楼下的水泥坝练半个小时，直到身上起汗方才停止。

我笑着说：“可不可以赏光，施展几手给我们开开眼界？”她笑着说：“明天早上就请你在楼上看我现丑吧。”

看来，他同女儿女婿生活还融洽，唯一是他同老伴之间，因为二十几年的隔阂一时没能疏通，所以她基本上还住在缙云山的西山坪养殖场，很少回来，暴政给他们留下的伤痕难以弥合。

下午女儿和女婿上班去了，小外孙也上中学去了，屋子里又剩下我们俩人，我才翻开他递给我的杂记，里面有律诗杂文和回忆录，那是他在深夜里的愤世之作，我曾建议他能够系统的写下人生回忆录。

一篇‘南归赋’就我记得的，录下了下面几句：

“余南国之弟子兮，祖皇考于民国。自幼崇仰中山兮，立志三民主义。少时求读军校兮，正逢国难当头。壮年从戎恩伯兮，启于浙中金华。烽火连天生死兮，败军于乱贼中。独苦战众寡兮，身陷敌虏。囹圄流刑卅年兮，苦鼎镬求生！……”四十载，他对国民党的向往，至死没有改变。

《七律·十年动乱》写道：“笔锋战紧更兵锋，国事不堪问吉凶。败寇成王功罪判。降官敌婢死生从。强扶拓鲁宣邪道，肆诋孔灵黜正宗。野种独根无好果，民族败类史难容。”

另一首是对劳改的真实写照，反映了炼狱的过程：“十年劳改不寻常，欲说真情泪满肠。‘思想斗争’如烈火，精神炙灼胜骄阳。饥劳索命动魂魄，偶语毒刑宁哑盲。压力重重呼吸紧，使人痴慨使人狂”。

1971年六队的恶吏，张剑波为了和姘妇交欢而虐杀发妻的案发，他写了《恶吏传》。痛斥那些人面兽心疯狂虐待流放者的中共酷吏，他写道：“殊世之共产政权在其阶级斗争之腥风血雨中，对已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的国民党人仍加紧迫害，除一批在历次运动中杀掉外，四十岁以下的多数投入“劳动改造”

我入监以后，从蒙昧状态到政治上渐渐觉醒，便有潘老启发和影响的成份，所以，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长辈和狱中的良师益友。我们同监十五年，最令我终身难忘的，便是1967年8月那个血腥之夜，我被军警打掉门牙，被打得遍体鳞伤，无法动弹。

兽警还向全体流放者警告说：“谁敢帮助孔令平，替他送饭送水、倒粪倒尿，就将同他一样受到惩罚”。然而潘老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渡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六队在中共狱头猖狂的年代，能凝聚相当一批人高举抗暴的‘火炬’，也有他潜移默化作用。

下午五点钟光景，他叫我将他早已准备好的收折床，从客厅搬进了他的小屋里，仍同在黄沙溪悬崖的旧居一样，我睡的床对着他的床安下，中间只留下一个拳头的距离。

夜间，同以往一样，是我们俩久已盼望的促膝对话的难得时光，在小屋内

纵论天下大事，昼情释放积郁在内心的烦闷。

夜深了，听那自来水如线的水滴，从龙头中掉进水缸里发出淙淙的响声。他打开那壁上的灯，看看挂钟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钟了，便起身去看了厨房的水缸里的水有没有接满，然后和我肩并着肩坐着继续讲他的经历。

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从浙东一带逃出包围圈，在兵荒马乱中步行千里，形同乞丐，历数月终于到达深圳，想在那里越境投奔母党。想不到第二年被边防部队抓获，紧接着被遣回重庆关在二监狱中。

他的妻子直接受到殊连，那时她才三十岁，戴着反革命，反动军官家属双重帽子，拖着两个女儿替人帮佣，受尽欺凌。1958年被缙云山西山坪劳教所关押劳教，做了共产党的奴隶，因为常年劳累，严重缺乏营养，使她瘦如干柴。

1960年，两个女儿姐姐才十三岁妹妹十岁，做娘的不忍看孩子饥饿的眼睛，把分配给她的口粮从牙齿缝中节省下来，自己却用菜脚叶充饥，因常年饥劳，经常昏倒在缙云的山路上。

每每讲到带孩子的伤心往事，她那干涩眼眶里常挤出泪来。

1972年，大女儿在重庆干电池厂找到了一份包装电池的工作，依附着大女儿在黄沙溪的悬崖壁上原先无家可归的她，筑起了归巢。1976年在这里迎接潘老从盐源归来，这个被中共暴力打碎的家，总算依附着大女儿，“破镜从圆”了。

人说破镜从圆乃人生幸事，只可惜二十七年来这面被中共打碎的镜子已碎成了粉末，那心灵的粘合力失去了复原的能力。

潘老归来面对骨瘦如柴的妻，因身患肺气肿，冠心病，严重的贫血和心衰，宛如一支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熄灭。病床上的她反复唠叨，好像二十多年母女三人所受的欺侮都源于他。

性格固执的潘老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就把自己封闭在他的小屋中，实际上仍处于鳏居独处，逃避着妻子的唠叨和抱怨。

她咳嗽刚停，便又从新住到西山坪的老屋中，她说，那儿空气新鲜些。

看到潘老与老妻实际已分居两地，我几次劝他考虑从新建立家庭，但都被他拒绝，理由只有一个：“我已年老不愿拖累别人”。

直到1988年春天，他的妻子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在他写的《水调歌头》悼亡妻中，我深深体察他内心里用苦水泡出来的爱，那辞是这样写的：

“生命如重返，一死何足悲。

曾经十载医护，病告几番危。

眼看一丝游息，明灭半支残烛，断续又光回。

婿女多劳苦，绝地救娘归。

毕生苦，磨折尽，瘦如柴，能经多少风雨，长寿永不埋。

忽尔一声噩耗，魂断缙云西去，从此弃尘埃。

已矣今真死，遗我有余哀。”

原来，人生的真感情是伟大人格铸成的。

听他的小外孙说，外婆死后，外公曾闭门三月不出，从门缝里看到他每夜三更伏案疾书。

这时他原先退休的那个黄沙溪付食商店，因为承包给了私人，承包人因为他为人正直，一丝不苟，再三恳请他回店值夜班。

他考虑到继续打工会有三种好处，一是与店伙计们相处聊天，可以抵消亡妻带给他的思念和孤单；二来每天去那个店步行两里地，可以锻炼身体；三来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为老来进养老院筹点钱，所以欣然答应了。

我知道后，劝告他因年纪已大，行动不灵活了，万一在路上摔倒，不但自己痛苦，反而增加女儿一家负担，至于靠守店那点收入无补所缺。倘若需要，那点钱重庆市的朋友都会乐意相助。

但是他执意的去商店值夜班了，反而把每次店里发给他的“误餐”糖果留下来，每一次我去看他时，他便将它们包好，硬塞在我的提包里，关照说：“带给你的小馨馨吧，就说潘爷爷十分想念他，希望他见到这些糖果就像见到我一样，潘爷爷祝他快快长大，好作国家栋梁！”

1992年我乔迁月亮田后，便把我分到新房的消息首先告诉了他。我诚恳的请他认真考虑我的建议，请他在我这里住一段时间。

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信上写道：“我一年一年的老了，身心衰微，举步唯艰，黄沙溪的差事也力不胜任了，所以也不再去了。

然而，每每杂念累累……正到处寻找我此身的归宿地，效外？市内？老家？总要觅得一个合适的去处。有时整天纳闷，情绪很不正常，所有的远近亲戚，邻居良朋，一概不住来了，愿意小屋一人孤寂独处，一年多来断绝外缘……对于生死，我早有准备，很少去专门思考这个结局。”

他年近八旬也许预感到了什么？本来经过中共关押二十七载，经历长期的洗脑和奴役，其遭受的精神伤害和家庭破碎的痛苦，终身折磨着他。现在他感到妻子仿佛就在天堂口等着他。

由于坚强的信念，经二十五年监狱万般折磨，他晚年仍保持思维正常。

收到这封回信后，我决定立即去他的住处。

这次到了他住的八楼，他仍和上次一样在底楼迎接了我，我仔细端详他，他的确更加苍老了，然而上楼时仍保持着矫健的步伐，他告诉我说，明年他就满八十了，这岁数已令他满足了。

进到他的房间，我指着他放在桌子上已写的回忆录嘱他：“共产党将我们下狱二十多年，斗我们整我们，目的就是在精神上压垮我们，好给良民百姓们展示一下，反共的下场，但他们不但没有整垮我们，相反的，使我们成了这段中华民族最黑暗历史的见证者，成为今天最有资格揭露中共欺骗的人。

这一夜，我们俩再次促膝到鸡叫时才合眼睡去，第二天，临走时，我再次相邀他到北碚住一段时间，他说虽然我的新居提供了条件，但一来他本没有到北碚居住的打算，二来事前也没有和女儿商量。

自从妻子死后，他的女儿把他管得很严。我说：“你老人家行走如果不便，我可以用厂里的车来接你。”

讲价还价了好久，最后他答应，过几天到我那里看看我的新居，尤其想看看他最关心的德馨小儿，但讲好了的，当天去当天回，不在北碚过夜。

一个星期后，他果然来了北碚，给德馨小儿带来了四尾金鱼。

在我劝说下，他留住了一夜，翻看了我所写的“片断”，并且在回去时，带走了我写的一些初稿。以后在它上面批了他的斧正，使我的《血纪》注入他的心血，给后来的读者以更多教益。

1994年，当他得知王大炳因煤气中毒身亡的消息，叹气道：“怎么天公老是整善良的好人啊。”当我把王琳带到他那里讲述孩子的困难，并告知他，我已经收她为我的干女儿后，他立即从他的柜子里取出两百块钱拿给孩子，表示对她求学的支持。

在他已近垂暮，仅靠菲薄的退休金勉强渡日，这钱实际上凝聚着对死难者后代的关注和希望。王琳含着泪水说了声谢谢，便跪倒在地。

1995年他满八十，不知是因为阿弥托佛的佛力招唤，还是因为寻找此身归宿的尝试，他应磁器口宝轮寺主持风轮法师的邀请，去那寺院当了居士，其实是应法师邀请，为寺院抄写经文。得到这个消息，我当即去了宝轮寺。

当我跨进宝轮寺的山门找到他时，他正向一群围坐的老人讲地藏经，我站在远处不敢惊动他，只能从他那微闭双目抑扬顿挫的语言中体会他的虔诚。

一个小时后讲经完毕，他缓缓地向我走来，我迎着他，牵着他的手低声问道：“在这里习惯么？”他说：“四海为家到那里都一样！”

他告诉我：“女儿和女婿去贵州开了一个锌矿，我一人整天闷在屋里，正觉无聊，这时风轮法师在街上碰到我，他说我面带佛缘，于是我就来了。”

我进到禅堂，潘老将我介绍给寺庙的主持。听他说横行于世的大盗和杀人如麻的倌子手，对自己罪业一遭顿悟，皈依佛门是常有的事。

过了两个月，我再度登宝轮寺山门，这一次我们在主持的禅堂里相见，风轮法师纵论当今世道险恶，极言世界末日正逼近人类。

他说：“潘老已将你在狱中情况告诉了我，端详你的面像很像钟馗，佛祖将你降生，专打恶鬼。仗佛祖庇佑，你在狱中累次逢凶化吉几次逃过死劫，正因为还要继续留在世上打鬼啊”。

吃过斋饭，潘老从他的寝室里取出了他新作“等待皈依的居士”。这一篇就一直珍存的在我这里，成为他留给我的遗笔之一，现摘录于后：

“我身入佛门，俗念未净，仍然烦恼在心，痛苦难除。时时回忆一生颠沛流离，蹉跎岁月，本有清明的智慧，却被无明掩盖，凡夫的贪嗔痴，三毒迷住了心窍，种下恶业，造了不少人间恶果。

“……我小的时候，大概尚在襁褓中，吾父，吾母，晚年得子，爱如珍宝，生怕养我不活，长不大，便去拜寄了寺庙，求佛保佑取名小和尚，化缘缝起了一件五颜六色的百家衣，穿到了十多岁，还在叫我小和尚。”

目睹大陆腐败，而无回天之力的他，晚年凄凉心情可以想见，他只好以依靠皈依佛门解脱自己。

在宝轮寺，他仍以勤奋谦恭待人，诙谐幽默的谈吐，博得寺庙众僧的尊敬，但是，谁能料到，**这便是他渡过晚年的最后一岁。**

1996年春天，寄住在寺庙中的他，开始咳嗽咯血，起初还以为是普通的支气管出血，半个月服用中药不见好转，痰中的血越来越多，在他小女儿劝说下，由风轮法师亲自搀扶去三军医大检查，检查结果初诊是肺癌。

等到我获悉赶到医院看他时，他已经穿上病号服，住在大坪医院的肺科病房里了。我走进病房，见他一如往常谈笑风生，正在同对面床位上的一个病人讲“精神”治疗法：

“为什么叫生活呢？生活就是生龙活虎，死气沉沉还叫什么生活，你看我有多大年纪？每天早上我还要打太极拳，起来在阳台上练气功，像我们这样的病，如果就这样躺在床上，没病都要躺出病来。”

病房里的病人向我介绍说，他每天早上六点便按时起床，还要帮助其它病人打开水，真是一个热心快活的老人。邻床还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说：“爷爷给我讲故事，他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听过，好听极了。”

我问他：“谁替你办的住院手续？怎么连陪伴人都不请一个？”他说：“五天前是小女儿替他办的住院手续，请人服伺每天还要开给他三十元工资，我那里给得起？就是这住院费，退休单位承诺一半，你看，我那有这个经济力量住院啊？”

贫病交加，他心里十分凄凉！

我又问：“丽娜呢？”他说：“从贵州回重庆一趟光路费得上千元不说，耽误的时间也补不起，我嘱咐她的妹妹不要告诉她，现在病情还没有下结论，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暗地里询问了主治的医生，医生摇头说：“晚了，没有康复的希望，何况他这么大年纪，最多只能三个月的阳寿了。”

然而，他依然地谈笑，依然讲些有趣的故事，依然的每天按时起床，依然自己走出病房，打饭菜，打开水，依然的为邻床的病友送药递水！

一个明知自己死期已近，仍然置之度外，坦然迎接日常发生的事，这除了仰仗他那毕生的人生毅力和一贯的临危不惧外，未必没有佛在暗中相助？潘老是聪明过人的长者，每天清早他不可能面对着大口吐出的鲜血，而不知察自己已入膏肓。

又过了两周，他索性的出院了，得知他出院的那一天，我又赶到他的住处，这时他的家刚从八层高楼上搬到了临街的新修楼房，不用再爬那么高的楼。

我去时，他正在收拾他的床铺，很坦然地告诉我说：“一个人生死有定，阳寿多少都是在阎罗王的生死簿上圈定的，何况我已过八十一岁算是知足了。”

我担心他这么出院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医院未必答应，他回答说：“医生嘱咐我还是回家调养，开了许多中药，在家里熬药方便，过半个月再来复诊一下，我在医院，每天所付的昂贵的住院费使我反而担心，女儿在贵州找点钱也不容易，我怎么能多花他们的血汗钱？”

我走进厨房揭开锅盖，锅里面正熬的稀饭。

我问道：“你现在咳那么多血，如果不再在营养上补充，就是健康人也受不了。”他摇摇头说：“吃不下啊；再说谁能替我上街买菜啊？两个外孙都已在电池厂上班了，早出晚归，我不愿麻烦他们，自己慢慢的下楼上街，生活也从简了，一天两顿都吃稀饭，这样反而肠胃受得了。”

听他这么说我真想放声大哭。

我忍着悲伤，向他说：“我替你在北碚请一个保姆过来，专门替你买菜弄饭

吧！”他很坚决的拒绝了，告诉我说：“我的二女儿和住在杨家坪的外侄女都先后来帮过我，但是我反而失去了活动的机会，你看我一个人能走，能做事，一旦停止了必要的运动，病情反而会加重的！”

面对着形体黝黑的潘老，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却反而拉着我的手吃力的说道“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放声痛哭起来，这是一个傲骨一身的好人，他一尘不染的品格，如青松傲立在这个世道昏浊的人间，已经不多见了。

拨通了他侄女家的电话，对她说：“潘老在人间已是最后几天了，丽娜又没在家，千万对他要尽最后几天的责任，请你马上过来，千万不要让他再一个人上街了，万一不小心摔在马路上，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怎么忍得下心？”

电话那一头传来了哭声，答应马上赶过来。

还没隔上十天，六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钟，我便接到了潘老的外孙打来电话，带着哭声在电话中他通知我说：“外公已于今天下午两点钟离开了人间。”我的心顿时收缩得厉害。

我没有迟疑，立即乘坐公共汽车赶到他家时，已是华灯初照。

就在他家楼下的巷道中，灵堂已经布好。逢布遮盖的“灵堂”里除了他的小女儿，外侄女和两个外孙，里面空荡荡的坐着几个紧邻的邻居，老家凉平的两位老哥和远在贵州的大女儿，都只发了通知他们的加急电报，还没有赶到。

灵柩前方的一张桌子上两位宝轮寺的僧人正身披袈裟，正襟危坐，一边敲着木鱼，一边还在不断地诵经，为他的亡灵超度。

那悠扬哀怨的颂经声，吸引着一群周围邻人的孩子们。我坐在灵堂前放的一张长凳上，听着那抑扬顿挫的经文，脑子里正翻滚着几十年回忆的画页：

我与他相识于 1960 年 8 月重庆南岸弹子石四川第二监狱中，刚入狱那时我才满二十二周岁，虽头顶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项大帽，实在讲还不懂什么叫“政治”，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长者。

靠着这天赐的缘分，我们俩在 1962 年 3 月份一起从孙家花园在枪押之下，流放到凉山自治州甘洛农场，在那里九死一生地撞过老母坪，同年 10 月死里逃生又从甘洛农场再发沛西昌黄联关。

以后又一齐押送到西昌地区的盐源农牧场，这期间除了短期的调散，到农六队以后的十四年间都在同一中队，编在同一个组，铺褥相依，朝夕为伴。无论是年龄、资历和学问，他都无愧于我的长辈，在我政治上日臻成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受到了他的启迪和教诲。

从 1960 年到 1976 年狱中相伴十六年，有难同当，有危相扶。我遭受狱吏残酷折磨，被打伤后，在生活无法自理的情况下，他敢于顶着枪杆子的威胁帮助我勉励我，渡过最难熬的日子。在饥寒交迫之下，我们相扶为生存而拼搏。十六年令人难忘的共勉共扶的往事似悲歌，一曲一曲回荡在耳际，不敢忘怀。

1975 年中美建交，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中共对国民党县团有以上人员颁布大赦令，他得以先一步回到重庆，1979 年平反冤假错案中，我脱离盐源的地狱回到重庆。以后，我们又在重庆相逢，以不断的书信、互访联系着我们间的友

谊，共勉共励，成为精神上不可缺少的挚友。

然而凭着他在狱中的坚定信仰，待人平和宽容的人品，凭着他的博学和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却赢得了狱中共患难的难友们普遍的尊敬。人们恭称他为“潘翁”，是狱中最有号召力和威信的“国民党人士”。

五〇年锒铛入狱以后，他的妻子直接受到了殊连，为人奴佣。不久就被收押进行劳教，从此带着政治上的歧视，拖着两个小女儿，大的不满三岁，小的未足两岁，也在监狱般的管束下，终身为奴。可以说他的一家都因投身三民主义事业，而献给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业了。

临终前，在他的陋室中伏案留下“生活与遗言”，我在这里摘抄下来，一面给我的读者留下对他的简介，一面也让我们知道，老一辈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后人的教诲：

“由于我过去亲自感受饥饿二字，深有体会，又来自农村，熟谙庄稼人耕田种地的辛苦，正如古人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生逢乱世之我，感受而加以认识，深深懂得物力艰难，从来敬爱农民，从来不敢抛洒粮食，也足见我的生活节约刻苦有了根，再苦我也能过去。

因为我从苦中来，早已苦惯了，君子忧道不忧贫，穷困威胁不到我。

出狱二十年来，一直自炊自食，自洗自补，逢人从不说苦，在经济收入低于普通职工，受着不断上涨的物价压力，不得不更加节约，不吃烟和茶，酒在严冬喝一口。好在我一个人又已年老，消化机能减退，齿牙摇落，咀嚼困难。每天吃两餐粥，有时候换吃面条，一菜下饭无兼味。

看起来我生活确实清苦，但比起那狱中的日子就好多了……

告诉丽娜丽施两女，我死了不举哀，不办丧事，不穿寿衣，不烧香烛纸钱。臭皮囊一火焚了，不要骨灰，不详之物，要来何用？人生道路上我是一个失意者，没有任何留恋，洒脱而去，岂不快哉！”

好一位彻底的无我者，临终前留下的这段文字潇潇洒洒，对这个痛苦不堪的人间，没有任何牵肠挂肚和遗憾，没有任何的遗产留给他的后人。当我问生理后事的外侄女，有没有追念他的悼词在他的追悼会上宣读，她却摇摇头。

在这种临终的时候，纵有千言万语，岂是一段家人的悼词能说清？

好在他身虽归去，灵魂尚存。信仰和追求都随灵魂而一起长存。至于一生，后人如何评说，对于置生死于度外的他也不会计较。更何况，又有谁为他写传记，留存人间呢？于是我默默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他的一生，出生农家，六十年前从政治大学毕业，后来去黄埔求读，从此在心中扎正了三民主义的根，追随着国民党从事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在国难当头，日寇入侵之际，毅然从军，官拜浙江金华行辕主任，并挂少将衔，抗击日寇，八年倥偬。

抗战结束共军蜂起，他愤然率军抗击兵匪，终因兵败成囚，锒铛入狱，然而由于信仰坚定，在中共高压刑镣之下，狱火垂炼了他整三十五年。

自比苏武，用他的精神鞭策自己，激励周围。做到在独裁淫威下，威武不屈，信守了对三民主义的忠贞不渝。其人格，可以昭日月，他一生中无愧于孙

中山之最为忠诚的信奉者。

这同那些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民之“救星”，贫苦者之救世主，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挑动内战，涂炭生灵，残害无辜，制造人为的战争饥荒，杀人如麻的人比起来，显得光彩夺目。这同那些争夺权位，呼风唤雨，穷奢极欲的当今各级贪官污吏和毫无正骨的人比起来，又是何等磊落！

历史一定会对一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向邪恶斗争一生的人作出公正裁决。历史会永远纪念潘朝元这个忠诚的民主战士。》

是夜，就在那灯光昏暗的灵堂之中，在他的遗体之前，我把这段文字在他的灵前默默念后，再一火而焚。就在他的脚前，我将四条长板凳，拼在一起，从温过去鬓发相触的情谊，俯身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声：“潘伯，我来矣，就在你的脚前与你作最后一次相伴吧。”言毕和衣悄然躺下，似与往常那样，面对面促膝相对，只可惜此时我们已不能对话了。

心中似有一团烈火在燃烧，一摸我自己的额头烫得灼手。又感到板凳下面凉风突起，凌晨二点左右忽狂风大作，雷电骤起，我定了定昏迷的眼，看那灵前烛光随着狂风而摇曳不止。昏昏屯屯之中，感到那南方尊者来迎接在空中久久徘徊的潘老游魂了。

紧接着倾盆大雨狂泻不止，好似要冲净这地面上人间太多的淤泥垢土，冲净这人间太多太多的不平。

到了凌晨四点左右，楼下响动，他的大女儿丽娜和丈夫才下火车，匆匆赶到。两个女儿扶灵柩恸哭，我看四下，除梁平老哥外并无他人，连生前最密切的挚友都没有在场，我知道他生前的朋友不计其数，仅盐源同过患难，而今就在重庆仰慕他人品的就不少，而今一个也没有来。

后来我才知道，自他身患绝症后，全部断绝了同周围友人的信息。他的病来得突然，他的灵魂走得仓促。

后来我问到唐元澄等人，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潘老得了肺癌。就连黄沙溪付食店，他站过柜台守过夜的那家商店的小青年们，都不知道他得绝症的消息。

我若不是特别的关注他的晚年，主动获悉他的消息，未必又能守着他的灵，渡过这最后的令人难忘的一夜！

这段晚年的凄凉和悲景，以及他为自己设计的潇潇洒洒离世的全部过程，真正实践了他的临终遗言。

这同那讲排场，囍儿托女活得快活，死得悲伤的市俗人们比起来，有多大差异啊！

上午九时许，一辆卡车载着他的遗体，一驾旧中巴客车，载着送行的不到三十个亲朋，就在阴霾的天色里缓缓驶向石桥铺火葬场。

夜间下起的雨变成了霏霏细雨，就像老天爷的泪水永无止尽。

送葬的队伍没有乐队，没有仪仗，没有鞭炮。灵车缓缓驶出巷道，悄悄的，那气氛可以说十分凄凉。

身处此情此景，我泪流不止。十点钟，潘丽娜在火葬场院吊唁厅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家庭遗体告别会。告别会刚刚结束，我已难以坚持，前一夜风寒感染，此时已使我浑身发烧，满脑袋的昏昏沉沉说不清是病还是过度悲哀，坐

在那告别会厅前的廊沿长凳上，我止不住哭出声来。

我想，日后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得知像潘老这样的忠枕三民主义之士，在铁蹄，囹圄之下守着这信仰的方寸，矢志未移。而今天又如此凄凉与世长辞，何时才能为他补上一个追悼会，昭扬他光明磊落的一生，以及他为民主事业所作的贡献，他的在天之灵便可告慰了！！

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一点，我在泪眼中目送他那枯瘦的遗体缓缓推进火化炉，眼望着那伸入苍穹的浓烟，把他的魂灵和他的肉体一起带入到天堂，永别了这块苦土。

和他写的“吊亡妻”我填词一首：水调歌头·悼潘公

《人生如灯烛，烛尽光难收。明灭半载默忍，咬牙独徘徊。

瞀然枯槁今去，六魂悄然苍穹，消洒南天回。蓦然回首处，我在守忠骨？

八十终，坎坷尽，魂弥留。万事萧萧，曾经沙场英雄事。兵败阶下成虏，囹圄自比苏武。晚年佛门皈依，方悟万事空。从此蓬莱去，净土迎君回。”》

潘老骨灰安葬于哥乐山陵园。

十年后，我同他的侄女一同拜谒了他的墓，在苍柏丛中，仿佛又见他的遗容，于灵前填《江城子》一首：

《君卧山岗已十年，今复见，松柏间。梦里拾遗，故事有多少？纵使阴阳已隔离，五十载，旧时日。

指处荒冢忆昔时，正伏案，愤疾书。促膝相对，岁月能倒流？唯有正义摄人心，一曲在，永唱吟！》

第五节：夏 光 然

毛泽东时代，在反抗中共迫害的斗争中，我和夏光然结下了共生死的患难之情，当年张锡铨和刘顺森相继惨遭毒手以后，我和老夏便成了“火炬”生还的主要成员。

回重庆后，当我知道他在出狱后混迹市井的遭遇，对他深为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资助过他。我几次为他找工作的努力没有实现，深感力不从心。

中共长期的虐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性格被扭曲的伤痕，铁打的汉子也难免这种伤痕的恶性发作。所以幸存者之间保持相互慰勉，成了我们之间的共同约定。

1989年他与王正印闹得很僵，决定离开重庆，回到成都金牛镇的老家去，回成都之前曾到北碚我的家中一聚，那次我们同去北温泉和缙云山玩了一天，并且合影留念，我问他回成都以后的打算，他不无伤感的回答我说：

“随遇而安吧，我不像你有了家，我是孤身一人无牵无挂，在江湖上漂泊多年习惯了。我最牵挂的是那些在盐源牺牲了的先烈们，民主尚未成功，我一定要回一趟盐源五号梁子去，凭吊当年已经牺牲的难友们，他们的遗骨如何处置我也要打听一下”。

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收到他的短信，这些短信只有几句相报平安的话。

直到 1996 年才收到他从资中城关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准备到重庆来投奔我，我敏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恐怕到了流浪不动的时候了，想来重庆找一份工作暂时栖身。

我当即与毛贯益联系，看看他的八桥客车有限公司能不能给老夏安排一个看门的工作，不料，老毛严辞拒绝了。

想他从资中到来后，再作商议。那时我已在璧山投奔李伦所办的海山公司，正同孙庸利用璧山坐椅厂的场地，开办一个制作防弹衣的工厂。

接信后，我立即回了信，答应无论如何我要为他安排一个安渡晚年的事做。

八月份，我在璧山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到了北碚我的家里。我忙从璧山匆匆赶回，到家已是中午时分，进门见他端坐在我的客厅里，穿着一件灰色很旧的中山装。大概因为心情不佳，再加上旅途劳顿，那满脸的皱纹，花白头发已盖满了他的两鬓，比之五年前从重庆离开时苍老多了。

灰色的中山服，又脏又黑，好像有几个月都没洗过似的。脚上套着一双绿帆布的“解放鞋”，那模样与进城打工的乡下农民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一个穷愁潦倒的流浪人。真乃“匆匆又作渝市客，晃然如隔数十秋，乱世今日抚昨日，今日仍在街中乞。”

我本想问他怎么搞得如此狼狈？但我却不知从那个标准和那个状态来问，事实上夏老三从我在孟平店里与他久别重逢后，一直都处在穷愁潦倒的状态中，想来他在 89 年从王正印家离去后，恐怕日子一直过得十分艰辛。

今日中共统治下，过去的五类份子及其后人，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何况像他这种不甘弯腰事权贵的人，半生图圉，几十年折磨，到了晚年仍在漂泊流离。看到他，想到近几年为生活而死在打工路上的王大炳。因不愿低头，苦难伴随着他们的晚年。

见到他们如同对镜照见自己，相比他们的命运，我中年后得到了一个正当的谋生职业，免去了在社会上流浪，近年又蒙李伦不弃，取得了一个小小科长职位，却因天性不苟与浊世同流合污。不但与一些发财的机会失之交臂，还在工厂内部的斗争中提前退席。

退休后，立即进入打工仔的队列，虽平时节俭刻苦，仍无多余积蓄可用来支付穷朋友们的求助，面对着形同乞丐的老夏，平添了我的压力。

好在这些年我认识了一些朋友，解决个把人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当我俩坐定后，我向他问道：“你现在生活来源靠什么？”见我直端端的发问，他很不好意思的向我嗫嚅了一阵说：“离开重庆时，早先有一点积蓄，本想做点中药材生意，却上了别人的当，本钱也被人骗走了。”听他这么一说，便不想追问下去，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来。

他接过钱捏在手里继续说：“来前在资中，往在朋友家，已经身无分文，这次从资中来重庆，火车票还是朋友给买的。一下火车到北碚来，因为没有钱买汽车票，便将自己贴身衣服脱下来，当给汽车售票处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脱下那又脏又旧的中山服，里面居然没有任何衬衣。

他怎么会混成这样子，我不想追问，连忙到厨房里热了热现存的菜饭，同他将就着共进了午餐，按照我原先的安排，下午就立即带他去璧山坐椅厂，请

求孙庸念在我和李伦的交情上，给他安排一个看守大门的工作。

他狼吞虎咽吃着我给他热好的饭菜，一面告诉我他在火车上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面前的他完全像“风雪夜归人”中的老乞丐，所不同的只差一根打狗棍和向人讨饭的破碗了。

吃完饭以后，我在衣柜里给他搜索了一大包我穿过的衣服，从新再添了五十块钱，要他去汽车站把押在那里的衬衣赎回来，一面挂通了壁山坐椅厂孙庸的电话。

这孙庸原是李伦的童稚之交，从小一起在含谷的农村中长大。据李伦介绍，文革时他在壁山公安局供职，因家庭出身，在文革中被划为走资派的黑狗崽，后来在李伦母亲的掩护下，躲过造反派的追捕，免去一场杀身之祸，不得不离开壁山，离井背乡到外地混了几年。

文革结束后，孙庸得到平反回到了壁山县公安局，不久下海，以老家的农舍为基地，开始做一点汽车零件的买卖，办起的公司起名海山公司，李伦任专用汽车厂厂长，他依靠专汽厂而暴发，1994年壁山坐椅厂已成了占地50亩的厂家，并获得四川省私营明星企业和重庆市私营企业十强的桂冠。

我与孙庸从丁家开始接触，是以质量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在质量上扶助他们，从丁家茅舍到壁山坐椅厂的建立，开始时，因为“生存”关系，对直接扶助他的部门极为谦恭，虚心接受客户反映出来的各种质量问题，认真加以改进。

一年后，他对专汽厂的几个大综产品，例如坐椅，侧窗，不仅形成依附关系，而且形成了包销包用的关系，干脆取名为重庆专用汽车制造总厂坐椅厂。而专汽的职工，因为他们售后服务态度好，几乎包揽弥补操作者操作不当所造成的损失，所以总装车间的装配工并没有不满的意见。

孙庸本人原是壁山公安局的警察，他熟谙共产党权钱交易的诀窍，知道除了依附专用汽车厂外，还必须有一个“保镖”，他的小儿子顶了他退休让出来的位置。

为了应付政府各级衙门，孙氏父子承包了壁山街上最豪华的酒店，壁山市政府官员和公安局的刑警是他酒店的常客。

后来，孙庸从相隔不远的某机械厂私下用重金挖来技术骨干，并购置了一条生产摩托发动机的生产线，以最快的速度在坐椅厂地盘中心，建立了一条年生产能力千万台的摩托车发动机装配生产线。

开始半年果然获利颇丰，孙氏父子，便将利润很薄的坐椅换成生产摩托发动机。殊不知这一次独立运作的结果，却没有逃掉商品的经济规律，重庆摩托车发动机一哄而上，产品很快出现过剩危机。上千万流动资金被卡住，整个工厂无法继续运转，生产线停止了运转。

而这时，无锡常州一带更为狡诈的商人，探听到发动机处于滞销的海山公司，便从江苏专程到重庆壁山与孙庸商定，以赊销的办法，将这些滞销货运往沿海，答应一定在装配后，将这些赊销的货款如数返回。殊不知这些发动机有去无回，运出去一年了，赊销的货款却连个影都没有看到。

在短短一年多的发动机热中吃了这个大亏，使孙庸明白他那点功夫，只有依附一个主厂，保证他的产品销路，才能存活。他没有掌握一支为他提供适销

对路产品和营销班子，唯一手段就是贿赂国有企业的头。李伦下台后，窃取了专汽厂领导班子的陈增，向他伸出了‘双赢’之手。

中共“改革派”想用经济建设的成就，使自己迅速成为有产者，尤其想证明一党执政比多党制优越，为继承独裁衣钵辩护。然而，失去竞争所带来的粗制滥造，失去监督所带来的腐败却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贫富分化使社会秩序日益混乱，抢劫银行、抢劫珠宝店的事频频发生，老百姓几乎家家有防盗门。

防弹衣及防弹车应运而生。

1996年重庆市把各银行配置的防弹车生产权交给了专用汽车厂，双方进行了‘协商’，孙庸以丰厚的回报，从陈增手上接过了防弹车的生产权。

老夏大约就是在壁山坐椅厂陷入困境，孙庸刚刚与陈增搭上关系时，来到了这家工厂。根据我的估计，看在与孙氏几年的老交情上，由壁山坐椅厂接纳一个夏光然应当不成问题。

我从家里打电话到壁山坐椅厂时，电话的那一端传来了老孙大儿子的声音，说他老子去浙江讨债去了，虽然他没有拒绝我的请求，但听得出态度非常勉强。他向我诉说了一大堆的苦衷。

听他的回答，让老夏一个人去恐怕要碰软钉子，所以决定亲自陪他去一下。下午三点钟便与他一起乘公共汽车去了壁山坐椅厂。

我在总经理室里终于碰到了孙露，彼此寒暄后，我向他介绍了夏光然，着重地向他介绍老夏的能力和现状。孙露皱着眉头，重复着在电话里已经说的话：“工人已大幅裁员。”

讲了好半天，最后孙露表态说，只有将原先守门的人数再压缩一个，让老夏暂时充任。老夏就这样勉强地留了下来，工资没有定。

那时，李伦的海山公司正在规划防弹衣的生产线。我在陈家坪为防弹衣生产线绘制流程图。

几天后，我又专程从陈家坪到壁山探望他，看他住在其它看门人一道，问他孙老板给他每月多少工资时，老夏苦笑着沉默不语。在我追问下，他摇头说：

“谁叫我无一技之长，又在这种垂老时寄人篱下？我的处境在别人眼里如乞丐并无两样，能够有一碗饭吃，夜容一宿，我没理由向东家再讲待遇。再说你也不容易，孙氏父子已不像从前那样为产品过关而讨好你，你也在人家的管束下拿点打工钱。”

最后他才告诉我，孙庸每个月只给了他两百元，除了节省着吃饭就一文不剩了。听到这个情况，我立马想找孙露去论理，因为我知道，重庆市门卫的待遇一般都在五百元一个月，怎么会给老夏这样少的工钱？

我刚刚站起身来，就被他拉住说道：“孙露是晚辈，你找他有失你的身份，再说我来时，他把话说明了，他这里不需要人，换句话说，我是从别人碗里分饭吃，何况我才刚来，试用期也是三个月，等到以后你找他父亲平心静气商量这件事也不迟。”

我又问道，你们除了看门还包含那些附带工作？他说：“看门的人已经少到三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半兼职的饮事员，所以我们的值班时间，每天已增加到

十二小时，除负责对进出员工登记，收发公司来往信件，还要负责厂区前的清洁卫生打扫，登记员工的迟到早退，督促工人们按时上下班。”

壁山坐椅厂开办初期的雇佣者，都是孙庸老家的子弟，开始他们为摆脱农活，甩掉农民帽子感到新鲜，不久他们被烦重的（有时是没日没夜的）生产任务，和不小心报废产品扣除工资的惩罚，使他们对孙老板感到憎恶。他们在背地里咒骂他比《半夜鸡叫》里的周剥皮还要周剥皮。

工人们把工厂的工具，原材料、半成品，趁下班时夹带出工厂大门，千方百计买通门卫，偷拿之风盛行。甚至发展到深夜用汽车，把整车的铝材、窗框、汽车座椅偷出门去，日子一久，被孙老板发现，除了增派狼狗夜巡，并毅然地撤换了“门岗”，将最亲信的外侄和娘舅充任这些岗位。

身为中共党员的孙老板，其剥削手段一点不比资本家差。

恰恰好在夏老三当门卫的这段日子里，1997年初，在壁山坐椅厂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由七八个人组成的“索债队”，气势汹汹的撞进工厂大门。他们不听老夏的制止，径直穿过庭院，直端端的向办公室大楼撞去。

在两个戴大盖帽，身着蓝色制服的‘执法’人员带领下，撞上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孙庸办公室外的财务和管理人员阻拦不住，两个“警察”亮出了自己的工作证，证明他们是壁山县工商局的执法警察。

来人口称，县工商行政管理所，收到了二十几家工厂的状告信，说壁山坐椅厂长期拖欠他们的摩托车零件款，现在已是年关在即，所以特别来查对这个事实。

索债队伍中有两个女人，在楼下尖声的吼道：“今天你们不还钱，我们就要把你们的摩托发动机搬走”。那时孙庸还在浙江催款没有回来。

手头没有钱又想发财的小业主们，常常凭着一时产品的适销热，一哄而上，在产品热销推动下，小业主窜合一起，将自己的零件材料盲目投入一个组装厂，开始时哥们相称，大碗的酒喝出了最初的‘兄弟’关系。

但是好景不长，积压发动机欠下配件款，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见现象马上出现了。一半因需求严重跟不上生产，一半因一时脱销而粗制滥造，产品滞销加质量低劣产生了小业主间的欺诈和斗殴，很必然发生眼前这一幕了！

现在两个自称县的工商民警，在经理室门外乱吼了一阵，却不见里面的动静，其中一个一面狂喊：“孙庸你给我出来！”一面在阳台上拾起一块砖头向总经理室玻璃隔窗上猛砸过去，只听见哗啦一声，足有8毫米厚的毛玻窗就像惊雷一样被砸开一个大洞，碎玻璃落得经理室门前一地都是。

在里面躲着的孙大少爷，马上陪着笑脸走了出来。为了平息对方的怨气，他连忙从裤包里摸出一包“红塔山”来，连声陪着小心说道：“诸位有话好说，消消气”，一面吩咐在过道上办公的办事人员快给客人倒茶。

然而两个大盖帽将自己的公文皮包朝孙露办公桌上一甩，打开包，从中间拿出一大叠欠条。原先在楼下喊叫的女人，见两个警察在楼上攻破了办公室，便连骂带恐吓的撵上楼来，随行的其它人挽袖擦掌，口口声声喊道：“我们厂反正活不下去了，今天不拿钱来就砸了这家工厂。”

那用砖头敲碎大门玻璃的大盖帽，将手中的“警棍”交给了一起来的年青

人，年青人会意，立刻挥动警棍将办公室其它几扇窗子一扇扇敲碎，一时办公楼乱成一团。

孙露被来势凶猛的讨债人吓昏了头，呆呆坐着，连大气都不敢出。他明白，今天这种场合，自己有一句失言，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正当办公大楼里闹得乌烟瘴气，孙露束手无策时，突然楼下坝子中一声大喊，只见此时的老夏戴着门岗执勤的红袖套，手里拿着一根一公尺长的铁棍，另一手叉腰、怒目圆睁的大喝道：“那里来的，敢在这里撒野？这是工厂重地，那个敢在大白天撞到这里来闹？”

楼上的肇事者，被楼下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震住，一起停下了手，把脸转向楼下老夏站在地方，等到看清楚吼声正是看门的老头发出的，为首的大盖帽推了一下帽沿，轻蔑地回敬道：“你一个小小看门的敢来干扰老子执法，小心弟兄们一个给你一拳，就要叫你扒在地下起不来！”

几个正在兴头上的年轻人立即在楼上向他挥动着拳头。

殊不知老夏冷笑一声，毫无惧色，接口道：“你那戴大盖帽的人听着，你这一套只能诈骗那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你们一进门我就看出你们是一群雇来的二流子，我已经打电话问过壁山工商所了，他们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派人来要债。

现在，你们别在这里装腔作势的哄人了，我已经把你们来这里捣乱的事报了警，一会警察马上就到，你们这些冒充工商的人一个都脱不到手，我奉劝你们还是趁早滚出去，否则你们就要倒霉的。”

他一面厉声的警告，一面还走到铁门前伸手把门关上，做出一付关门打狗的架势。老夏的出现不仅使那些大喊大砸的人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大家都一齐把脸扭过去，朝着从县城马路上驶来的汽车张望。

办公室前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大盖帽，一下收了刚才的架势，为首那个大盖帽下意识的把头上戴的帽子摘下来提在手上，接着用手向他带来的人马一招，所有的肇事者便跟在他的后面，一面小声骂着，一面向楼下“撤退”。

只有那两个女人还拉长了嗓门，但已不像刚才那泼妇骂街的架势，而是带着哭声嚎叫道：“老娘已经快一年没有领到工钱了，本来老板答应我这次摧债如果有钱了，就首先补给我们的工资，砍脑壳的孙庸你教我们怎么活下去哟？”一面还是跟着讨债队的后面，向着楼下“撤离”了。

走到工厂的那两扇大铁门口，一脸晦气的大盖帽，指着孙露吼道：“我还要来找你的，等着吧！”当他丧气的跨出大门时，他又歪着头狠狠的瞪了这看门的老头一眼。恰恰好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

这支队伍不敢怠慢，一齐跨出厂门径直向路边的一辆过路的中巴车奔去，叫停了那车，蜂拥爬上了中巴车，一溜烟的跑掉了。

院子里沸腾起来，年轻的本厂子弟，把夏光然簇拥着。他们对这个老头已有了敬意，今天亲眼看见，老夏在凶恶的催债人面前不慌不忙解围的风采。孙露正准备打开保险柜，取出最后一点钱来退敌，却没想到这些人被老夏退去，他对这个平日不大开腔的老头刮目相看了。

这时，老夏才向包围他的工人们吐露了真情，他根本就没有报警，也没有打电话去县工商所，他这样的吓唬来人，是从这支讨债队，自己语言上出现了

矛盾，暴露出肇事人是厂家雇佣来的打手，当老夏道破他们是冒充县工商局的，使他们感到心虚。那有不预先通知工商局就直撞工厂的？

这种以讹对讹，本是从中共常用的惯伎学来的。

想当年，林扯高抓到一纸“火炬”刊物，想讹诈出一个惊天的反革命集团大案，趁此机会，将他们十几年最棘手的六队人物一网打尽，赶尽杀绝。在险恶情势下，面对气势凶凶的刽子手，不被对方设置的坦白从宽陷阱所迷惑，变被动为主动，反而质问何庆云的证据。接连几天笼罩六队的恐怖气氛被击破，创下了以往一经被抓住把柄，只有挨斗、挨整的被动局面，转危为安。

这也许就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道理。老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述，而今能用的人已经不多，这是坐椅厂的工人，无法理解的，也是孙庸和他的儿子所不知道的。

自从这次风波后，孙老板觉察到靠上层的“权”和手中的“钱”是不够的。他开始对这个过去两个多月来从没正眼看过的，衣着破旧，沉默寡言的守门人刮目相看了。

原来孙庸的轿车出入厂门，从不停一下，更谈不上对守门人招呼一声。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从浙江回来后第二天，轿车进厂门时，破天荒停下来，跨出车门主动向夏光然握手，并从车厢后备箱里取出从浙江带来的水果。询问工作所遇到的困难。他知道老夏常犯胃病，专门给他带来了胃药。

不过老夏并不愿改变他一贯的不卑不亢态度，从此，每当白色的桑塔那经过工厂大门时，不论孙老板是忧是喜，老夏只礼节性点点头。

而他同工厂里的工人们，相处得就不同了，大家一直尊他为夏老师。他同打工者相处得很融洽，晚上他的门房里总是聚着一大群小伙子，有说有笑的谈古论今，倒也冲淡了他的孤独，使他并不感到凄凉和贫苦。！

然而他的病情却一天天恶化了，先是吃饭老是感到喉里不畅，渐渐出现呕吐。1998年4月，他已不能正常吃饭，小伙子们替他在厨房里熬粥，热中药。他变得十分消瘦。然而他却忍着病痛，不露声色照常值班，守门，打扫清洁。

那时，我正按李伦的布置，加紧准备防弹服的鉴定工作，听说老夏病体越笃，便在5月份专程赶来特地探望他，在他的寝室里他躺在床上，形如骷髅。无力的说：“我已不能进食，现在连喝下一点鸡蛋花也要兜肚的吐出。”

我真想不到半个月没有看到他，竟变成了这样，忙询问他到医院看了么？他说，孙庸亲自用车送他到县医院去作了胃镜，只说是胃炎，开了许多中药。

我看他床边摆满了大包小包的药，告诉他防弹衣厂审核一旦通过了，我就立刻把他安排到我那里，做一点编制计划方面的管理工作，也用不着值夜班。这样，生活上有条理，我们就可以相互照应了，对他的病会有所帮助。

这一夜他才把隐藏在心中的家事，告诉了我——

他一共五兄弟，他排行第三，夏老三便是他的小名。金牛镇本是他的老家，兄弟中三人都是当地的农民，最小的弟弟十五岁，便考入了成都军校，毕业后入伍，参加了共产党。而夏光然，1962年在一群中学生中组织了金牛镇人民党，不久被中共破获，以组织反革命集团将他下狱。

当年老么出于仕途原因，登报断绝了与老三的亲兄弟关系……二十年后，

他从盐源回到金牛镇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五弟的耳中，这时候这位五弟已是成都军区的一个大校军官。不知这位五弟良心发现，还是骨肉亲情，看到自己的三哥，流落街头替人代笔书信维持生活，便派人把他带到军区大院。

向他表示不要再在街上流浪，答应他在军区大院随便干点事，以渡晚年。老夏心中明白五兄弟找他来，是对当年他的不认亲哥表示忏悔。必竟眼下在金牛镇只剩下他们两兄弟了。

对中共早已认清的夏光然，怀着复杂的心态，不久只身离开了成都，他说：“天地有正气，人活就为这一口气。拨出去的水难以收回，他不愿一个曾公开宣布将他赶出家门的亲弟弟，今天再招他寄住他的篱下。从那以后，十几年过去了，成渝沿线布着他流浪的足迹。

一种无牵无挂交织着流浪者共有的失落感，伴随着他亲身体验监狱外整个社会底层的酸楚，饿一顿饱一顿，晚上经常在车站码头露宿过夜。

据他口述，1979年他因刑期刚满，调到农四队，1982年在盐源农场为张锡锬和刘顺森作戏剧性平反会上，他当场责问邓扬光：“人都被你们杀害了，现在凭你们一张空头平反书有什么意义”？

刑满后，他仍保持着“火炬”成员的本色，继续反抗中共对留场人员的压迫，负责管理他们的敖麻子说他反革命本性丝毫没有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将他“释放”，离开盐源农场，回到了他的金牛镇老家。

返回金牛镇后，他在场口摆了一个替人代写家信和讼状之类的小书桌，晚上又在附近茶馆里为喝茶人讲评书，得点茶水钱，维持着清苦的生活。

1963年，他入狱后，怀着遗腹的妻子，被所在生产队长强娶，并逼她堕胎，遭到她拼死反抗，总算把怀胎八个月的孩子生了下来。

老夏回到金牛镇时，他的儿子已满二十岁，儿子面对着这个站在面前的“陌生人”心情极为复杂，要认吧，想起幼时被人欺凌时，这个本该保护他的人到哪里去了？不认吧……

回到金牛镇，房子早已归他人占有，妻子也成了他人妇，看着站在跟前儿子眼里的尴尬眼光，知趣的老夏悄悄的离开了他们，用发给他的安家费在昔日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盖了一个干打垒的土房子，聊作栖身之榻，不久便同路经成都的盐源同难结伴，一起流浪到重庆。

他用平淡的口气讲述着他的经历，他的处境很像狄更斯笔下的奥立弗，只是他并不是济贫院里长大的孤儿，而是经过中共十几年监狱锤炼出来的火炬战士，同他们认钱不认人，奉行大鱼吃小鱼作风完全不同，他靠自己的正义感和正直，影响周围的人，虽然他常遭人算计，弄得往往连饭都没得吃的地步。

他讲完了这段从未向任何人讲述的隐情后，显得非常疲倦，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得的病我最清楚，如果真的得了不治之症，那么我想，我最后投靠五弟的时间也许到了，我预计要治好我的病，需要大量的金钱，在这个时候我再不花他的钱给我治病，就未免太傻了。”！

认定终身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那么他宁可流浪飘泊也不会去讨权贵的恩赐。中国自古就流传着叔牙、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下的故事，我们这个年代中，像陈力，张锡锬这种宁死不屈的中华精英，**真值得我们的后代大树特树，否则**

怎么说中华魂犹存？！

那天晚上，我俩相聚在我房间，夜半我还给他做了一碗鸡蛋汤，大概因为我在他身边，使他感到宽慰，喝下了没有呕吐，平静的睡去。我却没有睡意，突然感到我同他可能是最后一夜相聚了。

直到五点钟与李伦约好，今天是防弹服鉴定会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匆匆的起床，在离开这位难友时，我一再叮嘱他，现在他的病情未知，身体已十分虚弱，一个人回成都，我绝不放心。必须有人护送，所以请他无论如何等我两天，在我开完鉴定会以后，由我专程护送他回成都。

两天以后，当我回到壁山坐椅厂时，门岗上却不见了他。我连忙去他的宿舍里找他，正碰上与他同值夜班的老吴。他告诉我说：“你走的第二天，老夏开始大口吐血。昨天晚上，他告诉我不能再等你了，再不走恐怕真走不回成都了，我再三劝他再等一天，等到老孔回来，他也没有听，临走时嘱托我，把你给他过冬的衣服归还给你。”

听他这么一说，我马上问道：“有人陪他一起走吗？”老吴回答道：“他临走时说是去丁家找小王，是不是请小王送他一下，我就知道了。他刚走才半天，现在要去小王家，兴许他还在那里？”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字条，我接过那张字条时手在颤抖。

令平如晤：我不能再等你了，这次给你增添麻烦了。我这次打工教训太大，真实了解基层打工仔的艰辛。我的性格决定我不向新贵们卖笑，同时，我的病情又发，不得不走。等你四天你还未来，我只好离去。我决定到成都医病，**如能康复，九月二十七日一定再到盐源凭吊死难的友人**。然后叫我在共产党的显贵“弟弟”供我晚年，（他是求之不得的事，我还要慎重考虑再作决定）。今后可能经常见面畅谈今生事，或写点小东西，握手。

友：光然 1997年6月7日

读罢，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心中喊道：“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好人老是没有出头的日子？敢于反抗暴政的人老是被人整得无路可走？”

“九月二十七日，正是“火炬”最后一位烈士刘顺森牺牲于中共屠刀下二十一周年的忌日，病笃流浪的夏光然仍念念不忘，其忠已表，只是大陆上何年何月有这些英烈的纪念碑，使他们的英魂为更多的民主事业后继者所纪念？”

来不及多想，把信折好存放，向老吴说：“你能不能带我去丁家找小王，兴许他还没有走。”老吴为难的说：“你知道，孙老板的规矩门卫值班是不准换班的。”

我只好到车间去问几个家在丁家的人。找到以后，在厂门口登上一辆去青杠的客车，等我们匆忙赶到小王的家找到小王时问他，他却说：“老夏一直没有来过。”我心中一阵紧张，这个老夏，这个在监狱里经历过多少磨难，好不容易活到今天的硬汉子，此时究竟在那儿呢？我迷惘的望着通向青杠的马路自问。

难道他自己独自上了去成都的高速公路，我们上那儿去找他？

我和带路人只好返回坐椅厂。回到宿舍，老吴将他临走时，嘱咐转交的一包棉衣提出来交还给我，那是我为他准备过冬的东西，现在人去物留，看着它我此刻挂欠他能平安到成都吗？他能康复吗？

唉！这些年来，从毛泽东地狱里熬出来的挚友们先后离我而去了，王大炳、

潘朝元、现在难道轮到夏光然了吗？这些相逢时可以倾吐内心的至交血友，今天还剩下了几个？邓自新，邓小祝、陈孝虞、王文典这些人如今生死不明，不知漂泊到何方了？

每想到这里，便将他留给我的那张字条拿出来读了又读，不愿相信他就这样走了，难道这一张质朴的留言，真的是留给我的诀别书？人生何其短暂，算起来，他不过比我大五岁啊！今年才六十多岁呀？

从那以后，大约三年的时光，我都在盼望邮递员会突然送来告知他下落的信件，甚至希望突然有一天他会来信约我同去盐源祭拜已牺牲的难友。

1999年，我专门写信到如今还滞留在盐源农场的朱凌飞，王文典，告诉他们夏光然在我这里离去的经过，并告诉他们老夏若康复他要重祭先烈的宿愿。并请他们注意一有老夏回盐源的信息立即通知我。

然而一年一年过去了，夏光然从此再没有给我来过一封信。成都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老夏没有去过成都，盐源就更是杳无音信了。

倒是每年我却在做着梦——在盐源二月的沙尘暴中，我看到了令我伤心的二道沟，在风砂弥漫的五号梁子上，在那些埋葬这些烈士们的乱石堆中，夏光然正在向那些熟悉的坟茔鞠躬，一遍又一遍！！

原先的“火炬”成员一个个离去了，我越来越感到，揭露中共监狱黑暗的任务，在我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

第六节：散落在市井里的盐源难友

1985年，我还住文星湾的危房时，有一天中午下班回来，邻居刘大爷告诉我“你早上上班后不久，就有两个与你年龄相当的中年人来找过你，我告诉他们，你在农用汽车制造厂上班。他们立即留下了一张字条要我转交给你。”

我接过那张字条一看，那上面写着：“令平兄，别来无恙，听说你回重庆后，现在在农用汽车制造厂工作，今天特别的专程从市中区来到这里拜访你。不巧，你不在家，我们又不好去厂里惊动你们的门卫，加上还有其它事要办，所以我们就没等你回家，特留下我的地址，希望你能抽空到重庆一聚”

字条落名孟平，地址是市中区五一路某街100号。

在蔡家场听到从盐源返回的何福安讲过，张锡锬和刘顺森后来得到“平反”。同刘顺森一起，当年以“反革命越狱”逃跑集团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孟平和杨汉群，也从南充监狱中获释，孟平回到重庆后便在大阳沟一带居住。只是不知道他住的详细地址，也不知道他谋生的职业是什么？

孟平比我小十岁，据他本人讲，被捕前是西南铝加工厂的一名工人，因派系武斗而被捕，人很机灵，今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并找上门来必定有事。我本来就想弄清楚刘顺森当年逃到重庆的经过，也想知道孟平等人的平反过程，了解他们从南充监狱放出来的伙计们下落和生活情况。

当时决定下个礼拜，到市中区按字条提供的地址，会见这位当年小兄弟。

我按字条上提供的地址找到那里时，已接近中午，而门却锁着，据隔壁的邻人讲，他平时一大早就出去了，白天很不容易找到他本人，只有在晚上十点

钟左右他才回家。我从门缝里向里张望，只见室内堆放零乱，也没什么家具。

问他的邻居，那人说，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房子是租来的，如果你要找他，可到大阳沟菜市场去找，他弟弟在那里开一家火锅馆，门面叫“兄弟火锅馆。”

到中午，我才找到了那里。火锅馆正在营业，生意不错，但是除了他的弟媳妇在那里张罗，孟平却没有在。问到老板娘她说：“他去买火锅料了，你等一下吧。”

十分钟后，只见他提着一个篮子，身后跟的人竟是夏光然。自盐源一别整整七年没有相见，看他的穿着打扮已与当年完全不同。见面后，最先问孟平，盐源宣判后，什么时候改判的？现在各在那里谋生？

夏光然穿着中山服，还是那个老样子，他告诉我说：“我成了无业游民，至今落魄江湖，四海为家，前年我到了重庆，一直住在王正印家里，帮他在朝天门的水果市场贩运水果。”

“我打听了你好久，都没有弄清你在那里，后来，还是在王明丰那里问到你在北碚。最近，我和孟平合开一个五金商店，做些买卖标准件的生意，上周我和孟平到北碚联系一批业务，问到你的住址就去了文星湾……”

从老夏介绍中，我已听出，他出狱后，四处流浪，为求生活和孟平在市井相遇聚在一起。我指了指火锅店，向孟平问道：“这店的生意不错，想来你发了”孟平淡然一笑回答说：

“这是我弟弟和弟媳妇的根据地，我们只是暂时在这里歇个脚。从监狱出来以后，我在南充监狱结交的那帮朋友缠上了我，前些日子又在江北碰上了蒋真富，他从盐源回来后，回到他以前的铁作社，铁作社现在改行生产螺丝螺帽。我们商量从他那里拿来的标准件，摆到大阳沟租的一个五金门市中来卖，大家都想弄口饭吃，权且以此谋生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对他们的近况已明白几分。问到他们，这么多年来是否安了家，老夏苦笑道：“四海为家，我们这种处境，谁看得起我们？”

我们在火锅店吃过午饭，便由夏光然陪着我到了他们开的五金门市，在大阳沟的偏僻弄堂里，我们找到了他们合伙的五金店。

那是一幢居民住宅楼的底楼用作出租门面，门面大约五米宽，纵深不到两米，摆在玻璃厨柜里，全是些普通的联接零件和一些扳手之类的小工具。里面坐着一个小伙子，正伏在厨柜的玻璃台面上打瞌睡，看来生意相当清淡。

我们穿过门市旁边很窄的巷道，进去后，便是一个通向地下室的石梯坎。走下石梯坎进入地下室。过道里漆黑一团，拐过弯，才看见从地下室射出来的灯光，进去是两间套房，昏暗的灯光中弥漫出劣质香烟的呛人气息。

外面那间房间里摆着两张麻将桌，大约五六个青年男女正围着一张桌上玩着麻将。见有人进来一齐把脸扭向我们。

用不着介绍，我已经猜出这些人是孟平在南充监狱里结交的朋友，他们的年龄差不多都在三十岁上下，从那穿着看，男的全是新潮的牛仔衣裤，女的袒胸露肩，披着没有钮扣的连衣裙，脚上拖着拖鞋，口里叼着香烟，头发蓬乱，好像才起床的模样。

从他们的外形上判断，这是些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里，所描写的社会

底层人物。用我理性的眼光认识他们，这是些随时都同看守所打交道的社会弃儿，是一群被生活遗弃的社会另类。

跟着老夏向里面的房间走去，那里面摆着三张床，一股低档香水夹着霉气迎面扑来，那床上乱扔着肮脏的被褥，以及乱堆在一起的衣裤，地上丢着满地的烟头。证明这些男女们过着群居的流浪汉生活。

看到他们的生活现状后，我马上会想到，为了求生存，他们极有可能就会在今晚的某次行窃中，被当成嫌疑人抓进看守所，他们从小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力，不知什么时候成了社会弃儿，没人关心过他们的苦难和内心痛楚。

其实我在盐源渡过的十六年时间，早了解他们了，他们是些从市井和农村流落出来，生活失去来源的人。他们被抓起来，又被监狱放出来，正常人谋生的路在他们脚下已经断绝，只好落到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田地。

中共不但对知识份子造下了罪孽，尤其对劳苦大众，造下了比历代王朝更深更广的罪孽。

下午留下夏光然与我单独相处的时间，他向我讲了他目前的生活，特别讲到在与孟平合伙做机械零件生意过程，他说“不久前，孟平背着我将价值三万元的零件，私自拉了一车到成都出卖。突然说雇佣的包运车是黑车，车在运送过程中失踪，这件事发生得太蹊跷，那是大家好不容易凑起来的本钱。

车是孟平雇的，想不到这小子给我玩黑吃黑的把戏，现在底金抽空了，生意也做不起来了，所有的人就只好在这里鬼混了。”

我听了他的话心中禁不住一阵惊异，孟平的底细我并不清楚，当年在六队物色越狱的人也是刘顺森亲自定的，我和他的交往并不深。那一次三个人从六队出逃。究竟怎么栽在重庆，我也不清楚，但获刑的人中除刘顺森饮弹刑场，其余两人都判了无期徒刑。

论人品他纵然变得再坏，也不可能拿大家凑的钱做出这种缺德事，就是黑社会里也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否则怎么在江湖上混？

沉默好半天，我忧虑的问他：“你同孟平推心置腹的交谈过了吗？我想现在社会极混乱，运输车发生这种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当然也不排斥你讲的黑吃黑的可能，眼前我觉得你总要想找一个正当的谋生职业，不能老在社会上混。”

为了规劝他，我介绍了潘老的为人和晚节，他晚年只是帮人站柜台，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过他的晚年。像老夏这种经历比潘老惊险的人，更要保持一个政治犯的本色。我建议他最好找一个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的职业，千万不可在当前的困境中消沉堕落。

1987年我在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水果市场上，碰到了王正印，在王正印家里再次与夏光然相见，当天晚上在王正印家留宿一夜。

这一次有比较宽裕的时间向他们较详细了解。

老夏刑满释放后，便同赖开明，张映国等一起做收购黄连生意，据他说受商贩骗，赖开明被人暗害，生意也散了伙，便跟王正印来朝天门做水果生意。

同孟平交谈到过去农六队可歌可泣的斗争往事时，他的评价是，“我们当年在做蠢事。”他对中共有一种特殊的看法，他认为同中共讲真理是可笑的，更不主张同他们正面的硬拼。

他说：“真理在共产党眼里，只有大傻瓜才会孜孜不倦追求，只有愚弄人的时候才会讲‘牺牲是伟大的’。”

他断言人是自私的，他说：“与其抨击当局，触恼他们，还不如去做破坏这个社会的事。例如不惜手段贿赂当权的，通过他们捞回大把钞票，或者把毒品贩到这个国度来，或从事走私，总之‘生意’做得越大才算好汉！”

1992年，孟平两次到北碚来找我。第一次拿了一个摔坏的轿车面罩，叫我找人给他焊补一下，他说他最近已经在作进口车的走私生意，自己也有了一辆本田车。我告诉他日本车的面罩，不能用普通焊补，只有另外下材料仿制一个，价格要五百元，他没有思考的一口答应了。

那一次，我虽然没有问他的生意是怎么做的，也没有问他现在有多少钱，但我根据中国人还很少有私车年代，他就拥有了轿车，一定在按自己的计划，在做很大的生意，大把捞钞票，一步步跻身于“中产”行列了。

第二次他拿了一大卷英文资料，我看是一部全自动洗衣机的图纸和清单，于是我好奇的问他：“你怎么又在做走私车，又在做洗衣机？”

他说：“重庆洗衣机厂生产的洗衣机是我从国外搞来的，我已经买断了它的专利，现在我已查明，这个厂未经我的同意，大批仿造这个产品，所以我将向重庆市经济法庭，按盗用专利的名义起诉该厂，并要求索赔。现在请你找一个懂英文专业的翻译，把这些图纸和说明书翻译出来。”

听他说的我已猜出，他已混迹进出口商贸场，并在外贸上初露头角了。

我为难的说：“英语我完全还给老师了，要请人翻译，我不懂这方面的行情，不知道你能出多少钱完成这套资料的翻译报酬？”

他说：“我也是一个外行，所以特来请你帮忙，你们厂的技术室里从重大毕业的年轻人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个？”三天以后，我回答他请人翻译全套大约要三千元，只是他们需要的时间要三个月。他听后说钱不贵，只是打官司的时间恐怕不允许延续那么长，我只好另找他人了！于是他收回了他的图纸。

那时，我家还没有安电话，他已使用“大哥大”了。

1994年夏天我在沙坪坝参加一个质量体系培训班，在培训的地方他找到了我，他开的是一个新的凌志车，车上还带了一个很年轻的女秘书，他本人不但西装革履，带着一付太阳镜，很像近代派被尊为大腕的人物。

1996年，我已辞去了我的工职，在璧山的四亨公司“打工”，这一天晚上大约已经八点钟了，我正在青杠车站旁的马路边，碰巧他驾驶的凌志车顺着高速公路刚从成都返回重庆，在高速公路青杠出口站把车停下来，向我打招呼，他的坐旁坐着他的小秘。

这次邂逅，他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这两年他已在进口车生意中站隐了脚跟。他以商人身份，在重庆和成都拥有两个规模可观的销售门市，专门在西南边境同东南亚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做“进出口生意”。

说罢他还从皮包里亮出泰国和越南的护照，和一张出入边境的特许通行证，上面盖有四川省公安厅的大印。

他说他已经取得了泰国的国籍，我明白，他是瞄准了这些年进口汽车的热门，靠走私小轿车发起来了，手里有的是钱。

我问他兄弟现在在干什么？他说现在在重庆宾馆担任业务经理。

重庆宾馆是重庆市政府对外接待的窗口，也是重庆官员们的小金库之一。这里有来自各方的“黑道”“白道”人物与市政府搭线联络，干着各种‘秘密’勾当。能担任这里的业务经理不是一般的市民可以揽到，看来孟平兄弟今天是混迹在中共权力富有阶层之中了。

按此推断他们的家庭和出身，当与中共某当权者有很深的联系，或者说他的父辈有当今中共的掌权人物。但是我问到孟平有关与当今中共权力者的亲缘关系时，他从来不作回答，只说自己原来是西南铝加工厂的工人。

不过当与他交换对毛泽东独裁政权的看法，他毫不掩盖他对这个杀人魔王的切齿愤恨，透露他与中共内的某种倾轧有关。

1971年他入狱不久，便到了六队，与刘顺森交为挚友，1975年刘顺森组织向重庆地区的逃亡中，首选的成员便是他，其中他那机灵过人，以及对重庆地区文革状况的熟悉，是刘顺森选择他的主要理由。但是我除知道他的兄弟外，对他的家庭背景一直没有弄清楚，这也许就是他的狡诈之处。

那天晚上，我们在青杠镇街边的一家馆子里吃过晚饭后，便在四亨公司的花园里交谈得很久，他说他在出狱后经过认真的反思，对张锡镔刘顺森的人品推崇备至，替他们的遇难深深惋惜，但认为当时刘顺森的逃亡是件蠢事。

讲到他对当前政局的看法，他说：“我对政治已经失去了兴趣，就是感兴趣也没用，今天的老百姓那一个不是为赚钱谋生活而奔忙？那一个不是对中共既抱着一腔怨怒，但不会走上大街散发反对邓小平的传单！

我现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赚钱！赚政府的钱，赚共产党的钱我决不半点手软，因为共产党内有的是贪官，像我现在干的买卖，首先就是逃关税，巧妙利用这些贪官为我批条子做护身。我现在就是要捞大笔钱来补偿我十年的牢狱之灾！”

好明确的主张，好熟悉的手段，这同那些被文革打成走资派的黑崽子们，到了今天父母官复原职，以后被称为“太子党”的人们，冒出来的肺腑之言，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他算是挤进了中国新生的富有阶层了，凭着他的机灵他会混得很惬意。

深夜十二点钟，他才起身告辞，他的“女秘书”一直呆在车里没有出来，我说夜深了就在四亨公司住一晚上吧，他说已与他的几个伙计约好，今晚回重庆宾馆住，我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反问：“人为什么要结婚找约束呢？结了婚，行动要受限制，要是再拖上一个孩子，简直就是受罪，像我现在这样无拘无束不是很好吗？”

看来他在家庭问题上也是时髦的现代派，同居的双方都不受道德和责任的约束，这是不是新的家庭观念，我不知道。

当我讲起王大炳子女的困难，以及其它挣扎在贫穷线上的人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资助，把自己用不完的钱做些慈善事业可是一件积德的事。他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意，可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这种好事。

不久当潘老去世时，我打电话通知他，一同去参加潘老的追吊会时，他却没有应诺前往，这令我感觉到他与我们当年狱中同生死的人相隔甚远，没有必要同他保持联系了。

至于我所知道的从盐源农场获释的几十名人员中，除了几位获平反回到机关企业的人员，如张忠信，王明丰、王平依靠工资而过活外，邓自新回了西南毛纺厂，陈孝虞身体很不好，曾带信到蔡家场寻找过我，至于陈蓉康因家被拆迁，当时缺电话，随后便失去了联系。朱凌飞、王文典还留在农场的老残队。

1991年当我出差成都专门寻找解放中路张锡锬的家，准备第二次探访他的大哥，但那里已从新拆修，原来的1268号早已消失，因不知电话号码同他大哥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现在何方？

刑满释放人员绝大多数处于市井最底层为生活而挣扎，如像我第一次在上清寺的那个地下室里看到的那样。也有些实业小成的人。例如唐元澄，从事一个涂料小作坊，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挣扎渡日。

散落在菜市场从事开面馆的危君福，王正印，中共给了他们一点可以求生存的条件，他们年纪都已六七十岁，再没有精力过多去想其它的门道，并以他们亲身经历诉说中共当年“改造人”的真相。尤其见证当年高举火炬，英勇抗暴人们的事迹。

第十二章：前途

在毛泽东对中华社会大破坏以后，中共的腐败酝酿着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除所涉公职贪污、贿赂成风、官霸民宅、抄家窃财、冤狱横生、烟毒无忌、道德沦丧外，还要将我从日常生中所见到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乞丐娼妓、市井欺诈记载在下面，看看这个以‘解放人类’为宗旨建立的社会究竟怎么样了？也从中看到社会的未来。

第一节：市井公害

六十年中共统治的实践证明，中华民族损失最惨的是道德的败坏，毛泽东时代讲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的真情友爱被无情斗争代替，今天中国人又被金钱利益毒害，街上受伤的老人没人去扶救，乞丐玩着花样骗人怜悯，投机商用低劣假货骗人，大米蔬菜肉蛋牛奶无不含危害人体的毒素充斥市井。

社会道德已沦丧到这种粉碎性程度，令人对中华安危感到忧虑，一旦大陆出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演卢沟桥事变，恐怕就再不会出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人人都有抗战守土天职”，出现与入侵者拼死相搏的淞沪战场壮井了。

（一）如此建设

再看看中共吹得天花乱堕的“四化建设”。

上世纪末重庆綦江门户彩虹桥突然垮塌，致使四十多过桥行人顿时命伤黄泉，这种惨案实际上充满了这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为减少这种恶性事故重复泛滥，当时朱融基特指派中央电视台赴重庆，就虹桥事件负责人举行公判会，用电视对公审现场进行了报导。

可是道德沦丧已深入国家中枢，人们对人命关天的事已麻木不仁，劣质工程有增无减，进入 2007 年以后矿井垮踏、瓦斯爆炸造成危及工人生命的事故频发，除翻墙得到许多消息，这些被认为“负面”东西又为中共噤声。

近三十年来高楼大厦不少，又有多少是服从于国计民生需要呢？

新近距我的住处不远，落成了一家私人营业的休闲娱乐餐厅，因为每天傍晚我都要去龙凤河边活动身体，经过那里的门口。看到几十个工人在那里忙碌着装修，只是门面和招牌没有扯出来，所以并不知道这里干什么用场。

待到装修初具眉目，并且在霓虹彩灯下映出了《月光·28》几个大字，才知道它同遍地开花的餐厅一样，名字取得很漂亮。

因为它的位置选在环城公路通北碚市区的第二个路口，隔着公路，面对龙凤河，门前是宽阔的丁字路口，可以摆放几十台小轿车。整个场地楼高五层，每层长约七十米，每层大约千余平米。面对环城马路的一面，全是玻窗结构，视野开宽，环境幽美，算适合于小车一族者们进餐的地方。

中间过道隔开的后面，是一处处隔开的小包房，大概用于玩的人洗澡泡妞！

临三岔路口的一方，还有一个圆拱形的玻璃窗装饰的透明机动升降装置，可供食客玩者上下。

整个餐厅入夜以后，灯光通明。我虽没有进去过，但从设备条件估计在这儿休闲费用一定不低，在北碚地区，属于中档以上消费的用餐娱乐场所。近十几年来，这些场所频频建立，反映的不是一般平民生活的提高，而是贫富的两极分化。

忙碌了一个多月，前几天终于竣工，开业庆典是从前天开始的，接连两天，门口站着打扮入时的年轻女招待。下午五点钟，门口停满了以轿车为主的车辆，每一辆车开来，便从后备箱里抬下一个个花篮，表示来客对业主的祝贺。

我走到花篮前，看到上至重庆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北碚区政府、渝北区政府、北碚公安局，依次是财政局、税务局、房地产公司、北碚技术监督局……几乎本地市政管理机关，都统统名列在花篮的条幅上。

一个北碚私人开办的餐馆老板，请来这么多政府部门为它开业庆典捧场，足见这种靠当官的作背景，不但是一种时尚，简直就是一种规矩。

商而无官，缺了靠山，也缺了财源，要想私人独撑，应付税收、治安等等的纠缠，简直是不可能的。官为商提供条件，商为官提供贿赂，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致！一个小小酒楼老板都能贯彻这个宗旨，可见它的普适性。

我正在想，突然门里撞出来的一位税务稽查胡某，他曾是我在中学教过的学生，后来在税务局升了官。此时他满脸通红，后面跟着是他的老婆和儿子，手里都提着一包“礼品”，他已带有三分醉意，但还认得我这个“老师”。打过招呼后，便偏偏倒倒提着东道主送的“大礼包”，走到他车前，一家人上了车。

看到这个学生，我又在想，东道主送给捧场人的大礼包，甚至还有“红包”，也不知价值究竟多少？几十个单位，每个单位来人至少是五人，带上他们的家眷连吃带包，老板要拿出多少钱应付这些白食客？

然而商人当然不会作蚀本生意，花出去的钱，开业后在几天之内就赚回来的。有句民谚：“舍得会花，便懂得会赚。”投入的本钱越大，赚来的钱越多。不管胡锦涛如何讲八荣八耻，也不管他口头上如何扶助三农和消除贫富悬殊。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权。没有监督，一党独裁对少数人就有这些好处！

当我走过那儿，一个醉汉从旁边的小餐馆里出来，对拦住马路的小车群，脸上显出鄙夷，带着点醉意怒喝道：“滚开！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摇摇摆摆走过“月光 28”门口，指着站在那里的女招待说：“我不敢惹你，只有大佬才玩得起你们，哈哈……”

表面看，后极权时期，中共把工作重心投入经济建设，中国经济的增长比某些发达国家还快，那是因为毛泽东留下来几乎是没有公路桥梁的“处女地”。人口众多，劳动力剩余的中国，只要将资金投在公路桥梁，高楼大厦等等，实现 8% 的增长速度是容易的。

地方政府为凑足工业增长的百分比，不惜重复建设。本来市政建设已够畸形的，拆了又建，建好又拆，这种加在贫弱经济上的可怕浪费，处处可见。

另一方面，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上增长甚微，百姓收入和民生改善几乎停滞，甚至倒退。

同时，高楼大厦下，藏着无数穷愁潦倒的苍生，他们蜗居在城市角落。走进这些贫民窟，里面的脏臭，使人不敢相信，他们就是高楼大厦的建设者，配称为城市的主人，居住的小屋潮湿阴暗，四壁破墙难遮风雨。破床上堆着肮脏发臭的破絮，夏秋蚊苍蝇绕，冬日壁上生风。

然而新闻媒体，在摄下高耸的大厦时，却很少用笔为贫困的民众呐喊。是被人遗忘而忽略？是因为新闻主管的特务紧盯？

（二）乞丐、娼、赌、毒

我刚跨过丁字路口，就看见马路旁，一个跪地行乞的乞丐，蓬乱肮脏的头发遮住了他的脸，衣衫褴褛，年纪已经不小，手里捧着一个破盆子，正在一个劲的向过路人叩头。有好心人见他可怜，动了恻隐之心，摸出五毛或一元钱丢在那讨钱的盆子里。

“月儿湾湾照九州岛，几家欢乐几家愁”，古老的悲歌在贫穷中国大地上反复吟唱了千年。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越是水深火热，饥寒交迫，越是赞歌不断，谁在大街上唱悲歌以抒发压抑的内心，就要作好被抓被斗的准备。

这几年，残迹的乞丐可以推着一架破旧的小车，放着民间传统的哀歌，向路人乞讨。若是在饥寒交迫的毛泽东时代，谁敢在大街上公开说一句‘我冷，我饿’，发一声‘你们发发善心救救我吧’的求救声，必会受到警察严厉盘查。弄清那乞丐从那里来，家庭出身是什么？倘如出身五类，定遭斗争会，领到一顿暴打当即性命难保。倘若是一个平民出身，也定会关进看守所，在那里有一群专等二两罐罐饭的无赖打手，围着乞丐开斗争会，直到把他折磨到生不如死才了结，所以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乞丐。

现在，我在小城街上随处都会看到这些可怜的人们，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鹑衣百结的中年残废人，断腿、断手、四肢畸变的；有的扒在人行道中，以路为纸，用粉笔，或以口噙毛笔，写出颇公整的仿宋体，自编出五言或七言诗句，倾诉自己不幸的遭遇。

从他们所写的，我还读到对贪官污吏的控告，说当地乡长村官，不但不施舍他们，反而驱赶他们，背井离乡流落天涯。社会的不公平暴露无遗，**同时说明中共无能治理不公平的社会；**

衣衫褴褛，头发脏乱的女人，抱着残迹的孩子，面前摆着一个碗，押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她和孩子的身世，跪在地上，埋着头，向路经的行人伸出她的手……

新近，中山路最宽阔的步行街口，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前面的地上，摆着主人的文凭，和他身份的证件，一张白纸上写出他流落街头的原因，它告诉人们，残迹人并不像邓大少爷吹嘘那样，受到‘党’的阳光普照，即使读到大学，眼睛失明，依然只有流落街头卖艺行乞的命。

桌上放着电喇叭和电子琴，肩上挂着一个吉他，弹动吉他，一边和唱着歌，喇叭里放出他唱的歌声，音色哀怨，桌子周围吸引了一大圈路人。从他的琴艺和歌喉，我判断这是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盲人，桌前的盆子里甩着一些零钞……

有人悄悄议论，说瞎子的文凭是假造的。但我想伪造文凭，已成时下热门。

马路上，墙壁上到处书写着土‘广告’，上书‘办证’两个字，留下电话号码，这种民间广告被称城市‘牛皮癣’。

社会上纵然假文凭、假证件满天飞，机构庞大的城市管理机关，却视而不见，任由它们“装饰”市容。

不过乞丐却大可不必使用假文凭，因为人们对求乞者的施舍，几角块把钱，不会因求乞者有无文凭取舍。

可是报纸上把这些因失学、残废的行乞者，说成骗子，并说有百万巨富的‘叫花王’，列数他们的招数。

而我认为，这是对中共统治下贫穷失业现象的漠视，乞丐是社会底层中最可怜的人群，他们都是身体残疾，或被社会抛弃，走投无路时不得已而为之，他们除了靠人的恻隐心给与施舍，几乎没有有效保护自己生命的手段，更不会顾及人们对他们道德上的非议。

前几天就有一则消息，一群恶少，无凭白故的围殴两名行乞者，致其死亡，媒体却流于一般报导，对如此凶恶的行为，并没发出社会应有的谴责！

又一天下午，靠汽车站不远摆着两个摊，一个七十开外的老人坐在地上，他的面前放着一台洋琴和扩音器，和一个盛钱盆子。听他拨动琴弦，演奏‘天涯歌女’虽不悦耳，却足以表现他行乞的哀怨和无奈。

老乞丐对面相隔十公尺处，又是一个摊，却是一个女孩手拿一个话筒在那里哀唱，面前摊在地上是一张求乞书，标题醒目：‘请叔叔阿姨们帮帮我’求乞书告诉路人，她是一位家在合江的苗族姑娘，今年初中毕业，父母是农民因负担不起昂贵学费，要她小小年纪便打发人家……于是她流浪乞讨，期望遇到好心人，帮她继续读书。求乞书旁摆着她的学生证和几张证明品学兼优的证书……

一老一少，并没多少人围观，闹市街上，这种事司空见惯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在天奇广场前散步，又碰上了一男一女两个年青的行乞卖唱者，男的拿着一把提琴，女的提着一把二胡。

被男歌手哀怨低沉的歌声吸引，我挤进人群，仔细看了放在地上他俩的身世介绍：他俩是贵州某音乐学校的学生，家在农村，今年秋天，因家遭水灾，家园被洪水冲毁，不但不能供他们继续念书，还巴望他们拿钱回家救灾。

两人只好辍学卖唱。那男歌手正好廿岁，正是我当年轮为右派的年纪。听他歌声哀怨凄凉，不知怎么联想到读书时代的我，听着听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正是“凄凄不似向前声，满街重闻皆掩泣。街中泣下谁最多，七十老翁青衫湿”。

从身上摸出十元钱，放进他们面前的盆子里。不料两个孩子放下他们手里的乐器，站到我面前，躬躬敬敬行了一个礼。

每逢周六，辽宁路、中山路、胜利路的街心花园附近，会出现许多年纪在二十岁上下的年青人，他们身背书包，面前地上摆着一张写着‘家教’的纸，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群还在西师，西农求学的穷孩子们，利用假日出来，为自己找一点伙食费或书费。学费的昂贵，社会的贫穷可以由此窥见。

有人解释满街挑着水果、小菜叫卖的小贩；背着皮鞋箱替人擦皮鞋的妇女老人；或手里提着一个电喇叭沿街收买废旧的‘破烂王’，是农村富裕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正常现象。

我住的这条街又是城市的‘红灯区’，多年来沿街布着发廊、按摩店、洗脚城。大白天涂脂抹粉的年轻女郎，坐在门里向过路男人频频招手；甚至于游走在大街上，见到上了岁数的，便凑上去答讪：“要不要”？会意者如果答应，便会跟着‘介绍’人走进背街小巷里，那里几个三十岁上下的‘红嘴鲤鱼’半裸睡在被褥乱扔的床上，见有客进来便打起精神与来客讨价还价。

城市郊区，去重庆的马路上，一过白马桥，黄昏时间，就会看到一个接一个红色的大伞，像一朵朵罩撑在大路两旁。伞下坐着稍加打扮的女孩，不断向过路汽车司机招呼，敞若是‘熟客’不用多话，司机煞住车跳下驾驶室，便挽着从伞下走来的女郎，很快消逝在丛林中。

听说重庆市中心附近，还有专供上了岁数的女老板的‘三陪男’，打的招牌很别致，什么‘明月楼’，‘醉仙居’。低档的茶楼，消闲房遍及背街小巷，一方面因精神无寄托；一方面失业人群无以为生。

先前受礼义约束，廉耻规禁，皮肉买卖就是在十里洋场，百乐门里，为普通市民不齿，有识人士所不肖。自文革以后，礼义廉耻扫荡殆尽，皮肉生意得以在大白天公开在大街上揽客。

因为久居月亮田，周围的居民都知道鳏居独身的我，楼下一家‘美发厅’的老板娘，几次向我示意，叫我进去‘玩’，都被我拒绝，她因此说我太吝啬，其实我打心眼里替这些不满二十岁的‘美容小姐’难过，也替她们的父母难过，将心相比，一个正常人家的父母，怎忍心自己的女儿去干这种事？

自邓小平执政以来，最大政绩，无过于麻将的普及，八十年代五讲四美风行一时，扫黄禁赌虽风声大雨点小，一般小百姓行赌还要藏着玩，后来，生意做大了，为官者应酬所需，赌场愈多，赌资愈大，赌风益盛。会赌的不仅以此贿赂官场，奸商以赌为媒，兴风作浪。

干脆赌也市场化了，专营赌场的老板像开妓院的鸨婆，大小兼有，公开的于大街上摆几张麻将桌，以应付查赌的，暗处则在地下室，或山间别墅，那排场就大了，那里往往就是黑社会的窝，兼营毒品，也是大官二奶的消魂处。

因为教育沦丧，道德的颓落，使社会秩序恶化，市民麻痹了，这又是毛老魔头给社会造成的灾难。人们交谈动不动用对方的妈出气，小市民三句话不对，便要捋拳搓掌，甚至于拔出凶器逞强，伤人性命。

中学生打群架之风盛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因帮会厮拼，青红帮大爷为争码头，打群架的事已远去多年。中共后极权年代，流落街头的青少年，打群架而酿成流血的事件屡见不鲜，警方视而不见，就是死了人，也取搁平了事。他们害怕惹恼了黑社会，招来意外麻烦。

毒品泛滥已成灾害，返毒的人，瞄准位于市中区的天生民中和四十中学，两所学校学生厕所经常发现用来注射大麻的针管。

母亲的义子，工商联的李重生，家住望龙门，他儿子李辉上高中时因碰到吸毒成瘾的周兵，为筹毒资，周兵逼迫李辉向家里要钱，为躲避亡命的周兵，李辉几次逃学，被李重生追问查实，无奈之下只有被逼转学。

（三） 假

因为商人为赚钱而不讲道德和诚信，假货充斥，欺行霸市，直接危害着贫苦的人民大众。假药品，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充斥市场，其根源就是专门欺骗百姓的社会风尚。

有奸商就说：“毛主席就是骗老百姓的山大王，我们跟他学一点，真是鸡毛蒜皮，那算得了一回事？”

有一天，我碰上一个年龄与我相当，衣着破旧，面相老实的农民，正提着一篮鸡蛋站在天生菜市的进口出售，他向询问的顾客许以“假一赔十”的承诺，当时我相信了他，从他的篮子里选了二十个蛋，拿回家打开一看，真上当了，怀着一种受骗，想借此劝告这个农民大哥，我提着蛋当即去找他，幸好他还在那里。

我从五十年前的大跃进讲起，（他不致于忘记，那一次运动，农民被共产党的邪说骗得一无所有并陷入饿殍遍野绝境），一直讲到今天，严肃的告诉他，受欺骗之害最深的是他们这些老实的农民。

中共“不谈过去”，反而使它不光彩的过去，变成倍受年青人关注的“敏感”话题。邓小平为了推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取而代之，便说，国家已处在崩溃边缘，既如此，又为什么自相矛盾对毛三七开，可知不让人说真话，正好暴露了中共一贯的欺骗脸嘴。

从毛泽东开始，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从此开始，为了吹嘘政绩，做假成了中共一党专制的政风，国内宣传的‘建设成绩’，拿到国际上没有不被怀疑的，这些数据或指标，既没有权威的核实机构，假风氾滥不止，人们‘习惯’了，但全社会中毒了。

假货可以没收，可以一大堆的烧掉，即使如此，不做假何以图利？所以罚没一时，假货又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冒上来。野火烧不尽、过后定猛生！打假办公室也形同虚设，而对于“软件”，就更不能用罚没这样简单的办法可以禁止。

中国的教育可说是受害最深的一个领域，既然走后门，靠老爸可以轻易入仕。要文凭干吗？何况文凭本是一张纸，原本可以伪造，大街小巷贴着假文凭制造人的电话，只消一个电话花几百元钱办妥了，何必十年寒窗苦？

六四运动不是早就呐喊，学生没有一方可供容纳课桌的“地方”么？年轻孩子们只好相沿着做假了。这些年来，凡遇考试，学生在卷子上几乎人人作弊，从小学一直抄到大学，考场成了作弊的公开场合，高考的课堂里有所谓代人作试卷的‘枪手’，每次考试只要花上几千元请枪手代考，如此而已。

被录取的学生，怎能见得真成绩？反正那种靠父母入仕的，与请枪手过关的都差不多。在这种考试的竞争场上如此，那里寻觅真才实学的苗子？我的几个朋友叹息这一代不如一代的教育。

进入 2010 年，当权官僚后代，逐渐取代统治，所谓“老子打下江山，儿继位”，中共太子党渐渐得势。尽管胡锦涛用“和谐社会”掩盖太子党间日趋恶化的内斗，但官僚腐败，民怨沸腾加剧了太子党间的内斗。

在第二年中东茉莉花革命期间，在民主潮流冲击下，中共体制越益腐败，民主运动越来越显示取代独裁专制的趋势。

2009 年重庆唱红打黑运动，从我区公安局长谢某家中搜出的现金就达两千万，谢某任职仅一年，这便是他的“政绩”？其实而今中共当官的，包括那装正神的薄公子，哪个不双手沾满大陆无辜百姓鲜血，哪一个不在任内不成腰缠万贯的富翁？

本次运动中，市公安局长文强被抓，接着，检察长乌小青在看守所里自裁，市长王鸿举被免职。老大们称王称霸，平日里，哪一个老百姓都不敢正眼一视！啊！原来我居住的直辖市，穷的穷，富的富，却是一帮黑帮的乐园。

有人若要展示一下，不过是腐烂窝窝里的苍蝇耗子，翻出来令人呕心。黑幕里隐藏了多少见不得人东西？再瞎的人也可看到这样腐败的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第二节：台湾是中国的希望

想来台湾当局不会忘记，从中共建国之日起，三十年间，借口“镇压反革命”，前前后后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毛泽东还不甘心，还要制造一个“五类份子”，对他们的家属肆意残害，三十年间成千万的中国人冤死在运动中，五千万同胞被饿死。这个数目比抗日战争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得多！

至今侥幸存活者，每逢天阴下雨的夜晚，还依稀听得到死者从天空里发出的悲泣声。

当年逃亡到台湾的人更应牢记，若不是海峡的阻断，毛泽东定要“宜将趁勇追穷寇，”追着杀尽一切国民党人，好像杀不完他们，留下他们就留下了祸根。

（一）不该出现的

2005 年 5 月台湾国民党负责人连战首次访问北京，他把这次访问称为“破冰之旅。”倘若中国人一时没看清国共双方，谁是内战和分裂的罪魁？谁是陷中华于落后的祸首？那么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台湾海峡两岸的同胞，已看得很清楚了。

特别是现在，事实证明三民主义才是求富强的中华坦途！而中共所主张的才是一条绝路。

可是，中共一直对台湾的成就‘恨得要死’，时时刻刻都想消灭这个“异类”。中共自己行动再次证明它是多么邪恶。

连战在向北大师生发表“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中，一再声称：“国民党现在要做五件事，”可惜他所说的五件事，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如果从 1949 年算起，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国民党在小小台湾站住了脚，其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治理台湾拿出来与中共比试的，无非是顺应了台湾民众民心的民主政治！！

现在国民党要做的最最重要的事，便是扩大民主政治制度的成果，向大陆的执政者和民众表明，要想求中国的统一，大陆应当尽快向民主转型的路上走。

值得一提的是，连战怎么就没有想到在此行（哪怕是做做样子）去慰问一下

多年生活在中共压迫下，被残害的当年国民党人的家？去那些被中共害死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和将士送上一个花圈？

可知这些牺牲者是在抗日战争中用生命保卫这片热土的民族英雄！他们才值得国民党痛心，对他们的抚恤才能赢得人心，激励保卫民主台湾战士的士气！也才能赢来台湾本土人民的民心，否则像弃如敝履般抛弃他们，就是抛掉了民心，今后怎么赢得执政的支持者？

不知连战在接受中共款待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住的地方竟是瀛台，这个地方是当年清朝末年慈禧囚禁光绪的地方？安排他住在这里，是巧合呢还是中共有意的暗示？连战此行只能使人相信，国民党当今领导人是一群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但是，刘阿斗是不能校仿的啊！

如果正如连战在北大的讲演中所说：“两岸所走路的方向已使我们两岸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小”，那么他应当强调的是，“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已经从毛泽东的阴影下，走向同我们的差距日渐缩小的道路上”。可惜他的演讲中却让人听不出这个意思。

他还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联合中共治台独’”这种提法犯了社会学最基本错误，曾经不共戴天的敌人，在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错误立场时，就忙着认作联合的对象，来对付本该由台湾内部的和平竞选解决的台独问题。

大陆在毛泽东时代经济上一穷二白，连当年邓小平都惊呼堕入到崩溃边缘，这几年修了点高楼大厦，却陷入高层争权夺利，人民贫富分化，中共上下腐败不堪，老百姓依然过很苦的日子，尽管中共刻意维持极不稳定的民心，然而群体事件逐年增加，国民党当局急着向中共示好，难道他们是瞎子？！

在台湾民众的努力下，不但在自然灾害特多（三百年前还是一个荒芜的小岛）的条件下，建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政治上进步的宝岛，这其中与国民党曾付出的代价（包括大陆上好多人的牺牲和奉献）密不可分，无视这一切的人，小看人民的贡献不觉得可耻吗？

蒋中正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命于度外。”继承人连战可曾记得？礼义廉耻四个字概括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精髓，这个精髓已被中共完全破坏，而只有原台湾国民党人才把这“国之四维”继承了下来，难道连战在继承和破坏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是大非也分不清了吗？

特别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大陆上本该回首这一页，真诚悼念那些在抗战中浴血牺牲的抗战将士，建立抗日纪念碑，并在上面刻记英雄们的伟迹，抚恤他们的后代，但他们除做些表面姿态，并没有任何实在的措施。

抗日战争中，面对着装备和训练占绝对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动员和组织了全体人民，用血肉筑起抗日的万里长城，出现了空前同仇敌忾的抗日气氛。

中共却还在抹杀事实，将抗战的功劳掠为己有。编写和拍摄了大量影视剧，继续为中共趁抗战中，国民党全力抗战的机会，拓占割剧势力范围，制造摩擦的阴谋涂脂抹粉。

更有甚者在‘内战’中，共军大杀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军浴血抗战的国军将士，毫不软手。

不妨让我们都来回忆一下当年的抗日战场：国民政府投入军队，历经南口战役，卢沟桥保卫战，太原会战，忻口会战，娘子关保卫战，淞沪保卫战等大会战二十二次，有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负伤不致被日人生俘，杀身成仁。

以淞沪保卫战为例：参加当年会战的老兵易谨，劳声环回忆往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们亲眼看到有的师团投入战斗，不到三小时，便牺牲了一半，在残暴的野兽面前，抗日将士除了尽忠报国，团结杀敌，再没有其它想法！淞沪战之壮烈，振憾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称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在这场战役中，半数团职以上将领以身殉国，使骄狂的日军大量伤亡，空军炸毁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海军第三舰队旗舰，迫使日军改变原来的战略计划，并为国民政府西迁赢得了时间。

整个抗日战争，国军陆军三百二十余万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八名上将，四十一名中将。空军六千多名血染长空，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战机被击落，海军全部覆没。

现今大陆人又知道不知道，让国际刮目相看的是孙立人指挥的新一军，他以伤亡一万七千人的代价毙日军十万，成为皇军克星，使日本司令部丧胆。另一位让日军丧胆的抗战英雄张灵甫，在长沙会战中夜袭张古峰时掉了一条腿。这样的英雄，却被中共诬为杀人魔王。

而中共吹得天花乱坠的平型关大捷，不过是太原会战的小部份，也只打掉了一支日军运输队。另一个虚构的李向阳更是无中生有，而真正让日人闻风丧胆的委员长卫队，以两个营阻击进攻南京的一个师团，每个卫队士兵阻击着 50 倍于自己的日军。

因抗战的胜利，才扭转了近百年来中国被列强分割的极为屈辱的历史。

这才是中华民族之魂，才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中共抹杀它，除了暴露自己民族败类的本性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再举一例，今年人们在纪念抗战六十周年之际，9月3日在重庆竟发现了：“一位死去的将军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这个日子”，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朱鸿勋将军的坟墓，首次暴露在记者的镜头下。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身经百战，声名显赫的抗日将领，竟被埋在重庆南山黄桷垭的一块红苕地里，长眠达半个世纪！他那在天英灵何等悲伤？而中共不肖子孙并不以此汗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国军53军与日人将战于黄河南北，晋鄂之郊。朱将军不为寇慑，奋勇率军而起，1940年宜昌市相继陷落，他率军进驻湖北境内藕池口，使日军挥戈南下的计划不得实现，1941年除夕，他率部偷袭日军，日军利用空军反袭，朱将军饮弹牺牲。

牺牲后，蒋中正代表中国革命军，追赠他为陆军中将，当时因湖北是日本沦陷区，国民政府将其遗体暂时埋葬于重庆南山复兴村，准备抗日胜利以后，运回他东北老家安葬。

抗战刚刚胜利，中共便迫不及待的挑起了内战，东北三省悉数被共军占领，致使国民政府安置朱将军遗体的后事，便被耽搁下来。

共军占领重庆后，便把当年浴血奋战的抗日英烈，弃之如敝履，长达半个世

纪，他的忠魂无人照料。将军坟茔早已烟没在南山脚下的红苕地里，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痕迹。

1958年“大炼钢铁”时，八个大汉用铁锹硬是把将军墓碑撬出来，打算用来砌炼铁炉，由于碑石仅十厘米厚，根本不够作炉圈，故将它改作炼铁厂伙食团用的水缸。石碑被撬出后不久，人们将墓石等材料拆出，充作炼铁炉的材料，将军墓横遭肢解。

谁也说不清将军的尸体被弄到哪里去了？成了实足的游走在南山耸林荒郊中的孤魂野鬼！！六十年代初，铁厂垮了，一个村民见铁厂的水缸盖材质不错，便请人把石碑抬回家来，充作猪圈石，后来猪圈拆了，石碑又改成了洗衣石。

像这类的事，在中共统治之下可以说是绝非仅有。这种辱没先烈的耻辱又该由谁来承担，谁来洗雪？

两天后（9月5日），媒体又报导了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的牺牲事迹，总算使中国老百姓对真正抗战的中流砥柱，得到了一点支离破碎的信息。这还是因为李家钰之子，李克熙曾任重庆人大副主任之职，这一报导就是记者在组织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访问李克熙所写的一篇文章！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李家钰率二十二军从西昌徒步北上，辗转跋涉四十余日，到达山西前线。1938年2月，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进攻东关，想一举驱逐驻守长治的李家钰部。李亲临前线，明知在装备上数量上，与日军无法相匹敌，仍率部殊死搏斗。

当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报导长治守军，几乎全军覆灭，子弹打完后，继以拳头、大刀、乱石！！城破，巷战中击毙日军两千……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大战，同时强渡黄河，5月21日、36军奉命阻击日军西进潼关，结果在行军途中遭日军伏击，李家钰阵亡。

阵亡后家人留下血衣带回四川，1944年6月13日，国民政府追赠李家钰为陆军上将。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对他下褒扬令，入祀忠烈祠。1945年蒋总司令题词：“勋烈常昭”，其夫人安淑范，亲自撰写挽联：“马革裹尸还，是男儿得意收场，亦复何恨？”

抗日战争喋血沙场的英雄千千万万，可与日月同昭，我大陆作家却在中共操纵下放弃了这许多的素材不去讴歌，而是写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范傻儿”，以他的粗犷无知和鲁莽，博取低级市民一笑，岂不知日寇的残暴，中国军队在抗日的鼓励下的英勇牺牲，怎么容博得一点票房价值？

中共这样做不正好暴露出了他们的汉奸嘴脸吗？无数的抗日英烈在天之灵，怎不对这般不肖子孙扼腕长叹！

特别要再提的，在轰轰烈烈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共为取得割据地盘，在日占区助日军剿杀正浴血奋战的国民党抗战部队，更有甚者在大陆建政后还以镇反为名，大肆屠杀抗战有功的国民党将士，据最近统计并披露的材料，被杀的仅将军以上军官就有百名，将士三百万！与整个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相当！

中共欠下中华民族的这笔血债该怎么算啊！

应告诉后人，今天大好中华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是当年英雄的抗日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而独夫民贼毛泽东居然说，没有日本入侵就没有中共今天的天下，并表示不要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赏。对这样的执政党，台湾凭什

么向它示好？

中共接待连战“破冰之旅”中，也受到各界“热烈”的欢迎。不过大家马上要联想到当年国内战争中，中共与八个小伙伴，也有城下之盟，答应组成反蒋统一战线，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但一经夺得了天下，先前的诺言全都在“不断革命”口号下撕得粉碎：那怕小伙伴稍对“党天下”表示了一点异议，例如小和尚瞿安平，竟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掩盖自己背信弃义的嘴脸，他们还在借八个已成为政治僵尸的小伙伴，玩什么风雨同舟，长期共存的骗人把戏。

每逢过年过节，为了赢得一点民主的美誉，把他们从棺材里扶出来，招待一翻。其作用难道不是胡弄给国际的民主力量看，做给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看的么？

我看今天接待孤悬海外台湾的一个在野党主席，正好说明毛泽东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今天的中共，已将先前的伪装剥去，被蒙骗的老百姓已经觉醒，失去民心是当今中共最感恐惧的。这使我相信由贪婪、权欲、欺骗发动的战争，虽可能得逞于一时，但终将失去一切。

如果中共真的要洗心革面，把自己溶入世界民主大家庭的一员，他们早就该向人民清算毛泽东所犯的累累罪行，天安门城楼上那魔头像，该早就摘下来了。对历次运动受到伤害的无辜者早该赔罪，认错。然而他们依然坚持一党专制，依然在抹杀历史真像，依然对他们迫害过的无辜者拒绝陪礼道歉。

在这种基本态度没有明朗之前，连战慌慌张张跑到大陆上来向中共示好，这不是“好日子过得不自在了”么？，国耻忘了，甘做李后主，蜀汉刘禅这样的亡国之君，又是为什么？

（二）对台湾的希望

六十年来，当年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人在蒋总统领导下，忠实地沿着孙中山确立的三民主义道路走，经过蒋氏父子两代人的励精图治，在一个荒凉的孤岛上终于民主建国成功。民主政治实行以后，台湾人心稳定，生活富裕。

现在大陆上，人们翻墙就可以听到，频频传来大陆民众越海峡之险投奔台湾的消息。

在民心归顺民主的趋势下，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2010 年一位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发表了精采的讲话。

她用赤子的情怀，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眷恋，唱出了一个两岸人民共同的一曲：“中国梦”。

她明确地指出：“礼，义，廉，耻”是中国梦的基石！她以泣血情怀，用周厉王纵容卫巫的故事相告戒，坚决地摒弃了中共以军事为后盾，政治上唯我独尊，经济上炫耀财大气粗，欺压民众，残害异议人士的“崛起”。无情揭发“血浓于水”的欺骗，这无疑是对中共病入膏肓的“独裁病”下的一剂猛药。

她特别介绍了台湾选举的“乱”，说这种人人都有发表主张的自由权，使各自见解充份发挥出来，怎么可能“清风雅静”？所以表面看起来的乱才是“民主政治”的必修课，然而正因此，才能使决策真正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台湾快

速进步，因此雄踞海峡，为表面强势的中共国所畏惧！

特别是讲到台湾小学教育中以“反攻大陆”为教材的那段，令中共闻之胆寒，1976年毛泽东输光了所有政治资本，致使被他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的邓小平，堂堂皇皇走进中南海，抓了毛钦定的接班人下了大牢。直到今天“九常侍”明争暗斗，使中共王朝腐败，逃不掉灭亡下场。

中共长期的打压和收买，对台湾人也是一个巨大考验，1948年至49年，台岛军人，有许多投共的，例如当年空军中就有徐迈，韦大卫感到走投无路，在中共收买下“驾机叛离”。

结果过了几年，他们全都被划为“国民党残渣余孽”遭到残酷镇压，他们本人在折磨和监禁中纷纷选择了自杀，一家老小沦为黑五类，逃不掉家破人亡之灾。

中共对人性的扼杀和破坏，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最大的罪恶。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台湾女作家琼瑶，以一部‘环珠格格’电视剧，赢得了大陆观众的交口称誉，因为被毛泽东扼杀的人性，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得以恢复，人们对人性的渴望和追求便成了《还珠格格》热产生的原因。

另一位台湾的歌手邓丽君，毛曾用淫晦歌相侮，然而她的歌声以颂唱和平、自由、爱情、人性进入普通的千家万户，她的歌，滋润着亿万被毛共扭曲的中国百姓的人性。‘小城故事’用友谊化解敌对，几乎成为中学生人人都会唱的歌。

‘四季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岛’、‘几多愁’ 凄惋美丽，就是她最善长的爱情歌曲，脍炙人口，打开毛封闭多年的人性窗牖，将人回归到本来面目，而不是相互残杀的嗜血野兽，在文化封锁的毛泽东年代，在海峡两岸只有用大炮隔绝的毛时代，却封锁不了邓丽君的歌声！

早在五十年代后期，电视已传入大陆，可是电视作品受到独裁统治的把持，毛泽东时代几个“样板戏”称霸舞台，而邓小平时代，同样禁止优秀的电视作品占据银屏，文化部的官僚们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宁可让低俗，无聊、色情、平庸，占据电视，也不敢让“敏感性”的题材留在文艺作品中。

在中共统治下，像样的现实主义，人文主义，能激发人的良知、友爱和正义感的影视作品真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最近，文化部的统计表明，国产电视剧每年有一半压仓。就是搬上银幕的收视率也极低，他们惊呼每年有二十个亿白扔了，这已经说明独裁统治对文化实行专制的结果了。

几位报社记者和新闻撰稿人，他们在私下对我表露，普遍感到“压抑”，他们说心中最大的苦衷，便是不能说心里话，真话。文艺工作的装腔作势和假话连篇，反映中共不得人心。

而腐败文化趁机在大陆上泛滥，更促进了大陆社会的动荡不安。

比较起来，还是亚洲自由之声的编辑和主持人，比连战清醒多了。因为他们饱赏中共统治年代里所有的痛苦，知道中共的底细，清楚毛泽东的罪恶和后继独裁者的狰狞，他们才是最有资格的发言人。

他们宁可亡命海外，通过电波飘洋过海，以他们的忠诚，以他们传播的事实，揭穿中共专制的霸道和虚伪，向全世界和大陆上传播着真理之声，而赢得中国听众的爱戴。

前几年，我常在深夜中收听他们声音，了解被中共封锁的世界真象和中共内幕，知道我的同胞们一天都没有间断对专制的斗争，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如同与他们共呼吸、共欢乐、共哭泣，他们的声音和传播的信息。成了我生活的鼓舞和精神食粮。

“了解这世界，探索它的未来”，在亚洲自由之声电台编排的节目中，我最喜欢收听的是马平和史东编排的“一周时事评述”。听他们用雄辩的语言，辛辣的讽刺，直刺中共专制无法掩饰的疮疤和内部的勾心斗角，不断揭发中共出卖领土的卖国行径，使老百姓更好地认识中共政权。

鲁南则以其浑重，低沉的噪音播报的“文学禁区”节目，把听众带到了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听到那些死难者的名字从地下发出来的呼声，使我难忘那个惨痛年代独裁者所欠下的笔笔血债。

亚洲自由电台之声以令折服的语言，在浩瀚的天空中织成了一个强大的火力网，无情地射向中共所设置的新闻封锁网链，让一切阴暗角落里用政治欺骗蒙骗老百姓的鬼蜮，现出原形，无法继续得逞。

所以，中共对它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竟使出了痞子惯技，根据亚台的波段和频道，播放强大功率的噪声，在它们播出的时间，同步播出。真理之音，被一片噪声包围，使渴望真理的中国大陆居民，在刚刚得到一片阳光后，立即陷入嘈杂的锣鼓的喧嚣中，回到又聋又瞎的状态。

大陆本属国民党，是毛泽东依靠史大林洋爸从国民党手中抢去的，“反攻大陆”合情理也合时宜。

当然，如果忌讳这党那党，中国人要选择什么制度？民主和自由，得由中国人自己决定，那就在大陆实行选举吧！

把枪口挪开，让人走上大街发表施政的竞选演说，像台湾那样，让选举出来的人组成政府吧！中共你们敢吗？而台湾的人民就凭这点精神建起了这棵美丽的东方明珠，今天中共却用上千枚火箭相虎视，你们真要做民族大罪人，受后代子孙的万世唾骂吗？

第三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真善忍”与“假恶骗”

不愿放弃独裁衣钵的中共执政者，明白自己处在人民的对立面，六四以后，特别加强了对民主运动的防备，对于萌芽中的反政府苗头一经发现，立即斩断。但是腐败使自身百孔千疮，小心防备反而增加了人民的反抗情绪。

举个例子来说明江氏集团的惶恐状态：许多年来中国大地出现了练气功强身的修练团体，本身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八十年代最著名的有香功和法轮功。

九十年代，名目不少的练功者从山林，寺庙中“脱颖”而出，在民间广为传播，其中尤以法轮功传播最广。

由于法轮功提倡真、善、忍，反对奢侈，练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颇得普通老百姓的青睐，练功人数迅速扩大，几年来参加修练的学员发展到数千万之众。

中南海广场因环境安静，空气清新，历来是老百姓练功的去处，选在这里练功的法轮功学员渐增，守卫人员以中央首长要在这瑞安静办公为理由，横加干涉。试图禁止学员在这里练功。

干涉的官腔，惹恼了练功的老人们，开始相互攻讦，警卫人员用武力强令禁止，江泽民用毛泽东镇压百姓的章法，用暴力驱散练功的百姓，并在 1999 年 7 月 22 日，以中共中央民政部、公安部联名发出不准修练法轮大法的通知。用一顶新帽子“邪教”扣在法轮功学员头上，取缔了法轮功。

于是，一起本来很容易协调安抚的练功场地纠纷，变成了与全国数千万法轮功学员的对抗，这便是独裁统治的恶例。

练功者的反抗怒火，迅速燃遍全国。江泽民效法毛泽东，出动全国警力搜捕坚持练功的法轮功学员，拘押他们，查封数以千计的练功站，焚毁他们的练功资料，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邪教运动。

为了对付这个人员巨大的练功组织，成立了“630”专案办公室，恐怖再次笼罩了大陆，数以千计的人，因邪教罪名关进劳教场和精神病院，进行肉体和精神摧残。借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制造惊世丑闻。

被迫转入地下练功的信徒，并没有屈服，他们像当年活动在日本鬼子占领区的游击队，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散布传单，张贴标语，揭露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

许多法轮功练功学员被迫流亡海外，将中共破坏信仰自由的恶行传遍了全世界。他们与流亡海外的反中共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海外声势浩大的统一阵线，使江跨出国界如丧家之犬，处在一片喊打声中，凡江泽民参加的国际会议，必遭受自发组织起来学员们示威抗议。

江泽民的霸道源出毛泽东，证明，毛泽东在大陆阴魂不散，国无宁日。

打开法轮功的书，明白它的宗旨是提倡“真善忍”。“权”“钱”交易和物欲横流让人们窒息，他们用“真善忍”对抗中共的“假恶骗”。

记得我是 1998 年，在南坪的打工现场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印发的小册子，从中了解了李宏志其人，但初初接触印象很浅。

1998 年春天，有一天，老马公司的一位管理生活和伙食的女工周某，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老孔，你要不要戒指和项链？”我好奇地问她，我从未带过这些东西，你问我是何意？

她说：“我想把我戴的这些首饰卖掉，托你找个买主。”

我说：“你缺钱是吧，要不，好好戴着戒指折价卖掉岂不可惜？”

她说：“我因为心脏不好，长期失眠，甚是痛苦，三个月前我看到我的老邻居李大妈的老肺气肿居然好了很多，问她吃的什么药，是怎么治疗的？她才告诉我，这是她练功收来的效果。在她的劝说介绍下，我同她去了石坪法轮功点，

加入了他们练功行列。

现在已三个月了，果然见效，失眠，气紧，心律不齐的毛病大有好转。听老师指点，练功时不能穿金戴银，练功先要练心，做到心静，欲敛，方能收效，并说法轮功学员要三忌，忌贪、忌色、忌追求功名。现在练功收到了实效，我的首饰留着没用处，倒不如卖掉，给孙子上学用。”

又过了几天，她给我带来了“转法轮”的小册子，上面除介绍法轮功宗旨，还附有练功的图片。从那时开始，我更了解法轮功，江泽民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却启发了我。联系我的一生经历，把毛泽东的学说定为迷信和邪教才恰如其分，中了他的毒的中国人，有几个是保留了做人良知啊！

没想到 2002 年我从新回到马老板公司打工，有一天又碰上了这位周师傅，问她现在还坚持练功吗？她摆摆手压低嗓门说：练功站早被捣毁了，我还受到了追查，但我回答他们说：“我这把年纪用不着他人来训斥我” 现在为了躲避麻烦，明里不练了暗中我还坚持天天练，否则心脏病要发作！

说完后沉思良久，叹口气说，这么好的功被禁了，那些公安对贪官污吏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个什么世道啊！说罢她又大骂江泽民，说他只能在国内老百姓面前充狠，他出国访问那一次不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臭鸡蛋“迎接”，只好像蛤蟆一样躲在防弹车里，连面都不敢露……

然而，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法轮功在海外以其‘真善忍’的人性魅力，不仅在国际上赢得广大信众，他们在国外创立神韵，用美丽的艺术，真正继承并发扬了华夏传统文化。他们用事实在全世界面前揭穿中共法律的随意，虚假，中共是一伙无法无天，颠倒是非，混淆善恶的恶棍，毛教才是祸国殃民的邪教。

特别是中共借审讯为名，对无辜者大施毒刑，割摘信徒的器官，活显出中共野兽面目，在大量确凿事实面前，2009 年 11 月西班牙国家法庭，承接了海外法轮功信众的起诉，正式以灭绝人类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中共高官。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道有常，审判结果罪犯的罪名若成立，从此这些人只要跨出国门一步，在世界任何地方，法院即可按引渡办法，立即进行抓捕。看来他们总有一天会以罪犯身份接受人民正义审讯的，而今天距‘邪教’法之颁布才廿年。

（二）群体事件—民愤

毛泽东死后，全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1978 年北京西单墙民主运动尤具代表性，例如北京民刊《探索》主持人魏京生，与此同时相继有任畹町，《四五论坛》主编徐文立，民刊和民众组织联席会召集人刘青人，上海人权协会王辅臣，武汉市朱建斌等人成立武汉民主墙，与秦永敏合办民刊《钟声》，他们都为大陆民运开道，是大陆民主启蒙的先师。

然而这些民主启蒙的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中共残酷的镇压，‘六四’以后，老百姓仍被禁锁在专制主义的牢笼中，基本权力被剥夺。争取人权的民运领袖们纷纷被捕，有的逃亡海外，在海外与六四民运人士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相呼应，成立以争取实现中国民主为纲领的民运组织，携手战斗。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陆正处在独裁全面解体的过程，用和平方式去推动顽固的中共结束中华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同去世界接轨！是大陆的主流

中共推行的专制主义的罪孽越深重，所背的包袱也越沉重，中国注定还会徘徊在表面平静，而内部动荡的年代。它那摇摆不定的步伐走向何处令人怅网。

邓小平继位后，出于与毛相同本性，除吸取经济上到了崩溃边沿的教训，提出经济建设是硬道理外，原封不动的继承了独裁衣钵。

现今中共在制定国策时，无论开中共党代会或人代会，都清风雅静听到一个声音，看一个表演，抬着傀儡：一起举手，一致通过。

专制主义视民主为大敌，它拒绝任何民主制约，经济虽然发展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却无法控制了。人民被激怒了，‘六四’燃起燎原大火，证明独裁统治必然引起政府与人民的对立。

所谓公民的合法权是指选举权、人身自由权、生存权、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这些各国宪法公认的权利，一直被独裁的中共诬为资本主义自由化而被剥夺，中共统治下人民是没有任何自由权的奴隶。

反对失业，维护就业权；反对对住房的强迫拆迁；反对克扣工资；反对征收苛捐杂税；反对不顾生存环境的建设；反对对农民土地的强迫征用等等。所以目前所指的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绝大部份还仅限于维护公民的生存权。

‘六四’，中共在光天化日下，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可见它的本质多么邪恶。‘六四’运动是因贪污腐败，中共各级政府大量侵害老百姓生存权的非法行为所引发的。

说这些年来‘六四’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就是指人民在它的启发教育下，懂得用维护自身的权利向独裁作斗争的道理。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证明，老百姓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任人宰割不知反抗了。

对于贫穷老百姓手里极其有限的钱，都要收入国家金库，这本是专制政权的‘绝招’，从上一世纪末期因扶助民营企业而允许民办银行建立，是经济的一种进步现象。可惜没有多久，对民办银行便以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加以取缔，给取了一个新罪名：‘非法集资’。

后极权时代，中共对钱的好处有了浓烈的兴趣，民间那点可怜的钱也成了他们聚敛的对象。2001年，中共突然决定，冻结所有非国有银行的民间集资，穷苦百姓为了买住房、准备儿女上学、筹办婚事、生病住院等等需要，平时辛辛苦苦换来的钱，集存在这些银行中，不说清原因便加以冻结。

加上中共素有霸占民房，以没收名义强抢老百姓钱财的恶迹，这个荒唐决定刚一出炉，立即引发了大规模民间抗议。人们立即聚集到各地政府的衙门口，表达强烈抗议，我看见各集资银行外的马路上，被抗议者占满。

他们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上面写着：‘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决定！’；‘强烈要求政府归还我们的血汗钱！’；‘责问政府，你们的做法同强盗还有什么区别吗？’；‘朱融基，你就这样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当的总理吗？’……

马路再次被老百姓围断，面对愤怒的民众，集资银行的职员吓得紧闭大门，龟缩在工作室不敢出来。这样相持着不知过了多少天，集资银行向每天围聚讨债的民众贴出‘安民告示’，说：‘大家的钱已转存国家银行，请大家保存好集

资的凭据，听候通知，到国家指定的银行兑换现金。’

至此，市民不知多少不眠夜，悬在心头的大石头才暂时稳住。

以后市民们不断的拦马路、上访各级政府、围银行，也不知闹了多久，集资银行门口才贴出了‘兑现通知’，叫集资者根据集资金额的大小，按口家利息分期分批兑现。整整闹了一年多，一直悬着的贫苦市民的‘血汗钱’本金，终于在市民们群起反对所施加压力下，从新要了回来。

那段时间，我只要一出街，就会看到写着‘还我血汗钱’，的横幅、标语到处都是。市民的交谈中少不了这个话题，也不知多少家庭主妇与丈夫为此口角，甚至闹到离婚的地步，贫穷的中国老百姓还要对自己糊口的工资，提心吊胆，害怕被中共‘没收’了。

这起因集资引发的民运整整持续了五年之久，待到归还时，本金要了回来，但利息取没有按集资银行所承诺的偿还，而是按国家规定的极低利息偿付，从此老百姓手里的钱又被国家控制起来了。**独裁统治者搜括民脂一贯不择手段。**

大家都知道，毛的独裁统治是以国家垄断为经济基础，工业、矿山、能源一律实行‘国有制’，农业实行集体化。

人民公社这一毛独出心裁模式搞得全民饿饭，天怒人怨，邓小平就是从这里找到突破口，从被打倒的位置上翻身取代毛指定的接班人，进到了邓小平时代。

在‘改制’名义下掀起一场由国有变私有的运动，实际上把国有这种独裁占有，变成中共权贵掌管的‘公司’‘银行’‘部门’所有，在权力与金钱等同条件下，吃亏的当然是一无所有的工人。

接手老板在中共的卵翼下，第一件事就是把‘多余’人员裁减出去，大量工人被解雇，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他们走上了维护生存权之路。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除各级中共大小官吏贪污、包二奶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外，民间闹得最凶的便是‘下岗’。

所谓下岗就是失业，穷人一家因此而断了生活来源，刘欢一曲‘再从头’的歌，响遍大街小巷，也不知唱哭了多少下岗、待岗者。

命运让他们蒙里蒙懂跟着共产党在国有企业中安身立家，已将一辈子都贡献给这‘家’的四、五十岁的老职工，怎么也没想到，中共竟无缘无故抛弃他们，家破灭了，他们已到行将退休的年纪，便被轻易甩问街头！一家人生活无着，夫妻因此闹离婚，家被撕裂的悲剧我没有统计，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附近一家电器器材厂破产后，一对夫妻双双下岗，家里已有半年没买过肉。有一天中午，两个幼小的孩子看到邻家孩子端的碗里有红烧肉，便吵着妈妈要肉吃。

父亲心里正烦，突然把左手摆在菜板上，右手提起菜刀，眼睁睁挥刀向自己左手指头砍去，只听到大女儿惊叫一声，看着父亲从菜板上捡起砍下的血淋淋手指头，怒目圆睁向小儿子甩了过去，吼道：‘给你吃！给你吃……’

被惊呆了的两个孩子抱在一起，呆对双手血淋淋的父亲。

说起肉，又使我想起邻居一个下岗工人家里已有好几月没买过肉，父亲为满足孩子吃肉的要求，有一天父亲到肉店里偷了一块不到一斤的猪肉，不料被人

当场捉住，肉没偷成反而挨了两耳光羞辱一顿，回家后，一家人抱头痛哭。

一位母亲因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生了两个女儿，男主人因下岗，丢下妻女独自外出打工。先前还寄点钱回家，半年前钱也不寄了，电话从未打一个回来。女主人替人帮佣，但要维持两个孩子的生活，早就无法维持。

有一天清早见街上还没有几个人，牵着才六岁的小女儿，经过街心池塘，突然停下脚步指着池里的一双鞋，叫女儿下水去捞上来，趁女孩不备，她竟将孩子推入池中，仓皇逃离。

池中孩子大声呼救，过路人把她从水中救起。在目击者指证下，派出所民警抓走了孩子的母亲。从破屋里带走这女人时，女孩哭喊着一路追着带走她母亲的警车，喊道，妈妈没有把她推进池塘，她的妈妈是好妈妈，一面哭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而警车里的妈已经泣不成声。

周家岩下的一个小厂破产后，由于生活无着，有一家人，男的勒死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后，上吊自缢。

这种悲剧在大陆上充满大街小巷，人们听多了，习以为常也麻痹了。然而这些大陆正上演的幕幕悲剧，虽不像毛泽东时代，大批饿死、成批枪杀那样令人心惊肉跳，但这些老百姓的斑斑血泪天天都在发生。

2001年8月26日下午5点多钟，我正在杨公桥寻公共汽车准备回家，见公路中间，聚集了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簇拥着一些牌扁和标语组成的方阵，将马路拦断。方阵上方扯起一幅横亘马路的横幅，上面写着：‘失业工人争生存有理，防暴警察无理打人有罪’十九个大字。

一股文革的遗风，陡然袭入我的眼帘，那栏在路正中的牌扁上方，贴着一张毛泽东彩像，下面贴着“请愿书”，结尾上写着灯泡厂和水泥厂的职工签名，那上面横七竖八的写着几百个名字。

牌扁的后面，是许多由老头老太婆手执的竹千板做的标语牌，每一块标语牌都贴着毛的像，内容相似。几百个老人和他们簇拥的‘牌扁一标语’方阵，俨然像一座祭神的坛，坛的前面，并排正襟危坐着满头白发的老人。已是下午六点钟了，这些老人表情严峻，严阵以待。

我挤进人丛，听围观者七嘴八舌议论：“工厂是国家的，现在破了产，工人只给几十元的生活费，就叫他们回家，物价那么涨，叫人怎么活？”

“活不下去了，年轻人还可以跑生意，做小工，老人只好饿饭。”

这马路也扎了快一个月了，警察打伤了人，把带头人抓进看守所，关了十来天还没放人，市里下来了几个人，谈判了几回，什么也没解决。带头的人被警察打成重伤，住院一个星期，医药费也无着落。

一辆满载身穿尼采军装警察的警车，就停在附近，他们手中个个握着警棍和电击棒，路人说他们打人从不手软。

这些原国营企业工人，现在因破产而处在生活无着的人们，他们落到这种地步，都是中共造的孽。现在他们用堵马路的方法，意在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

毛皇上为控制国计民生，将工人集中在类似集中营的地方从事生产，给极低的工资，起码的供应，以苟延他们的生命，禁止他们自由迁徙。

可惜又犯了中共安定大局的忌，吃亏的当然是工人。

选择拦断公路的办法打着毛旗反当局的策略，争生存权的斗争，却不敢明目张胆的提出，足见中共当局的霸道。

他们可以在各种年会上称台湾和香港居民为‘同胞’，却狠狠咒骂被生活所迫起来反抗的工人为暴民，动辄以警棍相对！

本来代表国法维持秩序的警察，在公众心目中应是公正的化身，但是毛泽东把它变成了维护统治、施行暴力的工具，从此它与老百姓处处作对，<血纪>上、中两集，记述监狱老管的种种暴虐就是最好证明。

可以说中共统治下，几乎没有维持正义和良心的老管，不久前在上海发生的“袭警”事件中，公共舆论为什么异口同声支持杨佳，说他是抗击暴力的英雄，而异口同声谴责警察？

坐落在重大下方，靠嘉陵江边的重庆造纸厂，因为技术落后，环保能力极低，一直是毒气、毒液的排放地。我没有资料提供死于该厂排放毒气毒水人数的统计数目，单知该地区属于癌症高发区，该厂职工一般寿命只有四十岁。

在这种恐怖笼罩下，该厂的‘领导’经中共地方组织纷纷外调，离开了这个鬼门关。职工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频频上访，被拒绝后涌上街头，曾听说他们截断了江北区观音桥大道，声势很大。直到 1992 年在市民的强大反对声中，该厂宣布停产。

停产后，该厂工人连续进行了长期斗争，直到 2001 年工厂破产，市政府按工人工龄每年九百元买断工龄后，工人们带着被污染而受到伤害的病体离开工厂，自谋生路，还要按规定交纳养老金，直到退休。今天那里的工人们还在为增加伤残、毒害补偿费向政府进行长期的交涉和斗争。

生产特殊钢材的重庆第二钢铁厂，工厂改制后，生产日渐萎缩，面临工资发不出的危机，原先募集工人的股金又退不出来，工人生计面临威胁，引发了持续的截路斗争。中共的特务和特警部队在对付他们使尽了手段。

他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表达出新的内涵，他们意识到自己在中共统治下的奴隶地位，原来的中共党员纷纷宣布脱离中共组织，并公开向社会宣传。

双碑是殊钢厂的中心，工人们拦断了双碑通往市中区的路段。经过很长时间斗争，中共把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另外开通北碚到重庆通道。军警们紧紧包围了罢工范围，禁止罢工车辆越出，封锁与外界的通讯，严禁记者采访报导，隔断拦路者与外界一切联系。

有一天，拦马路通重庆方向开来了几辆军车，向拦路者说：‘重庆市政府正在哥乐山上开工作会，特邀请你们上山当面提你们的条件，市长在那里公开答复你们，特派我们来接的，请上车吧！’指挥部听到这话正在犹豫，却经不住大家七嘴八舌，性急的已爬上了前面的军车，接着大家喊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且上哥乐山看个究竟”便一齐上了车。

等到车队开到哥乐山，大家下了车，看看开到的地方，却并没看到任何开工作会惯有的会场布置，也没看到一辆市政府的小车。正要询问开车人，司机们已纷纷坐上各自的驾驶台，军车已经启动，开足马力一溜烟的跑了……

工人们对于中共堕落到将工人骗到哥乐山倒掉的行为极为愤恨，殊钢厂拦路请愿中军警曾扬言：“打死人算不了那回事，老百姓只要有几万块钱什么事都可搁平，钱不过是国家拿出一叠纸罢了。”

可见在事件中，军警奉了中共指令，对拦路者进行殴打和抓捕，并打死人，然而这留下新的血债又算给谁？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中共对闹事者也作了‘善后处理’，对死者安埋，被抓的参与者释放，拦路者大多都安排了工作，上了岁数都作了退休或内退，将他们交给了民政部门。就这么一些‘实惠’也是工人十几年的长期斗争换来的。

在我生活的城市，各‘改制’厂矿的职工，纷纷为争取增加遣散费和抵制由‘资方’单方面制定的改制方案，走上街头，举行频繁的示威游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山峡洗衣机厂，他们选出代表与区、市级地方政府交涉，进行为时十几年的斗争。

就是最没有声势的专用汽车厂，也在厂门张出横幅，遣责趁改制侵吞职工们多年创造出来财富的硕鼠，几次派出代表到国资委和机电公司（中共指定负责改制的机关），进行历时六年的‘破产—改制’谈判，为‘亏损’而被抛弃的职工，声讨无能腐败的中共官员。

民运推动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公交公司为争得自身待遇罢运；摩托车经营者为抵制交通警察的无端罚款，动辄扣车，在北碚街上联合‘的士’司机进行过多次环城示威。

此外为反抗市政管理机关，工商局无止境无理增收高额的营业税、场地租金而开展的小经营主的罢市斗争；

教师为政府对待的承诺食言，边远地区为极少的工资而罢教事件累次发生，总之各行各业贫苦的职工向中共展开的斗争，方兴未艾。

以上所列均我亲眼目睹，亲耳所闻。

工人为维护生存权的斗争，还带动了市民和农民起来向中共展开维权斗争。村民因争取村乡基层选举的民主普选，向中共基层组织展开的斗争曾遍及全国。河南郑州市南曹乡七里河村 1998 年至 1999 届换届选举中，村民推选的村长提名，被原村中共支部书记杀害，恐怕是农村基层选举一个典型惨案。

这个惨案揭露中国今日的‘民选’遇到层层阻力，根本原因是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所致。农村中少数靠权力富有者，决不会放弃使他们致富的，那点手中窃据的权力。

因建筑开发商强迫征用土地，而引发的涉及贫苦农民生计的反征地运动，一度遍及全国农村。我母亲当年流放地蔡家场，去年因‘开发’渝北区，向该地居住的农民大兴征地，今年三月农民为征用土地补偿太低，与开发商雇用的打手发生多起斗殴事件，被打伤的农民，至今还在为争取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向政府控告肇事开发商。

全国因强迫征地而发生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城市居民因城市建筑，要拆迁他们久居的贫民窟，眼看自己久居的破屋将被待命铲除的推土机推掉，政府却没有安置他们的新居，或草率给了起居十分不

便的另一陋室，而引发贫民们的抗议。脚跟脚地跟着拆迁办人员到政府衙门诉苦评理的事层出不穷，发生扼打阻止拆迁的流血事件，成了民间最多的传闻。

胡锦涛所提的和谐社会，原意在维护独裁政体下，建立唯稳体制，但是病入膏肓的中共独裁政体，把“和谐”，当成与他的祖宗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完全一样的欺骗！

第四节：独裁的没落

1976 年，一代枭雄毛泽东，带着众叛亲离的遗恨，拉下几千万中国老百姓的命债见阎王爷去了。

在他晚年，毛泽东思想已为他的谎言所彻底否定，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解体，信仰危机使独裁面临厄运。国家弄得民不聊生，毛氏深感帝位无人可继，匆忙中，将他的私生子叫来榻前，以一句：“你办事我放心”草草完成了帝位世袭的最后交位，匆匆去见专制独裁的列祖列宗去了。

这本书仅从我亲身的经历，如实反映中共六十年来用社会主义欺骗中国人民，一步步暴露它的独裁、虚伪真面目，走向灭亡的过程。

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掀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目的是迫使整个社会臣服于他的独裁。他将人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建立一个新的人压迫人，等级森严的社会。

为了巩固帝位，他甚至不惜使用专制王朝最残酷的文字狱，要人只读他的“经”，强迫人进行‘思想改造’，把人的思想禁锢在他要求的范围内，不准任何偏离。

他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是饿死那么多人，也必须按他的路子走！皇令如山，就是他的大臣们，稍有偏离也必须领死。因反对他的‘三面红旗’而死中共元老还少吗？

邓小平并不想改变这种个人为所欲为的统治秩序，只是改变了毛泽东在经济建设的禁律，他认为毛泽东所以“失败”就是忽略了经济建设，所以“经济发展”被他列为“硬道理”，摆到了第一位。

人民公社行不通了，用包产到户替代。然而土地所有权仍在国家手中，而在中共统治下，代表国家的是掌握政权的各级地方官吏。这样作把农民变成置于中共地方官吏监督下的农奴，他们随时可以“建设需要”为借口，拆迁农民的家园，驱赶农民背井离乡流落城市。

国有制行不通了，他们可以以一纸文件，对工厂实行“改制”，将剩余劳动力赶出工厂，而把工厂廉价卖给了刚刚新生的小业主，为他们缴纳利税；靠权力将子女以公务员身份安置到国家管理机关，警察，学校，医院，银行，税务，房产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层。

这样，一方面是以地方权力所有者为基础，直到中央的宝塔式官僚统治阶层；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组成了供他们随意驱使的城市建设廉价劳动建设大军。这才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用“发展经济”代替“社会主义革命”；用“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代替

“平均主义分配”。中国在他的带领下走上的不是人人奔小康，而是一种渗入权力的国家资本主义。

“六四”几乎要改写邓小平历史，在大势所趋之下，他宣布退位，并结束了中共的个人终身制，当然也结束了世袭制，同时以“安定团结，压倒一切”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从此换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极权时期。

既然，利益向权力敞开了大门，中共内姓资姓社的激烈争吵，暂时的安静了一段时间，太子党们，人人有份何必争呢？毛泽东独裁带来的灾难，邓小平含含糊糊地掩盖着。既不清算，也不继承，结果反而激怒了毛泽东的旧臣们，他们并不安心退休疗养、享受！

而是指责靠权力发起来的太子们腐败，反而替罪恶的毛泽东招魂了。

在这一时期，中共恶习——说假话依然是官方少不了的“党风”。**新闻管制，剥夺人权，在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旗帜下，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可是，不受监督，使贪污腐败恶性肿瘤般长大。而今成了对中共政权致命的威胁久治不愈。因为“权力资本”只有在不受监督的条件下才能长大。

随便举一例子：血腥屠杀六四的元凶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的案子。据官方公布 1990 年结案，仅他挪用重点建设资金为他营造豪华别墅就达 3511 万元之巨，收受贵重礼物 55.5 万元，吃喝挥霍公款 165 万元，**国家金库成了他任意取用的保险柜。这种‘硕鼠’在中共现政权中到处都是，他们是由一党独裁孕育出来的。**

到了 2004 年，‘六四’过了整整十五年，这支硕鼠大队日渐庞大，各级公务员、法院的法官，公安刑警队长、检查官、缉私队长、反贪局长等凡与政权沾边的人都争先恐后加入。中共官员有“五十岁不贪是傻瓜”的说法，生怕为官期间错过发财机会，令人终生遗憾。

在湛江走私案处理时，最高法院院长感慨面对媒体惊呼：“在这起走私案中，所有涉及湛江市及海关，大小两百名官员无一不贪！”连逃亡在外八年即将遣送归来的赖昌星，也敢出大话威胁中共：‘我若回国被追究，少说也有上百人人头难保’。可见中共腐烂到什么程度？

据透露这个海关使国家蒙受的利税损失高达数百亿，其中海关官员的主要份子，贪污贿款均在数百万以上。当采访镜头摄下被采访的海关一般职工时，他们竟要绕开采访镜头，不敢回答记者所提问题，要求记者隐匿自己身份，以免遭受“飞来横祸”。

可见，政府与黑社会相勾结，猖狂到了何种程度？中共官场腐败已入骨三分，谁跳出揭底，谁就逃不掉粉身碎骨的下场。

但，这种腐败终因“狗咬狗”而不断揭发出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自 2003 年 1 月至 2003 年 10 月的十个月中，全国发生滥用职权案 1841 件，造成 6.5 亿元损失，致人死亡 460 人，伤 117 人。

仅从此官方公布的数字看，大陆每天发生滥用权力的案子就达六起，根据中共一贯粉饰太平，虚报瞒报的传统，这无疑还是大大缩减了的数字，真实情况只有让历史来记载了。

另一说明官场腐败的例子，便是买官鬻爵，这种事就是在封建社会也是绝对

要受制裁的，一旦被皇帝老倌发现，往往带来“满门抄斩”的后果。故云：“尚利者乱，尚义者治”，“贪夫殉财”便是市井的警句。可在中共统治之下，买官鬻爵却成了家常小事。

仍以报载为例，黑龙江市委书记马德从 1992 年 1 月至 2002 年，十年因卖官所得就达六百万元，马德就凭这种“人事买卖”进入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却并没有伤之毫毛。从他手里买得中共高官的人数涉案人员达 265 人。

其中包括大贪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原政协主席韩桂芝都是投他的门下入道。据绥化县市各部门靠他得官当上一把手的大大小的“贪官”，就达五十余人，以致于他的案子层层受阻。中共官场之黑，马德算是一个典型。

国家官员掌权的可以卖官批条，大有大的吃法，小有小的“收入”。甚至于将统考的考卷，犯罪人所获的刑期，都成了有价证券“入市”，堂而皇之进入流通。雇用打手保镖也成了“自卫”的手段，光天化日之下，买凶杀人，使“秉公”执法者望而生怯。如此猖狂的黑恶势力控制之下，又有谁敢秉公执法？

报纸上偶尔出现抗争恶势力的义勇之士，其报导也限于对付鸡鸣狗盗的小贼，这些报导，新闻记者是在黑暗中寻找一点光明的饥渴心理支配下写出来的。如此黑暗统治，怎么不发生烟毒泛滥，车匪路霸横行，杀人越货，强奸卖淫？

失业工人为反对无理解雇的游行；居民为抗议横蛮的住房拆迁；老百姓为反恶吏和贪官的抗议；国家机关的弄虚作假这些为当局禁发的消息，远远还没有登载出来。

当然这比毛泽东统治年代有了“进步”，那时，对大量饿死人的事；逃荒流窜他乡冻死街头；逼使水肿病人下地干活；五类份子被斗被打致死的事，是不准见报的。这样比，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

也罢！我们现在就以官方允许在报纸（2007 年）所登载的消息，归纳成下列五点：

第一，上层官僚集团的贪污案，已成了中共统治集团的不治顽症，这些消息只选登了百万以上的大案，至于几万的小耗子，可以说遍地皆是。无官不贪，是概括当今官场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共设立了纪委检查委员会，后来又设反贪局，百万以上的大耗子仍在逐年增加。

第二，由于官僚集团疏于管理，使社会上人身死亡的事故（包括交通事故和近期突出的矿难事故）医疗事故、传染病、天灾、矿难等灾害事故层出不穷。中共素来就有报喜不报忧的习惯，报纸上已经传播的事件肯定是相当严重，并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公开报导的事。

例如河南的艾滋病传播，2003 年非典的流行，都是在国际卫生组织提出警告，并在亚州自由之声连续报导以后，才在媒体上公开曝光的。而随着这些病态社会现象的曝光，又暴露出与国家管理的相关上层机关的腐败。

第三，毛泽东“共产主义”被现实扯穿以后，代之以“金钱万能”。社会道德的堕落是这个社会是最危险的信号。

为了独裁统治所需而提出的“维稳”，形成人们相互间除利害关系，见义勇为被认为是傻瓜才干的，代之以欺骗泛滥，欺软怕硬，弱肉强食造成整个社会一盘散沙，这种不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气氛害了中华民族。

毒品空前泛滥起来：据报载：世纪大毒枭刘招华在广州过堂，他曾在 1995 至 1998 年间制造冰毒 18 吨！搜查出装成在纸箱内的冰毒，整整堆满了一个篮球场，当场缴获的冰毒相当于 1998 年全世界查获的冰毒的总量！

值得一提的是冰毒集团的成员，大多是中共军队的退伍军人，刘召华本人曾荣立过中共奖给的三等功！大陆变成了毒品的运集、生产基地。

盗劫、杀人、贩毒等刑事犯罪和黑手党的猖狂，使老百姓民不聊生，终日生活在恐怖的阴霾之下。

第四，邓小平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民奔小康”，是太虚假了，他明明知道，资本原始积累是赤裸裸的剥削，哪有全民同富的好事？至今城市贫民每户人平均一百元的生活费的赤贫户，官方没有公布统计的数目，但不会是少数。农村里的人，每户人均每月收入不足五十元所占比例更大。

城市中到处是擦皮鞋的，下苦力的，卖小菜的，挑着担子沿街叫买水果的，收破烂的。洗脚城、发廊里的小姐遍街都是。问他们的家住在哪里？先前还有人说是农闲时节，出来到城市里找活干。

近几年，由于扩大了城市建筑面积，傍城周围的土地被征用了，除了几千元的土地征用费，他们已没有土地，只好流落城市。

这些因中共‘圈地’运动失去土地的农民，是一股使社会不稳的潜在力量。这些人如果身体还健壮，往往因不满自己赤贫处境，铤而走险，杀人越货。

2004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扶贫办公室主任刘坚惊呼，2004 年未解决温饱的年收入仅 637 元以下的贫困户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八十八万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近发布的中国国情的“居民收入分配预警系统，称 2003 年中国人收入差距拉大，已进入值得警惕的“黄灯”区。

贫困家庭中，姐弟俩因解决谁继续读书而抓阄，酿成姐姐跳崖自杀，恐怕就不是个别的悲剧；在这样情况下，少女被迫卖淫惨遭恶徒在脸上用刀刻字，也不是个别人的惨剧；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垃圾堆中刨废铁，而被虚空的渣层垮下来，命丧黄泉的夫妇岂止一对？

第五，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卖国集团：与中共对百姓的残暴统治相对应，为了取得政权，在国际上一味迁就俄国。毛泽东为此而甘拜史大为干老汉，根据俄国外交部公布的解密档案，国人才知道毛泽东暴政的另一面：

1945 年毛泽东在一边倒政策指导下，引狼入室，这一年，为夺得江山，投入斯大林怀抱的毛泽东，与苏联签订了卖国的“哈尔滨协议”，把军政大权拱手让给斯大林指挥。

1949 年又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秘密协议”，苏俄得到中国大陆地下资源的开采权并武力控制东北、新疆。让中国人民为苏俄充当炮灰和工奴；

1950 年 7 月 16 日，中央通讯社又公布了“中美协议”秘密条款 13 条，集哈尔滨与莫斯科两协定，并补入内蒙设自治区，进入西藏条款。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以“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推动国际形势更加走向缓和”为理由，对在押的 1063 名日本战犯处以“一个不杀，对个别罪大恶极者只处以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将 1000 名双手沾满了中国抗日将士和几千

万中国老百姓鲜血的刽子手，悉数免于起诉，“交中国红十字会遣送回国”。（见外交部 2006 年公布的解密档案）

1978 年 8 月 12 日，又未经全国人民讨论，毛的皇位继承人华国锋根据毛氏遗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声明”，正式放弃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国际协议。

邓小平执政以后，为了统治目的，压根就没想到纠正这些可耻的卖国勾当，而是将大陆继续出卖给周边国家，那怕相邻小口看到中共国内乱象环生，也乘机在沿海地区争地争海，对此我就不一一列举。

由于国内形势不稳，不惜以国土为代价，在他统治下，与周边国家签订了“有争议地段”的边界协定，最严重的是承认毛与俄国所签的卖国条约：

1999 年“中俄国界议定书”，中共放弃了 160 万平方公里领土主权（包括黑龙江东 64 屯，唐努乌梁海，帕米尔高原等相当于 44 个台湾领土），

2004 年 11 月 14 日（中俄国界补充协定）中，俄国竟占去了黑匣子岛一半的主权，正式承认了 1999 年的议定书。

有人质疑，邓小平刚上台时，曾指天发誓，五十年绝不搞运动，写在纸上还没过三十年，由中共挑起的‘六四’、‘镇压法轮功’、大规模运动，未曾间断，当时便有人断言：中共离了运动便无法生存。

中共建政之初，不但向全国各界许诺了一大堆民主建国诺言，一篇联合政府的文章欺人民，骗国际，把民主党派哄得围绕它团团转，至今建政六十年了，任何中国人都看清楚了：

六十年来，前三十年，老百姓别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家有洋房小汽车’，给人民不是享受民主和共产主义梦想，而是弄得连饭都没得吃，三十年和平年代饿死、整死过亿，毛贼东是制造冤狱最大的统治者；是古今中外杀人最多的刽子手。这本书只揭其冰山一角而已。

后三十年邓小平执政，老百姓有口饭吃，开始建家，但人民依然权力一无。至今贪污猖行，贪官遍地，他们用国库的钱到国外消魂；贫富两极，贿、赌、毒、淫盛行，邓公喜麻将，在他竭力提倡下市井农村遍地开花，也是他一大‘功迹’，如此建国，还提倡什么五讲四美！

举目世界，独裁统治正一点一点被逐出人类的恶梦，几个不识时务的权力拥有者：朝鲜？古巴？伊拉克萨达姆想用杀人渡日，自己却上了绞架。

经历了六十多年中共独裁势力在大陆的折腾，国家伤权辱国，神圣领土遭可耻肢解，实践告诉每个现代中国人，现在，从新回到民主宪政的大道正是时候，以和平方式再造共和，已是万心归一。

可太子党内竟出现了一个官迷心窍薄熙来，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想出唱红歌的药方，为行将就木的独裁起死回生，一时官办的大小会议红歌一派。

听到令人肉麻的颂词歌声，我会立刻联想毛贼东的大跃进年代，社会主义好的歌声正掩盖了饿殍遍地的大陆哀鸿。

一个‘假’便能概括当今大陆，不光假货充斥市场，假话充斥社会，假象迷漫官场，然而红歌企能为妖孽壮胆？可知，红歌陡起时，

恰恰是中共危机深重时！

在這朝野貪腐背景下，‘红歌’犹如为独裁下葬时的‘挽歌’！

既然中共无自知之明，作为中华民族一员，让我在这本书中简略回顾中共统治大陆期间的所作所为，《血纪》就秉笔直书写到这里。

其实这本书所记载的都是我亲身经历，每个情节断无虚构，由于年代相隔几十年，记忆有所丢失之处，使读者读后可能感到不足。

有人打电话给我，劝我在中共天下，不允再提旧事，今天拿了中共发的养老金安安稳稳怡养天年吧！

但是，我却正告规劝者，我的一生都被毛泽东肆意践踏，他使我家破人亡，知耻而忍辱，我的秉性决不相容。何况**供养我的是中国民众，不为他们说话，我为谁说话？**

加上白白被奴役我们二十三年，中共连工资都还欠着我们，我不向奴役我们的人要，又向谁要？

那些牺牲的挚友们在天之灵，还时时叮嘱我：为我们共同的“民主”大业奋斗！生就了我至死不悔的脾气，何况今日全家人都去到极乐世界，我是天天准备与他们天堂相会。

生活在今天，有冤不能申，有耻不能雪，家徒四壁，我有什么顾忌呵！

说假话的人心是虚的，原苏共头目也会尊“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为俄罗斯良心之父！为什么？就因为凭着良心说真话，就像一柄正义之剑会穿透骗子的心脏，是假话连篇的政治骗子最害怕的！

若要问中国的前途是什么？我说是民心！。东方雄狮不能再长睡不醒！我们决不是任由暴政凌辱的奴隶，在大陆一党独裁必须让位给民主共和。

后 记

「己丑年，离开盐源整整三十年了，《血纪》已完稿，想为它的故地配以像片，向读者介绍这些血腥故事所发生的地方；更想知道经历‘改革’整整三十年，这血腥的故地，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些年来，从那里出来的人，告诉我那里还在不断散出阵阵血腥，例如前年的徐友全告诉我，两位留场‘右派’，因收入拮据，一家人难以生活，分别投水库自杀。

他还告诉我，留场就业的几十个人，连与国营农场职工同工同酬都没有实现。被中共奴役了一辈子，他们现在只凭每月四百五十元生活费，聊渡晚年，有人只好守在这里终身鳏居。

所以，我决定 2009 年清明节期间，重返盐源农场故地。因为我们听说前几年，有人为挖掘这里被中共掩埋的血腥罪证，拍照时，被留守人员阻绕未果，所以本次重返盐源农场只约了荆楚同行，对还在原地幸存的盐源难友今日并不通知，决定快去快回，拍下照片后马上离开。

雷十 马富初 胡俊

同三十年前不同，从重庆到西昌已不用绕成都，石棉，雅安的汽车路，四月八日，我和荆楚直接从重庆到西昌。当四月十日晨，我们突然出现在原农场的中心十字路口，（盐源农场已撤多年，这里已改为盐源果场）我和荆楚走下公共汽车时，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很快问到了车站不远处朱凌飞的家，见到了朱的爱人，在她带引下我们很快找到王文典，罗玉杨，周德汉，徐友华等人。

当天我们步行到了农六队（这里已卖给了私人），过去的高墙电网已全部推倒削平，大门已重修。所幸岗楼、探照灯架，六队大监房以及院坝尚存，好像留下这些遗物是专门为我们提供斑的。

离开六队，我们立即沿水渠步行三里，登上五号山梁，当年张锡锬、皮天明的遗骨就被弃置于此，而今改建成两类人员坟场。

百卦酒农场 (ana)

此时，正赶上己丑年清明节，我当即点燃了随带的香烛、纸钱、鞭炮，祭拜了当年在盐源洒血的烈士们，以及被毛泽东当年残害在这里的数百无辜冤魂！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雇了一辆面包车，驱车水库、农五队、农科所，回顾盐源农牧场建场之初，从甘洛押赴这一片不毛之地的奴隶们，怎样在枪杆下开垦出这个农场。

再驱车去原农七队，在当年农七队，枪杀张锡锬和皮天明的宣判主席台，和院坝，以及陈尸张锡锬的白桦树拍下照片。它们好像为了今天的取证，而完好保存了四十多年。

当年由张锡锬们高举的火炬，照亮了地狱里反抗暴政的奴隶，当年喊出反抗独裁迫害的呼声，仿佛还响在耳边。

我们随即还找到了盐源农牧场场部，摄下关押我和陈力的反省室，以及当年农三队和基三队旧址。《血纪》记载了当年我们向施暴者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经历。

1964年春节，我和陈力从场部的“反省室”，搬到附近一排废弃的羊圈里，当年我们亲手浇灌的核桃树，而今已成了一棵傍山而立的大树。是夜靠它的指引，我们找到了当年的“羊圈反省室”，羊圈已不复存在，那里留下了一亩积水，触井生情我仿佛又想起，月影蒙蒙中金梅的悲歌！

下午我们雇车，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当年屠杀陈力和刘顺森的刑场，当年目击者说，枪杀陈力时，只见他满脸是血，刽子手为了不准他临终时呐喊，而割掉了他的舌头！！为让他跪下饮弹，刽子手刺穿了他的腿！

毫无人性的刽子手，用自己血腥的暴行，永远在人们心中刻下了一道永不会消退的血痕。同车去的人还回忆枪杀陈力八年后，在同一刑场上枪杀刘顺森时，给他打了哑针，使他无法在临牺牲前呼喊……

《血纪》里讴歌牺牲者的壮烈场面，已在当年目击者心中留下了完美的形象。

四月十二日，我们又从西昌坐汽车去了甘洛，这一段经历，是当年我们在流放途中最惨烈的一段，如果1962年甘洛农场在短短七个月，将从内地调集的年轻力壮小伙子饿死了一半，这场全国性大量饿死人的灾难，从1959年算起至少持续了五年，数量之多就更不是四千万所盘点得了的。

甘洛可算我们这批无辜流放者的鬼门关，我从车窗搜索着当年经过的老母坪，直到下午汽车进入甘洛都没看到，下车后我们询问当地开环城车一位司机，他告诉说，离甘洛城偏北二十多里路有一个小地名就叫老母坪。

查地图我才猛然想起，当年是从雅安经荣经进甘洛，恰与本次路线相反，告诉路线的司机还警告我们，城附近聚居的傈僳见了汉人很可能行抢劫，要我们警惕。我回头看了一眼荆楚，估量两人人地生疏，不能贸然行事，决定雇了他的车去西西卡看看。

沿着马路，司机把车只开到西西卡山下，远远相隔，荆楚摄下了山上西西卡的景像，便请司机将车开回火车站。考虑到我们连日赶路，两人都得了感冒，怕在途中发生意外，所以当晚返回成都。

在成都，我们受到省城彭慕陶先生组织的二十余‘右派’同难热情的迎接，热心的彭先生已于半年前，将我所写的《血纪》第一稿付印一批，交给同难们传阅，本次聚会彭先生介绍了我们重返盐源的初衷和经过，期望大家抓紧余暮晚年，写下自己过去的经历，以供历史考鉴并流传后人。

在中共严密监视下，大家的热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鞭策。

四月十四日，我们回到重庆，按照《血纪》记载的故事，我们还将去南桐。

南桐是我们初入‘右派’练狱的进口；是我们最初受到毛泽东虐待的地方；更是我们认清中共的虚伪欺骗，看清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从而放弃幻想坚决抗暴的开始。

当然，大浪淘沙，在中共残暴的摧化下，当年‘右派’这个蒙懂的受害群分化了，甚至也有不齿人类的佯鬼出现。

四月十五日晨，我们乘车到了南桐矿区的万盛市，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当年只有独街狭路的小城，已是高楼林立的渝南重镇了。正感到人地

南桐看守所（旧址）

变异，旧地难寻时，同车到达的一

位姓朱的当地妇女自告奋勇为我们领路，在她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南桐法院，和隐没在居民平房里的南桐看守所旧址！

回忆五十年前，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背着破烂的行囊，跟着带我来的鲁召到了这里，由于信任和依赖，我根本就没去看挂在门口的招牌，当我进得阴深深的监房时，我还误以为这是‘母校’为我另换了一个场地呢！！

就是今天，我也无法理解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怎么会这么忍心，将一个无知的孩子，抛弃在地狱中！中共对人性的扭曲太可怕了。

然而正是残酷的练狱，使我扭曲的神经恢复了正常，使我踏上了正常的人生之程，《血纪》就从这里开始，记载了这条我走过的路。

当我们重走当年拉着成吨铁矿的板板车，飞奔而下的海孔马路，当我们拍下遗弃了半世纪的高炉烟冲时，我们再次知道中国学生群体的大规模灾难就此开始，我们是这场灾难的受难者，因此也是这场灾难的见证人。

若从清匪反霸、土改开始，按毛所规定每次伤害 5% 计，三反、五反、镇反、反胡风、反右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杀一小批、武斗、四五运动、六四民运、镇压法轮功、镇压西藏新疆和全国民运中，有几个中国人没有挨整？

恐怕中共也知道，毛的那一套必亡国，当然也必亡中共。

从 1979 年我离开盐源至今又过去三十年了，初初那种希望中国会从毛泽东的恶梦中醒来，从新开始中国的未来，像新的恶梦破灭了，时至今日，引中

国进入这场灾难的魔头画像，仍悬于国门之上，中国依然是一党专制，中国人难道生就了是在专制政体下做奴隶的命？

大陆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毛泽东独裁的毒瘤长得太深，他虽在万民唾骂中结束了他的独裁，但他发动的那么多运动，却使中国失去了凝聚力。

今天，中共的当权者搬着指头算一算，你们的党欠下无辜者的命债每个人摊几条？加上你们已高度腐败，纵能掌控枪杆子，他们能听你们的话，甘心为你们卖命几天？毛泽东魔力能管多久？回首你们欠下那么多血债，你们不感到讨还血债的一天随时都会降临？那一天来临是非常可怕的。

2010年10月14日重庆国安部三个人造访了寒舍，领头姓白的人看到我独居的地方十分简陋，便问到我的家人，我说都被你们整死了，我也几乎被你们的人整死。他见我态度强硬便接着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劝我不要出版《血纪》。

我也不绕弯子，回答来人：“这是不可能了，你们也知道，你们想枪杀我，牛头马面已带过我去阎王殿了，古人云：士不惧死，耐何以死惧之？”

当然你们可以不依法而按“政策”办事，但“无法”怎么治理若大的中国？至于我写的书既敢在全世界人面前公开，只要我能按事实陈述，而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我是无所顾忌的。你们可以就我所写的事挑骨头，但你们决抹杀不了事实。”

今天，大家已经看到，连中共上层都在惊呼：“不进行民主变革，中国是没有前途的”原因就在奉行独裁只有死路一条，独裁将导致民心殆尽，在世界民主巨流的冲击下，中国不会长陷于独裁的泥坑，我们翘首跼足中国民主大业的成功。

人生如梦，梦醒后方觉自己不过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微尘，生逢恶世，我不知逃过了多少死结，不知不觉今年已过七十二载。当我最后回顾一生，只有这本记载我一生的书留给后人了。希望后来人好好读这本书！从中吸取走自由民主的教训吧！

全书于 2007 年 10 月写完

改

改

2007 年第一次修改

2008 年第二次修改

2009 年第三次修改

2010 年 2 月第四次修

2010 年 8 月第五次修

改

2011 年 7 月第六次修

作者：孔令平

版权所有，禁止翻印